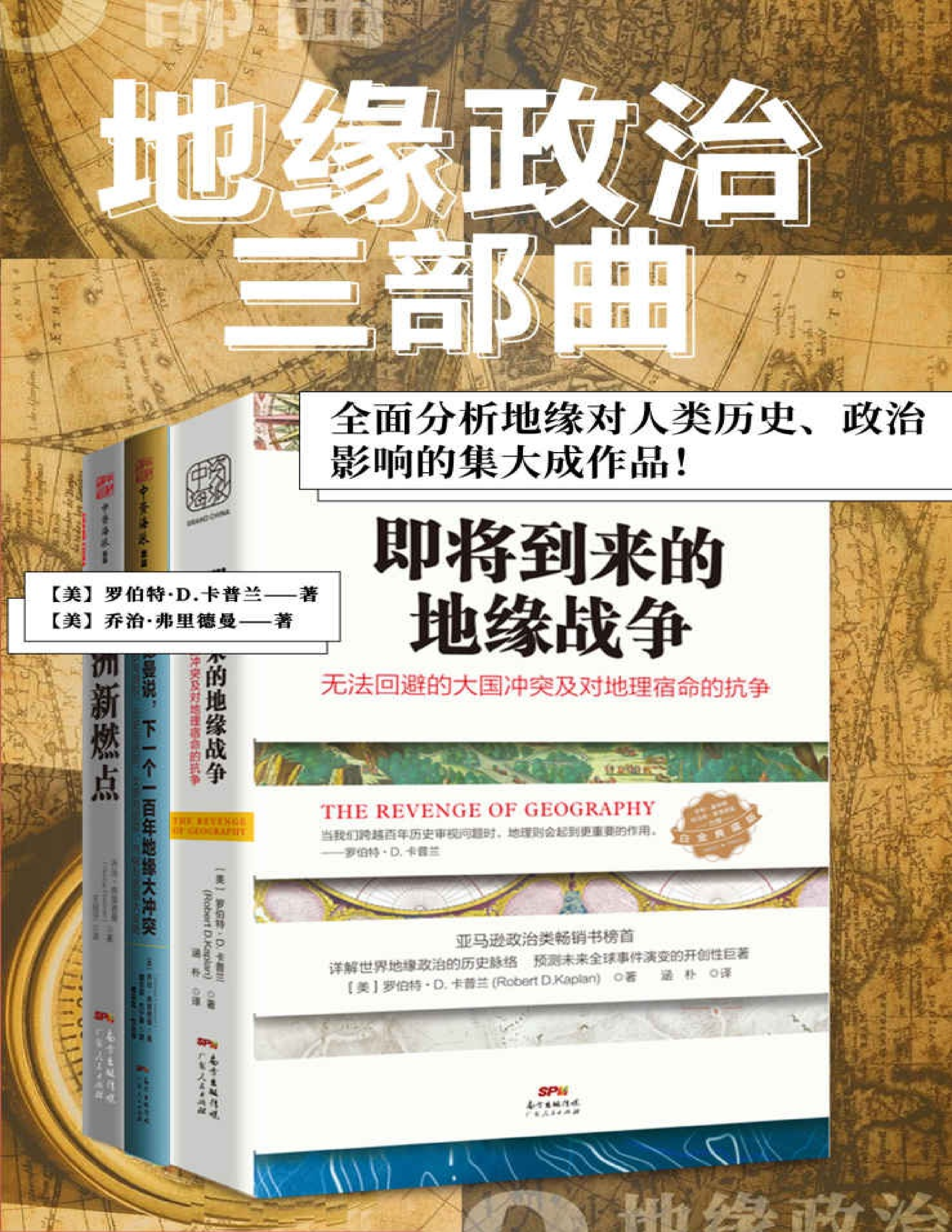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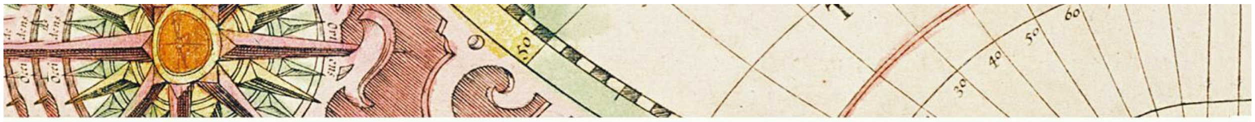

地缘政治
三部曲
全面分析地缘对人类历史、政治影响的集大成作品！
【美】罗伯特·D.卡普兰——著
【美】乔治·弗里德曼——著
即将到来的
地缘战争
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当我们跨越百年历史审视问题时，地理则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罗伯特·D.卡普兰
亚马逊政治类畅销书榜首
详解世界地缘政治的历史脉络　预测未来全球事件演变的开创性巨著
［美］罗伯特·D.卡普兰 (Robert D.Kaplan) ◎著　涵朴 ◎译
洲新燃点
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目录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
欧洲新燃点：一触即发的地缘战争与危机
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

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当我们跨越百年历史审视问题时，地理则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罗伯特·D. 卡普兰

亨利·基辛格
托马斯·弗里德曼
——力荐——
白金典藏版
地缘政治★热销作品



亚马逊政治类畅销书榜首

详解世界地缘政治的历史脉络　预测未来全球事件演变的开创性巨著

[美] 罗伯特·D. 卡普兰 (Robert D.Kaplan) ◎著　　涵　朴 ◎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

［美］罗伯特·D. 卡普兰（Robert D. Kaplan）◎著　涵　朴　◎译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廣東省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白金典藏版）/［美］罗伯特·D.卡普兰（Kaplan, R.D.）著；涵朴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6（2016.6重印）

ISBN 978-7-218-08641-5

Ⅰ．①即… Ⅱ．①罗…②涵… Ⅲ．①地缘政治学–研究 Ⅳ．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2582号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 by Robert D. Kaplan
Copyright © 2012 by Robert D. Kapl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bert D. Kaplan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中资出版社）授权广东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Jijiang daolai de diyuan zhanzheng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

［美］罗伯特·D.卡普兰　著　涵　朴　译

出 版 人：曾　莹

策　　划：中资海派

执行策划：黄　河　桂　林

责任编辑：肖风华　古海阳　张　静

特约编辑：梁桂芳　杜天宜　董莹雪

版式设计：王　雪

封面设计：张　英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深圳市东亚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3

字　　数：288千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2版　2018年10月第4次印刷

定　　价：5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0604 83791487**　邮购：（**020**）**83781421**

致中国读者信

To my Chinese readers,

It is a pleasure to introduce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This book has special relevance to China. For China is faced with both geographical opportunities and geographical dilemmas. Because of China's demographic and relative economic strength, it is able influence adjacent areas like the Russian Far East, Outer Mongolia, and especially former-Soviet Central Asia, where it is building energy pipeline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is faced with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within its own borders. Geography will thus go a long way to explain the future challenges of the Middle Kingdom.

Sincerely,
Robert D. Kaplan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荣幸地向您介绍《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这本书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渊源。当今中国面临地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相对经济实力使其对相邻地区国家有巨大的影响力，如远东地区的俄罗斯、蒙古，特别是苏联时期的中亚国家，这些国家正在建设与中国相连的输油管道和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中国也正面临着内部发展的挑战。要预测这个“中央帝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从地理方面去研究。

致以深深的敬意，
罗伯特·D.卡普兰

作者介绍



罗伯特·**D.**卡普兰

★ 《外交政策》评选其为“100位全球顶级思想者”之一

★ 《大西洋月刊》资深国际事务记者

★ 全球首屈一指的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

★ 美国海军学院特聘教授

★ 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

★ 美国防务政策委员会成员

★ 曾担任美国陆军特种兵团、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顾问

★ 地缘政治家、知名畅销书作家

卡普兰共写过14部外交事务及旅游类畅销书。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第一个对巴尔干地区即将发生的剧变发出警告的美国作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称他为“后冷战时代至关重要、值得受到广泛关注的四位作家之一”。他的主要作品包括：

《巴尔干鬼魂》（*Balkan Ghosts*）：《纽约时报书评》年度最佳图书

《阿拉伯专家》（*The Arabists*）：《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华尔街日报》关于美国与中东地区历史关系的五本必读书目之一

《地球边缘》（*The Ends of the Earth*）：《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

《帝国的荒野》（*An Empire Wilderness*）：《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年度最佳图书

《东进鞑靼大地》（*Eastward to Tartary*）：《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

《战之华》（*Warrior Politics*）：《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阅读的图书

卡普兰的文章也有巨大的影响力。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卡普兰的文章印象深刻，并特意为此组织了跨部门研究，该研究对卡普兰的结论深表同意”。前总统乔治·W.布什也是他的读者，认为卡普兰对世界局势的诸多观点与他本人的世界观颇为吻合。除了在《大西洋月刊》任主笔外，卡普兰的文章也常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等，《外交事务》等主要外交类杂志也有刊登。

此外，卡普兰还经常在美国军事战争学院、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

局、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国防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各主要院校及全球财经论坛上发表演讲，并在美国国务院开放论坛上作为秘书发言。100多个国家的媒体报导过关于他的新闻。

罗伯特·D.卡普兰于1952年6月23日生于纽约，1973年毕业于康涅狄格大学。1975年起，他游历阿拉伯和地中海世界，自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生涯。他曾在以色列国防部队服役一年，并在希腊和葡萄牙生活9年之久。直至现在，他已游历了近70个国家。

欲知更多信息，请访问其主页www.robertdkaplan.com

编辑推荐

地缘政治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作为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地缘政治学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基本因素之一，并从国家利益出发，将具体国家的安全纳入全球背景之中，从地理的角度考察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在《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中，罗伯特·D.卡普兰作为著名的地理学者和地缘政治研究者，全面而系统地回顾了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通过各地气候、地势和所处地理位置预测未来全球事件的演化，特别是欧亚大陆的下一次冲突周期。

作者在书中特别讲到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并对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中国历史上与周边国家关系复杂，加上当今崛起过程中在能源、资源等方面的巨大需求，使得中国如今的地缘政治格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南海到东海，从东亚到中亚再到东南亚，从欧洲到非洲，中国将如何在其地缘政治布局中找到切入点并实现百年复兴，世人正拭目以待。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书是我们认识自身问题的一面镜子，对地缘政治及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对关心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和时事热点的大众读者，本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由于作者卡普兰的身份、立场和角度的限制，本书中的某些观点和论述不可避免地会以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在谈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和未来军事战略时有失偏颇。对于在全球各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的中国来说，未来充满机遇和挑战，而改革和完善也将是恒久不变的主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模式”会得到更多认同，并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内发挥更多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2013年5月

专家推荐 I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罗伯特·D.卡普兰早年是一位浪迹天涯的记者，他的足迹遍及中亚、中东、北非、南亚等地，总之是哪里不太平他就往哪里跑。2006－2008年他在美国海军学院执教，2008年之后在华盛顿的新美国安全中心做研究，2009－2011年曾是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旗下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2012年，他加盟著名的地缘政治智库STRATFOR，其创始人是乔治·弗里德曼。中资海派已经翻译出版了乔治·弗里德曼的两本畅销书，一本是《未来100年大预言》，另一本是《未来10年》。再加上罗伯特·D.卡普兰的这本《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可称得上是“地缘政治三部曲”。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想先提醒你，你将要读的是一本非主流的著作。国际政治学的主流学者始终不认为地缘政治是一门严肃的学科。国际政治学的大师级人物摩根索也曾说过，地缘政治是一门“伪科学（pseudoscience），它把地理因素提高到绝对地位，认为地理决定国家的权力，因而也决定着国家的命运”。

卡普兰在这本书中讲到，国际政治学者们之所以如此厌恶地缘政治，背后其实有一段历史的公案：地缘政治曾被纳粹利用，成为其对外侵略的理论依据。1901年，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生存空间”（Lebensraum）。他声称一个国家是有生命的，国家不断成长，国界线也要向外扩张。拉采尔的学生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第一次提出了Geopolitik的概念。你可以清

晰地看出德语Geopolitik和英语Geopolitics的相似之处，难怪“二战”之后的国际政治学家一提起地缘政治就格外反感。

对希特勒影响最大的是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豪斯霍弗尔1869年出生于慕尼黑，他早年参军，曾到日本做过军事教官，“一战”期间曾任德军旅长，战后他在慕尼黑大学讲授地理学和军事科学。他的一个学生叫鲁道夫·赫斯，此人后来成了希特勒的亲信。正是通过赫斯，豪斯霍弗尔认识了希特勒。当时希特勒因“啤酒馆暴动”失败被捕入狱，正在写作《我的奋斗》。豪斯霍弗尔向希特勒讲授了“生存空间”等理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希特勒恍然大悟。《我的奋斗》第14章专门讲纳粹的外交政策，明显受到了豪斯霍弗尔的影响。但豪斯霍弗尔和希特勒的关系究竟有多么紧密，已经成为历史之谜。豪斯霍弗尔很快就在元首那里失宠了。1944年，豪斯霍弗尔夫妇被关进了集中营。同一年，他的儿子因参与暗杀希特勒的计划被处死（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刺杀希特勒》就是根据这一历史事件改编的）。德国战败之后，盟军软禁了豪斯霍弗尔，并考虑是否要把他送到纽伦堡审判。1946年，豪斯霍弗尔和妻子一起自杀。

地缘政治学遭到冷遇和歧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经常被视为历史决定论的变种。尤其是在“二战”之后，决定论成了意识形态对垒的一个重要战场。意大利和德国出现了法西斯主义，苏联出现了专制政权，来势汹汹的极权主义几乎要将西方脆弱的传统自由主义价值碾成齑粉。在信奉自由主义的学者看来，历史决定论就是极权主义的宣言书。出于误读和曲解，他们将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也视为历史决定论。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几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谈到，历史主义就是乌托邦主义，会异化为极权主义。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一文中，著名学者伯林严厉批判历史决定论。他不承认历史是被任何人为因素以外的力量决定的。这是因为，如果有人力不可控制的外力，人的行为就无法被表扬或批评，无善恶之分，沿着这一逻辑推演下去，历史决定论包藏着危险的道德和政治祸心。

不管历史决定论是否真的像波普或伯林说的那样可怕，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地缘政治学者是支持自由政治传统的。提出“陆权说”的麦金德支持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政治主张，提出“海权说”的马汉也相信民主政体，他认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的政治立场会更民主。

地缘政治学家想要得到一点点同行的承认都很难，但同样的观点，从其他学科的学者口中说出来，却得到了大家的景仰和崇拜。历史学家中尤其不乏这样的学者。卡普兰非常推崇的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就是其中之一，布罗代尔1949年出版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本地缘政治的代表作。顺便说一句，更令人钦佩的是，这本书是布罗代尔在“二战”期间在德国当战俘的时候写的。布罗代尔提出了“时间波长变化”的概念。最长的“长时段”主要是指那些不为人所察觉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化，“中时段”是指在一个世纪之内出现的人口、经济、社会、政治的变化，这往往是“集体力量”的结果。最短的周期是“历史小事件”，就是我们在媒体上天天看到的新闻事件。布罗代尔最为重视的是“长时段”和“中时段”因素。这些因素对我们的影响最大，但却最容易被人忽视。它们是冰山藏在水下的部分，它们是海洋深处几乎静止不动的庞大水体。

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国际政治，自然感受不同。卡普兰在回顾了从修昔底德以来的地缘政治核心观点之后，结合他在世界各地的游历经验，谈到了21世纪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欧洲并没有出现完美的统一。从历史上看，欧洲的重心经历了从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向西欧、北欧转移的过程，因为南欧土壤贫瘠、山地崎岖，而北欧、西欧则河网密布、矿产丰富、平畴千里。最近发生的欧洲金融危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本来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它反映出来的矛盾，就是长久以来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西欧和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南欧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此外，“中欧”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批知识分子的虚构。在欧洲和中东之

间，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始终不存在明晰的边界。北起波兰，南至巴尔干半岛的广阔地区，处于地缘政治学家高度重视的“缓冲地带”，至今仍然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半梦半醒。

卡普兰也谈到了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些“新兴大国”的地理宿命。

在他看来，欧亚主义是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本来只是困在森林深处的一个小公国，机缘巧合，使得它成为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国。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辽阔无垠的国土、蒙古入侵的历史，造就了俄罗斯近代以来不断对外扩张的心态，甚至还有一种对暴力和暴政的迷恋。但欧亚主义也是俄罗斯最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向西，俄罗斯不愿意完全让自己和西欧文化融合，这样只能让其更加边缘化，俄罗斯的独特文化，仍然是其可以向整个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投射影响的一种“软实力”，但如何在苏联解体之后重新找到一种新的文化感召力，是其面临的一个难题。向东，俄罗斯的地图不断向亚洲扩展。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里宁甚至说，“俄罗斯如果把符拉迪沃斯托克视为其21世纪的首都，那将再好不过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处于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东亚地区，理当成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型的港口城市，但俄罗斯至今只把远东当做原料基地，而非通向亚洲的通道，因此错失了日本经济腾飞、“亚洲四小龙”奇迹和中国崛起几次历史机遇。

印度在地理上占据了南亚次大陆的大部分面积，但从历史上讲，印度始终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印度现在统治的领土远远超过其大多数历史王朝的疆域。其实，大英帝国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殖民扩张才将印度的势力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但印度仍然没有占据整个南亚，向西向北，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几乎从来没有过明确的边界，这里仍然是宗教极端势力、地方军阀和山地部落的领地，也是令印度最为头疼的地方。向北，隔着喜马拉雅山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之间，经济相互往来水平却相对较低。向东，印度尽管不断向东南亚渗透，但南亚和东南亚之间却如陌生的路人。卡普兰在其另外一本书《季

风》中曾预言，随着国际贸易尤其是能源贸易越来越集中于中东和亚洲之间，印度洋将成为未来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海洋。

卡普兰对中国的海上力量扩张深表担忧。但是，他似乎相信中国仍然没有实力与美国抗衡。他谈到，中国已经拥有现代化的驱逐舰编队，并制造出了自己的航母。根据美国原海军副部长克罗普西（Seth Cropsey）的判断，中国很快就能拥有规模超过美国海军的潜艇部队。中国海军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已经大大提升。但卡普兰引用美国五角大楼201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的战略是加强与其亚太军事同盟的关系，同时再部署第二道“围堵”中国的防线，即太平洋上的关岛、帕劳、北马里亚纳、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等。这些岛屿或为美国领土，或与美国签订了防御协定，面积大到可以建立海军基地，同时又小到不会太引人注目，地理位置离中国较远，可躲避中国的导弹袭击，但又近到可随时开拔到朝鲜、台湾等地。我非军事方面的专家，无法判断其观点的真伪，但这些新的动向，或许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卡普兰最为关心的当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STRATFOR网站上最近刚发布他们的一份报告，《美国的地缘政治，第一部分：不可避免的帝国》，有兴趣的读者可做参考。在本书中，卡普兰的核心观点是，美国需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其对外战略。在他看来，对苏联的遏制、对东欧的支持，以及对中东的战争和干预，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估计了美国地缘政治的成本和收益。美国过多插手中东事务可能得不偿失。美国努力稳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局势，最终获益者很可能是中国，中国可以借道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打开一条通向印度洋的通道。他支持美国把更多的战略资源配置到亚太地区，同时，他也更关心美国家门口的地缘政治。美国的后门就是墨西哥，但墨西哥却一直为毒品交易、政治腐败等问题所困，墨西哥一日不稳，美国就不能安寝。有意思的是，乔治·弗里德曼在《未来100年大预言》中也讲到，最终对美国的霸权带来挑战的既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而是墨西

哥。因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美国的移民政策更加宽松，大量的墨西哥移民越过美国南部漫长的边界进入美国，久而久之美国就会逐渐变成一个受拉丁裔选民影响的国家，这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将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总之，这是一本充满了新奇观点，能够激发新的思路，但也必然会引起很多争议的书。最后，我想说的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谈论地理的作用或许已经显得过时，毕竟只要坐上飞机，你就可以在一天之内环游地球。当《纽约时报》的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作《世界是平的》一书的时候，他的头脑中根本就没考虑到地理的影响。地理对他来说，不过是飞机头等舱座位的液晶屏幕上显示的飞行路线。但我之所以要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就是因为我赞同卡普兰在本书的一开头就讲到的：

> 要问有关未来的问题，最好的立足点其实就是大地，要尽可能放慢脚步去旅行。

专家推荐Ⅱ
很“地”道的一本书

中雷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美国著名记者罗伯特·D.卡普兰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他周游列国，早在巴尔干、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打响前几年，就实地走访，并撰写游记专栏，据说他的书直接影响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小布什是否出兵的决策。最近他转向更深入的战略研究，《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即是代表作。

本书旨在唤起人们对地理因素的重视。所谓地理的报复，就是说，如果忽视了地理的作用，就会犯错误，甚至遭到失败。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信息化、网络空间、扁平世界、气候变暖、全球治理等，一时间铺天盖地，地理因素长期以来被忽视了。这一次，卡普兰又将在新一轮地缘政治热潮到来之前，推出警世预言。作者认为，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国家间的争斗，昭示着民族命运的起伏转折，预示即将到来的地缘冲突。

毋庸置疑，地理环境对国民性格、文化文明、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内外政策都有着重要影响。作者从欧美地缘理论经典入手，结合实地旅行经历，点评了麦金德的核心地带理论、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理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以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认识。

不管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说，还是斯皮克曼的大陆边缘说，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把这些地带的地位看做是静止不变的。实际上，大

陆核心地带可能边缘化，而边缘地带可能成为核心。一个地区的重要性还有赖于不同时代的现实需求，比如冷战时期的中欧，石油时代的中东，现在的海上通道，地缘战略的重心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升高，北冰洋也将成为新焦点。可以看出，世界版图并非一成不变，将继续不断分化重组。

本书还展望了21世纪全球地缘战略格局，比较分析了欧洲、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朗、前奥斯曼帝国地区的地理条件优劣和历史演变，其中认为中国具有作为大国的天然地理优势。

卡普兰与乔治·弗里德曼等人一样，认为美国面临的根本威胁不在中东、阿富汗，而是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因为大规模的西语裔移民对美国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美国将不再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在作者看来，只有接受英美价值观的地方才是好地方，这反映出作者根深蒂固的种族文化优越感。

总体看，这是一本最能体现作者理论功底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地缘政治著作，引经据典，知识丰富，文字优美，也是一本很好的历史地理教科书。尽管有些地方不够“厚道”，但这的确是一本很“地道”的书。

权威推荐

亨利·基辛格博士

美国著名外交家　国际问题专家　美国前国务卿

罗伯特·D.卡普兰迷人而宏伟的研究和极其重要的著作，着眼于一个古老的真理：地理对于决定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不管是法老王的埃及还是当今阿拉伯的政局动荡都是如此。

詹姆斯·霍格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顾问

地理对于塑造历史有多重要，是罗伯特·D.卡普兰在这部杰作之中要探讨的重要问题。在他对人类的辉煌历程和经年冲突的分析背后，是三十年的学术和游历积淀。他的广泛分析的核心在于一个信仰：地理对于人类的行为有着持久的影响，无论现在还是未来。

伊安·布莱默　欧亚集团总裁　畅销书《独自为战》作者

卡普兰将地理当做手术刀，用它来剖析国际关系和那些全球化无法解释的冲突。《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不仅敏锐地记下了地理如何塑造我们所知的世界，也预言了它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他以一块块地域为基础，将历史与当下两方面结合起来分析，使他的这部巨著成为极具研究价值、娱乐性和信息性的不可忽视之作。

马凯硕　国立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行政学院院长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及常驻联合国代表

罗伯特·D.卡普兰的《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详尽地描述了古老的

断层线在当代重现的事实，并极富勇气地断言：“我相信，美国在21世纪会成为波利尼西亚、印第安与拉丁民族的混血文明体。”那么，为何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们没有预料到其即将面临的真正挑战呢？卡普兰的作品，对他们来说有振聋发聩之效。

瓦里·纳斯尔

中东问题专家　美国塔夫兹大学教授

在这本涉及地理和历史的杰作中，罗伯特·D.卡普兰无可辩驳地向读者展示了经济与政治发展的趋势，以及它们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他流畅的文笔、敏锐的洞察力和文中随处可见的历史轶事，吸引人重新思考地理在全球战略中的关键作用，并理解美国在其中的利益。

《纽约时报书评》

不管卡普兰指引你去哪里，他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

《出版人周刊》

卡普兰将旅行作家捕捉细节的敏锐度以及驻外国记者对事物的分析能力完美地结合于一身。

《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美国知名新闻网站）

精彩绝伦……如果你想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将是你的起点……卡普兰的现实主义与直面困难的愿望，使这本书成了那些将自我感觉良好的宣言伪装为战略思想之人的苦口良药。

邱震海　中国战略问题专家　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

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

地缘政治是世界各国或合作或竞争的古老而又崭新的课题，罗伯特

·D.卡普兰先生从新的思维角度观察事物，为只会孤立研究寰宇战略的人们提供了又一思考新空间。

曹景行　资深媒体人　时事评论员

对于《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这本书，您也许未必认同卡普兰在书中的诸多看法，甚至不能接受地缘政治理论，但还是应该认真思考作者提出的种种“即将到来”。何况，正如作者所说，他的这本新著还“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渊源”呢。

马鼎盛　香港资深军事专栏作家

作者卡普兰以地理学者和地缘政治研究者的眼光，指出中国土地只有7%适于耕种，只够满足23%人口，现代化急需全世界的能源、矿物和粮食，需要探索不用19世纪的帝国主义方式的全球一体化道路。

宋忠平　资深军事评论员

感谢卡普兰对我战略思维的启发，地理会报复那些莽撞者，如同中国古人提到的“地利”，日本想要吞下整个亚太是妄想，但中国可以与美国“隔洋而治”，这都是地理带来的地利。不妨仔细研究这一新著，你会发现卡普兰笔下的地缘政治很有趣。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在世界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板块不断发生变动的形势下，需要有一些新的、具有全局性的、陆权与海权并行不悖的地缘战略“再平衡”思考。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对于几乎所有国家决策者和国际战略研究者来说，地缘政治因素都

是他们进行战略判断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林利民　《现代国际关系》期刊主编

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与地缘战略选择是个常话常新的大战略课题。

崔文约　中国国际关系学院

《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这本书，让我们透过纷纷扰扰的国际形势，重新认识到地缘政治的基本作用和地位。

目 录

编辑推荐
专家推荐 I
专家推荐 II　很“地”道的一本书
权威推荐
前言　地球不是平的
　　持久的“自然”边界
　　智慧的开端——地理
　　中东何以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第1章　地图上的地缘战争　宁死不屈的地理
　　谁来拯救“中欧”？
　　德国的钟摆与巴尔干的灵魂
　　“慕尼黑阴谋”的类比
　　理想主义对美国的祸害
第2章　分裂的地理，报复的逻辑　地图的力量
　　现实主义与地图的价值
　　地理的逻辑
　　人类活动轨迹的前戏
　　从未降格的地理
　　地理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报复人类？
第3章　地理的历史轮廓　希罗多德和他的继承者
　　动荡的美索不达米亚
　　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地理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
　　霍奇森——伊斯兰的冒险
　　希罗多德的猜想
第4章　历史的地理枢纽　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剧本
　　亚洲的“附属”——欧洲文明

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决定人类的未来？
一个世纪前的地缘政治剧本
第5章　纳粹德国的地理扭曲　地缘政治空间竞争
被纳粹曲解的“生存空间”理论
德国地缘政治的本质
“心脏地带”理论的末日？
第6章　被边缘的边缘地带　“权力均衡”的挑战
边缘地带与心脏地带，孰轻孰重？
美国的后院——起火的“南锥体”
大陆边缘地带导致“遏制”战略的形成？
遏制中国的逻辑
第7章　海权的诱惑　霸权野心
地理决定海权？
制海权等于霸权？
第8章　从“缓冲垫”到监狱　拥挤的地图
人口膨胀在地缘政治上的反映
群体心理作祟下的民族主义
杀伤性武器和大众传媒带来的地理报复
第9章　欧洲分裂的地理根源　被割裂的“大欧洲”
欧洲的地理与未来的命运
亚洲仍然支配着欧洲？
希腊债务危机决定欧盟的未来？
第10章　摒弃历史的地理　中心地带的俄罗斯
地理决定的集体主义？
欧洲的“外省人”
“不安全感”造成的无休止扩张？
在地缘政治中迷失的俄罗斯
“北极熊”的中亚棋局
第11章　巨龙崛起　中国实力的地理优势
虎虎生威的中国
中国的大陆强国之路

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
台湾——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中美世纪博弈的必然性
第12章　“阿育王”的困惑　印度的地理困境
“德里”的历史变迁
上帝创造的敌人——巴基斯坦
阿富汗在印度地缘政治中的角色
中印的全方位博弈
第13章　搅动世界的波斯　伊朗的地理枢纽
阿拉伯半岛的核心——内志
地理将怎样报复伊朗？
波斯帝国的最终出路
第14章　“荒野腰带”的“和事佬”　前奥斯曼帝国
欧洲的“弃儿”
阿拉伯世界的困境
民主的傀儡——伊拉克
地理决定不了叙利亚
天生冤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第15章　“山姆大叔”的历史罗盘　墨西哥的挑战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
为何墨西哥对美国更重要？
如果美国不再主导世界……
墨西哥——美国退出历史舞台最体面的出口？
墨西哥的今天，美国的明天？
墨西哥的未来必将影响世界

前言
地球不是平的

要问有关未来的问题，最好的立足点其实就是大地，要尽可能放慢脚步去旅行。

驱车穿越伊拉克北部沙漠后，第一道穹顶般的浑圆山丘突然跃出地平线，群峦叠嶂起伏，最高处可达10 000英尺（1英尺约为0.3048米），密布着橡木林和火山灰。身后广袤的平原，如同一张张大饼，我的库尔德司机回头望了一眼，不屑地咂咂嘴，哼了一声："阿拉伯斯坦。"

再向山上看去，他喃喃地说："库尔德斯坦。"脸泛出光亮来。那是1986年，当时正值萨达姆·侯赛因统治巅峰时期，气氛令人窒息。然而，只要我们走进深如地牢的山谷，或行人罕至的豁口，城区无处不在的萨达姆巨幅画像就会突然消失，伊拉克士兵也不见踪影，取代他们的是库尔德自由战士。他们身背子弹带，头戴包巾，身穿宽松的长裤，系着宽大的腰带。

从政治版图来说，我们并没有离开伊拉克。但是，这里却不是萨达姆统治的地盘，因为即使是萨达姆，也不可能战胜山脉天险。

持久的"自然"边界

大山具有强大的守护力，它保护着本土文化，防止其受到激进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侵蚀。同时，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大山又为游击队和贩毒集团提供庇护所。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写道："最好把山民理解为流离失所、孤立无援的群体。两千多

年来，他们不断逃离平原河谷地带，那里有政权机构的各种剥削与压迫。”比如说，正是在平原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建立起他的政权，把爪牙安插到人民中间；然而，20世纪80年代，我几次登上喀尔巴阡山脉，却很少看到集体化的踪迹。这些山脉号称“中欧的后门”，山上到处是原始树林和天然石料垒成的房屋，很少见到罗马尼亚统治者所钟爱的钢筋混凝土。

喀尔巴阡山脉环绕罗马尼亚，正如山脉包围着库尔德斯坦一样。喀尔巴阡山脉西部，是辽阔而空旷的匈牙利平原，点缀着煤褐色的土壤与绿色海洋般的草地。从这里开始，我离开奥匈帝国的欧洲部分，渐渐进入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一带在经济上相对贫瘠得多。喀尔巴阡山延伸出来的平地，为齐奥塞斯库的专制主义的形成创造了可能，相比之下，匈牙利的古拉什[(1)]共产主义，强制性则要小得多。

然而，喀尔巴阡山脉并非与世隔绝。几个世纪以来，牵着牲口的商人们在古道上络绎不绝，将货物和文房雅玩贩至此处，由此，中欧的文化特征远远走出了本土，在像布加勒斯特和鲁塞这样的城市和乡镇扎下了根。但大山依然层次分明，第一层余脉向东南方向延伸，消失在阿拉伯和卡拉库姆沙漠之中。

1999年，我乘夜班渡轮，从里海西岸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发，赶往东岸土库曼斯坦的克拉斯诺沃茨克。公元3世纪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时期所说的突厥斯坦，发源地就在此。一觉醒来，眼前是人烟稀少的海岸，一排白色帐篷背靠着死灰色的峭壁，如同抽象画一般。尽管室外温度高达38摄氏度，所有旅客还是被命令在一扇油漆剥落的大门前排成一队，由一名警察逐一检查护照；然后，我们又进入一个空荡荡的、热得像烤箱一样的大帐篷进行随身物品检查，另一名警察翻到了我的胃药佩托比斯摩片，竟指控我走私毒品。

那位粗暴的警察还一把夺去了我的手电筒，把1.5伏电池倒在脏兮兮的地板上。他那冷酷又野蛮的表情，简直是此处环境的绝佳诠释。除

了这间帐篷以外，整座城镇几无半点遮阳蔽荫之处，平坦空旷得让人感到压抑，很难看到物质文明留下的建筑遗存。我突然怀念起巴库来，那里毕竟还有公元12世纪的古波斯城墙，以及第一代石油大亨的梦幻宫殿里精美的壁画和石雕。在喀尔巴阡山、黑海、高加索地区，这些西方文化特征竟能顽强地保留下来，而再向东行进，欧洲的印迹便在我眼前一步步淡去，里海的自然边界成为欧亚的最后分界线，随后即进入更加荒芜的卡拉库姆沙漠。

当然，从地理上讲，土库曼斯坦并非毫无希望。相反，它体现了智慧的开启，见证了人类探索历史格局的进程。帕提亚人、蒙古人、波斯人、沙皇俄国、苏联以及突厥余部，不断入侵这块光秃秃又不设防的地域，但这块土地不容任何人在此永久扎根，这里几乎没有可以让文明存活的基本条件。这也印证了我对这里的第一印象的确没错。

再来讲讲另一次经历。我驾驶着汽车在沙漠中前行，地形表面开始逐渐升高，突然间，一马平川的戈壁大漠在我眼前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迷宫一般的地貌，时而是早已干涸的河床湖底，时而是叠加起伏的山坡，满眼尽是灰色和土黄色。惟有山顶上披着一抹夕阳红，映射着红赭色的霞光。从不同的角度看，太阳似乎只能照在更高更陡的山坡上。一股冷空气吹进汽车里，原来已到达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经历过白沙瓦的热浪熏蒸后，我终于呼吸到第一口山间的清新气息。

开伯尔山口规模不大，本身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它的最高峰不到7 000英尺，很少有陡峭的山坡。然而，1987年，在一个小时之内，我穿越阴曹地府般的火山岩构造带，通过尖削的峭壁和蜿蜒的峡谷，从印度次大陆诱人的热带平原，到凉爽的亚洲中部，最终踏上被废弃的戈壁滩。这边是黑土地、纯棉布、浓厚辛辣的菜肴，那边是大沙漠、粗羊毛、手抓肉，完全是两种世界两重天。

在这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处，一代又一代商贩像在喀尔巴阡山脉一样踏出连绵古道，但这里的地理环境却能给后人提供别样的经验教

训。按照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苏嘉塔·柏瑟（Sugata Bose）的说法，这个所谓的“西北边境”，首先是英国人叫出来的，其实在“历史上根本没有界”。但是，印度波斯和印度伊斯兰板块的“心脏”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直接导致它们各自作为国家时，在地理疆域上丧失了内聚力。

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更多“人工”边界。

智慧的开端——地理

1973年和1981年，我先后两次越过柏林墙，进入东柏林。顶部安装着粗管的混凝土幕墙足有12英尺高，横亘在东西德之间。西德这一侧，混居着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移民的贫民社区，看起来如同薄薄的黑白胶片一样，而东德一侧则残存着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洗礼的建筑。在西侧，你可以顺墙行走，触摸任何地方，墙上到处是涂鸦乱画；但在东侧，你却能发现到处都是雷区和岗楼。

在当时，城市地面上突兀地出现监狱大院这种离奇事儿，几乎没人会质疑，因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冷战永远不会结束”，对于像我一样在冷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记忆，我们难免会觉得，柏林墙不管多么残酷和武断，似乎都与山脉一样永恒。然而，真理其实一直存在于书本和德国历史地图上。1989年初的几个月，我滞留波恩，为了完成一本杂志的约稿而查阅资料，偶然间发现了这些文字：

> 德国处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夹在北海、波罗的海与阿尔卑斯山之间，正如历史学家戈洛·曼（Golo Mann）所形容的，就像被关在一座“大监狱”里，四面大门紧锁，内心蠢蠢欲动，希望打破封锁，冲出牢笼。但因南北两面为山水阻隔，向外扩张就意味着只能东扩和西进，因为这两个方向没有地域的障碍。

> 戈洛·曼认为，100年以来，“毫无章法”和“不可靠”这两个词可以概括德国人的特性，他指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动荡时期，尤以俾斯麦的扩张和两次世界大战为主要标志。然而，纵观德国历史，这两个词也可作为德国版图的大小和形状的最佳诠释。

事实的确如此。公元800年，由查理曼大帝建立的第一帝国，是一次重大的领土重组，其疆域范围不断变化，同时或先后囊括了奥地利和瑞士的一部分，以及法国、比利时、荷兰、波兰、意大利和前南斯拉夫；后来，马丁·路德倡导宗教改革，导致西方基督教分裂，接着重大事变纷至沓来，点燃了三十年战争，战斗主要在德国土地上打响，中欧自此衰败；18世纪，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之间交叉重叠；19世纪早期，各个德语国家之间结成关税联盟；19世纪末，奥托·冯·俾斯麦以普鲁士为中心完成统一。

书读得越多，我越发现，原来德国领土一直经历着重组易手的过程，柏林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阶段性插曲而已。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制度也垮塌了。我常年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其他地方工作和旅行，对这些制度早已明了在胸。近距离看，它们似乎坚不可摧，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对我来说，它们突然解体的教训是一个信号，不仅说明所有独裁政权的基础并不稳定，还预示着在目前看似固若金汤、压倒一切者，实际上稍纵即逝。唯一持久的，是人民在地图上的位置。因此，越是在动荡年代，地图就越显得重要，它虽然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却是智慧的开端。脚下的政治版图瞬息万变时，只要认真思考历史的逻辑，你就能推测出下一步可能出现什么。

再来看看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紧张对峙，暴力在边境的非军事区（DMZ）无处不在，这是我对这一地区的主要印象。2006年，我看到韩国士兵在与朝鲜士兵对峙时摆出待令出击的跆拳道姿势，一动不动地僵立着，握紧拳头，绷紧小臂，眼睛死死地盯着敌人的脸。两边都挑选

了个头最高的士兵执行任务，目的是让对手看着就心惊胆寒。但是，这种形式化的仇恨，虽然目前陈列在铁丝网和地雷阵前供世人观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会被废弃，成为历史遗产。看看20世纪其他分裂国家的地图，例如德国、越南、也门，很明显，不管分裂多久，坚持统一的力量终将胜利，没有例外。

这种分久必合的进程，大多是在计划之外一举完成的，有时还会诉诸暴力。非军事区就像柏林墙一样，是一个没有地理逻辑的任意边界，把一个民族国家肆意划分为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正如统一的德国一样，是我们应该期望的，或者至少应该有这样的打算。文化和地理的力量，可能在某个时刻战胜一切；而一个人为的边界是不符合自然的，所以也特别脆弱。

我也曾从约旦和以色列之间、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陆地边界经过，诸如此类的边界还有很多。现在，我更希望跨越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鸿沟，从历史和政治学的角度经历一段截然不同的旅程，通过对地理的着重研究，从地图中看出更多玄机，从而模糊地管窥到未来的政治轮廓。正是因为跨越了这么多的边界，我对它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感觉这些地方的命运与我息息相关。我做记者已超过30年了，在这喷气式客机数小时即可飞越大洋和大洲的信息爆炸时代，一些精英舆论塑造者们高唱着所谓"世界是平的"，这使我确信，当下的人们都需要恢复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敏感性，这些能力我们已失去了很久。

我丝毫没有"世界是平的"的感觉。相反，我将向读者介绍一些貌似"不合时宜"的思想家，以便打消人们的错误观念，使他们不认为地理不再重要了。在这次旅程的前半段，我将深入挖掘和阐释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基础，以便后半段运用他们的智慧，带领读者横跨欧亚大陆，了解从欧洲到中国，包括大中东和印度次大陆，这些地区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未来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我要检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寻找到底缺失了什么，检讨一下我们是如何把它弄丢了的，然后试图恢复它。

要放慢我们的旅行脚步，还要慢慢地观察，同时借鉴和援引一些著名学者的丰富学识。这就是我此次旅行的目标。

地理（Geography）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对于大地的描述”，常常与宿命论相关，意味着限制人的选择，因此含有贬义。但对于我来说，只希望通过地图和人口学研究等工具，为传统的外交政策分析作多一层解读，从而找到更深层和更强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你没有必要成为“地理决定论者”，但必须记住：我们越是对当前的事件疲于应付，个人及其选择就越显得重要；而当我们跨越百年历史审视问题时，地理则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中东地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中东何以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就在我撰写此书之际，整个中东地区，从摩洛哥到阿富汗，所有专制政权都处于危机之中。寡头统治的旧秩序已难以为继，而通往民主化的道路却又艰难曲折，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个大动荡时期的第一阶段，新通信技术的力量似乎打败了地理学派。卫星电视和社交互联网站已经使整个阿拉伯世界成为抗议者社区，始自突尼斯的变革使得埃及、也门和巴林等地的民主人士都受到了激励。这些国家的政治局势存在共性，不过，每个国家的事态发展方向都受到自身历史和地理特征的深层影响。因此，越是对这些方面有所了解，越会对有关事件表现出更少惊诧。

始于突尼斯的动荡，可能只是个意外。古董级的旧地图显示，今天的突尼斯过去只是一个集中定居点，相比之下，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在那时反而显得地广人稀。突尼斯向地中海突出，与西西里隔海相望，不仅在迦太基、罗马帝国时期是北部非洲的人口中心，在汪达尔、拜占庭、中世纪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统治时期也很繁华。西部的阿尔及利亚

和东部的利比亚从地图上看只是模糊的地理概念，相对而言，突尼斯更像一个古老文明的集群。

在长达2 0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与迦太基（其范围与现在的突尼斯大致相当）离得越近的地方，发展水平越高。由于城市化进程在2 000年以前就已开始，突尼斯建立在游牧基础上的部落特征相对薄弱，研究中世纪历史的阿拉伯学者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也认为，这一特征对政治稳定非常不利。公元前202年，罗马将军小西庇阿在突尼斯外围击败汉尼拔后，挖了界河战壕或称为“罗马地宫”，用以标志文明的领土范围。这个地宫与目前的中东危机仍然有关。它从突尼斯西北海岸的塔巴卡向南延伸，然后折向东，直到另一个地中海港口斯法克斯，至今仍然清晰可见。

在这条壕沟之外的乡镇较少有古罗马遗迹，今天仍然是贫困和欠发达地区，历史上失业率较高。2010年12月，西迪布宰德镇一名果蔬贩子采取了自焚行动抗议当地警察的苛待，就倒在离西庇阿防线不远的地方，这成了阿拉伯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这不是宿命论，我只是提供相关时事的地理和历史背景。阿拉伯民主变革从历史上看，正好发端于阿拉伯世界最先进的区域，也是在地理上最接近欧洲的地方。更具体地看，它又肇始于这个国家最穷困的地区，这里自古代起就长期被忽视，此后也一直没发展起来。这种历史知识可以增加对其他地方的理解深度。比如另一个古老文明集中地埃及，像突尼斯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也门，作为阿拉伯半岛的人口核心，一直怀有谋求统一的雄心，但因庞大的山区地形而备受困扰，这样的地形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势力，助长了部落和分裂主义组织的气焰；或者还可以看看叙利亚，那缩成一团般的地形，使基于种族和宗派身份的分裂状态得到了庇护。

地理学证明，突尼斯和埃及具有天然的凝聚力，而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凝聚力就没有这么强。因此，突尼斯和埃及只需要温和的专制

形式即可维持统治，而利比亚和叙利亚则需要更强硬些；至于也门，从地理上讲一直就很难统治。20世纪的欧洲学者，如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罗伯特·蒙塔涅（Robert Montagne），一直把也门称为“条块分割的社会”，这里集中体现了中东的山地和沙漠地形。也门，在中央集权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徘徊，用蒙塔涅的话说，就是一种典型的“颠沛流离”的制度，“其本身十分脆弱”，因此不能建立起持久的政权。这里的部落很强大，中央政府则相对薄弱。

我们越是重视地图的价值，就越不容易造成失误。我们将不仅可以决定何时干预、何时不干预，还可以规划我们该怎样干预。

当前，全球性的政治动荡屡见不鲜，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难以管理，美国及其盟国应该如何应对，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地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应对的方法。通过翻查研究旧地图和求教于早期地理学家、地缘政治思想家，我想在21世纪搞清地球的真相，相关的前沿性工作我早在20世纪中后期就开始做了。即使我们可以发送卫星到太阳系外，即使网络没有国界，兴都库什山这样的山脉仍然构成无法逾越的强大屏障。任何旨在这些地方搞什么重建自由秩序的意图，都不能脱离这样的现实。

---

(1)　Goulash，匈牙利炖牛肉，匈牙利最出名的一种炖菜。——译者注

第1章
地图上的地缘战争
宁死不屈的地理

20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后，人们才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并重新建立对地图的尊重。冷战结束后，人们逐渐丧失地理意识，似乎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经开始，但在“9·11”之后的10年里，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将这种幻想击得粉碎。

巴尔干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根源何在？中欧作为“宽容忍让”和“高度文明”的理想地标，在新的大国博弈中能否幸存下来？德国的地理位置又是怎样决定其钟摆方向的？海湾战争中，眼看就要活捉萨达姆，老布什为何却下令停止进攻巴格达？

西方国家对米洛舍维奇等独裁者的“绥靖政策”一时间使得“慕尼黑阴谋”的类比甚嚣尘上，地理的报复在无形中开始上演了……

要重拾我们的地理意识，必须先在最近的历史坐标中找准一个时间点，搞清我们在何时彻底失去了它，以及为什么会失去它，并阐明那将如何影响我们对世界的判断。

当然，这种地理意识的丧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倘若要我指出这个时间段，我想大约就是柏林墙倒塌后的那段日子。一条人为边界的倒塌，本应让我们对地理和地图更加肃然起敬，以便提前考虑德国版图的变化可能会对相邻的巴尔干和中东地区带来什么影响，但恰恰相反，我们却从那时开始盲目自大起来，完全无视那些真正的地理障碍仍然虎视眈眈地横亘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渐行渐远。

德国境内一道人为边界的拆除，仿佛突然成了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这让我们认定：人类所有的分歧将从此烟消云散；民主既然能将东欧收于麾下，也必将征服非洲和中东；“全球化”这个风靡一时的流行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而是一跃成为了历史的道德方向和国际安全体系。想想看，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才刚刚被打破，美国和西欧的国内安全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太平盛世的假象统领了一切。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预见性地捕捉到了这种新的“时代精神”。他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宣称世界各地战争和动乱有增无减，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即自由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至此宣告终结，因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取得了胜利，有关政治制度的争论就此结束。

其实，这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塑造世界，有时甚至是通过出动美国军队来实现的。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做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惩罚。这是一个信仰倒错的时代，是冷战后的第一轮知识辩论周期。在这个时

代，“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被视为无稽之谈。比如，在一些地方，传统和狭义的“国家利益”本来就被定义得似是而非，却硬要对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你最好加入新保守主义派，或当一名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整天想着如何在巴尔干地区阻止“种族灭绝”，因为这是当时“聪明的好人”该做的事。

在美国，类似的理想主义大迸发并非史无前例。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之际，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命名的“威尔逊主义”[(1)]风行一时，后来人们才发现，威尔逊的想法很少考虑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真正目标，更没有考虑到巴尔干地区和近东地区的现实。20世纪20年代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民主和自由已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得到推行，同时也意味着，在这古老苏丹王朝的某个地区，狭隘民族意识正在悄然觉醒。

冷战胜利后西方出现的现象，与“威尔逊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人认为，只要高举“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旗帜，自由和繁荣就会随之到来。有人甚至建议，非洲也可以成为民主革命的前沿，全然不顾这里是最贫穷、最不稳定的大陆，更糟糕的是，这里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人为划定的、不合逻辑的边界。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苏联解体了；相隔近万里，隔着大海和沙漠，仅仅因为电视上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一事件就对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也有了最高的指导意义。然而，正如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一样，我们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却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民主和全球和平。下一步，为生存而开展的斗争更为艰难，邪恶会戴上新的面具。

非洲各地的确开始显现出民主的迹象，以及更好的政府。不过，斗争必然是漫长而曲折的，无政府状态、叛乱、极端邪恶势力（如卢旺达的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重新抬头，非洲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过对欧美地区来说刻骨铭心的这段旅程：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到2001年9月11日五角大楼和世界贸易中心遭恐怖主义袭击。在这

12年间，随处发生的大屠杀和姗姗来迟的人道主义干预，激怒了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而这些干预措施的最终成功，把理想主义必胜信念提到了新的高度。

事实证明，这种信念在“9·11”事件之后的10年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这期间，曾在20世纪90年代影响过巴尔干地区和非洲的地理因素，同样破坏了美国在近东地区的“良好意愿”。从波斯尼亚到巴格达，从古老的土耳其帝国西部最发达的巴尔干部分到东部最不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部分，从有限的空中和地面打击行动，到大规模地面步兵入侵，这一过程将公开暴露自由主义普遍论的局限性，并重新承认对地图的尊重。

谁来拯救“中欧”？

所谓“后冷战时期”，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就开始了，与之相伴的是“中欧”一词的复苏，身为记者和牛津大学学者的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后来将其定义为“对于‘东部’苏联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悖离”。

中部欧洲，即米特欧罗巴（Mitteleuropa），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地理事实。它宣示的是一段旧时光的记忆：热情喧闹，韵味十足，浪漫的欧洲文明，使人联想到鹅卵石小巷、错落有致的小房子、丰收的葡萄酒、维也纳的咖啡馆和古典音乐，而其优雅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却饱浸着躁动不安的现代艺术和思想。

这里沉睡着奥匈帝国的魔幻记忆，以及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马勒、克里姆特、弗洛伊德、康德、斯宾诺莎等。事实上，在纳粹暴政统治之前，“中部欧洲”就意味着一个知识分子备受蹂躏的犹太人世界；意味着经济发达，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里的工业化已高度发展，甚至超过当时的比利时，使人回想起波希米亚的繁荣盛世；意味着姑且

不论各种腐败颓废和道德沦丧，仍然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多民族融合地区，由哈布斯堡王朝为其提供一个良性的但功能日益失调的保护伞。在冷战时期的最后阶段，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E.舒斯克（Carl E. Schorske）在其著作《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ecle Vienna*）中简明地表达了对中欧的怀念，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也在其华美的游记《多瑙河》（*Danube*）中有类似的记述。在马格里斯看来，中欧富有政治敏感性，“能够保护特定的群体反对任何极权主义的计划”；而对于匈牙利作家捷尔吉·康拉德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等人而言，中欧意味着“贵族”和开启“政治自由化”大门的钥匙。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欧”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身处地理之中的文化，或者就是这种文化组成了地理的每一个节点，像山脉一般连绵不绝，或像苏军坦克的履带一般回环往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随着种族冲突在南斯拉夫爆发，“中欧”这个概念竟从统一体变成了分支；“巴尔干”也在人们的意识中被肢解出来，成为了新近东的一部分。

巴尔干是古老的土耳其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同义词，崇山峻岭阻碍了发展，这里的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低下，比起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帝国，要落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始终遭受着一定程度的贫困和压迫，但在北方，即苏联的“中欧部分”则对此并无体会。

当然，情况是复杂的。东德作为从属国而被完全占领，因此它的制度在所有国家中最严酷；而前南斯拉夫并非正式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因此在其某些城市里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化；而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这种自由化则是闻所未闻的。而原属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的那些欧洲国家，虽然也吃了一些苦头，程度上却大大减轻，不过是把激进的自由民粹主义掺和在一起的大杂烩而已。

20世纪80年代，我时常旅行。我发现，当我乘坐的火车从匈牙利行

至罗马尼亚时，窗外的建筑质量突然变差了；车上的乘警肆意蹂躏我的行李，因为翻出了打字机而向我索取贿赂；厕所里的卫生纸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灯光也变得无精打彩。巴可尔干虽然深受中欧影响，但中东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因为它与两地的距离相等。进口的货物大都来自安纳托利亚，尘土飞扬的广场空地，破败不堪的公共场所，也几乎是科索沃和马其顿生活的真实写照。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文化娱乐，在这里则难觅痕迹。这并不完全是意外，或由某些邪恶势力一手造就。在民族混杂的前南斯拉夫，暴力冲突一触即发，而在单一民族的中欧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波兰就不会如此。说到底，还是与历史和地理因素有关。

然而，以加顿·阿什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宏伟设想中将中欧奉为道义和政治上的北斗星，而不仅仅将其看作一个地理标志。这个北斗星不仅是欧洲的，也是世界的，具有包容性而非排他性。按他们的观点，不仅不应该将巴尔干弃于不发达状态，任何地方，包括非洲都不能例外。柏林墙的倒塌不仅代表着中欧梦想的实现，更应将这种精神辐射至全球。这种人本主义的设想本质即世界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自由国际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者都对此趋之若鹜。

回想一下，那些因支持伊拉克战争而臭名昭著的人物，如鹰派人物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新保守主义“教父”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也都是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进行军事干预的支持者。以加顿为首的自由派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并以左派的《纽约书评》作为阵地。入侵巴格达之路，其实正是植根于20世纪90年代对巴尔干的干预。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对此坚决反对，完全不顾这些军事部署是否成功。其实，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穆斯林的“拯救”正是始于对恢复中欧之美的浪漫向往，无论将它看做一个真实的地方还是想象中的乐园。历史终将证明，正是“道德”和人道主义牺牲了美。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人道主义著作，抓住了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加顿·阿什在讲述其东德生活的畅销回忆录中写

道："我过去常把'以赛亚·伯林派'（Ich bin ein Berliner）的说法挂在嘴边。"而现在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反而取代了曾在过去40年间处于主导地位的一元化理论，成为其完美的解药。作为牛津大学教授，伯林几乎与20世纪同龄，他一直捍卫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在政治上主张"暂缓妥协"。他厌恶地理、文化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决定论，包括"命定天数"。他倾尽终生之力撰写文章、发表演讲、阐述意见，像旷野中孤独的布道者一般，宣扬着他"有节制的理想主义"，并以此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某一群人有权享受自由和安全的观点。他的哲学和中欧的理想形成了绝配。

这些智慧和雄辩的知识分子的鼓吹确实使中欧的复兴成了一项崇高的事业，这种方法在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中经常发挥作用，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有所展开。但是，中欧的复兴之路仍然困难重重，稍后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德国的钟摆与巴尔干的灵魂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有一个丑陋的事实经常把中欧概念变成某种悲剧，那就是中欧在地图上根本不存在。以哈尔福德·J.麦金德爵士（Halford J. Mackinder，1861－1947）及其弟子詹姆士·费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为代表的地理决定论者一入场，就以唐突而低沉的音调压过了以赛亚·伯林那柔和的声音。

对他们来说，中欧概念具有"致命的地理缺陷"，因为它属于地理上的"破碎带"，横跨欧洲内海，既要顾及"海洋利益"，又具备"欧亚心脏地带的大陆观念"。总之，在麦金德和费格里夫看来，中欧从战略方面考虑并无发展空间。他们在著作中反复暗示，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欧复兴的庆祝和沉迷只是地缘政治斗争的间歇喘息，或至少他们希望如此。柏林墙的倒塌并没有也不能结束地缘政治的影响，只是把它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任何人都不能一厢情愿地希望国家间、政体间的斗争会就此

打住。

我将在后文中花大量篇幅来探讨麦金德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心脏地带”（Heartland）的论文，因此先交待一下即可。这个百余年前提出的理论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源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抽丝剥茧地深入到两次世界大战的逻辑核心，就会发现其本质是关于德国是否能够主宰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而冷战的本质则是苏联如何主宰东欧，那里正处于麦金德心脏地带的西部边缘。这里所指的东欧包括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东德，历史上的普鲁士正是为了领土的需要进行同样的东扩，最终奔向“心脏地带”；而西德则成为北约海洋联盟的一部分，以天主教为精神依托，借助其雄厚的工业力量和商业头脑，向北海和大西洋挺进。

冷战时期，美国著名的地理学者索罗·B.科恩（Saul B. Cohen）指出，“划分东德与西德的边境区，正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区域”，中世纪区分法兰克和斯拉夫部落的分界线正在这里。换句话说，东西德之间的边境，几乎不是人为划定的。科恩认为，西德“反映的是海上欧洲”，而东德属于“陆权王国”，他因此支持德国分裂，认为“它在地缘政治上是合理的，在战略上是必要的”，因为它是欧洲中心连年战斗之间的稳定地带。麦金德在1919年也预见性地写道，“贯穿德国的分界线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我们可以借此从战略意义上，把大陆地带与海洋地带划分开来。”柏林的一分为二，本质上是人为的，而对于德国的分裂，人为的成分则相对较少。

科恩把中欧称为“单纯的地理概念，却缺乏地缘政治的实质”。按照这个逻辑，德国的统一，不会导致中欧的浴火重生，反而会导致欧洲重燃战火。由此推理，对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而言，德国的钟摆朝向何方，意义非同小可。如果是向东倒向俄罗斯，将会对波兰、匈牙利和其他苏联卫星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是向西倒向英美，是否会为这两个海洋大国提供胜利的契机？这一点我们尚不知晓。在冷战后的早期阶

段，科恩和其他学者都未能准确地预见今天统一德国“处于停摆化”的情况。如今的德国想尽力摆脱军国主义的影响，同时保留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在未来可能成为有助于欧洲大陆稳定的积极砝码，也可能成为使这个大陆重陷动荡的原因。

德国作为强权国家之一，一直占据着欧洲的中心。因此，德国人总是表现出强烈的地理意识和敏锐的战略观，并将其视为一种生存保障机制。目前，德国人亟须完成的正是超越一时持有的准和平主义观念，恢复其敏锐特性。想想看，一个统一而自由的德国难道不可以成为一种平衡力量吗？有德国横贯于大西洋和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之间，为“中欧文化”提出大胆的新诠释，是否可以使中欧的概念成为调节地缘政治的整流器呢？果真如此，加顿·阿什等人的理论将得以印证，他们也将享有超过麦金德和科恩的声誉。

将问题归总为一个，那就是：中欧作为“宽容忍让”和“高度文明”的理想地标，在新的大国博弈中能幸存下来吗？因为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这种斗争司空见惯。从20世纪后期的制高点回过头来看，19世纪后期欧洲中部充满活力的文化显得那么兼容并蓄，而且它正是形成于残酷无情的帝国扩张和地缘政治斗争，比如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自由主义最终必然依赖于强权政治，也许依靠的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强权，但强权就是强权。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人道干涉主义者并非完全无视权力斗争。在他们眼里，中欧并不是幻想中的乌托邦，相反，通过阻止巴尔干地区的大规模屠杀，让中欧得以恢复元气，其目的不过是名正言顺地吹响了西方军事力量的集结号，以保护冷战的胜利成果。

“对于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波斯尼亚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西班牙内战。”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这样写道，此人是知名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传记的作者。他一语道出了知识分子在巴尔干问题上的激情。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发挥人的能动性，打败决定

论。有人通过摘录乔伊斯的作品来说明这一点：当利奥波德·布卢姆[(2)]感叹着面对自然法则强加的生存条件，如“大瘟疫”“大灾难”“大地震”等，人是多么无能为力时，斯蒂芬·迪达勒斯[(3)]a对此只是简单地回应道，“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理性动物”。

是的，灾难时时降临，世界本是如此，但人类并没有因此逆来顺受。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有责任与苦难和不公作斗争。

如此一来，中欧成了自由主义者的北斗星，一路向东南延伸，首先到波斯尼亚，再到科索沃，最后直达巴格达。当然，许多知识分子支持干预波斯尼亚，也反对伊拉克战争，或者至少是对它提出怀疑，但新保守派和其他人不会就此罢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巴尔干展示的是干预主义的成功理念，在付出最小生命代价的同时取得胜利，从而给许多人留下错觉，误以为未来战争都将如此。加顿·阿什热切地写道，20世纪90年代那些姗姗来迟的干预，让人想起英国诗人奥登（W. H. Auden，1907－1973）对20世纪30年代的描述：“低下而不诚实的十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十年来得未免太容易了。

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历史和地理终于低下了他们宁死不屈的头。柏林墙倒塌后，非历史性和普遍主义思潮蠢蠢欲动，然而不到两年，各国媒体突然发现自己陷入狼烟四起的废墟，残砖瓦砾堆积成山，一些地名拗口的小城镇里，建筑钢筋扭曲断裂。在古老的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边境地区，名为斯洛文尼亚和克拉伊纳的两个地方，刚刚目睹了纳粹以来在欧洲不曾再出现过的暴行。

于是，精英之间的战略对话，不得不从神侃全球一体化变成着力解开距离维也纳只有几小时车程远的中欧无名小镇的复杂历史问题。地图表明，克罗地亚南部和东部，靠近萨瓦河，就是广阔的欧洲平原的南部终点。在萨瓦河岸另一边绵延的崇山峻岭，统称为巴尔干地区。彩色立体地图显示，从法国到俄罗斯，即从比利牛斯山到乌拉尔山脉，象征着广阔平坦地貌的绿色一直延伸着，而到了萨瓦河南岸却陡然变成黄色，

又渐变成棕色，这标志着有更高、更坚固的地貌出现，并继续向东南延伸，直到小亚细亚。这个地区曾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操练场，双方此消彼长：西方基督教在此止步，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就此开始。就在这里，克罗地亚军民集结，与塞尔维亚对阵作战。

克拉伊纳（Krajina）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是“前沿”的意思，即军事禁区。16世纪末，奥地利人为反对土耳其的扩张而建立此禁区，并将从奥斯曼苏丹帝国专制统治下逃脱而来的克族和塞族难民都诱骗到前线一带。因此，这里成为一个民族混合杂居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的控制一消失，两族人就纷纷谋求建立单一民族身份国家；此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两族人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统治下一度团结起来；而在纳粹占领时期又被混杂着分成几块，克罗地亚在此地建立起纳粹傀儡政权，在死亡集中营谋杀了数以万计的塞族人。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后，斯洛文尼亚和克拉伊纳的边境塞族军队对克罗地亚人居住区展开了种族清洗，而当克罗地亚人重新夺回该地区后，这里的塞族人又不得不纷纷逃返塞尔维亚。战争从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边界地区一直蔓延到波斯尼亚，成千上万人遭灭门之灾，方式极为恐怖残忍。

这里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如此丰富，但敬业的记者和知识分子却视而不见。他们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甚至还不止一个。首先是纯粹的恐惧和厌恶。你看，加顿·阿什又来了：

> 我们从前南斯拉夫可怕的10年中能知道什么？……首先知道的一点是，人性并没有改变。在20世纪末的欧洲，人类实施野蛮暴行的能力丝毫不减当年，与本世纪中叶的大屠杀不相上下……在20世纪末，我们西方的政治流行语变成了“一体化”“多元文化”之类，或用老掉牙的词汇来形容，就是“大熔炉”。但前南斯拉夫问题一直与此相反。它像一个巨大的“离心力”机器，一个不停地疯狂旋转的圆

筒，向外甩出奶昔和黄油……在这里，随着机器奋力旋转，分离出来的是民族，而从过滤器底端不停地流淌出来的，是血。

随着这股逆流而来的，是对于西方在米洛舍维奇身上实行“绥靖政策”的指控。在柏林墙倒塌后，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别墅、豪华办公室、狩猎小屋和其他特俸津贴，而自己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并引发了第二次类似大屠杀的暴行。这一事件让人联想起1938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实行的绥靖政策及其灾难性后果，并迅速成为20世纪9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类比推论。

事实上，类似的“慕尼黑阴谋”恐惧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91年，美国之所以要把科威特从萨达姆·侯赛因的入侵中解放出来，就是这种恐惧症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不在科威特阻止萨达姆，他将拥有未来入侵沙特阿拉伯的资本，进而有控制整个世界石油供应的危险；他还将剥夺本地区人权，使整个地区陷入难以名状的黑暗和恐慌。

但是，国际上对于“慕尼黑阴谋”的类比最盛的时期，还是1991年和1993年间。当时，米洛舍维奇先是发起对克罗地亚的进攻，然后又对波斯尼亚塞族发动攻击，而西方没能及时回应，从而引起轩然大波。

在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繁荣与和平之后，世界大战的历史负担被抛在脑后，战争在人们心目中似乎越来越抽象，这时，对于“慕尼黑阴谋”的类比总会重新活跃起来。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美国在亚洲曾经遭受的痛苦不堪的陆地战争回忆，已经过去两个十年以上，残酷的战争印象已在人们心中变得暗淡。此时重提“慕尼黑阴谋”，是希望将其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提醒，呼吁世人眷顾世界，珍惜他人的生命。

1994年发生卢旺达种族灭绝大屠杀之后，最常见的舆论反应，就是质疑为何未能阻止它。但是，直到北约1995年在波斯尼亚、1999年在科索沃迟迟未能实施有效的军事干预，“慕尼黑阴谋”论才真正累积到了白

热化的程度。与此相对，那些反对干预者举出越南战争作为反例。万幸的是，一次次战争预告只是“狼来了”的呼唤，并未真正到来，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越南的幻影最终在巴尔干地区地烟消云散。这在当时成为被口口相传，大书特书的佳话［对于这些与干预迟缓有关的故事，我有自己的历史纪录。据说，我的拙作《巴尔干鬼魂：穿越历史之旅》（*Balkan Ghosts: 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是1993年克林顿总统决定不进行军事干预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因此推迟两年才向巴尔干地区派遣北约部队。——作者注］。

“慕尼黑阴谋”的类比

军事武力在越战时期遭人憎恨不已，现在却成为人道主义的代名词。“反对种族灭绝的战争必须带着暴怒去战斗，目的正是要打掉暴怒，”莱昂·韦塞梯尔（Leon Wieseltier）如是写道，他是《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文学编辑，“为了阻止种族灭绝，使用武力是第一手段，而非最后一招”。为此，韦塞梯尔不断示威抗议，反对为人道主义干预制订退出战略：

> 1996年，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一位生性犹豫又胆怯的人，竟炮制出一个所谓的“退出战略”：“在我们向海外派军之前，就应该知道如何以及何时需要把他们捞回来。”
>
> 莱克妄图在调遣美国部队方面扮演全知者的角色。“退出战略”学说，从根本上误解了战争的性质，更从普遍意义上误解了历史行为的本质。它以谨慎从事的名义，拒绝承认人类事件具有突变性。万事并非一开始就能预知结局的。

韦塞梯尔引用了卢旺达为例。100万图西人（Tutsis）在1994年的大

屠杀中丧生，他认为，如果西方适时干预、阻止杀戮，即使日后陷入军事泥潭，肯定比已经发生的悲剧要好。韦塞梯尔，正像加顿·阿什一样，是20世纪90年代立场最坚定、道义上最有说服力的代言人之一，他写了很多文章来发泄他的挫败感。他认为，正是因为北约空中打击的有限和迟到，才没能把科索沃的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从米洛舍维奇的驱逐和灭绝政策中解放出来。针对塞族城镇的空袭，在他看来必不可少，但根据人道干涉主义者的看法，要出动地面部队才能解放科索沃城镇。克林顿政府在发动战争时犹豫不决的态度，客观上成了造成大规模苦难的同谋犯。

“理想主义者的工作，”韦塞梯尔写道，“已被压缩成仅限于抢险救援，以及灾难的善后处理。我们是在本应大投特投子弹的地方大投特投毛毯。”他说，克林顿政府发明的是一种不需要美国人死掉的战争，这是一种懦夫的战争，靠的是精密技术，民意和良心则被抛在一边。他预测道：“这个时代的免疫力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迟早，美国将不得不派遣士兵……奔赴那些他们将遭受伤害或死亡的地方。重要的是事业正义与否，而不是事业是否危险。”

事实上，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酝酿。当时美军自恃天下无敌，历史和地理因素对它都奈何不得，只要选对时机，放开手脚，一举出动地面部队，就将所向披靡。换句话说，正是这些理想主义者在声嘶力竭、激情四射地鼓吹对海地、索马里、卢旺达、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使用武力。尽管像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亨利·基辛格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极力敦促美国保持克制，他们收到的反馈却只是越来越多的无情嘲弄。

然而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还是较少动用军事实力的10年，同时也是专门展示空中力量的10年。这是1991年从科威特赶走伊拉克军队的关键。当然，这种战例必须依赖于平坦广阔又很少下雨的沙漠地理环境，这样的地貌有利于取得高科技战争的胜利。

空中力量虽然表现出各种局限性，但在四年后结束波黑战争时仍然成为了关键因素，美军据此在科索沃完成了对米洛舍维奇的最后一击。阿尔巴尼亚族难民返回了自己的家园，米洛舍维奇的势力也被削弱到一定程度，最终在2000年被迫放权下台。仅凭人力无法“拔山”，这是美军最初不向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派兵的根本原因；但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拥有空中优势，陆军也能“力拨山兮”。

仿佛一时之间，在巴尔干地区刚要再次抬头的地理学派又被空中力量很快打压了下去。随后，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不断巡逻伊拉克禁飞区，让萨达姆成为笼中困兽，长达10年之久。因此，美国精英阶层在对军队的无比威力肃然起敬的同时，也对老乔治·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不在巴尔干使用军队义愤填膺，他们认为，这本可以制止20多万人遭受种族灭绝之害，更不用提发生在卢旺达的百万人大屠杀。这是一种有可能引向冒险主义的思维定式，实际上也的确出现了这样的结果。而且，这还会导致在未来的10年间对“慕尼黑阴谋”的类比之风减弱，而地理学说将重新恢复其应该受到的尊重和地位。

20世纪90年代，因为有了空中打击力量，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地图只剩下两维空间。但在阿富汗的群山中，在伊拉克的险恶小巷，三维空间将很快得到恢复。

1999年，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发泄情绪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韦塞梯尔写道：

> 克林顿拒绝把除掉米洛舍维奇这个恶棍算在他的战争目标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其前任（老布什）拒绝把除掉另一个恶棍（萨达姆）算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目标里，由此造成的后果，却正是由克林顿继承了。
>
> 1991年，近五十万美军势如破竹，距萨达姆·侯赛因只有几百公里之遥，布什总统却没有下令继续向巴格达进军。他的将军们刚

刚结束自己零缺陷的战争，也担心出现伤亡。他们也考虑到伊拉克的“领土完整”，似乎政权崩溃的短痛给人民带来的损害，不亚于维持独裁统治已经造成的长痛，特别是对于北部的库尔德人和南部的什叶派带来的苦难。

在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想象中，中欧边界仿佛是无限长的，最远可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当然，事情本可以变得截然不同。2006年，就在政权崩溃之后，伊拉克发生了最恶劣的教派大屠杀，萨达姆曾在该国实施的暴力与之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韦塞梯尔还算良心未泯，他坦言美国人“有点操之过急”。他也承认，尽管他支持战争，此时也无话可说了。仍然有一些入侵的狂热支持者，不惜口舌地极力为自己辩解，但他毕竟还不属于这类人。

当年，我也支持伊拉克战争，曾撰文鼓吹并加入相关民间组织，敦促布什政府大举入侵。美军在巴尔干地区表现出的力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萨达姆直接或间接谋杀的人数远超过米洛舍维奇，加上断定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我的观点来看，当时干预的确是必要的；我同时又是一名记者，沉溺于自己的故事中不能自拔：20世纪80年代从伊拉克发回的报道，对于萨达姆的统治比起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更具压迫性的观察，使我有意促成萨达姆下台。虽然后来以色列的领土扩张一下子使许多人支持战争，但据我与新保守派和自由派人士打交道的经验，在这段时间里，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战报比以色列的情况更能吸引这些人的眼球。

对巴尔干的干预使美国赚足了战争红利，似乎验证了在外交政策上，理想主义的做法具有可行性；1995年对波斯尼亚的干涉则改变了辩论的主题，从“北约该不该存在”变成了“北约该不该扩大”。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允许北约最终扩大到黑海岸边，其影响不亚于“9·11”事件。

一些理想主义者对伊拉克的关注，是20世纪90年代激情的延续。虽

然在潜意识里，这代表着地理学上的失败，但也由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之强大而可完全忽略不计。20世纪90年代，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被认为是值得期待的民主化候选国，尽管这些国家中也充满暴力行为，尽管其制度完善程度远远低于伊拉克。正是军队尤其是空军的力量，使普遍的价值观更显重要，甚至超越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理和历史经验。

“9·11”事件后，“慕尼黑阴谋”类比重新得到重视，在打破与萨达姆·侯赛因的僵局中也起了作用。人们惊奇地发现，虽然美国本土刚刚遭受了堪比“珍珠港事件”的大袭击，但该国的地面战争经验在1/4世纪以来已降到最低点，令人不敢恭维。此外，萨达姆绝非简单的独裁者，而是一个扎根于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明中的暴君，在很多人眼中堪比希特勒或斯大林。他窝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至少一时间所有人都这么认为。有了“9·11”事件和慕尼黑阴谋的前车之鉴，再不采取行动，历史将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们。

理想主义对美国的祸害

对慕尼黑阴谋的类比走到极致，却引出了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一度几乎被人遗忘的类比：越南战争。于是，冷战后的第二轮知识辩论周期开始了。

这一轮知识辩论周期的长度，约等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并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艰难战争相对应。“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得到重视，人们开始对美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冒险行为持怀疑态度，而“新保守主义”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遥远角落的民族和教派分歧被视为西方的责任所在、“好男儿”应该铲除的障碍，否则会被扣上“宿命论者”或“决定论者”的帽子；而到了下一个十年，这种仇恨的种子却在警告我们远离军事行动。越南战争的类比完全压过慕尼黑阴谋类比的决定性时刻，是2006年2月22日。当时逊尼派基地组织极端分子

炸毁了萨迈拉的什叶派阿斯卡里（ai-Askariyah）清真寺，并在伊拉克内部煽动教派间的暴行，美军对此束手无策。仿佛突然之间，我们发现面对原始的仇恨和混乱，地面部队是如此无能为力。万能的美军神话，在巴拿马战争和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横空出世，在索马里遭受重创，然后在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得到修复和打磨，此时则被轰然震碎，理想主义思潮亦随之而去。

如果说对于慕尼黑阴谋的类比关乎普遍性，是对世界上其他地区人民的眷顾，对越南战争的类比则是一种自我关怀。5.8万人在那场战争中死去了。越南战争的教训就在于，盲目的热情会导致事情向错误方向发展，而悲剧性思维有助于避免悲剧。事实上，一开始正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意识，将美国拖入东南亚的冲突中。当时的美国处于和平盛世，享受着“二战”后繁荣的顶点。还有比这更应该参与的战争吗？地理和距离被抛诸脑后，当军队进入越南战场时，人们心目中最近的战争往事，是60年前菲律宾丛林的残影。

越南战争是每当美国遭受重创后就容易引以为戒的战例。现实并不精彩，血淋淋的教训只有在事情恶化后才再度得到尊重。事实上，有近5 000名美国人在伊拉克死亡，超过3万人重伤，几十万伊拉克人死亡，另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成本，截至本书发稿时尚在统计中。即使伊拉克将来演变成一个半稳定的民主国家，或成为美国的准盟友，如此过度的代价仍显得得不偿失，正如某些人指出的那样，坦率地讲，很难看到我们的胜利成果有什么道德价值。

不过，伊拉克战争倒是打破了一些思维定式，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美国在向国外部署军力时，总要得到些道德上的回报。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任何国家，即使像美国这样标榜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如果无节制地使用权力，也不一定会形成良性循环，时常“善”无善报。在现实主义重获尊重的同时，知识舆论界重新燃起了对17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兴趣。他对于“恐惧”的道德优势大加颂

扬，并认为暴力的无政府状态是社会的主要威胁。在霍布斯看来，对暴力与死亡的恐惧，是人类自我利益的觉醒。这种恐惧可以通过建立国家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只有违法者才需要面对的恐惧。然而，这样的概念很难得到城市中产阶级的理解，因为这些人早已失去任何与人类自然状态接触的机会。

冷战后时代又将我们带回原点，让我们认识到，哪怕是我们与之冷战了几十年的极权主义，在许多方面也要比无人负责的无政府状态更为可取。虽然我是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支持者，我也不得不说，在伊拉克，我们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004年3月，我发现自己置身于科威特沙漠的乌达里军营（Camp Udari）之中，与海军陆战队队员一起经历了第一波暴力袭击浪潮。一个四分五裂的伊拉克，并不像卢旺达和波斯尼亚一样，是某个统一组织的死亡机器造成的结果，而是因为秩序的崩溃而回到“原始状态”。霍布斯因此成为冷战后第二波知识辩论周期的标志性哲学家，就像伯林在第一周期享有的地位一样。

海军陆战队正要启程，从陆路开往巴格达和伊拉克西部，为陆军第82空降师换防。这是由帐篷、床板、集装箱和食品间组成的流动部队。并列行进的7吨级大卡车和悍马车队，浩浩荡荡地一路北上，美国在伊拉克史诗般的军事干预，很快就会公诸于世。沙尘暴刮起，风刀刺骨，暴雨威逼，车辆抛锚。

而就在短短的几年前，我们离巴格达只有区区几百公里的路程，却半途而废，因为当年那些人把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仅仅看做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延伸。广阔的沙漠里，原油和汽油味扑面而来，预示着前面就会出现第一个由承包商建造的车辆服务站。这一路沿途有许多工程项目，为北上行军的数百车辆提供服务，供应数以千计的海军陆战队员的给养。发动机和发电机在黑暗的夜色中发出轰鸣。这世界上最复杂的物流，包括储存和运输矿泉水瓶、三餐即食盒饭、洗漱用品包等一切物

资，只用数天功夫，就跨越凶险的沙漠，抵达巴格达以西的费卢杰城（Fallujah）。只是区区几百公里而已（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先头部队到达了距巴格达150公里以内的范围，但大部队仍然驻扎于科威特和沙特的沙漠地带。——作者注）。

在美国完成对伊拉克军事占领的过程中，这只是较为容易、相对非暴力的环节。但由此来证明地理不再重要，无疑是错误的。

---

(1) 威尔逊主义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愿望、信念和标准，以及由此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的计划。1918年1月8日，他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即威尔逊主义的主要内容。——译者注

(2) 乔伊斯作品《尤利西斯》主要人物。——译者注

(3) 乔伊斯作品《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主要人物。——译者注

第2章
分裂的地理，报复的逻辑
地图的力量

现实主义是将我们引向地理的力量，强调我们要善待地图并认识到其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现实主义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藐视将地图的地位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为金砖国家，中国比巴西更有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发展潜力，是因为地理位置决定的？为什么非洲至今仍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方？在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时代，地理到底还重不重要？

为何自由国际主义者普遍支持在巴尔干地区进行干预，却反对入侵伊拉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地理是以何种方式勾勒出人类政治版图的？同时，地理又将以怎样的方式对人类进行报复？

现实主义与地图的价值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最初几年遭受的惨败，印证了现实主义的箴言：想要在某个地方有所作为，当地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必然会产生阻碍。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观点曾经受到理想主义者的诋毁。然而，那些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最好不要过于强调越南战争的类比，以免矫枉过正，陷入孤立主义的泥潭，正如其导致绥靖政策的可能性一样。用中东问题专家福阿德·阿杰米（Fouad Ajami）的话说，越南战争的类比“经常会引起降低期望值的轻率偏见”。别忘了，慕尼黑会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内召开的。那场大规模战争的残酷性，使得张伯伦这样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理所当然地设法避免历史重演，但这种形势对于心怀战争阴谋的国家来说，却是最适合不过了。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他们本就无所畏惧。

越南战争的例子意在限制，慕尼黑阴谋的例子意在克服这些限制。单独拿任何一个案例来作类比，都可能是危险的。只有正反两方面都得到妥善权衡，正确的政策措施才有保证。明智的决策者，会意识到其国家的局限性，懂得政治的艺术在于尽可能靠近边缘，又不至于从悬崖上失足跌落。换言之，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一位政治家的性格所发挥的作用，跟他的智力一样多。

现实主义的鼻祖可以追溯到2 400年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中的深邃见地，证明他对人类行为不抱任何幻想；现代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却是汉斯·J.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他于1948年出版的著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是其思想的全面总结。让我暂停一下，先来谈谈这本书。这是一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德国难民的智慧结晶，

可以为我的地理大讨论确立基调：为了正确看待地图的价值，现实主义至关重要，实际上，它正是将我们直接引向地图的力量。

摩根索一开篇就指出，世界“是人性中的本质相互作用的结果”。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人性的本质即恐惧（Phobos）、自我利益（Kerdos）和荣誉（Doxa）。“要改善世界，”摩根索写道，“我们必须与这些力量合作，而不要与它们对着干。”因此，现实主义者接受已经掌握的人类物质现实，不管它们多么不完善。“历史上的先例，比抽象的原则和目标有吸引力得多，能引导我们少做恶行，而不是实现绝对的善举。”例如，一个现实主义者会通过研究伊拉克历史上的族群图谱，而不是诉诸西方民主的道德戒律，来预测伊拉克推翻专制政权后将会有怎样的未来。按照摩根索的说法，良好的愿望几乎与正面的结果没有任何关系。

他举例说，张伯伦与大多数英国政客相比，在个人权力方面的考虑少得多，而是努力寻求所有相关者的和平与幸福，但他的政策给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带来了难以名状的苦难；另一方面，温斯顿·丘吉尔的任何决策都以个人和国家权力作为出发点，对此他从不讳言，但他的政策却意外地产生了无法想象的道德效果。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在主张向伊拉克派兵时，认定这将大大改善那里的人权状况，但结果却与其初衷适得其反。这一切说明，并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国家采用民主政权，其外交政策就一定比专制政权更好或更开明。正如摩根索所说，“要满足民众的情感需要，就会无一例外地损害外交政策本身的理性”。

民主和道德根本不是一回事。“所有国家都禁不住用普世的道德目的来掩饰自己特定的愿望，很少有人能长期抵抗这种诱惑，”他继续说，“承认各国都受到道德的约束是一回事，而利用所谓的‘正义’在国际关系中谋求国家利益，又是另一回事。”

此外，国家必须要比个人受到更多道德约束。摩根索写道，“个人

可以说这样的话……‘让正义得到伸张，即使世界灭亡’，但是国家没有权利以那些受庇佑者的名义这样说。”个人只对他的亲人们负有责任，他们会原谅他的错误，只要他出于善意；但一个国家必须在其境内保护千千万万人的福祉，一旦政策失误，不会得到任何谅解。因此，国家必须比个人深谋远虑得多。

人性，即修昔底德所谓“恐惧、利益和荣誉的综合体”，造就了这个冲突和强权层出不穷的世界。对于摩根索这样的现实主义者来说，冲突是意料之中的，无法避免，因此不必像理想主义者那样反应过度。他们理解，在人类的交往过程中，尤其是各国的互动之中，“支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摩根索援引罗诺克学院教授约翰·兰多夫（John Randolph）的话说，“单靠权力自身就可以限制权力”。现实主义者不认为国际机构是和平的关键，因为这些机构所反映的只是各个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平衡。这种平衡，正是“和平还是战争”的最终决定因素。

但权力平衡系统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按照摩根索的说法，每个国家都在担心可能误判了权力平衡，因此必须不断取得更大的权力优势，来补偿其万一出现的误差。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动因，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德国威廉二世和沙俄都试图调整权力平衡，以便对自己有利，结果严重失算。摩根索写道，正是由于普遍性道德良知的存在，即把战争看做“自然灾难”，而不是本国外交政策的自然延伸，最终限制了战争的频繁发生。

地理的逻辑

2003年至2007年间，在伊拉克发生一系列暴力事件之后，我们都宣称自己已成为现实主义者，或至少自恃如此。但从摩根索对现实主义的定义来看，果真如此吗？例如，大多数人以“现实主义者”的身份反对伊拉克战争，那他们是不是也觉得，民主和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呢？请记住，摩根索反对越南战争，是同时基于道德和国家利益的双重理

由，因此他是最易让人接受的现实主义者。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一生从未有过对权力和地位的奢望，而不像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等现实主义者那样展现出雄心壮志；此外，他为人内敛朴实，也不像基辛格或塞缪尔·亨廷顿那样尖刻犀利。事实上，即使是摩根索这样的现实主义者，都应该让人感到不安，对此无人予以否认。现实主义者明白，国际关系受制于比国家内政事务更无奈、更有限的现实。国内的政体毕竟受到法律的制约，因为合法的政府有武力的垄断使用权；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则仍然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不存在霍布斯笔下的巨人利维坦[1]可以对不公正予以惩罚。事实上，文明的表面掩藏着的正是人类最冷酷的欲望，因此对于现实主义者而言，外交的核心问题是：谁可以对谁做什么？

“现实主义是对美国传统的异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曾这样告诉我，“它刻意忽略道德因素，认为在这样低俗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利益，而不是价值观。但是，现实主义永远不会死，因为它准确地反映了各国的行为本质，所谓的价值观言论，不过是用来粉饰门面而已。”

现实主义者重视秩序超过自由，对他们来说，后者只有在前者已经确立后才变得重要。以伊拉克为例，即便是极权主义性质的秩序，也要比缺乏秩序的后果更人性化。世界各国政府永远都是难以捉摸的，所有社会的进步方式永远不会完全一致，世界注定要被各种不同的政权统治，一些地方甚至还处于部落化和民族化的无秩序状态。源起于古老的希腊和中国的现实主义，一路绵延数千年，直到20世纪中期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Remond Aron）和他的西班牙同龄人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 Gasset）等现实主义者加入，其核心理念仍然是：战争，是人类固有的本性，是区分国家和其他集团的必由之路。主权和联盟绝不可能凭空出现，他们出现于与他人的差异。在全球化的信徒仍在高唱人类统一时，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则一直强调着人类的分歧。

所以还是来看地图吧，这是人类分裂的空间图示，是现实主义作品摆在首位的主题。但地图并不总是说实话。他们有时会像散文小品那样主观臆断。

已故英国地理学家约翰·布赖恩·哈雷（John Brian Harley）曾说过，看看欧洲人给非洲大片土地所起的名称，我们就知道制图学是如何诠释“权力话语”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了潜伏在地名中的帝国主义。此外，墨卡托投影[2]显示的欧洲也大于其实际面积。地图上的国家总用非常鲜明的色彩标识，以示对于本土之外区域的统一控制，虽然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地图是唯物的，因此在道德上必须是中立的；换句话说，它又可能是危险的工具。但他们确实是了解世界政治的关键。“地理是国家权力的金字塔赖以确立的相对稳定的基础。”摩根索如是说。一言以蔽之，现实主义是对最生硬直率、最令人不舒服，同时又最具确定性的真理的认识，这个真理就是地理。

地理也是人类自身历史的背景图。除了制图失真的情况之外，它都可以被看作政府的秘密议会，可以揭示其长远意图。一个国家在地图上的立场，是立国的首要大事，比其执政理念重要得多。哈尔福德·麦金德形容道，地图能令人“一眼知乾坤”，而地理则是艺术和科学之间的桥梁，用环境因素连接那些人文学家经常忽略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18世纪和19世纪政治学作为专门的学科出现之前，地理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学科地位，经常被当做政治、文化、经济等学科的重要参考工具。根据唯物主义的逻辑，山区和部落的重要性高过理论观点上的世界。或者说，山脉及其居民是现实的，第一位的，而思想不管被拔得多高、有多坚定，都只是第二位的。

这也是我的观点。我在伊拉克战争中接受了现实主义，不管这么做有多么不易，以及在多短的时间内下的决心。其实我们接受的是地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地图反驳的正是人类平等和统一的观念，它提醒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地球在许多方面是分裂的，不

同的环境导致了冲突，而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观点。

打个比方来说，帝国主义的普鲁士人对地理一词的感觉，肯定不如英国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人感觉那么恶劣。这就是地理的报复，标志着冷战后时代第二波知识辩论周期的顶点和第一个理论循环的结束。此前，我们曾通过空中力量和人道主义干预的胜利来宣示地理学的失败，现在我们又被带回人类生存的最底层，在那里接受未来生存斗争的挑战。地理通过预示和联想，严重制约着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和阿富汗等地方承受痛苦。

虽然不得不承认现实，但也并非没有希望：我们可以努力深化在地理方面的知识，借助技术来规避地图的限制。这也是我研究的目的，一种“非直觉”的对应之法。因为不仅思想的狭隘会导致孤立主义，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也一样会导致孤立主义的反弹。

人类活动轨迹的前戏

但是，我们必须先来认识地理学科的核心。英国地理学家W.戈登·伊斯特（W. Gordon East）写道，“成事在天，但取舍在人”。人的行动是有限的，受到地理上的边界所限制；但是，由于地域范围的广阔，人类可以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发挥其能动性。

事实证明，阿拉伯人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有实现民主的能力，而利比亚部落和也门山脉的空间安排，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也将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地理可以预知，而不是确定，因此它不是宿命论的代名词。但它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分布一样，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制约和推动因素。

尼古拉斯·J.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伟大的战略家，耶鲁大学教授。他在1942年写道，“地理不用自辩，而是自明。”他用这样一段话阐释了他的观点：

> 地理是美国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因素，也是最永恒的因素。部长来去更迭，连独裁者都死了，但山脉岿然不动。
>
> 乔治·华盛顿，率领其衣衫褴褛的大陆军，保卫着十三个殖民地，他的继承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掌握着整个新大陆，无数资源任其调度，但大西洋却继续让美国和欧洲分离，圣劳伦斯河港口冬季仍然结冰断航。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把俄罗斯拱手让给斯大林，他留下的不仅是权力，还包括他未完成的任务，那就是为俄罗斯争夺出海通道；而马其诺将军和克里孟梭则继承了凯撒大帝和路易十四对开放的德国边境的焦虑。

有人可能会补充说，尽管“9·11”事件震惊全球，但大西洋仍然很重要。事实上，正是大西洋决定了美国和欧洲奉行不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我们也同样可以说，俄罗斯直至今天仍然是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陆权大国，它渴求更多的出海通道。从一方面来说，俄国在13世纪是蒙古汗国入侵的受害者，只靠着时间、距离和天气这些自然因素逃过一劫；另一方面来说，因为欧洲、乌拉尔地区和东欧地区之间没有大的障碍，尽管人工边界柏林墙倒塌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依然存在，百年来并无变化。是美国通过支配整个大陆的资源，才最终保住了欧洲的和平。

的确，地理是人类活动轨迹的前戏。欧洲文明的重要来源是希腊的克里特岛和基克拉迪群岛，前者是“从欧洲独立出来的碎片”，是欧洲连接埃及文明的最近地点，后者则是与小亚细亚的最近地点。德国是陆权国家，英国只是一个岛国，这是欧洲历史不可争辩的事实。德国东西两边均无山脉保护，为了应对其危险的地理位置，它选择的道路从军国主义到当代的新型和平主义；而英国边界安全，面向海洋，可以比其邻国更早地发展民主制度，并与美国建立了特殊的跨大西洋关系，与它共享一种语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过，如果英国不是一个岛国，其军事制度将会与欧陆国家一样霸道，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某个极权势

力的受害者”。正是其地理位置保证了英国在历史上免遭最危险的入侵，并在几个世纪以来对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对岸的法国及其他低地国家的政治付出战略关注，使他们能够顺利发展。一切事实均表明，国际事务的构成往往以地理为基础，而我们却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为什么中国无论如何都比巴西更重要？是由于地理位置。即使巴西与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同一水平，人口同等规模，它也没有像中国那样掌握着连接海洋和大陆的主要海上交通线；它也不像中国大部分地区位于温带，享有更健康的环境和更令人精神振奋的气候。中国面临西太平洋，内陆纵深，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的中亚接壤，而巴西的地理优势则比较小。它孤立地处于南美洲，从地理上就与主要大陆分离了。

非洲为什么这么穷呢？虽然非洲是世界第二大陆，面积是欧洲的五倍，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海岸线却只有其总长度的1/4。这条短短的海岸线上缺乏天然良港，东非的港口虽与阿拉伯和印度交易频繁，却只算是个例外。此外，非洲的河流很少能与海洋通航，它们从内陆向沿海平原顺势而下，形成一系列瀑布和急流，这也造成了非洲内陆与沿海的隔离。

检视世界上最贫穷经济体的清单，内陆闭锁型国家所占比例很高，尤其是位于北纬与南纬23.45°之间的热带国家普遍较差。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分布在中高纬度地区。借助温带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东西向的欧亚大陆实现了良好的科技扩散效果，因为共同的纬度和相似的气候条件最适宜科技传播和创新，移栽的植物和驯养的动物也容易成活，这使得它将南北向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远远地甩在后面。明明是土壤肥沃、足以养活稠密人口的地方，却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那里远离港口，铁路也无法到达，不具备经济发展的条件。印度的中部和内陆地区，也是很好的例子。

在总结地理决定论时，已故地理学家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还观察到一个现象：“梵文的舌头在海拔500米时就会冻僵，人们不得不

保持沉默”。也就是说，印度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低地现象。还有许多例子，都可以说明地理如何以微妙而明显的方式从各个方面影响某一民族的命运，许多例子都很有传奇色彩。在研究的进程中，我会逐渐谈及它们。

在继续讨论之前，让我先提一下美国的例子。正是地理帮助美国保持着繁荣，这可能也是美国泛人本利他主义（pan-humanistic altruism）的最终原因。正如美国首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指出的那样，“没有人给美国人以特殊恩赐，大自然对待他们与其他人没有两样”。

历史学家约翰·基冈（John Keegan）说，美国和英国倡导自由，只是因为海洋保护他们“免受那些来自大陆并威胁自由的敌人的骚扰”。20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的军国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地理环境的产物，而不是国民性格使然。对此，美国人总是怀有优越感。在拥挤的欧洲大陆上，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帝国彼此毗邻，一旦发生军事误判的事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海洋全身而退。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上，普遍的道德不适用，他们不得不以精良的武装力量彼此对抗，直至“二战”后由美国主导霸权。两大洋不仅给了美国人理想主义的奢侈，还让他们轻而易举地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两条政治和商业动脉，横跨大西洋可到欧洲，横跨太平洋可到东亚，美洲大陆的财富就置身其中。然而，也正是这两大洋，把美国同其他大陆隔开数千里，给美国种下了孤立主义的毒株，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1940年欧洲国家体系崩溃，也未能使美国立即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在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之后才断然应战。战后美国再次从世界事务中撤回，直到苏联不断侵略扩张，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才迫使美军重新回到欧洲和亚洲。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精英们就一直在准孤立主义和理想化心态的干预主义之间左右摇摆，所有这一切从本质上说，都是因为两大洋。

从未降格的地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贾库柏·J．格瑞吉尔（Jakub J. Grygiel）写道，“地理已被遗忘，而不是被征服”。长期担任英国和美国政府军事战略顾问的科林·S.格雷（Colin S. Gray）也认为，“认为技术可以将地理因素一笔抹杀的论调，即使证据充分，最多也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用格雷的话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若想真正实现影响力或实施持续性控制，……就必须有武装人员长期驻扎在这些时刻会爆发冲突的地区”。不仅如此，凡是相信地理已经不再起作用的人，都对军事物流缺乏起码的认识，那毕竟是一门关于如何把大量人力物力从一个大陆运往另一个大陆的学科。

我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横穿伊拉克的经历，只是军事物流工作的一小部分，这项工作还包括飘洋过海数千英里（1英里约为1.6093千米），把人力和设备从北美运往波斯湾。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威廉森·穆雷（Williamson Murray）在1999年发表的分析性著作中展现出惊人的洞察力。他认为，随着新世纪的临近，美国将再次面临两大洋施加的“恶劣的地理现实”限制，在遥远的地方部署地面部队，将使我们付出无法估量的昂贵代价。虽然空降部队的参与可以使一些战斗和救援任务很快结束（以1976年以色列突击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解救被劫持的航班乘客的案例作比。——作者注），但在这些行动中，地形仍很关键。地形决定了战斗节奏和方法。1982年福克兰战争[(3)]进展缓慢，因为那是海洋环境；而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平坦沙漠放大了空中力量的作用。然而，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人口稠密区的诸多狭长地带暴露了空中力量的局限性，从而使美军成为地理的牺牲品。飞机可以轰炸，但不能运输大宗货物，也不能行使对地面的控制。此外，在许多情况下，飞机需要尽可能近的基地提供补给。

即使是在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时代，地理也至关重要。正如摩根索指出的那样，中小型国家，如以色列、英国、法国、伊朗，不能承受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陆权大国所能承受的同级别打击，因此他们的核威慑战略缺乏必要的可信度。这就意味着，像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在面对

敌对势力时，为了生存，要么处境特别被动，要么不得不特别咄咄逼人。这主要还是地理问题。

然而，全盘接受地理因素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同意“世界必然受到种族和宗派分裂驱使”这一观点，也不意味着对全球化的抗拒。事实远比这更复杂。全球化本身促使地方保护主义重生，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重生建立在种族和宗教意识基础上，而这些意识必须与具体地形相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参考地图得到最佳解释。因为大众传媒和经济一体化的力量已经削弱了许多国家的权力，包括无视地理因素人为划定的国家，一些关键地区显得难以控制、动荡不安。由于通信技术的发展，尽管单个伊斯兰国家内部风雨飘摇，泛伊斯兰运动还是在整个亚非伊斯兰弧形地带得到了壮大。

以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为例，从地理上讲，他们是地中海和印度次大陆之间最不合逻辑的两个国家。即使是阿富汗，从地图上看充其量也只可称为“小国”而已。是的，伊拉克的分崩离析是因为美国入侵，但萨达姆·侯赛因的暴政（20世纪80年代我亲身经历领教过，迄今仍觉得是阿拉伯世界中最糟糕的政权。——作者注）从根本上可以说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从1958年的第一次军事政变起，伊拉克的每一位独裁者都不得不比其前任施加更多的镇压，才能把这样一个国家强扭在一起。因为伊拉克没有天然边界，是由库尔德人和逊尼派以及什叶派阿拉伯人组成的一个国家，其种族和宗教意识的冲突早已达到明火执仗的程度。

我们还是不要扯得太远为好。的确，那些把库尔德人从伊拉克其他地方分隔开来的大山，那些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划分成中心逊尼派和南部什叶派的分界线，对事件发展所起的作用可能比对民主的向往更关键。但没有人能知道，未来是否一定会出现一个相对稳定和民主的伊拉克。想想欧洲东南部的山脉，它们曾帮助奥匈帝国脱离贫困和欠发达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曾让种族主义和教派主义势力在巴尔干地区世世代代处于分裂对立状态，但没有人要求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实施干预，来

阻止自相残杀的战争。

我不是在谈论一种连人类都无能为力的、无可战胜的力量。相反，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应该虚心地接受地理上的事实，以遏制在外交政策上的过度热情，对此我自己早已深感内疚。惟其如此，我们所参加的干预行动才会更加成功，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将来在舆论的法庭上才会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地理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报复人类？

我现在意识到，在将地理学推上神坛时，我自己却站在了危险地域。因此，我将在研究过程中时刻铭记以赛亚·伯林的警告。他在1953年发表的著名演讲，次年以《历史的不可避免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为名出版。他斥责那些不道德和懦弱的信念，即地理、环境、民族特色等“强大的客观力量”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和世界的政治方向，并指责汤因比和爱德华·吉本，说他们眼里只有“国家”和“文明”，似乎这些比人“更具体”；他们心中只有抽象的“传统”和“历史”，似乎这些比人“更聪明”。

对伯林来说，个人及其道德责任是最重要的，因此他或她不能完全或部分地将其行为或命运归咎于地理和文化等因素。人类的动机对历史的影响很大。它们不是幻想，不会随着作为参照物的更大力量出现而消失。地图是解释过去和现在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

虽说地理、历史、民族特征会影响而并非决定事物的未来，但若不充分考虑这些特定因素，我们就无法应对今天的外交政策挑战，也无法作出明智的选择。伯林对一切形式的决定论都全盘否定，在面对这些因素时却犯了同样的错误。

如果当时借鉴了地理、种族和宗派的因素，我们可能就会预见到冷战结束后巴尔干的动乱，也能预见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暴力冲

突。然而，伯林的道德挑战至今仍能站得住脚，因为在过去20年里，围绕在哪里部署海外驻军的问题展开过一场大辩论，伯林为这场辩论提供了理论框架。

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承认地理在塑造历史方面的重要性，又要避免过度强调的危险，如何将二者区别开来？雷蒙·阿隆曾提出，“清醒的伦理植根于‘概率决定论’的真理”，因为“人类的选择总是在一定的框架内或限制中运行，比如对过去的继承”。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这一概念当做避风港。

这里的关键词是“概率”，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聚焦于地理，是在坚持部分的或迟疑的决定论，承认族群和地形之间的明显差异，但并不过分简化，并且留下许多可能性的窗口。自由国际主义者普遍支持在巴尔干地区进行干预，但反对入侵伊拉克，就反映了这一精神的细微差别。他们凭直觉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个主要的地理事实，那就是前南斯拉夫处于前奥斯曼帝国最西端，毗邻中欧，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处在前奥斯曼帝国最混乱的东部末梢。因为这一事实一直影响着那里的政治发展，在伊拉克的干预将被证明只是这种影响的延伸。

那么，在今后的岁月里，那个温和的命运，那只看不见的手，会为我们储藏着什么宝贝呢？我们该如何向地图学习，才能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让我们通过20世纪几位大学者的眼睛，回顾一下地理对世界历史大格局的影响，然后再通过古代先贤的视角，具体看看地理和人为干预的相互作用。这将会为我们作好铺垫，用以探讨那些最经得起时间考验又极富挑衅性的地缘政治理论，并看看他们描绘的未来世界是怎样的。

---

(1) Leviathan，意指庞然大物。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出版的著作《利维坦》（*Leviathan*）中称，人类为了自我保护，创造了利维坦，但利维坦在保护人类的同时又在吃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把利维坦关进笼子里。——译者注

(2) 墨卡托投影（Mercator projection），即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由荷兰地图学家墨

卡托于1569年创拟。假想一个与地轴方向一致的圆柱切或割于地球，按等角条件，将经纬网投影到圆柱面上，将圆柱面展为平面后，即得本投影。在切圆柱投影与割圆柱投影中，最早也是最常用的是切圆柱投影。——译者注

(3) FalklandsWar，又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是1982年4月至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马岛的主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译者注

第3章
地理的历史轮廓
希罗多德和他的继承者

麦克尼尔的现实主义世界历史观是怎样阐述地理与文明之间的关系的？位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何自古以来就是专制独裁政权的温床？

汤因比为何会认为安逸的地理环境反而不适合文明的发展？

霍奇森为何认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是错误的？他所倡导的“一世界”是否真是打开世界历史大门的钥匙？伊斯兰教的形成与阿拉伯地区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联系？霍奇森认为马背上的蒙古人比骆驼背上的阿拉伯人的历史地位更重要，这又是为什么？

20世纪中后期，当汉斯·摩根索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任教的时候，其他两位出类拔萃的教授也在历史系开创了卓越的学术道路。他们是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和马歇尔·G.S.霍奇森（Marshall G. S. Hodgson）。大学里不乏严谨治学之士，那里人才济济，我单独提出这三位教授的名字，并不意味着轻视其他同行。

如果说摩根索确立了当代的现实主义，麦克尼尔则确立了世界历史的现实主义，而霍奇森确立了伊斯兰教历史的现实主义。在他们希罗多德[(1)]式的作品里，地理因素不再显得遥不可及。麦克尼尔和霍奇森在选择他们的专业时显示了巨大的勇气，在当前的学术时代更是值得钦佩，主要是其研究方向集中在非常狭窄的专业化领域。说实话，在知识的深入积累方面，这种专业化非常有必要。品读麦克尼尔和霍奇森的著作是件令人愉悦的事，当年那些学者们的学术视野简直是无限的。专业化迎来了大好时光，学术界也可以更多地享受到这两位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成果。他们展示的就是地理，它来自于且自身就是一种宽广的思维方式。

动荡的美索不达米亚

威廉·H.麦克尼尔，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963年他40岁，正值不惑之年，即出版了《西方的崛起：人类社会的历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这部长达800多页的巨著，其主题是挑战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观点。他们认为，不同的文明追求自己独立的命运，而麦克尼尔则认为，正是文化和文明的不断互动写就了世界历史的剧本。这部剧本所写的，是人民在地图上的大流动史。

一次北上大迁徙，在公元前4500至公元前4000之间把所谓的“多瑙

河”开垦者带到中欧和西欧；南下的一支则是牧民和农民的先驱，他们越过北非到达直布罗陀海峡，“迎接和挑战多瑙河的洪水”。欧洲更古老的狩猎原著民群体没有遭到破坏，麦克尼尔写道，而是与之形成了混合的人口和文化。由此，这本书的心脏搏搏跳动起来。

这两股围绕着地中海北部和南部的人口流动，分别起源于肥沃新月地带[2]和小亚细亚，那里政治上不稳定，主要是地理起作用的结果。“埃及的地形与人类交通路线平行，因此能够和平相处，但伊拉克作为边境省份，从最早的时候起，就交叉困扰着人类命中注定的路径。”已故英国旅行作家芙蕾雅·斯达克（Freya Stark）写道。麦克尼尔也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历史上最血腥的迁徙路线之一。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下游平缓的地域中，灌溉用水绵延数英里，“平原城市的蓬勃发展，对于周围的野蛮人来说，是诱人的掠夺对象”。

此外，随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分水浇地得到开垦种植，某个氏族部落的土地有可能延展到另一个部落，加上没有中央权威机构来解决边界争端和在用水短缺时期合理分配水源，接连不断的战争就出现了。在半混乱状态之中，出现了萨尔贡（Sargon）这样的征服者，他们从种植区的边缘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虽然征服者能够建立中央集权和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但经过几代人之后，最终会迷上“更温柔、更豪华的”城镇生活方式。接着又一波新征服者到来，历史就这样循环往复。

这一说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4世纪突尼斯历史和地理学家伊本·哈勒敦。他注意到，奢侈的生活会在政权初建时起到积极作用，到了后期却会加速颓废与崩溃的进程。地方诸侯的崛起就是明显的信号，他们悍然入侵并形成自己的新王朝。在伊拉克古代文明崛起的进程中，统治者为了避免内部瓦解，最终采取了极端专制主义，因此出现了提格拉特-帕拉沙尔（Tiglath-pileser，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11世纪），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Ashurnasirpal II，公元前9世纪）和森纳赫里布（Sennacherib，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7世纪）等出了名的暴君，他们狂

妄自大，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了大规模驱逐。这种模式到萨达姆·侯赛因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印证了对于一个容易受到入侵和支解的地区来说，在整个历史阶段始终需要保持相当程度的暴政。

但是，需要再提醒一次，应该避免得出过于狭隘的结论。例如，1921年和1958年之间，伊拉克曾经历过运作良好的温和议会制度，如果当时情况变动不大，就有可能继续下去。麦克尼尔、斯塔克和伊本·哈勒敦讲的只是地理和历史趋势，从而避免了决定主义的罪名。

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特征为那里的极端暴政和官僚集团奠定了基础，而埃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较少压迫性，地理可以说起了重要作用。麦克尼尔解释说，“沙漠给埃及提供了鲜明的边界，其地易守难攻，而尼罗河则作为天然的中流砥柱和神经系统存在着”，这使得尼罗河沿岸无需采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压迫水平。“应对外族人的边界入侵……对埃及王朝来说，几乎不是问题。”确实，由于埃及地形与迁徙路线平行，比美索不达米亚在地理上有利得多，利比亚人只能由西部进逼，而亚洲人只可从东部渗透，所受威胁相对较小。埃及的南部闭锁，只有尼罗河两岸光秃秃的沙漠，北部有地中海，这可能就是4 000年里，埃及人“从来没有看到入侵的僭主能站稳脚跟”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尼罗河易于通航，河面宽广，风向适宜。因此，文明的曙光最早照亮埃及。

“相比之下，”麦克尼尔写道，“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没有现成的自然工具可以利用，地理没有赋予他们像埃及那样的天然屏障，只能缓慢和痛苦地发展（压迫性）的法律和官僚政体，以此作为地理屏障的人工替代物，来确保自己的集中权力。”美索不达米亚还需要在庞大的官僚体制中调拨人力来处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泛滥洪水，从而使灌溉系统的组织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情况在尼罗河流域则不会出现。

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在中东地区以外，存在着麦克尼尔所谓的“处于古代文化世界边缘的文明体”，即印度、希腊和中国。前两种文明的活力，相当一部分来自印度河和米诺斯人的克里特岛。但是，这三大文明体都源起于其自身与野蛮入侵者的相互作用，并部分地凭借地理进行自我保护。希腊和印度的北方山区，都是“有效的庇护，挡住来自草原骑兵的直接冲击”；中国则更加孤立，荒凉的沙漠戈壁，高耸的山峰，使中国文明在远离中东和印度中心地带万里之外的黄河流域得以孕育。三种完全原始的文明形式，尤其是中国文明，在稳定中自成一体地发展延续，完全不受中东大沙漠的影响，后者的文化从北非延伸到土耳其，日益表现出统一性特点。

麦克尼尔解释说，在整个古代时期，希腊、中东、印度等文明体的边界不断变动，在欧亚大陆形成了微妙的文化平衡，后来在中世纪的几百年里，毁于从北方蜂拥而至的蒙古草原民族之手。但是，也正是蒙古人使丝绸之路得以绵延发展，从太平洋到地中海的欧亚文明相互间得以接触融合，尤其是在13世纪和14世纪。与西域文明相比，中国在地理上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势力范围，吐蕃、蒙古、日本、朝鲜均唯中国文明马首是瞻，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各自的文明特色。但是，受到高原沙漠环境的严重限制，“任何比原始文明更高级的形态都不可能出现在吐蕃和蒙古”。吐蕃喇嘛“时刻不忘他们的佛教信仰起源于印度”，并没有汉化。

斯宾格勒、汤因比以及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强调文明间的互动而不是独立性，麦克尼尔虽然反对他们，但在《西方的崛起》一书中却给读者一个整体概念，即文明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支配，在特殊而精准的地形上确定自己的身份，并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中催生新的混合文明。历史是相互交织的，麦克尼尔形象地描述了这一进程：

> 文明好比山脉，隆起于亿万年前的地质时代，因受外部力量缓

慢的侵蚀而泥沙俱下，不可避免地蚕食周围的平地。与之相比，人类历史的时间跨度要短得多，文明在风云际会间不断兴衰交替，并在邻近民族的借鉴或创新中达到新的文化高度。

这种文化的侵蚀和借鉴，使20世纪前期的德国人感觉到其文化的纯洁性受到威胁。斯宾格勒所谓“与土壤间的深层纽带”，可以作为这种“高端文化”的绝佳诠释，即祭奠方式和教条的内在演化如何将他们“困在其出生的地方”，因为“任何把他们从土地割裂开来的意图，都会自然而然地举步维艰”。他断言，高端文化开始于农村，却在“唯物主义的终点站”即世界化大都市达到高潮。这段黑暗的浪漫，你可以同时用浮夸、迷人、深刻和坦率来形容它，有时甚至找不到最恰当的词语来诠释，但归根结底，世界主义的本质是无根性，因为它割断了与土地的联系。

至此，西方城市文明的兴起和最终命运的问题浮出水面，并逐渐变形，因为“世界文明”这一命题标志着从土地上逐渐分离。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将在后面展开。我仍然要继续与麦克尼尔为伍，他的论述比斯宾格勒更有说服力，因为他更多地注意到了气候和地理。

例如，麦克尼尔写道，雅利安人到了印度的恒河平原之后，其文化性格变得越来越不好战，因为此地受次大陆森林和季风周期的影响，冥想和宗教知识盛行，与他们的出发点地中海截然不同；而古希腊殖民地爱奥尼亚的“早熟”是因为地理上与小亚细亚和东方的接近及亲密接触。值得一提的是，麦克尼尔有意识地避开了决定论的陷阱：尽管希腊的山区地形有利于建立较小的政治单位，比如城邦，他仍然谨慎地注意到，也有“连成一片的肥沃土地，被分割成不同城邦”的例子。因此，地理只能是故事的一部分。更有甚者，虽然主要宗教（尤其是印度教和佛教）的传播呈现出地理连续性，但犹太教发展的历史却完全不合地理逻辑。

麦克尼尔不得不忍痛将这一特例也纳入研究，并得出结论：朱迪亚

[3]地区犹太社会的彻底毁灭，是公元一二世纪罗马镇压反叛造成的后果，这一变动并没有终结犹太教，反而使其得到了不可想象的发展和繁荣。犹太教民以侨民的身份，在西方城市里分散生存。这2 000年前的古老故事与地理决定论相抗衡，再次表明思想和人的能动性与实体地形一样重要。

欧洲也有自己的故事，同样围绕着地理展开。让我们回溯到人类历史曙光乍现的时代，正如麦克尼尔指出的，西欧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在此前提下，所谓的“黑暗时代”里，技术的发展得以发挥作用。宽广肥沃的平原，绵延不断的海岸线，形成许多天然良港，河流便于通航，一路向北穿过平原，使贸易范围不断延伸，直达地中海地区，那里蕴藏着丰富的木材和金属资源。

欧洲大陆气候多样化，不乏恶劣、寒冷、潮湿之地，与麦克尼尔同样不是宿命论者、在专业水平上势均力敌的汤因比这样写道：“安逸的环境不利于文明的发展……自然环境越是便利，越不利于刺激人类走向文明。”欧洲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虽然在地理上很难居住，却有许多有利于交通和商业的自然集散点。

文明，许多时候正是产生于对天然环境勇敢和坚忍的反应。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例，它对西欧海岸施加的巨大军事压力，导致了英国和法国成为国家实体；此外，英国比欧洲大陆的主要封建王国面积要小，“但具有更明确的边界（毕竟这是岛屿），因此它成为国家的时间远远早于作为封建领地存在的邻国”。

当然，像北极这样的地理环境实在太过恶劣，它们或导致文明的崩溃，或导致文明的被困。根据汤因比的说法，这里必然存在着文化角力之旅，也就是爱斯基摩人在冬天留守冰上捕猎海豹的情景。但是，完成了生存这一壮举后，他们便无力进一步掌控环境，达到创造全面文明的程度。

除了汤因比之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当代地理学家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也不遗余力地在著作中阐释中世纪的文化困境与衰落，包括格陵兰岛的维京人，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人，美国西南部的阿纳萨兹人，中美洲丛林玛雅人的中古文明，所有这些都与环境问题有联系。欧洲尽管处于北温带，与非洲、中东、欧亚草原和北美相当接近，但其自然环境的困难仍达到极致，其挑战足以迫使居民把文明提升到更高程度。

欧洲的人民能够充分利用贸易格局，千百年来在航海和其他领域的技术推陈出新，正是得益于此（在应对环境困难方面的案例还不止欧洲。例如，汤因比就注意到安第斯高原的居民如何应对严酷气候和贫瘠土壤的挑战，而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居民面临高温和干旱的挑战而修建灌溉工程。但是，欧洲和南美之间有一个差异汤因比并没有注意到，那就是欧洲有许多天然的深水港口，处于许多贸易和迁徙路线的交汇点上。——作者注）。

正是因为达伽马掌握了印度洋的季风规律，欧亚大陆外围边缘才得以成为欧洲主导的海上通道中心。但是，在麦克尼尔的叙述中，西方的崛起不仅是欧洲在具有挑战性的地理环境刺激下取得物质进步的结果，还得益于对他所谓“野蛮人”生存空间的包围。

地理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

麦克尼尔谈到的文明对蛮荒区域的侵蚀，即使不是完全不间断的，也是“不可动摇的”：“通过这种侵蚀，世界上各个单独文明体实现了广泛性和内部变化，彼此接触的频率增加，为壮观的全球一体化作了准备，而这个准备过程，在过去的三四百年里就已经开始了。”

文明对于地球上相对空白地带的探索和包围，主要分布在温带，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地理大发现航程为其提供了基本路线。这种大发现的进程还在继续，历经工业革命、交通革命和通信革命等不同

阶段，直到今天我们所处的全球化阶段。在此期间，草原民族最终一败涂地，俄罗斯、中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分割了相对空旷的欧亚平原和高原台地的中心。

而欧洲的殖民侵略牢牢控制了北美大陆西端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给当地土著民族带来了灭顶之灾。而现在，正如麦克尼尔所描述的那样，世界终于以日益城市化的“泛西方形式”统一了。

虽然《西方的崛起》的中心主题是地图上空白地带的封闭，但这显然只具有相对意义上的真实性。事实上，两条铁路线交汇并相互交叉，并不意味着中间一定是空白地带，或者其间人口必然稀少。边界在理论意义上可能会被封闭，但人口密度和媒体交流仍然在急剧增加，其增速足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造成政治剧变。如今，地球上已经没有需要超过几周的时间才能抵达的地方，麦克尼尔可能因此认为，这就是统一的世界。

但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又该如何变化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在18世纪和19世纪已经统一了，但在人口和技术方面与21世纪初没有可比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当今时代的变化核心，是空间被日渐填满，形成真正封闭合拢的地理局面，国家和军队拥有的隐蔽空间越来越少。20世纪早期的现代军队虽然实现了机械化，仍然需要跨越许多英里才能到达对方的阵地，而现在导弹的射程相互覆盖，胜负瞬间可分。但是，地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消失，恰恰相反，它只会变得更为关键。

让我们转向摩根索，从另一种角度再来看看这一观点。摩根索写道，在18世纪和19世纪，各国向比较空旷的地理空间扩张，如非洲、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西部，大国政治斗争由此悄然转至地球的边缘地带，从而减少了彼此冲突，并因此在某种意义实现了相对和平。

但到19世纪末，几个大型民族性国家和西方帝国为了实现巩固、获取利益（尤其是德国），只能从别国领土内争夺资源。摩根索总结道：

> 权力的平衡现在主要集中于三大洲，影响波及世界范围内。一方是大国强权及其力量中心圈，另一方是其外围和更远的空白地带，二者之间的对立必然消失。目前，权力平衡的边缘正好与地球的界限相重合。

摩根索是在紧张的冷战早期提出这一构想的，他念的是危险的咒语。而他的同事麦克尼尔，生逢更稳定的冷战后期，所念的却是希望的经文。他写道：

> 在中国古代的汉朝，为了促使混乱的交战诸侯偃旗息鼓，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虽经数次分崩离析，仍能在温和的修正后延用。20世纪的交战国家为了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似乎正转而探求类似的办法。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似乎已验证了麦克尼尔的乐观态度，但今天的世界仍与冷战期间一样危险。地图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加速走向合拢封闭。以中国为例，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近几代领导人仍成功地将其建成了现代化强国。现在，中国作为经济和军事大国冉冉上升，正在填补欧亚棋盘的空白，这一切远远超出了摩根索的想象。

如今，就连世界的偏远地区也在进一步城市化，斯宾格勒从人类抛弃土地和农业生活的过程中，看到文化的衰落，而麦克尼尔则直觉地感到，随着城市群落的蔓延和日益拥挤，宗教和身份认知的异化正以充满活力和令人不安的方式疯长。

例如，作为美国西南部生活压力的后遗症，基督教如今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在欧洲城市里还出现了一种组织松散的环境保护主义异教，正逐渐取代传统的民族主义，因为整体意义上的“欧洲联盟”属于精英阶层，对于大众只具有抽象意义。同时，战争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主要是“国王的专项运动”，现在已成为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分子的手头

工具，要么像纳粹德国那样大打出手，要么如基地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一样小打小闹。

还有可怕的核武器幽灵，现在被国家和次一级的激进主义精英玩于股掌之间。在所有这些尴尬动荡之中，经典的地理学再次抬起了头，描述和印证了西方、俄罗斯、伊朗、印度、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细加分辨所有这一切时，我们发现麦克尼尔关于文明之间交互作用的论文在今天更显真实，但若将正在兴起的世界文化趋势与政治稳定性等同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空间理论依然管用，而且在现今更管用，正是由于世界日趋拥挤，空间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珍贵。

霍奇森——伊斯兰的冒险

麦克尼尔的学术视野囊括全球，而马歇尔·霍奇森的造诣，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则稍显狭窄，仅仅对于大中东地区有所启发。作为一位充满激情的教友派信徒，霍奇森于46岁时英年早逝，其呕心之作《伊斯兰的冒险：世界文明的良心与历史》（*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三卷本出版于1974年，即他去世的6年之后。与其他杰出的中东学者相比，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在当代新闻工作者中并不太知名，远不及普林斯顿大学的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或乔治敦大学的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但他在这一巨著中已经有意识地将伊斯兰教放在当代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进行地理和文化考察，其功堪与麦克尼尔相提并论。

霍奇森的文风带有学究气和晦涩感，但如果读者坚持读下去则必有所得。他阐释了伊斯兰教的源起和发展过程，描述了它如何像神话一般迅速传播，不仅跨越阿拉伯半岛和北非，还传遍了整个印度洋沿岸以及欧亚大陆，从比利牛斯山直到天山脚下。

最值得注意的是，霍奇森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出《伊斯兰的冒险》大部分内容的，那时媒体的聚光灯通常对准的是欧洲的冷战。然而，他在第一卷就指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是错误的，这种偏见早在制定地图规范时就存在了：

> 荒谬得以伪装，视觉急剧扭曲，用墨卡托投影制作的世界地图日益广泛地得到应用，它夸大了北半球的管辖面积。结果，一个人为设界的“欧洲大陆”看起来比整个非洲面积还要大，其他欧亚大陆半岛，如印度次大陆，则显得又矮又扁。

霍奇森接着引导读者将关注重点向东、南两方转移，停留在他称为“一世界”（Oikoumene）的地方。这在古希腊语中意指“整个可居住的世界”，包括亚非广袤的温带区，自北非延展至中国西部内陆。这条地带又被他称为“从尼罗河到阿姆河一带”（Nile to Oxus）。此地定义范围有些含糊不清、互相矛盾。例如，从尼罗河到阿姆河一带，其西端在埃及，而“一世界”可能进一步向西，到达地中海的非洲沿岸。关键之处在于，霍奇森写作这本书时，严格区分冷战地域的“专业知识”正大出风头，欲将中东与小亚细亚和印度次大陆断然分开。但当霍奇森向我们展示其更加有机的地理学说，即用地形景观和文化划分地域时，一切人为界限都消失了：那里只是欧洲和中国文明之间的一大片炎热地区，是希罗多德的世界，通过它，霍奇森掌握了世界历史的钥匙。在全球化肆意侵蚀边界、地区和文化差异的时代，霍奇森那审慎、宏大而又游刃有余的地理架构的作用就格外明显，因为它表明地图对那些固化的、粗劣的线条有多抗拒。

霍奇森以这种可视的方式，帮助读者洞悉世界的变化，包括近古时期伊斯兰教的兴起，以及当今中国和印度如何提高其在大中东地区的经济地位。通过对地图的分析，那些我们已习以为常的分界线渐渐变得模糊了。

“凡伊斯兰文化形成之处，几乎必是消极地区，”他解释说，“在那些贫瘠的土地上，希腊文化和梵文化传统无法扎根，最终不得不黯然退回欧洲和印度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4]，‘我们的地区’包括了从地中海到兴都库什（阿富汗）之间的土地，只不过在这些地方，希腊文化和梵文化要么被本地化了，要么只是短暂地发展。”在呈长条状的大中东地带，大约有3 000英里或以上处于温度较低的区域，其间有两大地理特点促进了高度发达文化的形成：一个是贸易位置的重要性，特别是阿拉伯和肥沃新月地区正处于“一世界”到其他地区的贸易路线之中；另一个则是这一地区的极度干旱。

后一个特点需要解释。霍奇森告诉我们，普遍缺水的气候环境使农业生产很难有所收获，高产的大片土地极为少见，财富难以积累，与绿洲中的城市生活相比，农村的生活水平很低。金钱和权力掌握在处于中东长途贸易路线“关口”的商人手中，尤其是在那些靠近红海、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海上交通要道，有实力的阿拉伯商人可以畅通无阻，从事巨额的海上贸易。

在这样一个盛行贸易规则和合同的世界，道德行为和“公正处理”被视为至高无上，因此保证了稳定的经济生活秩序。随着北部的拜占庭和萨珊帝国在小亚细亚和波斯的势力被削弱，阿拉伯和肥沃新月地带出现了一种新的信仰，强调良好的职业操守，只是为了确保“农业季节有所收成”。因此，伊斯兰教最初是作为商人的信条出现的，正如沙漠里的生存法则一样。

阿拉伯西部和中部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中心是汉志省的麦加，此地靠近红海，是两大路线的交汇点。一条路线呈南北走向，以麦加为中转站，连接也门和印度洋港口，以通往叙利亚和地中海；另一条呈东西走向，连接附近的非洲之角（the Horn of Africa）与对面的红海海岸，通往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伊朗。麦加的地理位置远离伊朗的萨珊王朝

权力中心，天高皇帝远，因此一些温和优雅的宗教和哲学容易对其产生影响，如袄教、摩尼教、希腊教、犹太教等，有的来自波斯，有的来自伊拉克，也有从小亚细亚传来的。虽然麦加没有大片的绿洲，但水源足以养活骆驼；那里有丘陵挡住红海海盗，庄严的克尔白圣殿（Ka'bah）里供奉着该地区部族的神器圣物，来自各地的朝圣者长年络绎不绝。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出现了先知穆罕默德。他原本是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商人，在30多岁时就致力于探寻生活的公正和纯净，后经冥思而开悟。麦加不仅仅是沙漠中一处水源地，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都会中心。

当然，在霍奇森那图案繁复的地理巨毯上，并没有对伊斯兰教兴起的终极解释。宗教，就其定义而言，更多地依据着形而上学而非物理存在。但是，他的确说明了地理如何影响宗教的兴起、传播和成型，比如伊斯兰教，它是商人和贝都因人生活模式的映射，同时又是干旱的地理特征与贸易商道纵横交错的产物。

阿拉伯贝都因人被三大农业产区包围：北部有叙利亚，东北有伊拉克，南部有也门。这三个地区分别连接到高原地区的某个“政治中心”，并在公元六七世纪受其统治。叙利亚面向小亚细亚高地，伊拉克面向伊朗高地，也门与阿比西尼亚高原（今埃塞俄比亚）则存在相对较弱的从属关系。伊斯兰教征服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但地理特征却使得部分农业文明体保留了自己的族群特征，特别是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新月沃土弧形地带，从而成为伊斯兰势力的竞争中心。

霍奇森在其史诗性巨著中，对近古和中世纪时期进行历史扫描，尤其是前两卷中的内容，大量地涉及现代中东国家的真实成因。表面上看，这些国家的建立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其实人为因素所占比例比人们指责的要少得多。埃及、也门、叙利亚、伊拉克，此四国有目共睹；更不用提摩洛哥周围有海洋和阿特拉斯山环抱，突尼斯继承着古迦太基，古老文明的堡垒正是这些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源头，尽管其边界线

在平坦的沙漠中往往看似任意划定。

汤因比悲叹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声称“在‘西方化’目力所及范围内，任何伊斯兰世界国家都难逃其手”。伊斯兰教构成了世界上的一大文明体，这是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它被确立为一个政体。正如霍奇森所说，文明有许多不同的人口节点，丰富多彩的前伊斯兰时代已过去，现在轮到后殖民时代粉墨登场了。伊朗高地就其本质而言，一直与美索不达米亚有政治和文化联系，历史上不乏明显的证据；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为伊朗重新进入该地区打开大门。事实上，波斯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那不断转移的边界，正是幼发拉底河本身，只不过现在它正处于伊拉克的心脏地区。

公元644年，就在穆罕默德从麦加逃亡或称飞越至麦地那的22年之后，阿拉伯人征服了统治伊朗高原心脏地区的萨珊王朝，该事件标志着世界历史上伊斯兰时代的开始。相对而言，小亚细亚高原较为偏远和不规则，并因为这种地理条件得以偏安一方，直到400多年后的公元1071年，因土耳其塞尔柱王朝而非阿拉伯人在曼兹科特战役中打败了拜占庭帝国，占领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此地才最终伊斯兰化。

塞尔柱人是来自欧亚大陆腹地的草原民族，从东方入侵小亚细亚（曼兹科特在小亚细亚东部）。但是，正如阿拉伯人从来没能成功地攻取小亚细亚的山中堡垒，塞尔柱人虽深居要塞之中，却并未成功地维持对伊斯兰王国心脏地带的稳定统治，包括新月沃土和伊朗高原，更不用说汉志省和南部阿拉伯沙漠的其余部分。这又是地理在作祟。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塞尔柱王朝的继承者，虽然征服了阿拉伯沙漠，但其统治向来较为薄弱。在战事方面，他们节节胜利，最远到达印度次大陆最东端的孟加拉，但这对于东西走向的整个欧亚大陆温带区而言，只是人口南下的一个分支。这些土耳其游牧民族是臭名昭著的蒙古大军的一部分，至于蒙古人自己，不过是这支大军中为数较少的精英阶层而已。

蒙古汗国部落及其地缘政治意义，我们晚些再来解决，先来看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霍奇森的看法。他认为，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蒙古人和土耳其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比骆驼背上的游牧民族阿拉伯人更高。由于马不能忍受干旱的中东沙漠，而且随行的羊群需要相对密集的牧草，蒙古人领导的军队不得不避开远处的阿拉伯半岛，转而蹂躏更近、环境更宜人的东欧、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伊朗、中亚、印度、中国。在冷兵器时代，连成一片的领土在欧亚大陆的版图上具有压倒一切的战略重要性。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联合入侵，可以说是公历纪元以来的第二个千年里，世界历史上是最重大的事件，主要原因竟然是使用了某些与地理紧密相关的动物！

霍奇森对于蒙古人的探讨，显示了《伊斯兰的冒险》这部鸿篇巨制的内容已远远超过了专业领域知识，把霍奇森称为阿拉伯学者或伊斯兰专家，既不准确，也是一种低估。伊斯兰教在他手上是一种工具，用以揭示最关键的知识、文化和地理趋势，它们不仅影响非洲-欧亚社会，也影响到以古代的“一世界”为中心的整个世界。这在本质上并非地理性工作。仅为了阐明苏菲神秘主义[5]，霍奇森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同他花在描绘地形上的一样多，更不用说他所探讨的其他学问和宗派传统了。他以自己的方式把地理引入讨论，演示了地理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如何相互作用，并由此创造出肌理分明的历史。

以奥斯曼土耳其人为例，在13世纪末期，他们最终取代了其同胞塞尔柱人，成为小亚细亚的新主人。奥斯曼实行“单一军事种姓制度”，每控制一块地方，就对该地区实行“本地化限制”，这种方法与俄国和早期的蒙古人都形成鲜明对比。“奥斯曼习惯于保有一支由国王或皇帝直接统领的宏大军队，同时，他们必须从地中海东北部、黑海之滨的首都城市君士坦丁堡发出命令，那里是苏丹国庞大官僚结构的总部。这样做的结果是，任何一次重大战役，都只能在单个季节行军所能达到的范围内进行。”西北的维也纳和东南的摩苏尔，因此成为稳定的奥斯曼帝国土地扩张的地理极限。在某些年份，军队可以在索非亚或阿勒颇过冬以扩

大其范围，只是经常会陷入巨大的后勤补给困境。

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等于将个人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同时集中于君士坦丁堡，其结果就是将首都的地理条件变成了唯一的决定因素。这在当时虽然是一种风尚，实际上却大大降低人的能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地理反而变成了导致这个军事帝国衰竭的第一要素，因为一旦达到奥斯曼军队的地域极限，军中的士气以及所获奖赏都会下降。反之，权力不那么集中的状态，却有可能使帝国更安全，而非任由地理摆布；在海军领域，绝对主义理论也同样夸大了地理位置的决定作用，奥斯曼帝国海军大多聚集在离家不远的黑海和地中海海域，只有对葡萄牙的印度洋战役取得了“短暂的”成功。

霍奇森，像他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同事麦克尼尔一样，与其说是一位现代学者，不如说是一位旧世界的鸿学大儒，具有严谨不懈的态度和科学的调查思路，更有着教友派独特的深邃气质。即使在探索到细节极致时，他仍能看到宏大的场景。他的主要舞台是古希腊的“一世界”，无独有偶，这也正是麦克尼尔探究世界历史的主要材料，正如我们之前说到的，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正是希罗多德著于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的背景。

如果我说，这个地区在当今也频频占据新闻头条，可能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这就是地中海东部和伊朗-阿富汗高原之间的地区。因为“一世界”地带正是欧亚板块和非洲大陆衔接处，此处通路众多，都要经由红海和波斯湾进入印度洋，这使其成为超级战略要地和迁移动荡中心，许多相互冲突的民族和教派团体相继出现。希罗多德的《历史》正是抓住了此处动荡不定的脉搏。

希罗多德的猜想

希罗多德是我行文论道的中心，他在21世纪的重要性不亚于麦克尼

尔和霍奇森。这位希腊人于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484年期间出生于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此地位于小亚细亚西南部，当时已臣服于波斯帝国。他认为，希腊人和波斯人决定了战争的起源和进程，在地理与人的能动性之间取得了完美平衡。他提出的部分宿命论，正是我们都需要的。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以地图为背景的世界，比如希腊和波斯及其各自在近东和北非野蛮地带的势力范围，并告诉我们，个人激情的迸发能够造成具有破坏性的政治效果。希罗多德是“敏锐性”的代言人，这正是我们现在亟需恢复的能力，有了它，我们就不会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感到大惊小怪。

希罗多德曾引用古希腊诗人品达（Pindar，约公元前522－公元前442）之语：“习惯是所有人的国王。”希罗多德说：

> 埃及人在爱猫死了的时候，会把自己的眉毛剃光以示悼念；利比亚部落会把一边头发留得很长，另一边剪掉，同时给猫的尸体涂上朱砂；
>
> 住在里海东部（现属土库曼斯坦）的马萨格泰人，却会在一个人年老体衰时，“召集亲戚一起过来把他杀了，把他的肉和羊肉一起炖，举行一场宴会”。

这说明，一个地方的地理风土具有唯一性，当地人的历史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举止和想法是各不相同的。

作为文明和地域记忆的保护者，希罗多德保护着神话、寓言，甚至它们赖以存活的谎言。他知道，政治领袖在面对外部事务时，掌握越多诀窍妙招，就越不可能犯悲剧性的错误。有一个例子：

> 波斯王大流士要攻打居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斯基泰人，他的军师阿塔巴努斯竭力劝阻，称斯基泰是一个移动迅速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居住地长年严寒，没有城市或可播种的土地，因此装备精良

的大部队找不到攻击焦点。但大流士执意出兵，最终因粮草不足而战败。

希罗多德的象征力量，在于他对人类可信之事的强有力的召唤。古人没有办法掌握大量的科学技术，所见所闻因人而异，但信念的力量加上事实的佐证，使他们的见解比我们的更生动。地形景观和地理形态对他们而言是实实在在的，而我们却无法想象。

再来看看希腊士兵斐迪庇第斯的故事，他因善于长跑而被委任为信使，从雅典跑到斯巴达，请求联合对抗波斯人。斐迪庇第斯告诉雅典人，在途经帕尔铁尼昂山时，他见到了半羊半人的潘神，对方要求他问问自己的同胞："为什么你们不供奉潘神？潘神是雅典人的好朋友，一直为你们提供服务，这次还会如此。"雅典人确信斐迪庇第斯说的是实话，于是在他们的城市安定后，就在雅典卫城下建立了潘神庙。

这不仅仅是一个迷人的故事。在雅典人把此事叙述给希罗多德听时，它可能真的发生过。信使认为他看到了潘神，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他的知觉中只能出现其信仰体系中固有的神祇。古代世界"分散落户，人烟稀少，自然尚未被人工开发"，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中写道，"自然一拳打在你的眼睛上，粗暴地拉扯着你，死死地抓住你的颈背，此时确实到处是神"。

如果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已经把我们远远带离斐迪庇第斯所看到的未来，至少我们还可以尝试去理解宗教运动对启蒙运动的逆转，以及它如何影响到当今地缘政治的方向，并随之进行自我防护。地球空间拥挤不堪，自然界今非昔比，贫民窟和棚户区的拆迁改造形成四不像的地形景观，并以不同的方式对人类的心理产生同样激烈的影响。要理解这种新地理对于空间的附加价值，以及对人的心理产生的影响，我们首先需要去欣赏希罗多德描述的仿古地形景观。

希罗多德《历史》的聚焦点就是希腊。那里文化气息浓厚的群岛和陆地极具诱惑力，一路绵延向西，并超越了波斯和小亚细亚的高原山区。地理决定论在这里处于统治地位，东边的亚洲人和西边的希腊人几千年来互相争夺，直至今天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顶点。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紧张并没有引发公开的大战，主要是因为在那10年中人口发生了大规模迁移，两个单一民族国家得以创建。换言之，和平只有在以地理为仲裁的种族清洗发生后才能占主导地位，然而，这终归不是希罗多德思想的主线。

希罗多德认为，人类心胸的包容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都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他也举例说明了在一个激情扭曲的旋涡里，人是如何为自身利益而算计谋划的。阿托萨嫁给波斯国王大流士后，在床笫之间尽显万种风情，以此诱使她丈夫下决心远征希腊。她的这种举动，其实是对治好她乳房增生的一位希腊医生的报答，因为对方提出想随波斯大军重新回到自己的祖国。这原本都是关于地理的，后来却变成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主题。

希罗多德《历史》的最深层意义，是理解命运的复杂性。希腊的命运女神掌握着万物的命运，而英雄是要战胜命运的，这形成了希罗多德叙事诗的上层建筑。霍奇森在《伊斯兰的冒险》中对《历史》评述之精准，无人能出其右：

> 希罗多德写他的历史，目的是使希腊人和波斯人的伟大业绩得以留存。那是空前绝后的事业，永远值得我们尊重。它们不能被复制，尽管后世可能会效仿，并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它们，但即便是现在我也敢打赌，没有任何伟人的事迹能与他们相提并论。

霍奇森在他的三卷本史诗巨著里，也清楚地说明人最终会控制自己的命运，但他同时又不厌其烦地描述历史和环境发展的宏大趋势在个人的控制之外。霍奇森说，不承认个人奋斗，就等于没有秉承历史研究中

的人道主义原则。他据此编织了一幅巨大的伊斯兰教壁毯，认为伊斯兰教作为具有全球性特质的“与道德和人性有关的复杂传统”，其源头却是从麦加开始的个体行动。

因此还是回到与命运的抗争这一论题上吧，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干得还不错。现在，我们亟需那些希罗多德主义者们，如霍奇森、麦克尼尔等人协助强化其论点，因为我们即将进入极其艰巨的研究领域，地缘政治和准决定主义的理论都是从那里发散开来的。历史的大致轮廓，实际上早已被预测，并仍可能被再次预测。

至少可以说，在个人以何种方式改变历史这一点上虽远无定论，但一切皆为事实。我将要介绍的这些人物，可能会让自由人文主义者深感不安。与其说这些人是哲学家，不如说他们是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战略家，他们断言，地图几乎能决定一切，从而减小了人为的回旋空间。人为因素，就其发挥作用的程度而言，主要是关系到军事和商业上的主导优势，然而正是即将上场的这些人为我们建立起一个框架，让人类反抗这“天定命运”，并且明确在此框架中我们可以实现什么目标。

---

(1) 希腊语ΗΡΟΔΟΤΟΣ，公元前5世纪（约前484—前425）的古希腊作家，他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纪录下来，著成《历史》一书，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译者注

(2) Fertile Crescent，中东一个地区。此术语代表了一块肥沃的新月形地带，这里曾是早期知名民族斗争、迁徙的发生地，这些民族包括苏美尔人、亚述人、阿卡德人、一些闪米特部族、巴比伦尼亚人和腓尼基人。——译者注

(3) Judea，古代巴勒斯坦南部地区，包括今以色列南部及约旦西南部。耶稣在世时，它是由希律王室所统治的王国，也是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译者注

(4)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著名命题。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就是北纬25°至35°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译者注

(5) Sufi mysticism，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是对伊斯兰教信仰赋予隐秘奥义、奉

行苦行禁欲功修方式的诸多兄弟会组织的统称。亦称苏菲主义。——译者注

第4章
历史的地理枢纽
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剧本

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可能决定其外交政策。

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对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进行了怎样的描述？为何说海洋是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扎根的自然条件？俄罗斯最终选择陆地环绕的莫斯科作为首都，是否标志着地理因素的再次胜出？麦金德真的准确预见了北约与苏联的对抗以及苏联的解体？陆权的代表苏联在与海上力量最为强大的美国进行终极对决中，为何败下阵来？

世界岛的中心地带将怎样决定全球的命运？麦金德认为一个心脏地带的强权拥有了希腊就能控制整个世界岛。但他为何又指出人类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倚仗“印度和中国的季风地带”？

在如今这全球动荡的时代，“政治版图永恒不变”的假定一如既往地接受着检验，这也导致了地理思维的复兴。这主要是因为，地理正是战略和地缘政治的基础。拿破仑曾将“战略”定义为“以军事和外交的方式使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而地缘政治则是对每个国家确定其战略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在这个环境中的其他国家，也同样在为生存和竞争优势而斗争。

简而言之，地缘政治就是地理对人类分布产生的影响。正如拿破仑所说，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也就了解了它的外交政策。

摩根索称地缘政治是“伪科学”，因为它把“地理因素标榜为一个绝对值”。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写下这句话的，彼时他心中一定想到了伟大的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麦金德发表于20世纪之初的思想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新得到重视，并被纳粹滥用，以证明德国“生存空间”的合理性。可以肯定的是，地缘政治的目的是实现权力平衡，如麦金德所言，权力平衡赋予每个国家以安全保障，从而形成了自由的基础；而纳粹的目的则正与之相反，是对麦金德本人思想的变态扭曲。摩根索对于麦金德的指责，未免太过苛刻了些。

在任何情况下，摩根索都不掩饰对麦金德的反感，但他对其理论的审慎总结，本身就表明麦金德几十年来对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尽管麦金德不断受到谴责，他的理论仍然普遍适用，尤其是在美国地面军队大规模驻扎于大中东和东北亚地区的当今时代。显然，他的著作中包含着一些悬而未决的潜在真理，虽然有时也会出现离题千里的风险。麦金德显然是个天才，他一生的座右铭是“地理是普遍论者对于具体学术问题的答案”。1890年，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地理知识是如何丰富人类对于世界事务的看法的：

> 假如有人告诉我，一种小麦样品来自拉合尔，而我并不知道拉

> 合尔在哪里。我在地图上查找，发现这是旁遮普省的首府。如果我对地理一无所知，肯定只会立即想到拉合尔是在印度，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但如果我受过一定的地理知识培训，旁遮普一词就……有可能向我传递很多东西。
>
> 我将想到，拉合尔在印度北部一隅，地处雪山脚下的大平原上，印度河谷之中；我会想到季风和沙漠，山泉顺流而下，灌溉沟渠纵横交错；我会知道其气候变化特点，以及应该何时播种，何时收获。卡拉奇和苏伊士运河，将在我的精神地图上熠熠发光；我还能够计算出，在一年中的什么时候，货物将运抵英国。此外，旁遮普邦在面积和人口规模上与一个欧洲大国不相上下，相当于西班牙或意大利，它向英国提供的出口商品使我们普遍受益，对此我深怀感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麦金德的理论及其思维方式，是如此引人入胜。

亚洲的“附属”——欧洲文明

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这位让摩根索嗤之以鼻的现代地缘政治之父，其名声大噪的原因不是某一本书，而是一篇名为《历史的地理枢纽》（*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的文章，1904年4月发表在伦敦的《地理杂志》（*The Geographical Journal*）上。文中的论点是，中亚不仅协助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形成，更是世界帝国安身立命的枢纽。因为地球的自然脉络布局，在山脉和河谷之间表现最为明显，这有利于帝国而非普通国家的崛起，对于这一点，大多数人已是心照不宣。在探索这个概念对我们自己的地缘政治理论有何借鉴意义之前，需要先介绍一下麦金德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他的文章，考察了整个历史和人类居住区域的模式，是地理学科的原型，文中借鉴了希罗多德和伊本·

哈勒敦的成果，从文体上奠定了麦克尼尔和霍奇森的风格，并影响了法国历史和地理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作为对布罗代尔的回应，麦金德写道，“是人，而不是自然，在创造历史，但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对其施加了控制”。

麦金德的开篇首句，让他的整篇文章具有史诗般的气魄：

> 在遥远的未来，历史学家回首审视我们现在正经历的几个世纪，他们看到的只会是缩略的历史记录，正如我们今天看埃及王朝一样。他们很可能把过去400多年的历史统称为哥伦布时代，也许会说，这个时代在1 900年后就结束了。

麦金德解释说，在中世纪，基督教区“被压缩到一个狭窄的区域，面临外部蛮族的威胁”；到了哥伦布时代（大航海时代），欧洲人漂洋过海，把领土扩张到其他大陆，仅遇到“可以忽略不计的阻力”；但是从今往后的后哥伦布时代（他从1904年写起），“我们将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封闭的政治制度”，这次是“在广泛的世界范围内”。麦金德对此给予了详细解释：

> 每次社会力量的大爆发，其辐射范围将绝不仅限于周边的“野蛮人”领域，而是直至地球遥远的另一边都能感受到强烈的震感，并随之循环往复。这将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有机体里造成严重后果，一些薄弱环节将被震得粉碎。

他感到，欧洲帝国在地球上已没有更多的扩张空间，因此他预言，欧洲战争必然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麦金德的许多预言都变成了现实。几年前，在堪萨斯的莱文沃思，我参加了美国陆军指挥和总参谋部学院研讨班，学到了一句谚语：同类相耗之力，巨大变革之本（Attrition of the same adds up to big change）。如果说大航海时代或大发现时代大致截止于1900年前后，那么整个20世纪直到今

天，以及未来几十年，这个本就已相当拥挤的世界地图，将进一步被塞得满满当当。正如我已指出过的，不管是人口还是武器射程方面，都将处于饱和状态。

例如，中东在过去短短的50年里，已经从农村社会转变成巨（特）大城市群集中的地区。世界的其他地方，根据我过去30年来作为驻外记者的了解，即使在一些偏远地区，也普遍实现了城市化。我们将在以后深入研究这个拥挤的新地图及其影响，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回到麦金德及其欧亚大陆枢纽理论。

麦金德要求我们把欧洲的历史看做亚洲的“附属”。他认为，欧洲文明仅仅是与亚洲侵略作斗争的结果。麦金德比麦克尼尔早几十年即指出，欧洲之所以成为文明体，主要是因为地理因素：高山、峡谷、复杂的半岛群，单一国家在那里形成，以对付东部威胁性很强的俄罗斯广袤平原。

俄罗斯平原分为北部森林和南部草原两部分，麦金德解释说，波兰和俄罗斯最早的雏形，完全是在北部森林的保护下建立起来的；而在无边无际的南部草原上，从公元5世纪到16世纪，匈奴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卡尔梅克人（Kalmuks，属厄拉特蒙古之土尔扈特部及杜尔伯特部）、佩切涅格人、蒙古人……各种各样的游牧侵略民族一代接一代地在此出没。此地一望无际，气候严峻，除了草以外种不出任何作物，即使是草也反复地被强风席卷，砂砾破坏。这样的条件，有利于塑造出强硬凶悍的种族，要么摧毁他们遇到的任何对手，要么自生自灭。

为了对抗亚洲蛮族的入侵，法兰克、哥特、罗马外省组成联盟，后来形成了现代法国的基础。同样，威尼斯、罗马教廷、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其他新兴的欧洲列强，正是在与亚洲草原游牧民族周旋的过程中兴起，或至少逐渐成熟起来。麦金德写道：

> 让我们回想一下。黑暗时代持续了几个世纪，北欧异教徒驾着

帆船在北海沿海当海盗，撒拉逊和摩尔异教徒在地中海上当海盗，亚洲马背民族土耳其人则趁海权为敌对力量掌握，直接进入基督教半岛的心脏。在此期间，难免有一些思想上的碰撞，就像是研钵与杵之间反复研磨，进而推进了现代欧洲的形成。这其中的杵，就是来自中心地带的大陆强权。

与此同时，俄罗斯靠森林空地的保护抵御了许多暴君，但在13世纪却败于蒙古金帐汗国之手。它因此被拒于欧洲文艺复兴大门之外，永远囿于自卑之中。此外，这个以大陆为根基的帝国，除了森林以外再无天然屏障来抵抗侵略，深受被残酷征服之苦的俄罗斯，因此常年不懈地痴迷于扩张和控制领土，或至少支配其相邻的阴影区。

蒙古人从中亚发起的进攻，不仅使俄罗斯发生了分化和改变，还包括土耳其、伊朗、印度、中国和阿拉伯中东北部。欧洲许多地区没有遭受过这样大的破坏，因此能够成为世界的政治驾驶舱。事实上，撒哈拉沙漠发挥了封锁隔离的作用，让欧洲几乎不能进入非洲的任何地区。按照麦金德的说法，中世纪欧洲的命运直到哥伦布时代都紧随着亚洲草原上发生的大事件而跌宕起伏。蒙古人和塞尔柱土耳其人在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从草原腹地冲出重围，扫荡了中东大部分地区；他们在耶路撒冷虐待基督教朝圣者，至少从表面上引发了十字军东征。麦金德认为，这是欧洲集体近代史的开始。

以此作为脉络，麦金德为读者勾画了欧亚大陆的轮廓，其北部为冰雪覆盖，南部为热带海洋，有四个边缘地区处于广阔的中亚疆域阴影之下，长年受到蒙古-土耳其游牧部落的侵扰。这四个边缘地区刚好对应了四大宗教，在麦金德看来并非巧合，根据他的定义，信仰正是地理的功能之一。

四个边缘之一的“季风大陆带”东部面向太平洋，是佛教的发源地；南部面临印度洋，是印度教的产生地；第三个边缘地区是欧洲本身，受

大西洋的福荫，是基督教的枢纽；最脆弱的是中东，即伊斯兰教之家，它因接近非洲而“被剥夺了水分”，“除了绿洲之外……人烟稀薄”（1904年的情况）。这里没有森林，以沙漠为主，大敞的门户任由游牧民族和随之而来的动乱和革命侵扰。此外，中东因为邻近海湾、内海和大洋，在海上力量面前特别脆弱（虽然它也因此受益）。按照麦金德的地理观点，大中东是最不稳定的过渡地带，在地中海世界、中国和印度文明之间作为中转站，见证所有强权政治的巨大变化。

麦金德敏锐的观点，与霍奇森完全一致。后者把“大中东”描绘成古代的“一世界”，并认为这里孕育出伟大的忏悔派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至今仍继续在地缘政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麦金德的作品写于大石油时代以及管道和弹道导弹时代之前，对他来说，中东尚不能算是全球的地理枢纽。因此，他大笔一挥把中东划到一边，之后继续他的论文。

他写道，哥伦布时代的主要标志，是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到印度的海上航线，从而避开了中东地区。而在中世纪，欧洲“犹如困兽，南面是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部面临着未知的海洋……北部和东北部要么是冰冷的世界，要么是森林覆盖的莽原”，东部和东南部则是“马背民族和骆驼骑手”。现在突然有渠道通过印度洋进入南亚整个边缘地带，这使得发现新大陆都算不得什么了。

但是，在西欧国家“用舰队覆盖了整个海洋”的同时，俄罗斯的作为也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在大陆上扩张地盘，“从北部森林荒原出发”，带着哥萨克骑兵横扫了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正如葡萄牙、荷兰和英国舰队胜利地绕过好望角一样，俄罗斯席卷了西伯利亚，把农牧民发配去西南部草原屯垦种地，同时包抄了伊朗的伊斯兰世界。

汤因比和其他人也在著作中触及到了这一点，但要晚几十年，麦金德是最早的。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欧洲与俄罗斯，一个是雅典和威尼斯般的自由海上力量，一个正好相反，正如斯巴达和普鲁士。因为大海

除了为大都市带来遥远港口的财富之外，更为其提供了某种不可侵犯的边境安全秩序，这是自由主义和民主扎根的必要条件（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大岛国，两边由两大洋相夹，北面是人口稀少的加拿大北极地区，只有南部面临墨西哥人口力量的威胁。——作者注）。

麦金德注意到，在19世纪，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扩大了海上力量的通行范畴，可以任意巡游欧亚大陆的南部边缘地带，而铁路的发展则开始充当“远洋商务的供给线”。但他同时指出，铁路也在为大陆霸权做同样的事，特别是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作用更为明显。以前这里发展迟缓，主要是因为缺乏修筑道路所需的石料和木材。

最后，他得出如下结论：

> 当我们迅速回顾更广泛的历史潮流时，地理关系的持久性，岂非显而易见？广大的欧亚大陆地区虽不通船舶，但在古代却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畅通无阻之地，今日更有铁路网络即将覆盖全境。这里不正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带吗？

在麦金德看来，20世纪初，领土扩张的俄罗斯将取代蒙古汗国成为欧亚大陆的中心，正如一些人所说，这将是第二个千年中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蒙古人曾逐一猛攻并打破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许多国家的大门（芬兰、波兰、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印度和中国），现在俄罗斯得益于其广大领土的连续性和铁路的迅猛发展，在作为上将比蒙古更进一步。麦金德写道：“就统计学而言，地理面积比人口更容易测算，而且几乎是一个常量。”沙皇和1904年即将到任的摄政者本身不值一提，相对于更深层次的地理构造和技术力量，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然而，时事并非总给麦金德的理论助阵。在他著名的演讲发表后不到两个星期，爆发了日俄战争，在第一次战役中，日本海军即袭击了中国东北的旅顺港。战争一年后结束，日本在对马海战中战胜了俄罗斯。

换句话说，麦金德强调大陆权力的重要性，但在20世纪初的冲突中，正是海上力量，击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大陆权力。

尽管如此，麦金德的表面决定论还是为我们迎接20世纪下半叶苏联的崛起提供了准备，并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有所预见。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指出的，两次世界大战旨在争夺麦金德的“边缘地带”，即从东欧到喜马拉雅山，以及更远之处。

从俄国革命直至苏联解体，中亚和西伯利亚的铁路延长了45 000英里，麦金德的观点得以证实；此外，冷战牵制战略的成功与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跨越整个大中东和印度洋的边缘地带基地力量。事实上，美国军事力量对于阿富汗和伊拉克边缘地带的投射，以及美国与俄罗斯围绕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政治命运展开的紧张较量，本身就形成了地理枢纽。麦金德的论文因此获得更高的正统地位。

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决定人类的未来？

有人指责麦金德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决定论者，是一位帝国主义分子。这两种指控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公平。麦金德终其一生都从事教育事业，本质上既不是极端派，也没有那么意识形态化。之所以说他是帝国主义者，仅仅因为当时大英帝国范围遍及全世界，他作为一位开明的爱国人士，认为人类发展的前景，特别是民主化的趋势，将更可能受到英国模式的影响，而不是采用俄罗斯或德国模式，就这一点而言，他受到时代偏见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说他是一个地理决定论者，只是因为地理作为他的事业主题，其本身具有确定性特点。

在布尔战争[(1)]之后，英国陷入心力交瘁的困境，麦金德却仍痴迷于保卫大英帝国。与此同时，他写出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对政治重建的研究》（*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主题即是人的因素可以克服地理的支配。然而传记作

家怀特·H．帕克（W. H. Parker）却对他的观点作了这样的注解：“从长远来看……那些顺应环境的人，一定会战胜那些与自然环境对着干的人。”

这正是雷蒙·阿隆“或然决定论”（Probabilistic Determinism）的本质，我们大多数人也会赞成这种说法。事实上，阿隆一直为麦金德辩护，打心底认为他是一位社会科学家，而不是自然科学家，因为在阿隆看来，麦金德认为可以通过技术革新征服地理环境。为了弄清所有疑问，我们有必要看看麦金德到底要说明什么。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开头，他写道：

> 上个世纪，在达尔文理论的魔咒下，人们认为某些形式的组织之所以存活，是因为他们最好地适应了自身所处的环境。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我们现在认识到，人类的胜利，在于超越了这些宿命论。

麦金德反对一切形式的自满自大。这里是《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开篇的另一个生动例子：

> （1919年）那个时刻诱使人们相信，和平即将到来，且永远不会被打破，只是因为人们厌倦了战争，并下定决心永远不再开战。但国际局势的紧张化起初缓慢，后来却一发不可收拾。
>
> 滑铁卢战后，一代人享受到了和平；1814年在维也纳国会宫谈判桌上，哪位外交官会预见到普鲁士将成为世界的威胁呢？是否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降低未来历史长河的河床坡度，使洪水的祸端不再出现？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没有比这更大的任务。我们不想让后人小看了我们的智慧，正如我们看那些所谓的维也纳外交家们一样。

不，麦金德不是纯粹的决定论者。他认为，地理和环境是可以克服的，但我们必须具备最广泛深入的专业知识，同时对其抱有最大的尊重。

诚然，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The Prince*）之所以被奉为经典，部分原因在于它对某些人具有指导作用。他们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并认为人必须要殚精竭虑，以战胜更强大的力量。麦金德的理论也是如此。他的学术视野开阔而弘大，气势逼人；他的观点和文章充满力量，给人当头棒喝之感，似乎现实已经预先设定，不可改变，实际上这却正是麦金德留给读者的挑战，让人们奋起超越现实。他是最好的犹豫型决定论者，知道需要多大努力，才能避免悲剧。

决定论是一种静态思维方式，意味着臣服于席卷一切的趋势之力，从此历史潮起潮落与己无关。但麦金德恰恰相反。就像某些人的“收藏癖”一样，他不停地检视修改其1904年的那篇著名的“枢纽”论文，不断增加它的深度和见地，并将最新发生的事件补充进去，探讨它们如何影响事态发展。

“地理枢纽”论真正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预见了全球体系的出现，而在当时的爱德华时代，人们心里还只有欧洲大陆体系的概念。大陆体系源于100多年前的后拿破仑时代召开的维也纳和会，时过境迁，那时已处于衰败晚期。

然而，除了麦金德等少数人凭直觉认识到这一点以外，没有人发现它已时日无多。《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发表10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人类带来了空前巨大的灾难。德意志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在东部战线上殊死搏斗，而在西线，德国大陆力量对抗着英国和法国的海上力量。战争从侧面印证了麦金德有关“心脏地带”的观点，同时又不断地调整和增加其思想的深刻复杂性。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是《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扩展成书后的增订版，出版于凡尔赛和会的同一年。麦金德在书中警告那些所谓的和平

缔造者，尽管战争已使数百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海权和陆权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日耳曼民族与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决斗，还有待展开”。《历史的地理枢纽》展示的只是理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不仅对理论进行了修改扩充，更是具有远见的警言。

在这本书中，麦金德集中体现了他的论证功底。他博学多思，论点鲜明，在当代和古代场景间自由切换，从海陆两方面的视角出发，呈现给世人崭新的学术景观。

他以海员的眼光告诉我们，尼罗河流域东西两边受沙漠的保护，并因北部三角洲广阔的沼泽地而免受地中海海盗的袭扰，这一切都保证了埃及王国非凡的稳定；克里特岛位于埃及北部，东部与地中海毗邻，是面积最大、物产最富饶的希腊岛屿，因此号称西方世界“海上力量的第一基地”，因为“海上力量必须由肥沃的土地提供滋养补给”。从克里特岛出发，船员可以落户于爱琴海的“海上仓库”，这也形成了希腊文明的基础。

希腊海上力量一直蓬勃发展，直到受到波斯陆权的挑战，但是波斯人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作为“希腊半岛本身的根基”的马其顿，最终却征服了整个爱琴海。马其顿比希腊离海更远，只能算是“半个希腊地区”，这里的“山地民族”更服从自己的统治者，同时又是优秀的战士，他们拥有同海边居民一样的“大世界”意识。这种马其顿式的征服使爱琴海成为“封闭的海”，也使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身为马其顿人的亚历山大大帝，自此野心大涨，尝试对近东陆地进行征服。

接着，麦金德解释了罗马及其后续帝国的地理起源。当然，他也承认，地理不一定总能解释历史。例如，地中海南部撒哈拉地区的撒拉逊人征服了地中海北部的西班牙人，而地中海北部的罗马人却征服了地中海南部的迦太基人。两种情况下，都是人的意志通过特殊的海上力量形式起了关键性作用。

然而，麦金德也指出，不管个人成就多么巨大，地理的力量往往

会作用于人类文化，并最终赢得胜利。以圣彼得堡的例子为证，彼得大帝把俄国的首都建在这个“地理敌人的牙齿”上，其发达的文化背景和具有高度能动性的个人，保证了在此生存从技术层面上是可能的；彼得大帝也因此在短期内连连取胜，俄罗斯帝国用这种“怪异的方式”统治了两百年。但俄罗斯最终还是选中了陆地环绕的莫斯科作为首都，标志着地理的再次胜出，以及人的意志的局限性。

麦金德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研究，出发点在于他对“枢纽”的敏锐觉察力。人类自有历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封闭系统”，在此系统中“所有陆地的政治所有权”都已经被“瓜分完毕”。

根据麦金德的描述，在新的全球地理系统中陆地形成了“巨大的海角”或称“世界性海角”，从不列颠群岛和伊比利亚南部探出，一路延伸至西非隆起地带和好望角，然后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次大陆和东亚。由此，欧亚大陆和非洲共同组成了一个“世界岛”。几十年的斗转星移，将会使它越来越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 在地球的表面，9/12的地区覆盖着海洋；大陆只有一个，即“世界岛”，占地球表面的2/12；此外，还有许多较小的岛屿，比如北美和南美，总括起来可以占到1/12。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概括说，世界总人口的75%都生活在欧亚大陆，此外还包括全世界财富的大部分，全球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及3/4的能源资源。麦金德的论文隐含的假设是，欧亚大陆将主导地缘政治大棋局，当然欧洲作为独立实体的成份将越来越少，难以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和非洲的联合体中割裂开来。“旧世界已变得非常孤立，也就是说只是一个孤零零的个体，无法与我们地球上最大的地理单元相提并论。”从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起，除了葡属莫桑比克、德属东非和荷兰属东印度群岛三处以外，英国海上力量始终占据着“世界性海角”。当英军拿印度西北边境作为赌注，对付沙皇俄国的进犯时，麦金德甚至将英国

对印度洋的统治与古罗马军团沿莱茵河岸对地中海实施控制进行了对比。

通过麦金德的“封闭系统”我们可以感受到欧亚大陆和非洲作为有机整体在一同呼吸。在20世纪后期，该系统进一步封闭，我本人的研究核心点即是受其影响而形成的，他人亦可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但是，我们仍要承认，即使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内部仍然存在着地理上的分歧。事实上，地理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前所未有地重要，因为不论该系统产生任何倾向性，都会引发明显的后果。比方说，阿富汗的地理环境一旦恶化，其政治影响会从世界岛的一端波及其他地区。现在，让我们回头来探索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意味着什么，这将极大地影响到世界岛的命运。

在麦金德开始阐述他的思想和最终进行总结时，下面这句简单而玄妙的格言被一再引述：

> 统治东欧者，必将统领中心地带；
>
> 统治中心地带者，必将统领世界岛；
>
> 统治世界岛者，必将统领世界。

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件事，就是麦金德并非完全的决定论者。他对事件作出反应，同样也试图预测这些事件，这正是人的能动性的体现。在他1904年发表“枢纽”文章和1919年发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结束后，正值麦金德著作付梓之际，召开了巴黎和会。作为战争的结果，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继崩溃，凡尔赛的外交官们重新划分了东欧地图，这也是他们的核心目的之一。

因此，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麦金德提到15年前他在“枢纽”一文中忽略的观点：“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应该有独立国家的阻隔，这一措施必不可少。”也就是说，“我们反对半德国化的俄罗斯独裁国

家，因为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对于东欧还是心脏地带，俄罗斯一直是极具威胁性的主要力量；我们也反对完全的德国式政权，因为德国在东欧比沙皇俄国有优势，将来还有可能粉碎斯拉夫人的叛乱，并统治东欧和心脏地带。”因此看来，麦金德在1919年把东欧看做心脏地带的关键，无论是德国还是俄罗斯的陆权都由此派生而来。

就在俄罗斯为了打击英国的海上力量而“撞击印度的陆地门户”时，英国正绕过好望角，后又通过苏伊士运河，“攻打中国的海上门户”。麦金德于是建议，从爱沙尼亚往南至保加利亚，应建立一些独立国家作为“缓冲带”，如“大波希米亚”、“大塞尔维亚”、“大罗马尼亚”等。他的说法和其弟子詹姆士·费格里夫提出的“破碎地带”，实际上差别很细微。

1915年，费格里夫在著作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具体阐述，意指那些随时可能遭受心脏地带的陆权力量或西欧的海权力量蹂躏的新国家。如果这些新的主权国家能够生存，就有机会导致中欧在精神和地缘政治意义上崛起。麦金德更进一步，提出东欧可以建立一系列主权国家，如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等，来挫败俄国布尔什维克设计的政体。事实上，1991年苏联解体后，一连串新独立的国家随即出现，与麦金德的想法竟有惊人的相似。

在研究的最初阶段，麦金德也犯过错误。他似乎并没有像汤因比那样，意识到在民族自决原则基础上建立了边界的欧洲，很容易受德国控制，因为它面积更大，地理位置更好，比那些受到民族束缚的国家更强大。

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德国将征服东欧，而苏联将相应地征服“破碎地带”中的那些新独立国家，从1945年至1989年，一直使他们处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大监狱里；直到最近一代，希望才得以重现，一个精神上的中欧终于可以在俄罗斯和德国这两个陆权大国之间生存下去。那么，麦金德作为现实主义者的翘楚，为什么突然放软身段，

支持“威尔逊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呢？学者阿瑟·巴特勒·杜根（Arthur Butler Dugan）认为，尽管麦金德能够提出大胆和富有决定性的理论，他终归无法脱离自己的时代，是“特定舆论环境下的产物，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就其内在而言，麦金德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或至少后来变成了自由主义者。他寄望大英联邦成为多种文化和民族的大联盟，成员虽各自不同但平等相处；他还相信，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将会形成一个民主同盟，以此作为对超级大国最好的防御。也可以说，北约与苏联之间的斗争，麦金德早已预见到了。

从《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开始，麦金德逐渐倾向于威尔逊主义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心脏地带”理论进行了完善和修改。这一理论首次出现于“枢纽”一文，但没有使用“心脏地带”一词。这个术语实际上是费格里夫在自己的书里发明的，也就是1915年出版的《地理与世界权力》（*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

1904年，麦金德划定了中亚的“枢纽”地区，1919年他又将“位于西藏与蒙古高原的大河源头”和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安纳托利亚的一条南北向的宽阔国家带补充进去。这个新的“心脏地带”，或多或少地接近于冷战时期苏联在其权力顶峰时期的疆域，或者我应该说，是苏联加上挪威、土耳其北部、伊朗和中国西部。由于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并不生活在西部，而是集中于受季风影响的东南沿海，因此麦金德的心脏地带主要包括欧亚大陆内部人口相对稀少的部分，以及中国、印度以及欧洲西部的人口稠密地区。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和肥沃新月地带）既不是人口稠密地区，也不是心脏地带的一部分，之所以现在与“世界岛”的命运息息相关，是因为它作为“通道地带”连接欧洲与印度、心脏地带北部与南部，以及阿拉伯半岛周围的几片广阔水域。

虽然阿拉伯未处于心脏地带，但它的命运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阿拉伯世界离心脏地带最近的国家伊朗，就是一个明显的教训，为

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应该将其牢记。事实上，伊朗高原的确至关重要，我们稍后再来谈论它。

一个世纪前的地缘政治剧本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外，那就是希腊。在地理上，它属于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缓冲带”的一部分，但在1919年拓展后的心脏地带范畴里，麦金德把它拿掉了。他认为，希腊有大片水域为界，因此更接近于海权国家。在“二战”期间，希腊属于从德国控制中解放出来的首批国家之一，对此，麦金德也有先见之明：“一个伟大的心脏地带政权若拥有希腊，……可能就会连带控制整个世界岛。”

事实上，这句话几乎应验了。经历了亲西方势力和游击队之间的激烈内战后，希腊成为缓冲区地带唯一一个没有纳入苏联轨道的国家，后来与土耳其一起，构成了北约的南部战略脊线。由此，苏联在冷战中失利，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在麦金德看来，欧洲和中东更多地受到心脏地带的影响，而印度和中国的亿万人民能够自给自足，因此保持相安无事，和平发展。由此，他预测未来我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倚仗“印度和中国的季风地带”。但心脏地带到底为何如此重要呢？对欧亚内陆广阔的低洼地带和高原山脉的控制，对于世界强国来说真的举足轻重吗？没错，这些地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战略性矿产和金属，但这就足够了吗？麦金德的想法有极端机械性的缺点，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工具，可以部分地解释东半球各国及其人民的空间安排。以大陆中心而非任何沿海边缘地带作为参考，会比较容易解释欧亚大陆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但是，心脏地带最好被视为世界岛的权力缓存器，而非决定性力量。

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结尾处，麦金德断言，如果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并以德国的征服者面目出现，“它必将成为地球上最

伟大的陆权国家”，因为它有能力驻守心脏地带。

苏联的确这样崛起了，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做到了同样的事。正如麦金德预示的那样，它也因此可以迎面抗衡美国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海上力量。此外，正是出于对海上力量的追求和在印度洋上寻找不冻港，苏联最终入侵阿富汗（阿富汗原应是心脏地带的一小部分，却成为超越其掌握的漏网之鱼），后因深陷阿富汗游击队的伏击圈而使整个帝国土崩瓦解。现在的俄罗斯联邦，规模已大大缩小，但仍试图重新巩固其心脏地带的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麦金德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理论，竟然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地缘政治的主要剧本之一。

---

(1) Boer War，1899－1902，是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为了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荷兰殖民者于17世纪来到南非，他们和葡萄牙、法国殖民者的后裔被称为布尔人。布尔战争称得上是英国复兴史上最长的战争。——译者注

第5章
纳粹德国的地理扭曲
地缘政治空间竞争

德国相对其他欧美国家表现出更强的地理意识。豪斯霍弗尔上校是如何在拉采尔和契伦的基础上发展纳粹生存空间理论？作为希特勒背后的人，豪斯霍弗尔的理论对德国“二战”时期的战略选择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胡比的地缘政治学说对“二战”时期盟军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胡比是如何认识到纳粹地缘政治的危险性的？为何说麦金德的声誉在史特劳兹-胡比的手里得到了挽救？

空间力量的壮大是否意味着心脏地带理论已经过时？那些纵深宽广的大国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

作为陆地权力的继承者，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几百年来一直对地理方面十分重视，比美国和英国那样的海权国家考虑得更多。俄罗斯人对于蒙古人入侵造成的破坏刻骨铭心，地理对他们来说，仅仅意味着不扩张就有遭受蹂躏的危险。此外，光有大片的领土也远远不够。冷战期间，苏联需要建立一个由东欧卫星国构成的帝国，因此大量使用军事力量、在敌对国搞颠覆活动、修缮能源管道，所有的计划都围绕着如何扩大地盘进行，以谋求东山再起。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其严重的不安全感。

至少在20世纪中叶，德国人表现出了更强的地理意识。从黑暗时代到近现代的欧洲地图上，讲德语的地区形状不断改变，直至19世纪60年代，才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无论从陆地还是海上方面讲，德国都处于欧洲的心脏，这使其充分意识到了它与海上的西欧及俄属东欧的心脏地带的关系。

德国之所以先后战胜丹麦、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从根本上说是缘于俾斯麦的战略眼光和精准的地理洞察力，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地理限制的结果。东部的斯拉夫地区是德国不敢逾越之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放弃了俾斯麦的谨慎风格，结果导致战败，这更激起了德国人对地理的脆弱性和可能性的重视。地图上的历史是多变的，德国的南北两边夹在北海和阿尔卑斯山之间，东西两边是平原，既方便德国扩张，又方便入侵者长驱直入，正可谓生也地理，亡也地理。正是德国人提出并阐释了地缘政治的概念，即由政治和军事力量主导的空间；也正是这样的地理理论，导致了德国在20世纪中期一败涂地，难怪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代德国人都在诋毁地理和地缘政治。

被纳粹曲解的“生存空间”理论

地缘政治这一学科，历史上曾几度兴衰。所谓的理论家们踩着前人的肩膀展开研究，却又滥用前人的成果，直至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出现，地缘政治才得到了认真对待。拉采尔是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生存空间”（Lebensraum）理论的创造者。这个概念原本传自19世纪早期美国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德裔移民之口，他是位记者、政治学教授和投机商，也是美国政治家、辉格党创始人亨利·克莱（Henry Clay，1777－1852）的朋友。亨利·克莱从门罗主义[(1)]中汲取灵感，用“生存空间”来形容主权既定的广阔地理区域；而拉采尔则深受查尔斯·达尔文著作的影响，因此提出了这样一个有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即边界会根据人口的规模和构成而不断发展变化。虽然我们通常把边界看做是静态的，具有持久的代表性、合法性和稳定性，但拉采尔却认为，边界会随着国家事务的变化而扩大或收缩，并无常态。对他来说，地图可以像生命体一样呼吸，并进而萌生了“有机生物国家”的想法，把国家扩张的妄念，也看成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

拉采尔的学生、乌普萨拉大学和哥德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是“地缘政治”（Geopolitik）一词的创立者[(2)]。契伦是瑞典人，同时又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对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等暖水海域谋求扩张始终心怀戒备，希望瑞典和芬兰也施行扩张主义，以应对俄罗斯的图谋。契伦虽然召集了一部分贵族和中上层阶级来支持自己，终因民众支持太少而失败——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已经没有多少人沉湎于大国梦想了。于是契伦把他所有的希望转移到德国，希望它站出来迎战他特别痛恨的俄罗斯和英国这两个国家。

契伦编制的德国未来帝国计划，包括中欧和东欧全部地区、法国沿海所有港口、俄属波罗的海各省，以及乌克兰、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以远程铁路网络连接到柏林）。他采用拉采尔的思想，把人类社会按种族和生物类别划分，认为国家就像人一样，要想有足够的阳刚和活

力，就需要大量的生存空间。这正是拉采尔和契伦的理论中最狡猾和最精彩之处，后世的刽子手们利用它为其残暴行为大加辩护。观念无论好坏都很重要，那些模棱两可的观念尤其危险。正统的地理学，告诉我们在面对环境挑战时应该克服什么，而拉采尔和契伦的理论则是地理学的异端，将人性置于种族大灭绝的危险之下。

上述理论正是纳粹主义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坚定崇拜者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1869－1946）的生命支柱，虽然彼时他的学术活动尚未开始。豪斯霍弗尔对麦金德观点的悲剧性曲解，以及纳粹地缘政治战略的危险性，在一本备受冷落的经典政治学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述，那就是1942年罗伯特·史特劳兹-胡比（Robert Strausz-Hupé，1903－2002）发表的《地缘政治：追求空间和权力的斗争》（*Geopolitics: 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

史特劳兹-胡比是奥地利移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在冷战期间曾先后担任美国驻四个国家（包括土耳其）的大使和北约代表。1955年，他在费城创办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20年来，我也算是一直在他手下“混”日子。史特劳兹-胡比的书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形势尚未有利于盟军。他不仅试图在书中明确解释纳粹地缘政治的危险性及其对于美国公民的威胁，还着重阐释了地缘政治的重要意义，让正义的势力可以运用它抗击纳粹侵略。他用实际行动拯救了麦金德和这门学科的声誉，同时尽其所能执行外交任务，为赢得战争出了一份力。

再来看看卡尔·豪斯霍弗尔。这位身兼博士、教授、少将三个显赫头衔的纳粹学者出生于慕尼黑，他的祖父、伯父和父亲都从事制图和编写旅游手册的工作，这在他的生命中打下了深刻印记。豪斯霍弗尔加入了巴伐利亚的军队，并于1909年被任命为炮兵教官。他对日本的军事崛起深深着迷，主张德国与日本结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被任命为旅长，纳粹党要员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成了他的助手。战争结

束后，豪斯霍弗尔被任命为慕尼黑大学地理和军事科学院院长，赫斯作为弟子，一直追随他。

正是通过赫斯，豪斯霍弗尔得以面见“帝国崛起的煽动者”阿道夫·希特勒，并呈交了地缘政治的学术简报。当时是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3)]失败后，希特勒被囚禁在兰茨贝格（Landsberg）的要塞中，正在埋头撰写《我的奋斗》（*Mein Kampf*）。作为一个只受过四年制中学教育的人，除了相信直觉以外，他需要更多地了解现实世界。这位大学教授的来访正可以填补他的知识空白，因此受到热烈欢迎。在《我的奋斗》第十四章，希特勒提出了纳粹的外交政策与纳粹生存空间理论，可能正是受到豪斯霍弗尔的启发。

德国地缘政治的本质

跟随史特劳兹-胡比之笔，我们可以回顾豪斯霍弗尔是如何被他的同仁麦金德迷住的。麦金德虽然痴迷于陆权，却从来也没有真正诋毁过海上力量；但他对英国的海上力量一直持悲观态度，认为其难以阻止德国陆权袭击心脏地带。一旦拥有心脏地带，德国就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助其征服世界岛。

麦金德解释说，20世纪尤其需要向陆地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扩张，以便充分发挥工业化的优势。工业时代是超级大国的时代，弱肉强食是基本规律。史特劳兹-胡比写道，豪斯霍弗尔采纳了麦金德理论并反其道而用之，“他的结论是，德国的世界强国之路，正是由英国最恐惧的那条线路铺就的，也就是使德国和俄罗斯的更大地盘得到巩固”。按史特劳兹-胡比的话说，豪斯霍弗尔在解释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时极尽添油加醋之能事，将其阐述得故弄玄虚、模棱两可。他称它是“世界征服者的摇篮”，“一个巨大的城堡，跨越易北河直达阿穆尔”（即中国的黑龙江），意即从德国中部直到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其纵深可以确保德国既能随时撤回重要的军工基地，同时其陆军和海军又能够

在各个方向对外出击。

麦金德深受威尔逊主义的影响，认为有必要在欧亚大陆保持势力平衡，并在1919年建议在东欧建立独立国家带作为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区；几年之后，豪斯霍弗尔颠覆了麦金德的论点，直接倡议“灭掉这些国家”。史特劳兹-胡比在书中记录道，豪斯霍弗尔称这些小国为“几块国家碎片”，认为其居民只会从自身“狭小的空间”展开思考，“其腐烂症状已被确诊无误”。史特劳兹-胡比更进一步发现了豪斯霍弗尔的“整体性逻辑”，即计划解散大英帝国，同时让苏联解体。他要让苏维埃联盟分裂成各单一民族体，之后设法让这些民族国家向大德意志俯首称臣，因为在豪斯霍弗尔看来，德国是唯一有权实行民族自决的国家。按他自己的话说，“目前，三分之一的德国人仍然生活在帝国边界之外的异族统治下。”德国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包括日本霸权下的“大东亚”，以美国为主导的“泛美洲”，德国主宰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以及意大利权力映射下的地中海-北非亚区。但对豪斯霍弗尔来说，这仅仅是一个中间步骤，最终应该是心脏地带主宰世界岛，世界岛主宰世界。

史特劳兹-胡比告诉我们，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概念带有明显的“爱德华七世时代英国人印记”，我之前也曾提到过这一点。在麦金德所处的时代，俄罗斯作为大不列颠的对手已将近一个世纪，英国政治家一直生活在恐俄症中，害怕俄罗斯将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吃掉奥斯曼帝国，并扑向印度。因此，麦金德一直主张建立一系列独立的缓冲国，以隔开俄罗斯和海上欧洲，虽然他已判定俄罗斯国内的心脏地带本身即可作为可视化战略工具使用。

“麦金德的目光，”史特劳兹-胡比写道，“对世界强国是崛起还是倒台这种病态的理念太过关注，这也是德国的国家病；麦金德的教条只有一个，这恰恰也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们[(4)]所渴望的终极结局。”虽然如此，麦金德的声誉最终还是在史特劳兹-胡比的手里得到了挽救：

> 麦金德写书的时候，军队还未从战场返回，他受到冷遇却仍不失尊严，始终捍卫自己广阔的历史视角。他相信个人的信念，而这正是他的德国崇拜者所缺乏的。虽然豪斯霍弗尔喜欢强调英雄主义在历史中的作用，但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战场上的集体牺牲，而不是在战斗中送命的无名小卒。

史特劳兹-胡比和麦金德都相信和赞赏人的能动性，而德国的地缘政治信徒却不是这样。

心脏地带学说在麦金德手里，是用以解释地缘政治的关键性工具，而到了豪斯霍弗尔的手里，却成了一种疯狂又如梦似幻的意识形态。史特劳兹-胡比通过认真的剖析，认为豪斯霍弗尔"呈给希特勒的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刚好可以拨开其脑中混沌的迷雾，这就是一个系统而连贯的帝国学说"。

麦金德寄希望于未来各国势力均衡，认为那样能保护自由，而豪斯霍弗尔决心推翻它，于是他费尽心机从地缘政治里寻找突破口。在歪曲了麦金德的学说之后，他又对乔治·纳撒尼尔·寇松爵士（George Nathaniel Curzon）的学说如法炮制。寇松曾在1907年就"边界"问题发表演讲，豪斯霍弗尔受其启发，干脆写了一本书，名为《边界》（*Frontiers*），实为探究如何突破边界。他在书中称，只有处于下降趋势的国家才寻求稳定的边界，只有腐朽的国家才修建永久性工事碉堡来保护其边界，因为边界本是活物；强盛的国家要做的是修建公路，而边境只是阻止霸权国家的临时栅栏而已。毋庸置疑，德国地缘政治的本质是以争夺"空间"为目的的永久战争，因此类似于虚无主义。史特劳兹-胡比补充道：

> 尽管这个变态的学说破坏了世界和平，我们也不应该假定它会让所有的地缘政治理论失效；即使是人类学，也不过是一门充当种族主义工具的科学而已。

豪斯霍弗尔虽然深受自身暴力世界观的局限，其原则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希特勒50岁生日时，他将这位元首称为“杰出的政治家”，认为他是由“克劳塞维茨的血液和拉采尔的空间与土壤”铸就之人。在一篇社论中，他大赞1939年苏德秘密协定，强调德国需要与苏联共建大陆霸权；然而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后，他又写了篇社论，认同入侵是获取心脏地带的最佳方式。当然，希特勒的决定当时谁又敢批评呢？

许多事例表明豪斯霍弗尔与希特勒的联系受到了人为夸大。当然，豪斯霍弗尔只是纳粹战略观的一个典型代表者而已。随着战争局势日趋不妙，豪斯霍弗尔失宠于元首，1944年被关押于达豪集中营；同年，豪斯霍弗尔的儿子，同为地缘政治学者的阿尔布雷希特，因参与反对希特勒的军队叛变被处决。此外，豪斯霍弗尔的妻子有部分犹太人血统，虽因赫斯的关系受到纳粹的种族法律保护，但在赫斯1941年只身飞赴英国谈判被囚后也失去了倚仗。内外交困之际，豪斯霍弗尔逐渐意识到，对于造成大屠杀和大破坏的世界战争，他负有部分责任。德国战败后不久，盟军对他展开战争罪行调查，豪斯霍弗尔和他的妻子畏罪自杀。

“心脏地带”理论的末日？

其实，史特劳兹-胡比著书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抹黑豪斯霍弗尔和挽救麦金德的声誉，而是恳请美国人严肃地对待地缘政治学。如果他们对此不以为然，就会受到其他意图不轨的势力利用，并借此打败美国。于是，他在书的结尾写道：

> 纳粹的战争机器是征服的工具；而地缘政治作为其手中的蓝图，给他们提供了征服的方法和目标。现在了解这些知识尚可亡羊补牢，因此要尽快吸取地缘政治的教训。

史特劳兹-胡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仅仅将极权国家征

服计划的理论基础公布于众，对他来说是不够的，此外也太容易了。他知道一些令人不舒服的真相，正如麦金德的推理在关键方面存在缺陷一样，豪斯霍弗尔的推理虽然变态，但却有其现实基础。因此，史特劳兹-胡比的目的是向美国人灌输地理学科的重要性和价值，使美国凭借两大洋之间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承担起战后稳定器的角色，维护欧亚权力平衡。这也正是纳粹在豪斯霍弗尔等人的帮助下，千方百计试图打破的东西。

至于心脏地带理论本身，史特劳兹-胡比从始至终都非常怀疑。空中力量一出现，不管是商用还是军用，马上会使其毫无意义。然而他也承认，工业时代的技术发展，包括大型工厂、铁路线、坦克和航母，都使得纵深宽广的国家能取得最大的优势。当然，在后工业时代，微型芯片、手机、塑料炸药等重要物件，就连个人和无国籍群体都可以轻易拥有，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紧张性。史特劳兹-胡比在讨论边境问题时已对这方面的某些点有所涉及，并认为豪斯霍弗尔对寇松观点的滥用难辞其咎。

在豪斯霍弗尔的虚无主义理论大行其道之时，史特劳兹-胡比无视其威慑，毫不客气地对其予以揭穿。边境的客观存在，表明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政治和军事的分界线早已划定的世界。“主权国家起源于有组织的力量，起始于战争。其边境无论好坏，均属战略前沿。”史特劳兹-胡比写道。他从寇松那里引用的话，尤其引人关注，如断言边境战争将在数量和强度上增加，因为“地球的可居住范围在萎缩”，特别是当“一国的野心膨胀、不可调和时，势必与另一国产生冲突”。

换句话说，豪斯霍弗尔对于“世界冲突永无休止”的假定，并非完全错误。即使战争结束，人类也不会从日渐悲惨的生存条件中找到些许喘息之机。近几十年来地球的日益拥挤，军事技术的进步，时间和距离系统的崩溃，处处预示着世界地图上迟早会发生空间危机（room crisis）。详细情况且听下回分解，因为我们还需要请出麦金德的“封闭

系统”理论对其加以分析。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响应史特劳兹-胡比的呼吁。他已注意到任务的紧迫，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之间权利的平衡者，永远担付不起无视地缘政治的代价。地缘政治和空间竞争是永恒的，在未来几十年其热度将只升不降。自由国家必须自告奋勇，甘当重任，否则阵地就会落入豪斯霍弗尔之流手中。

---

(1) Monroe Doctrine，发表于1823年，表明美利坚合众国当时的观点，即欧洲列强不应再对美洲实行殖民统治，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将视为具敌意之行为。——译者注

(2) 鲁道夫·契伦发展了拉采尔的思想，认为国家就像有机体，能生长、发育和衰亡。1918年发表论文《国家为有机体》，对法西斯德国的影响很大。——译者注

(3) Beer Hall-Putsch，1923年11月希特勒和E.鲁道夫等人在慕尼黑发动的法西斯未遂政变，又称希特勒暴动。希特勒试图利用魏玛共和国的危机发动政变，建立民族主义的独裁统治。——译者注

(4) Wagnerian，文中特指对德国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思想的狂热追随者。瓦格纳是德国歌剧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因为他在政治、宗教方面思想的复杂性，特别是反犹太主义和纳粹思想，成为欧洲音乐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译者注

第6章
被边缘的边缘地带
“权力均衡”的挑战

与胡比一样，斯皮克曼的权力均衡始终都是其地缘政治学说的核心，他甚至在“二战”尚未结束时就预示了美国将成为未来的超级强权。

胡比为何认为历史是在“北纬20°与北纬60°之间”创造出来的？被斯皮克曼称为“美洲的地中海”的加勒比海，真是新世界的战略和地理核心吗？斯皮克曼为何认为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比控制麦德金所谓的“中心地带”更为重要？

苏联为何一心要打破心脏地带的海权国家所形成的包围圈？边缘地带对苏联意味着什么？斯皮克曼在60年前准确预见中国的崛起？美日同盟的形成以及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是否是历史的必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伯特·史特劳兹-胡比不是唯一一个向美国人发出警告，要求将地缘政治从纳粹手中夺回来，恢复其本来面目并为己所用的人。尼古拉斯·J. 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kman）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斯皮克曼1893年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中立国荷兰的驻外记者四处奔走，先后到过近东（1913－1919）和远东（1919－1920）。战争过后，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本科和研究生学位，并在那里留校任教一段时间；后转投耶鲁大学，1935年在那里成立国际问题研究所。他让学生以地理作为主要工具，来评估这个吸引他入籍的国家在世界上面临的危险和机会。1943年，斯皮克曼死于癌症，时年49岁。他去世前一年发表的《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美国的权力平衡》（*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在理解冷战后的世界框架方面，比麦金德的著作更具参考性。斯皮克曼在年代上略晚于麦金德，在某种意义上刷新了他的思想。

在史特劳兹-胡比的身体里，流动着与摩根索、基辛格和其他欧洲移民一样的现实主义血液。在20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这个国家给他们提供了避难之所，同时他们也敏锐地感觉到这个“天真”的国家处境危险。斯皮克曼也是一样，他的脑子里没有一丁点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和伤今别古之感，在他看来，地理就是一切。美国的大国地位不是由其理想奠定的，而是因为它直接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

对斯皮克曼来说，地图的冷酷性和随之而来的空间斗争从未止歇。他写道，“国际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不存在中央权威来维护法律和秩序。”换句话说，它处于无政府状态，所有国家都必须在斗争中寻求自我保护。政治家们本可以致力于追求公正、公平和宽容的普遍性

价值观，但对他们来说，权力如同呼吸，几乎是生存的代名词，怎么可能舍得放手呢？“不是为了实现道德价值观而追求权力，而是利用道德价值观来获得权力。”卡尔·豪斯霍弗尔一语道破了这些政客们的想法，为了实现这一点，已酿成太多的悲剧。

然而，斯皮克曼与麦金德和史特劳兹-胡比一样，相信“权力均衡”会比某霸权主宰全球更具“安全性”。这也是他与豪斯霍弗尔观念的分水岭。斯皮克曼还谨慎地将“权力均衡”与“自然律法和基督教伦理”相提并论，因为在他看来，二者都可用于维护和平。

虽然史特劳兹-胡比在其作品中为麦金德辩护，但他的论述重点始终落在纳粹的地缘政治理论上；而斯皮克曼则将重点放在世界地图上，借此评估纳粹统治的前景，勾勒出战后世界权力的配置，可惜他无法活着看到那一天。在作品中，他开篇即用地理解释了美国是如何成为超级大国的。

边缘地带与心脏地带，孰轻孰重？

世界历史，如斯皮克曼所言，是“在温带制造的”。温和的气候在那里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因为南半球的大块陆地在这个区域分布较少，历史主要是在北半球的温带地区形成的”。当然，说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美洲的南锥体地区无关紧要，也是不恰当的；事实上，由于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对全世界所有地方产生影响，因此他们在今天比在过去更重要。当然，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他们的影响比北半球，尤其是北温带地区还是要少得多。

詹姆士·费格里夫与麦金德几乎是同代人，他解释说，因为温带地区与热带相比日照少、气候条件多变，因此人们必须一年到头努力工作；同时，季节的差异也导致播种和收获的时间具有确定性。这些正是人类能在温带地区“进步发展壮大”的原因。此外，南极是一个巨大的大

陆块，周围被不间断的海洋圈环绕；而北极周围则反过来，海洋被不间断的大陆圈环绕包围，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最有生产力。

史特劳兹-胡比解释得更具体。他说，历史是在“北纬20°与北纬60°之间”创造出来的。这个区域包括北美、欧洲、大中东和北非、俄罗斯，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麦金德的“荒野腰带”说（Wilderness Girdle）与此大致吻合，即包括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和相邻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用加拿大所属北极圈内地区的情况来印证这个说法。那里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相对空旷的巨大温带区，然而直到欧洲进行启蒙运动的时期，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

斯皮克曼也证实，美国最初的繁荣得益于东海岸密布的河口提供的“无数有利于建设港口的位置”，以及蜿蜒的海岸线。地理也是早期美国自由最重要的捍卫者。在确立了西半球的地区霸权之后，美国就可以腾出力量应对“新世界以外的活动”，最终奠定其超级大国地位。它能够影响东半球的权力平衡，也正得益于此。

这一切绝非易事，更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所有的成就都植根于拉丁美洲的地理细节。地理的关键作用，使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成为占有整个半球的霸主。斯皮克曼以南美洲为例对此作出了解释，这也正是麦金德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的一个地区。麦金德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心脏地带有浓厚兴趣，这对于理解冷战地理至关重要；而斯皮克曼对于地球的整体性把握得更好，因此在当今全球各地高度连通的时代，比麦金德更具现实意义。

新世界的战略和地理核心，正是被斯皮克曼称为“美洲的地中海”的加勒比海。雅典称霸于爱琴海，因此有效地控制了希腊群岛；罗马称霸于地中海，于是号令西方世界；在斯皮克曼看来，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根本原因在于它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无可争议地控制了加勒比海，并在此后不久就有了建造巴拿马运河的条件。至于加勒比盆地，正如斯皮克曼所说，“这个地区没有能力对美国的地位形成严重

的威胁”。中美洲的地形就像巴尔干半岛，岛屿规模有限，只适合建立较小的政体；即使像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规模相对较大的国家，也因受制于地形、气候、战略原料而无法成为海上强国。美国海军只要愿意，尽可以封锁加勒比地区的东部边界，切断这些国家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斯皮克曼因此得出结论，他们渐渐对美国形成了严重依赖的关系。

和我在书中提到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斯皮克曼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他能够透过纷乱喧嚣的表象，揭示出深藏在本质中的真理。他认为，西半球最基本的地理特征，就是其内部分化不是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产生，而是在亚马孙地区赤道雨林以北和以南地区之间产生。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圭亚那虽然在南美洲的北部海岸，但仍具有北美洲的部分特征，因此也算是“美洲的地中海”的一部分；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加勒比地区则与亚马孙丛林南部的国家几乎没有共同点，尽管他们共享同一大陆。与欧洲的地中海一样，“美洲的地中海”象征的不是分裂，而是统一。比如，北非虽然属于非洲的一部分，但由于受撒哈拉沙漠阻隔而在地理上被纳入了地中海世界；同样，南美洲北部海岸是加勒比世界的一部分，地理切断了其与南美洲的联系。斯皮克曼解释道：

> 从安第斯山脉开始，山脊向东弯曲，把亚马孙盆地与马格达莱纳河谷和奥里诺科河谷隔离开来，形成圭亚那的南部边界。穿过这里，是人迹罕至的广袤森林和亚马孙河流域的热带雨林。河流及其支流形成了一条东西向的交通系统，但南北向方面则缺乏运输动脉。

根据斯皮克曼的解释，南美洲的南半部受地貌的影响，在地缘政治上处于边缘地带，而西海岸则被太平洋和安第斯山脉挤压得支离破碎。安第斯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之一，仅次于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河谷给美国东海岸提供了通往西部

的机会，而安第斯山脉河谷则既窄且少，不能通航。智利和秘鲁等国家远离历史上沟通和迁移的主要通道，需在太平洋上航行8 000英里才能到达东亚，离美国任一海岸也有数千英里之遥，因此不能发展强大的海军。而且，智利全境只有中部和南部处于温带。据说基辛格曾趣言智利是指向南极中心的匕首，这个比喻可算得十分形象。南美洲的东海岸，也一样显得偏远而孤立。

美国的后院——起火的“南锥体”

由于南美洲并非位于北美大陆正下方，而是在其东南方向，因此大西洋沿岸的人口稠密地区（如里约热内卢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纽约之间的距离，和与里斯本之间的距离差不多。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称霸一方，与南美洲的心脏地带之间隔着千山万水和宽阔的热带雨林，因此在自己的半球几乎没有挑战者。斯皮克曼写道，南美的南锥体地区与其说是美国的“大陆邻居”，还不如说是美国的“海外领地”。

但也并非全无反例。加勒比盆地的团结，体现在行动上，就是从哥伦比亚出发，经由中美洲和墨西哥向美国贩运可卡因和大麻的通道。所谓的毒品战争也是一堂特殊的地理课，现在正威胁着美国在西半球的后院；此外，民粹主义者、激进反美的委内瑞拉铁腕人物乌戈·查韦斯，立足于加勒比盆地边缘公然与俄罗斯和伊朗结盟，也是对美国全球利益的侮辱。如果该国处于亚马孙雨林下方的南锥体上，其威胁就小得多。全球化信息时代距离感的崩溃，以及劳动力从人口年轻化国家向人口老龄化国家迁移，都使美国与加勒比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而围绕其周边的正是一个不稳定的拉丁美洲。

加勒比地区以前若非由美国海军把控，其实很容易脱离美国社会主流，也就不会像目前这样，成为与美国相互交织的一部分。斯皮克曼预测到了这一趋势，但他显然无法预测到具体细节。和史特劳兹-胡比等人一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研究和写作，在战事尚未明朗化

之前，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应对纳粹的威胁是斯皮克曼头脑中最重要的问题。因此，他看到了美国与南美洲南部分离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意义，认为这是一种战略优势；但从另一方面说，一旦该地区受到来自欧洲对手的威胁，美国将腹背受敌。

南锥体地区的里约热内卢以南，正是斯皮克曼所谓的“等距离区”（Equidistant Zone），其中包括这个大陆最有生产力的农业地区和占南美洲3/4的人口，南美洲两大共和国巴西和阿根廷的主要城市也都在这里。虽然与欧亚大陆相比其地理重要性微不足道，但斯皮克曼仍担心南部锥体成为敌对势力包围战略的一部分。美洲的地理条件，允许美国作为西半球霸主出现，但如果美洲分裂为一个自由的北部和一个由轴心国主导的南部，美国的优势将被终结。斯皮克曼写道：“许多孤立主义者认可西半球的国防战略，因为它似乎是与德国避免冲突的唯一方式。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使美国可以避免与德国在欧洲正面冲突，也不能完全避免与之围绕南美洲的霸权开战。”

即使当年轴心国被击败，斯皮克曼的警告依然有效，直至今天仍可以被奉为经典。欧洲、日本和中国，与斯皮克曼定义下的等距离区有着非常深的贸易交往，而其与美国的贸易量仅占总量的不到20%，美国作为这个区域的外来强权，其地位很难得到长期保证；另外，从纽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飞行时间是11小时，相当于从美国飞往中东所需的时间。从这一点来说，虽然斯皮克曼聚焦于地理的原因是为了赢得战争，但他卓越的学术成就也继续映射到了我们目前居住的世界。

大陆边缘地带导致“遏制”战略的形成？

作为麦金德的后辈，斯皮克曼引入了这位英国地理学家的理论框架，为其研究提供参照和启示。他们二人都对欧亚大陆关注有加，而拉丁美洲则构成其关注中心的一条长长的正切线。

麦金德在著作中认为，在由心脏地带主导的陆权与海权之争中，陆权更占优势。斯皮克曼承认受到麦金德影响，但他对海陆力量的相对重要性有着不同的看法：

> 自彼得大帝时代起的两百多年来，俄罗斯一直试图冲破边境各国的包围，将边界推进到海洋。但是，地理和海权一直持续地阻挠着它。

斯皮克曼把心脏地带作为苏联帝国的模糊代名词，意即北部毗邻冰雪封锁的北冰洋，从挪威一直延伸到远东地区之间，南部群山环绕，从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脉到安纳托利亚、伊朗和阿富汗高原，并向东北转向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脉和蒙古大草原，最终收尾于满洲和朝鲜。在他看来，这是世界上最关键的地域，围绕此地进行的争夺战连年不断。在北部的山脉和台地内侧，就是心脏地带，南部和外侧则是欧洲、南亚、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等人口集中区域，以及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欧亚大陆的边边角角，特别是沿海地区，被斯皮克曼称大陆边缘地带（Rimland）。他认为，对于世界强国来说，最关键的是大陆边缘地带，而不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心脏地带虽可主宰欧亚大陆，但面向海洋的大陆边缘地带，才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中心。

其实，两人的观点在实质上殊途同归。麦金德说，谁控制了心脏地带，也就占据了控制大陆边缘地带的先机，之后就可以通过海权统治世界。当然，这正是苏联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为了占据印度洋的温暖水域，它入侵阿富汗，并企图制造巴基斯坦的不稳定，试图以此把海权和陆权结合起来。不过，斯皮克曼对大陆边缘地带的格外看重，仍然使其占有微弱的优势。纵览目前世界形势，处于大陆边缘地带的大中东动荡不安，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局势紧张，朝鲜半岛紧张对峙，这一切使得斯皮克曼对大陆边缘地带及其地缘政治意义的认识，具有更多的当代关联性。

麦金德的理论主体出现之时，世界正处于世纪之交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而斯皮克曼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事实出发，认为当时心脏地带在另一个盟友苏联手中，因此暂时不是问题，而大陆边缘地带却受到轴心国的威胁。

虽然轴心国输掉了这场战争，但对大陆边缘地带的争夺一直持续到冷战时期。苏联作为巨大的心脏地带强国觊觎着这一地带，而西方海权则对其进行了抵制。1946年美国外交官和俄罗斯问题专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他的“长电报”[(1)]中阐述了对苏联实施“遏制”（containment）的冷战政策这一说法出自苏联周边的海权国家，而心脏地带的强权则称之为“包围圈”。对于西欧、以色列、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捍卫，以及在阿富汗和越南开展的战争，都是为了防止苏联将控制范围从心脏地带扩展到大陆边缘地带。1957年，年轻的亨利·基辛格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他在书中写道：“为防止苏联集团控制欧亚大陆周边地带，有限度的战争是成本上可接受的唯一手段。”基辛格认为，苏联作为心脏地带的霸权国家，拥有强大的“内部通信和交通线路”，因此可以沿其周边聚集相当大的力量。波兰、伊朗、阿富汗、越南在整个冷战时期都随时可能成为战场，因为它们处于苏联和中国的边缘地带。这就是麦金德的世界，但带着斯皮克曼式的感性。

遏制中国的逻辑

斯皮克曼以1942年作为基点，其目光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使我们看到了地理学家心系未来的先见之明。虽然当时盟国的优先目标是彻底摧毁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但斯皮克曼也非常担心战后德国一旦非军事化，会给世界局势带来什么影响。他解释说，一个“从乌拉尔到北海”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可能比一个“从北海到乌拉尔”的德国好不到哪里去。苏联若在英吉利海峡设立机场，将和德国机场一样威胁大不列颠的安

全。因此，在希特勒垮台后，一个强大的德国仍然是必要的。基于同样的道理，虽然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夺岛恶战还要打三年，斯皮克曼仍然建议与日本结成战后联盟，以对付苏联等大陆强权，特别是正在崛起的中国。日本是一个粮食净进口国，石油和煤炭产量不足，但其悠久的海军传统是一大优势；对美国来说，这个强大的东亚海上岛国在远东可以发挥同英国在欧洲一样的作用。斯皮克曼特别强调，虽然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初因遭受日本的侵略而异常虚弱，但将来必然会重新振作，因此联合日本这个盟友实属相当必要：

> 一个现代化、军事强大、生机勃勃的中国……不仅会对日本构成威胁，还会向西方列强在“亚洲地中海”的地位提出挑战。中国幅员辽阔，控制着广大周边海域，它在亚洲占据着类似于美国在美洲地中海的主导地位。当中国变得强大时，它对该地区的经济渗透无疑将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可以设想，这片海域将不再由英国、美国、日本海权控制，而是由中国的空中力量控制，这种结局可能为时不远。

也许，斯皮克曼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对欧洲的观察。他反对德国或苏联统治欧洲，也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实现一个统一的欧洲。他更倾向于在欧洲国家之间形成权力平衡，认为这比欧洲联邦（即便是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实现的）更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利益。他写道，一个“欧洲联邦……有可能凝聚力量，彻底改变我们对于大西洋地区的重要性，并大大削弱我们在西半球的地位”。目前欧盟仍处于发展中阶段，各个强国的国家领导人虽加强相互协调，并建立了单一货币区，但仍奉行各自独立的外交政策；要评判斯皮克曼的预测是否准确，还为时过早。然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欧洲越是统一，与美国的关系就越是紧张。一个拥有武装部队并奉行单一外交政策的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超大国，将是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甚至可能成为在南美洲南部的“等距离区”占主导地位的外部力量。

接下来的部分，是斯皮克曼的理念明显不同于麦金德和冷战遏制政策的地方。遏制政策基于自由主义理想及地缘政治原因，鼓励欧洲统一，希望其发挥反苏的堡垒作用。乔治·凯南撰写“长电报”时，就把欧洲生活方式奉为至臬，并相信它将拖垮苏联的极权体制。随后，志同道合的欧洲民主国家在美国的鼓励下，开始朝着一个共同的政治经济联盟而努力。凯南自己是一个死硬的现实主义者，而斯皮克曼显然比他更冷血，他根本不会让自己的分析掺进地理以外的任何元素。与豪斯霍弗尔不同的是，他并非不相信民主和自由社会，而是感到它的存在对于地缘政治分析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斯皮克曼的工作不是改善世界，而是陈述他认为正在发生的事；也许正是这种冷血带来的敏感性，使他的视野远远超越了凯南和冷战。在半个多世纪前的1942年，他已然可以把今天的局势写得清清楚楚：

> 只有从全球视野和三维立体战争的整体性考虑，并运用他们的政治和战略思维，政治家才可以拯救他们的国家，避免在遥远的边缘侧翼陷入左右夹攻。空中力量对海权的弥补意义及其移动的迅捷性，将成为战争的本质，全球没有任何地区会因为太遥远而失去战略意义，也不会因为太偏僻被强权政治的算计所忽视。

换句话说，得益于空中力量和远征能力，各国部队特别是美军可以在任何地方快速部署，范围遍及整个地球。这出精彩剧目，麦金德“封闭系统”中的每个人都将有幸目睹。这种令人吃惊的能力应归功于通信技术，特别是与空中力量有关的技术的迅速发展。

然而，地球系统毕竟过于庞大，无法由一个霸权主导。因此斯皮克曼认为，将会出现“区域性分权”，每两个大区域之间都会相互影响。他直觉地认为，世界会以多元霸权的方式存在，相当于我们现在经常谈论的、已然存在的“多极化世界”。但这种多极化只是就经济和政治领域而言，在军事意义上并非如此，因为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军队，仍然具

有绝对的优势。但在这个新兴的世界里，区域性庞然大物实在太多了：美国、欧盟、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些强权大国，以及土耳其、伊朗、印度尼西亚、越南、巴西等中等强国，对于斯皮克曼而言，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这样一个世界的动力是什么？斯皮克曼的回答方式，就是紧盯着地图，从不同角度探究。他最引人注目的见解来自北极投影地图。“这里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北半球大块陆地的集中，另一个是他们以北极为中心，像海星一样向四面八方散开，朝着非洲和好望角、南美洲和合恩角、澳大利亚延伸……”在这幅投影地图上，几乎到处都是陆地；如果你对比南极地图，则会发现几乎到处都是水域。北极地图显示了北方大陆彼此之间有多么接近，南部大陆则彼此相距甚远；当然，在这张地图上，南方大陆之间的距离被夸大了，但仍然大致可以看出澳大利亚与南美洲、南美洲与非洲之间相距有多远。因此，在地理上，北美和欧亚大陆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动态的，并构成了“世界政治的基本线”，而那些南半球大陆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要小得多。

再强调一次，斯皮克曼并不是说南美洲和非洲是微不足道的，只是说它们彼此的关系影响较小。南美洲和非洲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价值，只有通过它们与北方大陆的关系才能体现出来；而北美和欧亚大陆之间存在有机关系，才是这幅极地投影地图传递的真实信息。

我们认为，正是浩瀚的太平洋，把北美西海岸与东亚分隔开来；但从极地飞行航线图上看，这不过是一段航程而已：向北飞越阿拉斯加，然后南下横跨俄罗斯远东，越过日本和韩国，到达中国的温带地区。假想一下，北极地区如果变得温暖，在未来几十年里将赋予海权和制空权什么意义？超音速运输机将美国西海岸和亚洲城市之间的距离削减了2/3，极地航线越来越多地投入使用，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将被锁定在一个日益紧固的世界里；地理会变得更具实感，并因而更加重要。虽然我们普遍认为全球化将打破壁垒，实际情况却是各国间的联系在数量和

强度上大大增加，产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大。

麦金德认为，一旦世界变成“一个封闭的政治系统，终极地理现实也将变得真实易感”。他指的是北半球由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部分组成的世界岛，将其看做地缘政治的一个独立单元，北美则是边缘地带海洋中最重要的卫星大陆。斯皮克曼的大陆边缘地带理论与这种情况正好吻合。在他的设想中，欧洲、中东、印度次大陆和远东的边缘地带，将凭借其大量的人口、迅猛的经济发展和丰富的油气资源，一起控制围绕欧亚大陆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连续海岸，并对俄罗斯的心脏地带权力形成制衡（即使俄罗斯在北极海岸获得温暖水域的控制权）；北极可能变成飞机和船只运输的枢纽中心，连接北美与世界岛的北部地区；而大印度洋则可能形成世界岛商业和军事方面的海上通路，把非洲与中东和东亚连接起来。

尽管如此，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仍不会在严格的政治意义上统一。这是在多元化霸权世界里最让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担心的一种危险，但似乎尚没有出现的迹象。即使是处于海权力量上升期的中国，虽然似乎有能力取得这一成就，但仍会受到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海军的牵制。我们会看到一个权力分布更加微妙的世界，贸易和经济会削弱纯粹的军事力量；不过，世界可能仍然是一个由地理决定的地缘政治体，尤其是海洋，将比以往更加拥挤。

---

(1) The Long Telegram，美国外交史上最重要的电报之一。1946年美国国务院询问驻苏联大使馆如何对付苏联，当时作为代主管的乔治·凯南用一封长达8 000字的电报作为回复，史称“长电报”。——译者注

第7章 海权的诱惑 霸权野心

马汉为何认为帝国的地理枢纽不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而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他的海权论学说又有着怎样的不足？

为何说美国的地理位置对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巴拿马运河的开通为何使得美国不再像过去那样超脱于国际纷争之外了？

为何当下美国所施行的海军战略似乎与马汉的海权论背道而驰？为何崛起中的中国和印度格外推崇马汉的海权论？它们是否会重蹈美国海上霸权的“覆辙”？

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促使麦金德强调大陆权力；同样的工业革命也促使比麦金德年长几岁的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成为海权的狂热鼓吹者。马汉认为，在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海权不仅是比陆权更重要的力量，而且由于“海军向内陆压迫性延伸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对国际局势稳定的威胁也比较小。

马汉认为，帝国的地理枢纽不在于所谓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而在于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两个大洋可使相关国家沿欧亚大陆边缘投射力量，并借助发达的铁路和公路网影响大中亚地区政治发展。从这一点来说，斯皮克曼对印度洋和太平洋周围大陆边缘地带的看重，同时受到了马汉和麦金德的深刻影响。

俄罗斯对中心地带的控制实力，让麦金德备感吃惊；马汉的著作《亚洲的问题》（*The Problem of Asia*）比麦金德的“枢纽”一文还要早4年，他当时就发现了俄罗斯的弱点在于与印度洋温暖水域相距甚远。他说，俄罗斯“与任何开放性海域之间的遥远距离是其先天弱势，并使它在积累财富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既然如此，它有理由感到不满，而这种不满也很容易通过侵略的方式表现出来。”于是，马汉深入研究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特别是其最深层的心理意识流，而地理正是他研究的基础。那些位于俄罗斯南部、印度洋北部的国家，被马汉称为亚洲的“有争议地区”，即“俄罗斯陆权和英国海权之间的冲突区”，中国、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的重要性都得到了强调。这里也正是40年后被斯皮克曼称为大陆边缘地带之处。事实上，马汉在1900年选定的一些枢纽国家，直到当前仍具有地缘政治意义。这不是巧合，地理是不可改变的。

冷战期间的地理刺激，使西方制定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它从欧亚国家的南部梯队实施，涉及该领域内的所有大陆边缘国家。地理确定了

中国的重要地位，这个国家的地域和文明从欧亚的心脏地带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温暖水域；地理也有助于将阿富汗和伊朗确定为心脏地带国家，并成为中东命运的关键力量。

1902年，马汉首次使用“中东”这个术语，来划定阿拉伯和印度之间对于海军战略特别重要的地区。他指出，印度位于印度洋沿岸的中心，其后方侧翼受喜马拉雅山脉的保护，对于中东和中国的海洋渗透战略至关重要。海权的出现，使美国可以在“麦金德式的封闭系统”里，从千里之外影响欧亚大陆，马汉为此提供了方法。

地理决定海权？

马汉的海洋中心论也有缺陷。史特劳兹-胡比在其《地缘政治》一书中解释道，“英国和美国都很推崇马汉学说，豪斯霍弗尔和其他德国地缘政治学者也从中看到了德国飞黄腾达的机会。马汉学说的吸引力在于，它承诺只要以此作为国防理论基础，就可确保世界安全。对于德国来说，只要英国采用该学说，他们就可获得必要的喘息空间，以便组织全面战争。”换句话说，马汉的海权学说一直强势聚焦于大欧亚安全，却没有充分考虑到陆权国家有能力占领从伊比利亚半岛到乌拉尔之间的区域，从而迅速实现对欧洲的包围。

对于这一点，马汉自己也并非毫无知觉。他写道，“海权的适当使用和控制，仅仅是财富积累过程中交换链条的一个环节。”然而，他的思想更适用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海权扩张，而不是用来保持欧洲范围内的权力平衡。用史特劳兹-胡比的话说，马汉心怀“某种诱人的帝国主义”，看到美国的最终目标是超越“从一个大洋迈向更广阔的大洋”的天定命运，并牢牢把控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这将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马汉认为，一个国家要么扩张，要么衰落，如果停滞不前，就不可能保住自己。作为坚定的战术家，他相信通过战舰群形成战列线舰队，必可实现海军力量的强化和集中。

从1883年开始的20年间，马汉出版了19本书籍，可谓一发不可收拾。“诱人的帝国主义”只是他思想中的一个方面。他也是一个民主派人士，尽管他认为民主制度不利于军费开支；他认为一个庞大的船队对美国并非绝对有必要，因此应与英国合作，因为制海权只有通过联盟才能掌控；他认为战争是国家间的非自然状态，但他们却不得不为之时刻作好准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他同时也预见到将来有可能形成跨国海上联盟系统，以保护全球公地安全。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还是不要丑化他为好。

1890年马汉发表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案例研究》（*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书，奠定了他的总体构想。该书对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的思想有重大影响，也促使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加紧海军建设。马汉认为，海洋是文明的“重要高速路”或“广阔的公用区域”，“海上航行一直比陆地更容易和更便宜”，因此海军作为商船队的保护力量，一直在全球政治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他的论点之所以有说服力，不仅在于其独创性，其全面性更是值得称道。

马汉在其史诗性巨著中开宗明义地断言：“一个和平的、有进取心的国家，并不一定也是有远见的国家。充足的军事准备需要有远见卓识的头脑，特别是在目前这些日子里。”马汉既不是战争贩子，也非专制政治的拥护者，恰恰相反，他指出正是因为专制和“无尽的贪婪”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可以成为海权大国，却算不上是伟大的国家。然而，“无论一个民主政府是否具备先见之明和对国家立场的敏感性”，阻止对手的必要性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马汉告诉我们，友好的外国港口在全世界随处可见，但并非永远如此。在和平时期，许多国家都不会去刻意培养对于危机的敏感性，他们的历史学家也常常对大海未加重视，没有意识到这片广阔区域对陆地、对国家的安全和繁荣有多大的影响。因此，他警告说，尽管军事科技迅

猛发展（从木制桨艇到蒸汽船，再到今天的核动力航母和潜艇），但战争的原则一直保持未变。因此，当务之急是撰写海战的历史。他以陆军类比形象地说明这一点：

> 徒步行军被机车部队所取代，后者又让位于铁路运输，距离增加了，时间跨度减少了。但是，作战原则仍然支配着军队的集合地点、调动方向、对敌人的进攻点以及通信保障等，这一切都没有改变。

马汉著作的时间跨度，从1660年航海时代“基本开始”直到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他指出，乔治·华盛顿在总结美国独立战争时，把胜利的部分原因归结于对海洋的控制；而在此几十年前，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失败，部分原因则是对海权的忽视。马汉对海军战术作了全景式的评论，对海洋在人类历史中的关键性作用作了精彩的描述，并将记述范围进一步上溯到更久远的历史中。

在罗马对迦太基的布匿战争中，正是由于罗马对水域的控制，迫使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横穿高卢，长途跋涉，一半以上老兵残将客死征途；而罗马军团通过水路行军，不受干扰，不觉疲倦，在汉尼拔的大本营西班牙与意大利之间，活动自如……”马汉指出，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中没有大型海战，罗马对地中海的掌控是迦太基战败的决定因素。假设地中海是平坦的沙漠，而陆地是沙漠上耸立的高山，占主导地位的海军力量，就如同陆军来回穿越沙漠旅行，从一个山岭翻越到另一个山头。这就是罗马的情况。但是，因为海洋是一个奇特的领域，水手们“从没有历史记录的远古时代起，就在人们视线之外孤独地游弋”，我们对海军的重视，也向来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马汉认为：

> 从本质上说，海军属于轻兵种。它与自己的港口之间通信无障

碍；它能够有效地阻击敌人；它扫荡海上，使之为陆地所用，又可控制着沙漠，那是人类在可居住的地球上生存和发展的地域……

> 击败个别船舶或舰队并不是至关重要的，重要的是拥有压倒一切的海上力量，可以轻易摘去敌人的旗帜，或随它落荒而逃……如果一个国家处于这样的位置，它就不用在陆地上被迫自保，也不必用陆地的方式寻求领土的延伸。通过海洋，它将获得那些只拥有大陆边界的国家梦寐以求的巨大优势。

英国和美国就处于这样的地位，因此历史上都曾长时间以霸主地位存在。但马汉暗示说，美国的地理位置也有其天然缺陷。作为地处温带的巨大岛屿，美国占尽天时地利，当欧亚大陆为了霸权而相互厮杀时，它可以独善其身；但同时也要看到，它离欧亚大陆，特别是太平洋沿岸港口的距离实在太远了，这大大抑制了美国对他们施加影响的能力。马汉在书中也预见到，中美洲的巴拿马运河开通后，美国的商船和战舰编队会与欧亚大陆有更多接触。但距离仍将是巨大的，而且也是“付出巨大代价的事业”。巴拿马运河实际上是对加勒比海的改造，将其从一个“终端”和“本地交通站”改造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海上通道之一”，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船只都可以通过运河一路航行到太平洋。马汉说，有了巴拿马运河，美国“从此将不会像过去那样，那么容易超脱于国际纷争之外”。

地理条件除了使地峡式运河成为可能之外，也必然会促使美国和中美洲及加勒比邻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以便保护运河，并控制附近海域。有了运河，美国与亚洲在物理距离上更为接近，并可通过海运更多地参与欧洲事务；运河还对削弱孤立主义大有裨益，由此引起自由国际主义的崛起，使华盛顿的同盟越发声势壮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地理有指令性作用，却不是最终决定因素。

巴拿马运河是几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将

欧洲国家排斥在外的大国强权政治、选择巴拿马而非尼加拉瓜的幕后交易决策、征服中美洲热带疾病的战斗，此外还有艰巨的劳动和伟大的智慧。而地理则再次为人类的选择提供了环境背景。

马汉也是影响美国选择的因素之一。在他那本富有冲击力的著作荣耀出版的同年，美国军队巩固了美洲大陆，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赢得了最终也是最残暴的胜利。仅仅几年之后，作为战争的结果，美国将获得西班牙帝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取得对加勒比地区的主导地位。

马汉与其说是一位地理学家，不如说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战术家。他吁请美国通过全球海权力量武装自己，他那极具代表性的帝国主义优越感，表现出明显的地理影响痕迹，这也是斯皮克曼对他高度重视的最主要原因。并非斯皮克曼热衷于征服，而是他同马汉一样，直觉地认识到美国将别无选择，不得不卷入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斗争，因为它在西半球的优越地理位置，赋予了它在东半球的影响力。

制海权等于霸权？

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马汉也自有敌手。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安吉尔爵士（Norman Angell，1874－1967）是和平主义精神的捍卫者和倡导者，他于1909年发表《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指责马汉的著作是“滑稽的空谈”。这位英国记者和政治学家，因遭到豪斯霍弗尔的憎恨而名声大噪，此时却对马汉的观点发难。他认为，马汉所说的“将国家权力施加于异族社会”并非体面的事业，因为“国家和帝国与个人一样，除了有身体，更有灵魂”。马汉的荒谬之处在于，他对“个人”这一有形存在全盘否定，并要求其服从于“国家”这个相对无形的存在。安吉尔辩称，“有谁会因为俄罗斯农奴恰好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里而尊重他吗？又有谁会蔑视易卜生……或任何受过教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比利时人或荷兰人，仅仅因为他们属于欧洲最小的国家？”换

句话说，马汉连同斯皮克曼、麦金德等一众地理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都是决定论者和本质主义者，他们的战争倾向来自他们的所见所闻。以赛亚·伯林曾抱怨说，现在国家和帝国似乎比建设它的人还要真实，安吉尔的观点可谓与他一脉相承。

然而，我们需要再次请出豪斯霍弗尔作为陈述理由。马汉等人如果没有参与安吉尔所谓“决定论”战略的制定，就会将大战略领域留给那些真正邪恶的人。这样说来，我们需要马汉这些人的道德缺陷。

安吉尔著作的核心点是说战争和大国竞争不合逻辑，然而本书出版后没过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并在欧洲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世纪战争和冲突。生不逢时的安吉尔随之成为笑柄，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我之所以说“不公平”，是因为他的书就其本身而言可读性极强，读来让人不忍辍手，论证也十分鲜明独到。他的书或可作为“人性光明面”的证明，然而正是因为人性的缺陷遭到地理的扩大，才允许一个像马汉这样的作家几十年来享受的优待比像安吉尔这样的作家多得多。

现在，印度和中国的战略家们比美国人更像“马汉派”，这也是世界权力变化的风向标。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马汉的作品，同时建设舰队以应对海上武装冲突，而欧洲海军仅仅用警察巡逻的方式维护海权。2004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学者一个接一个地引用马汉的话，这就证明了他的影响力”，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詹姆斯·R.福尔摩斯（James R. Holmes）和吉原俊井（Toshi Yoshihara）这样写道，“他们援引的都是马汉最咄咄逼人的训诫，几乎无一例外，比如把制海权等同于霸权，关闭公海，拒绝敌人旗舰进入等”。随着中国海军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对马汉也越发推崇；印度海权的崛起，让中国感到了威胁，而印度方面则同样以马汉式的角度看待中国。

与此同时，美国的海军却似乎已经接受了另一位理论家的思想。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1854－1922）是与马汉同时代的英国历史学家，他在海军战略方面的精明之处在于，他提倡用更少的船舶在海上

做更多的事。科贝特断言，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对海域的控制权，另一个国家也不一定能得到它（马汉也这样认为）；海军联盟看似薄弱分散，但若适当建设，就会有“现实的力量”。科贝特称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舰队”，必要时，舰船能够迅速集结成统一的舰队。这支舰队不需要将对手逼上死路，只要有效地控制基地、把守咽喉要道，就可战无不胜。科贝特认为，这能为有限的国防注入“积极和旺盛的生命力”。他的书出版后，英国皇家海军很快缩减海军规模，同时利用盟国日本和美国的海权相互制衡，当然，这可能只是巧合而已。

现在，美国面临着与100多年前英国类似的处境。美国海军在逐渐减少，战舰从冷战时期的600艘左右，减少到20世纪90年代的350艘，现在只有280艘。因为预算削减及成本超支，这个数字在未来几年和几十年里还有可能降至250艘。正因如此，它热烈欢迎盟友加入，如印度、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海军。2007年10月，美国海军公布了一份文件，题为《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其中更多反映的是强调合作的科贝特精神，而不是马汉所强调的主宰。

这份文件声称，“我们国家的利益，……最好通过促进和平的全球贸易体系得到维护，这一体系将由金融、信息、法律、人民和治理的相互依存网络组成。”在美国海军看来，各国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全球人口加速向人口中心地带聚集，这些地区大多处于海域附近，非对称性的袭击和自然灾害将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困扰。文中提到大国冲突有愈加微妙和不对称的趋势，却很少谈及传统的海陆作战，中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也未得到提及。“集体防务”的精神无处不在，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的资源，为整个海域提供安全保障……”该文件也指出，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海域，将具有首要的战略意义。

用斯皮克曼和麦金德的话说，在欧亚大陆边缘以及更大的世界性海角，正在出现两种明显的趋势。一方面，美国海军拥有的舰队数量趋于下降，但仍然占主导地位。他们遵照科贝特精神进行海上巡逻，与非洲

和东北亚的当地盟军联合保护海上商业安全；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度的力量正在崛起，并遵照马汉的思想武装海军。正是因为中国人对这位有帝国主义野心的美国标志性人物特别重视，美国海军也将无法完全摆脱他的影响。“鼓吹扩张本质上是种误导，”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写道，“这意味着过去350多年来，所有列强都没有理解国际体系的工作原理。”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解释道，“霸权的安全效益是巨大的，”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体系里，却没有世界霸主，“强大的国家都会禁不住受到诱惑而效仿美国，并试图称霸世界某个地区”。

到目前为止，马汉已声名远扬；但他最风光的日子，可能还在后头。

当前，欧亚大陆沿岸的战舰日益增多，以应对其他国家重蹈美国权力覆辙的野心。极地航线的可操作性，尽管可能缩减欧亚大陆和北美之间的距离，却也会使全球范围内霸权斗争的速度和强度大大增加。因此，我们需要探讨一个封闭地理系统的功能。

第8章
从“缓冲垫”到监狱
拥挤的地图

所谓“空间危机”指的是什么？历史上亚洲为何没有出现类似欧盟的组织？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是要确保亚洲的军事平衡吗？为何说核武器的蔓延大大加快了全球化进程？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思想对地缘政治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人口的过度膨胀又将如何在地缘政治上作出反映？

精确制导武器及复杂地形的限制，使得地理的报复变得显而易见，“心脏地带”“大陆边缘地带”和“边缘区”的相互作用，使得地图本身的内聚力和收缩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再加上大众传媒的广泛影响，日益严重的空间危机正在前所未有地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

几年前，我在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任客座教授，所授课程是未来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学期一开始，我就叫海军士官生读《东方的战火：亚洲军事实力的兴起和第二个核时代》（*Fire in the East:The Rise of Asian Military Power and the Second Nuclear Age*），这本书的作者是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布拉肯（Paul Bracken）。

这本简洁而有洞察力的作品1999年出版时并不好卖。尽管文中没有提到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的名字，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精神。布拉肯几乎向所有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提供过评估顾问服务，他绘制了一个欧亚大陆的概念地图，在图上详细描绘出各国冲突的时间和距离，以及对于空白地域的占领——这是威廉·麦克尼尔在他所处的伟大历史时代的末章，提醒过我们注意的事；及至布拉肯写作之时，其发展已到了更具戏剧性的阶段，因此布拉肯断言，“空间危机”很快就要出现了。

布拉肯参考了杰出的美籍匈牙利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的学说。冯·诺依曼担忧地提出，虽然过去空旷的地理条件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安全机制，以应对军事和科技进步，但现在地理已处于下风。无可否认，“有限的地球面积”将日益成为不稳定的力量，而军事的发展又将进一步压缩地缘政治地图上的距离。布拉肯警告说，“我们很容易就会忽视这一点，因为这是一种简单而渐进的变化。”

让我用几页的篇幅来概括一下布拉肯的论文，因为这对我自己的思想发展至关重要。

在美国人和欧洲人关注全球化的同时，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则越来越受到民族主义和军事实力的吸引。布拉肯说，导弹核试验、生物战计划和化学武器的发展，已成为“一个自由繁荣的亚洲制造的副产品”。战争的技术和财富的创造一直紧密相连，西方“没能认识到”这一点。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它的军事也崛起了。

在冷战初期，亚洲的军事力量主要用于伐木屯垦。虽然无人如此定义，但“二战型”军队存在的主要目的即是巩固国家。“军队是一个巨大的思想灌输工具，是以民族主义为核心课程的巨型学校”。士兵主要的工作是帮助收获庄稼，而不是磨练他们的战场杀敌本领。因此军队驻地向国家内部集中，许多国家的军队甚至与他国军队相距很远。但随着国家财富的积累和信息革命的兴起，从盛产石油的中东到太平洋沿岸的“亚洲虎”国家，军事经济均全面发展，在军转民营的后工业化园区里，生产着导弹、光纤电缆和手机。

与此同时，欧亚大陆国家的官僚体制更加趋向高度集权化。他们的军队及其领导人将国内政治派别之争暂且搁下，一致对外，并在此过程中日益专业化，从而更具杀伤力。过去千百年来，面对外敌入侵，政府往往退避到偏远地区；现在的国际边界上电子传感器密集分布并全方位实时监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时处于战备状态，地理已经从“缓冲垫”变为一座座监狱，任何人都无处可逃。

亚洲的概念是由西方海权国家创立的，始于16世纪之初的葡萄牙，并在冷战期间被分割成许多单独的区域。但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自由经济热潮席卷东亚，“太平洋盆地”（Pacific Basin）这个新的大型区域形成了，在此基础上亚洲地图回归其整体性。这种经济成功的故事之所以成为可能，绝非仅仅是以武力相威胁的结果；相反，正是因为军事霸主美国的存在，才保证了亚洲的地区和平。现在，随着亚洲重返单一的有机整体，美国的力量正在慢慢后撤，而中国、印度和其他本土国家的军事实力随之上升。随着区域次单元逐渐崩溃，亚洲变得越来越大；又因为人口规模和导弹射程不断扩大，它越来越令人感到恐惧。武器装备在逐渐累积，同时却没有伴随联盟结构，这样一个亚洲，愈加显得不稳定。

布拉肯解释说，欧洲有许多强大的国家，彼此拥挤在一个狭窄的半岛上，容易相互争夺；而亚洲因为规模巨大，军队之间相距太远，彼此

很难给对方以驰援，因此历史上的联盟从无必要。但现在情况正在变化。如今遍布欧亚大陆的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是步兵部队；各国海军远离母港，游弋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中国、日本、印度、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正在发展通信技术网络，卫星和水下监听设备得到广泛使用。随着“亚洲工业化强国与军事强国成为同义词”，布拉肯写道，大陆简直已经没有出错和误判的空间，事实上成为了“缩小的欧亚棋盘”。

对于这个缩小的棋盘，布拉肯还追加了“破坏性技术”这个不稳定因素。这些技术不是用来维持领导地位和现存全球权力结构的，而是可以“打破现状，破坏秩序”。它们包括计算机病毒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和生物炸弹。布拉肯写道：

> 破坏性技术改变了游戏规则。它通过培育新的技能打破现有优势，并促进不同战略的出现。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动摇了既定秩序，改变了衡量领导地位的标准。

事实上，破坏性技术在宗教狂热的助力下，已把伊朗高原拉到巴勒斯坦的大门口，即使两国地理距离相隔800多英里。伊朗仅仅是某种趋势的一部分。从前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今也获得了战术核武器，美军在两次海湾战争之前设于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大型前进基地，今后将很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这样的发展趋势，将阻碍美国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投射力量，为更加不稳定的、多极化的权力格局铺设了道路。

正是因为可以自由地在全球关键部位部署军事装备，美国才得以保持军事实力优势，但是，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能够摧毁这些前瞻性部署，或者至少使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发挥作用。布拉肯写道；“亚洲的军事霸主并不是亚洲国家，而是美国。因为要保持非对称局面，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军备力量。”然而，美国现在越来越难做到这一点了，因为从前的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在军事实力上有了突破性发展。

几十年来，美国和苏联拥有而不轻易引爆核武器，只是为了玩

弄“政治花招，以便形成威慑力，可以任意发号施令，或者取得其他形式的心理优势”；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这样做，有些是受愤怒情绪的驱使，有些是不愿受制于贫困，或因缺乏有效的官僚机制，不能以负责任的方式控制这些武器的使用。在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以“超然和理性”的方式对待核战争，然而在布拉肯称为“第二次核时代”的当今时代，可能就不是这么幸运了。如今欧亚大陆里挤满了穷国，其中不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布拉肯说：“在亚洲，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就像美国旧西部电影中的六连发手枪一样泛滥。”这个比喻之所以恰如其分，是因为六连发手枪既便宜又致命，有了它人的块头和力气大小都变得无关紧要。正如六连发手枪改变了旧西部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平衡一样，穷国的核武器以及其他破坏性技术，将改变全球权力平衡。突然之间，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得不与一个像伊朗这样的国家打交道，而且几乎要平起平坐。

核武器在亚洲的蔓延，“让世界更少以欧洲为中心”，从而大大加快了全球化进程。欧亚大陆和欧洲自身在地理上的关系将更加密切，许多强大的国家不甘心囿于密闭的狭小空间，必然冲突不断；和平只是作为插曲，为了实现政治上的权力均衡而间或出现。现在倒不会像冷战期间那样有大规模的热核弹头积累，也不会通过彻底毁灭对手来寻求和平与稳定，虽然在这个都市密集的世界上，一个国家仍然能够对另一个国家造成巨大的、几乎令人无法理解的伤害。因此，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需要有最能干的政治家，通过实施梅特涅[(1)]式的权力平衡治国术，来防止大规模暴力的发生。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会进入一个多维边缘政策的世界。地图的萎缩不仅会抹杀冷战时期区域研究者划定的人造地区，也会使麦金德有关“枢纽”的概念与斯皮克曼关于“边缘地带”的概念之间的区别变得不那么明显。一直以来，欧亚大陆已经因技术的重新配置而形成一个有机的

整体。例如，如果有其他国家对伊朗实施军事援助，可能会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以色列引发军事行动；因为电视图像生动直观，落在加沙地带的炸弹可能在印度尼西亚激起民众抗议示威；美国空军可以从位于印度洋中央的迪戈加西亚岛基地攻击内陆封锁的阿富汗；许多国家的军队过去通常囿于本地，现在中国和印度海军则可以沿着整个可通航的大陆边缘地带，从亚丁湾一路部署到南中国海和日本海。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欧亚大陆某个地方呼应另一个地方，而另一个地方又予以反复回应。这并不是对地理的否定，只意味着我们必须为它添加其他因素。地理，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至高无上了。

人口膨胀在地缘政治上的反映

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曾经的担忧，不仅会因布拉肯密切关注的破坏性技术而加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代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这将使欧亚大陆地图患上更严重的幽闭恐惧症。20世纪90年代是冷战后的第一轮知识辩论周期，“现实主义”和“决定论”等词汇遭到诋毁。18世纪后期英国哲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思想被许多知识分子所诟病，认为它过于严酷，充满决定论思想。因为马尔萨斯把人类看做一个对所生存的物理环境作出反应的物种，而不是拥有自我意愿、受思想驱动的个体。当然，马尔萨斯的具体理论，即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加，而粮食供应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显然是错误的；然而，随着世界粮食和能源价格大幅波动，以男性为主的大量贫困人口涌入卡拉奇和加沙地带（中东的索韦托）这样的地方，马尔萨斯作为第一位集中研究人口及穷人生活质量和政治影响的哲学家，已得到了更多的尊重。

目前，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一半人口的年龄都在15岁以下；未来20年，整个大中东人口将从8.54亿增长到12亿，阿拉伯世界人口增长近一倍，尤其是在也门这样的地方，人口膨胀甚至使地下水的供应也显得大为紧张，由此产生了爆炸性的政治副作用。可以想见，马尔萨斯

这个名字，以后我们将会更经常听到。

可能已经没有必要去刻意证明马尔萨斯的正确性了。他的普遍性世界观，与布拉肯关于欧亚大陆空间危机的观念正相吻合。拥挤的大城市，恶劣生活条件的困扰，商品价格轮番上涨，水资源短缺，反应迟缓的市政服务既是传播民主的主要渠道，也是滋生极端主义的肥沃土壤，就连政府自身也将越来越多地由导弹以及重点对外的现代军队武装起来。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将在21世纪占据地理中心。目前世界上已经有25个人口超过1 000万人的特大城市，到2015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40个，但除两个以外，全部集中在以前的第三世界；大东京有3 500万人，一路领先，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垫底，也有近1 200万。在这25个城市中，有13个位于南亚或东亚。在大中东地区，主要大城市包括卡拉奇、德黑兰、伊斯坦布尔和开罗。

关键的事实是，以前第三世界的许多城市只是从名单上漏掉了而已，现在一半以上的人类居住在城市条件下，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2/3。世界上有468个城市人口超过100万，未来几乎所有新出现的城市都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和非洲。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时代，相当大一部分人口居住在城市的贫民区和棚户区；而在麦金德的时代，即20世纪之初，只有14%的人类算是城市居民。

我前面说过，伊本·哈勒敦著有《历史》，或称世界历史的“简介”。书中写道，沙漠的游牧民族渴望定居生活和物质上的舒适，这为城市化提供了原动力；强大的统治者利用其需求为王朝提供安全保障，让城市得以蓬勃发展。但由于统治者对奢华和腐败的痴迷侵蚀了党派团结，行政权力被削弱，使体制最终支离破碎，并为其他形式所取代。

现在，这出剧目再次上演，只不过历史上头一次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城市和大都会已经形成，整个欧亚大陆、非洲和南美洲的农村居民，从不发达的农村向城市中心迁移。这些大都市所在国家的管理者，越来越难以有效地从中央派遣人力，对民众实施有效的管理，只好将这

些集中居住点非正式地分成郊区和自助社区；该地区的地方管理者，也往往是通过电子通信技术的辅助方式，接受来自遥远中央的指令和计划。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伊斯兰教也部分地上演了城市化剧目，其范围横跨北非和大中东，这也是2011年激进的民主示威者推翻各个阿拉伯政权的故事。忘记阿拉伯游牧民族或高原沙漠上绿洲居民的形象吧，现在的他们大多是城市居民，混迹于拥挤破旧的都市民居中。城市生活的人情淡漠，更助长了宗教感情的加深。在古老的村庄，宗教是广义的大家庭之间日常传统和生活的自然延伸；但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穆斯林们逐渐走进了贫民窟式的生存环境，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为了保持家族的凝聚力，让年轻人不致滑向犯罪深渊，宗教必须经过重新改造，刻意显得惊世骇俗，或具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国家的职能因此被削弱了，或至少让它三分，有时甚至不得不容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宗教行为，这些都是城市化推进的后果。最终，新的宗教社区站稳了脚跟，超越了传统的地理障碍，甚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空间格局。

历史上的伟大变化，往往是潜移默化地发生的。辽阔的欧亚和北非大陆有集中的城市、交叉重叠的导弹射程和制造轰动效应的全球化媒体，不断有民众受到半真的谣言和半假的真相蛊惑，并将其愤怒通过卫星电视频道以光速传播，瞬间传遍整个边缘地带和心脏地带的广大空间。反之亦然，民众也会受到社会媒体的驱动，相信专断的当权者对真相的矢口否认。在一个新的时代里，地图将因密集的大城市而变得拥挤灰暗，民众反而成了关键。这一庞大的人群放弃了自己的个性，凝聚成为令人惊叹的集体性符号。

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是一位保加利亚出生的西班牙裔犹太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对于民众的暴力感到愕然和惊恐不安。当时正值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货膨胀席卷法兰克福和维也纳，卡内蒂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研究各种形式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他于1960年出

版《群众与权力》（*Crowds and Power*）一书，提出了一个标志性的见解，即人人都渴望加入某种群体里，哪怕是暴民群体也没关系，因为群体可以为其提供规避危险的庇护所。他推断，人们可以由此摆脱孤独无助的境地。民族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对民主的向往等都是群体形态的产物，是人类摆脱孤独的表现；也正是这种孤寂感最终导致了传统权威的崩溃，以及新权威的建立。孤独是城市存在的独特特征，那里到处都是陌生人，真正的朋友和家人相对较少。正因如此，21世纪新城市地理的最大特征，即是一幅幅充满激烈个人向往的地图。

即使有人不愿承认，我也不得不说，其实乔治·奥威尔作品中有关暴政的描写，很大程度上表现的也是人类的一种倾向，即宁愿出让个人自由来换取保护和与组织的亲密接触。在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有一个人物这样说道："总是夹在人群中和别人一起叫嚷，那就是我说话的方式。人多势众，是保证安全的唯一办法。"作家托马斯·品钦也认为，互联网提供一种虚拟的群体保护，并由此"实现了空前规模的社会控制，这是20世纪那些留着滑稽胡须的旧式暴君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与此同时，媒体放大了即时性（presentness）的影响，愤怒、狂喜、美德、恶行……无论什么情况，不管是好是坏，只要是目前的情景即可。换言之，在大众媒体时代，政治成了我们所经历的最紧张的事，因为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已被一笔勾销了。

群体心理作祟下的民族主义

带有技术含量的群体心理，在奥巴马的竞选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并刺激了2008年华尔街的恐慌性抛售。在2002年印度古吉拉特邦发生的针对穆斯林的大屠杀中，这种心理起了很大的作用；2003年欧洲爆发民众示威游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它起了作用；2009年和2010年，在伊朗发生的亲政府和反政府示威中，它起了作用；同一时期，在曼谷发生了反对泰国政府的大规模民粹主义集会，它起了作用；在西岸和加沙地

带，连绵不断的反以色列示威游行中，它也起了作用。

欧亚大陆的大城市是群体心理能够发挥最大的地缘政治影响之处。思想的确很重要，自由的人文主义和反决定论者都宣称认可这一点。而且，正是地理的紧缩，为新的和危险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最佳环境，当然也为健康的民主化思路提供了有利条件。

大众教育之所以重要，除了它对社会进步的促进功能以外，也是因为它会从客观上使一群受到误导性教育的人从宿命论中解放出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生存空间不足将是关键因素。民族认同的心理大熔炉加快了城市的发展，使之取代了过去理想化的田园风光。当然，城市人群有时也会要求他们的政府奉行最高纲领的外交政策，而这正是以理想化的地图为基础的。

在这一进程中，媒体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中写的那样：

> 没有哪个驯兽师指挥的动物，比媒体指挥的还要多。……只要对那些大众读者一声令下，他们就会涌塞街道，一根筋似地奔向指定目标，……这简直是我能想象的最令人惊奇的关于思想自由的讽刺画了。从前一个人不敢自由地去思考，现在他敢了，却已无能力思考。他对于思考的意愿，其实仅仅是愿意对别人的命令作出响应而已，却让他感觉自己获得了思想自由。

斯宾格勒有些过于悲观和愤世嫉俗了。不过，回想一下冷战时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仇恨，隔着海洋和北极的冰天雪地，通信技术尚不发达，没有种族歧视的基础，因此是冷静和抽象的。但现在和未来铺天盖地的传媒网络，就像机场里巨大的平板电视屏幕，你只能收看，不能关掉。这使得原本相隔万里之外的国际事务都显得近在咫尺，而且愈发个性化。于是，我又想到了布拉肯的话：

> 西方人很难理解亚洲人在宗教、种族和领土纠纷问题上所投入的感情。国家内部的混乱和问题，一经大众传媒煽风点火或受到寻找国外替罪羊的政治逻辑驱使，就可能很快蔓延到整个地区，并跨越国界。这样，国家领导人就可安然退至光线照不到的墙角了——对于那些拥有并可任意处置原子弹的人群来说，这也是危险的地方。

布拉肯警告说，民族主义被西方观察家“危险地低估了”，他们把它看做复古倾向的一部分，可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一步跨过。“21世纪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民族主义与亚洲的新破坏性技术相结合的趋势”。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新的核大国里必然存在穷人和低收入阶层，他们将成为心怀不满、血气方刚的民族主义者的催化剂。这个时代里新的军事符号不是军队，而是导弹和核武器，它们也将作为群体的新图腾存在。虽然拥有导弹的自豪感有助于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从而使一些国家的国力增强，但群体心理现象伴着媒体的推波助澜，会将不同的民族、宗教和宗派团体、民间团体以及倡导民主普遍性的各种团体集结起来，削弱另一些国家的国力。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会在应对全球化的战争中缓慢而无情地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官僚能量在长期的战争中消耗殆尽，疲于应付不断涌来的难民，难以适应过于庞杂的城市管理工作。总之，随着欧亚大陆的地图变得更小，技术的进步和人口增长也将使人为边界从内部受到削弱。

杀伤性武器和大众传媒带来的地理报复

理解21世纪的地图，意味着要接受的矛盾。当一些国家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变得更加强大时，其他国家，尤其是大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就会相应地受到削弱。然而，这些国家的文化和宗教传统衍生出一些次国家军队，在一些特定地域的战斗中，他们比国家军队更具杀伤

力。南黎巴嫩的真主党，斯里兰卡北部前泰米尔猛虎组织，印度东部和中部的毛派“那夏里特”运动（Maoist Naxilites），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亲塔利班组织和其他普什图族部落集团，阿富汗塔利班本身，以及2006年至2007年内战期间伊拉克境内多如牛毛的民兵组织，都是特定地形条件下的次国家军队趋势日益明显的例子。

在当今时代，精确制导导弹可以准确摧毁数百英里之外的指定房舍，同时确保相邻的房子完好；而一小撮非正规军也同样可以利用一些复杂艰险的山区地形，给一个超级大国带来相当大的困扰。在后一种情况下，地理的报复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前一种情况来看，这些导弹要想成功发射，就不得不借助于某一块陆地或海上基地，这也使我们重新与地理拉上了关系，尽管是不太亲密和不那么传统的一种关系。斯皮克曼的印度洋大陆边缘地带，对于美国军舰的部署是至关重要的，其导弹的矛头对准伊朗和阿富汗这两个心脏地带国家的纵深腹地；其中阿富汗陷入部族冲突，分裂成许多部分，几乎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一样多。斯皮克曼和麦金德在20世纪初的伟大构想，既与那些古代思想共存，又与我们自己的时代息息相关。

众多而密集的贫困城市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沉重的负担，让建国立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艰难。这是僵化的独裁统治崩溃的原因，也是年轻的民主国家的弱点。一个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几乎不可能提供起码的市政服务，或保护人民免受自杀式炸弹袭击。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如尼日利亚、也门、索马里等，时常处于次国家民兵组织的围攻之中，几乎难以为继。特别是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用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对自己的处境表示抗议，却对建国所需的基本条件避而不谈。黎巴嫩真主党也是这样，它可以在任何时候推翻贝鲁特政府，但却迟迟不肯动手。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建立和维持，有些规则是不得不遵从的，既然这样，还不如追求一些更容易的目标来得实际些。

所以，在这个超级城市和大众媒体的时代，我们面临一个新概念：无国籍的力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客座教授贾库柏·格瑞吉尔写道，“国家是一种负担”，所以这些次国家群体“只顾寻求权力，而不承担执政的责任”。现代通信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容许这些团体组织纷纷坐大，寻求外国的帮助，用致命性武器来武装自己，从而打破国家对暴力机器的垄断。

正如我前面所说，工业革命讲究一个“大”字：大飞机、大坦克、大航空母舰、大铁路、大工厂等。而在后工业革命时代，讲究的是小，微型炸弹和塑料炸药并不需要一个国家腾出一块领土来部署。小型的无国籍组织，正是这种新技术时代的受益者，而没有必要组成国家的理由也越来越多了。格瑞吉尔写道：

> 国家之间，特别是列强大国之间相互摧毁的能力越强，建立国家的风险就越大，对于那些以挑战现有政权为目标的团体来说更是如此。

他继续说，对于那些受到宗教狂热或意识形态极端主义驱动，突发奇想地提出绝对化目标的人来说，国家的形式并不适用。在当前时代，人口向城市平民地区大规模迁移，并切断与传统农村的联系，进一步推动了沿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南部的激进化进程，许多地区甚至变成了典型的“愤怒地带”。大众传媒有机会接触他们并宣传他们的要求，这个过程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身份认同感，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思想家”由此出现；他们对国家是否忠诚，并不是判定其身份的决定因素。总之，如果我们稍微退后一步，考虑一下有关情况，我们就能得到一张新的欧亚大陆地图。这张地图把整个大陆看成是统一的板块，而不是冷战时期的区域研究部门划分的、我们已经习惯的小块地区“拼图”。

在这张新的地图上，出现了一些之前几乎不存在的触点和通信节点。扩展的城市，重叠的导弹射程范围，相互交织的意识形态，加上大

众传媒推波助澜，使它显得更加混乱不堪。新的道路、港口和能源管道，把中东和中亚与欧亚大陆其他部分联结在一起，从俄罗斯经印度洋到中国均已连成一片。

随着不同的文明体密集地相互交叉，媒体作为经常性愤怒的出气筒和受压迫群体释放民间压力的渠道，对于安静的幕后外交的需求从来没有这么强烈。一场危机将会并入下一场危机，“保持冷静”成了每个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常彼此告诫的箴言。

由于地图本身所具有的内聚力和收缩性，“心脏地带”、“大陆边缘地带”和“边缘区”等意味着从水平层面将大陆分成若干大区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将不再那么贴切了。但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这些地区之间永远存在的相互作用，有可能带来各种各样的结果：就好比说，一块手表或计算机芯片虽然小却十分复杂，想要了解手表或芯片的工作原理，就必须对其加以分解，才能看到其中一部分如何影响其他部件一样。飞机、互联网、对广大城市中越来越彼此雷同的政治手段的关注，都必然会削弱地图的重要性；而且，互联网若脱离了网络载体，转化为口头形态，可能会把领土战争变成一种思想的战争（这也是我们迫切需要坚持以赛亚·伯林的人文主义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各国不管如何武装自己，都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正是因为民主和网络空间对于次国家体和超国家力量的推崇和善待，较小的区域将更大胆地突破底线，正如他们在中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做的那样。

然而，我们当下居住的这个“政治制度封闭化”的世界，在20世纪的进程中已进一步关闭了，正如布拉肯注意到的那样；就连地图也受制于熵函数定律[(2)]，这意味着一种平衡状态终将形成：地图上包括大城市在内的每个人类居住区，都会越来越彼此雷同，并表达出相似的情感诉求。根据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兰德尔·L．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的研究，这会导致“因过度刺激引发的全球性倦怠……由令人不安的个人极端主义和国家的故作教条姿态混杂而成”。换言之，世

界将比以前更加无聊，更加危险。

但在这种了无生气的局面完全掌控世界之前，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社会动荡、权力转移以及自然的地缘政治演变，都可以参照地图得到有效描述。

现在，到了深入探索全球各地区的时候了，特别要重点关注欧亚大陆这个超级地带。要牢记我们从历史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和其他思想家那里学习到的东西，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会尽量与读者分享他们的情感和理论。

> 我会写到欧洲，它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相邻，受到它很大的影响；
>
> 我会写到俄罗斯，它是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本身；
>
> 我会写到中国，它有可能在未来数十年里主宰心脏地带以及斯皮克曼所说的大陆边缘地带的一部分；
>
> 我会写到印度次大陆，这里形成了大陆边缘地带的核心区域；
>
> 还有伊朗，它是心脏地带和大陆边缘地带实际交汇的地方；
>
> 土耳其和阿拉伯中东地区，这里是霍奇森所谓的“一世界”；
>
> 最终，我将落笔于北美，这是麦金德的大陆卫星国中最大的区域，并对欧亚大陆和世界岛提出了挑战。

我会尽量不作预测，而是着力描绘地理对历史的影响，从而模糊地管窥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

---

(1) 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和首相。倡导“均势外交”，周旋于欧洲大国之间，寻求国际力量的平衡，从而维护和扩大了奥地利的利益。后来的历史学家将当时的欧洲格局称为“梅特涅体系”，而1815年之后大约十几年的光景是梅特涅体系的黄金时期，被称为“梅特涅时代”。——译者注

(2) 熵（shāng）指的是体系的混乱程度。1850年，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首次提出熵的概念，用来表示任何一种能量在空间中分布的均匀程度，能量分布得越均匀，熵就越大。——译者注

第9章

欧洲分裂的地理根源

被割裂的“大欧洲”

麦金德认为欧洲的命运是由成群结队涌入的亚洲游牧民族塑造的，随着欧洲在能源、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亚洲，这是否意味着欧洲的命运仍旧受到亚洲的支配？

欧洲地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其发展带来优势的同时，也造成了欧洲的条块分割。为何说欧洲当前以货币形式出现的经济分歧，实际上有一定历史和地理的基础？

德国的中心地理位置及其内在文化态度，将怎样决定欧洲的走向？希腊何以成为整个欧洲乃至西方的发端与终点？

在谈到当代地缘政治频繁的动荡和变革时，重点自然会集中在非洲和亚洲，即从中东到中国的这片区域，而欧洲往往会排除在这个坐标轴以外。但这是错误的。

欧洲联盟有5亿人口，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其经济规模达16万亿美元，比美国还要大；欧洲的西端与北美的心脏地带遥相呼应，它同美国一样靠近南美洲南锥体，甚至连距离都差不多，从它的东端则可俯瞰非洲和欧亚大陆；此外，欧洲位于东半球的中心地带，是一个“陆地半球”，事实上，它与俄罗斯远东的距离和它与南非的距离相等。综上所述，我们对世界政治地理的解释理应从欧洲开始。

麦金德、斯皮克曼、摩根索以及我们曾提到过的其他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表达的都是欧洲人的立场和观点。因此，看看世界自他们那个时代以来经历了何种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他们起步的地方再次前行。虽然马歇尔·霍奇森有关近东“一世界”居首位的观点显然是对的，但我会将它当作我们旅程的高潮之一而非起点；虽然是从欧洲出发，我们也将综合考察俄罗斯、中国、印度次大陆和大中东地区的地理，对于这一点读者不必担心。总之，要了解21世纪的地缘政治，必须从20世纪现代化的起源地，也就是欧洲开始。

麦金德说过，欧洲的命运是由成群结队涌入的亚洲游牧民族塑造的。在21世纪，欧洲与东方的关系将继续给它带来关键性影响，特别是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欧和东欧想要进一步发展，成为繁荣稳定的国家带，从而保护整个欧洲不受俄罗斯威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知识分子与麦金德有着同一个梦想，那就是：实现“中部欧洲”的复兴。

然而，在欧洲寻求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统一时，它也将继续受到其内部分歧的困扰。这些困扰从表面来看是经济方面的，如德国对于希

腊债务危机的愤怒，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永恒的地理真理的表达形式。也就是说，这体现了北欧的德国、地中海的希腊和巴尔干欧洲的不同发展模式。由于欧洲的人民运动主要是由技术促进的，因此其历史发展越来越频繁地与南边的非洲和东方的亚洲交织在一起；但是，欧洲内部的多样性仍然存在。换句话说，欧洲目前虽然没有面临传统军事威胁，却可能成为自我陶醉的牺牲品。反过来讲，斯皮克曼担心统一的欧洲可能挑战美国，还显得为时过早。

尽管现在设立了许多泛欧机构，但欧洲地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包括海洋、半岛、河谷和群山的不同地貌，以及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民族国家，都将在未来岁月里继续促进欧洲政治和经济上的分裂。即使从地图我们也可以看出，欧洲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热词，频繁亮相各大报章的头版头条。

欧洲的地理与未来的命运

用牛津大学考古学家巴里·坎利夫（Barry Cunliffe）的话说，欧洲是亚洲大陆“西边的赘疣”，这个从欧亚大陆伸出的巨大半岛，在第二个千年期间竟然主宰了世界政治。这一切都源于地理，我们可以从麦克尼尔以及坎利夫对麦克尼尔理论的阐释中得到更好的解释。得益于海湾暖流调和的气候，欧洲处于非洲的沙漠和北极冰盖之间最宜居的生态区中。欧洲资源丰富，盛产木材、石材、金属和毛皮，最关键的是，其海岸线旁逸斜出，犬牙交错，有许多天然良港和小岛、小半岛。欧洲海岸线长达23 000英里，足以绕地球一圈；事实上，论海岸线与陆地之比，欧洲远远高于其他大陆或次大陆。

在欧洲边界上，有4个封闭或半封闭的内海，它们将这个次大陆挤占为一个相对狭窄的半岛，这4个内海是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和北海。欧洲拥有极佳的河流地形，莱茵河、易北河，特别是多瑙河，简直是天赐的跨半岛优良河道。痴迷于中欧文化的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

格里斯（Claudio Magris），对多瑙河不吝溢美之辞，称它“汲取德国文化之精华，承载着奥德赛的梦想，一路向东流淌，与其他文化交融着，混合着，蜕变着”。这里也有摩拉维亚峡谷、布伦纳山口、广阔的平原和通过法国的罗纳河谷，它们成为了从欧洲一部分通向另一部分的走廊。

欧洲享有陆地与海水相衔接的巨大优势，既无海啸破坏之虞，又有出入浩瀚大海的门户，这使其具有无限的海上活力，欧洲各国人民之间的流动亦畅通无阻。然而，欧洲的复杂地形和气候环境，反过来又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并最终以强权政治的形式爆发：从古代雅典、斯巴达、罗马、伊比利亚、腓尼基、斯基泰和其他蛮族之间的相互交战，到普鲁士、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争夺，再到当今时代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

尽管欧洲矛盾冲突不断，但数百年来旅客仍可通过大西洋到黑海的低地走廊，舒适便捷地跨越欧洲全境，欧洲的凝聚力和自身优越感由此产生，这也在马格里斯的散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欧洲全境范围内的直线距离都比较短，这一事实已经成为统一的另一大元素：从里斯本到华沙，即从欧洲一端到另一端，距离只有1 500英里。换句话说，地理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主权合并等方式，确定了一个“大欧洲”的概念。这是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的地理表达，这种和平安定的趋势，以及对各个历史时代破坏性军事冲突的反思，也是数千百年的物质和知识进步的产物。然而，在各国相互冲突的时候，欧洲绝非铁板一块。当今以货币危机形式出现的经济分歧，实际上有一定的历史和地理的基础。

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提过，柏林墙倒塌前后的几年里，知识分子为中欧的复兴而欢欣鼓舞，把它视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自由主义灯塔，可以且理应为邻近的巴尔干乃至更远的第三世界地区所效仿。但事实上，21世纪欧洲的政治核心位于中部欧洲稍微偏向西北的区域，从比

荷卢经济联盟[(1)]国家开始，向南延伸至法德边境的阿尔卑斯山一带。也就是说，它包括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海牙的欧洲法院、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小镇，以及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等。

事实上，所有这些地方是由一条从北海南下的线贯穿着的，这条线也是公元9世纪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的生命线和重要通路，这是现代欧洲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的发现。如今的欧洲超级国家联盟主要集中在中世纪时代的欧洲核心地带，查理曼帝国的首都亚琛仍然处于其正中心，这决非偶然。因为在这块大陆上，再找不出任何一个地方，比这条旧世界文明的脊柱、这块海陆交界处更富饶和伟大了。

在比荷卢这三个低地国家，有通向大海的开放式港口，它们与英吉利海峡的入口和一系列荷兰岛屿一起，形成了一道重要的保护屏障，让这些小国享有与其大小不成比例的优势；紧靠北海沿岸的后方，有许多因蕴藏着无限的财富而受到保护的河流和水道，为商业、迁徙和政治进步提供了广阔前景；欧洲西北部的黑土地土质肥沃，森林也为其提供了天然屏障；最后是北海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寒冷地带，与温暖的南部阿尔卑斯山气候相比有足够的挑战性，考验着从青铜时代晚期以来人类的意志。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撒克逊人和弗里斯兰人，从近古时期就定居高卢，生活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和沿海低洼地带。这里在9世纪成为法兰克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事试验场，勃艮第人、洛林人、布拉邦人、弗里斯兰人，以及特里尔和列日城邦，也都纷纷到此一试身手。他们后来集体脱离了罗马，并演变成驱动当今欧洲联盟运转的政治实体。

当然，罗马建立在以上这些政体之前，古希腊又在罗马时代之前。用麦克尼尔的话说，这二者构成了“古代文明”世界的前庭，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其发源地，通过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和安纳托利亚半岛，直达地中海北岸。众所周知，文明起源于温暖河谷的保护和孕育，如尼罗河和两河流域，并继续迁移到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地区、北非、

希腊和意大利半岛等气候相对温和的地区，那里的人们只要掌握了初步的技术，就可以很容易地生存下去。

尽管欧洲文明是在地中海沿岸奇葩初绽的，但到了技术更先进、人类行动力更强的时代，仍然继续向北方发展，并适应了更寒冷的气候。公元伊始，罗马帝国扩张至此，为东南部的喀尔巴阡山脉到西北的大西洋，也就是中欧的大部分及靠近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地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秩序和国内安全保障。大型聚居地，即凯撒大帝称为“欧匹达”（oppida）的城市，在这片延绵广阔、覆盖着森林、灌溉条件良好的欧洲中心腹地随即出现，为中世纪和现代城市提供了初步发展的基础。

罗马的扩张为欧洲北部所谓的野蛮人部落带来了相对稳定，同样，罗马的分裂也在千百年来促进了我们现在已非常熟悉的那些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一点，在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2]结束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中得到了正式确认。学者威廉·安东尼·海（William Anthony Hay）解释道：“来自大草原和外围游牧部落的压力形成了连锁效应，推动着其他过着半定居生活的群体进入了因罗马政权崩溃留下的真空地带。”也就是说，罗马帝国的崩溃加上大草原民族的进攻，推动了欧洲中部和西北部民族群体的形成。

地中海对于古代社会的地理屏障作用，随着罗马的腹地失守而受到了削弱，中世纪由此诞生了；阿拉伯人席卷北非，更是将地中海的统一一举打破。到公元11世纪，欧洲地图已经有了现代化的轮廓，法国和波兰的地形与目前相去不远，神圣罗马帝国沦为德国统一的幌子，波希米亚则以布拉格为中心，显现出捷克共和国的雏形。历史，就这样向北移动了。

尽管地中海社会在政治上不断创新，雅典民主与罗马共和国相继出现，但用法国历史和地理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说，其主要特征仍是“传统性和僵化刻板”。地中海土壤质量差，大领主们因此将许多土地据为己有，这使得社会秩序趋向于一成不变；而欧洲北部的森林空地土

壤较为肥沃，更自由的文明在那里有发展空间，并借由封建主义的非正式权力关系得以维系。这种文明也允许一些新技术优势，比如活字印刷术发挥其最大作用。

布罗代尔的解释可能有些决定论的意味，但它对于描绘欧洲历史演变的背后动因确实有一定作用。当然，扬·胡斯、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等新教改革的关键人物（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关键人物），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北欧得以迅速崛起，成为现代史的舵手之一；但是若没有畅通的河流和入海口，富含煤炭和铁矿石的黄土等作为个人活动和工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在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兼收并蓄、伟大辉煌的大帝国次第出现，其中包括12世纪的罗杰二世在西西里岛建立的诺曼王国；另外，随着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作品和马基雅维利的世俗现实主义在世上传播，文艺复兴运动也自中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蓬勃兴起，对此我们尤其不能忘记。然而，最终推动全球航线开辟的却是寒冷的大西洋，它将地中海的封闭局面一举打破。尽管葡萄牙和西班牙得益于其所处的半岛突出位置，成为大西洋贸易的早期受益者，但在启蒙时代之前，他们却因邻近北非穆斯林而惨遭占领，最终在与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的海洋竞争中败下阵来。正如查理曼的神圣罗马帝国取代古罗马，近代的北欧亦已成功取代了南欧，矿产资源丰富的加洛林核心区以欧洲联盟的形式胜出。所有这一切都是地理在起作用。

中世纪的地中海被一分为二，西有法兰克，东有拜占庭。在此之下还有许多令人头疼的细分法，不仅像当今一样有南北之分、东西之分，西北部和中心之间还有分野，待会儿我们也将看到。沿多瑙河流域有一条迁徙路线，向东穿越匈牙利大平原、巴尔干和黑海，经过里海沿岸和哈萨克草原，直到蒙古和中国；沿着大平原一路向北，则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俄罗斯。这一地理事实，为东斯拉夫人和突厥部落等入侵者一波波地向东进犯创造了条件。麦金德在他的“枢纽”一文中对此有细致的描写，这也极大地塑造了欧洲的政治命运。所以，就像有加洛林时代的欧洲、地中海时代的欧洲一样，来自东方的入侵也造就了拜占庭和奥斯曼

帝国的欧洲、普鲁士的欧洲和哈布斯堡王朝的欧洲。所有这一切都缘于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并通过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延续至今。这些模式之间的区别，是不会因单一货币制的创立而被简单消除的。

例如，在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被分为东西两半，罗马仍然是西部帝国的首都，而君士坦丁堡则成为东部帝国的首都。西罗马帝国后来让位给更靠北方的查理曼帝国以及梵蒂冈，也就是所谓的西欧；东部的拜占庭帝国则主要由讲希腊语的东正教徒组成，当奥斯曼土耳其人从东部迁徙而来，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时，那里住满了穆斯林。东西两大帝国的边界，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多民族国家的南斯拉夫中间横穿而过。1991年前南斯拉夫在暴力冲突中的分裂，至少在最初阶段呼应了16个世纪以前罗马帝国的分裂。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自命为正统的继承人，可从奥匈帝国回溯到西罗马帝国；塞族信奉东正教，是东罗马遗产奥斯曼-拜占庭的继承者。喀尔巴阡山脉横卧前南斯拉夫东北部，将罗马尼亚分割成两部分，部分地强化了罗马和拜占庭之间的分界，也即是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苏丹之间的分野。

在这些难以逾越的崇山峻岭之中有一些商贸路线，把中欧深厚的文化积淀带到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但是，即使是喀尔巴阡山脉也并非坚不可摧的边界，就像阿尔卑斯山一样，只能说是一种渐变，标志着天平从欧洲一个部分倾向另一部分。东南欧地区不仅比西北欧贫穷，也比不上有着普鲁士传统的欧洲东北部。也就是说，贫穷的巴尔干地区不仅跟比荷卢经济联盟国家没法比，甚至比波兰和匈牙利还要落后。

柏林墙的倒塌使这些分歧对比更加鲜明。华沙条约使莫斯科统治下的帝国日渐羽翼丰满，并以其军事占领和计划经济导致的持续贫困作为显著特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的44年期间，普鲁士、哈布斯堡王朝、拜占庭-奥斯曼帝国的欧洲，统统被困于苏联的国家监狱里，它们只有一

个统称，即“东欧”。与此同时，西欧的欧洲联盟正在形成，早期是煤钢共同体，后来发展为欧洲共同体，并最终成为欧洲联盟。参与国家范围从原加洛林王朝的法国、德国和比荷卢经济联盟国家，到吸引意大利和英国加入，直至后来的希腊和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由于在冷战期间占了先机，处于北约内部的加洛林欧洲部分显得比普鲁士的东北欧和多瑙河的中欧更为繁荣，后者在历史上原本也是富饶的，只是在华沙条约组织里待得太久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开进中欧，将一次完整的历史轮回划上了句号。这一事件证实了麦金德的论断，即亚洲的行动塑造欧洲的命运。当然，我们不应过多强调这种决定论，因为如果没有阿道夫·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也就没有后来的苏联开进了。

但希特勒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景况：由于统一德国的复兴，欧洲的权力平衡将比查理曼王朝时期稍微向东转移，转向普鲁士与中欧的合流交汇处，在德国经济力量的支持下，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多瑙河上游地区随之振兴。地中海海岸和拜占庭-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将被远远抛在后面。这两个地区交汇于多山的希腊半岛，在经济和社会上是欧洲联盟成员国中最受困扰的。希腊位于霍奇森所谓的近东“一世界”的西北边缘，是古代地理的受益者。在这个位置上，埃及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的严酷统治变得柔软和人性化些了，“西方”由此诞生；但在今天北方国家主导的欧洲，希腊发现自己站错了位，处于东方化的末端，虽比保加利亚和科索沃等地稳定和繁荣一些，也仅仅是因为它很早就脱离了苏联阵营。希腊企业的3/4是家族企业，依赖家庭劳力，所以最低工资法并不适用，那些没有家庭关系的人甚至得不到晋升。这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现象，并具有其历史和地理根源。

的确，地理可以解释很多事。华沙条约组织解体时，以前受到禁锢的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走向，几乎完全取决于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其

中，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还有匈牙利和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希米亚地区发展态势良好，而南部的巴尔干国家却陷入了贫困和动荡之中。尽管20世纪巨变频发，普鲁士、哈布斯堡王朝、拜占庭和奥斯曼统治的遗产仍然与当今时代息息相关。这些帝国是地理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产物，他们全都受到麦金德所谓东方迁徙模式的影响。

因此，让我们再看看11世纪的欧洲地图吧：神圣罗马帝国像统一的德国一样，处于其中心位置。周围全是地区性国家，如勃艮第、波希米亚、波美拉尼亚和爱沙尼亚；西南则有阿拉贡、卡斯蒂利亚、纳瓦拉和葡萄牙。21世纪成功的区域故事，主要集中在加洛林欧洲，如巴登-符腾堡州、罗讷-阿尔卑斯大区、伦巴第大区和加泰罗尼亚。托尼·朱迪特提醒我们，这些地区居住的大部分是北方人，看不起“落后、懒惰、靠接济过活”的地中海南岸居民，甚至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加入欧洲联盟心生恐惧。这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外围地带邻近中东和北非，其居民普遍（虽非绝对）被看做失败者。但也有例外，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超国家联盟就处于偏北的次区域，它对巴登-符腾堡州和加泰罗尼亚的作用使其从一刀切或连锁店式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占有历史上固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精神中心，得以蓬勃发展。

除了对欧洲周边的失败成员表示不满以外，繁荣的北欧地区中也充斥着对社会解体的不安感。欧洲各国人口出生率陷入停滞，老龄化趋势加剧；到2050年，欧洲将失去24%的主要劳动年龄人口，而60岁以上的人口将增长47%。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第三世界青年移民到欧洲，以支撑这些老龄化的福利国家。穆斯林统治欧洲的说法未免夸大其辞，但穆斯林在欧洲主要国家所占的百分比到本世纪中叶将翻倍，从目前的3%增至10%将会是不争的事实。在1913年欧洲人口比中国还要多，到2050年欧洲、美国、加拿大的人口总和将只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2%，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33%相比有大幅下降。欧洲所占人口比例正受到亚非的挤压，而欧洲人口本身也包含了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和中东人。

事实上，欧洲的地图正在南移，再次涵盖整个地中海世界，在罗马时代、拜占庭和奥斯曼土耳其时代，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过。几十年来，专制政权扼杀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也助长了极端主义政治，北非因此与地中海北部边缘切断了大部分联系，仅为该地区提供经济移民；但随着北非国家在民主政治方面的混乱演变，它们与欧洲政治和经济的互动也将成倍增加。而且，一旦改革派政策创造新机遇，一些阿拉伯移民将返回自己的家园。在后殖民地时代，地中海地区将成为一个连接带，而不是它过去扮演的分离器。

1989年民主变革后，欧洲东移并重新吸纳了一些苏联的卫星国，现在则向南扩大，吸收了阿拉伯革命的成果。突尼斯和埃及不会加入欧洲联盟，但他们会成为欧盟深度介入的阴影区。因此，欧盟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雄心勃勃，同时也更加庞大笨拙。正如麦金德所说，撒哈拉大沙漠从北部切断了赤道非洲，因此将成为欧洲真正的南部边界。尽管欧洲联盟备受分化、焦虑和与日俱增的阵痛困扰，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后工业中心之一。因此，其内部正在向东进行权力转移，从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到柏林，从欧盟到德国，将成为全球政治的关键。德国、俄罗斯和仅有1 100万人口的希腊，将最敏锐地揭示出欧洲的命运。

亚洲仍然支配着欧洲？

德国统一的事实，意味着欧盟的影响力比其分裂时期降低了，因为统一的德国位于欧洲心脏地带，在地理、人口和经济上处于优势。德国现在的人口是8 200万，法国则是6 200万人，意大利近6 000万人；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65万亿美元，法国则为2.85万亿美元，意大利2.29万亿美元。更为关键的是，法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冷战时期的西欧国家，而德国经济的影响则包括西欧和前华沙条约国家，这得益于它的中心地理位置，以及与东西双方的贸易联系。

除了地理位置横跨海上欧洲和中欧以外，德国在贸易活动中持有一种内在的文化态度。时任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诺伯特·沃尔特（Norbert Walter）曾告诉我："德国人更愿意主导实际的经济活动，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活动。我们留住客户，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发展市场和人脉关系。"这种能力由一种特别的动力所支持：正如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向我解释的那样，"众多的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零开始，因此他们是积极进取的现代主义者。在这里，现代主义和中产阶级文化已提高到意识形态的地位"。

统一的德国也有利于在空间上组织起来，发挥欧洲北部地区繁荣时代的优势。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后，产生了一系列独立小国，他们的传统仍然引导着德国的联邦制度；这里没有像巨大的压力锅一般的庞大首都，转而代之的是一系列规模较小的都市，即使在柏林重建的时代，也能各自设法生存；汉堡是传媒中心，慕尼黑是时尚中心，法兰克福是银行业中心，铁路网络均匀地向四面八方辐射开来。此外，因为德国的统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接近完成，因此各区域特点得到了较多保留，这在今天的欧洲是比较有利的。最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柏林墙的倒塌仍然算是"最近"的事情，其趋势需经几十年才能完全显现。它把德国与中欧重新连接起来，并以极其微妙和非正式的方式重建了12世纪的第一帝国和19世纪的第二帝国，几乎相当于整个神圣罗马帝国。

除了柏林墙的倒塌之外，释放德国地缘政治力量的另一个因素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与波兰的历史性和解。美籍波兰裔国际关系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写道："通过波兰，德国的影响力可以向北辐射到波罗的海国家，向东辐射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换句话说，德国的势力通过更大的欧洲以及作为独立实体重现的中欧得到了扩大。

在这一演变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准和平主

义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持续。正如英国战略家科林·S.格雷（Colin S. Gray）写的那样，“几朝被蛇咬……在索姆河上的失利，在凡尔登战役的惨败，到1945年纳粹‘诸神的黄昏’，欧洲中西部的强国已经令人信服地放下了武器”。然而，欧洲人厌恶军事行动（除了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干涉之外），不仅仅是因为战争和破坏的教训使然，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冷战时期欧洲享有超级大国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至今也没有迫在眉睫的传统军事威胁。德裔美国学者和记者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也曾说过，“欧洲现在面临的威胁不是穿制服的军队，而是衣衫褴褛的难民”。

但顺着麦金德的思路想一想，如果说欧洲的命运依然受到亚洲的历史性支配，如俄罗斯的崛起，那又会怎样？那必然会是不小的威胁。支撑苏联在“二战”结束后的东欧强硬地建立了一个帝国的力量，至今依然存在。俄罗斯曾被立陶宛人、波兰人、瑞典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掠夺留下的阴影，使得他们认为有必要在历史上的俄罗斯和中欧之间，建立一个由附庸国组成的缓冲区。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人不会再为此派地面军队重新占领东欧，但他们会在政治和经济上联合施压而达到目的。由于欧洲需要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莫斯科可以部分地借此在未来几年内对前卫星国施加不正当的影响。想一想欧洲的25%、德国的40%、芬兰和波罗的海诸国将近100%的天然气都是由俄罗斯供应的，就能知道其影响会有多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解除了武装的德国会部分屈服于俄罗斯的影响，从而导致东欧“芬兰化”，并使北约更加空洞吗？或者，虽然德国社会依然沉浸在后英雄主义时代的准和平主义理念之中，但它是否会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巧妙地抗衡俄罗斯？

前面一种情形若出现，麦金德及其他地理学者所担心的事就有可能发生，即地理上并不存在中欧，只有海上欧洲和大陆欧洲之分，中间是一条缓冲带；而后一种情形将使欧洲的命运更加复杂：中欧将自“一

战”以来首次全面复兴，繁荣绽放；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许多缓冲带国家也将迅速崛起，麦金德所希望的欧洲和平将得以实现，尽管欧洲对于武力部署的反感会让美国在地理上不太方便。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会容忍东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国家加入欧洲，欧洲的概念作为历史自由主义的地理表达，终将变成现实。罗马帝国分裂后，欧洲用几个世纪重新分化组合。在经历了**1914－1989**年间长期的欧洲战争之后，欧洲还处于寻找自身理念的阶段，并将继续进行自我重组。

希腊债务危机决定欧盟的未来？

从地理学意义上讲，欧洲的概念在整个历史阶段经历了多次变化。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向西横移，商业发展穿越大西洋，使得魁北克、费城和哈瓦那等城市在经济上与西欧的距离比克拉科夫、利沃夫等东欧城市更近。17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军队向西北推进到维也纳，从而切断了巴尔干与欧洲次大陆其它部分的联系。现在的欧洲一方面在东移，因为它吸纳了前共产主义国家加入欧盟；另一方面又在南移，因为它解决了北非地中海南岸的政治经济稳定问题。

在所有地区的重组过程中，希腊最适合为欧洲联盟的健康状况提供一份深刻的报告表。希腊是巴尔干国家中唯一一个有多条海岸线通往地中海的国家，因而成为两个欧洲世界的连接点。它在地理上与布鲁塞尔和莫斯科等距离，在文化上因拜占庭留下的东正教传统而与俄罗斯和欧洲一样亲近。在现代历史上，希腊深受政治停滞落后的拖累。19世纪中期的欧洲革命通常是中产阶级为实现政治自由而发起的，而当时的希腊独立运动，则主要是一场以宗教为基础的民族运动。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尽管希腊政府的立场相对中立，但希腊民众却压倒性地站在俄罗斯这边，支持塞尔维亚人，反对欧洲。冷战时期，除了处于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希腊是欧洲经济状况最糟糕的。回溯到古代，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的发端与终点都是希腊。希罗多德关于希波

战争的纪年历史建立了东西方的“二分法”，这一分法持续了数千年。冷战初期，希腊险些脱离西方阵营，后因希腊右派分子与共产党人的内战，以及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谈判而最终成为北约的一部分。正如麦金德所写的那样，希腊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边缘，与海权极为接近；一旦被俄罗斯这样的心脏地带国家以某种形式控制，“就有可能以此为基础控制世界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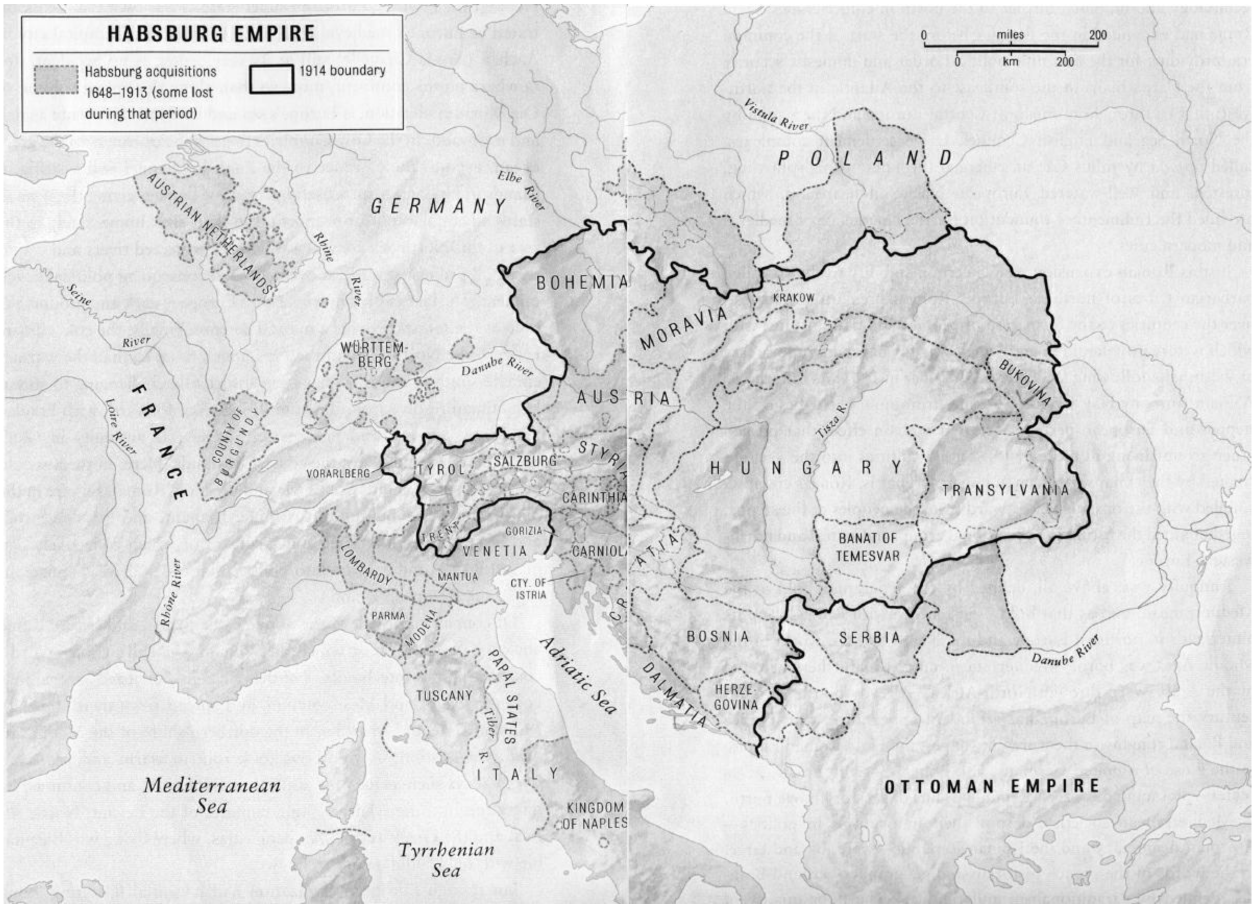
当然，俄罗斯控制希腊这件事，近期之内应该不会发生，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也是很有意思的。如果冷战时期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的谈判换一种结果，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想象一下，假如希腊留在苏联阵营里，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地位该有多强？它可能跨过亚得里亚海危及意大利，整个地中海东部和中东都不在话下。

2010年以来，希腊金融危机暴露了其政治经济的欠发达性，动摇了欧盟的货币体系。由于挑起了南北欧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希腊成为继南斯拉夫分裂战争以来对欧洲统一的最大挑战。然而，希腊有能力证明，欧盟仍然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在建工程，在这个空间危机徐徐展开的世界里，南方和东方的趋势和碰撞也将继续影响欧洲的未来。

---

(1) Benelux，是由3个相邻的君主立宪西欧国家：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组成的经济联盟。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宗旨是发展三国关系，协调三国之间的财经和社会事务政策，加强与大国的竞争地位。——译者注

(2) 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以及宗教纠纷剧化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肇始，最后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译者注



（哈布斯堡王朝）

（本书插图均系原文插图，后文各图不一一标注，上图地名中文对照如下文内容）

图名：HABSBURG EMPIRE哈布斯堡王朝

Habsburg acquisitions 1648－1913（some lost during that period） 1648－1913年哈布斯堡所辖地区（某些地区在此其间失去）

1914 boundary1914年的分界线

① FRANCE法国　GERMANY德国　ITALY意大利　AUSTRIA奥地利

KINGDOM OF NAPLES那不勒斯王国　BOHEMIA波希米亚　HUNGARY匈牙利

POLAND波兰　SERBIA塞尔维亚　MORAVIA摩拉维亚　NETHERLANDS荷兰

WURTTEMBERG符腾堡　OTTOMAN EMPIRE奥斯曼帝国

PAPAL STATES教皇国　COUNTY OF BURGUNDY勃艮第王朝

② Mediterranean Sea地中海　Tyrrhenian Sea第勒尼安海　Adriatic Sea亚得里亚海

③ VORARLBERG福拉尔贝格州　TYROL蒂罗尔州

STYRIA施泰尔马克州　CARINTHIA克恩滕州

④ Seine River塞纳河　Loire River卢瓦尔河　Rhine River莱茵河

Elbe River易北河　Danube River多瑙河　Tiber R台伯河

Rhone River罗讷河　Vistula River维斯瓦河　Tisza R.蒂萨河

⑤ VENETIA威尼斯　GORIZIA戈里齐亚　TRENT特伦特

SALZBURG萨尔茨保　MODENA摩德纳　CTY. OF ISTRIA伊斯的利亚

CARINOLA卡里诺拉

⑥ CROATIA克罗地亚　BOSNIA波斯尼亚　TRANSYLVANIA特兰西瓦尼亚

DALMATIA达尔马提亚　TUSCANY托斯卡纳区

LOMBARDY伦巴第　PARMA帕尔玛　MANTUA曼图亚

HERZEGOVINA黑塞哥维那　KRAKOW克拉科夫

BUKOVINA布科维纳

第10章
摒弃历史的地理
中心地带的俄罗斯

俄罗斯的整个历史，从高加索打开窗口。

历史上蒙古人对俄罗斯的统治更是导致了俄罗斯人的“侵略妄想恐惧症”，但这个经度跨越东经26°至西经170°的国家终究摆脱不了陆权国家的命运。

严酷的气候和地貌以及车臣等分裂势力的干扰，加之俄罗斯人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俄罗斯也表现出了对印度洋、阿富汗和伊朗的兴趣。

俄罗斯正在运用手中的能源筹码影响欧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但曾经的加盟共和国并不安心受其摆布。一度被贬低的地缘政治随着苏联的解体逐渐恢复过来，但在亚洲与欧洲的天平上，俄罗斯似乎并不清楚应该站在哪边……

《1914年8月》（*August 1914*）是俄罗斯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主题的大型史诗小说，开篇就是一首高加索山脉的颂歌：“那高耸入云的高加索山脉白雪皑皑，……一个个锯齿形的山坳全都清晰可见。与人类所创造的种种渺小事物相比，这座山脉简直是人类不能想象的庞然大物。数千年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的所有人，即使尽可能地张开手臂，把他们曾创造的一切全部堆积起来，也造不出这样一座鬼斧神工的山脉。”沿着这条脉络，索尔仁尼琴又对其“辽阔雪域”“裸露的峭壁”、“深谷和山脊”“缭绕的云雾”进行了描绘和赞美。

从历史上来说，高加索始终紧扣俄罗斯人的心弦，索尔仁尼琴这样激烈的民族主义者，特别对它充满恐惧和敬畏。在黑海和里海之间有一座大陆桥，欧洲在这里逐步消失于绵延600英里、高达18 000英尺的群山中，那蜿蜒的山脊格外迷人，舒展而平坦的草原向北延伸。这里是俄罗斯的“蛮荒西部”，虽然这些山脉处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南边。自17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俄罗斯殖民者试图征服的“蛮夷”民族的聚居地，他们包括车臣人、印古什人、奥塞梯人、塔吉斯坦人、阿布哈兹人、卡特维尔人、卡克特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等；在这里，俄罗斯也见识了伊斯兰教的温文尔雅和残酷无情。俄罗斯人对高加索地区复杂的情感，让他们既着迷又惶恐，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故事，也在这里打开了窗口。

地理决定的集体主义？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独特的陆权大国，经度跨越东经26°至西经170°，几乎占地球的一半。主要出海口在北方，一年中数月被北极冰层封锁。马汉曾暗示过，俄罗斯作为陆权国家常年处于不安全境地。在获

得海洋屏障之前，他们永不满足，要么继续扩张，要么坐视别人征服。俄罗斯土地平坦宽阔，几乎没有自然边界可以为其提供保护，因此他们对陆地上的敌人充满恐惧，这也是麦金德学说的一个主要议题。因此，俄罗斯想方设法把边界推到中东欧中间，以阻止19世纪法国和20世纪德国的进犯。为了限制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并寻求在印度洋的温水出海口，俄罗斯多次出兵阿富汗，他们还把边界强推到远东，以限制中国。此外，俄罗斯对高加索山脉的作用极为重视，将其作为屏障，以防御大中东的政治和宗教争端。

俄罗斯面临的另一个地理事实是严寒。俄罗斯的大片陆地都位于北纬50°以北，大部分人口居住在比加拿大更寒冷的气候带上。地理学家索尔·科恩（Saul Cohen）写道，“俄罗斯纬度较高，又远离海洋，加上山脉的屏障作用和大陆性气候”，使得该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寒冷干燥，不适宜永久定居。但高加索和靠近朝鲜边境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例外，这也是高加索的另一个吸引力所在：处于北纬43°，气候相对温和。

俄罗斯的气候和地貌确实严酷到极点，这也是掌握俄罗斯人性格和历史特点的钥匙。俄罗斯史学家菲利普·朗沃思写道，俄罗斯的极度高寒，似乎正是这个民族“能够承受苦难，普遍具备集体主义意识，甚至愿意为共同利益牺牲个人”的原因。他解释说，北部高纬度地区农作物生长季节很短，需要农民之间齐心协力，“通过狂热而艰苦的努力完成长时间的田间劳作，甚至要动员儿童参加”，因为播种和收获的全过程，都不得不匆匆完成。此外，寒冷造成的低产量，促使新兴的俄罗斯富豪们尽力控制广阔的土地，这严重扼杀了农民的积极性，只要没人强制就不愿多干活，这造成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具有“暴力倾向”。俄罗斯共产主义的特点以及对于个人自由的不以为然，都与寒冷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空荡荡的大地，冰冷平原上的大教堂和防御工事，东正教的祈祷诵经以及所有风俗制度，都体现了集体主义的冷酷无情。

俄罗斯北部处于北极圈和北冰洋之间的冻土带，常年覆盖着冰雪，

除了苔藓和地衣外寸草不生。当夏季冰雪融化时，大量的蚊虫又会泛滥成灾。冻土带往南是世界上最大的针叶林，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这样的地区，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占40%左右。在俄罗斯南部，从西部匈牙利平原经由乌克兰、北高加索地区以及中亚，一路直到远东，绵延着世界上最大的草原，用俄罗斯学者W.布鲁斯·林肯（W. Bruce Lincoln）的话说，这简直就是一条“以草铺就的大路”。

麦金德说过，俄罗斯人本来是蜷缩在森林里的民族，从远古、中世纪到近代早期一直受到亚洲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迫于无奈，不得不寻求对外扩张与征服。特别是蒙古人，包括中世纪莫斯科公国附近的金帐汗国和中亚的蓝帐汗国对他们的长期侮辱和侵犯，直接导致俄罗斯错过了文艺复兴时期，但同时也赋予他们共性、动力和极强的目的性，这些至关重要的品质最终反过来帮助他们摆脱了蒙古人统治的枷锁，在近几个世纪里夺取大片领土。历史学家G.帕特里克·马奇（G.Patrick March）认为，蒙古人的统治造就了俄罗斯人“对暴政的极大容忍”，使他们在遭受困苦的同时，患上了“侵略妄想恐惧症”。

不安全感是俄罗斯典型的民族情感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馆员詹姆斯·H.比林顿（James H. Billington）写道：“既想在历史中寻根，又希望利用历史为自身辩护，这种需求部分源于来自东部平原的不安全感。”他在关于俄罗斯文化的巨著《标与斧》（*The Icon and the Axe*）中写道，“地理，而不是历史”，一直主导着俄罗斯人的思想：

> 严酷的季节转换，远方的几条河流，降雨多少和土壤肥瘦，决定了普通农民的生活方式。游牧民族征服者来了又去，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成不变的冷酷海面上某种物体的无意识游荡而已。

平坦空旷的俄罗斯大地，从欧洲一直延伸到远东，几乎没有自然边界。分散定居的生活方式造成了长期的无政府状态，每一个族群都永远地缺乏安全感。在森林深处防备着草原上潜伏的敌人时，俄罗斯人对于

泛灵论和宗教的渴求相互融合，形成了他们的精神避难所。比林顿写道，东正教的复活节“影响极大，特别是在俄罗斯北部”。在这个传统节日里，问候语不是“复活节快乐”这样平淡的西方客套话，而是对一个神圣史实的直接肯定：“基督升天了！”得到的答复则是：“千真万确，升天了！”这一对话赞美的不仅是升天的基督，也是复苏的自然——漫长而黑暗的冬季接近尾声，树木抖落枝丫上的积雪，拱出稚嫩的叶芽。在严谨的东正教基督教义中，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异端”了吧。20世纪初的俄罗斯神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指出，布尔什维克强调总体性，因此俄罗斯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俄罗斯宗教，是东正教的世俗化替代品。正如比林顿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它的图标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提醒，唤醒那些受难的先驱者对于东正教的信仰，并体会到其带来的庇护和更高的目标；而斧头是“用于征服森林的，象征着实现大俄罗斯基本目标不可缺少的手段”。无论是俄罗斯宗教还是共产主义，都让人回想起森林深处、草原边缘那种深重的不安全感，因此顿生征服之欲——因为俄罗斯土地平坦，并与亚洲和大中东整体相接，本身就容易被征服。其他帝国历经崛起、扩张、崩溃直至销声匿迹，再也无人提起，而俄罗斯帝国扩张、崩溃、恢复，又几度东山再起。地理和历史表明，我们永远不能低估俄罗斯。苏联帝国解体后俄罗斯的复苏，有可能就在我们有生之年，将化为古老故事的一部分。

欧洲的“外省人”

俄罗斯第一个帝国，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东欧政体，是公元9世纪中叶的基辅罗斯（Kievan Rus），它兴起于第聂伯河最南端的历史文化名城基辅。基辅罗斯可以经常接触南部的拜占庭帝国，对俄罗斯人皈依东正教有极大促进作用，它与俄罗斯的严寒条件相结合后，发展成一种极富特色的本地化宗教；地理也决定了基辅罗斯的人口构成，从北方顺流而下的北欧维京海盗和东部的斯拉夫土著都相继加入；该地土壤

贫瘠，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征服大片土地以保证食物供应，两种动态区域势力在此合二为一，即维京海盗和拜占庭人，帝国由此开始形成，并使俄罗斯逐渐成为一种地理和文化概念。

由于长年疲于应对草原游牧民族的侵袭，13世纪中叶，基辅罗斯终于被成吉思汗之孙拔都汗（Batu Khan，1207 – 1255）带领的蒙古大军摧毁——蒙古传统的牧马地连年干旱，马既是他们的食物也是迁徙工具，促使蒙古人向西进发，为马匹寻找新的牧场。俄罗斯帝国的首次扩张企图，在欧亚腹地陷入了僵局。

经过无数次迁徙往复以及各种政治伎俩，俄国逐渐转向北方，到达斯摩棱斯克、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等地，其中莫斯科在中世纪后期实力逐渐变得最强（正如我们看到的，中世纪这几百年的特点是专制和偏执，部分缘于蒙古的压力）。莫斯科的脱颖而出得益于其商业上的有利地位，它地处伏尔加河中上游河谷的河流港口沿线。布鲁斯·林肯写道：“莫斯科位于高地中心，是俄罗斯欧洲部分大河的发源地，蜿蜒交错的河流水道以此为枢纽不规则地向外延伸，如同倾斜的轮圈辐条一般。”这段历史使俄罗斯避开了蒙古人出没的草原，进一步向森林深处集中发展，并在那里作为国家凝聚在了一起。

中世纪的莫斯科公国，四面被围，内陆闭锁。东部只有针叶林、草原和蒙古包，南部草原上的匈奴人、蒙古人阻止莫斯科公国出入黑海，西部和西北部则有瑞典人、波兰人、立陶宛人把控着波罗的海。“恐怖的”伊凡四世[(1)]在遥远的北方获得的唯一一个勉强可用的海岸，就是北冰洋的入海口白海。这种局面使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在伊凡四世治下尝试突破，力图有作所为。

伊凡四世，史称“恐怖的伊凡”，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同时被人看作怪物和民间英雄。他的绰号“恐怖的”，是对Groznyi的误译，原意其实是“严厉的”（Dread），其支持者的本意是说他对有罪者严惩不贷。历史和地理部分地赋予了伊凡首位大帝国扩张者的身份，因为在他

所处的时代和地理环境中，对付混乱的唯一方法是实行专制。1453年，拜占庭统治下的希腊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希腊难民从君士坦丁堡逃难到莫斯科以北，更是给他们带来了政治、军事和管理经验，这对帝国的建立至关重要。

伊凡四世的残暴和狡猾集俄罗斯人经验之大成，他的臣民曾一代又一代地与亚洲人“耐心而顺从地打交道”。作为史上第一位沙皇，他先是击败了喀山鞑靼人，为接触乌拉尔山脉创造机会，迈出了日后征服西伯利亚的重要一步；后又击败额尔齐斯河附近的失必儿汗国，即现在的蒙古西北部。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俄罗斯以惊人的速度突飞猛进，60年后的17世纪初即到达鄂霍次克海，直抵太平洋边缘。

伊凡也觊觎南部和东南部，特别是穆斯林居住的阿斯特拉罕地区，它是金帐汗国的一支，控制着伏尔加河河口通往高加索、波斯和中亚的道路；其东是诺盖汗国的地盘，当地居民属突厥游牧民族，说钦察语的一种。虽然诺盖是莫斯科公国的政敌，但他们愿意与大公进行贸易活动，并欢迎伊凡的士兵保护主要道路的安全。草原如无边的大海，蒙古人和鞑靼人隐藏其中，与俄罗斯一边打仗，一边贸易；高加索地区的艰苦和复杂性不亚于此，在俄罗斯人眼中，那里有更奇特的异域风光，让人痴迷忘返。

伊凡不知疲倦地扩张。在南部取胜之后，他紧接着在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地区发起战争以抢占波罗的海，但被汉萨同盟[(2)]和日耳曼利沃尼亚骑士团打败。虽然俄罗斯此前刚刚在中东和亚洲获得大片土地，这次失败仍彻底阻断了其与西方的联系。16世纪中后期和17世纪初，俄罗斯大陆帝国首战告捷，哥萨克人作为御用军队名声鹊起，稳定了其在高加索地区的地位。哥萨克这个词，或称哈萨克，原本是指自由的鞑靼战士，他们对家园苛刻的生存条件感到绝望，从俄罗斯、立陶宛、波兰等地迁移到南部的乌克兰大草原。在前蒙古边境的混乱形势下，他们迫于生计，干起了盗贼、商人、殖民者、雇佣军等行当，并因坚强勇敢和佣

金便宜而逐渐被吸纳进伊凡的非正规军行列。

哥萨克人定居点主要集中在顿河和第聂伯河的河谷中，尼古拉·果戈理的经典之作《塔拉斯·布尔巴》（*Taras Bulba*）描写的正是第聂伯河哥萨克人的故事。果戈理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但他在乌克兰（俄语原意“边疆”）看到了真正的、原始的俄罗斯：一望无际、四通八达的草原，几近枯竭、无法通航的河流，造成了民族之间矛盾频发，人民嗜血好战。虽然果戈理用“俄罗斯”“乌克兰”和“哥萨克骑兵”来表示特定的人群，但他同时承认这些身份有其重叠性（三种身份代表的地域也是如此）；他笔下的故事阴暗悲惨，充斥着不可饶恕的暴力，虽然小说中描绘的人物完全缺乏人性，其结局都源于自己的可怕选择，但书中的暴力场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大草原的地理特点，其平整度、大陆性和迁徙路线导致了冲突的发生，并引发财富的迅速变化。

伊凡四世的帝国在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1598－1605在位）统治期间继续扩张，囊括了斯大林格勒东南方向的乌拉尔山地区和哈萨克草原。好景不长，莫斯科大公国最终也如基辅罗斯一般轰然倒塌，这次是瑞典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哥萨克人把帝国的庞大躯体凿得支离破碎。中世纪莫斯科大公国自封为“第三罗马”，是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它解体后的时期号称“乱世”（the Time of Troubles），似乎整个世界和文明都会随之结束。但俄罗斯并没有结束，短短几年后的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Michael Romanov）被推为沙皇，俄罗斯历史上一个新的王朝开始了。

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奠定了现代俄罗斯的基础，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运行机器和行政组织在这一时期初见规模，比浪漫有余、规范不足的中世纪莫斯科公国大有改进。在罗曼诺夫王朝300年的统治中，俄罗斯征服了波兰和立陶宛，摧毁了瑞典，羞辱了拿破仑的法国，夺回了乌克兰，并从奥斯曼土耳其那里成功抢到了克里米亚和巴尔干，同时正式实现了对高加索、中亚和西伯利亚的扩张，边境直接推到中国和太

平洋。

至此，俄罗斯从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和日俄战争（1904－1905）的逆境中恢复了。广阔无阻的地理条件，使俄罗斯在战争中进可攻、退可守，来去自如，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调度成了俄罗斯历史上最盛大的主题之一。1812年，罗曼诺夫王朝在一次战役中败给了拿破仑军队，从而失去了波兰和俄罗斯西部，短短几周后即卷土重来，将法国赶回到中欧，拿破仑军队完败。

彼得大帝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统治俄罗斯，他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地位与伊凡四世在莫斯科大公国的地位相当。他的卓越功勋，使地理仅仅成了故事的一部分。关于彼得大帝，历史上最知名的事件是1703年他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圣彼得堡，其间与瑞典帝国的战争可谓艰苦卓绝：瑞典穿过马祖里湖区大举入侵白俄罗斯，俄罗斯以焚烧农作物的“焦土战术”对敌，此举后来也用于对付拿破仑和希特勒，屡试不爽。

彼得大帝成功地巩固了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并面向欧洲建立了新都，但其试图改变俄罗斯政治文化身份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虽然致力于全方位扩张，俄罗斯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认同欧洲文化的欧亚国家，其典型性可谓独一无二；即使其地理条件和被侵略（例如蒙古）的历史否认这一点，俄罗斯仍然想方设法成为欧洲国家。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对此是这样解释的：

> 目前，我们看待欧洲人和欧洲的心态，就像外省人看待首都居民一样，既羡慕又自卑，喜欢屈从和模仿他们，凡是与人家不一样的地方，都认为是我们不如人家。

显然，俄罗斯没有什么值得自卑的，他们已经做得够好了：这个民族凭借不利的地理条件，建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帝国，并不断地侵扰黎凡特东部和印度门户，从而威胁法英帝国的安全。在赫尔岑写下上述文字的同时，俄罗斯军队攻占了塔什干和撒马尔罕，踏上了通往中国的古

丝绸之路，并逼近印度次大陆边界。

当法国和英国这两个海权帝国忙于应付海外的劲敌时，俄罗斯却不得不在自己的领土上接受敌人的挑战。忧虑和警惕，成了他们从早期历史中学会的东西。这个国家似乎总是处于不同形式的战争状态，再来看看高加索的例子：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穆斯林在18世纪后期抵抗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军队，19世纪则继续与沙皇战斗，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不曾安歇；而高加索南边更顺从的地区，如格鲁吉亚，早在很久之前已纳入沙皇统制下。车臣的好战，源于其生活条件的极端困窘。石质山脉少得可怜的土壤本就收成极低，还需要拿起武器来保护绵羊和山羊免遭野生动物的侵害。在经过高加索地区的贸易路线上，车臣人既是导游也是劫匪；此外，他们虽然皈依了苏菲伊斯兰教，却往往不像其他教派信徒那样狂热，而是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保卫家园、抵御东正教俄罗斯的入侵上。地理学家丹尼斯·J.B.肖（Denis J.B. Shaw）写道，在高加索地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哥萨克殖民者，遇到了山区暴民的顽强抵抗。除了奥塞梯人以外，此地居民在文化上都从属于伊斯兰，这更使他们下定决心痛击俄罗斯入侵者”。

出于对北高加索地区人民独立精神的恐惧，布尔什维克拒绝将其纳入统一的共和国，而是将其与不同语言和民族构成的其他民族人为划分到一起。正如肖指出的，“把卡尔巴德人与巴尔卡尔人划分在了一起，尽管前者与切尔克斯人有更多共同之处，而后者与卡拉恰伊人更合得来”。更有甚者，1944年斯大林以涉嫌与德国人合作为由，将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卡尔梅克人流放到了中亚。他摆出的这副冷酷面孔，相当一部分是由高加索造成的。这是陆权国家的宿命，也是他们对征服的需求使然。

俄罗斯的步步为营，触动了麦金德“枢纽”理论的形成。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铁路建设迅速发展，1857年至1882年间修通15 000英里，将莫斯科与西部的普鲁士边境相连，东部连至下诺夫哥罗德，南部通往黑

海之滨的克里米亚。此外，1879年至1886年间，俄罗斯从里海东岸的克拉斯诺沃茨克铺设了一条铁路线，通往东部的梅尔夫，全长超过500英里，逼近波斯和阿富汗边界。1888年，这条铁路线又往东北新增300英里，直到撒马尔罕。

在卡拉库姆沙漠和克孜勒沙漠南部的中亚草原，帝国的新动脉跟随俄罗斯军事扩张的步伐不断推进，覆盖今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全境。至此，俄疆域已接近印度次大陆，与当时如日中天的英国霸权争夺亚洲的控制权；同时另一条铁路线跨越高加索地区，把里海西岸的巴库与黑海之滨的巴统连接起来。

1891年，俄罗斯开始修建从乌拉尔山脉穿过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直通太平洋沿岸的铁路，该线全长4 000英里，经过俄罗斯境内所有森林、高山、沼泽和冻土带。到1904年，俄罗斯已拥有铁路38 000英里。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从圣彼得堡跨越11个时区，一路走到俄罗斯和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这再次证明，新版俄罗斯“天定命运”的推动力正是其不安全感，他们必须保持进攻，并在各个方向探索，否则自身难保。

“不安全感”造成的无休止扩张？

欧亚地图上有一个突出的事实，可以作为俄罗斯故事的解释。西部的喀尔巴阡山脉和东部的中西伯利亚高原之间全是低洼平地，使广袤的大平原形成了一整块大陆（乌拉尔山脉作为小插曲横亘其间）；这个大平原，包括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从白海和喀拉海的北冰洋入口延伸到高加索地区、兴都库什山脉和扎格罗斯山脉，直到阿富汗地区和伊朗境内。

俄罗斯帝国一直对打通印度洋心存模糊的希望，对印度洋附近温暖的出海口垂涎三尺，这是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背后动因，但其冒险

跋涉的范围远不止此。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俄罗斯的哥萨克人、毛皮贩子和贸易商勇敢地跨越叶尼塞河，从西至东进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那里高寒广袤的七座大山绵延2 500英里，整个地区每年霜冻期可达9个月。如果说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征服是顺其自然，因为这片土地与俄罗斯地理上接近，共享文化和历史，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则是硬生生地夺取一个全新的"北方河流帝国"（boreal riverine empire）。

布鲁斯·林肯在其权威性巨著《征服大陆：西伯利亚和俄罗斯》（*The Conquest of a Continent: Siberia and the Russians*）中写道，"真正让俄罗斯变得庞大的，一直是它在亚洲的扩张"，而非欧洲。俄罗斯人在对东西伯利亚和更远处的征服过程中总结了极为严酷的历史经验，正如菲利普·朗沃思所言：

> 严寒的气候，磨炼着他们的顽强意志和持久耐力，地广人稀加上生长季节短促，又促使合作加强迫的社会关系形成。为了生存，俄罗斯人比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需要有更大的组织规模。在过去，这方面的需求有利于形成集中、独裁的政府形态，并阻止了其他政体的参与。

叶尼塞河是世界第六长河，洪水泛滥时面积可扩至3英里宽。它从蒙古向北流淌，绵延3 400英里注入北冰洋。与乌拉尔山相比，它是俄罗斯西部和东西伯利亚之间真正的分界线，其西岸是绵延上千英里的低地平原，东岸耸立着上千英里的高原雪山。英国游记家科林·萨布伦（Colin Thubron）写道："这条从虚无中流出来的河宛如实体，历久不息，时而平和时而可怕，把我的心揪得紧紧的。"在北极圈之外，沿着河流偏向更北方的另一点上，"地球变成了扁平状，偏离其轴线，而河岸正在沉下去。这里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历史只剩下了地质痕迹"。

将探险家们吸引到这个冰川期世外桃源的第一件东西是动物毛皮，

后来则是石油、天然气、煤、铁、金、铜、石墨、铝、镍等其他各种金属和矿物质。此外还有电力，因为西伯利亚的河流落差之大有利于发电。

正如叶尼塞河把西伯利亚分为东西两半，同样雄伟的勒拿河则是西伯利亚东部与俄罗斯远东之间的分界线。事实上，西伯利亚的大江大河支流繁多，“犹如参天大树，枝丫交叉，旁逸斜出”，形成了一个宏大的河口港湾系统。还有地面上星罗棋布的矿区，构成了沙皇和苏联刑法制度的核心。事实上，西伯利亚一直是环境残酷和战略财富的代名词，它使苏联在过去几十年里成为一个道义黑暗、能源丰富的强权国家。18世纪初它突然跻身欧洲列强之列，即得益于乌拉尔森林中储量丰富的铁矿石，它们适合做大炮和火枪，这些都是发动现代战争的必需材料。

同样，由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西伯利亚西北部发现了大型油气田，俄罗斯在21世纪初一举成为能源超级大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还使俄罗斯进入了太平洋的地缘政治带，并与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冷战的核心动力，正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冲突，由于事关如何在21世纪与两个大国打交道，它甚至对美国自身战略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与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不同，阿穆尔河的流向不是从南到北，而是由西向东，与乌苏里江连接，形成今天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黑龙江省之间的边界。自17世纪中叶起，沙俄和中国清廷为此地区争夺不断，先是俄罗斯的盗猎者进入该地区，随后是莫斯科士兵，两国外交官也纷至沓来，当时清廷为了平定中原和收复台湾，分身乏术。这一较量最终在1860年有了结果，积弱腐朽的清政府，被迫割让35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俄罗斯因而开辟了目前的边界。

当然，现在中国强大了，俄罗斯相对较弱，因此边境再次面临压力。中国以移民和开设公司的方式北上，以便开采利用其石油、天然气、木材和其他资源。地理注定要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造成持续紧张关系，只是有时会被战术性需要或一时的反美联盟所掩盖。2009年7月，

俄罗斯总参谋长尼古拉·马卡罗夫（Nikolai Makarov）在一次报告中明确指出："北约和中国是我们最危险的地缘政治对手。"

其实，地理显示的恰恰是我们经常遗忘的东西：俄罗斯历史上正是驱动东亚权力斗争的重要力量。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大部分原因在于日本的煽动，他们要求俄罗斯承认中国的满洲自治（以及日本对韩国的自由干预权），对此俄罗斯表示反对。那场战争不仅使沙皇当局受挫，中国清政府更是遭受莫大的耻辱，因为这片饱经蹂躏的土地正是清廷皇祖列宗的故土。也就是说，俄罗斯虽然失败了，仍然保留着阿穆尔和乌苏里地区的控制权。这成了清廷的一块心病。

日俄战争中，俄罗斯失去了萨哈林岛（Sakhalin Island，即库页岛）南半部和南满的一部分（根据地理逻辑，它无论如何也应属于中国），然而更为严重的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随后的混乱，它真正撼动了俄罗斯对远东的控制。中国、日本和美国（一个名符其实的新兴远东力量）分段控制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范围从贝加尔湖西部直到东方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即海参崴），后者在1918年至1922年间又随着日本八万大军进攻阿穆尔而被占领。不久以后，列宁的红军镇压了"白"俄罗斯反革命内战的潮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有了足够的实力收回边疆的领土，特别是中亚沙漠地带的土耳其民族聚居地等极易受到西方攻击的地区。尽管布尔什维克公开宣称"世界上所有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但在面对外围备受威胁这个陆权大国的"老问题"时，他们还是变成了现实主义者。

不管谁统治俄罗斯，都不得不面对其领土过于庞大平坦、与周边邻国缺乏自然分界这个令人头痛的事实。为了弥补这一天然缺陷，布尔什维克们摇身一变成了俄罗斯帝国主义者，比起他们的沙皇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将摩尔多瓦人、车臣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布里亚特蒙古人、鞑靼人以及其他所有民族一概纳入囊中。布尔什维克很容易把他们

的征服合理化，他们向这些民族许以共产主义的幸福，就连俄罗斯人自己也成为了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之一。因为地理的原因，苏联有意识地向东迁都，从波罗的海之滨的圣彼得堡迁回莫斯科，恢复了亚洲国家的主要身份。毕竟，亚洲对于俄罗斯而言，总是处于核心地位的。自此，彼得大帝开创的从“西方的窗口”统治俄罗斯的半现代化制度，被克里姆林宫统治的国家取而代之，这里也曾是历史悠久的中世纪莫斯科公国的半亚洲基地。

苏联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联盟共和国以及11个自治共和国和州区等组成。因为许多地区划分没有与族群边界正相重合（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有庞大的塔吉克少数民族群体，而塔吉克斯坦有更多的乌兹别克人），内战的迹象时时出现，迫使苏联逐渐演变为一座国家监狱。在20世纪，这个监狱一如继往地富有侵略性，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不安分的理由。1929年，苏联动用步兵、骑兵、飞机攻击满洲的西部边缘，夺取了穿过中国领土的铁路控制权[(3)]。1935年，苏联提出在中国西部的新疆省设虚拟卫星站，并扶植蒙古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与其结成同盟。1939年，苏联又在欧洲与纳粹签署条约，允许苏联合并波兰东部、芬兰东部、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就是说，在苏联的幌子下，俄罗斯帝国从欧洲中部延伸到了朝鲜半岛。

各种事件证明，苏联仍然不够安全，地理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1941年希特勒向东进犯，穿过苏联的欧洲平原部分，直逼莫斯科郊外，里海几乎触手可及，直到1943年初才被挡在斯大林格勒外面。战争结束后，苏联通过大举报复来宣泄几个世纪以来的不安全感，其规模让人回想起蒙古人对基辅罗斯的掠夺。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崩溃以后，苏联迅速地占领了整个欧洲的东半部，建立其共产主义卫星国系统，这些国家的忠诚度在大多数情况下靠苏联驻军保障；后又回师向西，跨越整个平原和第聂伯河、维斯瓦河和多瑙河。当年面对广袤的苏联欧洲部分地区，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因后勤物流严重不足而陷入瘫痪，重蹈拿破

仑一个世纪前的覆辙；现在，苏联东欧帝国已延伸到中欧的心脏深处，超过了1613年至1917年的罗曼诺夫帝国的范畴，以及纳粹与苏联协定互不侵犯的领土。另一方面，苏联的亚洲部分也已扩张到日本北部的萨哈林和千岛群岛，毗邻俄罗斯远东地区。

日本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混乱和疲弱状态。在毛泽东的共产党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为国内权力而斗争时，苏联军队趁机在满洲大举进驻，一方面巩固亲苏的蒙古政权，一方面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对苏友好的共产主义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到5年，朝鲜半岛遭遇海上强权美国介入，当时苏联作为大陆强权同刚刚确立了共产主义政权的中国一起支援朝鲜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麦金德描述的心脏地带强权最终以苏维埃俄国的形式建立起来，而马汉和斯皮克曼的海上强权则以美国的形式存在，二者形成两极对峙局面。

苏维埃强权在心脏地带的扩张，使欧洲和中国的命运都受到了影响，而大中东和东南亚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因此感受到美国的海上和空中力量的压力。这是冷战的最终地理真相，但它被意识形态的对立掩盖了。

在地缘政治中迷失的俄罗斯

对于在“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来说，冷战看起来似乎永无休止，但事后证明那仅仅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阶段，并按照地理规律自然终结。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企图改革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由此暴露出了系统的实际状态。这毕竟是一个由被臣服民族组成的僵化帝国，许多人仍居住在俄罗斯的森林和平原、草原、平地和山区的边缘。实际上，一旦戈尔巴乔夫本人宣布帝国赖以建立的思想戒律存在严重缺陷，整个系统就开始解体，边缘部分纷纷脱离中心，这与其13世纪中期基辅罗斯的失败、17世纪早期中世纪莫斯科公国的结束、20世纪初罗曼诺夫帝国的崩溃是一样的。

这就是历史学家菲利普·朗沃思强调俄罗斯历史的主要特征是“地势总体平坦，国家反复膨胀和崩溃”的原因。事实上，正如地理学家丹尼斯·肖解释的那样，开放的边疆以及由此带来的军事负担，“促进了俄罗斯国家集权”。沙皇的权力是传奇式的，但俄罗斯毕竟曾是弱国，沙皇无法在遥远的省份巩固行政机构，这使得俄罗斯更加容易遭受入侵。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国土面积锐减，成为自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以来面积最小的时期。它甚至失去了乌克兰，那可是基辅罗斯最初的心脏腹地。但尽管失去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损失了高加索和中亚，尽管车臣、达吉斯坦和鞑靼斯坦在军事上具有不确定性，尽管蒙古成为独立的国家，摆脱了莫斯科的把控，俄罗斯的领土仍然是地球上最大的，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占据亚洲大陆1/3强，陆地边界仍然绵延横跨近一半的世界时区，从芬兰湾直到白令海。这个广阔而裸露的疆域，再也没有山脉和草原的屏障，不得不靠只有苏联一半多一点的人口去守卫。事实上，俄罗斯人口比孟加拉还要少，在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只有2 700万人。

和平时期的俄罗斯，在地理上从未如此脆弱，但俄罗斯领导人没有时间评估严峻的形势。苏联解体后不到一个月，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俄罗斯政府公报（*Rossiyskaya Gazeta*）中说，“我们果断地认为，地缘政治正在取代意识形态”。爱丁堡大学名誉教授约翰·埃里克森（John Erickson）写道：“地缘政治在苏联时期一直被妖魔化了……现在它又带着复仇回来了，困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地缘政治作为一门学科在俄罗斯获得平反，不再有人谴责地缘政治是军国主义的工具，麦金德和马汉等人都恢复了名誉。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以“不折不扣的新麦金德风格”，宣布俄罗斯不得不恢复对“心脏地带的控制”。历史上的起伏跌宕和新的地理薄弱环节，迫使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一个修正主义的强权，以一些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形式收复附近的地盘，如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高加索和中亚地区，那里生活着2 600万俄裔人。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10年期间，俄罗斯经济在崩溃的边缘摇

摇欲坠，国力虚弱并备受侮辱，但新一轮扩张正在孕育。

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建议，南高加索以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都必须置于俄罗斯的统治之下。日里诺夫斯基的极端主义并不为大多数俄罗斯人所认同，但他仍是俄罗斯思想的一个重要暗流。俄罗斯目前在欧亚大陆的弱势地位，使地理学成为21世纪之交俄罗斯的心病。当然，苏联将永远不会重组，但某种松散的联盟形式仍然可以实现，并延伸到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的边界。重要的是，让它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背后动力是什么呢？俄罗斯还能拿什么在道义上为下一波扩张辩护呢？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一书中写道，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开始重提19世纪的欧亚主义学说，以此作为共产主义的替代物，把非俄罗斯民族的苏联人民吸引回来。

欧亚主义非常适合俄罗斯的历史和地理个性。俄罗斯从欧洲一路漫无边际地扩展到远东，两端都不稳固，它以任何国家都没用过的方式，集中体现了它的欧亚大陆国家特点。此外，封闭的地理形势体现了21世纪的“空间危机”，消解了冷战地区问题专家之间的分歧，使其一致认同欧亚大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陆块，“欧亚大陆”这个概念在未来几年内对地理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将更显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或乌兹别克人将立即把自己视为“欧亚人”，毕竟他们的民族身份承载着所有的历史和情感记忆，而且随着冷战权力集团的崩溃，这种身份有可能得到更丰富的发展。中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比如说，俄罗斯人以及哈萨克人，即使能通过各种“欧亚联盟”（Eurasian Union）抑制他们的民族对手，欧亚主义也不会成为让他们视死如归的原因；似乎也不会出现某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使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其他民族迫不及待地争当欧亚人。但是，如果欧亚主义能够抑制差异，哪怕在苏联的一些地区能稍微求同存异，因此有助于稳定，那么又岂能因善小而不为呢？

但地理不能解释一切，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仅仅是一个不变的背景幕布，思想的交战可以在上面任意投射。即使地理是一种能够形成团结的力量，就像美国、英国，或印度、以色列那样，民主、自由和精神元素（如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才是这些国家普遍认同的基础。如果一个民族除了地理就再也没有别的可以团结的力量，正如前独裁者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或前执政党自民党统治下的日本，那么国家对于强权的不适将非常强烈。得益于地理，这些国家也可能是稳定的，但若地理就是全部，那就只能听天由命。因此，厌倦了沙皇统治和共产主义的俄罗斯需要一个超越地理、提振民心的统一理想，这样才能成功地把苏联人民吸引回来。特别是在当今原本就略显稀薄的人口正在迅速减少的时候更应如此。

事实上，由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堕胎率和低移民率，到2050年俄罗斯的1.41亿人口可能会下降到1.11亿。受到普遍环境恶化影响的水质和土壤污染，也正加速这一进程。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公开的伊斯兰社区正在增加，并可能在10年内达到该国人口20%以上。即使他们主要集中在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沿岸的乌拉尔地区，以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但鉴于车臣妇女生育的孩子比她们的俄罗斯姐妹们要多1/3，长此以往，毕竟会有地区分裂主义和城市恐怖主义的隐忧。所谓的欧亚主义和由此催生的独立国家联合体（CIS）赖以维系的是地理纽带，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仅仅以地理为出发点，俄罗斯帝国难获新生，甚至很难与基辅罗斯、中世纪莫斯科大公国、罗曼诺夫王朝以及苏联相提并论。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迪米特里·特里宁（Dimitri Trenin）认为，在21世纪“吸引力胜过强制力”，因此“软实力应该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核心”。换句话说，一个真正脱胎换骨的俄罗斯将更有利于向整个欧亚大陆边缘投射其影响力。俄语是从波罗的海到中亚国家的通用语言，俄罗斯文化“从普希金到流行音乐”，仍然需求旺盛。在用知识振兴俄罗斯的过程中，俄语电视台应“成为俄语世界的‘半岛电视台’”。按照这种思维方式，自由民主将是可以让俄罗斯再次实现其心中“地理命运”的唯一

道路。

这种理念与索尔仁尼琴1991年的言论不谋而合，他说：“现在到了该作出毫不妥协的抉择的时候了，要么谋求帝国统治，让自己继续成为受害者，要么实现人民的精神和身体救赎。”事实上，特里宁的分析也有地理方面的因素。他认为，俄罗斯应该更加重视远在欧洲和太平洋边缘的边疆，而不是仅仅重视欧亚心脏地带。一味强调与欧洲合作，将从心态上把俄罗斯往西推移。俄罗斯的人口地图显示，尽管境内地跨11个时区，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居住在毗邻欧洲的最西端。因此，将政治和经济改革与人口结构相结合，可以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地道的欧洲国家。

特里宁写道，就太平洋地区而言，“俄罗斯如果把符拉迪沃斯托克视为其21世纪的首都，那将再好不过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国际大都会海港，靠近北京、香港、首尔、上海、东京，这些大都市都云集在这个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因为苏联把远东地区视为原料基地，而不是通往太平洋沿岸地区的门户，从20世纪70年代持续至今的东亚经济崛起与俄罗斯擦肩而过。特里宁说，俄罗斯正承受这种结果带来的痛苦，要弥补这种过失则需要时间。如今，中国已越过俄罗斯，紧随着环太平洋边缘地区国家日本和韩国采用市场经济，现已成为欧亚大陆的巨大力量。北京给中亚提供了100亿美元贷款，帮助白俄罗斯进行货币互换，又给大陆另一端的摩尔多瓦10亿美元的援助，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一片有影响力的区域。对于俄罗斯来说，相应的策略将是在政治上向欧洲靠拢，在经济上向东亚靠拢。如此，俄罗斯或可解决高加索和中亚的问题，那里的人民渴望自由和较高的生活标准，就像欧亚大陆的西部和东部边缘人民业已获得的那样。

其实，俄罗斯在一个世纪前就有过迎接类似命运的机会。1917年的脆弱时期，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俄罗斯完全有可能演变成为20世纪的法国和德国，哪怕是个贫穷一点、腐败一点和更不稳定的版本，至少停泊在欧洲的范畴里，而不是成为后来斯大林式的庞然大物。

毕竟旧制度下浓重的日耳曼式沙皇统治、说法语的贵族、资产阶级议会和以欧洲的圣彼得堡作为首都，总体上是面向西方的，虽然俄罗斯农民并非如此。俄罗斯的地图在亚洲蔓延，而俄罗斯的人口地图，却心向欧洲。

布尔什维克革命完全拒绝了这个准西化方向。同样，自2000年以来普京实行低限度的独裁统治，先当总统后当总理，并拒绝用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做“冷冻火鸡”试验[(4)]，主要是鉴于20世纪90年代苏联帝国崩溃之后，休克疗法带来的混乱差点吞噬了俄罗斯。普京和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在最近几年都没有将俄罗斯推向欧洲和太平洋，也并未实施对苏联人民更有吸引力的改革，事实上，在贸易、投资、技术、基础设施、教育程度等诸多方面，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反而更显“乌云压顶”。尽管普京严格说来是帝国主义者，但俄罗斯最新帝国毕竟建立在巨大自然资源财富的基础之上，那正是欧洲外围和中国急切需要的东西，因此俄罗斯尚可借此获得利润并对其他地区施加影响。随着俄罗斯的恢复，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并没有令人振奋的思想和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可以提供。实际上，他们所拥有的，上帝施与他们的，就是地理。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储量，第二大煤炭储量和第八大石油储量，其中大部分在西伯利亚西部，介于乌拉尔山脉和中西伯利亚高原之间。除此之外，西伯利亚东部的山脉、河流、湖泊蕴藏着庞大的水电储备，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面临水资源短缺困境时显得格外突出。在普京第一任总统任期的7年间，能源收入主要用于扩军，军事预算特别是空军翻了两番，自此俄罗斯军事预算一直水涨船高。如前所述，俄罗斯除了北冰洋和太平洋以外没有明确的地形边界，因此俄罗斯社会“深层次军事化”，并通过建立大陆帝国“无休止地谋求安全感”，这一切普京已通过他的能源哈里发提供了保障。普京没有选择开放俄罗斯、发挥其在整个苏联地区和欧亚大陆边缘相邻地区的软实力潜能，而是走上了新沙皇的扩张之路，幸好其国家拥有的丰富天然资源使他有资本这样做。

然而，普京没有完全放弃俄罗斯在地理上属于欧洲的维度。他对乌克兰的关注，背后还有更大的企图，那就是在海外周边重新打开势力范围，这进一步印证了他想把俄罗斯以非民主的条件锚定于欧洲的野心。乌克兰作为支点国，南部毗邻黑海，西部接前东欧卫星国，它若独立将使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与欧洲绝缘。然而，乌克兰西部地区奉行希腊和罗马天主教，东部则为东正教；西乌克兰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温床，东部地区则主张与俄罗斯保持更加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乌克兰自身的宗教地理特点使该国具有中东欧之间的边疆作用。布热津斯基写道，没有了乌克兰，俄罗斯虽仍然是一个帝国，但只能是一个“以亚洲型为主”的帝国，并将进一步卷入与高加索和中亚国家的冲突。一旦乌克兰重归俄罗斯统治，俄罗斯面向西方的人口结构就会再增加4 600万人，并同时对欧洲形成挑战和融合之势。根据布热津斯基的观点，下一步俄罗斯所觊觎的波兰将成为“地缘政治的新支点”，决定中欧、东欧和欧盟本身的命运。

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斗争，尤其是和德、法之间的斗争，自拿破仑战争以来一直持续着，今后还将继续如此，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随时命悬一线。苏联帝国虽已解体，欧洲人仍然需要以乌克兰为主要通路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冷战的胜利在相关国内引起了巨大变化，但它无法改变地理事实。澳大利亚情报分析师保罗·迪布（Paul Dibb）认为，一个复兴的俄罗斯可能宁愿“考虑中断复兴，也要创造战略空间”。2008年对格鲁吉亚的入侵，正表明俄罗斯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力量。

在俄罗斯的沉重压力下，乌克兰已同意延长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租约，以此交换较低的天然气价格，克里姆林宫还试图将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网络置于其控制之下（毕竟，乌克兰还依赖俄罗斯的贸易）。然而，并非欧亚大陆的所有管道地理都对俄罗斯有利。中亚的管道向中国提供油气资源，阿塞拜疆的里海石油，通过管道横跨格鲁吉亚通往黑海，并通过土耳其进入地中海，完全避开了俄罗斯。此外，一个以里海为起点的天然气管道计划，打算横穿整个南高加索和土耳其，通过巴尔

干半岛到达中欧，也避开了俄罗斯。不过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筹建从黑海到土耳其的海底天然气管道，以及向西输往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底管道。土库曼斯坦远在里海之滨，通过俄罗斯出口天然气，因此即使有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欧洲特别是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仍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俄罗斯。欧洲的未来，正如过去一样很大程度上依赖东方的发展。

俄罗斯手里还有其他筹码：位于立陶宛和波兰之间的波罗的海海域的强大海军基地；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大量讲俄语的少数民族；亲俄罗斯的亚美尼亚人。此外，格鲁吉亚受到亲俄罗斯的分离省份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威胁；在哈萨克斯坦的空军基地和导弹试验基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空军基地，覆盖范围可达中国、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塔吉克斯坦也允许俄罗斯军队巡逻其与阿富汗的边界。2010年，正是俄罗斯精心策划的媒体宣传和经济压力，帮助驱逐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下台，并指控其引入美国的空军基地等罪行。

此外，俄罗斯必须在辽阔的南部边境，即从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到紧邻中国的塔吉克斯坦的区域内应对伊斯兰教复兴，那里历史上曾是大波斯文化和语言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俄罗斯为了恢复失去的共和国和建立势力范围，肯定需要与伊朗交好，以使对方不与俄罗斯展开地域性竞争，不输出伊斯兰激进主义。由于根深蒂固的地理原因，俄罗斯只能为美国对伊朗政权的干涉活动提供微薄的帮助。

“北极熊”的中亚棋局

但拥有以上优势并不意味着历史会自我重复，在21世纪初扶起另一个新兴俄罗斯帝国。这一切都是中亚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情况在作梗。俄罗斯自19世纪初开始逐渐巩固在中亚地区的控制权，在该地区的贸易甚至扩展到了哈萨克草原上，当地无政府状态的统治地位始终高于部族长老。20世纪初，苏联把中亚广阔的草原和台地分拆成单独的国家，但与其自然民族边界并不相符。由于当时任何试图脱离苏联的举措都无法施

行，使得种族间冲突不断。

苏联对泛波斯主义、泛土耳其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心存畏惧，族群的割裂因而成了一种灵丹妙药，这造成大量的非正常现象：锡尔河山谷起始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人居住区，流经塔吉克斯坦，然后折回乌兹别克斯坦，注入哈萨克斯坦；连接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与费尔干纳省的道路必须经过塔吉克斯坦；从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到塔吉克民族地区苦盏和霍罗格必须穿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希姆肯特市靠近乌兹别克斯坦，居民主要是乌兹别克人，但被“附加”到哈萨克斯坦；以塔吉克人为主的城市撒马尔罕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等。在当时的中亚，苏维埃主义取代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控制和强权的技术。苏联解体后，该地区的俄罗斯族人已被边缘化，但一些地方仍对他们心存敌意；而泛土耳其主义和泛波斯主义则比较薄弱。伊朗自16世纪以来，一直是什叶派占主导地位，而塔吉克人和其他中亚波斯化穆斯林主要是逊尼派。至于土耳其人，则直到最近才以现代土耳其的形态寻求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焦点。

听起来有点讽刺，虽然苏联加盟共和国各单一族群间缺乏完整的身份识别，居然也曾一度保持了中亚的适度稳定，只是偶尔在费尔干纳河谷等地出现动荡。中亚极端丰富、充满活力的天然资源，给其中一些国家提供了与莫斯科和北京讨价还价的底气（中亚天然气需要通过俄罗斯输送到欧洲市场，这是俄罗斯对欧洲的筹码，但俄罗斯的立场正因中国自己购买中亚油气而受到威胁。——作者注）。中亚的自然资源的确得天独厚。哈萨克斯坦的田吉兹油田储量，据探为阿拉斯加北坡的两倍；土库曼斯坦每年的天然气产量居世界第三位；吉尔吉斯斯坦是苏联最大的汞和锑生产基地，另有巨大的金、铂、钯、银储量。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对苏联占领的强烈不满，导致乌兹别克斯坦开放其通往阿富汗的铁路桥作为北约的通路，而没有征得俄罗斯同意；此外还面向土库曼斯坦提供多元化的能源路线，而非完全依靠俄罗斯；在工程建设方面，他们宁可寻求哈萨克斯坦或欧洲的帮助，以开发利用里海大陆架的石油储

量，也不求助俄罗斯的工程师。

以上种种因素，使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难以维持，并在某种程度受制于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因为俄罗斯经济就像中亚一样，本质上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如果俄罗斯新帝国成功建立，将可能只是昔日帝国的一个薄弱轮回，不仅受制于翅膀渐硬的中亚各国，也受制于中国在中亚影响的上升，印度和伊朗的限制也会给它造成一定影响。中国在中亚投资超过250亿美元，并为横跨哈萨克斯坦的2 000英里高速公路买单。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市和中国西部的乌鲁木齐市之间每日有航班往来，中国商品极大地填补了中亚市场的空缺。

哈萨克斯坦可能是俄罗斯在欧亚大陆财富的最终寄存器。作为一个欣欣向荣的中等收入国家，哈萨克斯坦地理面积相当于整个西欧，国内生产总值比所有其他中亚国家加起来都大。新首都阿斯塔纳位于由俄罗斯民族主导的北部地区，苏联解体后，头脑发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想吞并它。沿哈萨克斯坦北部有3 000英里范围与俄罗斯边境接壤，属于苏联的9个州8个在北部地区，人口近90%属非哈萨克人。阿斯塔纳的象征性建筑“生命之树”，由诺曼·福斯特爵士设计，象征着哈萨克斯坦保卫国家免受俄罗斯侵犯的决心。阿斯塔纳再造计划耗资100亿美元，它与南部地区以高速列车相连。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在向真正的独立国家迈进，并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它正在开发3个超巨型的“大象项目”，即石油、天然气和炼油业。里海海域有两大油田，主要由西方跨国公司投资，从里海到中国西部的新石油管道也将很快完成。此外，哈萨克斯坦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铀生产国；它还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铬、铅、锌储量，锰矿储量全球第三，铜储量全球第五，并拥有占世界前十位的煤、铁和金储量。

哈萨克斯坦，是麦金德真正的心脏地带！这里集中了世界上所有的自然战略资源，欧亚大陆中部的咽喉要道在这里相互重叠：地处西西伯利亚和中亚，向西1 800英里外有里海，东部伸展到蒙古；乌拉尔山在

哈萨克斯坦的西北部，天山山麓则始于东南部。哈萨克斯坦属极端大陆性气候，阿斯塔纳冬季拂晓前的气温可至零下40摄氏度。麦金德认为，一些大国或超级大国必须控制心脏地带，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心脏地带在其原住民手中，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争夺的只能是能源资源。俄罗斯若想影响哈萨克斯坦并以某种方式施压，哈萨克斯坦必然无法抵御，但若被逼到极致，他们可以随时转向中国；俄罗斯将会受到国际反对和外交孤立，等于自吞苦果。2008年，在格鲁吉亚这个只占哈萨克斯坦1/40、人口只相当于对方1/3、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已经暴露了俄罗斯在大陆进行军事冒险的局限性。事实上，当吉尔吉斯斯坦在2010年向俄罗斯发出暗示性请求，希望俄罗斯军队干预制止其种族骚乱时，俄罗斯拒绝了。它害怕陷入一个多山的中亚国家，尤其是在哈萨克斯坦的边远地区。

俄罗斯在中亚军事行动中面临的另一个制约因素就是中国，他们在远东共享漫长的边界。俄罗斯与中国的交好将为上海合作组织注入活力，目的是联合欧亚国家（主要是权威体制国家），以抗衡美国的影响。俄罗斯和中国之间若心存敌意，对美国和欧洲在欧亚大陆的影响更大。因此，俄罗斯将约束别国在中亚的行为，坚决阻止任何国家企图以武力收回部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

迪米特里·特里宁很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俄罗斯唯一真正长远的希望，就在于其经济和政治开放，增强俄罗斯对哈萨克和其他苏联人民的吸引力。心脏地带已经随着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和全球化的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力量，哈萨克斯坦比其他中亚国家的土地面积加起来还大一倍以上，就可作为明证。麦金德虽然担心世界横向分离出各种不同的阶级和意识形态，但我们相信，随着权力平衡和地方主义的发展，世界将垂直分裂为各种小团体和小国家，这才有助于保证自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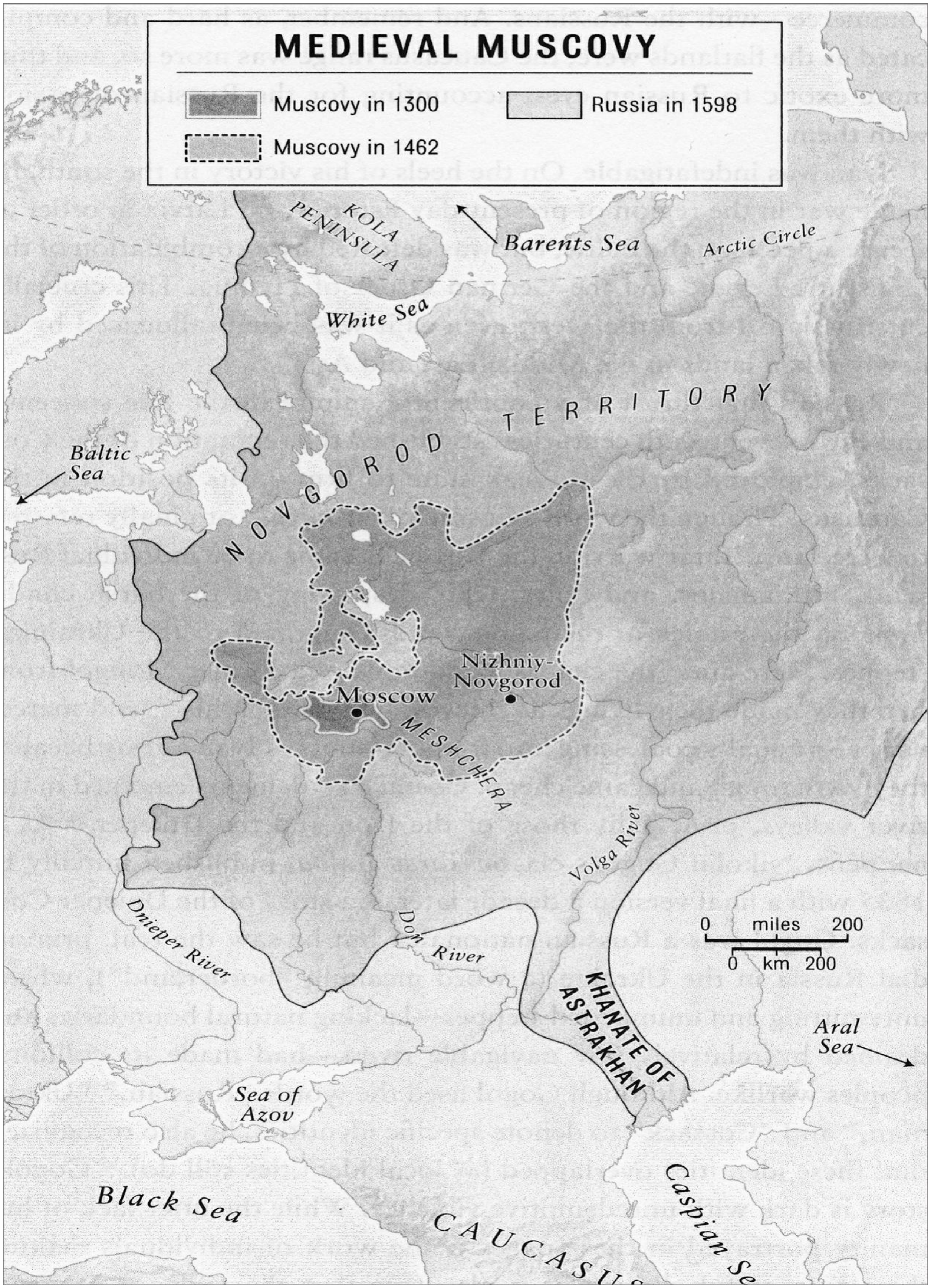
(1) Ivan IV，1553－1584。又被称为伊凡雷帝或者“恐怖的伊凡”“伊凡大帝”，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三岁即位，母亲暂时摄政，却苦于大贵族们

的横暴。当时各集团激烈争权、倾轧和谋杀，对伊凡四世性格的形成及其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译者注

(2) Hanseatic League，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13世纪逐渐形成，14世纪达到兴盛，加盟城市最多达到160个。15世纪转衰，1669年解体。——译者注

(3) 即中东路事件，1929年张学良领导的东北政府以武力收回苏俄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双方发生军事冲突。——译者注

(4) cold turkey，意为突然放弃以前的习惯做法。——译者注


MEDIEVAL MUSCOVY
Muscovy in 1300
Russia in 1598
Muscovy in 1462
KOLA PENINSULA
Barents Sea
Arctic Circle
White Sea
NOVGOROD TERRITORY
Baltic Sea
Nizhniy-Novgorod
Moscow
MESHCHERA
Volga River
Dnieper River
Don River
KHANATE OF ASTRAKHAN
0 miles 200
0 km 200
Aral Sea
Sea of Azov
Black Sea
CAUCASUS
Caspian Sea

（中世纪的莫斯科公国）

（上图地名中文对照如下内容）

图名：MEDIEVAL MUSCOVY　中世纪的莫斯科公国

Muscovy in 1300　1300年的莫斯科公国

Russia in 1598　1598年的俄罗斯

Muscovy in 1462　1462年的莫斯科公国

① CAUCASUS　高加索

② Barents Sea　巴伦支海

Baltic Sea　波罗的海

White Sea　白海

Sea of Azov　亚速海

Black Sea　黑海

Aral Sea　阿拉伯海

Caspian Sea　里海

③ Arctic Circle　北极圈

④ Volga River　伏尔加河

Don River　顿河

Dnieper River　第聂伯河

⑤ Moscow　莫斯科

Nizhniy-Novgorod　下诺夫哥罗德

⑥ NOVGOROD TERRITORY　诺夫哥罗德地区

KOLA PENINSULA　科拉半岛

MESHCHERA　梅晓拉低地

KHANATE OF ASTRAKHAN　阿斯特拉罕汗国

第11章
巨龙崛起
中国实力的地理优势

中国作为一个辽阔的大陆国家，凭借其与亚洲内陆拉锯式交融，向着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延伸，这是当今中国版图与成就的政治现实。

长城除了起到强化生态地理区别的作用之外，为何还能转化为政治上的分野？为何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东西罗马帝国分而自治的局面？

从远东到蒙古再到中亚，从东南亚到南海到东海和朝鲜半岛，作为传统大陆强国的中国，其地缘政治将面临哪些挑战？

中国在向中亚心脏地带施加影响，对大陆边缘地带的东南亚和东北亚有很大的发言权，而现在的西太平洋地区，已呈现出中国陆地权力与美国海上力量对阵的局面……

麦金德在著名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结尾谈到中国时，发表了惊人之语。他先是阐明欧亚大陆内部为什么会形成世界地缘战略强国的支点，随后断言，中国人“可能构成威胁世界自由的黄色危险，原因正是他们能够为其大陆资源再增加海洋前沿据点，这种优势就连占据枢纽地区的俄罗斯人都无缘享有”。这个论断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当时种族主义情绪甚嚣尘上，对任何非西方力量的崛起都报以敌视态度。

且抛开这些不管，先来看看麦金德的分析，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大陆强国，其唯一的海洋前沿主要被北极冰封锁，而中国虽也是大陆强国，但其阴影区延伸到苏联所属中亚地区的战略中心，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矿物和油气资源。中国有9 000英里长的海岸线和许多天然良港，其中大部分是不冻港口，此外还与3 000英里以外的太平洋主航道相连。麦金德于1919年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写道，如果欧亚大陆与非洲连接，由此形成的“世界岛”相当于北美面积的4倍及其人口的8倍，中国作为欧亚大陆上最大的陆权国家，海岸线兼跨热带和温带，将因此占据全球最有利的位置。他在该书的结论中预言，中国将与美国和英国并驾齐驱，最终引导世界，为人类1/4的人口建设一种“既非纯粹东方的，也不是全盘西化”的新文明。

麦金德自始至终都是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同时也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分子，自然把大不列颠看得高人一等。然而，如果仅就地理优势和人口规模来说，他对中国的预测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精准无比的。

中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看似太过明显，以至于我们向来只是大谈其经济活力和民族自信，却往往忽略了这一基本点。现在，到了通过中国历史的透镜来查看其地图的时间了。

虎虎生威的中国

俄罗斯位于北纬50°以北，中国位于它的南部，与美国处于大致相同的纬度范围内，四季变化分明，尽享由此带来的好处。东北主要城市哈尔滨位于北纬45°，与缅因州相同；北京接近北纬40°，和纽约一致；上海地处长江口，位于北纬30°，与新奥尔良纬度相同；北回归线贯穿了中国的最南端，略低于佛罗里达群岛。

美国夹在两大洋和加拿大北极地区之间，唯一的威胁是南部墨西哥的非法偷渡幽灵，而中国的威胁几千年来主要来自欧亚草原地带（该地区也曾从相反方向威胁俄罗斯），集中位于北部和西北部。过去中原本土的汉人和满族、蒙古、匈奴等沙漠民族相互交融，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的核心主题。这也是中国早期王朝的都城往往建在渭河流域的原因之一，那里有足够的降雨量，适宜农业人口定居，也比较安全，不易受到北方高原游牧民族的侵扰。

美国地理环境的典型特征是排列整齐有序的森林、草原、沙漠、高山和海岸，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呈南北流向从中间贯穿而过；中国则疆域辽阔，渭水、汉水、黄河和长江从西向东奔流不息，从欧亚内陆严寒干燥的高地流向湿润的农业区域，直达太平洋海岸。这些农田耕地，也可分为华北地区生长季节较短的旱地（小麦和谷子的主产区），以及华南湿润高产的双季水稻秧田。公元605－611年间修建的大运河把黄河和长江连接起来，相对贫困的中国北方由此得到经济富庶、食有盈余的南方接济。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凯伊（John Keay）的说法，“大运河的作用，与北美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同样巨大”。大运河曾对中国的统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缓解了唐宋北方征服南方所引发的矛盾，从此中原地区作为中国这一农业大国的核心地位得到巩固。在这里我们看到，像修建大运河这样的某种人类壮举比简单的地理事实更具历史意义。

中国华北和华南地区之间自古就存在严重分歧，南北朝曾持续两个

世纪之久，要不是因为后来修建了大运河，这很可能已成为永久性的现实，就像东西罗马帝国一样。

但正如已故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所写的那样，“亚洲内陆高原的游牧生活方式与建立在集约式农业基础上的村舍定居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相较而言，中国华南和华北之间的反差是不明显的”。所谓亚洲内陆，费正清是指某种比较全面的概念，包括“一条宽阔的大弧区，从东北通过内蒙古和新疆直达西藏”。

他接着说，中国的自我意识主要以文化差异为基础，也就是产生于沙漠地带和中原产粮区，即牧区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中国的民族地理正是这个“核心-边缘结构”的反映，核心是可耕种的“中央平原”（中原）或称“内陆中国”（内地），周边则为牧区“前沿”（边疆）或“中国以外”。

这也是中国修建长城的最终目的。政治学家贾库柏·格瑞吉尔写道，长城“起到了强化生态地理区别的作用，并转化成政治上的分野”。事实上，对于早期中国来说，农业就是文明本身，中央王国对周围游牧民族本就无所求；直到公元前3世纪东周王朝晚期起，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才开始吸纳蛮夷人和半蛮夷人作为成员。

从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起，中国开始接触到罗马、拜占庭、波斯和阿拉伯等其他文化，从而发展出相对区域化的空间感。今天的中国境内既有沙漠又有垦植区，规模不亚于一个大陆，这一事实反映了其长期持续、高潮迭起的历史进程，这也为中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地缘政治基础。

这种逐步扩大的过程始于渭水周围的“摇篮”区域，在3 000年前的西周时期那里最为繁荣昌盛，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渭河和黄河下游河道向外扩散，后进一步南移到大米和茶叶的主产区，即现今中国的东南部直到越南北部。即便如此，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北方，以当今北京地区为中心。战国时代，秦国最终在七雄中胜出，据词源查考，英文里的中国（CHINA）即由此得名。

公元前2世纪，汉代取代秦朝。至此，中国疆域包括所有可耕种的腹地，从黄河和长江源头到太平洋海岸，从渤海经由朝鲜半岛直到南中国海。汉朝皇帝将外交和亲与军事突袭双管齐下，得以在匈奴各部之间建立封藩制度，大一统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的定居式农业文明，需不断努力建立能够抗衡三面外界力量的缓冲带，范围从满洲直到吐蕃，以抵御高地的游牧民族。这一历史僵局在结构上与俄罗斯类似，但是，俄罗斯人口稀薄，还要地跨11个时区，而中国从古代起人口分布相对密集，因此更具凝聚力。由于对外威胁更少，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不那么好战的社会形态，但历史上的中国朝代仍在世界上具有特别的影响力和威慑力。

8世纪的唐朝，军事实力威震八方，文学艺术繁荣昌盛。大唐军队穿过蒙古和青藏高原，在整个中亚建立自己的附属国，最远处到达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并进一步扩展丝绸之路。与此同时，唐朝皇帝在西北突厥回纥部帮助下挥师西南，展开与吐蕃的战争。与草原民族的周旋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非毕其功于一役。事实上，军队只是构成唐代国家机器的工具之一。约翰·凯伊认为：“儒家学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也是对那个时代的反映，是强大的文官控制军事的思想。”费正清也写道，“古代中国的辉煌，……是理性的和平主义”，正如儒家神话“德政”所代表的意义一样。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正是这种和平主义造成历史的反复，即中国不断征战草原和高原地区，同时草原游牧民族又反过来侵略中国。公元763年吐蕃军队包抄了唐代都城长安，正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更重要的是，金、辽、元三个朝代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王朝，这代表中世纪亚洲内陆腹地对中原地区的军事进攻。这与宋、明两个本土朝代的失败有关，尽管他们也通过军事技术革新获得部分草原土地。至此，中原地带在与西藏、西域、蒙古至远东边疆的争斗中多以失败告终，俄罗斯也只是在17和18世纪被清王朝打退过（正是在此期间，今天由中国控制的多民族领土被“割让”，但也有例外：台湾就是在1683年被

收复的。——作者注）。总之，中国作为一个辽阔的大陆国家，凭借其与亚洲内陆前前后后的拉锯式交融，向着麦金德所谓的心脏地带延伸扩展，这是当今中国版图与成就的政治基础。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主导民族汉族逐渐聚居于内地的可耕地上，他们是否能够永久与藏、维、蒙等众多少数民族和睦共处，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中国目前正处于大陆强国的鼎盛时期。但是近代蒙受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等列强侵略的创伤，对中国人来说仍记忆犹新。19世纪，清朝沦为“东亚病夫”，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和藩属，英国将中国南部的尼泊尔和缅甸占为殖民地，法国占领了印度支那，日本将朝鲜占为其殖民地并强占了中国的台湾，俄罗斯侵占了当时中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大片领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治外法权协定，饱受屈辱，日本由此窃取了中国心脏地带的山东半岛和满洲，西方国家也分别控制了中国部分城市。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最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宣告结束。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领导人，虽然未必像毛泽东那样把形势看得极为严峻，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历史。现在的中国领土包括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也就是其核心地带周边所有高原和草原），中国领导人在经济和外交战略中展示的“中国”观念，其范围甚至超越了8世纪的大唐和18世纪的大清盛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与巨大的人口规模，与俄罗斯不同的是，它通过商务而非强权来扩大其影响。

中国的大陆强国之路

根据地图所示，中国走向全球性强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虽然过去30年中国年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率，这一增长率肯定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但是，中国即使在混乱时期，仍将屹立在地缘政

治的中心。中国以西式现代性与东方水利文明相结合的方式对麦金德的预言作出了回应，也就是充分利用中央控制的政权，动辄用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建设伟大的水利工程。中国历来政令如山，雷厉风行，而西式民主国家总是欲行又止，在这一点上是不能与之匹敌的。

然而，强国的建立往往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以美国经验为例，从内战结束至1898年美西战争之间的那几位总统现在已经很少被提起了（如拉瑟福德·B.海斯、詹姆斯·加菲尔德、切斯特·艾伦·阿瑟、本杰明·哈里森等），但在他们领导下，美国经济一直悄无声息地保持很高的年增长率；其后，随着美国与外界贸易交往增多，它开始动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南美洲和太平洋地区海域登陆，从而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之外获得经济和战略利益。尽管当时美国存在各种社会弊病，但这些弊病都是这种活力的副产品。此外，自1890年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之后，美国已巩固了内部大陆，这也使得美国有精力集中对外。

中国也正在巩固其陆地边界，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外。与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不同，中国不搞武装传教士那一套。它没有要传播的意识形态，也不想把自己的政治系统扩展到其他地方；在国际政治中推动道德进步是美国打出的目标，中国人不玩这个。但它也的确有非打破现状不可的理由：养活占世界总人口大约1/5的国民，并保持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需要大量能源、金属和战略矿产资源。事实上，正如费正清指出的那样，中国要以7%的耕地养活占23%的世界人口，“相当于每平方英里的可耕地养活约2 000人”。而且，它还要实现其“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是让大多数人口过上富足的生活。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国与邻近地区和资源丰富的遥远地区建立政治关系，以获取其经济发展和增长所需的优势。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算得上是一个超级现实主义的大国。它在整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悄然无息地发展势力，那里盛产石油和矿产；还将整个南中国海到毗邻的印度洋打通，确保港口准入，把油气能源丰富的阿拉伯和波斯世界与中国沿

海地区连接起来。由于在此问题上别无选择，因此北京较少关心与其接触国家的政权类型；它需要稳定，而不是西方设定的判定标准。与中国有经贸关系的一些政权，如缅甸、哈萨克斯坦、伊朗、苏丹和津巴布韦，要么被人为抹黑，要么被视为专制，或兼而有之。而且，中国在全球寻找资源，与美国的传教士角色发生冲突，也与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发生冲突：中国正在渐渐误入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然而，我们经常忽视一个事实：这些国家，以及东南亚、中亚、中东的其他国家，本来就在中国过去某个王朝的势力范围内；就连苏丹，也离15世纪初明朝将军郑和访问过的红海地区不远。

中国并未构成现实存在的问题，它和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即使有也是间接的。中国提出的最基本层面的挑战是地理，其他如债务、贸易和气候变化问题也很关键。它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地区，即麦金德所谓“世界岛”的新影响在增长，但其性质远不是19世纪的帝国主义，而是以更微妙的方式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

中国只需确保其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可以改变东半球的力量平衡，这将引起美国的极大关注。北京凭借在地图上的有利位置以及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其影响力正从中亚向俄罗斯远东地区，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逐渐发展。正如拿破仑的名言所说，“某些国家的政策扎根于地理”，中国正是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大陆力量。

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

尽管中国在中亚、东亚地图上的位置有巨大优势，但在其他方面，21世纪的中国是不完整的，而且充满潜在危险。北有蒙古（地理上的“蒙古”）的例子：这个巨大领土板块的南、西、东部与中国接壤，看起来就像把中国咬掉一口一样。

蒙古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面临欧亚大陆最新历史大迁移和中国城市文明北移的威胁。在中国内蒙古地区已经由汉族居民占主导的情况下，蒙古担心他们未来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况。蒙古有着丰富的石油、煤炭、铀和其他战略性矿物，以及空旷肥美的草场，那里还曾为清朝所拥有。因此，与蒙古的关系于中国而言具备战略性意义，从其积极打通到蒙古的道路，可以看出端倪。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积极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世界领先的铝消费国，对铜、煤、铅、镍、锌、锡、铁等矿物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在世界金属消费量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从10%上升到25%。

蒙古以北和中国东北三省以北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在贝加尔湖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是绵延无边的桦树林。这片浩瀚沉寂的土地相当于欧洲的两倍大小，却只有670万的稀薄人口，还在进一步下降到450万人。俄罗斯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扩展到这一地区的，当时帝国主义盛极一时，而大清正处于羸弱时期；但俄罗斯对任何地区的统治，都不像对东部的三个地区那么力不从心，尤其是它接近中国的这一部分。

在俄罗斯边境另一边的中国东北，生活着1亿中国人，人口密度是西伯利亚东部的62倍还多，因此已有许多中国移民跨越了这条边界。西伯利亚城市赤塔（Chita）的华裔人口规模就已十分庞大，并且还在不断增长。获取资源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俄罗斯远东人烟稀少，天然气、石油、木材、钻石和黄金储量巨大。《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记者戴维·布莱尔写道：“俄罗斯和中国有可能结成战术联盟，但它们之间在远东地区仍很紧张……莫斯科担心中国移民大量迁入这一地区，随即在此地兴建木材和矿业公司。”这个问题已在别的毗邻国家出现过。例如在蒙古，虽然并不存在军事侵略或吞并的问题，但中国的人口和企业显然已悄然控制了大部分曾在明、清两朝属于中国的地区。

冷战期间，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边界纠纷曾引发军事冲突，1969年，苏联军队第53师部署在漠河和乌苏里江俄方占领一侧，中国则在毛泽东领导下作出强硬回应，在中国边境一侧部署百万大军，并在各大城市建设防空洞。为了减轻苏联西侧压力以集中对付远东，时任苏联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提出与美国缓和政策。中国四面受敌，除了与苏联直接对垒外，还受到苏联的卫星国蒙古及亲苏的越南、老挝和印度的威胁。紧张的局势导致中苏分裂，尼克松政府因此抓住时机，在1971－1972年采取向中国开放的政策。

现在，俄罗斯和中国可能因地缘政治分歧再次陷入冲突吗？他们目前的联盟，主要是一种战术。美国可以像过去那样坐收渔人之利吗？这一次，因为中国拥有更强大的力量，美国可能会与俄罗斯结成战略联盟，对其形成牵制，迫使其注意力从目前的太平洋第一岛链转向陆地边界安全。事实上，为了阻碍中国海军的发展，美国必须从中亚基地向其施加压力，特别是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从陆地上施压，可以帮助美国阻挠中国在海上的力量。

其实本可以有另一种更为乐观的情况，也更有利于中国东北三省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个版本可回溯到1917年前，中国贸易和人口在阿穆尔和乌苏里江流域融合发展，促进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复兴，如果莫斯科当时有更开明的政府接受这一情况，就会借此促进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发展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全球枢纽。进一步推动该方案，我几乎可以断定，朝鲜也会出现更温和的政府，有利于以日本海为中心，形成一个开放边界、充满活力的东北亚地区。

中国与中亚地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边界，不像任意划定的那么不完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非历史”边界。中国虽已延伸到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但延伸得还远远不够。

中国最西部的省份新疆，直译为“新的疆域”，为多个民族共同的居住地，由于戈壁沙漠的阻隔，离中国的人口腹地更显偏远。18世纪中

叶，大清乾隆皇帝征服了叛乱，统一了巨大的西部领土，与俄罗斯划定了“稳定的西部边境”，因此中国疆域规模翻了一番。英国外交官和游记作家菲茨罗伊·麦克伦爵士（Fitzroy Maclean）写道，此后，这个地区的历史充满曲折。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不断有反叛和短暂的地方割据；1949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力量进疆，它与中国其他地区才强有力地结合起来。维吾尔族人约有800万人，不到中国人口的1%，但他们占新疆的45%，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区，相当于得克萨斯州面积的两倍。

事实上，中国的人口大量集中于靠近太平洋沿岸的河流低地以及中心冲积河谷，广大西部和西南部干燥的高原则普遍比较空旷。远古时代，中国作为文明的概念一出现，就有意识地沿大江大河发展，河流对于中国的作用正如道路对于古罗马一样重要。在这个中国文明的壁画上，阡陌纵横交错，“无数的河流、运河和灌溉水渠，繁华的市场，花园和稻田，季节性洪水……带回耕作需要的肥沃土壤”。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巨大的淡水库，但到2030年预计供水量相对于水需求而言将会短缺25%。由于西部和西南部的土壤下面还储藏着数十亿吨的石油、天然气、铜，为了确保这些地区的安全，中国几十年来从全国人口中心地带迁移了为数众多的汉族居民来作为填充。

中国与俄罗斯在西伯利亚东部有分歧，同样也会在中亚展开激烈竞争。中国和苏联统治区内中亚各国的贸易额已经从1992年的5.27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5.9亿美元。主要的贸易方式是通过两大油气管道进行的，一条从里海海域横跨哈萨克斯坦运送石油到新疆，另一条运送天然气，从土库曼斯坦穿过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和哈萨克斯坦到达新疆。这再次证明，随着中国向麦金德的欧亚大陆腹地延伸，能源的需求将永不满足。

在所有这一切活动中，中国并不避讳风险，它想尽办法开采世界上最后一部分未开发的铜、铁、金、铀和宝石矿藏。现在，中国已经在喀布尔以南进行铜的开采，其目的是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作为安全通路和

能源管道，把天然资源通过印度洋港口转运过来。中国一直是“异常活跃”的道路建设者，目前正计划连接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在阿富汗，一家名为“中铁十四局集团”的国营铁路公司在瓦尔达克省承揽公路建设工程。中国正从几个方向改善通往阿富汗的铁路基础设施，在美国出兵击败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时，中国正忙着提高其地缘政治地位。确实，军事部署是暂时的，公路、铁路干线、管线则几乎是永久性的。

正像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一样，青藏高原山区的铜和铁矿石含量占中国境内的很大一部分，因此中国对这些自治区分外重视。如果没有西藏，将大大减少中国的面积，同时也相当于扩大印度次大陆面积，这是中国加快青藏道路和铁路项目步伐的一大原因。

如果说巴基斯坦境内有中国修建的道路和印度洋港口项目，因此可能作为未来大中国区的一员，而缅甸等相对弱小的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的话，那么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印度，将是插入中国势力范围的一根生硬的地理楔刺。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的大中国地图，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印度和中国都拥有巨大的人口数量，文化传统丰富多彩，广受尊重又各有特点；尽管贸易关系可以互补，但地理上的接近和一触即发的边界争端，仍使两国注定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竞争对手。

当然，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这些动荡的边界会制约中国力量，因此地理自身就可以成为阻碍中国发展的一大因素。但是，鉴于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持续经济增长的合理前景预期，即使有少数严重的颠簸，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许多陆地边界仍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国用它自己的方式开发了这些人口较少地区的活力。也有人认为，中国边境上有一些不稳定国家存在，比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对北京来说是危险因素。那些国家的边境线我去过，他们处在海拔极高的偏远地区，人迹罕至；中国边境一侧几乎没有任何人活动，因此巴基斯坦可以完全放开。

过去，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有着重要影响，东南亚国家是相对较弱的国家，这里的地理版图历来是不完整的。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内，中国统治过越南；到13世纪末期，中国元朝也曾将缅甸、泰国和越南收归麾下。

中国移民到泰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所说，中国西南地区没有长城，不仅因为那里山峰崎岖，森林茂密，中缅之间山壑陡峭，还因为中国在这个地区扩大边境比北方更容易。没有什么自然屏障能把中国与缅甸、泰国、老挝和越南交界处分离开来。中国云南的省会昆明完全可以成为湄公河繁荣圈的中心，通过公路和河流连接印度支那半岛的所有国家，那里的水坝将提供电力供圈内所有国家消费。这里好比世界人口的驾驶舱，因为东南亚地区有5.68亿人，中国13亿人，印度次大陆1.5亿人，都扎堆聚集在这里。

缅甸是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国家，也处于大国争夺的最前沿，它在该地区规模最大，土地面积最广阔。和蒙古、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中国边界上其他领土一样，缅甸是一个弱国，但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自然资源，这些都是中国迫切需要的。从缅甸的印度洋海岸到中国云南省，距离不足500英里，中国和印度竞相争取在此地发展的机会。

泰国以前本是个强大的国家，然而现在它越来越无法发挥其地区锚的作用了。泰国政治面临深刻的结构性问题，体弱多病的国王与王室难以成为一支稳定的力量，泰国军方忙于派系斗争，公民从思想上分裂成城市中产阶级和崭露头角的农村阶级两部分。中国利用其洪水般的资金优势发展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军事关系，而美国的精力已转移到中东战争，因此对这一区域不甚重视。在东南亚更远的地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正经历民主过渡的自我挑战，他们的两位老牌强势领导人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和李光耀相继从舞台上退去。由于马来族人均是穆斯

林，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种族化，导致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社区之间分化明显。伊斯兰化的蔓延也在过去20年间导致7万华人离开马来西亚，国家经济严重下滑，不得不大量依靠中国进口。

新加坡则用行动清楚地表明了对中国无声的担心。这个城邦国家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位置接近于马六甲海峡的最窄处。新加坡的主体民族是华人，与马来族分占77%和14%。最近退休的部长内阁资政李光耀，曾公开敦促美国在该地区保持军事和外交存在。新加坡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独立地位，就像蒙古的发展一样，将对北京的区域影响力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

而印度尼西亚则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既需要美国的海军力量存在以对抗中国，又担心看起来太像美国的盟友，会在伊斯兰世界激起愤怒。

最近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ASEAN）正式成立自由贸易区，这表明中国与南部邻国之间正在发展一种新型贸易关系。中国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每个东盟国家分别与中国谈判，而不是作为整体交往。中国城市劳动力相对便宜，东盟国家成为其生产的工业产品的销售地，这导致中国的贸易顺差。事实上，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差距扩大了5倍。

看看最近的历史记录：1998年至2001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增长近1倍”，2003年至2004年，菲律宾对中国的出口也是这样。从2002年至2003年，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总共增长51.7%，到了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该地区领先的贸易伙伴，超过了美国”。然而，中国也在东南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现代化发动机的作用，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也是有益的。

在这种情况下最复杂的因素是越南的立场。这个国家历史上曾与中国为敌，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和海军基地，战略地理位置优越，与印度和日本都是中国潜在的缓冲国。不过，即使越南对于这个巨大的北方邻居心存恐惧，也只能别无选择地与其朝夕相处。中国仍然处于扩大影响

力的早期阶段，因为它只是刚刚掌握周边部分区域，未来几十年形势发展的脉络，将决定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

即使政治边界不变，蒙古、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亚以及东南亚都一直是中国的影响力扩张范围，这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朝鲜对东亚局势有着重要影响，它的开放，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地区几十年后的命运。朝鲜半岛是东北三省的天然地理附属物，控制着中国东北地区所有的海上交通线，更特别的是，渤海紧裹在其腋下，那里有中国最大的海上石油储备。

朝鲜接近俄罗斯并有通向太平洋的额外出海口。在那里，中国、朝鲜和俄罗斯远东利益交汇，有很多太平洋沿岸良港面向日本。中国的目标，必然是将朝鲜建成一个更现代、权威、戈尔巴乔夫式的缓冲带，以隔开更活跃的、中产阶级民主的韩国。

但是，就连中国也不能完全预计朝鲜的事态发展。在过去几十年里，其他分裂国家如越南、德国、也门，统一的力量最终都取得了胜利。但是，没有一次统一是在深思熟虑下取得的。相反，它往往一蹴而就，并不尊重所有主权的利益。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最有可能是在首尔的控制之下复兴的，而中国则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民族主义国家对于比其更强大的邻国一直抱有敌对情绪的暗流，特别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历史上曾试图控制或占领它的强国。

当然，韩国对日本抱有很大的戒心，日本从1910年到1945年间占领了朝鲜半岛。首尔和东京之间围绕独岛问题纠纷不断，韩国称那片海域为东海，日本则称之为日本海。同时，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比日本强。统一的朝鲜半岛将略向中国倾斜而与日本疏离，美军将在此无用武之地，并转而增加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建设。换句话说，韩国的未来很可能属于大中华圈，这甚至会影响并减少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面驻军存在。综上所述，中国在向麦金德所谓的中亚心脏地带进取的同时，也可能对斯皮克曼所谓的大陆边缘地带施加重要影响。其中包括东南亚

和朝鲜半岛。

中国的陆地边界，蕴含的机遇肯定大于危险。这使我想起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书中的评论，“在国际体系中，最危险的国家是拥有大规模军队的大陆强国”。然而，中国只是部分符合这样的描述。

诚然，中国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扩大影响力的陆权大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人数约160万人，是世界上最多的；不过，如前所述，除了印度次大陆和朝鲜半岛之外，中国只不过是在填补真空，而非加剧竞争状态。2008年和2009年的情况也表明，中国陆军未来几年还不具备远征能力。当时，解放军不得不参与四川地震应急响应、应对某些边境地区的安全，以及北京奥运会的安保挑战。据海军分析中心的亚伯拉罕·丹麦（Abraham Denmark）称，中国所谓“跨区机动演习”，体现的是中国解放军将部队从大陆一端移动到另一端的能力，而不是运输所需物资和重型设备的能力。

当然，中国拥有优越的条件，可以填补其广阔的前沿权力真空，不需动用真正的远征地面力量作后备，这表明中国在陆地上的安全感，可能是过去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

中国外交官们近年来一直忙于解决与中亚各共和国和其他邻国遗留的边界争端（印度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虽然这些协定对中国来说未必有利，北京这种全面性的做法却是一个强有力的战略风向标。中国已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学者贾库柏·格瑞吉尔写道：“中国的陆地边界稳定，可能是过去几十年来亚洲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之一。”冷战期间因有苏联大军压境，毛泽东将国防预算集中用于陆军，并有针对性地忽略了海军，这其中蕴含的意义不言自明。自古以来，中国一直专注于各种陆地的入侵。中国长城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本意是为了防卫匈奴人的侵犯；15世纪

北方的蒙古人大举入侵，迫使明朝中断其在印度洋的远航。与此相关的是，当前中国陆地边界的有利形势使中国可以腾出手来，建设强大的海军，重新把太平洋乃至印度洋纳入其地缘政治的一部分。

其实，大大小小的沿海国家和岛屿国家都追求扩大海上力量，并视其为理所当然，而像中国这样大陆性的和历史上孤立的国家这样做，却不失为一种奢侈。过去，中国人在肥沃的河谷中生活得很安全，不像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那样，不堪忍受寒冷和贫瘠的土地带来的贫困，被迫走向大海。太平洋对中国人几无所予，在许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无处可走之路，相比之下，地中海和爱琴海海域的人口集中居住在一些封闭海域的岛屿上，对于海洋的依赖则要大得多。

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说过："中国人不像欧洲人，他们缺乏海上探险的胆量，将自己绑定在平原的农耕地上，年复一年地安然劳作。"直到13世纪，他们才知道自己的台湾岛有个洋名叫Formosa，直到17世纪后才大规模迁居，此时葡萄牙和荷兰商人已在岛上建立了贸易客栈。因此，中国人以固有的方式，不慌不忙地走向海洋，他们更喜欢在亚洲的心脏地带赢得有利地位。

台湾——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目前在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代表的陆权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权相互对峙。几十年来，中国专注于在陆地上发展，而美国由于在越南的错误冒险的教训，没有余力对亚洲陆权予以关注，经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考验之后更是如此。中国正处于陆权和海权并重的早期阶段，这是该地区的最大变化。

在地理方面，中国享有沿海的条件，也享受着内陆淡水资源的福祉。中国控制着地跨东太平洋温带和热带地区的亚洲海岸线，其南部边境接近印度洋，并在未来几年考虑铺设道路和能源管道与之连接。中国

在陆地边界总体上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但却面临着一个充满敌意的海上环境。在所谓的第一岛链（First Island Chain）放眼望去，到处是麻烦和挫折，从北向南，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琉球群岛、台湾群岛、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所有这些地方，除澳大利亚以外，均是潜在的热点。

未来的战争可能出现在哪些地方呢？有可能是朝鲜半岛变局或南北方之间的战争，或是美国卷入台海对抗，甚至还有海盗或恐怖主义，可以想象，这些都会阻碍中国舰队访问马六甲海峡和印度尼西亚其他海峡；也有可能是在东部和南部中国海域，围绕海底丰富的能源与其他国家陷入领土领海争端。

从太平洋以外查看这条第一岛链，俨然是一条“反向的长城”。用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詹姆斯·福尔摩斯和吉原俊井的话说，这是美国及其盟国精心组织的一条围堵线，从日本伸展到澳大利亚，相当于阻挠中国获得更大海洋空间的监视塔。在这条线中，中国海军犹如笼中困鸟，这简直让人心惊胆寒。

然而，中国对于海上事务的解决方案一直特别积极，这可能有点令人吃惊。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海权都会比陆权显得更为和善，因此它被认为对所谓自由没有威胁。海军除了打仗以外，还有贸易保护等多种用途，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海权适合那些对陆上战争的伤亡不可容忍的国家。中国如果计划在21世纪主要通过海军体现硬实力，也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正如意大利、英国、美国以及其他海洋国家和帝国在历史上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应将贸易的自由流动和维护和平的海洋体系作为关注重点。

北京对海上事务的处理仍然本着领土的角度，像一个不安全的大陆国家那样，试图以斯皮克曼提出的同心圆方式扩大势力。它所用的术语，如“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本来也是大陆领土概念，由此可见，海洋被视为中国陆地面积以群岛形式的延伸。

中国正在发展不对称技术，以及反侵入的防守能力，旨在不让美国海军轻易进入东海和其他海域。分析家们在这件事上有分歧。波士顿学院的罗伯特·S.罗斯（Robert S. Ross）认为，“中国在具备态势感知能力和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反侦察技术之前，在反介入操作方面能力有限”。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F.Krepinevich）则认为，虽然中国可能会暂时遇到技术上的困难，但它无疑正在朝着使东亚“芬兰化”[(1)]的方向发展。因此，虽然它拥有现代化的驱逐舰编队，并有计划造一两艘航母，但并不会把全部力量用于购买一个海上平台。目前，中国已建造了四艘装载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全部配有新型核武器和常规动力的打击能力。

据原美国海军副部长塞思·克罗普西（Seth Cropsey）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能派出超过美国海军的潜艇部队。据他推算，中国海军计划使用超视距雷达、卫星、海床声纳网络，并将网络战应用于带有机动再入运载工具的反舰弹道导弹，这一新型武器将随着潜艇舰队的蓬勃发展，成为阻止美国海军进入西太平洋大部分海域的有力手段。至于中国正改善扫雷战能力，收购俄罗斯苏27和苏30第四代喷气式战斗机以及1 500枚俄罗斯地对空导弹，并将其部署在中国沿海，都可暂且不提。此外中国还将地下光纤系统引入中国西部纵深超出海军导弹射程之外的地区，一方面加强那里的防御能力，一方面全力以赴地发展进攻性战略，旨在打击美国财富和权力至高无上的标志：航空母舰。尽管美国已停止生产F-22，中国却仍将在2018年至2020年间装备第五代战斗机。

中国的武器装备计划大大改变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当然，它可能无意攻击美国航母，也无法通过远程打击直接挑战美国的军事实力。它的目的旨在劝阻：沿着其海岸线部署大量进攻和防卫力量，未来美国海军就不得不花两三倍的心思，才能打入第一岛链和中国沿海之间。权力的本质就是转变对手的行为，中国人通过其海军、空军、导弹采购，显示出明确的领土观，海洋意义上的大中国因此得以实现。由

此我相信，美中关系将不仅取决于双边和全球贸易、债务、气候变化和人权等问题，更取决于中国在亚洲潜在势力范围的特定地理环境。

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曾说过，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在第一岛链这个海上“反向长城”的所有守卫塔中，台湾处于最高和最核心的位置。一旦台湾回到中国大陆怀抱，它所扮演的海上长城和要塞的作用就戛然而止，而中国海军就会立刻处于更有利的战略地位，其国家的能量，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能量，将急剧地向外投射，达到现在不可想象的程度。虽然“多极化”这个词经常被宽泛地用来形容全球的形势，但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军事意义上的虚拟融合，将标志着多极化世界的真正出现。

根据2009年兰德公司[(2)]的研究报告，到2020年，美国将不再有与中国争夺台湾的能力。根据该报告，不管美国有没有F-22，用不用日本的嘉手纳空军基地，或者动不动两个航母战斗群，都必然会被中国打败。兰德公司的报告强调的是空战。中国仍然不得不从海上强渡数以万计的军队，尽管容易受到美国潜艇攻击。这份报告除了所有常规分析以外，还突出强调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中国距离台湾岛仅百里之遥，而美国必须绕道半个地球才能投放军力，在冷战后的环境里，又无法过多依赖外国基地。中国大陆的反介入海军战略，不仅在整体上拒斥美军，还以一个特定的方式缓解了美国对台湾的征服。中国大陆军方可以无限度关注台湾，而美国却不得不腾出精力应付全球责任；之前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之所以会令台湾舆论界大惊失色，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大陆不仅在军事上可以覆盖台湾，在经济和社会上也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量的30%，对大陆出口则占40%。两地之间的商业航班每周有270架次，上万家台湾企业，占总企业数的2/3，已在过去5年赴中国大陆投资。

两岸有直接通邮和共同打击犯罪的机制，每年有50多万内地游客来岛，还有75万台湾人在大陆居留半年以上。此外，每年往返两岸参观者

已达500万人次。直接占领台湾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更微妙的经济战将达到同样的效果。从这一点来看，“台湾独立运动”必将自取灭亡。未来将会有更高程度的一体化出现，它的发展将是大国政治的关键。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台湾下方是南中国海，它夹在东南亚大陆、菲律宾和印尼之间，更远端直达澳大利亚。全球1/3的商业海运货物和东北亚能源需求的一半，都从这里经过。在这个通向印度洋的门户和世界油气运输的洲际公路，中国参与了多个港口发展项目，如果大中国得以实现，未来终有一天南中国海将由中国海军主导。然而这个地区的问题也不少。海盗的挑战，激进伊斯兰和印度海军的崛起，印度尼西亚海峡两岸的地理瓶颈，都给必须通过这里的大部分中国油轮和船队造成了困扰。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Erickson）和莱尔·戈尔茨坦（Lyle Goldstein）写道，中国还希望利用这里的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储藏，使南中国海成为“第二个波斯湾”。

斯皮克曼指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国家经常通过“周边和跨海扩张”获得对邻近海域的控制。比如，希腊试图控制爱琴海，罗马控制地中海，美国控制加勒比海。按照这个逻辑依此类推，中国现在正试图控制南中国海。

事实上，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扼住了中国通往印度洋的咽喉，而加勒比海正是以相同方式控制了美国通往太平洋之路，因此当时修筑巴拿马运河极为必要。就像斯皮克曼把加勒比称为“美国的地中海”以示其重要性，我们也可把南中国海称为“亚洲的地中海”，在未来几十年，这里将是政治地理的核心。就像美国人当年主导加勒比地区一样，中国也将以类似的方式寻求对南中国海的控制，与此同时，美国已开始改换玩法，宣称保证越南和菲律宾等盟国享有完全自由的国际航道。正是对中国的恐惧而不是对美国的爱，才驱使河内投入华盛顿的怀抱。有越南战争的前车之鉴，这两个昔日宿敌的冰释前嫌，一时间会让人摸不着头脑，但试想一下，由于越南相信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了美国，

其自信倍增，才能在心理上毫无包袱地与美国结成心照不宣的联盟。

中美世纪博弈的必然性

中国正在利用所有的国家权力形式，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商业、军事、文化和人口等，来实现其历史上最大的、几乎超出其法律上的陆地和海上边界的国家范围。然而这里出现了一对矛盾，让我解释一下。

我前面说过，中国在其沿海海域有意采取了非介入（access denial）战略。著名学者安德鲁·埃里克森和杨大卫（David Yang）认为，中国目前可能已经具备更多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并可能计划在将来某个时候进行“公开战略测试”。美国海军仍将有能力切断中国的能源供给，并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阻截中国船只，若光有拒绝进入的战略而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海上交通线，是无力抵挡美国海军水面舰艇攻击的，更不用说与美国的海军正面作战。当然，现在中国的意图是影响美国的行为，而不是公然与美国打一仗。但是，既然从来没有打算实施，搞什么非介入战略又有何用呢？杰奎琳·纽迈耶在马萨诸塞州经营一家国防咨询公司，她解释说，北京的目标是“使权力配置达到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的，它不会，实际上也没有必要使用武力保护其利益”。

因此，台湾声称建立防御能力的目的并非与中国大陆发生冲突，同样，中国也并非注定要与美国发生冲突。各方都希望改变对方的行为，避免战争。如果埃里克森和杨是正确的，那么所有新的武器系统演示都是旨在显示力量，本质上没有秘密可言，更不用说港口设施建设、在太平洋和印度洋设监听站、向位于中国领土和印度洋之间的沿岸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等行为。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强硬的擦边球需要引起注意。例如，中国正在海南岛南端建设一个重要的地下海军基地，可容纳多达20艘核潜艇和柴电混合动力潜艇，这一设施直击南中国海的心脏，以其

独特的风格宣示着对周围海域的主权。

也就是说，未来大中华的核心有可能是南中国海和东南亚（他们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蓝水力量建设计划），随之而来的是全力保护其海上交通线，通达中东，横跨印度洋。若从这条线考虑开去，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冲突看起来就师出有因了。目前中国没有与美国开战的动因，但经过几年或几十年，动因是可以改变的。因此，细心观察中国能力的变化，不失为一个审慎的方法。

与此同时，随着台湾越来越与大陆融合，中国军方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印度洋和遥远的海上通道。在印度洋对岸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原材料需要保护：苏丹、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的石油市场，赞比亚和加蓬的铁矿石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铜矿和钴矿山，都由中国建造的公路和铁路相连，进而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港口。现在，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和介入肯定要比马汉时代更重要，美国在这些航线上的优势，未必将永远继续下去。

从本质上讲，目前亚洲的安全形势比“二战”结束后初期更复杂，更不稳定。随着美国的单极统治跌入低谷，美国海军规模相对下降，中国经济和军事上崛起（虽然速度比以前有所放慢），二者同时发生，多极化日益成为亚洲权力关系的一个特点。目前，中国人在海南岛建设地下潜艇，发展反舰导弹；美国向中国台湾提供了114枚爱国者防空导弹，几十套先进的军事通信系统等；日本和韩国正在进行全面的甲板舰队现代化，对潜艇特别重视；印度正在建设一个庞大的海军。一场军备竞赛正在亚洲举行，各国都加紧调整权力平衡，使其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整个世界都在观望等待，等待美国有朝一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有打仗的动因，但海上的突发失误事件和对权力平衡致命误判的风险，有可能随着军事对峙的日渐复杂而呈现出与日俱增的趋势；同时陆上的紧张局势也会影响海上。我们已经

看到，中国正在迅速填补其地图上的真空。随着各国人口日益增多，战略通道和管线错综复杂，船舰密集分布，导弹射程相互重叠，未来某一天中国很有可能与俄罗斯和印度擦出火花。亚洲的封闭性和即将到来的“空间危机”一直在持续，这意味着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摩擦。

那么，军事上严重透支的美国，又将如何维护亚洲的稳定呢？要如何保护其盟国，限制大中国的边界，同时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呢？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它终有一天将超过美国在20世纪的任何对手。有人认为，美国不应再扮演“离岸平衡木”的角色，其主要盟国，如日本、印度、韩国、新加坡等都要求美国海军和空军与他们本国的力量组成“合唱团”，正如一位印度高级将领告诉我的：大陆地形与海洋形势是不可分割的，矛盾不会总是在遥远的地平线潜伏下去。

这个公海和心脏地带的“合唱团”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美国五角大楼在2010年绘制了一幅21世纪的美国海军地图，旨在“抵制中国的战略力量，而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他们计划将海军舰艇数量从目前的280艘减为250艘，同时将军备预算降低15个百分点。已退休的海军上校派特·加勒特（Pat Garrett）认为，这一计划值得实施，通过此举，美国有可能在加强对关岛地区控制的同时，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战略重要性提升到与大洋洲等同的地位。

关岛、帕劳、北马里亚纳、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以及加罗林岛群，或为美国领土，或与美国订有防御协定联盟，或虽为独立国家却因贫穷而欢迎此类协定。美国在大洋洲的地位是1898年美西战争的战利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军陆战队员用鲜血把这些岛屿从日本占领下解放出来。大洋洲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因为它足够接近东亚，在中国扩展DF21导弹和更先进的反舰导弹应用的过程中，又处于反介入战略的范围之外。美军未来建于大洋洲的基地很低调，不像在日本、韩国和（20世纪90年代前）菲律宾的“岗楼”基地那么扎眼。关岛离朝鲜只有4小时的飞行时间，到台湾只需坐两天客船，最重要的是，它完全为美国所

有，并在经济功能上依赖于美国，美国可以在此进行一些巨大的国防投资，而不必担心被驱逐。

目前，关岛安德森（Andersen）空军基地是美军在世界上最大的指挥平台，美国硬实力可以由此任意投射。这里任何时候都保持10万枚炸弹和导弹的储备量以及6 600万加仑喷气燃料，是空军最大的战略油气库，可即加即走。跑道上排满大型运输机、C-17环球霸王远程重型运输机（Globemasters）和F/A18大黄蜂战斗机（Hornets）等。关岛也是美国潜艇中队驻地和扩大中的海军基地，它与附近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均为美国所有，几乎处于日本和马六甲海峡之间的对等点上。

还有大洋洲西南端的澳属阿什莫尔和卡地亚群岛，这里是极好的离岸锚地；澳大利亚西部海岸的连接点，从达尔文到珀斯，战略潜力也相当巨大。这些地方从印度尼西亚群岛下方守护着印度洋，后者是新兴世界经济的大动脉，也是石油和天然气从中东输往东亚新兴中产阶级国家的必经之地。根据加勒特计划，美国海军和空军将利用大洋洲的地理优势，构筑“区域存在待命系统”，以“地平线之上”为基地，监控从虚拟的大中国边界到欧亚大陆的主要航道。“区域存在待命系统”是英国海军战略家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100多年前的“舰队存在待命系统”的一个变种，意味着分散驻扎的船舶在必要时可以迅速集结成统一的舰队；而“地平线之上”则反映了离岸平衡与参与力量重组的结合。

美国正加强在大洋洲的空中和海上军事存在，这反映了一种妥协的态度，既没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抵御大中国，又不同意由中国海军充当第一岛链巡逻官的角色。毋庸多言，这一计划也考虑到未来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美国的船舶和飞机继续出入中国反介入战略影响区域的同时，其“遗产”基地却缩回到第一岛链区域。

该计划还设想美国的海军活动将在印度洋急剧扩张，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将不会再建立基地实体，而改由严格意义上的“作业位置”和防御协定来保证其在相关国家的军事利益，包括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

以及印度洋的岛国如科摩罗、塞舌尔、毛里求斯、留尼汪岛、马尔代夫、安达曼群岛，其中许多由法国和印度直接或间接管理，幸而两国都是美国的盟国。这将保证美国在欧亚大陆航行自由，能源运输畅通无阻。该计划还将降低日本和韩国现有美军基地的重要性，并用美国散见于大洋洲各地的军事存在缓解关岛不堪重负的压力。对于那些容易遭受打击的“主导”基地来说，此举可以起到转移视线的作用。

在主权问题异常敏感的时代，随着大众传媒的煽动，定点驻扎的海外基地越来越难以为当地居民所接受。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对土耳其基地的启用就遇到了困难，2010年短期使用日本基地也遇到麻烦；美军在韩国的军队作战能力也有所削弱，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人数近年来已从3 800人降到2 500人，首尔市中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军放弃。

在此种情况下，美国对第一岛链的掌控已经开始松动。当地居民对外国基地的抵制日益加剧，崛起的中国对他们来说既恐怖又迷人，美国与其太平洋盟国的双边关系更趋复杂化。

当然，这也是迟早的事。以2009年至2010年的美日关系危机为例，没有经验的日本民主党新政府希望改写双边关系的规则，同时大谈与中国发展更深层次的关系，这本应该在几年前就发生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主导地位难以为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过时的遗产，这次大战给中国、日本和菲律宾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而美军在朝鲜半岛上的主导地位，则是60年前南北战争的副产品，不可能永久不变。

在东亚中心和西太平洋地区，一个大中华正在政治和经济上兴起，并在东海和南中国海域表现出显著的海军实力，与此同时，北京还参与了印度洋沿岸港口建设项目和军备转让事宜。我们只能指望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因为某种突发原因变得糟糕，才有可能扭转这一趋势。在这一新的权力王国外围，集结着成群的美国军舰和来自印度、日本和其他所谓民主国家的联合舰队，尽管可能抵制不了中国的虎威，至少在某段时间内会对其形成制衡；随着中国自信心的增长，其蓝水力量可能更少地

着眼于领土之争，而被这个联盟结构同化。

政治学家罗伯特·S.罗斯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说得很有道理，他说，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悬殊，但因为东亚特殊的地理条件，中美力量对比相对而言会更加均衡，因而更加稳定。在冷战期间，美国海上力量尚不足以遏制苏联，还需要欧洲陆军的支持；但现在即使整个朝鲜半岛都倾向中国，也不需要陆军部署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美国海军相对于现在的中国仍处于优势。当然，美国在日本的陆军规模正在减少，但其目标对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中国，而是朝鲜。

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与之相伴的越来越大的军事实力，在未来几年仍将导致紧张局势达到极致。按我的理解，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的观点即是美国作为西半球的地区霸主，将设法阻止中国成为大半个东半球的地区霸主。这可能会成为划时代的大戏，麦金德对此也应该不会感到惊讶吧。

---

(1) Finlandization，指的是一个弱小的国家近乎无底线地听命于强大的邻国的政策决定，基本上属贬意词汇。类似冷战时芬兰和苏联两国之间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丹麦对纳粹德国也是如此。——译者注

(2) RAND，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以及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它可以说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译者注

第12章
“阿育王”的困惑
印度的地理困境

印度历经哈拉帕、孔雀贵霜、笈多到莫卧儿等王朝相互交叉，宗教在这个次大陆国家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同为文明古国，为何印度在历史上没有形成中国式的政治统一？

21世纪的印度在谋求大国地位时，地理的逻辑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支撑作用？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而治之是弄巧成拙还是历史的必然？阿富汗在印度的地缘政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为何说北京和新德里的新型竞争是战争技术和财富发展的共同表现？恒河边上的文明古国将会如何突破它的极限来与东方巨龙进行世纪大博弈？

对于美国和中国这两个竞争对手来说，印度向哪一边倾斜，可以决定21世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进程。换句话说，印度正成为最终的枢纽国家。按照斯皮克曼的理论，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大陆边缘地带国家。马汉也指出，印度位于印度洋沿岸中心，是中东和中国向海洋渗透的关键。

印度政治精英阶层对于美国自身历史和地理情况的了解达到一个非常深入的水平，而美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对于印度的理解却并没有达到同种程度。然而，鉴于印度高度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特点，特别是因其涉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国，如果美国人不掌握这些情况，就会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出现严重的失误。印度自古以来的历史和地理特点，形成了新德里看待世界的遗传密码。因此，需要从一开始就把印度次大陆置于欧亚大陆的整体背景下来考察。

“德里”的历史变迁

虽然欧亚大陆地广人稀，但在其边缘地带却密布着四大人口中心：欧洲、印度、东南亚和中国。1917年，地理学家詹姆士·费格里夫写道，中国和欧洲的文明分别从渭河流域和地中海孕育成长，并以多样形态向外发展；东南亚文明的发展更为复杂一些，骠人、孟邦人以及后来的缅甸人、高棉人、暹罗人、越南人和马来人等，依次受到向南洋迁移的华人圈影响，沿伊洛瓦底江和湄公河河谷混杂居住，有的分布于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岛屿。而印度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与中国一样，印度拥有自成一体的地理条件，西部和西南部有阿拉伯海环绕，东部和东南部面临孟加拉湾，东部有缅甸的崇山峻岭丛林，北部和西北部有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的主峰。还有一点与中国相似，那就是印度有广阔的内陆腹地。区别之处则在于，

印度不是由单一人口组织和文明发源地生成，缺乏渭河流域和黄河下游那样的政治体制中心，可以向外多方辐射扩展。

恒河流域没有为印度形成单一民族国家提供足够的扩展平台，供其向次大陆深处的半岛南部拓展；印度境内的其他河流系统，如布拉马普特拉河、讷尔默达河、栋格珀德拉河、卡佛里河、哥达瓦里河等，则使次大陆进一步分化。例如卡佛里河三角洲是德拉威人的聚居地，而说印地语的居民则在恒河边聚居。

此外，印度作为欧亚大陆的人口中心，也有像东南亚一样炎热的气候，以及丰富多彩、生机盎然的自然人文景观。因此，费格里夫告诉我们，印度人缺乏建立政治结构的动力，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组织配置资源，至少没有必要动用处于温带的中国人和欧洲人那样大的规模。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绝对，也许带有简单化的种族主义倾向，那是费格里夫时代的共同特征；正如麦金德在中国问题上担心所谓的“黄祸”，费格里夫对印度的深入广泛分析在本质上也是切实有效的，并且颇有见地。

印度次大陆有着自己独特的文明，同时由于上述原因，印度在整个历史上始终缺乏中国式的政治统一；中国的西北边界最不确定也最无保障，而印度则受到邻近的中亚草原和波斯、阿富汗高原的威胁，那里有“更野性、更阳刚”的温带文明。

印度历史上吸引入侵者的最大因素，是其广受欢迎的肥沃农耕地。旁遮普平原的特点在于降雨量恰到好处，而且正好处于波斯—阿富汗高原下降到次大陆平地的落脚点上，得到印度河及其支流的灌溉滋润。事实上，这些呼啸而至的入侵者和来自西亚、中亚的渗透，破坏了次大陆演变到现代的进程以及对稳定的追求。正如麦金德在他的一次演讲中说的那样：“在大英帝国，只有一个陆地边防必须随时作好战争准备，这就是印度西北边境。”

21世纪初印度谋求大国地位时，其优缺点仍然源于地理。已故历史

学家伯顿·斯坦（Burton Stein）指出，中世纪时代的印度版图已经扩展到中亚和伊朗的部分地区，但在同一时期，与印度河流域西北部和恒河流域南部的印度半岛的联系却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成功的鼎盛时期，标志着亚洲内陆高原腹地与中国内地洪水冲积平原之间的相互关系达到顶点；而印度代表的则是千年的沉重，受到更高海拔阴影区的严重影响，最不同的是，它尚未在一定区域内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仍然是较次一级的力量。

印度次大陆与阿富汗东南部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印度与中亚大草原地带、与伊朗高原之间的联系同样深刻。印度和伊朗分享着有利的地理屏障，蒙古从中亚一路打打杀杀，至此已达强弩之末，不得不就此打住；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s，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入侵带来了充满活力的伊朗文化，波斯语一度甚至成为印度官方语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35年。

已故历史学家K.M.潘尼卡（K. M. Panikkar）指出，16至17世纪，印度莫卧儿帝国甚至“成为波斯文化的体现”，如“将诺鲁兹（Nauroz，波斯新年）作为传统节日来过，并普及波斯艺术工艺”。与此同时，乌尔都语也成了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波斯语以及阿拉伯语，并以改进后的阿拉伯文作为书写文字。

因此，印度既具次大陆特征，又是大中东的重要延伸。从这个角度来说，麦克尼尔关于文明混合和融合的观点，也显得更好理解了。

理解印度的关键，是要认识到印度作为次大陆具有重要的地理意义，但其自然边界在许多地方却相当薄弱。整个历史上，这里曾形成各种国家，相当一部分并不符合我们对印度的空间观念，有的甚至产生横跨或偏离。

事实上，印度目前的状态仍然与次大陆的边界不相符合，这是其困境的核心所在：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较小的国家尼泊尔都位于次大陆上，在给印度带来重大安全威胁的同时消耗着印度重要的政治能量，使

其无法把大部分力量投放到整个欧亚大陆。

当然，并不是说远古人类居住区没有遵守次大陆的地理规律。确切地说，印度地理本身相当微妙，特别是西北部地区，与地图给人的第一印象明显不同。

乍一看，地图上棕色的山脉台地分布整齐，沿着目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界和次大陆的热带绿色板块，界线分明；但是，从阿富汗到纵向流淌、穿过巴基斯坦的印度河，其下降趋势却显得相对舒缓，使得千百年来高原、低地和沿江平原大致上分享同一种文化，哈拉帕、贵霜、突厥、莫卧儿王朝、波斯的印度和伊斯兰化的印度，以及普什图人，虽然名字各异，但其实都属于仅有的几大类。还有玛克兰和俾路支的碱性沙漠，将伊朗与印度次大陆连为一体；更不用说中世纪的海上交通，凭借可预见的季风将阿拉伯与印度连接起来。南亚学者安德烈·温克（Andre Wink）将伊朗东部到印度西部的整个地区称为“印度边疆”（The frontier of Al-Hind），是说这个地区在整个历史阶段一直是流动性很强的文化有机体，试图确定其国家边界本质上是有问题的。

哈拉帕文明是由各个集中控制的酋长国构成的复杂网络，兴盛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其地图颇耐人寻味。据考古遗迹发现，哈拉帕文明的两大城市分别为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它们都位于印度河上游沿岸的信德省；其自有文明的核心来源不是亚洲腹地次大陆边界的差异性，而是印度河。哈拉帕人眼中的世界，从俾路支省东北部延伸至克什米尔，然后再向东南延伸，几乎抵达新德里和孟买，直逼塔尔沙漠的边缘。也就是说，它几乎触及现今伊朗和阿富汗，覆盖巴基斯坦很大一部分，并扩展到印度西北和西部。这个复杂的人居地理环境与自然景观相配套，并有能力提供灌溉支持，由此可见，辽阔的次大陆有许多自然细节可以进一步区分。

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雅利安人可能已从伊朗高原渗入，并同次大陆的土著居民一起参与了印度北部恒河平原政治组织的建设进程。于

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200多年里，数个君主国家建立起来，公元前4世纪的难陀帝国（Nanda Empire）已初具规模，领土横跨印度北部，从旁遮普延伸到孟加拉的恒河平原。公元前321年，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废黜达纳难陀，建立孔雀帝国，占有次大陆除最南部以外的绝大部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实体建成，其范围与南亚地理基本相符。

伯顿·斯坦认为，这么多城邦国家和酋长国之所以合并成一个单一连贯的系统，除了它们之间“庞大的商务往来”，更大的原因在于亚历山大大帝构成的威胁。公元前326年，就在他几乎征服恒河流域之际，士兵发生哗变，印度才得以幸免。斯坦写道，促成统一的另一个因素是新出现的泛次大陆意识形态，如佛教和耆那教，它们“赢得了商业人士的忠心”。

孔雀国王笃信佛教，却用希腊和罗马帝国的方法管理帝国，这套行为准则从爱琴海盆地和西亚穿越温带地区，经过山脊河谷迁徙路线渗入印度。然而，要想把庞大的孔雀帝国维持下去，更需要人类的聪明才智。旃陀罗笈多·孔雀的顾问可能是一位叫考底利耶（Kautilya）的人，他撰写了治国经典之作《政事论》（*Arthashastra*）或称“国家之书”，讲述一个征服者如何利用各城邦国家之间的关系创建了一个帝国。他说，任何与自己为邻的城邦国家，都应被视为敌人，因为它会在建立帝国过程中被征服，但与敌人接壤的遥远城邦国家则应被视为朋友。

考虑到团结如此巨大的次大陆帝国必将困难重重，考底利耶重视联盟网络的建立，并对被征服者实行仁政，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应该继续保留不变。孔雀是一个分散的帝国，其心脏腹地位于东部恒河平原，到了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Ashoka）时期，已有四个区域中心：西北的塔克西拉，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外围；印度西部和中部马尔瓦高原上的乌贾因；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苏伐剌城，还有加尔各答南部孟加拉湾的卡林加。

在只有原始交通工具和通信方式的古代，一个帝国覆盖了如此广阔的印度次大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孔雀王国作为一个单一国家，利用地理逻辑统治一个广大的地区，并且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可惜最终因其国力的下降招致了来自西北部的进犯。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希腊人和斯基泰人相继通过开伯尔山口侵入，这也进一步刺激了巽加、潘德延、古宁陀等区域王朝重新瓜分次大陆。

公元1世纪，贵霜帝国在阿富汗北部与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汇处的巴克特里亚兴起，标志着印欧语系的统治者对大片领土的征服，范围从中亚人口心脏地带费尔干纳河谷到东北部的比哈尔邦。从现代意义上看，贵霜王国的地图令人难以置信地与苏联中亚地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印度北部恒河平原重叠。贵霜帝国沿河谷而建，又穿山越岭，所以有着相互矛盾的地理地形。这也提醒我们，在中亚和南亚的政治组织里，边界不一定拥有最终话语权。

笈多王朝（Gupta Empire，公元320－公元550）的建立，在印度次大陆营造了恢复统一的假象，其统治范围很广，从西部的印度河到东部孟加拉湾，从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到中部的德干高原，只有南方大部分地区在其控制之外。这个帝国连年遭受中亚马兵的入侵，他们从西北到拉贾斯坦邦和西部恒河平原，一路长驱直入。此外，跟孔雀王国的发展道路一样，笈多王朝不是单一制国家，而是由贸易和贡税组织起来的商人国家，是以恒河为核心的不稳固的联盟系统。正是从笈多王朝统治范围之外的南方，虔诚的印度教教义向北部的恒河传播开来。

印度南方半岛的主要标志是说德拉威语，与北方所说的梵语相对立，分水岭就是德干高原，此地深受中东和印度支那的海上影响。由于来自中亚的突厥人涌入，笈多王朝渐趋衰落，此后600多年里，一些小国家分分合合，这再次表明，印度不像中国那样倾向于稳固的中央集权和政治统一。事实上，用斯坦的话说，笈多时代后的诸多王国，“与其说是靠政府来界定，还不如说是靠语言、宗教派别和寺庙来区分”。

费格里夫写道，从公元7世纪到16世纪，穆斯林人相继进入印度。“阿拉伯人由沿岸的陆地和海上自然而然地来了，但他们没有留下什么永久的影响。接着突厥人也来了。……大约公元1000年之后，他们越过伊朗高原，穿过阿富汗，到达印度。”因为印度教统治者之间的纷争，整个北部平原在一个多世纪里由伊斯兰教统治着。在南部，俾路支省和信德省是同一条“沙漠腰带”的一部分，直接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将印度次大陆在实际意义上嫁接到了大中东。这期间的大事件包括：伊拉克的阿拉伯人于公元8世纪初占领了信德省、旁遮普邦、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来自阿富汗东部的突厥战将马哈茂德，于公元11世纪初建立王国，统一现今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西北部直达德里，并从阿拉伯海上进攻南部的古吉拉特邦；13世纪到16世纪初，所谓的德里苏丹国统治印度北部，南方部分则由突厥部图格鲁克王朝、阿富汗洛迪王朝，以及来自中亚的其他王朝轮流统治着。

这些侵略者选择德里作为印度的首都，主要是因为其地理功能。费格里夫写道：“信德省和印度河流域，与旁遮普一起形成了印度的前厅，这是一个相对狭窄的通道，有150英里宽，位于印度沙漠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德里就屹立在这个通道的出口。”德里背靠伊斯兰世界，前面是印度教世界（佛教这时实际上已经从其诞生地印度转向东和东北方向传播。——作者注）。地理决定了次大陆西北部并非固定的边境，而是一个无休止的多层次渐变区域，从伊朗和阿富汗开始，并在德里结束。

莫卧儿帝国是这一事实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体现。在艺术和宗教的兼收并蓄方面，很少有帝国能达到莫卧儿的高度。从16世纪初至1720年，他们强有力地统治着印度和中亚部分地区（此后帝国迅速衰落）。

莫卧儿王朝是蒙古帝国的阿拉伯和波斯变种，统治着印度北部到西北部的所有外国穆斯林。其奠基人札希尔-乌德-丁·穆罕默德·巴布尔

（Zahir-ud-Din Muhammad Babur）是查阔台突厥人，1483年出生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山谷，并在那里度过他的少年时期。巴布尔曾试图夺回帖木儿帝国的旧首都撒马尔罕，被成吉思汗后裔穆罕默德·昔班尼汗（Muhammad Shaybani Khan）击败后，巴布尔和他的追随者南下攻占喀布尔。从这里开始，巴布尔与他的军队席卷了从阿富汗到旁遮普的高原，并据此开始了对印度次大陆的征服。在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大帝（Akbar the Great）带领下，莫卧儿帝国成型，主要由拉其普特人、阿富汗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乌兹别克人、查阔台突厥人中的贵族组成，印度的逊尼派、什叶派、印度教徒还有其他教派民族相互重叠组合。这是一个种族和宗教混杂的世界，西北始于俄罗斯南部，向西到地中海。汇合于中东地区的文化和政治形式，在印度这里得到了保存。

喀布尔和坎大哈是这个古老德里王朝的自然延伸，但在印度南部一带势力则小得多，包括今天印度高科技之都班加罗尔周边，此地是印度教势力强大的地区。17世纪晚期，莫卧儿帝国在“世界抓手”奥朗则布（Aurangzeb）统治下，达到了其扩张的顶峰。他在80岁高龄时仍然跃马亲征，平定印度南部和西部马拉他叛军。1707年他在德干高原的营帐里去世，这是他至死都想征服的地方。用潘尼卡的话说，德干“始终是印度宏大的中坚堡垒”，不会屈服于恒河流域氏族。此外，次大陆地形背北面南，而河流从西向东流，奥朗则布的经验也表明，由于印度南北部之间地理连接相对较少，北方人很难统治南部，这一点直到近代才得以改变。

事实上，正是因为印度南部长期叛乱横行，难以驾驭，削弱了北方莫卧儿精英的凝聚力和士气。奥朗则布疲于应付马拉他的强大叛军和其他地方的问题，这给欧洲殖民者以可乘之机。荷兰、法国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轻而易举地在海岸上获得了立足之地，最终导致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要强调的一点是，奥朗则布是以德里为中心的统治者，数百年前次

大陆的统治者，甚至再往前追溯到古代也都是如此。也就是说，今天的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大部分，原本共属于同一个的政体，就连印度南部的主权归属也值得怀疑。对于印度的精英而言，不仅巴基斯坦，就连阿富汗也是印度的地盘，这一点不仅自然而然，在历史上也是合理的。巴布尔墓是在喀布尔，而不是在新德里。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对阿富汗有觊觎之心，但新德里的确对于谁统治阿富汗密切关注，并希望不管谁统治那里，都对印度友好相待。

上帝创造的敌人——巴基斯坦

英国与以前印度的统治者不同，它对海权的掌控远远超过陆地。从它在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设置总督可以看出，沿海是其统治的重点，正是从海上英国才得以征服印度。两千多年来，所有的入侵和迁移都发生在西部和西北部，直到英国入驻，才恢复其地理政治的基本事实：这里的确是一个次大陆。

1901年的一幅印度地图非常奇妙：英国建造的一系列铁路线，构成整个次大陆的动脉形状，从阿富汗边境深入南部锡兰附近的保克海峡，西部从今天的巴基斯坦卡拉奇，到东部今孟加拉国吉大港。技术的发展使次大陆广阔的内陆空间终于统一在一个政体之下，而不是条块分割或受一些薄弱帝国的联盟系统管理。

诚然，莫卧儿与较小的马拉他联邦是这一成果的前身，它们有自治的能力，并出色地管理着次大陆。莫卧儿王朝虽然显赫一时，但因为它标志着穆斯林又一次从西北入侵，直到今天仍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诋毁。大英帝国作为海上力量，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历史话剧里属于中性角色，这出戏剧的脚本仍然在于地理。大部分穆斯林生活在印度的西北部，入侵几乎总是从那里开始，也有的生活在东孟加拉，那里是农业发达的恒河平原东部终点。

英国可能给印度次大陆引进了现代官僚制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建立起铁路系统，但在他们1947年匆忙离开时，这个帝国已被大刀阔斧地重新瓜分过，所采用的方法比以往任何统治者更正式，影响更深远。过去，印度的希腊人很容易迁移到笈多帝国，莫卧儿帝国的居民与马拉他联邦居民碰面也非难事，今天的边界到处是铁丝网、倒钩线和雷区，不同的护照和媒体战争让人眼花缭乱，这些都是技术的功劳。现在的鸿沟在于法律的强化和文明的分野，更多属于人为决定，地理的成分较小。

让我们再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看。巴基斯坦在边境上扼住了印度的咽喉，对其构成莫大威胁，甚至远远超过以核武器武装的对手、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或者大型的传统军队。巴基斯坦位于印度西北部，这里山脉趋缓，与平原相接，正是穆斯林入侵者最钟爱的地形，也因此在整个历史上经常扫荡印度。全球战略预测公司创始人乔治·弗里德曼写道：“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对中世纪印度统治的现代遗存。”就连位于次大陆的巴基斯坦西南部，最早也是由伊朗和阿富汗南部侵入的阿拉伯穆斯林占领的。

可以肯定的是，印度的决策者并不反对穆斯林。印度有1.54亿穆斯林，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印尼和巴基斯坦，而且已经出现了三位穆斯林总统。但是，印度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它设法摆脱宗教政治，以填补在这个印度教绝对主导的国家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鸿沟。至于巴基斯坦，且不论其激进分子，单凭其作为伊斯兰共和国，就在某些方面直接冲撞了印度赖以立国的自由主义根基。

印度和巴基斯坦彼此对对方充满恐惧，这一点可谓尽人皆知。印度可以在常规战争中击败巴基斯坦，但在核打击和恐怖战争时代，两国很难分出胜负。然而，给印度带来麻烦的还不止巴基斯坦一个。阿富汗是另一种风格的典型，就我所知，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隔开的边境，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基本都形同虚设。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官方称开

伯尔-普赫图赫瓦（Khyber Pakhtunkhwa）〕的峭壁和峡谷构成了其边界，但这个边界绝对是漏洞百出。

我自己曾在两国边境往返多次，但却从来没有办理过合法手续。即使在正规的开伯尔边境哨所，每周仍有成千上万的普什图族人不用出示身份证即可大摇大摆地通过，而数以百计的叮当卡车则经常无人检查。这种手续程序的缺乏不仅表明边境两侧属于同一部落，还说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国家本身缺乏作为印度-伊斯兰中心或印度与波斯连续统一体的地理连贯性，因此几乎不可能划出分界线。

阿契美尼德、贵霜、印度-希腊、迦兹纳维、莫卧儿以及其他帝国，都诞生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领地上，或者给印度以威胁，或者合并其中一部分；还有中亚帖木儿和突厥曼纳德沙王，他在1398年和1739年两次打败德里，其帝国根基就在当今的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这是一段丰富的历史，在西方鲜为人知，而印度的精英们则将它们刻在骨子里。当印度人审视次大陆地图时，他们会马上注意到西北部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东北部则有尼泊尔、不丹和孟加拉，这些都是印度的直接势力范围，而伊朗、波斯湾、苏联中亚共和国、缅甸等都是其重要的阴影区。如果不从新德里的制高点看待地区局势，就是无视历史和地理的教训。

上千年来，这个帝国更迭往复，因此阿富汗及其战争对印度来说并不是急需处理的新安全问题。在西方看来，阿富汗是中亚的一部分，在印度人看来，它却是次大陆的一部分。阿富汗的地理位置不论对于今天的恐怖分子还是过去的军队都非常关键，它不仅是入侵印度的主要途径，对于印度的主要敌人巴基斯坦来说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后方基地。

如果说印度的地理逻辑是不完整的，与侵略路线呈直角相对的巴基斯坦则几乎没有地理逻辑，阿富汗就更不必说了。巴基斯坦领土像一张人工拼图，跨越伊朗和阿富汗之间的高原边境以及次大陆的低地，包括

旁遮普省的西半部而非东半部，不可思议地连接到北部的喀喇昆仑山脉，和距阿拉伯海千里之遥的莫克兰沙漠相连。印度河本应作为边界存在，巴基斯坦却横跨其两岸。巴基斯坦有四大族群，彼此对对方充满敌意，每个族群都有固定的地域范围：东北部的旁遮普省人，东南部的信德省人，西南部的俾路支省人，西北边疆则以普什图族为主。伊斯兰教本来应该为国家的统一起到黏合剂作用，但它在这方面已全盘失败，变得更为激进；俾路支和信德省人把巴基斯坦视为旁遮普人霸占的外国实体；西北部的普什图人则进一步卷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深受塔利班毒害的政治之中。其实，若没有旁遮普人为主的军队，巴基斯坦可能不复存在，或缩为“伊斯兰大旁遮普邦”，而半无政府主义性质的俾路支省人和信德人则会被纳入更接近印度的轨道。

巴基斯坦成立于1947年，创始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是一位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他对巴基斯坦的设想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前提下，那就是为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建立一个家园。建国后，次大陆的广大穆斯林聚居在巴基斯坦西部和东部（这里在1971年成为孟加拉国），但仍有数百万穆斯林住在印度本土，这使得巴基斯坦的地域矛盾更显突出。然而，次大陆的入侵和迁移的历史，原本已造就了丰富多彩的种族、宗教和宗派的混合体，巴基斯坦的创立，反而使上千万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成为难民。印度是几大宗教的发源地，拜火教徒（Zoroastrians）、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印度也已生活了上千年。印度国家的哲学理念对这个现实坦然接受，巴基斯坦的哲学理念却远没有这么大的包容性。这就是印度稳定而巴基斯坦却动荡不安的原因之一。

阿富汗在印度地缘政治中的角色

阿富汗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印度地缘政治命运的中央。这个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4岁，识字率28%（妇女识字率更低），只有9%的女性上中学，只有1/5的人口有条件享受饮用水。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

名，全世界182个国家中，阿富汗排名倒数第二，而伊拉克在2003年美国入侵前夕已位列130名，识字率是74%，尚属一个合理百分比。伊拉克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7%，2007年增兵期间，大巴格达地区暴力行为减少，对整个国家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而阿富汗城市化只有30%，意味着在一个村或地区的平叛努力，可能对另一个地方完全没有效果。

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大型城市群集中在一个平面上，有利于军队占领，但阿富汗在地理方面几乎算不上一个国家。阿富汗境内一座座大教堂似的高耸山脉，把大地阻隔得四分五裂，这反倒有利于弥合普什图人、塔吉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而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几乎没什么自然障碍，伊朗与阿富汗的分界也很模糊。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全球4 200万普什图人，一半以上住在巴基斯坦境内，倒是可以据此在印度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河之间建设一个名为普什图斯坦（Pushtunistan）的国家，其大致疆域可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重叠。

阿富汗直到18世纪中叶才以某种国家的形态出现，起初是波斯和莫卧儿帝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后来演变成沙俄和英属印度之间的缓冲地带。我们也可以预见，随着苏联帝国在中亚慢慢解散，巴基斯坦国家也逐步弱化，某个历史性的调整可以使阿富汗在政治地图上消失。比如，兴都库什山脉有可能成为未来次大陆真正的西北边疆，在普什图斯坦和更大的塔吉克斯坦之间形成边界。

塔利班作为普什图民族主义的怪胎，集伊斯兰热情、毒品洗钱、腐败军阀，以及对美国占领的仇恨于一身。用亚洲问题专家塞利格·哈里森（Selig Harrison）的话说，它可能仅仅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工具，由华盛顿那批急功近利的技术军官操盘的海外军事行动，无论以何种方式都难以阻挡这一广泛而宏大的历史转变。

但有另一种现实会对此形成反制。阿富汗虽然比伊拉克更大，但人口较为分散，因此其大小基本上毫无意义。占全国65%的居民都住在主要道路系统的35英里以内，接近中世纪的大篷车路线，342个区中只有

80个对于中央控制来说起关键作用。阿富汗或多或少是从中心实施管控的。自艾哈迈德汗以来，喀布尔要么是权威中心，要么也至少是一个仲裁点。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初到20世纪70年代初，阿富汗经历了查希尔的君主立宪制政府，他是艾哈迈德汗的后裔，温和并具有建设性。各大城市由公路系统连接起来，道路旅行安全畅通，还通过健康和发展计划大体上消除了疟疾。在这段时期结束之前，我背包走遍阿富汗全境，无论搭便车还是乘巴士，从来没有感觉到威胁，也能够到正常营业的邮局发送书籍和衣服回国。与伊朗、巴基斯坦或苏联地区不同，阿富汗的国家认同感也很强，因此，虽然部落网络可能已经很脆弱，但它未来可能不仅仅作为一个缓冲国家存在。

20世纪70年代，喀布尔发生了三起政变，从此这个国家陷入似乎永无止境的暴力冲突之中。若追究起来，苏联的责任应该比阿富汗本身还要大。为了把阿富汗牢牢地固定在势力范围内，苏联不知不觉地动摇了其政治基础，这也直接导致了1979年12月对阿富汗的入侵。阿富汗作为伊朗高原、中亚平原、印度次大陆的地理缓冲区，具有令人屏息的战略重要性，觊觎这里的不仅仅是俄罗斯，还有伊朗人和巴基斯坦人，就连印度决策者也对其动心不已。

塔利班曾威胁要创建从印巴边境到中亚的激进伊斯兰社会，这实际上将促使一个大巴基斯坦形成，使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有能力创造一个秘密帝国，将塔利班头目贾拉勒丁·哈卡尼（Jallaluddin Haqqani）、阿富汗前总理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以及伊斯兰恐怖组织虔诚军（Lashkar-e-Taiba）等统统收于麾下。他们对抗印度的方式，与真主党和哈马斯对抗以色列的方式如出一辙。相反，如果和平的阿富汗和多少有点自由化的喀布尔政府继续存在，新德里的西北边疆就少了一个克星，可以腾出手来在西部和东部边界挑战巴基斯坦。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印度支持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ohammed

Najibullah）的原因，他当时是苏联的傀儡政权，与试图推翻它的亲巴基斯坦伊斯兰“圣战者”（mujahidin）相比，他的世俗统治更宽松一些。印度现在支持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领导的喀布尔政府，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一个稳定且适度温和的阿富汗，将成为中亚南部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枢纽，因为它处于俄罗斯、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利益交汇处，可以直达中亚运输走廊。欧亚贸易航线的最强驱动力是中国和印度经济。通过中亚地区，印度与欧洲和中东市场的贸易量预计每年可增长超过1 000亿美元，只是因为阿富汗仍然处于战争状态，新德里尚未修通到伊斯坦布尔和第比利斯的铁路、船运，或到阿拉木图和塔什干的公路和铁路。然而，印度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一起参与了阿富汗的道路网络建设，贡献极大。印度援建的扎兰季至迪拉腊姆公路，连接阿富汗西部到伊朗的阿拉伯海港口查巴哈尔（Chah Bahar）。

和平的阿富汗能够为印度带来不少好处。公路、铁路、管道建设将在阿富汗全境开工，而且也会贯穿巴基斯坦全境，当然，是在巴基斯坦解决自身的不稳定局面的前提下。此外，和平的地区局势对印度最有好处，因为它的经济发展，已远远超过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中印的全方位博弈

但是，这些目前还无法变成现实。印度次大陆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中最不稳定的地区，帝国和入侵的历史尚未褪色，与之相关的是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而拥有核武器使这个地区的局势更加严重。

在许多方面，大印度有点像早期的现代欧洲，种族和民族群体相互竞争，官僚国家形成过程中力量权衡加剧，伴随着频繁的摩擦和随后的判断失误，偶尔爆发公开的战争。但不同于早期欧洲的多极化，南亚表

现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两极斗争，以阿富汗为主战场，有争议的克什米尔邦为次要战场。

不同于超级大国的两极斗争，这种冲突不讲究什么冷静、公平或规矩。意识形态冲突的对立双方没有宗教或历史仇恨，半个地球和北极冰宽阔的港湾将其隔离开来；而这里的冲突双方一边是印度教占多数的世俗国家，一边是穆斯林国家，双方都处于现代民族主义血气方刚的阶段，由一条拥挤的共同边界分开，附近就是首都和主要城市。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中心地带，与印度北部的恒河流域中心地带，相距不到200英里。

印度迫不及待地希望逃离这个地理环境和这段历史。它与中国的竞争和僵持，形成了这种逃避的主要因素。与印巴之间的斗争完全不同，印度与中国的竞争更抽象、更缺少情感，更重要的是波动较小。这种竞争背后，并没有真实的历史渊源存在。近半个世纪前，印度与中国为争夺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界，在西北部克什米尔附近海拔14 000英尺的阿克赛钦地区和东北部不丹附近的阿鲁纳恰尔（Arunachal Pradesh，即中国藏南地区）打了一场有限度的战争。这场战争最终以中国的胜利告终。

由于对西藏的紧张局势极为关注，中国发现，印度在有争议的边界线以北建立哨所，将其视为宣战，并在当年秋季的一个月战斗中打败了印度军队。任何一方都没有部署海军或空军，所以战斗仅限于没有人居住的偏远地区。目前，印度和中国边界仍有一些地区存在争议。中国已建立了遍布西藏的公路和机场。印度现已落入中国战斗机的操作半径以内，与此同时，印度空军名列世界第四，拥有1 300余架飞机和60多个基地，印度卫星和侦察机也随时关注着有关中国调兵的情报。

此外就是两国海军的崛起。关于中国海军，在前面的章节已有讲述。因为印度没有地中海那样的封闭海域和吸引水手的岛屿群，即使土地温暖而富有生机，印度直到最近都或多或少属于陆地国家，在架构上

较少考虑海洋因素。但军事技术的进步压缩了海洋地理，加上印度经济的发展，使其有能力建造船舶和并购融资。

驱使印度走向海洋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威胁论，中国目前正在加紧建设海军。中国参与建设或升级的港口大多在印度洋周边，如缅甸的皎漂、孟加拉的吉大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中国为上述国家提供大量军事、经济援助以及政治支持。如前所述，中国已经拥有一个宏大的蓝水舰队以捍卫自己的利益，保护连接中东与中国太平洋海岸之间的贸易航道；而印度则以门罗主义的方式，宣示其在整个印度洋的存在。双方海军的势力范围和利益大大重叠，使原本就很突出的喜马拉雅山脉北部边界问题加剧。

当然，中国只是在试图保护自己的海上交通线，保证沿途顺利享有友好的优良港口，而印度却有被包围的感觉。在瓜达尔港的波斯湾入口附近，未来有可能建立一个巴基斯坦与中国海军联合行动中心，印度深受刺激，加大在阿拉伯海卡瓦尔军港的扩张；中国承建缅甸皎漂港口和能源管道项目，印度也不甘示弱，在北部50英里建设缅甸实兑港口和能源综合体；在印度支那西部，印度和中国也加快了管线和资源的竞争步伐。

我们仍然认为，印度与中国之间是一种新型斗争，背后没有历史力量的推动。在遥远的过去，印度和中国的交互往来通常是富有成果的，最有名的是中古和近古时代佛教从印度到中国的传播，后来成为了唐朝的立国宗教。仅在最近的几十年里，由于东方各国军队的海上、空中和导弹力量大涨，欧亚范围内新的地理冲突才成为焦点。距离的消亡，比文明的分化给印度和中国关系造成的伤害更大。在印度，只有政策精英们对中国心存忌惮，而巴基斯坦问题则给整个国家造成消耗，尤其是印度北部。此外，印度和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贸易关系，二者可以优势互补。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成功也会带来问

题。新德里和北京两地的经济大发展被广泛应用于军事目的，尤其是投入昂贵的空中和海上平台；两国之间的新型竞争，也充分证实了保罗·布拉肯的观点，即战争技术和财富的创造互为表里，土地的有限规模越来越成为不稳定的力量，而军事硬件和软件的开发大大压缩了地缘政治地图的面积里程。也就是说，冷战后的最初几十年，印度和中国的地面部队技术能力有限，只能看好自己的边界、巩固国家的壁垒，因此彼此没有感到对方的威胁；但随着飞机、导弹和军舰进入其军事库存，他们忽然看到眼前出现了彼此对阵的新战场。不仅中国和印度有这种感觉，横跨欧亚大陆广阔地带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以色列、叙利亚、伊朗、巴基斯坦、朝鲜等都因处于导弹射程的重叠范围内，而不得不投入一个新的、致命的地理怀抱。

那么，再来看看印度次大陆。这片广阔的土地夹在海洋和山脉之间，早期缺乏政治统一的弊端，至今仍然给印度带来重大影响。

中国对国家的组织和治理比印度好得多。中国每年增加的公路里程数，比印度的总和还要多；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政府机构犹如不堪重负的脆弱芦苇丛。中国的麻烦可能来自怠工和抗议，但印度却会遭到暴力袭击和破坏，特别是在毛派纳萨尔分子（Naxalites）盛行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正如费格里夫所说，这里与外部世界相比，仍属某种“欠发达”的文明，这一说法至今仍能立得住。

其实，不管谁背靠穆斯林的中亚统治新德里，都必然担心仍然动荡的西北高原。美国仍将调动其在阿富汗的驻军，印度将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并被迫保持密切参与。其实，印度在新世纪的大国地位之所以增强，是因为它与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竞争。这对印度来说，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还要说一下印度与次大陆内部一些弱国或准弱国的关系，他们因边界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我们已经讨论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但尼泊尔和孟加拉国，也需带上一笔。

尼泊尔君主制垮台以后，毛派叛军力量上台，并勉强控制住了占人口85%的农村地区。由于从未被殖民统治过，尼泊尔没有继承西方的强大官僚传统，大部分人口生活在阴冷潮湿的低地，与印度相接的边境几乎没有警力把守。我已经走遍这一地区，它在许多方面与恒河平原无异。如果尼泊尔毛派不能增强国力，这个国家可能会逐渐消解。在这方面，孟加拉国比尼泊尔更甚。这个国家没有地域防御力量，平直的农耕地和绿油油的水稻田，与印度边界鸡犬相闻，其边防哨所更是破败混乱，摇摇欲坠。这块人为划分的领土原来是孟加拉地区，先后被称为东孟加拉、东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并有可能在下一次区域政治大博弈中再上演一次“变形记”，穆斯林宗教极端主义和气候变化都可能对它造成影响。同巴基斯坦一样，孟加拉国实行军事和文职人员制度，而且向来运作不畅。上千万孟加拉难民非法进入印度边境，截至本书付梓之时，孟加拉国政府还在为改善其政府职能效率奋力挣扎。将来，孟加拉可以作为陆上贸易和管道路线中转站连接印度、中国以及未来自由和民主化的缅甸。

次大陆的政治分歧从远古时开始，至今仍病灶缠身。在次大陆极北端，喀喇昆仑山脉与喜马拉雅山会合，山下是克什米尔的领土，挤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和中国之间；喀喇昆仑山脉的北部地区有个吉尔吉特镇，由巴基斯坦占领，印度则声称属于自己，并称其为克什米尔西部阿扎德“自由”区（Azad Kashmir）；克什米尔中心的拉达克岭，有两个镇叫斯利那加和查谟镇，由印度管辖，巴基斯坦亦宣示其主权；北面的锡亚琴冰川也是同样情况。

在更遥远的北部和东北部，沙克思干谷地和阿克塞钦由中国管控，印度提出声索；此外，印度占据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穆斯林人口占75%，多年来这一事实已成为刺激圣战起义的燃料，本·拉登生前就曾声明反对印度教主导的印统克什米尔。

尽管克什米尔是不适宜居住的高海拔荒地，但争夺它的战斗却屡屡

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同巴勒斯坦一样，网络空间和新媒体也对克什米尔地区的局势有重大影响，随时可以在千百万人中间触发仇恨，使问题越发错综复杂，其解决更是遥不可及。

技术可以超越地理，但技术同样可以增强地理的重要性。印度次大陆是模糊不清的地理现实，但其边境的勘界工作仍将无限期地进行下去。

中国旧时的历代王朝，几乎全部在其目前边界以内进行治理，而印度却历来没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印度在看待阿富汗和其他势力的阴影区时常常显得心情不宁，而中国则更加平心静气一些。从地理局限的程度上讲，印度是一个地区大国，但同时又是一个潜在的全球性大国，势必将冲击它所能超越的所有极限。

第13章
搅动世界的波斯
伊朗的地理枢纽

地理决定伊朗神权至上政教合一的体制。作为两河流域历经沧桑的文明古国，伊朗为何最终会由什叶派来主政？它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剪不断的历史纠葛？在伊斯兰革命风暴下为何其神权统治反而愈发变得牢固？

作为伊朗高原的唯一国家，伊朗不仅位于麦金德心脏地带的南部，也属于斯皮克曼所说的大陆边缘地带，加之其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及横跨两大产油区的独特区位优势，使得伊朗在历史上的枢纽位置更为显著。

在“绿色革命”的冲击下，伊朗的神权统治日益不为西方人所容忍，伊朗的核问题犹如中东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在西方国家的挑唆下引爆，曾经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如何才能恢复大中东强国的昔日风采？

麦克尼尔曾经讲过，印度、中国和希腊分别处于“古代文明世界的末梢”，他们受到高山、沙漠以及遥远距离的保护。当然，这种保护只是部分的，就我们所知，希腊曾被波斯人蹂躏过，中国受到蒙古和突厥等草原民族入侵者的困扰，印度则遭受穆斯林的入侵。

不过这三个伟大而独特的文明之所以能够扎根，都有地理提供足够的屏障。在这些文明之间的巨大空间，正如前面章节中指出的，正是麦克尼尔的同事马歇尔·霍奇森所提出的“一世界”（Oikoumene），即古代希腊语的“世界居住地”之意。这是希罗多德的世界，是从北非延伸至中国西部边缘的亚非大陆的温带旱地，也是霍奇森称之为“从尼罗河到阿姆河一带”（Nile to Oxus）之处。

霍奇森敏锐地捕捉到几个关键而矛盾的事实：“一世界”即“大中东”，是一个很容易定义的区域，处于希腊、中国、印度之间，又明显与这三个地方区分开来，对他们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样的关系是非常有机的整体。

但大中东又统一于伊斯兰教义之下，以马和骆驼作为游牧遗产，这与中国和印度的农业文明有本质的区别，同时其内部又细分为河流、绿洲、高地等不同地貌，给今天的政治组织带来了许多衍生物。大中东和中国之间的差距，尤其能说明问题。已故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写道：

> 古代中国文化同宗同祖的特点已为考古记录所证实。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中东地区的人口、国家和文化却表现出多重性和多样性。
>
> 从大约公元前3000年开始，埃及人、苏美尔人、闪米特人、阿卡德人、亚摩利人……亚述人、腓尼基人、希提人、玛代人、波斯人以及其他族人，在扑朔迷离的……战争和政治洪流之中相互混

杂，他们的历史是一种充满复仇色彩的多元化记录。在尼罗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河谷……几个中心地区，农业靠灌溉发展起来，语言、书写系统和宗教向外传播。

这种地域分割的古代遗产，跨越了千年鸿沟，对我们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今日动荡的大中东政治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阿拉伯语已统一本地区的大部分，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主要统领北部高原地区，更不用提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许多种语言。

正如霍奇森所说，某些中东国家的建立虽然是西方殖民地时代地图任意裁定的结果，但在古代也有其地理基础。这些国家的多样性，加上宗教、意识形态、民主化的力量，竞相操纵其发展进程，并进一步为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理论提供部分具体论据。处于地球干旱地带最核心的地区，也是地球上最不稳定的地区，这是21世纪世界政治最关键的事实。

用学者杰弗里·肯普（Geoffrey Kemp）和罗伯特·E.哈卡维（Robert E.Harkavy）的话说，中东是一个“巨大的四边形”，连接着欧洲、俄罗斯、亚洲和非洲：西部与地中海和撒哈拉沙漠结合，北部有黑海、高加索、里海和中亚草原大地，东部是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次大陆，南部临印度洋。这个四边形与中国或俄罗斯不同，它并不构成一个庞大的国家；它也不像印度次大陆，甚至没有一个占绝对优势的主导大国，否则至少会提供一些连贯性的假象；此外，它也和欧洲不同，并没有形成统一制度下的联盟结构（如北约和欧盟）。

中东看起来非常无序，令人眼花缭乱。王国、苏丹、神权、民主、军事独裁，其共同边界像是由一把没有握稳的剪刀任意裁出。整个区域包括非洲之角、北非、中亚，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印度次大陆，构成一个压缩版的“不稳定轴心”（axis of instability）。在这里，各大洲、历史道路网、海上通道相互交错衔接，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蕴藏丰富的石

油和天然气，各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70%和40%。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布拉肯提到的所有病症，本地区都容易发生：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从众心理、重叠覆盖的导弹射程范围，还有唯利是图的传媒，其观点的偏执程度丝毫不亚于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事实上，中东是除朝鲜半岛以外核扩散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中东也是青年增长聚集区，其中65%的人口不到30岁。1995年至2025年间，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曼、叙利亚、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也门的人口将增加一倍。年轻的群体是最有可能导致动荡和变化的力量。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下一代的统治者，都不会再像其前辈那样享有独裁统治的奢侈，该地区进行的民主实验也证明，虽然选举很容易实现，但稳定和自由民主的秩序却需要漫长的过程和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善。

在中东，青年群体性膨胀和通信革命已引发一连串墨西哥式的混乱变革场景，更乱更多的派别和多党制次第出现，取代了一党决定制度，但又没有达到墨西哥的制度化水平，后者虽然仍属初级阶段，比起大多数中东国家还是进步得多（对美国而言，与一个真正民主的墨西哥打交道，比与有效的一党统治的墨西哥交往要难得多。——作者注）。先进武器装备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预示着未来几十年中东的战争有可能比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更为惨烈。回头再看阿以冲突，不管是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代的，还是带有几分浪漫和怀旧的情调，道德上的考虑和战略优势的计算权衡，也都比较鲜明突出。

阿拉伯半岛的核心——内志

霍奇森的“从尼罗河到阿姆河一带”，基本上是指从埃及到中亚的部分，其中埃及可作为北非的简括。“北非”这一说法，包括属于阿拉伯地区的南部中东沙漠和平原，以及非阿拉伯区的北部山区台地，该地区始

于黑海，终于印度次大陆。北部高原地区呈不规则伸展，也可被称为“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印度河”（Bosphorus-to-Indus）。这个地区受到中亚迁移的严重影响，并相应地影响了尼罗河到奥克苏斯，以及地中海、红海、印度洋的海上交通。事实上，中东是几大洲的交汇点，其内部地理比欧洲以外的任何地区更复杂、更广阔，跨越的时区则是欧洲的两倍多。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中东地区分解成不同部分进行具体分析。

近些年来，电子通信和航空旅行已经克服了地理的限制，因此危机的解决受到整个地区政治互动程度的限制。例如，以色列拦截了向加沙运送救灾物资的船队，土耳其、伊朗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群情激昂；突尼斯中南部的一个果蔬小摊贩自杀，不仅突尼斯内部爆发示威，大半个阿拉伯世界也群起响应。研究一下地图和其先天的分歧，个中原因即见分晓。从中东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大陆桥，这三个地域特征分外明显。

阿拉伯半岛由沙特阿拉伯王国主导，也包括其他重要的国家。沙特阿拉伯人口只有2 870万，占半岛居民人口不到一半；但其年增长率近2%，如果高出生率继续下去，其人口将在几十年里增加一倍，鉴于该国主要由高原草地和水资源贫乏的沙漠组成，大量的人口会给资源带来巨大压力。接近40%的沙特人在15岁以下，年轻男子40%失业。这样一个年轻群体的就业和教育问题给该国带来的政治压力也将是巨大的。沙特阿拉伯的力量并非来自其人口规模（这其实是一项负担），而是来自其石油储量的全球领先地位，沙特现有原油2 620亿桶，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四，有240万亿立方英尺。

沙特的地理摇篮是内志，这里也是与极端逊尼派宗教运动相关的瓦哈比教派的中心。这个干旱地区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中心，夹在北部的大内夫得沙漠和南方的鲁卜哈利沙漠之间，东部是波斯湾沿岸地带，西部是汉志山。“内志”一词是指高地，此地西部海拔5 000英尺，东部则有2 500英尺。19世纪后期，英国探险家和阿拉伯学者查尔斯·M.道蒂

（Charles M. Doughty）对内志有如下描述：

> 溪水有气无力地尖叫着，和着沙砾的噪音，它是内志各个村庄干旱少雨的土地发出的哀鸣。牛再有劲也派不上用场，这里连超过三或四英寻[(1)]深的井都凿不出来。他们说，如果上帝没有创造骆驼，内志早已没了人烟。

内志正是霍奇森所谓“骆驼游牧”的心脏地带，以此为堡垒，瓦哈比派狂热分子近几个世纪以来向各方发起袭击；而汉志省则毗邻红海，拥有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内志的瓦哈比派分子视那些到各种圣地朝圣者为异端，唯独到麦加天房（Kaaba）的朝觐者除外。在西方人头脑里，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代表着穆斯林的宗教性，事实却恰恰相反：朝圣的穆斯林从伊斯兰世界各地辗转而来，给圣城和汉志周围增添了一抹世界主义色彩。中央情报局官员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写道，汉志“人口年轻，温文尔雅，宗教多样，从未完全遵守过沙特瓦哈比的清规戒律”。

汉志人面向红海，从埃及、叙利亚寻找文化寄托，而不是求助于内志严峻的沙漠及其瓦哈比教义。其实，瓦哈比派在历史上就无法保住阿拉伯半岛边缘，其对手甚至发现他们同样难以保住内志腹地。当代沙特阿拉伯的存在，归功于20世纪上半叶一个人的眼光和能力，它就是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Abdul Aziz ibn Saud）。这位内志人于1925年征服了汉志，他对国家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其地理优势。这个国家专注于内志和首都利雅得，不包括波斯湾沿岸的酋长国，也不包括阿曼和也门。

沙特阿拉伯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也门。也门只有沙特阿拉伯国土面积的1/4，人口则几乎一样多，这使阿拉伯半岛的人口核心密集于其多山的西南角落，那里广阔的玄武岩高原连接着沙堡构造带，火山爆发留下的凹凸起伏环抱着自古以来人口稠密的绿洲。

像尼泊尔和阿富汗一样，也门从来就没有真正经历过殖民统治，因此没有发展起强大的官僚机构。几年前我前往沙特，路过也门边境地区，只见一辆辆皮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青年男子呼啸而过，他们忠于这个或那个酋长，也门政府的存在简直微不足道。也门境内的枪支数量估计高达800万，几乎每个也门人有3支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也门首都萨那，美国军事专家曾告诉我："在也门，你至少能发现两千万咄咄逼人、富有商业头脑且全副武装的人。与邻国沙特相比，他们更加勤劳，积极努力。它的未来让利雅得政府害怕到极点。"

沙特阿拉伯是阿拉伯半岛的同义词，就像印度是次大陆的代名词一样。但是，与印度人口稠密的状况不同，沙特阿拉伯在地理上由模糊不清的绿洲网和广阔干旱的大片土地构成。公路和国内航空联系，对其凝聚力显得至关重要。印度立足于民主和宗教多元化的思想，而沙特阿拉伯是建立在大家庭式的忠诚上；然而，印度几乎被非常态化的国家包围着，沙特阿拉伯的边界却向北消失在无边的沙漠里，东部和东南部有很好的屏蔽（朝向巴林的部分除外），邻近的酋长国看起来治理有方，自给自足，它们也是历史和地理的产物。今天的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领土，沿途都是19世纪最大的海上力量英国的贸易路线，特别是印度沿线。英国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谈判达成交易，使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独立。大规模的石油储量构成这些国家故事的其余部分，用英国的阿拉伯学者彼得·曼斯菲尔德（Peter Mansfield）的话说，他们都是"埃尔拉多"（Eldorado），即传说中的"黄金国"。总之，阿拉伯半岛西南地区人口最多，那里正是沙特阿拉伯最脆弱的地方。武器、爆炸物、麻醉品咖特叶（QAT）从那里大量流入，大多来自也门边界。未来拥挤的部落化也门将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确定了沙特阿拉伯的未来，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地理或许比思想有更多的联系。

地理将怎样报复伊朗？

中东另一端的伊朗高原只是一个国家的代名词，那就是伊朗。伊朗有7 300万人口，是沙特阿拉伯的两倍半，与土耳其和埃及并列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伊朗的管理者已有意识地将其人口增长率降到1%以下，15岁以下的人口只占22%。因此，伊朗的人口不是负担，而是一种资产。

当然，也有人会举例说，土耳其有更大的人口基数，低人口增长率与伊朗相似，但识字率更高；它的农业经济非常稳定，工业化也超过伊朗。土耳其位于伊朗西北部，接近欧洲，离逊尼派阿拉伯人口中心更远。在油气生产大国的行列里，土耳其处于垫底的地位，而伊朗石油储备量世界第三，有1 330亿桶，天然气储量排名第二，达到970万亿立方英尺。然而，伊朗的区位优势尤其得天独厚，处于麦金德心脏地带的南部，斯皮克曼大陆边缘地带的里面。这才是伊朗真正值得一看的东西。大中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集中在波斯湾或里海地区。正如航线一样，油气管道已经从里海地区辐射开来，延伸到地中海、黑海、中国和印度洋。横跨两大能源产区的唯一国家就是伊朗，因为它的领土从里海延伸到波斯湾。波斯湾拥有世界原油储量的55%，伊朗占据整个海湾，从伊拉克边境的阿拉伯河到霍尔木兹海峡，全长615英里。

这些海湾，包括入海口、港湾、海峡、岛屿，是自杀性攻击最好的隐蔽处，油轮有时会在这里撞到快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线长度是1 356海里，第二长的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只有733海里。伊朗还有300英里海岸线正对阿拉伯海，包括邻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查巴哈尔港，伊朗因此成了苏联中亚内陆国家重要的温带淡水供给源。伊朗北面的里海沿岸，山地密林环绕，从西部的阿斯塔拉绵延近400英里，与苏联的阿塞拜疆边界接壤；东部的托尔卡曼港海岸则邻近土库曼斯坦边界。

看看欧亚大陆的地图，我们能看到更多东西。扎格罗斯山脉宽广的背部，从西北的安纳托利亚经伊朗一路落至东南部的俾路支省，山岭西部的道路对美索不达米亚完全开放。1934年，英国地区专家和旅游作家

芙蕾雅·斯达克到扎格罗斯山脉的卢里斯坦山区探险，她的出发点自然是巴格达而不是德黑兰。东部和东北部的道路通往呼罗珊、卡拉库姆沙漠和克孜库姆沙漠，这两个沙漠分别属于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既横跨波斯湾和里海丰富的能源产区，也横跨中东和中亚。除了伊朗，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敢这么说。

蒙古人对伊朗（波斯）的入侵，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坎儿井（qanat）灌溉系统被摧毁，最重要的是，它影响了波斯在中亚的前景。伊朗对苏联高加索和中亚加盟共和国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这些苏联共和国在伊朗北部有大量民族同胞，因此在理论上也可以破坏这个国家。在伊朗西北部的邻国阿塞拜疆有大约800万阿塞拜疆土耳其人，而在伊朗的阿塞拜疆省和德黑兰省，这些人口的数量却有两倍多。

阿塞拜疆人是伊朗政体的共同创始人。1501年伊朗迎来第一位什叶派国王伊斯梅尔，他就是一位阿塞拜疆土耳其人；阿塞拜疆商人和阿亚图拉[(2)]，在伊朗也非常重要。在西部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附近，伊朗的影响是行之有效的，在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影响同样深刻。如果未来伊朗和曾属于苏联伊斯兰缓冲带的南部建立不那么专制的制度，伊朗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还可以进一步加深。

此外，我们从新闻头条可以知道，伊朗直到最近都在邻近的地中海地区享有令人羡慕的政治地位，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真主党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和复兴党的叙利亚都是如此。历史和地理表明，伊朗在所有方向都有突破。公元6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的帝王宫殿在现代巴格达南部的泰西封，当时的国王宝座下面还为罗马和中国皇帝留了空座，以示虚位以待，此外还有座位留给中亚游牧民族的领袖，当他们来拜访时，可以作为候补进入万王之王的宫庭。此外，伊朗不是20世纪某个家族或某种宗教思想的发明创造，不像沙特阿拉伯任意裁定边界，它几乎与伊朗高原完全吻合，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的话

说，是“近东的卡斯蒂利亚”，其文明的活力则远超后者。伊朗是古代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大国。布朗写道，波斯帝国甚至围攻过希腊，“像一条巨龙的尾巴……远远地横扫奥克苏斯、阿富汗和印度河谷”。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伟大地理学者W.巴托尔德（W. Barthold）同样认为，大伊朗在幼发拉底河和印度河之间，库尔德人和阿富汗人在本质上其实正是伊朗人。

语言学家尼古拉斯·奥斯特勒（Nicholas Ostler）写道，近东人中只有希伯来和伊朗的古老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波斯的法尔西语，没有被阿拉伯语所替换，它在11世纪和今天是相同的形式，尽管它采用阿拉伯文的写法。伊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转一种彬彬有礼的文明，比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和肥沃新月的所有地方都古老，甚至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

伊朗其国近乎浑然天成。其神职政权内部的激烈竞争，倒也体现一种更高的制度化水平，比该地区除以色列和土耳其以外的任何地方都要高。正如中东对于非洲和欧亚大陆来说是一个四边形，对于世界岛而言，伊朗就是中东的万向节。麦金德的枢纽不应在中亚土地上，而应向南转移到伊朗高原。这样，伊朗正日益受到中国和印度的青睐也就毫不奇怪了，其海军甚至可以在21世纪的某个时间与美国海军分享欧亚海上通道的优势。虽然伊朗在面积和人口上远不及以上两个大国以及俄罗斯或欧洲，但因为它处于关键的地理位置，在人口、资源和能源方面也十分重要，因此是地缘政治的根本。

“伊朗的理念”，是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阿克斯沃西（Michael Axworthy）提出的说法。他解释说，这种说法关乎文化和语言，也与种族和领土密切相关，意为伊朗具有古希腊和中国那样的文明吸引力，把其他民族和语言纳入其语言的轨道。这是软实力的本质，在麦克尼尔的概念里，象征着一种文明和文化对其他文明的影响。达里语、塔吉克语、乌尔都语、印地语、孟加拉语、伊拉克阿拉伯语都是波斯语的变

种，或受到其影响。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从巴格达一直走到加尔各答，却没有跳出波斯文化圈。用旧时地图对伊朗历史来个简短的扫描，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活力。

大伊朗起始于公元前700年，玛代人在古老的斯基泰人帮助下，在以拦（古伊朗）西北部建立独立国家。公元前600年，其范围已从中央的安纳托利亚到兴都库什，即从土耳其到阿富汗，南部达波斯湾。公元前549年，来自波斯阿契美尼德王室的王子居鲁士大帝（Cyrus）夺取了伊朗西部的米底亚都城埃克巴塔，即今天的哈马丹，随后继续征服。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公元前539－公元前312）处于极盛时期，首府位于伊朗南部的波斯波利斯，并从那里不断发出扩张的命令，西北攻取色雷斯和马其顿，西南直指利比亚和埃及，一路向东收服旁遮普省，往北横跨高加索、里海和咸海，往南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海。至此，帝国疆域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印度河地区，尼罗河也被囊括在内，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与之匹敌。公元前5世纪的波希之战决定了西方对古伊朗的态度，我们普遍同情希腊人，反对波斯人。但也要看到，“一世界”相对平和、宽容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及其后继帝国的统治，为伟大的忏悔派宗教的出现和繁荣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阿克斯沃西写道：“帕提亚人……体现了伊朗最高的品德，即认同、接受和包容文化的复杂性……这是他们统治的基础。”帕提亚人的都城设在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和相邻的卡拉库姆地区，以伊朗语为通用语言，统治区间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疆域从叙利亚、伊拉克到阿富汗中部和巴基斯坦，以及亚美尼亚和土库曼斯坦。与阿契美尼德的疆域划分法不同，帕提亚帝国为大伊朗的现实打下了基础。这不见得是坏事。帕提亚帝国的统治极为分散，与其说是直接把控，不如说是一个强大的势力范围，并充分借鉴了从希腊人那里继承的艺术、建筑、行政惯例。今天的伊朗，神职政权固然威严，但人口、经济和政治力量同样充满活力，人口中最关键的阶层是不受管束的。

中世纪的历史纪录在地图和语言上都遵从古制，只不过方式可能更微妙。公元8世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轨迹从叙利亚向东转移至美索不达米亚，即从倭马亚哈里发王朝过渡到阿巴斯哈里发王朝，在9世纪中叶达到顶峰，统治范围从突尼斯向东至巴基斯坦，从高加索和中亚向南到波斯湾，首都位于巴格达的新城，紧挨着古波斯萨珊首都泰西封。这个新帝国继承了波斯帝国的官僚体制，给金字塔形的政府结构又做了整体加层，进一步加固了统治基础。与其说是一个酋长国，阿巴斯哈里发更像伊朗专制的象征。一些历史学家称它是波斯人对中东的“文化复辟”，只不过打着阿拉伯统治者的幌子。

阿巴斯王朝承袭了许多波斯传统，正如倭马亚王朝因更靠近小亚细亚而承袭了拜占庭的惯制。历史学家菲利普·K.希提（Philip K.Hitti）写道：“波斯的官爵高位，波斯的美酒和美人，波斯的主妇，波斯的情歌，以及波斯的理念和思想，在当时引领风骚。”此外，波斯人还帮助巴格达确定了其巨砖结构和环形圈地的设计。

“在西方人的想象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彼得·布朗写道，“伊斯兰（阿巴斯）帝国代表东方力量的精髓神祇。伊斯兰教的这一关键性取向既非源于穆罕默德，也不应归功于公元7世纪宽容的征服者，而应归结于公元8世纪至9世纪东方波斯传统的大规模回归。”西方人惯常认为，是法兰克王查尔·马特（Charles Martel）率军在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Tours）中击退了穆斯林军，“从而逼停了阿拉伯帝国的战争机器”，但事实与之恰恰相反：是巴格达的建立取代了贝都因骑兵的流动帐篷，代之以波斯帝国的建制和奢华的行政机关。

公元13世纪，蒙古骑兵的铁蹄践踏了巴格达，给伊拉克留下一片废墟，特别是摧毁了它的灌溉系统（正如在伊朗一样）。这次浩劫使伊拉克自始自终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即便如此，蒙古人也未能阻止波斯艺术和文学的生命力。鲁米、伊拉基、萨迪以及哈菲兹等大诗人[(3)]都在旭烈兀汗（Hulagu Khan）占领波斯之后进入创作高峰期。当时美索不达米

亚一片荒芜，沼泽遍地，疟疾丛生。波斯的文人墨客触景伤情，在作品中凭吊他们的祖先萨珊王朝，它曾一度统治一个比其帕提亚还要大的帝国，几乎相当于阿契美尼德时期的版图。

波斯艺术家和学者的学术成就和语法特色，对许多非波斯地区都有影响，如阿巴斯、迦兹纳维、塞尔柱、蒙古和莫卧儿。波斯语是莫卧儿的宫廷语言，也是奥斯曼帝国的官方外交语种。中世纪的波斯人虽无法像古波斯那样直接统治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印度的一大片区域，但他们对文化生活的主导却达到相同的程度。正如阿克斯沃西所说的那样，“伊朗的理念”，有利于扩展伊朗的地理位置，使“大伊朗”成为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汤因比曾提出一个诱人的假设，如果1381年帖木儿没有挥军南下征服伊朗，中亚河中地（Transoxiana）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可能已经“逆转”，或许伊朗会成为苏联那么大的国家，不是由俄国人从莫斯科统治，而是由伊朗人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执政。这也是什叶派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什叶派神职人员的统治使德黑兰文化黯淡，思想压抑。虽然马赫迪[4]以隐遁的第十二伊玛目（Imam）的名义到来，使什叶派人士感到不公正时代即将终结，因而引发了激进主义行动，什叶派倒不太倾向于扮演其他公开的政治角色。什叶派神职人员有“静”的传统，讲究安静应变，默许既成的权力，常靠苏菲派提出智力支持。今天伊拉克领导教士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Ayatollah Ali Sistani）只在关键时刻才从幕后呼吁政治和解，即是一大见证。因为伊拉克和伊朗之间在整个历史阶段的共生关系，伊朗革命后伊朗人完全可能将目光投向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等城市，而不是到自己的圣城库姆寻求精神支持，除非库姆和纳杰夫与卡尔巴拉一样，也采用清静主义。

法国学者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告诉我们，什叶派历史上本是一种阿拉伯现象，很晚才传来伊朗，最终却导致神职等级体制建立并上台掌权。什叶派的巩固和加强，还得益于伊朗自古建立起来的强大官僚体制国家传统；而伊朗的官僚制度之所以比阿拉伯世界更严格，部分

得益于伊朗高原的空间连贯性。

把什叶派带到伊朗的是16世纪的萨菲王朝（Safavids，1502－1736年统治伊朗）。他们的名字来源于苏菲派的萨菲军团，原本属逊尼派。萨菲王朝是“马背上的兄弟会”，由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波斯人的后裔在15世纪后期混合而成。他们占领了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山区高原地区，在那里，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加索、伊朗西北部交汇在一起。面对千差万别的语言和地域特点，新的统治者亟须在伊朗高原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他们把十二伊玛目什叶派（Twelver Shi'ism）确立为国教，宣称等待第十二伊玛目的回归，并称这位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没有死，而是在静修。

当然，这种发展不是历史或地理的恩惠钦点，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物和具体形势。例如，在13世纪，蒙古可汗尼德（Ilkhanid）时期的统治者完泽笃（Oljaitu，即元成宗）如果不转而皈依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什叶派在伊朗西北部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谁也不知道此后形势可能如何演变。不论如何，什叶派在伊朗西北部的各土耳其军团之间聚集力量，并为萨菲国王沙·伊斯梅尔（Shah Ismail）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他在完成征服后强行推广什叶派，从现今黎巴嫩南部和巴林带来了阿拉伯神学士，形成了国家神职人员的核心。

萨菲帝国在其全盛时期，从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扩展至阿富汗中心和巴基斯坦，这是大伊朗在整个历史阶段的又一变种。什叶派是伊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凝结剂，16世纪非波斯什叶派少数民族的伊朗化也对这方面有所帮助。伊朗自古以来可能一直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但萨菲王朝把什叶派安插进伊朗高原，改变了现代伊朗的定位方向。事实上，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伊朗革命是这一强大而奇异的传统遗产合乎国情的表达，其暴力感也因阿亚图拉的崛起得以持续压制。并非我有意夸大，伊朗历史传统中的丰功伟业、深思熟虑、才智激情实在让人感叹。“波斯，这片诗人与玫瑰的天堂！”詹姆斯·J.莫里

尔（James J. Morier）在《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The Adventures of Hajji Baba of Ispahan*）的前言中发出这样的惊呼。当然，更有名的说法是，比较才是严谨治学的开始。

与冷战早期和中期阶段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和革命相比，1978－1979年伊朗革命引出的政权，其锐气和现代性举世震惊。事实上，这可直接回溯到古代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有关伊朗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具有很高的品质，无论是居鲁士时代以来伊朗帝国的活力、穆罕默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他竟罔顾治理伊朗应具的德才智慧，在黎巴嫩、加沙地带和伊拉克经营起恐怖网络，难道也是帝国统治的一个方面么！）还是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政治思想和著作，或者是官僚机构和安全勤务在打击异己上的复杂效率。德黑兰的革命秩序，构成丰富发展的政府结构，其权力中心相对分散；它不是一个粗制滥造的独裁制神权政体，与萨达姆·侯赛因掌控的伊拉克不同。奥利维尔·罗伊告诉我们，伊朗革命的“原创性”在于神职人员和伊斯兰知识分子之间的合二为一。

> 比起（阿拉伯）逊尼派神学士，什叶派神职人员对非伊斯兰社团开放得多。阿亚图拉很喜欢阅读（像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一样），他们的思想中，甚至也有耶稣会会士或道明会修士的影子。因此，他们集纯粹的哲学大家与令人激动的诡辩法家于一身……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文化双重性是惊人的：既是高度因循守旧的传统主义者，又对现代世界非常开放……

用罗伊的话说，正是这种相对先进和现代化的源流，使得“什叶派的想象……更容易适应革命的思想”。反过来，这种思想需要一种历史感和社会正义感，并与殉道相结合。逊尼派的阿拉伯世界虽然不乏改革者和现代化的推动者，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穆罕默德·阿布杜（Muhammad Abduh）和拉希德·里达（Rashid Rida），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西方政治哲学家如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与伊朗

应有的文化程度不符；而伊朗的毛拉[(5)]已将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融入血管里，他们的道德优越感建立在对历史目的论的理解基础上。与阿富汗圣战者的保守主义或阿拉伯世界令人窒息的军事政权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伊朗革命自视为博爱兄弟会的一部分，与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阵线以及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相互呼应。伊朗的神学统治近年来已蜕变为单纯的残酷压迫，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就是腐朽的政权已暴露疲惫之态；但那些明争暗斗仅仅发生在紧闭的国门之内，其理论性和抽象性，也从反面证明了伊朗文化的高深莫测。除了土耳其和以色列以外，伊朗比任何大中东国家都强大，组织得也更精心。伊斯兰革命并未摧毁伊朗，而是让自己委身于它。这个国家还保持了普选制度，并有一套总统制系统，虽然神学知识分子和安全服务的滥用使2009年的选举受到了操纵。

此外，使伊朗的神职政权如此热衷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因是政权与国家的融合，这本身就是历史和地理的产品。2009年有争议的大选后，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绿色革命”，但它看起来与它想推翻的制度一样：按该地区的标准相当高级复杂，因此算得上伊朗天才的另一场示范。绿派展开了一场世界级的民主运动，他们采用通信技术最新手段，如推特、脸书、短信等来扩大组织影响，并将民族主义和普遍道德价值观有力地结合，以推进自己的诉求。

伊朗政权采取了各种压制手段，含蓄或直接地把绿色革命逼至地下。然而，绿派若有朝一日掌握权力，或敦促神职政权改变理念和外交政策，走向和缓，伊朗将因其强大的国家和有活力的理念，有能力带领整个中东远离激进，为新的资产阶级提供政治表达。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已经在整个大中东悄然出现，但因美国与基地组织和极端主义纠缠不清而一时受到掩盖。

将事情归因于命运是危险的，因为它意味着对命运和决定论的屈从，但鉴于伊朗的地理、历史和人口资本从大中东延伸到欧亚大陆，这

片地域将非常可能受到伊朗自身政治演变的严重影响，无论好还是坏。对于伊朗来说，这是一个有待履行的使命，其最佳迹象在于中亚还没有真正发生的那些事件。让我解释一下。伊朗的地理位置与中亚正面相对，边界范围与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东相同。考虑到大伊朗在该地区的整个历史，苏联解体给伊朗带来的收益有限。“伊斯坦”（Istán）这个后缀，对于中亚国家意味着“地方”，本是波斯语。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和文明的导线，正是波斯语言和文化。

自20世纪初以来，中亚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精英说的语言，都是某种形式的波斯语。然而，根据罗伊等人的观察，1991年后，西北部什叶派阿塞拜疆人开始采用拉丁字母，并转而师从土耳其；伊朗东北部的共和国逊尼派乌兹别克斯坦，出于对其本土原教旨主义的恐惧而倾向于民族主义，摈弃了伊斯兰基础，这引起伊朗的警惕；塔吉克斯坦也属逊尼派，但讲波斯语，向伊朗寻求保护，但伊朗因担心得罪中亚其他地区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而对其半推半就。其实，中亚人本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起初很少有虔诚的穆斯林，70年的共产主义统治更加强了他们的世俗化倾向。现在他们不得不从头重学伊斯兰教，因此对神职的伊朗敬而远之，甚至有点畏惧他们。

当然，在德黑兰看来，形势发展已经有了积极的信号。伊朗核计划证明它是中东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也是如此），而中亚国家的水电、公路和铁路项目总有一天会与伊朗相连，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通过阿富汗。此外，天然气管道从土库曼斯坦东南部连接到伊朗东北部，将天然气输送到伊朗的里海地区，从而减轻了伊朗南部的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压力，这也正好与20世纪90年代建造的连接两国的铁路线相辅相承。土库曼斯坦拥有世界第四大天然气储量，并承诺将天然气出口到伊朗、中国、俄罗斯。一个由三大关键陆权势力联合起来反对西式民主的欧亚能源轴，可能由此出现。

此外，伊朗和哈萨克斯坦已建成一条石油管道连接两国。哈萨克斯

坦将石油输送到伊朗北部，同量的石油则从伊朗南部经波斯湾出口。哈萨克斯坦和伊朗也将通过铁路相连，前者因此有了直通海湾的大动脉。发达的铁路线也可以将塔吉克斯坦山区经阿富汗连接到伊朗。通过伊朗，这些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都拥有了通往国际市场的最短路线。所以，想象一下伊朗那横穿中亚、大中东次国家及恐怖主义国家的管道路线，你会发现我们这里所说的正是麦金德心脏地带枢纽的21世纪接班人。但仍有一个问题。除了与黎巴嫩南部什叶派穆斯林和什叶派伊拉克联系紧密之外，什叶派伊朗在一部分逊尼派阿拉伯世界中也享有威信。伊朗政权坚定不移地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其反犹太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这也告诉人们，伊朗吸引境外民众的能力并不能一路照搬到中亚。而苏联加盟共和国则保持着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从历史本源上也缺乏对犹太国家的仇恨。这种仇恨仍然在阿拉伯世界中无处不在。

但有些更强大、更深刻的东西在产生作用，限制着伊朗的呼声，其范围不仅包括中亚，甚至还有阿拉伯世界。伊朗令人窒息的神职统治持续得太久了，其消极意义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利用伊朗的强国传统巧妙地粉碎了民主反对派，实行酷刑和强奸民意，已经降低了其语言文化和国际大都会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历史上一直是大伊朗独具的优势。

在这个政权领导下，伊朗这幅华彩艳丽的风景画的已黯然失色，代之以非白即黑的颗粒感。几年前，我曾去过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Ashgabat），它所处的位置使它成为观察德黑兰和马什哈德的绝佳地点，这两个城市以世界贸易都会和朝圣中心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在土库曼斯坦这一侧，人口稀疏的定居点和游牧生活景观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然而，随着贸易和管道政治在两国同步推进，伊朗对穆斯林土库曼人却失去了吸引力，他们大多是世俗凡夫，对毛拉敬而远之。

伊朗当下的广泛影响力主要在于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公开挑战。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出它还有什么魅力，其辉煌文化如此浪费着实可惜。除

非某一天其政权自由开放，或者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诞生一个民主化或准民主化的新伊朗，它才可能凭借地理优势，激发起阿拉伯世界和中亚穆斯林千百万同胞的能量。

在伊朗的崛起过程中，逊尼派阿拉伯自由主义者也可以得到帮助。除了西方的榜样作用和民主但功能失调的伊拉克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叶派伊朗成为新的自由主义国家，并历史性地转向折衷主义可能提出的挑战。冷战后20年来，西方通过倾销其所谓民主都没能做成的事，可能在这样的伊朗变为现实，这将大大地撬动对苏联中亚地区的限制和监管。

有一段时期，伊朗的什叶派政权曾对中东地区那些忠实而受压迫的逊尼派无业游民产生过较大影响，激发他们奋起反抗法老式政府，其中有些已经就此倒台。通过发出不妥协的信号和提供灵活的情报服务，伊朗操纵着一个非常规的、由诸多次国家实体构成的后现代帝国，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伊拉克南部的马赫迪运动。然而在国内的部分区域，伊朗政权正在悄然受到轻视。伊朗人已经领教过了伊斯兰革命的概念，它意味着拉闸限电、货币崩溃和管理不善。我已解释过，在欧亚大陆的争斗中，许多锋线都渐趋于相互交错；其中最为纠结的是伊朗人的心灵和头脑，他们和土耳其人是穆斯林世界最先进的人种。这正是思想斗争与地理规律相汇合之处；这也是以赛亚·伯林的自由人文主义与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准决定论相汇合之处。

地理的力量强大到不可抗拒之时，其实也是它命悬一线之刻。看一下纳迪尔沙（Nader Shah）的辉煌故事，他是18世纪继萨菲王朝之后的又一征服者。纳迪尔的波斯帝国发起于伊朗东北部呼罗珊地区的土耳其语族，跨过高加索，延伸到印度河。巴格达、巴士拉、基尔库克、摩苏尔、坎大哈、喀布尔等都在他围攻的名单上，这些在21世纪初被美国妖魔化的地方，对伊朗的统治却并不陌生。迈克尔·阿克斯沃西写道，如果纳迪尔沙在他生命最后五年里不发生精神错乱，他很可能把伊朗建

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足以在19世纪抵御来自英国和俄罗斯的殖民干涉。他本可以被尊为波斯的彼得大帝，并从此带领伊朗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可惜他不但没有做到，反而使其政权以政治混乱和经济灾难收尾。

再来看1979年巴列维的倒台。亨利·基辛格曾经告诉我，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发生反对国王巴列维的叛乱，如果当时卡特政府能更好地处理，国王有可能保住，伊朗现在会像韩国一样成为充满活力的准民主体制，尽管偶尔与美国有不痛不痒的摩擦，但基本上算是一个盟友。在他看来，当时的巴列维政权是能够改革的，尤其是苏联的民主动荡十年后才发生。虽然基辛格对吉米·卡特总统的指责可能过于轻率，但是由此提出伊朗革命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仍然耐人寻味。谁说不是呢？20世纪90年代我走遍了伊朗，最近又刚从埃及回来，前者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情绪其实比后者要小得多，对此我心知肚明。其实，伊朗与犹太人的关系从古代一直到巴列维王朝都还是良性的，对于伊朗人来说，仍有许多希望和可能性。

再来看看“9·11”恐怖袭击给美国提供的机会。袭击发生后，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和时任总统的穆罕默德·哈塔米毫不含糊地谴责逊尼派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伊朗人在德黑兰街头组织为受害者守夜的活动，而其他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却在为攻击欢呼。当年晚些时候，美国组织联军打击塔利班，伊朗亦为其提供帮助。2003年春天巴格达陷落后，伊朗提出举行实质性谈判。这都说明，在现今时段，历史没有必要像以前一样发展。其他结果也是可能的。根据地理决定论，伊朗将对大中东和欧亚大陆的发展至为关键，但地理虽然可以决定伊朗有多重要，却不能决定它对什么重要。这取决于人的决定。

波斯帝国的最终出路

无愧于中世纪和古代以来的帝国传统，伊朗现在已经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后现代军事帝国，其形式可谓空前：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坦克、装

甲车和航空母舰之类对大国来说司空见惯的装备。在作家和前中情局校官罗伯特·贝尔（Robert　Baer）看来，正统的帝国主义钟情于入侵和占领，而伊朗作为中东的超级大国，是凭借“三管齐下”的策略，即“代理人战争、不对称武器和吸引……受蹂躏者”，特别是大批年轻、失意的男性。贝尔指出，真主党和阿拉伯什叶派在黎巴嫩的代理人，“是事实上的国家”，不仅在军事和组织上更为重要，还拥有更多的公众承诺，比贝鲁特的官方机构所拥有的还要多。

在加沙，什叶派伊朗悄然进行着军事和财政援助，并以其“原始的反殖民主义信息”引诱那些可怜的、被困在索韦托式[6]生存环境中的巴勒斯坦人，他们被成片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疏远，这些国家由独裁者统治着。在这些受压迫者看来，远在千里之外的伊朗与他们更亲近，超过与加沙接壤、在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这也充分表现出伊朗人的天分。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都与伊朗交好，前者称其为最亲密的盟友，后者的政治体制与伊朗情报机构纠缠不清，是帮助该国维持稳定还是将其破坏，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愿望。对于波斯湾本身来说，伊朗也凭借断续而漫长的海岸线成为该地区唯一的主要力量，而那些弱小的阿拉伯执政府，德黑兰可以轻易动用军事力量打败他们，或像我们在巴林看到的那样，通过当地的什叶派第五纵队居民搞破坏，或者像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过恐怖主义或从经济上对其进行损害。

遗憾的是，虽然伊朗强大而令人敬畏，但其与启蒙相关的重要因素一直缺失着。阿契美尼德、萨珊王朝、萨菲王朝和其他昔日的伊朗帝国，多半在道德和文化意义上对臣民施以教化，或以仁慈鼓舞人心，但目前伊朗帝国的统治大多靠自杀炸弹的恐吓，而不是诗人的篇章。这限制了它的权力，也预示着其最终倒下的结局。

伊朗丰富的文化、辽阔的地域、丰富多彩的城市，与中国和印度一样自成一体，其未来必将取决于政治和社会条件，最关键的节点就是伊拉克。伊拉克的历史和地理与伊朗交织在一起，没有任何国家能与其相

比。在纳杰夫有什叶派圣人伊玛目阿里（Imam Ali，先知的堂弟和女婿）、在卡尔巴拉有圣人伊玛目·侯赛因（Imam Hussain，先知的孙子），而在伊拉克中南部已经产生了什叶派神学社区，挑战伊朗的库姆。如果伊拉克的民主能确保稳定，哪怕只是一点点，伊拉克圣城更为自由的学术氛围就可能对伊朗的政治产生影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民主的伊拉克将成为一种吸引力，可以为未来伊朗改革派所用。随着伊朗人更深地卷入伊拉克的政治，加上两国共享漫长的共同边界，都可能会打破两个系统的压迫性。

与一个多元化的、种族上以什叶派为主的穆斯林社会互通，会使伊朗政治变得更加枝节横生。经济危机在继续，政府却花费千万亿美元在伊拉克、黎巴嫩和其他地方收买人心，任何一个普通伊朗人都可能为此拍案而起。而且，伊拉克人现在对伊朗人的憎恶不亚于“丑陋的美国人”。伊朗利用伊拉克什叶派反制逊尼派政党的想法太简单了，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做法无异于将代表激进伊斯兰普世主义的泛逊尼派世界缩小为吸引力超不出什叶派社区的宗派主义。

因此，尽管伊朗试图对伊拉克摇摇欲坠的逊尼派和什叶派联盟提供帮助，并保持他们正常运作，但因伊拉克人对其干涉内政日渐不满，这一计划很容易受阻。如果无法合理说明2003年入侵伊拉克是如何策划和执行的，或为什么花费了数千万亿美元，却使几十万人在战争中丢了性命，那么萨达姆政权的倒台很可能从客观上促成两个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解放。正如地理使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政治关系微妙地殖民化了，地理也可能是促使伊拉克对伊朗施加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在伊朗，尽管绿色革命暂时失利，未来政权和平更迭或演化的可能性仍然大于苏联。伊朗的解放，加上阿拉伯世界独裁政府的减少，将会使伊朗集中更多精力解决国内问题，并由于其不安全感促使中东出现更加平等、流动性更强的逊尼派和什叶派。这将使伊朗将目光专注于其内部和区域权力动态，比迁怒于美国和以色列效果要好得多。

此外，德黑兰若采用更自由的制度，将激发伊朗文化的连续性，既无愧于老波斯帝国的光彩，又不再受神职人员的约束。一个更自由的伊朗，将拥有为数众多的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以及北部等地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可能随着中央集权的解散，民族的边缘地带将脱离德黑兰的轨道，渐行渐远。伊朗并非一个单纯的国家，而是一个形状不定的跨国家帝国。其真实大小与任何正式指定的版图总不相符。今天的伊朗西北部是库尔德和阿塞拜疆土耳其人居住区，而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西边的一部分在文化和语言上与伊朗国家更为兼容。伊朗回归的最终目标，可能正是这种国无定形，正像帕提亚帝国一样，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和毛拉政权的合法性将日益式微。

---

(1) fathoms，相当于6英尺或1.8288米。——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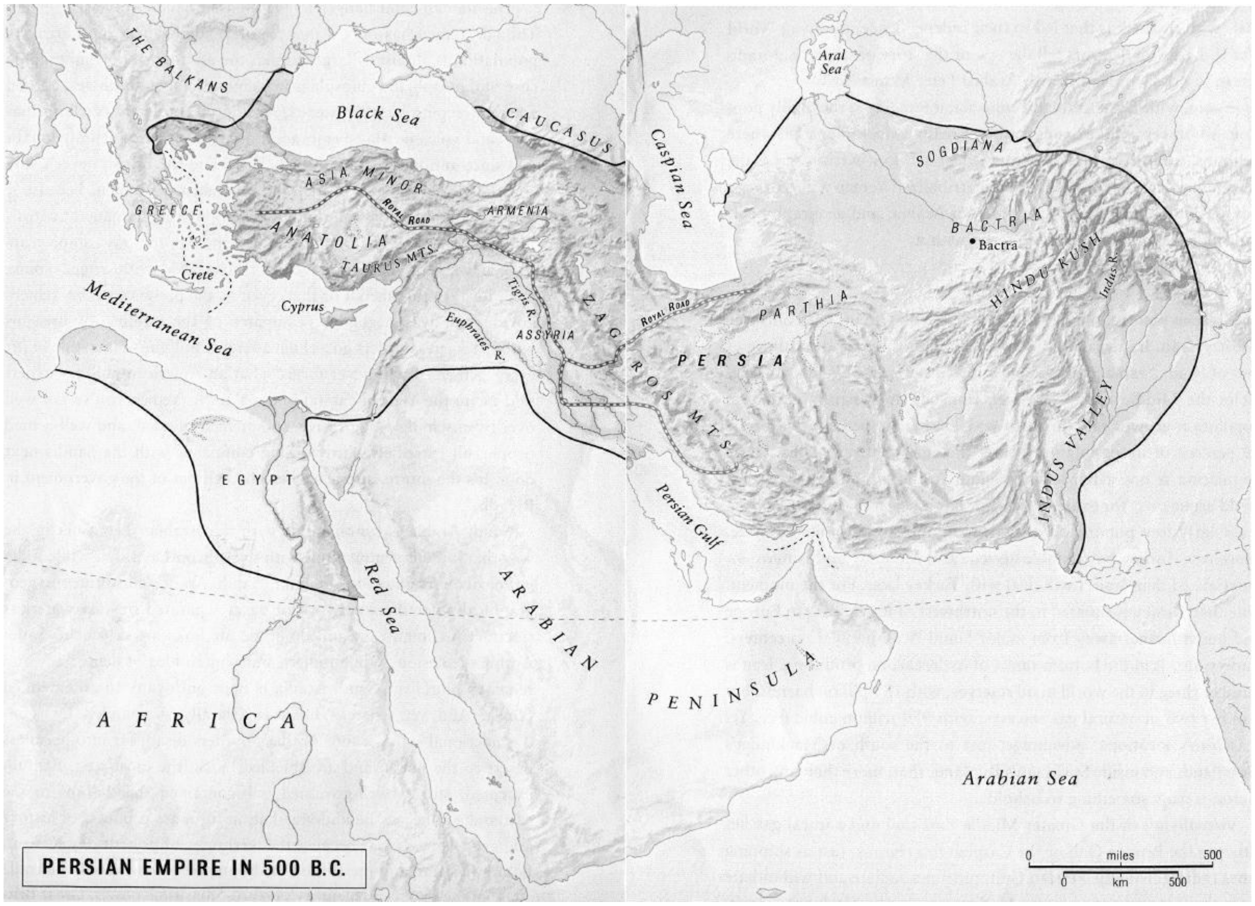
(2) 阿拉伯语ayatollah的音译，意为“安拉的迹象”，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高级教职人员的职衔和荣誉称号。——译者注

(3) 梅夫拉那·贾拉丁·鲁米，1207－1273，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诗人，出生于今阿富汗境内，著有《玛斯纳维》。伊拉基，约1211－1289，著有《光照集》。萨迪代表作《蔷薇园》及《果园》。鲁米、伊拉基、萨迪、哈菲兹，有波斯“诗坛四柱”之称。——译者注

(4) Mahdi，意为“蒙受引导者”或“被引上正道的人”。根据伊斯兰教的经典《圣训》预言：他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一个有宗教领袖性质的人物，是穆斯林的领袖，出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发图买的后代中。什叶派对马赫迪的看法与逊尼派有分歧，什叶派认为隐遁的伊玛目（领拜人）就是必将再降世的马赫迪。——译者注

(5) Mullahs，伊斯兰教职称谓。原意为：“保护者”“主人”“主子”。今为从清真寺经堂大学或经学院“穿衣”毕业，具有较高宗教学识的宗教人员的通称。——译者注

(6) Soweto，索韦托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西南20多英里处，是南非最大的黑人聚居地，处于白人居住区的包围之中。——译者注



（公元前500年波斯帝国）

（上图地名中文对照见如下内容）

图名：PERSIAN EMPIRE IN 500 B.C.　公元前500年波斯帝国

① GREECE希腊　EGYPT埃及　CAUCASUS高加索

ASSYRIA亚述　PARTHIA帕提亚　PERSIA波斯

BACTRIA大夏

② Black Sea黑海　Mediterranean Sea地中海

Caspian Sea里海　Arabian Sea阿拉伯海

Aral Sea咸海　Rea Sea红海

Persian Gulf波斯湾

③ Tigris R底格里斯河

Euphrates R.幼发拉底河

Indus R.印度河

④ Bactra巴克特拉

⑤ TAURUS MTS.托罗斯山脉

ZAG ROS MTS.扎格罗斯山脉

HINDU KUSH兴都库什山脉

INDUS VALLEY印度大峡谷

⑥ ROYAL ROAD波斯御道

⑦ Cyprus塞浦路斯岛

Grete克里特岛

ARABIAN阿拉伯半岛

PENINSULA伊比利亚半岛

⑧ AFRICA非洲　THE BALKANS巴尔干地区　ASIA MINOR小亚细亚　ANATOLIA安纳托利亚

ARMENIA亚美尼亚　SOGDIANA索格狄亚那

第14章
“荒野腰带”的“和事佬”
前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是其地理条件的现实反映。作为麦金德的“荒野腰带”以及斯皮克曼大陆边缘地带的关键部分，土耳其在控制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源头的同时，又与阿拉伯国家有着剪不断的历史纠葛。

作为中东亲以色列的北约堡垒，为何当这个国家真正实现所谓民主的时候反而成了相对反美反以色列的势力？土耳其为何能以非常公开和实质性的方式，反对美国遏制伊朗的政策？为何说土耳其民族主义找到了地理逻辑的支撑？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为何要推动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和谈，又为何冲在最前面与阿萨德作对？它为何又要在加沙以巴勒斯坦人的保护者自居？作为一个领导伊斯兰世界长达850年的国家，一百多年过后，在大中东所谓“一世界”的心脏地带，后奥斯曼时代的国家制度能否持久？

如果说伊朗高原处于大中东最关键的地理位置，安纳托利亚（或小亚细亚）大陆桥的重要性自然紧随其后。正如伊朗高原完全由伊朗一国独享，安纳托利亚大陆桥也由土耳其独有。总体来看，这两个国家以大山和高原为特征，从北部俯瞰阿拉伯沙漠，总人口约1.38亿，比南部所有12个阿拉伯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其中包括肥沃新月和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世界如果要在人口上压倒土耳其和伊朗，就不得不加上埃及和北非其他地区，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沿岸。

土耳其和伊朗，都是麦金德的“荒野腰带”以及斯皮克曼大陆边缘地带的关键部分，代表中东最富有的农业经济，以及工业化和技术机密的最高水平。伊朗正在发展核计划，土耳其也有能力跟进以保持国家优势，只是看它愿不愿意这样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缺乏发展核计划的知识能力，因此需要从巴基斯坦这样的有核国家引入核能技术。

像伊朗一样，土耳其自成关键地区，并按顺时针依次影响巴尔干、黑海、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高加索和中东阿拉伯国家。战略家乔治·弗里德曼写道，与阿拉伯世界相比，土耳其“是混乱中的稳定平台”。虽然影响周边的所有地方，但土耳其作为大陆桥夹在两个海洋中间，南有地中海，北有黑海，从这一点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岛国。无法与干旱陆地连接，使土耳其在地理方面不能像伊朗那样成为影响其邻国的关键。它在西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和南部对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主要是经济上的。在前南斯拉夫，它最近已参与冲突后的调解进程，只有在高加索地区，特别是阿塞拜疆，因其语言非常接近土耳其语，土耳其的外交影响力可以达到极大地影响其日常政治。

土耳其控制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地理优势，赋予它控制叙利亚和伊拉克水源命脉的能力。当然，如果土耳其真的切断其水源，就从事实上构成一种战争行为，因此土耳其必须

小心使用这一优势。为了满足自身农业发展的需要，土耳其有可能将河流改道或从上游拦截水流，而中下游国家对水流减少的可能性的担心，使土耳其在阿拉伯政治局势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地缘政治新现实，那就是土耳其东南部的安纳托利亚项目，其核心是阿塔图尔克大坝，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桑尼乌法以北25英里处。哈兰高原有近2 000平方英里的可耕地，正在通过这个大坝的高压提灌改道得到水利灌溉。幼发拉底河大坝系统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规划，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修建，实际抽水变灌能力最远可输往巴勒斯坦水资源匮乏的西岸。因此，21世纪土耳其将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中享有更大的权力。土耳其日益提高的政治形象，亦应置于这个新的地理现实背景下来考虑。

欧洲的“弃儿”

据最近的新闻头条报道，土耳其将注意力转向了中东，但实情并非总是如此。自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之后，奥斯曼人主要集中在西北部，面向欧洲，那里有可以带来丰厚利润的贸易路线。这种模式始于中世纪后期，中欧和法兰克加洛林王朝势不可挡的崛起对土耳其部落来说像一块磁铁，吸引他们向西跨越安纳托利亚到巴尔干地区，在小亚细亚的近边最肥沃的可耕地上安居。土耳其几乎已成为安纳托利亚大陆桥的代名词，但它与俄罗斯一样，几个世纪以来人口和工业重心一直集中在西部，毗邻巴尔干，离中东比较远。而安纳托利亚地势过高，山形崎岖，每个山谷之间分隔较远，阻碍了部落联盟的建立，否则他们就有可能挑战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地盘，特别是接近高加索和中东的地区。事实上，因为地理造成安纳托利亚东部社会的“中断”，塞尔柱和奥斯曼等王朝政权才可以从遥远的基地发号施令，在安纳托利亚西部，也就是欧洲的土耳其，维持数百年的统治。

如前所述，西伯利亚东部和俄罗斯远东的地形空旷无垠，难于组

织，因此无法向基于欧洲的俄罗斯发起挑战；安纳托利亚和奥斯曼土耳其也是这样，只不过安纳托利亚有漫长的海岸线作为边界，因此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面临的挑战要少得多，也不像俄罗斯那样容易患上入侵恐惧症。此外，安纳托利亚很紧凑精致，而俄罗斯则坦荡无边。

土耳其的人口分布，也进一步印证了其地理特征。安纳托利亚人口从中东腹地陆续西移，土耳其西北部近几个世纪的人口布局更加剧了这种倾向。奥斯曼军队对中欧的突袭，多少有点游牧部落流窜的味道，并最终于1683年展开对维也纳的围攻，后来是欧洲自身的政治分裂缓解了战局。当时，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都忙于横跨大西洋，争夺新世界的殖民地；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长期争斗不休；教皇陷入其他危机的纠缠；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斯拉夫分崩离析，这也是多山地形促使社会和政治分裂的又一案例。赫伯特·亚当斯·吉本斯（H.A. Gibbons）写道："从欧洲出发，可以征服小亚细亚或更多的地盘；而从亚洲出发，欧洲的哪一部分也不能被征服。"他的意思是，为了真正巩固安纳托利亚贫瘠的土地，并将疆域范围扩大到中东，奥斯曼土耳其人首先需要积累财富，因此只有征服巴尔干一途。促使这一计划成真的正是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位置，它有条件通往巴尔干地区、地中海和北非的安全港，同时也是大篷车路线的终点站，可来往于波斯、高加索或更远的地方。

这一地理现实，促使一个庞大的跨国帝国出现，在19世纪末期趋于没落，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奥斯曼苏丹国只好放弃巴尔干这个鬼地方。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urk，1881—1938，土耳其之父）作为唯一一位不服输的奥斯曼将军，在奥斯曼帝国相继于巴尔干和中东失败之后，回到安纳托利亚并塑造了一个现代国家。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因为他改变了人民的价值体系。他觉察到，欧洲列强击败奥斯曼帝国，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强大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更强的文明产生了更强的军队。他说，土耳其今后将在文化和政治上迈入欧洲，因此他取消了穆斯林的宗教法庭，禁止男人戴菲斯帽

（fez），劝阻妇女戴面纱，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文。

但是，这些革命性的行为也将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对欧洲的痴迷推向高潮。虽然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但是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亲西方的世俗主义学说即凯末尔主义一直指导着土耳其的文化，特别是其外交政策，其影响持续到冷战结束后第一个十年。

事实上，多年以来，土耳其一直希望加入欧洲联盟，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曾多次访问该国，土耳其官员明确指出这是他们的既定方向。但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现实看来，土耳其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理由看起来很牵强，源于充满腐朽气的地理和文化宿命论：尽管土耳其是一个民主国家，是北约的成员，但它也是穆斯林国家，因此人家欧洲不要。入欧盟被拒，对土耳其政体是极大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它早已与其他社会发展趋势相融合，因此土耳其的历史和地理可能会经历重大调整了。

其实，凯末尔对土耳其施加的欧洲取向，也使一对矛盾凸显出来。凯末尔在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出生长大，周围是希腊人、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

换句话说，19世纪末期的萨洛尼卡是一个多语种的世界主义前哨，受其影响，凯末尔对国籍的定义也有着惊人的时尚感。他屡次宣布，不管是谁，哪怕是犹太人或基督徒，只要讲土耳其语、生活在土耳其，就都是土耳其人。他将土耳其首都迁至位于安纳托利亚核心的安卡拉，离开欧洲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因为伊斯坦布尔与旧制度有关联；他不再试图夺回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或中东失去的省份，相反，他的策略是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土耳其国家，立足于安纳托利亚的中心地带，坚定地朝着欧洲和西方停锚。

凯末尔火焰的守护者是土耳其的军队，因为在其有生之年，凯末尔主义从来没有和民主搭上过关系。有一个问题可能需要数十年才会被发觉，就是通过将重点转移到安纳托利亚，凯末尔在不知不觉中使伊斯兰

文明更深入地扎根于小亚细亚，而不是欧洲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和苏丹国。此外，民主虽然在土耳其符合国情地发展，一开始却伴随着不定期的军事政变，之后才把选举权移交给居住在安纳托利亚腹地的穷苦大众和虔诚的土耳其人。

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十年，财富和权力掌握在军方和超世俗的伊斯坦布尔精英手中。在此期间，美国官员毫不吝啬地宣布土耳其的民主地位，即使土耳其的将军们操控着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这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改变，新当选的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Ozal）是一位来自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虔诚穆斯林，具有苏菲主义的倾向，他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放开了中央集权的经济。一些大企业实行私有化，放松进口管制。这导致中产阶级暴发户开始出现，他们是虔诚的穆斯林，掌握真正的政治权力。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厄扎尔的天分得到了集中展现。他在政治上抱定西方，同时又软化凯末尔主义的高度世俗化倾向，在体制系统中给穆斯林一个较高的地位。土耳其再次成为更伊斯兰化、更加亲美的国家。厄扎尔的伊斯兰主义，也允许他与库尔德人主动交好，他们与土耳其人在宗教上团结，但却因种族而疏离。

土耳其的将军们对厄扎尔的宗教取向极为反感，但厄扎尔并未向他们控制的国家安全政策提出挑战。他和将军们达成一项广泛的默契，即土耳其作为北约的桥头堡，在斯皮克曼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抗衡当时的苏联。

1993年厄扎尔突然去世，享年65岁，此前他当了10多年的总理和总统。这对土耳其的未来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又一次证明了人的生死如何像地理一样，影响地缘政治的命运。当然，地理仍是主要的因素，因为它是永久性的。在厄扎尔身上，亲伊斯兰主义和亲美主义这对明显的矛盾和谐共生，他的去世打破了一个脆弱的国家共识，尽管这需几年才能显现。

厄扎尔去世10年后，土耳其一直由平庸的世俗领导人管理着，但其经济实力以及对伊斯兰教的虔诚继续在安纳托利亚腹地发展。2002年年底前的一场选举，使伊斯坦布尔前市长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的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夺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伊斯坦布尔是世俗精英的家园，也是数百万贫困虔诚的土耳其人赖以栖身之所，他们为了求职谋生，从安纳托利亚腹地农村迁徙至此，陷入中下阶层的生活困境。埃尔多安代表的，正是这数以千百万计的人发出的呼声。

埃尔多安的掌权给新一波伊斯兰主义注入了活力。1945年土耳其有2万座清真寺，1985年达7.2万座，这个数字的持续上升与人口不成比例。据研究，几乎2/3的城市工薪阶层以及大多数农村土耳其人每天祈祷，这个百分比直到近几年才开始上涨。

旅居伦敦的作家和记者迪利普·希罗（Dilip Hiro）写道，世俗意识形态有两种，右翼如法西斯主义，左翼如马克思主义，一个复兴伊斯兰教非常有力地与它们展开竞争，成为“幻灭的城市青年的救星”，对于他们来说，凯末尔主义并非指导日常生活的“社会道德体系”。一旦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捆绑扎根，凯末尔主义就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

然而，2003年3月土耳其议会投了反对票，不允许入侵伊拉克的美军从土耳其过境。削弱美国地位的势力并不是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而是世俗主义者。在反美主义方面，土耳其加入了欧洲阵营，反对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的失态和粗鲁言辞。美国入侵伊拉克引发灾难性后果，导致伊拉克境内的教派冲突，但最终并没有发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此时土耳其刚刚认识到自己将不会被接纳为欧盟成员。这些戏剧性事件接连发生，结果就是土耳其建立了一个新的伊斯兰政府，它根深蒂固、顺应民意，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钟摆因而大幅转向中东、偏离西方，这在几个世纪以来尚属首次。

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几十年来，美国领

导人一直声称民主的土耳其是中东亲以色列的北约堡垒，前提是他们知道土耳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掌控在军人手中。然而，在21世纪初土耳其已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土耳其大众的伊斯兰性质得以体现，但结果却是变成了相对反美、反以色列的势力。

1998年秋天，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开塞利，我采访了一些土耳其伊斯兰教领导人，包括土耳其现任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当时美德党[(1)]正在举行集会，我就这些会议发回了报道，并于2000年结集出版，其中有一件大事被我料中，即这个党派虽然是少数党，短短几年内竟成为多数党。他们的基本主题是民主，认为土耳其越是民主，就越是强大。听来讽刺，他们竟把西方与土耳其军事独裁的权力结构相提并论，但事实的确如此。

“美国什么时候支持过土耳其的民主？”美德党晚餐上，旁边的人问我。“到现在为止，它只支持军方。”在我回答之前，那人补充说：“我去过以色列，那里的民主比土耳其更发达。”

在这件大事上，我错了。因为温和的土耳其伊斯兰对以色列相对开明，我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事实上，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土耳其的历史演变以及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让他们与泛伊斯兰思想更密切地结合，换句话说，就是技术战胜了地理。在随后几年里，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政府，都在一些具体行动上犯了错误。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土耳其的地理开始反映土耳其的政治现实。土耳其西接希腊，东邻伊朗，西北是保加利亚，东南有伊拉克，阿塞拜疆、叙利亚分列于东北部和南部，安纳托利亚超过一半的边界是黑海和地中海海岸线，介于欧洲、俄罗斯和中东之间，是真正的等距离，其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也是这样。土耳其仍然是北约成员，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在以色列设有大使馆，并间接推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和谈；但它在伊拉克北部实施反对库尔德人的军事进犯，帮助伊朗避免因发展核武器而受到制裁，在政治和情感上躲在最激进的巴勒斯坦组织的

背后。

2010年5月，以色列突击队突袭了有6艘船的土耳其船队，当时他们正将人道主义物资运往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土耳其勃然大怒，作出强硬反应。这件事相当于催化剂，宣告了土耳其处于东西双方的历史性枢纽地位。当然，巴勒斯坦的斗争介于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在这方面土耳其人没有可以发挥作用的余地；但是，如果穆斯林与犹太人发生冲突，土耳其人就可以充当穆斯林事业的领军者。

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关键性见解。他认为，土耳其是全球化过程中最基本的案例。全球化这个过程，从某个层次上说是团结的力量，而在另一个层次上则是造成文明紧张的力量，因为它把广泛蔓延的文明重新组合在一起。伊斯兰世界缺乏政治凝聚力，但伊斯兰意识在随着全球化上升，这使土耳其的伊斯兰属性随之增长。在此期间，非西方世界会变得更健康、更温和、更有文化，而中间层次的国家，如土耳其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将不断崛起。

土耳其人协助领导伊斯兰世界长达850年，从1071年塞尔柱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曼兹柯特战役（Manzikert）中打败了拜占庭帝国，直到1918年西方协约国打败奥斯曼帝国。仅在过去一个世纪，阿拉伯人才真正成为伊斯兰文明世界的领头羊。事实上，1978－1979年伊斯兰革命期间伊朗有5 000万穆斯林，西方对他们视而不见；现今土耳其的7 500万穆斯林也近乎隐身，直到加沙船队危机爆发才为世人所知。同一时间，土耳其与伊朗达成协议，接受伊朗浓缩铀计划，并对联合国制裁伊朗决议案投了反对票。突然间，西方的公众和媒体才被土耳其铁铮铮的地理现实所惊醒。

接着是2011年，整个北非和中东爆发了针对寡头统治的示威抗议活动，从历史和地理的意义上说，土耳其应是其中的受益者。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了当今的北非和地中海东部黎凡特地区数百年。虽然它是一种专

制统治，但是其压迫性不那么强，在今天阿拉伯人心目中没有留下持久的疤痕。土耳其是伊斯兰民主的一个典范，那些新解放的国家可以以此为榜样，最重要的是，它是从混合政权民主演变过来的，就在不久前，将军和政治家还在分享权力。一些阿拉伯国家要实现更自由的体制，这个过程不能省略。直到最近，拥有7 500万人口、经济增长率保持近10%的土耳其，仍在地区人口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可以向整个地中海地区释放软实力。它所拥有的优势，其他邻近北非的主要地中海国家，如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无缘享有。

事实上，我们应该对贾拉尔·阿德-丁·鲁米（Jalal ed-Din Rumi）有一点了解，他是13世纪土耳其灵修“脱勒伽”（Tariqat）的创始人，这是一种与回旋祭礼相关的内心修炼。如果我们了解一点点，就不会太惊讶于伊斯兰教与民主的相容性，就会发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显得那么铁板一块，或具有威胁性。鲁米拒斥那些“不成熟的狂热分子”，认为他们蔑视音乐和诗歌。他告诫神职人员，留胡须算不上什么智慧的标志；他喜欢敢于出头的人，并不断发声反对暴政。鲁米的事例证明，土耳其伊斯兰教同土耳其的西方化一样，具有折衷主义性质，其民主制度虽然不够完善，并被强横的军人影响得太久，但却凝聚了几十年的正统伊斯兰元素。此外，与不少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不同，土耳其的工业基地和中产阶级并没有凭空创造出的石油收入。我们还得感谢地理，它在土耳其展现了人类发展的先进水平，高于中东的大部分地方。土耳其的大陆桥不仅把它连接到欧洲，还用中亚游牧民族的入侵浪潮刺激了充满活力的安纳托利亚文明，而鲁米的诗歌更是其中一朵奇葩。

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它把欧洲政治制度（至少是它的巴尔干变种）引入中东，让二者亲密接触。19世纪，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的民族独立斗争如火如荼，刺激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崛起。同样，现代恐怖主义也在20世纪初诞生于马其顿和保加利亚，此后才渗透到大叙利亚。21世纪初，土耳其值得自豪之处仍然很多：它有充满活力的伊斯兰运动，在政治上占主

导地位；其巨大的军事能力，在中东除以色列以外无国能比；多年来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8%左右，在全球经济衰退之际仍保持在5%以上；灌溉大坝系统使土耳其成为水力资源大国，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石油大国相比，增速毫不逊色。这些可见或隐形的因素，使土耳其有能力与伊朗一争高低，争夺伊斯兰领导权和合法的发展轨迹。

多年来，土耳其在中东几乎与以色列一样寂寞。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苏丹王体系，使其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复杂，与邻国叙利亚充满敌意，与伊拉克复兴党和原教旨主义的伊朗关系紧张。1998年，土耳其与叙利亚几乎处于战争边缘，大马士革公开支持反土耳其的激进库尔德工人党。在此期间，土耳其与以色列保持了名义上的军事同盟，更强化了其在中东的弃儿地位。但所有这一切，随着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掌权，都发生了改变。在同一时期，西方因土耳其被欧盟拒之门外而在公众舆论中名声扫地，而美国右翼和以色列右翼则日益蛮横。

土耳其没有从北约撤出，也没有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相反，根据埃尔多安政府外交部长阿默特·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的说法，土耳其对它的近邻采取“没问题”的政策，这意味着与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实行历史性的和解。由于土耳其在经济、技术上比它的邻居要先进得多，经济增长也快得多，因此其影响力从西部巴尔干地区直到东部高加索，而且还在日益强大，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如今，保加利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随处可见土耳其家用电器和其他消费品。

在加沙，土耳其以巴勒斯坦人的保护者自居，在加沙地带声望日增，并成为阿拉伯世界完整的组成部分，享有自奥斯曼帝国时代以来的最高待遇。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是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制定的特殊战略，同时也促成了天然的政治演变，即土耳其所期望的重要地理和经济地位，随着相关地区伊斯兰化趋势的突然加强而成为了现实。新奥斯曼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其假设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土耳其无手段也无意愿在中东复制其旧帝国，除此之外，土耳其与前阿拉伯依赖国

的关系也日益正常化，对它们来说，奥斯曼帝国统治很遥远，也很仁慈，至少从几十年、几百年的跨度来看是如此。特别是随着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敌意促升，他们非常欢迎土耳其回归。

达武特奥卢的真正创新是向伊朗伸出橄榄枝。安纳托利亚和伊朗高原分别代表土耳其文明和波斯文明，两者的关系漫长而复杂。我已经说过，波斯语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外交语言，但16世纪至17世纪初，奥斯曼人和萨菲王朝的波斯人在军事上长期对峙。土耳其人和伊朗人是对手，同时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却深深地相互交织。鲁米以波斯文写作，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却在土耳其度过。

此外，土耳其和伊朗都没有遭受过殖民地统治，也没有落入其他民族手中。从地理上看，其势力范围虽有重叠，又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分开，伊朗横卧于土耳其东部。巴列维国王统治期间，土耳其和伊朗都亲西方，当伊朗在毛拉控制下转向激进之际，安卡拉仍与德黑兰保持正常关系。其实，历史上安卡拉就曾对阿亚图拉示好，只是在当代的政治背景下，这件事才有相当大的冲击力。

想想看：美国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正试图与欧洲盟国一起拼命地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防止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因为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极大地改变中东的权力平衡，对西方不利，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则可能会破坏该地区的稳定，使局势变得更糟。然而，2010年5月，土耳其与巴西一起采取行动，通过一系列戏剧性的外交举措，帮助伊朗逃避经济制裁，给其赢得了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时间。通过认可伊朗浓缩铀计划，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中获得更多的筹码，比支持哈马斯在加沙的行动更有利。伊朗有潜力“帮助土耳其成为一个能源转运中心，向西欧市场提供伊朗的天然气和石油，从而实现其核心战略目标”。

随着土耳其成为伊朗能源转移的交汇点，里海海域化石燃料也由此跨越整个高加索地区。土耳其还拥有巨大的水权，把控着幼发拉底河注入伊拉克90%的水摄入量，叙利亚的40%。土耳其的管线四通八达，运

送着石油、天然气和水，这是其工业生活的重要基础。土耳其已与伊朗一起，成为中东的超级大国。

在石油时代之前，土耳其曾推进到巴尔干地区和欧洲，以发展经济能力，因此它也一样可以挺进中东。而且，在石油时代还有其他方式供其选择。作为欧洲的导管，土耳其输送着伊朗和里海的石油，这已构成欧洲不可忽视的经济因素；它是地球上最大的大陆桥，然而又不仅仅是大陆桥。土耳其作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处于世界的核心区，它本身又是本地区的核心。土耳其和伊朗两国有能力让阿拉伯新月肥沃地带趋于中性化，这一地带的国家几十年来历经有害无益的国家安全制度，并深受社会动荡之苦。

此外，土耳其和巴西维护伊朗浓缩铀的举动，虽然可能帮助原教旨主义的伊朗获得核武器，从而造成较严重的后果，但也很难说是流氓行为。随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人口加入中产阶级，中型国家权力在世界各地崛起。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却能以非常公开和实质性的方式，使美国遏制伊朗的努力前功尽弃，这也显示了美国的虚弱。在当今时代，常规军事力量虽然仍很强大，但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威慑力都小。正是出于中型国家的本能，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才采取行动，试图逃脱这种威慑。

对于西方来说，唯一的一线希望是：如果土耳其力量没有提升，伊朗就会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但土耳其在中东咄咄逼人地崛起了，自奥斯曼帝国崩溃以来尚属首次。伊朗将面临来自近邻的竞争，两个国家既可做朋友，又能当竞争对手。

而且不要忘记，土耳其仍属于北约，与以色列之间不管有多么大摩擦，最起码关系未断。尽管西方难以容忍，但土耳其的伊斯兰领导地位毕竟代表一个巨大的进步，比伊朗政府的顽固要好得多。土耳其仍然可以充当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调解人。而伊朗历经政治动乱，一方面政权寿命得以延长，另一方面矛盾复杂化，因此在改进政治体制方面任重

道远。

随着冷战的记忆渐行渐远，土耳其和伊朗都将进一步释放自己的地域力量，在中东阿拉伯国家担任更强有力的角色。土耳其现任领导人不再执着于北约的垂青，尽管其前任把北约视为非抓住不可的一棵虚弱的芦苇。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政权本身即是冷战的余孽，这个政权倒台后，伊朗前所未有地卷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进程中。土耳其与伊朗的联合演出是一场微妙的戏码，既试图彼此抗衡，又都想把叙利亚吸引到自己的轨道。与此同时，不管目前伊拉克多么虚弱，它毕竟是一个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导的国家，未来或可取代伊朗的位置。

此外，全球通信革命也给土耳其和伊朗的宗教事业帮了大忙。它让人们摒弃前嫌、超越种族，真诚地拥抱宗教，并以此作为新的身份属性。土耳其人、伊朗人和阿拉伯人都是穆斯林，他们团结在一起，反对以色列、美国和整个西方。在土耳其和伊朗之间，地理因素的影响力不断加强，中东这个巨大的四边形更加有机地联系起来，其程度近乎前所未有。

阿拉伯世界的困境

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情况不同，阿拉伯国家位于地中海和伊朗高原之间，在20世纪前，其存在对于世界基本没有意义。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只是地理上的表达形式，约旦更不值一提。如果我们删除官方地图上的边界线就会发现，在这像粗布涂鸦般的区域中，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人口族群分布与国界划分存在矛盾冲突。在黎巴嫩和伊拉克，执政当局勉强维持；在叙利亚，专制的政府正处于民众的内外夹攻之下；约旦正处于绝对君主制统治下，但未来大概只有它会实行君主立宪制（约旦现有体制有其客观存在的理由：它与以色列有陆路边境接壤，充当了其他阿拉伯政权的缓冲国。——作者注）。当美国总统小布什推翻伊拉克独裁政权时，他一定认为自己搅动了阿拉伯世界的历史，

其程度自拿破仑以来无人能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后奥斯曼帝国制度，比以往承受着更多压力。西式民主可能不会马上接手，但某种形式的自由化必须出现。埃及革命和冷战时期那些“阿拉伯警察国家”的转变，给其提供了极大帮助，而中欧的过渡和巴尔干对共产主义的脱离，看起来竟显得轻而易举。的确，目前的地中海黎凡特地区，寡头政权轮番倒台，而四处兴起的民主政治实则无所作为。咄咄逼人的能源优势是土耳其和伊朗领导地位的特征，也是他们的地理副产品，尽管几十年来一直在阿拉伯世界中隐而不发。现在的阿拉伯世界之所以进入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过渡期，能源因素是一个重大原因。诚然，2011年的政局动荡将几大政权席卷一空，也成就了通信技术力量的神话，地理因此黯然失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地理，将重新显示自己的力量。

突尼斯和埃及这些古老的文明集群，自古就已立国，而利比亚和也门等只是一些模糊的地域，直到20世纪才自立国家。利比亚西部以的黎波里或的黎波里塔尼亚为中心，始终面向突尼斯的迦太基文明，那里有丰富和有礼的城市文化；而利比亚东部各地以班加西为中心，总是以埃及亚历山大文化为导向。也门从古代起就人口众多，生活富足，但众多山地王国总是分多合少。因此，毫不奇怪，在利比亚和也门建立现代的非专制国家，将比在突尼斯和埃及更加困难。

但是，下一阶段的冲突可能展开的地点，是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以及肥沃新月地带。

民主的傀儡——伊拉克

伊拉克2003年遭受美国入侵后，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变革，并影响到整个阿拉伯世界。伊拉克有巨大的石油储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

界第二），有超过3　000万的庞大人口；地理位置处于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世界交界处，与伊朗、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之间同等距离；此外，作为阿巴斯前朝旧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政治意义。伊拉克还受到三大遗产的困扰，第一是扭曲的政治文化，上个世纪的伊拉克几乎有一半时间处于不同军事独裁的残酷统治下，在萨达姆时代登峰造极；第二是黑暗暴力的古代和现代历史，其延伸远远超出了近几十年的专制，势必鼓励斗狠和多疑的民族性格（这听起来有点像揭人伤疤）；第三是严重的民族和教派分歧。

伊拉克从未能独善其身。还是芙蕾雅·斯达克那句话："埃及与人类交通路线并行不悖，和平相处，而伊拉克从早期就是边境省份，与人类的命运路线呈直角交错，冤家路窄。"美索不达米亚切断了历史上最血腥的移民迁徙路线，那时人人自危，鲜有活路，悲观情绪四处滋生。早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近东的古代居民就为争夺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权而不断发生战争。不管袭击是来自西部叙利亚沙漠，还是东部伊朗高原，伊拉克总是一个被不断占领的受害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都是如此。

比流血事件更厉害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很少能建成在人口统计学上有凝聚力的国家。沿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形成了伊拉克的边境地区，这里生存着的不同群体往往是外来侵略的残留物，彼此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和重叠。正如法国东方学者乔治·鲁（Georges Roux）在《古代伊拉克》（*Ancient Iraq*）一书中特意提到的，自古以来，伊拉克的南北部和中心经常陷入苦征酣战。第一个城邦统治者是南部的苏美尔人，他们与中部的阿卡德人战斗，二者又都与居住在北方的亚述人作战；反过来，亚述人又与巴比伦人打仗。还有八面玲珑的波斯人，他们与土生土长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混居在一起，形成另一个纷争的来源。只有最令人窒息的专制统治，才能使这个边境地区避免陷入彻底解体。正如学者阿迪德·达维沙（Adeed Dawisha）所说，"社会秩序的脆弱性，在整个历史上都是美索不达米亚这片土地的结构性特征。"在人口稠密的河谷以

及没有保护的边界，族群之间相互为战，最终导致20世纪的暴政，这看似无情，实际上与古代如出一辙。其实，一个专制政权被推翻的那一刻，总会导致持续几年的无政府状态和恐怖暴行，这正是其古代历史的回光返照，这也给伊拉克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美索不达米亚是奥斯曼帝国管辖最虚弱的部分，也是另一例模糊的地理表现形式，一个松散的部落、教派和种族组合，由土耳其人进一步分为几个行省，如库尔德人的摩苏尔、逊尼派的巴格达、什叶派的巴士拉，从北向南延伸。土耳其帝国崩溃后，英国试图在两河之间“塑造”一个政体，结果却弄巧成拙，导致了库尔德的分离主义、什叶派的部族主义以及逊尼派的激进主义。北部库尔德斯坦的油田与南部波斯湾港口相连接，为了从陆路和海上保卫印度，英国的战略之一是将种族和宗派势力结合在一起，然而这些势力很难通过正常的手段来安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伊拉克进一步分裂。该国的军官和政客都是内斗的行家：一部分人看到了伊拉克麻烦不断的身份属性，认为最好使其重归于一个单一阿拉伯国家名下，范围从马格里布到美索不达米亚；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力排众议建立统一的、尽管在地理上不那么合乎逻辑的伊拉克，这将平息各宗派的激情。无论如何，自1921年起伊拉克有近40年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政治不稳定、民主形同虚设、起义此起彼伏，并以王室的名义实行半独裁统治。直到1958年7月14日，一场军事政变废黜了伊拉克亲西方政府，这段历史时期才算告一段落。末代国王费萨尔二世曾统治伊拉克19年，最终与他的家人一起惨遭扫射屠杀；总理努里·阿萨德枪杀后被掩埋，他的尸体不久又被挖出，被暴徒肢解并烧毁。

这并不是偶发的行为，而是体现出肆意妄为的暴力倾向，这往往是伊拉克政治生活的特点。事实上，整个哈希姆王室被杀，正如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在1918年惨遭灭口一样，是一种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犯罪，预示着随后几十年这个国家将会实施的谋杀和酷刑。对于伊拉克来

说，复元所需的时间可能要许多年。

伊拉克东方集团式的专制流程始于布里格迪尔·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Brigadier Abd al-Karim Qasim），终结于萨达姆，独裁者们一个比另一个更极端。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控制住一个由如此不同的群体和政治势力组成的国家。然而，正如达维沙所说，“历史的记忆既不是线性的，也不能累计……因此，虽然伊拉克的历史无疑是威权专制的，但也有民主的希望曙光……”伊拉克一直在苦苦挣扎着，以避免重新滑入暴政，或在宗派忠诚的负担下陷入无政府状态。从1921年到1958年，它的确尝试了某种勉强运作的民主，这一点值得铭记。此外，地理本身也受到不同解释的支配。马歇尔·霍奇森告诉我们，美索不达米亚的人口分裂倾向并非完全源于人为，也有古代历史的基础。两河流域形成的种植区块，正是中东人口构成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所谓的伊拉克民主处于极端不确定的状态下，腐败、效率低下、毫无章法，政治暗杀是家常便饭。尽管拥有巨大的石油财富和美国训练的军队，至少在短期内，伊拉克仍将是一个弱国。争斗不休的政客们将倒向伊朗和沙特等邻近国家，寻求财政和政治支持，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国手中的傀儡。伊拉克可能再度成为扩大版的黎巴嫩，这个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饱受内战肆虐。统治这个国家的利益诱惑太大了，因此伊拉克当权者有腐败的条件，争权夺利的内讧有可能严重而持久。对于美国来说，要想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亲西方的前哨，需要伊拉克这个国家内部强大，遗憾的是，至今尚没有这种迹象。

美索不达米亚受到削弱，可能给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创造了成为人口或自然资源枢纽、从而在该地区树立威信和实现领导的机会，但目前还看不出谁能担此大任。沙特具有较为神经质的特点，天性犹豫而脆弱，因为它拥有巨大的石油财富，而人口相对较少；更糟的是，沙特男性青年群体容易倾向于激进主义，更向往民主，这种倾向已在突尼斯和

埃及点起革命的火花；埃及拥有阿拉伯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在后穆巴拉克时代，政府的精力将主要投入到巩固对国家内部的控制，并照顾到人口的挑战；而对于土耳其和伊朗来说，他们正可设法利用阿拉伯世界的弱点，呼吁建立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共同体“乌姆玛”（Umma）。

这个弱点，不仅体现在遭入侵后的伊拉克身上，也体现在叙利亚。无论是在中古时期还是当代，叙利亚都是阿拉伯世界另外一个关键性的地理终端。事实上，它号称是冷战时期阿拉伯主义的心脏。

地理决定不了叙利亚

1998年，我离开托罗斯山脉，沿东南方向从小亚细亚下行至叙利亚平原，这里点缀着松树和橄榄树，石灰岩山偶尔出现。我离开土耳其的时候，那里已是充满信心的工业化社会，民族主义找到了地理逻辑的支撑，北部有黑海，南部和西部靠近地中海，东部和东南部的山脉形成坚不可摧的天险。在这个国家里，伊斯兰教已经成了西方民主化的囊中物。但现在我行走的地方，是一块在广袤沙漠中推演的领土拼图，能将其拼接在一起的，只有阿拉伯复兴党的意识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崇拜。哈菲兹·阿萨德总统的照片悬挂于每个商店的橱窗和汽车挡风玻璃，真是大煞风景。地理决定不了叙利亚的命运，土耳其也一样，但它毕竟是一个起点。

从地理和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叙利亚人口2　000多万，目前和以后仍将处于阿拉伯世界动荡的中心。阿勒颇位于叙利亚北部，是一个繁华的巴扎（集市）型城市，与伊拉克摩苏尔和巴格达的历史联系比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更紧密。结果，每当大马士革衰落，阿勒颇就会大显身手。在阿勒颇露天市场闲逛时，你会吃惊地感到，大马士革似乎与这里毫不相干。

在阿勒颇的露天市场里，商贩的身份五花八门，有库尔德人、土耳

其人、切尔克斯人、阿拉伯基督徒以及亚美尼亚人。大马士革集市则几乎是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世界。与巴基斯坦和前南斯拉夫一样，叙利亚各教派和宗教都有特定的地理区域：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之间，霍姆斯和哈马日益成为伊斯兰逊尼派的腹地；在大马士革和约旦边界之间，则由德鲁兹派穆斯林占多数；在与黎巴嫩接壤的山间要塞，是阿拉维派的大本营，他们是来自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拨什叶派残部，1 000年前曾横扫叙利亚。

1947年、1949年和1954年，（法国殖民统治当局）试图举行所谓“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按照地区、教派、种族界限划分票仓，进一步加剧了其间的分歧。当1970年老阿萨德上台时，此前24年里已更换了21届政府。他一口气执政30年，是阿拉伯世界的勃列日涅夫，但未能在国内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因此断绝了未来的后路。就连南斯拉夫分裂时都有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叙利亚却没有，这使阿萨德政权显得分外笨拙。

冷战期间以及冷战后头几年，叙利亚激进的泛阿拉伯主义势力强大，几乎成为这个弱国身份的替代品。大叙利亚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地理术语，包括今天的黎巴嫩、约旦、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当今叙利亚国家的边界等于缩短了一半，由此造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学者菲利普·K.希提（Philip K. Hitti）所说，历史上的大叙利亚是“地图上最大的小国，论规模大小微不足道，影响却牵动世界”。其地理涵盖广博，是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汇合点，“文明世界历史的微缩景观”。

叙利亚对希腊-罗马文化进一步打磨，出现了一些最辉煌的思想家，其中包括斯多葛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此外，叙利亚是倭马亚帝国的根基，这是穆罕默德后第一个阿拉伯王朝，在其全盛时期，甚至比罗马的版图还要大。它也是十字军东征的主战场，这是历史上伊斯兰和西方之间上演的最大一出戏。

然而，今天的叙利亚仅仅是这个伟大地理和历史遗产的鬼魂。叙利

亚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知道，失去黎巴嫩就等于切断了叙利亚到地中海的出口，其丰富的文化沉淀将接触不到生命的气息。1920年，法国把黎巴嫩从叙利亚分裂出来，从那时开始，叙利亚一直拼命地要将它重新并入自己的版图。2005年2月，反叙利亚的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被暗杀，小布什随即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全部撤军，这削弱了大马士革少数阿拉维派制度的政治基础。阿拉维派教徒是非正统的什叶派穆斯林教派，人口遍及叙利亚和黎巴嫩。老阿萨德的儿子巴沙尔是其教派领袖，他若想要继续掌权，不仅要做到民主化，还需要证明他的阿拉维派政府能坚决捍卫叙利亚民族利益，比多数逊尼派做得更好。

事实上，活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逊尼派圣战者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正是叙利亚。他们视阿拉维派政权为宿敌，认为它“集专制、世俗和异端于一身”。阿拉维派政权与什叶派伊朗亲近，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涉嫌谋杀成千上万逊尼派伊斯兰教徒，罪不可恕。圣战组织对叙利亚后勤供给线了如指掌，因为要维持在伊拉克的圣战，必须在叙利亚有完整的网络并设置安全庇护所。

面对逊尼派圣战者的威胁，年轻的阿萨德可能别无选择，只有开放政治制度。仅仅为了顺应快速变化的社会步伐而安装的卫星天线和互联网，可能会使他的政权和教派变得比以往更脆弱。诚然，没有人能猜到后专制时代的叙利亚会是什么样。宗派主义的水有多深？它可能根本就不深，但一旦大开杀戒，人们长期压抑的宗派属性就会复苏。

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有可能比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做得更好。因为前者远没有后者那么专制，叙利亚社会受损的程度还没那么严重。当我从萨达姆的伊拉克旅行至阿萨德的叙利亚时，我感觉自己似乎有所解脱，偶尔还能呼吸一下自由人文主义的空气呢。另一方面，整个冷战期间，南斯拉夫是一个比其巴尔干邻国更加开放的社会，但是种族和宗教分歧几乎毁掉了它。少数阿拉维派教徒至少保持了叙利亚的和平，而逊尼派圣战者似乎不大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与前者同样残酷，

而且毫无治国理政之方，而阿拉维派在执政40年期间，已经获得了不少经验。

当然，事情也可能并不会按预想的发展。叙利亚的和平与政治重生，毕竟有坚固的地理基础。要再次记住霍奇森的话：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些国家，毕竟扎根于农业地带，他们并不完全是人造的。即便在目前边界以内，叙利亚仍然是地中海东部黎凡特世界[(2)]的心脏，它意味着以商业为纽带团结起来的多民族、多宗教身份的大世界。

叙利亚出生的诗人阿里·艾哈迈德·萨义德（Ali Ahmad Said）的笔名“阿多尼斯”（Adonis），本身就是这另一个叙利亚的体现，其丰富的文明互动形成历史戏剧的核心，我们可从威廉·麦克尼尔的著作中了解一二。

阿多尼斯劝告他的同胞放弃阿拉伯民族主义，建立新的国家认同，以叙利亚本身具有的折衷主义和多样性为基础，以使21世纪的叙利亚与20世纪初的贝鲁特、亚历山大和士麦那相当。阿多尼斯与阿萨德们一样属阿拉维派，但他没有寄希望于阿拉伯主义和警察国家，而是接受普世主义，他的目光并非投向沙漠，而是面向地中海。现代叙利亚尽管痛失了黎巴嫩，仍然有相当大规模的资产，而地中海代表一个民族和教派的集成，这是在叙利亚建立稳定民主唯一的思想基础。

麦克尼尔、霍奇森和阿多尼斯对于叙利亚提出的希望的确殊途同归，这也将给地理上“大叙利亚”的其余部分，包括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带来深刻影响。如果阿多尼斯的民主不能在叙利亚扎根，那么不管该国是否会发生圣战反叛，都注定会成为不那么集中的、较为弱小的国家。

叙利亚也是一个青年群体崛起的国家：其人口的36%在14岁或以下。叙利亚被削弱，可能意味着贝鲁特取代大马士革成为大叙利亚的文化和经济首都，后者则不得不付出数十年之久的巨大代价，或像苏联一样自绝于现代世界。而贝鲁特南部穷苦的、有真主党倾向的什叶派将继

续在人口上领先于这个城市的其余地区，同时逊尼派伊斯兰在大马士革有更多的政治影响，这意味着大叙利亚可能会成为一个比现在更不稳定的地理区域。

约旦可能在重大的变革中幸存下来，因为哈希姆王朝已经用几十年建立其国家意识，并形成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约旦首都安曼到处是忠于约旦国王的前朝政府部长，这些人不因内阁改组而被囚禁或杀害，但也仅仅允许他们保留财富而已。但人口统计又是一个魔咒：约旦630万人口中70%生活在城市，近1/3是巴勒斯坦难民，他们比东岸本地人的出生率要高些；此外，在约旦还有75万伊拉克难民，它成了地球上最大的难民人口收留国。

让我们再次跟随保罗·布拉肯和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脚步，回到封闭得让人患上幽闭恐惧症的地理真相，其中贫穷和拥挤的城市群体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并被电子媒体进一步煽动起来。在过去的10年当中，我们只关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暴力行为，却对所谓中东的“稳定地区”是多么不稳定视而不见。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危险，阿拉伯变革就证明这一点。它始于吁求民间社会和个人尊严，控诉僵化的国家安全制度剥夺人们的向往。但是，未来城市化和电子通信的发展，将使公众表达愤怒的方式不那么良性克制。对现实和想象中的不公正揭竿而起的人群，是新的后现代老虎，下一代阿拉伯领导人将很难控制住。

天生冤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我曾多次从约旦过境到以色列。约旦河谷是地球表面上一条深深的裂痕，绵延3 700英里，从叙利亚向南延伸，直达莫桑比克。从约旦伊尔比德镇的浅棕色台地到约旦河，其间道路千回百转、绵延下沉，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层出不穷。1998年我看到，道路两旁建着尘土飞扬的汽车修理站，摇摇晃晃的水果摊，年轻男子三三两两地抽着烟游荡。沿河床边有一条绿油油的田地，而对面以色列一侧则山势险峻。

约旦边境哨所和海关，就像在一块空地上摆满了一排排旧集装箱。界河很窄，坐上汽车分秒之间即过。边界另一侧建了一条园林绿化带分隔着交通行车线，像是西方国家随处可见的安全岛，但是，从黯淡、布满灰尘的约旦和阿拉伯世界大多数地方一下子置身此处，会感到如见奇迹。以色列移民局大厅如同美国的小型机场候机大厅，安全官们很少把身上穿的添柏岚（Timberland）名牌衬衫下摆掖进牛仔裤腰里，以便留出更多的地方别手枪。

在阿拉伯世界待了几个星期后，以色列给人的感觉如此无视传统。出入境大厅外面，新铺的人行道、长椅、旅游设施齐全，简直与西方的任何地方无差别。但它是一个空荡荡的、不友好的公共空间，根本没有人在此逗留，而阿拉伯世界则因失业率很高而满街都是游荡的年轻人。驻守岗亭的以色列人毫无人情味，没有传统的中东人那么好客热情。20世纪70年代，我在以色列居住过一段时间，并曾在其军队里服役，现在我又重温了这种感觉。对于中东，以色列显得那么不协调，但它毕竟是一种生硬而坚固的事实。

对于整个伊斯兰世界来说，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已经成为一种图腾，象征人类世界事务的最大不公正，他们一度非常团结，并通过大众媒体不断激起愤怒。在一定程度上，事实已变得毫无意义；观念就是全部，决定因素是地理。犹太复国主义正是思想力量的显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也就是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围绕土地的战斗，正如土耳其人和伊朗人之间的纷争一样，是一个绝对地理决定论的案例。

“在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占领区内，这些犹太人很快就会成为少数（按照某种算法，这已经是事实了）。一些人口学家预测，在15年内，他们在这一地区所占人口比例，将降低至42%。”《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国家版编辑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 Schwarz）如是说，他在2005年给该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以色列能活到100岁吗？》，从那以后，这些计算结果以及冷静的分析一直没怎么受到事实

的挑战，更可笑的是，阿拉伯被占领土上的人口出生率比以色列更高，加沙地带的人口增长率是以色列的两倍，成年女性一生平均要生5个以上的孩子。结果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色列的政治、军事和情报界达成一个共识，以色列必须撤出几乎所有被占领土，或基本上成为种族隔离国家，这件事或早或晚必须实行。他们希望形成某种“围墙”效应，一条以色列自建的屏障，以期有效地隔开约旦河西岸日益膨胀和贫困的巴勒斯坦人口。以色列地理学家阿农·索弗（Arnon Soffer）认为，围墙是“最后的绝望尝试，以拯救以色列国”；但是施瓦茨写道，在被占领土上靠近绿线的犹太人定居点，“与以色列人有太深的渊源，并很可能是太多以色列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很难被抛弃……”

然而，巴勒斯坦人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前提，就是“返回权”，这种观念适用于被以色列驱散的700万巴勒斯坦人，他们一出生就流离失所，还有他们的后裔，现在可能也已达500万之多。2001年，98.7%的巴勒斯坦难民拒绝接受以赔偿交换返回权计划。最后，还要考虑到生活在以色列1967年以前边界内的那些以色列阿拉伯人。以色列犹太人的人口增长率是1.4%，而以色列阿拉伯人是3.4%；犹太人的年龄平均是35，而阿拉伯人则只有14岁。

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人们可能会希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签订和平条约，以色列人放弃被占领土，解散大多数定居点，而巴勒斯坦人将放弃重返家园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大以色列”至少将作为经济概念，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及约旦、黎巴嫩南部和叙利亚南部（包括大马士革）统统吸引到身边来。但是，截至发稿时，没有哪两国人民像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那样有如此巨大的隔阂和分歧，以至于彼此之间在政治上已无法松动。人们只能希望2011年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震能够督促以色列作出关键性的领土让步。

中东处在人类命运的交汇点上，地理封闭和密集的人口更是让其命悬一线。在通信、武器装备等各方面的革命过程中，地理并没有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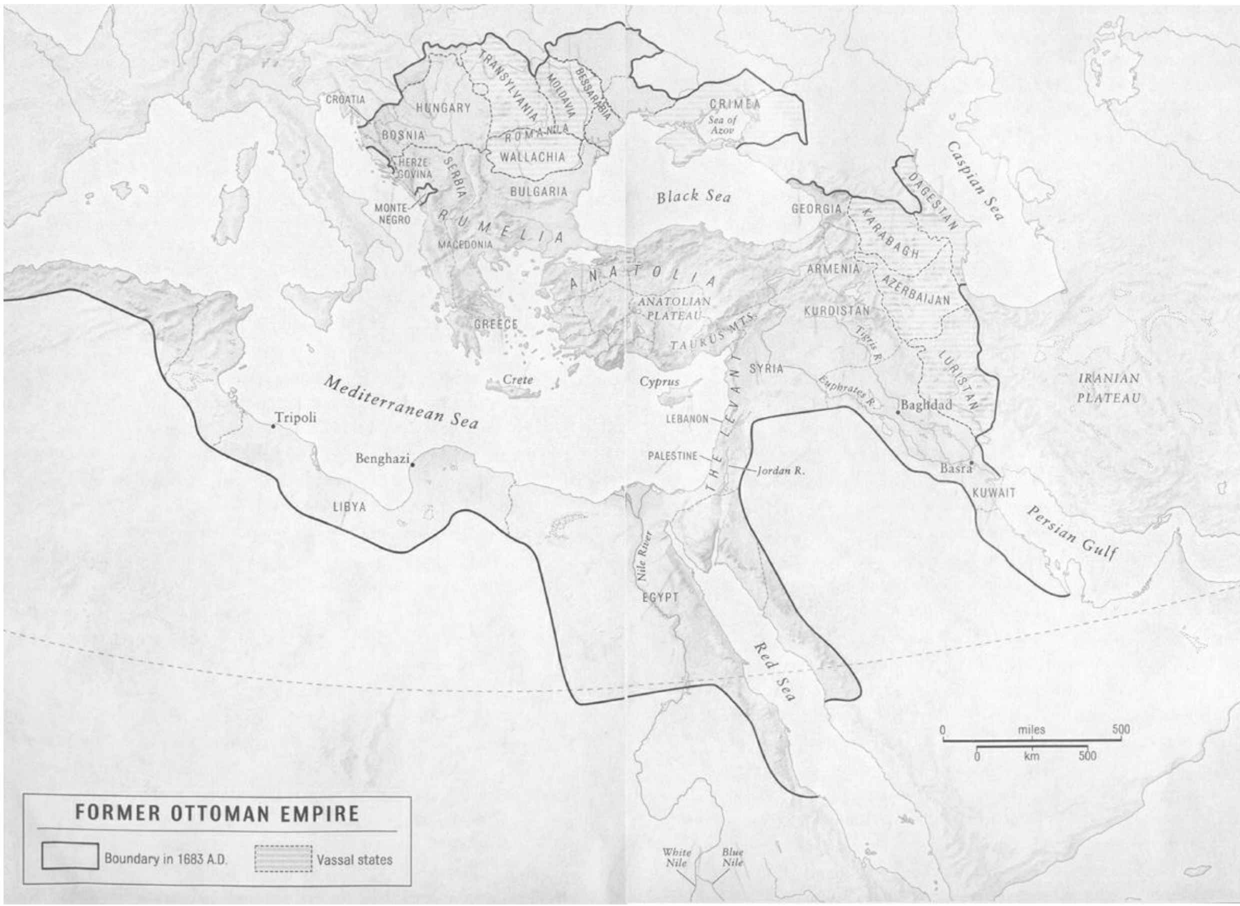
反而变得更有价值、更珍贵，与越来越多的人息息相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普世价值必须与环境条件相结合。我们祈祷，一个哈希姆王朝的约旦和一个团结的叙利亚能够幸免于难；当然，我们也祈求结束伊朗的毛拉专政，从加沙地带到阿富汗的大伊朗地区成为一个向好的力量，而不是邪恶；也许，在整个中东地区，天平会随之转移，真主党和哈马斯可能被驯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前景有所改善。在约旦，很难想象还会有一个比目前君主制更温和、更亲西方的政权；而沙特阿拉伯的政权则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在叙利亚，民主应该一步步深化，除非大叙利亚的政治组织结构受到逊尼派圣战者破坏；如果出现2006年至2007年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生的暴力袭击，结果就难说了。

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领导人专注于所谓的东方问题，也就是随着奥斯曼帝国灭亡而爆发的不稳定局势和高涨的民族主义诉求。第一次世界大战解决了东方问题，却付出了灾难的代价。如今，现代阿拉伯国家制度靠着其古老的地理特征和人口分布格局形成了。对此，马歇尔·霍奇森颇具先见之明；但是，100多年过后，在大中东所谓“一世界”的心脏地带，后奥斯曼时代的国家制度能否持久，还是不能想当然地掉以轻心。

---

(1) Virtue Party，前身是伊斯兰色彩浓厚的繁荣党。主张民主、世俗主义和法制，坚持实施人权，确保人民享受思想、言论和信教的自由。2001年8月，因为“反世俗罪名”，美德党被宪法法院取缔。7月至8月，被取缔的美德党传统派和新生派分别组建新党——“幸福党”和“正义与发展党”。——译者注

(2) 黎凡特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地理名称，指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译者注



（前奥斯曼帝国）

（上图地名中文对照见如下内容）

图名：FORMER OTTOMAN EMPIRE前奥斯曼帝国

① CROATIA克罗地亚　HUNGARY匈牙利　BOSNIA波斯尼亚

GREECE希腊　TRANSYLVANIA特兰西瓦尼亚　MOLDAVIA摩尔达维亚

ROMANIA罗马尼亚　SERBIA塞尔维亚　LIBYA利比亚

Cyprus塞浦路斯　LEBANON黎巴嫩　PALESTINE巴勒斯坦

SYRIA叙利亚共和国　KUWAIT科威特　CRIMEA克里米亚

RUMELIA鲁梅利亚　MONTENEGRO黑山共和国

HERZEGOVINA黑塞哥维那

MACEDONIA马其顿王国　GEORGIA格鲁吉亚　KURDISTAN库尔德斯坦

LURISTAN卢里斯坦　AZERBAIJAN阿塞拜疆　BULGARIA保加利亚

DAGESTAN达吉斯坦　ARMENIA亚美尼亚地区

THE LEVANT黎凡特地区　WALLACHIA瓦拉几亚地区

② Mediterranean Sea地中海　Caspian Sea里海　Red Sea红海

Sea of Azov亚述海　Black Sea黑海　Persian Gulf波斯湾

③ Benghazi班加西

④ Nile River尼罗河　Blue Nile青尼罗河　White Nile白尼罗河

Jordan R.约旦河　Tigris R.底格里斯河　Euphrates R.幼发拉底河

⑤ Tripoli的黎波里　Baghdad巴格达　Basra巴士拉

BESSARABIA巴萨拉比亚　KARABAGH卡拉巴赫

⑥ TAURUS MTS.托罗斯山脉

⑦ IRANIAN PLATEAU伊朗高原　ANATOLIAN PLATEAU安纳托利亚高原

⑧ ANATOLIA安纳托利亚　Crete克里特岛

第15章
“山姆大叔”的历史罗盘
墨西哥的挑战

当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人将战略重心从阿富汗和伊拉克转移到亚太时，似乎将墨西哥遗忘在了历史的街角。作为一个与美国有着3 000多公里边境的国家，毒品、犯罪、人口激增正在将这个国家一步步推向深渊。即使麦金德将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一起定义为“世界岛”周围最关键的大陆卫星国，但日渐模糊的美墨边境已经为美国的未来埋下了诸多隐患。

墨西哥到底是美国体面退出历史舞台的出口，还是美国重塑“新世界”核心地位的救命稻草？作为海洋性的欧洲与大陆心脏地带之间的独立缓冲国，这个国家将会怎样影响西半球甚至整个世界的平衡？

已故牛津大学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1972年写道，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没有任何一批学者比法国所谓的年鉴派（Annales）有更大的“产出效应”。该派于1929年由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创建，因为他们经常在巴黎一份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的期刊发表文章而得名。在这些法国历史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费尔南·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于1949年发表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书中重点强调了地理学、人口学、物质和环境因素，开创了历史著述方面的新天地。布罗代尔把自然因素引入了历史学，对丰富这门学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还恢复了地理学在学术界应有的地位。他这部两卷本巨著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大部分书稿写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是一名德国囚犯。

在布罗代尔宏大的叙事画卷里，永恒不变的环境力量造就了延绵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的持久历史趋势。因此，如果不纠结于具体细节，我们关心的各种政治事件及局部战争仿佛是天注定的。布罗代尔告诉我们，欧洲北部的森林土壤富饶肥沃，那里的农民不需费什么力气就能大有收获，因此北欧社会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相比更自由，也更有活力；地中海沿岸土地较为贫瘠，农民生活缺乏保障，这也使专制的寡头统治得以实现；此外，被榨干养分的贫瘠土壤加上变化不定的气候和频繁的天灾，也促使希腊人和罗马人不断征服探索。我们曾自欺欺人地相信人完全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布罗代尔则告诉我们，越是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就越有动力尽可能地影响事情的结果。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

在布罗代尔的地理罗盘上，地中海被标注为一个靠近撒哈拉大沙漠的海洋综合体。因此，他恢复了北非在地中海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并为我们提供了当代工人大移民的时代背景，他们从地中海南部的伊斯兰海岸迁徙到了北部以基督教为主导的地区。虽然在布罗代尔的故事里西班牙统治者菲利普二世经常是主角，但全书主旨并非在于个别历史人物如何克服艰难险阻。相反，他所讲的是在客观而深刻的结构性力量中，特定人物及其所处的社会如何得到巧妙塑造。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时代，日趋变暖的北冰洋开启了商业交通的契机，而海平面的潜在上升，对于沿岸的第三世界热带国家来说无异于灾难降临；此外，是否拥有石油和其他能源性商品，正在从根本上重塑世界政治。现在，阅读布罗代尔史诗般的地域决定论著作的时机已经成熟，至少，它可以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提供文学上的情境：这个星球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水资源日益匮乏，日趋拥挤，资源稀缺和环境问题不断引发各种社会事件。

特雷弗-罗珀写道，布罗代尔和其他年鉴派人物的成就在于“把地理学、社会学、法律、思想引入一条宽阔的历史长河，使之得到丰富、更新和强化……毕竟，地理、气候和人口决定了通信、经济和政治组织”。布罗代尔与麦金德、斯皮克曼或马汉不同，他没有专门的地缘政治理论供我们探讨，但他取得的成就更大，因为他不仅是地理学家或战略家，还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叙述有一种上帝般的特质，把人类生存的每一个细节都绘画在自然的帆布上。如果地理学某一天与文学相近，那一定是布罗代尔的杰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迄今为止所有战略思想家的集大成者。

牛津大学考古学家巴里·坎利夫指出，布罗代尔对于历史认识方法的代表性贡献，或许是他提出了“时间波长变化”的概念。在这个概念的底部是“长时段”（longue duree），即地形地貌缓慢地、不为人察觉地发生变化的地理时间段，在这个阶段，景观既有变化的能力，又受到一定限制。在此之上是波长较短的“中期周期”，布罗代尔称之为“中时段”（conjonctures），即人口统计、经济、农业、社会、政治上的系统

性变化。坎利夫解释说，这些基本上都是“集体的力量，是客观的，时间限定通常不超过一个世纪”。“长时段”和“中时段”表现出人类生活的大部分隐藏着的“基本结构”，而我对地理的研究和考量，所要突出的正是这些基本结构。

布罗代尔把最短的周期称为“历史小事件”（l'histoire evenmentielle），即政治和外交的每日流水账，这是媒体报道摄取的主食。他用大海作比喻：在海底最深处，庞大的水体缓慢流动，收留承纳万物；再往上面是潮汐涌动以及漩涡暗流；而最终浮在海面上，用坎利夫的话说，是“惊涛拍岸的瞬间，浪花四溅，转瞬即逝”。

由于布罗代尔的很多分析过程基于客观的时间框架之上，特别是鉴于气候变化及其对特定区域的影响，要臆测地缘政治将如何展开是不可能的。比如说，要谈论美国和欧洲一两百年后的关系是荒谬的，因为还有相当多的影响因素尚未浮出水面。布罗代尔鼓励我们不妨从远处旁观，以便平心静气地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展卷阅读时，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最重要的事件就会跃入我们头脑中，类似问题无可回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难道只是海上一朵小小的浪花，又或许，源于美国命运中更深层的结构性部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暴行，难道也只属于“历史小事”一桩吗？布罗代尔把人类活动放在自然力量的重压之下，这方便了我们以“长时段”为基础进行思考。

为何墨西哥对美国更重要？

我之所以提到布罗代尔，是为了引出2009年6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迫切需要我加紧研究21世纪与美国相关的地理问题。它把人们的目光从一时的困境引向更宏大、更长远的领域，我想布罗代尔也会喜欢这一点。

这次会议是由新美国安全中心主办的，我当时在那里做一名高级研

究员。我们分组讨论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需要采取的下一步骤，特别强调了对反叛势力的政策微调。与会嘉宾们跃跃欲试，都要打“阿巴”这场棒球赛的界内球。对华盛顿战略家们来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然后，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安德鲁·巴塞维奇发表了一个看法，语惊四座。我当时坐在前排，他的意思据我理解是这样的：

> 如果从一个历史学家的长远视角看待这次会议，我们可能得出结论：正当美国被深深地卷入阿富汗以及大中东其他地区局势之际，大规模的国家挫败感却在美国南部边界蔓延，这对美国近期和未来的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比半个地球以外发生的任何事件都要大。想想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在中东所有的干预实现了什么目标呢？为什么不换一种思维来解决墨西哥问题呢？如果我们把投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所有金钱、精力和技术创新改投到墨西哥，我们该有多么繁荣啊。

包含在这个简单问题里面的，是他对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性批判。这个批判的源头远远超出墨西哥，将欧亚大陆也囊括在内，但都植根于北美的地理特点。巴塞维奇的挫折感太鲜明了，因此他的逆耳忠言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甚至有凄凉的感觉。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生，越战退伍老兵，他的儿子在伊拉克战场上阵亡；但是在他的书中，巴塞维奇则俨然是一个辩论家，对东海岸精英抱有一种压倒性的蔑视，对他们让美国在海外卷入各种纠葛的行为极端不满。实际上，与他的意见不谋而合者大有人在。他们与巴塞维奇一样，在进行分析时有意识地超越了历史具体事件，着眼于长远。当我思考这些分析家真正担心的是什么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立刻跃入头脑。巴塞维奇，以及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约翰·米尔斯海默、保罗·皮勒（Paul Pillar）、马克·赫尔普林（Mark Helprin）、特德·盖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还有已故的塞缪尔·亨廷顿，这些人从哪方面看都不

是外交政策分析圈中最响亮的声音，而且把他们放在同一类别本身就有点牵强附会。然而，他们不约而同地从长远的角度质疑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

沃尔特是哈佛教授，米尔斯海默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尽管他们的学术声望不低，他们的著作《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在2007年出版时却遭到粗暴对待，因为该书将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势力指控为“伊拉克战争背后的始作俑者”，但那帮人个个都自视为这场战争的死对头。赫尔普林是一位小说家，以前曾在以色列当兵，他相信中国将成为美国的首要军事对手，因此主张“不留后患”，米尔斯海默对此深有同感。他们两人以及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皮勒，对于美国把资源分散投入中东“无用的战争”，同时坐视中国获得最新的国防科技深感担忧。事实上，即使美国稳住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中国也将会成为该地区道路和管线的主要受益者，并将部分地利用它们获取能源、战略性矿产和金属资源。卡彭特对美国面临的相关危险也发出警告，他所关注的方向主要以遭受严重暴力困扰的墨西哥为代表。而亨廷顿一生中致力于政策观察，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也提出了同样的预警。

将所有这些人的想法整合一下，我们就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属于外交政策圈里的现实主义派。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面临三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困境：一个是中东混乱的欧亚大陆腹地，一个是崛起而自信的“超级大国”——中国，还有一个是墨西哥面临的失败困境。只要我们在进一步军事介入中东时更加小心谨慎，就可以最有效地应对中国和墨西哥提出的挑战。也就是说，我们要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脱身，越快越好；至于轰炸伊朗一事则绝不可行。这是唯一的出路，惟此美国的力量才可以再维持几十年，在“长时段”生存得尽量久一些。

当然，从长期来看这样是安全了，也有人可能会为此沾沾自喜。这些人并未考虑到没有妥善处理短期问题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例如从阿富汗突然撤回会怎么样。是否会导致美国设在巴基斯坦北方瓦济里斯坦

的情报来源中断呢？我们曾在那里用无人驾驶飞机成功打击了“基地”组织；是否会看到扎瓦希里和其他幸存的“基地”组织头面人物在半岛电视台摄像机簇拥下，胜利开进贾拉拉巴德呢？阿富汗是否会成为一个激进的塔利班国家，接受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督导？作为由此带来的后果，美国是否会失去印度这个21世纪的全球枢纽国家的尊重？伊朗是否会非正式地合并阿富汗西部？

此外，如果我们在2006年完全从伊拉克撤军，又会发生什么事？当时那里正处在暴力高峰，一些分析家却觉得非撤军不可。如果那样的话，当时那与巴尔干同等规模的教派暴行是否已经飙升到卢旺达大屠杀的水平，造成上百万人死亡，而不是一两万人？一个人该有多冷血，才会意识不到这两种不同结果对生命的影响有多巨大！此外，如果我们当时撤回，对美国的全球声誉会有什么影响？这种快速撤军又将如何进行？永远不要说事情不可能比现在更差了，它们的确会的。

当然，仓促从伊拉克或阿富汗撤出是不负责任的。不管喜欢与否，仅仅通过入侵这些地方并长期地控制它们，美国就已经为下一步发展获得了利害攸关的筹码。然而，以此为标准来评判这些分析家，以及那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的细枝末节上与他们看法一致的人，是不公平的。他们的信仰背后的情感源泉是：我们压根就不应该卷入这些国家的事务。不管伊拉克战争最终结果如何，清点一下美国人和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数，相信这数字会在几十年里给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带来困扰，就像越南战争一样。它们绝不仅仅构成“历史小事件”而已。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分析家并不关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下一步要做什么。相反，他们都在问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失误成本已经是多少？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是否还有救？我们最好到哪里投入最大精力，特别是在高度选择性的军事部署和民间援助上，使美国可以帮助欧亚大陆保持力量平衡，而不是淹没在那些从一个失败国家逃离的墨西哥人群里？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助理教授贾库柏·格瑞吉尔所说的那样：“地理隔离

是战略的保佑，不应被扩张性的战略挥霍。”

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挥霍了多少？华盛顿的新美国基金会学者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同意巴塞维奇的观点，认为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升级是愚蠢的，但在美国是否能承担得起卷入这两场冲突的费用问题上，他与巴塞维奇分道扬镳了。林德认为，只有很少一部分国债是由国防开支造成的，对于同时打两场战争而言，这样的费用还算合理。解决美国财政偿付能力最重要的途径是减少医疗保障费用，这远比最近的帝国冒险行动要有效得多，尽管他极为反对这种冒险。事实上，看看过去帝国的一些失误，我们就能用两种视角来看待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惨败：一方面是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已经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我们在21世纪是否有能力应对来自中东、中国和墨西哥的未来挑战。

如果美国不再主导世界……

公元1449年，中国明朝的军队在于南下的蒙古军交锋中打了败仗，回撤途中被蒙古军队包围，水源也用光了，明军惊慌失措。格瑞吉尔写道，他们相信会得到蒙古军队的怜悯，“许多人卸下他们的盔甲，跑向敌阵前线投降”。结果，明军多达50万人被屠杀，明朝皇帝也成了蒙古人的俘虏。[(1)]明军在此次交锋中的大败，是明朝长期衰落的开始。明朝从此再也不敢尝试迎击北方草原的蒙古人，就连与蒙古人的紧张对峙，也消耗了明朝统治阶层的精力。这导致了中国从亚洲海运领域的撤退，并间接地鼓励了欧洲列强进入大陆边缘地带。

幸好，在美国侵入伊拉克的军事冒险中并没有发生过那么灾难性的事件，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仍然是坚固的，并没有降低的迹象，更不用说撤退。我们失去了不到5 000人的军力，重伤32 000人，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相对于50万的入侵大军来说并不算多。美国陆军在伊拉克战争中承担了冲锋陷阵的作用，伊拉克的非常规战争经验使55万精锐现役军人得到更好的训练，有更灵活的战法，从理论上说，其适

应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海军陆战队也是如此。美国犯了中世纪晚期威尼斯王国所犯的致命错误，但不是在伊拉克，也不是在阿富汗。威尼斯之所以创建了一个海运帝国，不仅是因为它享有地中海贸易航线之间的绝佳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威尼斯与意大利大陆之间有几英里的水域，保护其免受意大利大陆的骚扰，漫长沙洲旁的海域也给其提供了防入侵的屏障。威尼斯在15世纪衰落的原因之一，是其决定成为入主意大利大陆的霸权。在对维罗纳、帕多瓦、佛罗伦萨、米兰、康布雷同盟等多次发动战争后，威尼斯已不能从大陆上“致命”的强权政治平衡中脱身，这对其投射海上力量的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如果，当然仅仅是如果，美国习惯于动辄在大中东进行地面军事干预，那么威尼斯的教训，应该在政策制定者之间引起警惕。如果美国今后可以自我克制，将国家定义为空中和海上力量大国，它可以很容易地避免威尼斯的命运。一些持久的小规模战争可以把我们消耗殆尽，这一点并不奇怪，虽然悲剧已经太多，每隔1/3世纪我们还是会来一次误判。

2006年至2007年在伊拉克爆发的残酷冲突，不过相当于1857年至1858年反对英国的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当时英国的东方主义者和其他实用主义派别想保留一个传统的印度，因此失去了一些阵地，使那些希望使印度“英国化”的基督教徒和功利主义改革者占了上风。但是，在他们试图把西方文明的成果带给南亚次大陆时，却遭遇了当地人民强烈反抗。印度德里、路克瑙和其他城市被占领，直到殖民势力重新将其夺回。这一惨败并非大英帝国的休止符，其势力反而又延续了一个世纪；但它仍然是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英国自此从一个受传播福音欲望的强烈驱使，一心要将自己价值观强加给殖民地的专制政权，转向一个建立在国际贸易和技术基础上的更加冷静务实的帝国。

古老的历史也可提供镜鉴，让我们质疑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是否已经注定让我们身陷困境。最有名的是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第六卷里讲述的西西里远征。从雅典首次侵入西西里，到公元前413年锡拉丘兹海军战役的最终灾难，前后历经14年；从肯尼迪政府出兵侵越到西贡沦陷，直到福特总统下令撤离，同样用了这么多年。西西里战争分裂了雅典在国内的阵线，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悲观情绪和相互指责一时间使雅典陷入瘫痪，直到雅典人最终愿意认真地接受与斯巴达共存的局面，从而恢复两极冲突。

历史证明，西西里岛对于雅典的民主及其海上帝国的生存而言，根本就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因素。尽管失去了这么多，受了这么多苦难，雅典仍然有领导联盟的资源。当然，在西西里岛的冒险已被证明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战争以雅典失败告终。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例子，那就是罗马的衰落。1976年，爱德华·N. 勒特韦克（Edward N. Luttwak）在他的《罗马帝国的伟大战略：从公元1世纪到3世纪》（*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 D. to the Third*）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讲述。

勒特韦克的方法，不是泛泛谈论衰落，而是从罗马的战略方面展开讨论。他首先确定了战略的三个时间阶段。第一个是胡里奥-克劳迪安（Julio-Claudian）体系，或称共和帝国体系，其中，围绕着意大利这个帝国核心有一连串的附庸国，他们被充分授予“整体”的罗马权力去完成帝国的意愿，而无需派遣占领军队。在这个阶段，外交而非武力是罗马权力的活性成分。当然，罗马军队最压倒性的建制是在罗马周围形成的一个“巨大的卫戍圈”。因为这些部队不需要占领附庸国，或在任何意义上进行领土防御，用勒特韦克的话说就是，“得益于固有的移动性，可自由地重新部署”。

这是罗马的顶峰时期，权力得到审慎的行使，按照节约实力的原则运行。灭火能力是现成的，随时可用于任何军事应急作战，这在地中海世界无人不知。因此，每个人都害怕罗马。这让人联想到罗纳德·里根任内的美国，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已经完成，然而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

格（Caspar Weinberger）按兵不动，威望树立起来了，反倒没有了冒险的必要性。

罗马的第二个战略时间段是安东尼（Antonine）体系，实施于1世纪中叶到3世纪中叶，反映的是勒特韦克称为“疆域化”的罗马帝国。现在罗马觉得有必要在各地部署其军队，包括在附庸国内，以确保他们的忠诚，节约实力的原则因此失去了作用。不过帝国继续保持着繁荣，并有广泛的蛮族自愿接受罗马化，暂时“消除了本土的最后一丝不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帝国的罗马化进程又会造成不同部落在对付罗马的共同事业上拉帮结伙，因为他们现在加入的文化不属于自己。试想全球化如何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世界的美国化，这又反过来成为一种工具，为别国挑战美国霸权提供服务。

再看看罗马大战略的第三种体系，那就是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深度防御”。边境民族的正式联合足以挑战罗马，帝国不得不处处防守，并保持经常性的紧急部署。第二个系统的冲击应变能力至此也丧失了。随着军团临近崩溃，害怕罗马的国家越来越少。

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正处于惊人相似的时间段内，这怎不让人扼腕叹息。罗马力量稳定了地中海沿岸，美国海军和空军在全球公地巡逻，这看起来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并如罗马的统治一样被视为理所当然。在过去10年里，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过度扩张，忙于奔赴地球遥远的角落，平息那里的叛乱。美国因此必须考虑制订一个大战略，以便从类似于罗马第三体系的状态恢复到第二体系或者第一体系。虽然美国没有附庸国，但它确实有盟友和志同道合的其他国家。美国需要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使他们更有效地代表美国的利益。通过积极的外交和建设并有节制地使用预备役部队，美国可以重振雄风，胡里奥-克劳迪安体系下的罗马将随之实现。

其实，罗马帝国的寿命很长，这足以证明其大战略是成功的，它后来陷入衰落直至动荡垮台，是由于未能适应北部新的国家集团，那其实

是现代欧洲国家的轮廓。这些势力成形后，罗马帝国不论如何都会走向毁灭，但这原本可以不必发生得那么快，或不一定以那种方式发生。在其大战略的最后阶段，罗马真正的失败还在于没有建立一个体面的撤退机制，当然它的内部也已腐烂。但是，从逆向的角度来说，如果规划一个灵活的霸权出口，一个国家或帝国实际上可以延长其强势地位。对美国而言，要准备好迎接一个名为“美国已经过时了”的新世界，没有什么比这更健康了。这样，它就会有目的地努力，而不只是为享受霸权而维持霸权。

墨西哥——美国退出历史舞台最体面的出口？

假设美国要从历史上的主导地位退出，如何准备一个长期而体面的出口呢？与拜占庭一样，美国可避免代价高昂的干预，使用外交手段打垮敌人，把情报资源用于服务战略性目的等。回到巴塞维奇的观点，美国也可以确保自己不致于从南部遭到破坏，就像罗马从北部遭到摧毁一样。

美国东西两边毗邻海洋，北部与加拿大北极地区接壤，只有北部边境上的细长地带可供中产阶级人口居住。而西南地区则是美国最脆弱的地方。美国无论作为一个国家还是帝国，在这条边界上都正处在紧张状态。在那里，作为一个地理上有凝聚力的国家，美国的一致性受到质疑。就历史而言，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是广阔的，两边就像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部一样没什么差异，文明的张力在这里表现无遗。然而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也注意到，“在世界上任何两个相邻国家中，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最大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墨西哥的9倍。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国内社会条件的延续，没有任何事件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力超过历史上拉丁族群戏剧性的北上运动。墨西哥和中美洲构成日益增长的人口发电站，美国与那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墨西哥的人

口为1.11亿，加上中美洲的4 000万人，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一半。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限制，墨西哥出口物资的85%运往美国，而中美洲一半的贸易活动也针对美国。美国人的平均年龄是37岁，说明其人口呈老龄化趋势，而墨西哥人的平均年龄为25岁，中美洲人平均年龄更低（例如，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只有20岁）。

美国的命运正在悄悄转变，从由东向西变为由北向南，昔日从大海到阳光海岸的大陆和爱国的神话正在慢慢褪色。预定于2014年开工的巴拿马运河扩建工程将进一步加快转变的步伐，加勒比盆地将敞开大门迎接来自东亚的巨轮，在墨西哥湾的美国港口城市，从得克萨斯州到佛罗里达州，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美国南部边界漫长，其中一半是根据1846年至1848年的美墨战争条约穿越沙漠设立的人工边界线。乘巴士从墨西哥城一路北上时，我吃惊地发现跨越这条边界就像穿越约旦和以色列边界，或者越过柏林墙。在墨西哥一侧的诺加利斯和索诺拉，破损的人行道上围满乞丐，边界那头的美国国旗仿佛飘扬在另一个世界。边境检查站就设在一座小楼里，穿过去就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镇。仅仅触摸一下门把手，我就感觉"新旧两重天"。牢固结实的门把手用高品质的金属制成，玻璃橱窗清洁明亮，房间的瓷砖镶嵌得严丝合缝。这些似乎形成了一种感召力，在墨西哥呆了一个星期后回来，那里粗制滥造的基础设施简直让人不堪回首。

美国边检站房间里只有两个人：一位移民官员，另一位是海关官员。他们彼此不说话。在墨西哥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这样规模的政府机构里总是乱糟糟的，成群的官员和闲杂人等七嘴八舌地喝着茶或咖啡说笑，分不清谁是谁；而在美国边检站，我见识了如此少的人手如何驻守岗位，又如何有效地工作。随后不久，我到以色列参观，那里的环境标准化得近乎冷酷，街道空旷，商店店标用高档聚合物制作，而不是生锈的金属和廉价的塑料制品。在墨西哥几周的时间里，我目睹了1亿多

墨西哥人处于动荡和半无政府状态，这些安静的街道显得如此脆弱，甚至有些不自然。

汤因比在比较野蛮人和罗马人时写道，在高度发达与不那么发达的社会边界，“天平不会达到稳定的平衡，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向边境上更落后社会的一侧倾斜”。自1940年以来，墨西哥人口已上升超过5倍，1970年至1995年间几乎翻了一番，1985年至2000年又增长了1/3以上。

墨西哥人口现在是1.11亿，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不过，美国东海岸精英对墨西哥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墨西哥与美国边境各州，如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的生活挑战、大小事件、商业往来、文化互动等，在地理上远离东海岸精英的关注视野，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以及美国在那里的地位。也许在精英的想象力范围中，墨西哥的位置远远低于以色列或者中国，甚至不如印度。然而，墨西哥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可能影响美国的命运。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一起，构成麦金德“世界岛”周围最关键的大陆卫星国。

墨西哥的今天，美国的明天？

在墨西哥谷，曾经有一个大湖环绕着阿兹台克人的两座“威尼斯城”，即特诺奇蒂特兰和特拉特洛尔科，也就是现在的墨西哥城。这是新世界的尼罗河谷，用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亨利·班福德·帕克斯（Henry Bamford Parkes）的话说，它是连接南北美的“文明矩阵”，玉米种植从这里向南北两个大陆传播。墨西哥河谷及成长于此的国家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中间，它所在的中美洲与西半球两块大陆连接，形成了这个地球上伟大的文明中心之一。

然而，墨西哥与埃及不同，它没有表现出地理上的统一。西马德雷

山脉和东马德雷山脉分别横卧于中部高原两侧，还有其他跨地区的山脉，包括南部的德尔苏尔马德雷山、瓦哈卡马德雷山等。

墨西哥山脉众多，如果全部夷为平地，平铺起来将相当于一个亚洲的规模。此外，尤卡坦半岛和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与墨西哥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分离的，其本身又被分割得乱七八糟。这一背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墨西哥北部与美国西南部逐渐统一，而与墨西哥其他地方渐行渐远。这一进程始终持续着，虽然没有公开和大肆报道，但也不可否认。

1994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墨西哥北部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多。美元现在是共同的外汇单位，范围远到库利亚坎南部，靠近墨西哥城。墨西哥北部加工制造业产量占其所有边境的87%，占美国和墨西哥总贸易量的85%。墨西哥东北城市蒙特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与得克萨斯州银行业、制造业、能源行业紧密相连。大卫·丹尼洛（David Danelo）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费城外交政策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他对墨西哥北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已经走遍了墨西哥边境的6个州。他对我说，他还没有见到过一个感觉与美国疏离的人。他告诉我：“墨西哥北部保留文化的多样性，边境北方佬自视不同于墨西哥城的混混，土话叫智兰哥（chilangos）。”

尽管如此，墨西哥北部自有其地域划分。西部低地和索诺拉沙漠一般都是稳定的；东部的格兰德河流域是最发达的地区，与美国文化、经济、水文上紧密相联，是北美自贸区最大的受益者。中心地带是山区和草原，那里是名符其实的“三不管”地带，从得克萨斯州边境城市埃尔帕索到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市，枪战和连环杀手层出不穷，整个地区千疮百孔。

华雷斯市是墨西哥的谋杀之都，在2010年的头几个月就有700人被谋杀。2009年，超过2 600人横尸街头，一个120万人口的城市，已有20多万人逃离。华雷斯所在的奇瓦瓦州每万人就有143人死于非命，是西

半球凶杀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北部山区和草原一直是墨西哥的部落堡垒，贩毒集团、门诺教派（Mennonites）、雅奎印第安人等都在此出没，如此恶劣的边境，就连西班牙人也难以驯服。19世纪80年代，这里曾是一个杰罗尼莫酋长（Geronimo）和他的“阿帕切”兵团的老窝。类似的边远高原地区往往为反叛者提供避难所，如古巴革命者盘踞马埃斯特雷山，“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藏匿于瓦西里；这样的地形，也同样受到贩毒集团的偏爱。

事实上，与毒品有关的凶杀案大部分发生在墨西哥的6个州，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这也是显示墨西哥北部与该国其他地区分离的另一个指标。2006年，保守派的费利佩·卡尔德龙总统下令军方主导发起攻势，一举粉碎了贩毒集团。如果当时稍有手软，墨西哥城就会倒退，可能现在还无法切断与毒贩的交易，这样一来，墨西哥首都在功能意义上就可能完全失去对北方的控制，从而对美国产生严重的影响。

墨西哥联邦制是地区脱节和多山地理的直接产物，1个联邦、31个州、超过1 500个市级警察机构，使改革更加艰难。美国缉毒署前署长罗伯特·C.邦纳（Robert C. Bonner）写道，如果黑帮获得控制权，“美国将与强大的跨国贩毒集团控制下的毒品帝国共享一条2 000英里长的边境，对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稳定构成威胁”。

还要提一下塞缪尔·亨廷顿，他以无与伦比的洞察力闻名于世，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Who Are We?*），被称为直面墨西哥挑战的献礼之作，该书于2004年出版。亨廷顿在书中提出，拉丁美洲的历史随着人口北移而被带至美国，并因此改变美国的国民性格。亨廷顿认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确系事实，但并非全部事实。它更是一个盎格鲁-新教定居者[(2)]的国家，它为社会提供哲学和文化脊梁。只有采用盎格鲁-新教文化，新移民才能变成美国人。

亨廷顿继续说道，美国之所以是美国，因为它是英国新教徒定居的地方，而不是法国人、西班牙人或葡萄牙天主教徒的地盘。美国兴起于

新教，其古典自由主义就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容忍异议、个人主义、共和主义等价值取向标准，全部从新教演变而来。“美国的信条是没有上帝的新教，而美国的民间宗教则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但亨廷顿也断言，随着西班牙裔美国人、天主教徒和前启蒙社会步步进逼，这个信条可能会被不知不觉地消灭殆尽。亨廷顿写道：

> 在1830年至1840年美国人通过武力从墨西哥手中夺取的那些地区，现在正逐渐被墨西哥移民夺回。这种“墨西哥化”在方式上与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古巴化有可比性，虽然略有不同。它正在让墨西哥和美国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异族文化得以引入……

波士顿学院教授彼得·斯凯利（Peter Skerry）认为，亨廷顿的某个原创性见解“更令人吃惊，更有争议性”：虽然美国人倡导多样化，但“当今移民浪潮汹涌而至的时期，实际上是我们历史上最不多样化的时期”。他继续阐述并解释亨廷顿的话说：“诚然，非西班牙裔移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但就总体而言，由于50%的移民是西班牙裔或称拉丁裔美国人（Hispanic），使得整个移民队伍的多样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得多。对于亨廷顿来说，这种减少的多样性又使同化的可能性更小。”

大卫·肯尼迪也认为，“移民潮流的变化和分散”会使同化的进程更加平滑顺畅，“然而今天，大规模的移民潮流进入特定的区域，而且有着单一文化、语言、宗教和国家源头，那就是墨西哥……美国没有经验应对西南地区正在出现的严峻形势”。可以想见，到2050年将有几乎一半的美国人说西班牙语。

在上述论点中，地理处于前沿位置。再来看看亨廷顿说的：“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移民族群提过或有资格对美国提出领土和索赔要求。但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可以提，而且也这样提了。”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

大部分，都曾是墨西哥的一部分，直到1835年至1836年得克萨斯独立战争，以及1846年至1848年的墨西哥与美国战争。

要论同时遭受美国入侵、占领首都、吞并很大一部分领土，墨西哥是唯一的国家。因此，斯凯利指出，墨西哥人来到美国并居住在这个国家某处，那里曾经是他们的家园，因此"享有一种脚踩自家草地的感觉"，而其他移民就无缘分享。墨西哥裔美国人直到第三代及以后仍能保持他们的母语能力，远远超过其他移民，主要是因为西班牙裔社区在地理上相对集中，并从人口上体现了对得克萨斯独立和墨美战争的否定。

更重要的是，墨西哥裔的入籍归化率是所有移民群体中最低的。亨廷顿指出，国家是一个"记忆的社会"，也就是一个人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墨西哥裔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12.5%，还不包括其他拉美裔，他们分散集中于美国西南部，与墨西哥相连。他们的加入第一次修改了美国人的历史记忆。到2000年，边境上美方一侧的12个重要城市中，有6个的西班牙裔美国人已经占到人口的90%以上，只有亚利桑那州的圣迭戈市和尤马市的西班牙裔人低于50%。新墨西哥大学教授查尔斯·特鲁克西洛（Charles Truxillo）预测，到2080年美国西南部各州和墨西哥北部各州将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国家。

现在，美国西南边疆趋于模糊化已成为一个地理事实，所有安全设施都不能改变。虽然我很佩服亨廷顿挑战和揭露两难困境的能力，但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结论。亨廷顿认为，面对社会的部分拉美化，要对美国民族主义保持坚定信心，以保存其盎格鲁-新教文化和价值观。但我相信，虽然地理不一定能确定未来，却大致地划定了什么可以实现，什么不可以。

墨西哥与美国之间在地理、历史和人口上的有机联系太紧密了，亨廷顿一厢情愿地希望保持美国民族主义的纯洁性，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亨廷顿也对普世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提出讽刺，认为它们是精英的幻

想。但一定程度的普世主义其实是必不可少的，不能一概贬低。我相信，在21世纪的进程中，一种波利尼西亚式混血文明（Polynesian-cum-mestizo）将在美国成形，其走向从北到南，从加拿大到墨西哥，而不是从东到西，像浅肤色种族孤岛一般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这个多种族的组合将是一个广阔的城郊式国家，不管是太平洋西北的卡斯卡迪亚还是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林肯市都彼此相像，每个地方自行培育与城市的经济关系和世界各地的贸易网络，并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打破距离。在我的视野里，美国将成为全球最好最旺的商业交易免税区，成为全球精英最喜欢居住的地方。

按照罗马的传统，美国将继续使用移民法挖掘世界上最好和最聪明的人才资源，并进一步促使移民人口多样化，亨廷顿担心的墨西哥化问题有望解决。民族主义力量必然会得到稀释，但不致过分，美国的独特属性不会受到剥夺，其军事力量也不会被削弱。美国已不再是由大西洋和太平洋保护的岛国，它与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不仅是靠技术，也得益于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人口压力。

但这一设想的前提是，墨西哥作为一个国家不要遭遇失败。如果卡尔德龙总统和他的继任者能够一劳永逸地断绝贩毒集团的后路（说这件事非常困难，已经算是最客气的说法了），那么美国将取得巨大的战略胜利，远大于在中东可能取得的任何胜利。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墨西哥将与美国结成有机合作联系，这在地缘政治上将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组合。此外，后毒贩时代的墨西哥与稳定和亲美的哥伦比亚相结合，将融合西半球人口最多、第三多和第四多的国家，缓解美国对拉丁美洲和大加勒比地区挥舞大棒造成的紧张感。一言以蔽之，巴塞维奇的推理是正确的：搞定墨西哥，比摆平阿富汗更加重要。

然而不幸的是，正如巴塞维奇断言的那样，墨西哥是一个近乎灾难的国家，而且对大中东的过分关注也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目前的局势会导致更多合法或非法的移民潮，从而创造出亨廷顿预想的恐怖局面。

自2006年以来，卡尔德龙对毒枭的进攻已造成23 000人死亡，仅2010年上半年就有近4 000人死亡；此外，贩毒集团也已经进行了升级改造，军事形式的袭击屡屡出现，复杂的陷阱和封闭的逃生路线堪称专业。墨西哥安全专家哈维尔·克鲁兹·安古洛（Javier Cruz Angulo）总结道："这些都是他们正在使用的战术……它超越了正常有组织犯罪的战略方式。"华盛顿凯托研究所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副总裁特德·盖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也认为："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墨西哥这个国家的健康发展甚至生存能力都将非常令人担忧。"贩毒集团所使用的武器普遍优于墨西哥警方，甚至可与墨西哥军方媲美。卡彭特说，这使得这些毒贩"超越了单纯的犯罪组织，变成了严重的叛军"，就连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挑选暴力程度低于华雷斯和蒂华纳的地方部署。目前当地警察和政客因害怕被暗杀而纷纷辞职，墨西哥商业和政治精英们把他们的家庭送出国门，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也离开家园飞往美国。

墨西哥现在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在早期阶段向贩毒集团宣战，要么陷入堕落深渊，或两者兼而有之。因为未来难料，美国方面采取什么措施将对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美国安全力量却一边眼睁睁看着墨西哥局势发展，一边卷入其他臭名昭著的腐败政权和不稳定的社会，将金钱和精力投入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些离美国半个世界之远的地方。

然而，与在那些地方不同，美国在墨西哥边境地区的军事介入纪录是成功的案例之一。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和墨西哥通过双边合作使匪患大为减少。从1881年到1910年，墨西哥总统普罗费罗·迪亚兹（Profirio Diaz）与美国总统联手决定共同在边境巡逻：墨西哥农管队与德州骑警一起追赶印第安人科曼奇部落；在亚利桑那州，墨西哥和美国士兵展开对阿帕切部落的联合行动。

今天，从地形崎岖偏远的山区和草原直到华雷斯市，挫败贩毒集团的工作是军方的重要任务，但因为美方固守19世纪民团法，这种合作的法律框架并不存在。美国已经在欧亚大陆投入数千万亿美，以影响其未

来走向，而墨西哥与我们共享一个漫长的陆地边界，其人口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总和的近两倍，面对他们陷入混局我们却显得如此被动，真是咄咄怪事。

墨西哥的未来必将影响世界

当然，人们可以认为，通过强大的边境控制，正常运转的民族主义美国可以与一个不正常的混乱的墨西哥并行不悖。短期内或许可行，但从长远来看，结果可能正如汤因比所说，天平会向比较落后的社会倾斜。换句话说，美国民族主义的保护无法达到亨廷顿期望的程度，除非墨西哥成为第一世界国家，其威胁程度才会变小，两个社会才会加快合并。地图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无论以哪种方式，墨西哥和美国终有一天都将合二为一。当然，边界两侧的决策者可以用行动来决定这种合并什么条件、什么情况下发生。引用汤因比的话来说明：

> 罗马边墙[(3)]一经建立，就注定了建立者灾难性的结局。与界外野蛮人不交往的政策是相当不切实际的。无论帝国政府可能作何决定，贸易商、开拓者、冒险家等人的利益将不可避免地驱使他们跨越边境。

汤因比还写道："一个国家的普遍性价值观由创造者施予，被其臣民所接受，它可作为一个动乱时代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世帝国"埃及、新巴比伦帝国、阿契美尼德的波斯帝国、塞琉斯王国、和平时期的罗马以及中国的大汉天朝都是普遍性价值观的例子，不同的民族和宗教在这些地方共存同益。尤其是罗马，它解决了双重忠诚这一棘手的问题，世界城市罗马的公民身份和特定的本地化领土之间并不矛盾。因此，一个国家的普遍性价值观，在未来的某一天也将被当作灵丹妙药，对于现在墨西哥北部和美国西南边境地区所处的麻烦时代，可能也

是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国家和主权概念的巨大转变堪称神话，其意义无论怎么夸大都不过分。但是，按媒体的标准，离它的真正到来还有一个地质时期那么远。

1970年，我搭便车横穿美国，亲身感受到可能再没有任何一个大陆，像温带的北美洲这样适宜进行国家建设。18世纪末，阿巴拉契亚山脉为这个新生国家提供了西部边界，河谷从山脉中间横切而过，为定居者向西部渗透提供了条件。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就可发现了整块的肥沃农田，19世纪的财富由此创造，人类差异则在这个过程中消磨殆尽，独特的美国文化逐渐成形。大密西西比河流域以及海岸间的水道，拥有比世界其他地区总和还要多的通航河流里程，覆盖着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连续可耕地。在西进运动的先锋抵达美洲大沙漠这一真正的障碍物之际，落基山脉东西两边横贯大陆的铁路已经建成。

战略预测公司的一份材料显示："美国大西洋沿岸拥有比西半球其他地区加起来还要多的大港口……美国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哪里住。"当地理学家阿诺德·盖奥特（Arnold Guyot）于1849年考察美国大陆时，面对内战一触即发、工业革命即将胜利的景况，他将北美与欧洲和亚洲统称为"大陆核心"，认为其注定要控制世界。但他也相信，美国将一路领先于其他两个核心，因为美国两边都处在"海洋屏"的保护下，同时又与欧亚大陆交流互动；而且，这个大陆灌溉良好的内陆地区之间彼此连接，也保证了它的发展。詹姆士·费格里夫在1917年写道：

> 美国所处的地理圈是一个"新世界"（orbis terrarum），在欧亚系统之外独占一席之地，因此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紧凑连贯的地形，巨大的能源储量，面临大西洋和太平洋，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都有关系，任何人通过巴拿马运河后，只要调转船头即可以到两大洋的任何一边……

目前，北美大陆两大洋相挟的霸气依然存在，但另一个地理概念开

始与之重叠，它起源于西班牙探险家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Francisco Vazquez de Coronado）1540年至1542年的探险之旅。他从墨西哥中西部一路向北探索，穿越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和堪萨斯。刘易斯和克拉克于1804年至1806年在路易斯安那州和俄勒冈地区的勘探，把美国从大西洋带到太平洋，并由此奠定了这个现代大陆国家的领域基础，相比之下，科罗纳多的探索由南向北且在时间上占先，以自己的方式奠定了后现代国家的基础。它不受任何国家边界意识的约束，为未来那个从亚热带的墨西哥延伸至北美温带地区的普世国家提供了方向。

当然，弗朗西斯科·科罗纳多是为了寻找黄金或掠夺那些易得的财富，支配他的是中世纪的心态；但朝北进发的新拉美裔移民不是中世纪的人。他们的目的是寻找工作，而且是那些需要耗尽体力的初级劳动，他们愿意为物质利益而努力工作。他们正在被盎格鲁-新教徒的工作伦理改变，正像他们改造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一样。

可以说，这种文化和国家间双向互动的质量和延展性，将确定美国与麦金德的世界岛之间的相互作用，任何个人作用都无法与之匹敌。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几十年的过程中时而明智时而失误，但美国的经济、文化和道德力量，甚至包括政治和军事实力，将大大取决于我们是否可以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发展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双语的"超国家"，否则就会陷入困境，被那些功能失调、日益坐大和无法无天的边境地区包围。在美国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与其西班牙裔对手之间的文明冲突会更趋紧张，亨廷顿的担心自有其道理，他的错误在于解决方案。

我们已经从保罗·布拉肯和其他学者那里得知，地球的政治地理学日益构成一个封闭的、幽闭恐惧症似的系统。跨海洋的文化和政治交汇，将越来越多地成为有机的整体。如果美国和墨西哥的融合不能最终达到美国和加拿大已经达到的程度，如果我们在世界论坛上不能把墨西

哥作为亲密可靠的盟友，它会对美国的其他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墨西哥以及中美洲人口的增长速度比我们要高得多，其重要性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布罗代尔对16世纪地中海的探讨，明确解释了地理等自然力量对于时间的作用，它同样解释了墨西哥必将在未来的任何大战略中发挥核心功能。

试着将未来世界看成类似旧奥斯曼帝国微缩版的系统：用汤因比的话说，它是“地理上相互交错的社区网络”，而不是“相互隔离、心胸狭隘的国家……拼图”。每两个国家间的关系，都前所未有地影响其他关系。在未来几十年，我们会看到铁路、公路、管道通过中亚特别是阿富汗枢纽与欧亚大陆相连接，一个统一的欧亚大陆将需要统一的北美作为平衡器，其范围从加拿大北极地区直到中美洲丛林。如果不继续深化与墨西哥和中美洲的联系，我们就会看到，在欧亚大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与我们更亲密时，墨西哥及其南部一些邻国也许会滑向敌对的外交和政治轨道。要防止在西半球出现一个亲伊朗的委内瑞拉和其他激进国家，就要把大加勒比地区纳入自由贸易和迁徙区，其年轻人口可以为老龄化的美国提供劳动力，这些地区的发展将由美国主导。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写道：“全球战争，以及全球和平，……意味着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是相互关联的整体。无论他们相距多么遥远，一方的成功或失败都将对另一方产生直接和决定性的影响。”这一论断在今天听来，比1944年发表时更为真实，在不远的将来更是如此。

罗伯特·史特劳兹-胡比说：“希腊的历史，是反击亚洲人周而复始的侵略、从中求生存的斗争史。”想一想古希腊与波斯距离有多接近，而现在由于发达的运输和信息革命，欧亚大陆离我们也能有那么近。只要我们把促进西半球的团结摆在首要位置，就可确保不会有任何一个大国在东半球过分主导，从而威胁到西半球的美国。这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容易得多的任务。

我们必须成为欧亚大陆的平衡力量，并将北美变成统一的力量，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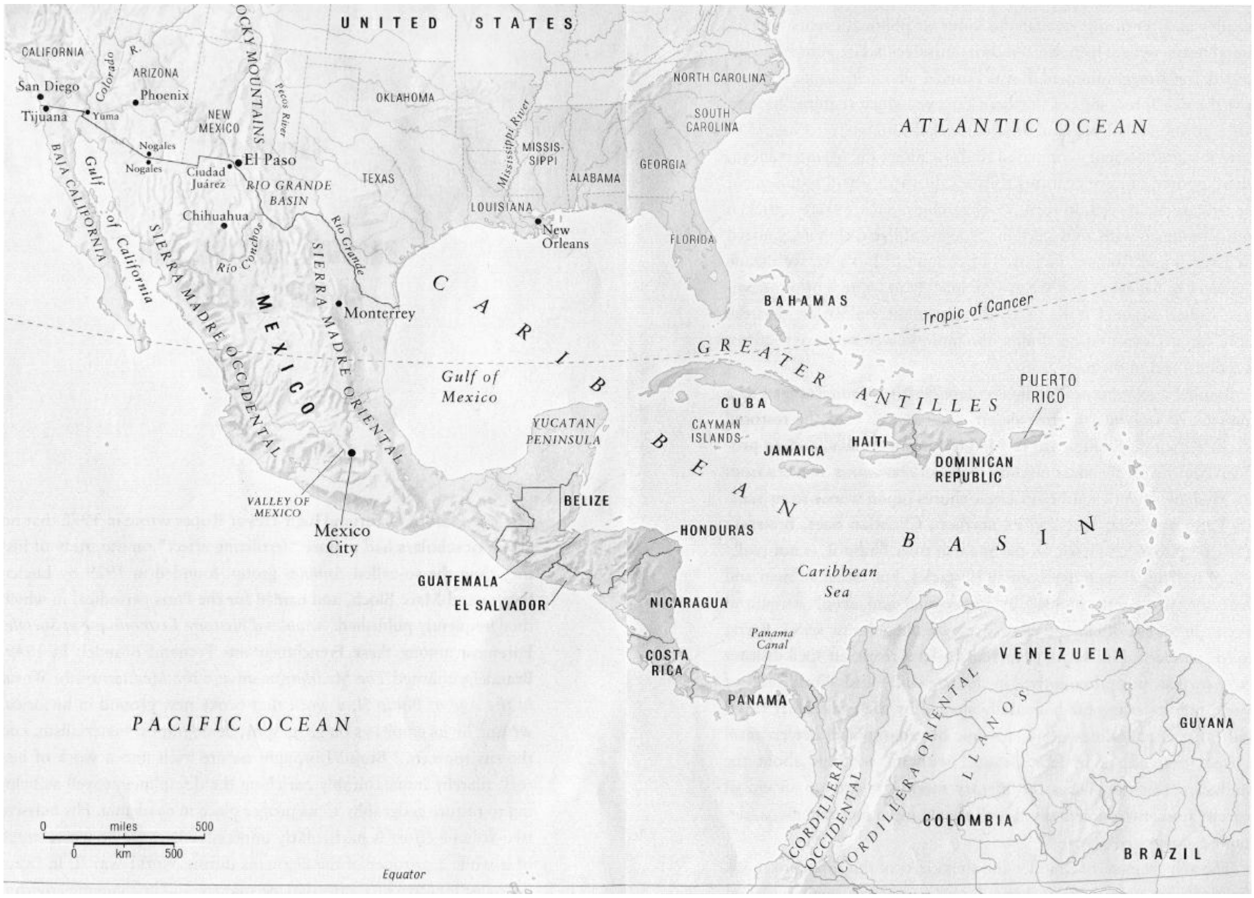
时做到这两点，要比只做其中一点更容易。当然，保持力量的平衡必须出于特定的目的，并超越美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的保护主义；这个目的就是充分利用由东半球力量平衡提供的稳定和安全保证，其意义不亚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将中欧剧变事业在全球范围内推而广之。正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借人物之口说的，“人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有意识的理性动物”。我们必须永远与命运作斗争，永不向地理低头，但在我们追求更美好世界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地理的作用。追求在后冷战时代具有普遍性的“中欧”理想，为地理研究的源起提供了灵感，也正是我收笔之际，我们所处的目标位置。无论这个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它都是永远值得争取的东西，希望届时墨西哥与我们站在一边。麦金德直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要求海洋性的欧洲与大陆心脏地带之间建立充满活力的独立缓冲国；同时，他还指出，一个世界有了平衡，也就有了自由。

---

(1) 指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当时在位的明朝皇帝为明英宗。

(2) 原义是指美国的新教上流社会，这些人属于基督新教中的长老教会、公理会、信义宗和美国圣公会等教派。此群体拥有庞大的经济、政治势力，构成美国上流社会和中上阶层的绝大部分。尽管美国社会日益多元化，但他们的文化、道德观和价值取向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发展。——译者注

(3) 边墙是公元83年到260年间罗马帝国修建的一段边境防御工事，从莱茵河上的波恩延伸到多瑙河上的雷根斯堡，旨在防止日耳曼部落的侵袭，总长568公里，包括60多座堡垒和900座瞭望塔。——译者注



（墨西哥全图）

（上图地名中文对照见如下内容）

图名：墨西哥全图

① NEW MEXICO新墨西哥　UNITRD STATES美国　PANAMA巴拿马

JAMAICA牙买加　CUBA古巴　GUYANA圭亚那　VENEZUELA委内瑞拉

HAITI海地　DOMINICAN REPUBLIC多米尼亚共和国　GUATEMALA危地马拉

HONDURAS洪都拉斯　NICARAGUA尼加拉瓜　BELIZE伯利

兹

PUERTO RICO波多黎各 EL SALVADOR萨尔瓦多 BAHAMAS巴哈马

COSTA RICA哥斯达黎加 COLOMBIA哥伦比亚

② PACIFIC OCEAN太平洋 ATLANTIC OCEAN大西洋

Caribbean Sea加勒比海 Gulf of Mexico墨西哥湾

Gulf of 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湾

③ Rio Conchos康求河

Panama Canal巴拿马运河

④ Pecos River佩科斯河

⑤ Mexico City墨西哥城 New Orleans新奥尔良 Monterrey蒙特雷

Rio Crande里奥格兰德 BRAZIL巴西城 Chihuahua奇瓦瓦

San Diego圣迭戈 Tijuana提华纳 Nogales诺加莱斯

Yuma尤马 Phoenix菲尼克斯

Ciudad Juarez华雷斯城

⑥ LLANOS亚诺斯山 CORDILLERA OCCIDENTAL西科迪勒拉山脉

ROCKY MOUNTAINS落基山

Valley of Mexico墨西哥大峡谷

SIERRA MADRE OCCIDENTAL谢拉马德雷山脉西

⑦ RIO GRANDE BASIN里奥格兰德盆地

CARIBBEAN BASIN加勒比海盆地

⑧ YUCATAN PENINSULA尤卡坦半岛 GREATER ANTILLES大安的列斯群岛

CAYMAN ISLANDS开曼群岛

⑨ 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 OKLAHOMA俄克拉何马州

TEXAS得克萨斯州 LOUISINAN路易斯安那州 MISSISSIPPI密西西比州

ALABAMA阿拉巴马州 NORTH CAROLINA北加利福尼亚州

SOUTH CAROLINA南加利福尼亚州

GEORGIA佐治亚州 FLORIDA佛罗里达州 Colorado科罗拉多州

ARIZONA阿里索纳州 BAJA CALIFOROIA下加利福尼亚州

| 位列《华尔街日报》春假阅读书单推荐 16 本图书之一 |

Flashpoints: The Emerging Crisis in Europe

欧洲新燃点

一触即发的地缘战争与危机

梳理欧洲衰落和崛起的历史脉络，详述欧洲的信仰与文明冲突
预测 21 世纪文明断层及日益激化的地缘政治危局

[美] 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 ◎著
王祖宁 ◎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欧洲新燃点

一触即发的地缘战争与危机

[美] 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著
王祖宁 ◎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新燃点:一触即发的地缘战争与危机 / （美）乔治·弗里德曼著；王祖宁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218-11126-1

Ⅰ．①欧…　Ⅱ．①乔…②王…　Ⅲ．①地缘政治学－研究－欧洲　Ⅳ．①D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2155号

Flashpoints: The Emerging Crisis in Europe by George Friedman
Copyright © 2015 by George Friedma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中资出版社）授权广东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OuZhou Xin RanDian

欧洲新燃点

一触即发的地缘战争与危机

［美］乔治·弗里德曼　著　　王祖宁　译

出 版 人：曾　莹

策　　划：中资海派

执行策划：黄　河　桂　林

责任编辑：肖风华　古海阳　张　静

特约编辑：王　影　梁桂芳　易　娜

版式设计：王　雪

封面设计：王　雪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深圳市彩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

字　　数：249千

版　　次：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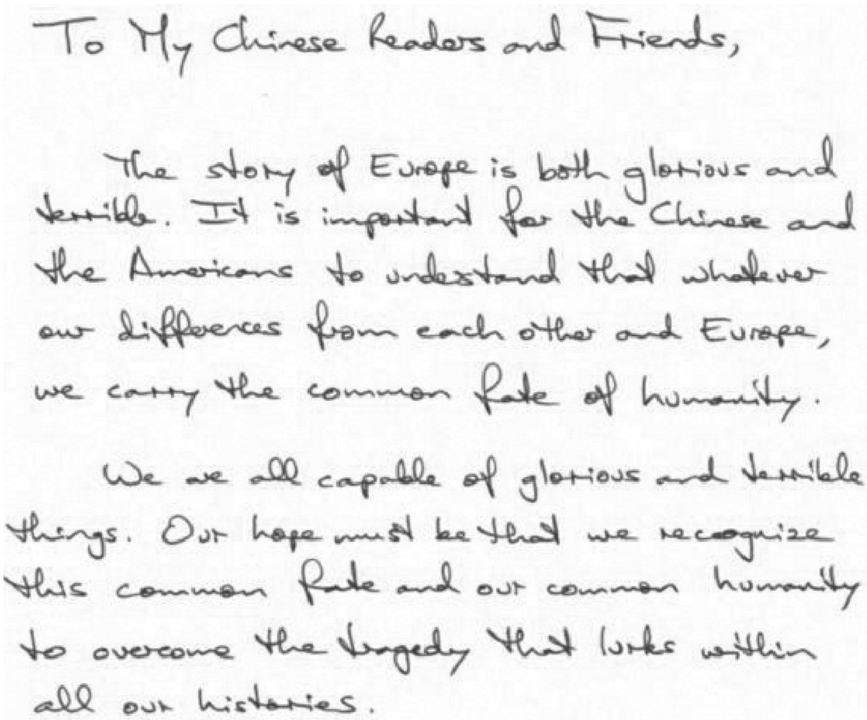
定　　价：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524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中国读者信



To My Chinese Readers and Friends,

The story of Europe is both glorious and terrible.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s to understand that whatever our differences from each other and Europe, we carry the common fate of humanity.

We are all capable of glorious and terrible things. Our hope must be that we recognize this common fate and our common humanity to overcome the tragedy that lurks within all our histories.

致中国读者：

欧洲的历史既辉煌又可怕。中国和美国的读者都应该明白：无论我们彼此以及我们与欧洲之间存在多少差异，我们所有人都肩负着共同的人类命运。

我们都有能力去做光荣或可怕的事。我们一定希望人类能够认识到这种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人性，从而克服潜伏在历史当中的悲剧。

乔治·弗里德曼

献词

殇者行

谁为蝼蚁般的逝者敲响丧钟？
是那炮火喷射出震天的怒号，
是那机枪迸发出不绝的轰鸣，
夹杂着他们生前仓促的祝祷。
如今不再有什么祈求或嘲讽，
也没有人为他们鸣钟或凭吊，
只闻得漫天锋镝凄厉的吼声，
还有召唤从戎的哀恸的号角。
是什么让他们直奔沙场疾驰？
不是为秉烛诀别的乡梓儿郎，
而是为他们眼中神圣的晖光。
凋零的朱颜仿佛冢上的柩衣，
生者的隐痛仿佛灵前的花束，
每一次日冥都是低垂的帘幕。

——维尔弗莱德·欧文
1918年11月4日卒于桑布尔河

导言
面对欧洲危机，美国如何能心安理得？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　王义桅

美国人看欧洲与欧洲人看美国，各有一种过来人的感觉：美国视欧洲为旧大陆，格什温的《自新大陆交响曲》典型反映了这种优越感；欧洲人视美国为新牛仔，继承了罗马而非希腊文明。

故此，欧洲人与美国人时常相互讥讽：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新欧洲，老欧洲……这都是美国人讽刺欧洲人的说法。欧洲人当然不甘落后，时常将美国人视为没文化的工业动物。

如果不是新兴国家崛起，欧美互为镜子的游戏还会继续。美国人里夫金的《欧洲梦》，就是在借欧洲可持续发展理念，刺激美国人实现转型发展。欧洲人借助美国来激发斗志的例子就更多了。

乔治·弗里德曼的新著《欧洲新燃点：一触即发的地缘战争与危机》无疑是美国重返亚洲后隔岸观火之作，不仅讥讽欧洲危机不断，甚至预示欧洲将引发地缘战争与危机，更是将欧洲的苦难从古到今数落个遍。

问题是，面对欧洲危机，美国人如何心安理得？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书中所言“欧洲人对世界的看法过于简单，思维方式非黑即白，无法理解那些精妙复杂的东西，且凡事喜欢诉诸武力”。这不正是欧洲人一直讥讽美国人的吗？！真所谓，“嫌屋及乌”！把脏水泼在欧洲人身上，如此草率！

我与这位弗里德曼先生在第十届布拉斯迪拉伐全球安全论坛

（GLOBSEC 2015）上有过交锋。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专场，他把中国经济比作日本当年，会不断走下坡路，原因是政治不民主——称中国是左一句“dictatorship”，右一句“dictatorship”，遭到我的几连问：“你会中文吗？对中国历史文化读过几本书？中共有多少党员？美国政治由1%的有钱人操盘，中共是以9 000万党员为基础的执政党，谁是dictatorship？”

本书结论：“欧洲只是暂时缓和了欧洲的中心问题，即民族主义与实力的问题，尤其是德国的实力。目前，在我们所处的时期，这种缓和正处在衰退之中。”似乎欧洲一体化的成就只是延缓、掩盖了欧洲的病根；欧洲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种宿命论，典型反映了美国人的侥幸。

作者承认自己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父母回忆所描述的欧洲梦魇，成为童年抹不掉的回忆。犹太人的逃离苦难的集体无意识，也在影响作者的欧洲观。

欧洲近年遭受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债务危机困扰，的确危机重重，但是厚道的人往往雪中送炭而非落井下石，更何况哪个危机没有美国的影子？可见弗里德曼并非厚道之人。

法国学者莫兰曾指出，“如果人们以为揭开了蒙在欧洲真正本源属性上的面纱，那其实同时也会遮蔽相反的也属于欧洲的特性”，“如果说欧洲是法律的欧洲，那它也是强权的欧洲。如果说它是一个民主的欧洲，那它也是压迫的欧洲。如果说它是风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对比来看，本书作者显然不是那种文化之人。

本书中随处可见如此现象：“唱衰”欧洲，讥讽欧洲，指责欧洲，可谓极尽挖苦之能事，处处折射出来自傲慢美国人的偏见。

更要警惕的是，弗里德曼创办的战略预测公司是借危机发财的。本书一番言论，博世人眼球的同时，还要悄悄地从我们的腰包里掏去血汗

钱，而不只是历史的偏见与现实情感。

他当然不代表美国人，但的确折射相当多美国人的阴暗心理：对待欧洲尚如此，何况中国？！

权威推荐

国际问题专家　中　雷

弗里德曼《欧洲新燃点》英文原版书刚问世的时候，欧洲还自诩为太平盛世的样板大陆，而当此书中文版付梓之际，欧洲果然让作者说中了，陷入经济衰退，难民危机，恐袭时发，地区冲突热多处点燃，可见作者具有惊人的预见力，就好像他们在参与策划世界大事一样。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　赵　磊

作为美国战略预测公司的总裁，乔治·弗里德曼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不少独特的研判。本书富有一定的预见性，如2015年爆发的巴黎暴恐事件就与书中观点基本一致。欧洲当下面临种种难题，如希腊债务谈判问题、乌克兰问题、欧洲难民危机等，本书均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张利华

乔治·弗里德曼的《欧洲新燃点》一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个人的所见所闻分析了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组织——欧洲联盟面临的危机和分解因素，对于人们认识欧洲面临的冲突与矛盾有深刻的警示和启示。此书不失为一部研究欧洲问题的力作。

凤凰卫视、澳亚卫视和深圳卫视时事评论员、军事评论员，深圳市国防教育促进会副会长　刘子军

乔治·弗里德曼在欧洲正处于大变革时代，以全新和全景的视野预测了欧洲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危机与动荡，而且作者恰好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来俯视整个欧洲大陆，洞察欧洲乃至于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奇妙和剧烈改变……

《纽约时报》

见到乔治·弗里德曼本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把他当做太极八卦神算。

《出版商周刊》

政治学者乔治·弗里德曼在这部见解深刻的作品中检视了当代欧洲，并质疑了一种观点：欧盟及其邻国已经消除了国家之间暴力冲突的威胁……弗里德曼公正客观地分析了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恐惧、愿望和利益，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历史悠久，拥有诸多弱点，而且曾经出现过多次危机的地区在当下的状况。

《科克斯书评》

这不是一部关于欧洲历史的学术著作，但作者的论述体现了他的博学多识。本书指出,20世纪战争和暴力带来的创伤没有真正成为过去……作者经过缜密思考后写作了本书，清晰地阐述了欧洲的失业、移民和种族歧视等棘手的问题。

《纽约观察家》

弗里德曼总是冷静地思考，清醒地看世界。他能力非凡，不仅能用美国人的眼光，也能用世界领导人的眼光观察世事。

《巴伦周刊》

弗里德曼创办的“战略预测公司”预测一向很准确。它拥有众多客户——从传媒公司到政府机构，近年来盈利良好。

《弗林特日报》

弗里德曼的书读来引人入胜，尤其是对于那些兴趣不只限于简单观点的挑剔读者来说更是过瘾。

CNN晚间新闻主持人　卢·道布斯

乔治·弗里德曼可谓美国首屈一指的战略专家。

序言
下一场欧洲战争将在哪里爆发？

边地：欧洲的火药桶

从1914～1945年，欧洲约有1亿人由于政治原因殒命，其中包括战争、种族灭绝、大清洗、人为饥荒等，原因不一而足。这个死亡人数无论是在任何地区和时代，都足以骇人听闻。在过去400年里，欧洲各国共同征服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人类对自身的看法也随之改变。因此对欧洲来说，这一数字格外令人震惊。

随着欧洲在全球开疆辟土，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人们只有亲赴演奏会现场才能聆听音乐；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读书识字毫无用处，书籍更是难得一见。正是人类的意志造就了这段“黑暗时期”。而如今，男人的平均寿命增长了一倍，妇女也不再屡屡死于分娩。截至1914年，欧洲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大为改观，世界其他地区也随之发生巨变，其变化之迅速、影响之深广令人难以想象。

我们不妨设想，1913年，你正在欧洲某个国家的首都参加音乐会。节目单上有莫扎特和贝多芬的经典曲目。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而大厅里灯火辉煌、暖意融融。淑女们身着霓裳轻裘，个个姿态优雅。在美轮美奂的大厅里，严冬似乎不复存在。其中一人刚刚向东京发去电报，安排将丝绸装船，载着货物的轮船将于一个月内运抵欧洲。还有一对夫妇乘坐三个小时的火车，从100英里外赶来参加这场盛会。然而，在15世纪末欧洲开始探险活动之前，上述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由欧洲大型交响乐团演奏的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曲目可谓举世无双。

莫扎特的乐曲令人飘飘欲仙，而贝多芬的每一个音符都与尘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聆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时，人们不禁会联想起革命、共和、理性，甚至感觉人类竟像上帝那般庄严神圣。欧洲正是以其精彩绝伦的艺术、深邃的哲学思想以及先进的政治制度将人类引领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对当时的许多人来说，他们宛如站在天堂的门口。我想，假使我也生在那个年代，必定与他们心有戚戚焉。

然而，谁也不会料到风云突变，欧洲从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之后的31年里，欧洲祸起萧墙、分崩离析。科技、哲学、政治曾经令欧洲人称雄世界，如今却对他们反戈一击。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欧洲人利用它们同室操戈、自相残杀。31年后，欧洲变成了一座满目疮痍的荒冢，到处都是颓垣断堑的城市和流离失所的人群。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不再是对欧式生活的赞美，反而成为对欧洲人自命不凡的莫大嘲弄。

欧洲的这种遭遇并非独一无二，因为其他文明也同样经历过动荡、战争和种种暴行。但其突发性、惨烈和迅疾程度以及对全球造成的后果却无可比拟。其中，最异乎寻常之处在于欧洲文明自我毁灭的能力。对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欧洲残暴的殖民统治、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以及四分五裂的状况中窥知一二。尽管如此，高度发达的欧洲文明与集中营之间的联系，仍然令人触目惊心。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在全球攻城略地的同时，欧洲国家间也战火不断。整个欧洲仿佛建立在流沙之上，统一总是稍纵即逝，这一点的确令人费解。事实上，欧洲的地形也注定了它们难以同舟共济，因为欧洲并非一块整齐划一的大陆，而是由形形色色的岛屿、半岛以及横亘其间的崇山峻岭组成，此外，还有海洋、海峡、层峦、深谷和一望无际的平原。与美洲不同的是，欧洲的河流并未百川归一，而是各自奔流。

除大洋洲以外，欧洲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大洲，但欧洲大陆上的国家星罗棋布。时至今日，欧洲小国林立、人口众多，共有50个独立的国

家（包括土耳其和高加索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2.5人，欧盟国家为每平方公里112人，而亚洲为每平方公里86人。很显然，欧洲支离破碎、人满为患。

这种地形意味着，欧洲很难通过征战取得统一，且蕞尔小邦也能长期生存。公元1000年与公元2000年的欧洲地图相差无几，这便是明证。欧洲国家鳞次栉比，长期以来毗邻而居，深仇宿怨使他们很难信任和宽宥彼此，导致其一再重燃战火。与此前的冲突相比，20世纪的两场战争大同小异，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一次导致天下大乱的是科学技术的优劣和意识形态的差异。

欧洲四分五裂、边地众多，不同国家的宗教和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融合。虽然各国的政治边界往往就在其中，但边地的范围要相对广阔。从许多方面来讲，边地的作用甚至比边界更为重要。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其分界线虽然一清二楚，但墨西哥的影响、语言和人口早已越过这一界限，还在不断向边界以北延伸。同样，美国的文化和商业往来也一直在向边界以南蔓延。住在两国边境地区的墨西哥人由于吸收了美国文化，与其他墨西哥人显得格格不入。而边境以北的盎格鲁文化也发生了嬗变，逐渐转变为一种奇特的混合体，边地居民甚至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Spanglish”，即“混有西班牙文的英语”。这些人非常独特，彼此的共性有时甚至超出了他们与国人之间的相同之处。

我住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南部，那里的地名多为英语或德语，因为德国人也曾在奥斯汀以西定居。当我沿着I-35州际高速公路南下时，看到的都是诸如“新布劳恩费尔斯”之类的德语地名。但随着距离圣安东尼奥市越来越近，路旁的地名变成了西班牙语，让我常常错以为自己身处墨西哥，尽管美墨边界尚在100多英里以南。这一点足以说明许多问题。

这种边地在欧洲不胜枚举，其中最重要的一块边地（俄罗斯以西地

区）将俄罗斯与欧洲大陆分隔开来。这一边境地区面积辽阔，包含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等数个国家。在过去100年里，我们看到，由于俄罗斯不断蚕食鲸吞，双方的政治边界大幅西移，而边界东部出现了一些新兴独立国家。无论当时双方的边界究竟位于何处，该地区居民彼此之间的共性，超出了与俄罗斯或者西方之间的共性。实际上，“乌克兰”一词在俄语中意为“边区”，也即边地。

虽然这一边地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欧洲意义重大的边地远不止于此。法语区与德语区之间的分野从北海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山；巴尔干地区横亘于中欧和土耳其之间；比利牛斯山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交界地带；匈牙利四周有一些面积较小的边地，那里的匈牙利人处于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统治之下。此外，英吉利海峡这处海上边地将英国与欧洲大陆阻隔开来。欧洲面积虽小，但人烟稠密、宿怨不断，因此边地永远不可能消失。欧洲的历史无疑为此提供了明证。

在边境地区，多元文化相互融合，走私往往是一种正当生意；同时，这里也是各国兵戎相见之地，即一触即发的危险地带。如今，莱茵河地区虽然太平无事，但历史上并非如此。从1871年起，莱茵河地区和法语区之间一共爆发了3场战争。当时，由于法德之间存在深固而严重的分歧，该区域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旦擦枪走火，势必烽烟四起。现在看来，俄罗斯以西的边境地区也已危机四伏，那里虽然风雷激荡，但火势只是刚刚开始蔓延，还未形成燎原之势，因此尚未带来灭顶之灾。

“一战”和“二战”期间，欧洲的所有边地都火药味弥漫。它们迸发的火星燎起熊熊烈火，并迅速向四周扩散。1914年，欧洲全境掀起了疾风暴雨。战火短暂平息后，1939年战争再次爆发，其剧烈程度在世界史上都堪称罕见，甚至绝无仅有。人们充满了恐惧之情与可怕的回忆，而这种情绪一旦被触发，边境地区很快就为烈焰所吞噬，并汇聚成一场空前的浩劫。

右翼政党：新欧洲战争的“癌细胞”

“二战”后，欧洲进行了艰难的重建，并在外援下恢复了独立。人们从一片焦土之上总结出这样一句话：“永不重演。”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犹太人已经发誓，决不允许大屠杀再次发生。一般情况下，欧洲人不会时常提起这句话，但这种坚决的态度影响了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些在31年烽烟中幸免于难的人们，紧接着又迎来了冷战。这场战争关系着欧洲的生死存亡，但决定权却掌握在莫斯科与华盛顿手中。最终欧洲并没有爆发战争，这一点笔者会在下文详谈。威胁解除后，欧洲人的目标仍是不再重蹈31年的覆辙，他们绝不会让昔日可怕的遭遇重演，或者像冷战时期那样将自己置身险境。为了这一信念，欧洲人牺牲了庞大的帝国和手中的权力，甚至在某些方面放弃了自己在世界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了结束战争的噩梦，欧盟应运而生。这一机构的宗旨是促使欧洲国家紧密团结，共同走向繁荣昌盛，从而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理由破坏和平或者相互倾轧。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致力于摆脱异族压迫、争取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的斗争。虽然他们曾经亲眼目睹违反这一原则所造成的恶果，但他们仍不愿为此放弃自己的道义及职责，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确保所有国家均保留各自的主权，且任何人都不得将其剥夺。贝多芬的《欢乐颂》被定为欧盟的盟歌，但早先的嘲讽意味如今已经消失殆尽。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已经真正摒弃冲突与战争，抑或这只不过是一次短暂的间奏、诱人的假象？欧洲无疑是全球最富庶的地区之一，GDP之和超过了美国。欧洲与亚洲、中东和非洲接壤，因此，一旦爆发新一轮战争，不仅欧洲会改天换地，整个世界都会发生剧变。至于欧洲是否走出了31年战乱的痛苦以及此前漫长千年的阴影，其答案乃是考虑未来任何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也是笔者创作本书的意图，而且这个论题从许多方面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1949年，我出生在匈牙利，而我的父母分别生于1912年和1914年。我的家庭正是在这31年间及随后一段时间组建的，当时欧洲正处于惊恐万状之中。而我们之所以离开欧洲，是因为我父母深信，欧洲精神已经深受腐蚀，这种状态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隐介藏形，但最终还是会暴露无遗。作为一个美国人，在我生活的世界里，所有事情都源自于个体的决断；作为欧洲人，在面对盘根错节、令人茫然的历史时，任何决定都显得毫无意义。作为美国人，我学会了直面这个世界；作为欧洲人，我学会了逃避现实。我之所以要探索这一欧洲之谜，究其原因，是源于父母在餐桌旁的交谈以及夜深人静时的梦魇。因为欧洲人的生活态度迥异于美国人，我产生了“认同危机”，仅从这一词语便可以推断，我已经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既然两者兼而有之，那我究竟是何许人也？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问题：欧洲是否真的已经改弦易辙，还是注定要时常为《欢乐颂》所嘲弄？

青年时代，我选择对政治哲学进行研究，因为我希望尽可能从最高层面正视这一问题。在我看来，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必然归结为政治问题。政治关乎社会及其赋予民众的义务、权利和敌友关系。而哲学对最普遍的事物进行剖析，迫使人们重新审视那些看似熟稔实则陌生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才是获得真知灼见的不二法门。

人生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在研究所里，我开始专攻德国哲学。作为一名犹太人，我想要知道，那些蓄意屠杀儿童并将其奉为国策的人究竟作何感想。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所以我清楚，所谓“欧洲问题”实质上是苏联问题，因为苏联人对我生活的影响并不亚于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可以说是剖析这一问题的理想切入点。时值仇视斯大林的“新左派”方兴未艾，因此我选择对这个派别进行研究。

为此，我曾多次返回欧洲，结识了不少欧洲新左派的朋友，因为我希望了解该派思想家如阿图塞、葛兰西和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所以不

能只在图书馆中闭门造车。外界局势云谲波诡、瞬息万变。对多数人来说，新左派只不过是一种泡妞的手段、一场时髦的社会运动。对少数人来说，他们试图籍此认识世界，寻找匡时济世的良方。只有屈指可数的一小撮人，把它视为己任以及使用暴力的借口。

人们常常忘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基地”组织出现之前，欧洲暴力活动就有愈演愈烈之势。恐怖分子在许多欧洲国家实施暗杀、绑架，并炸毁建筑物。美国同样存在提倡暴力的左派，只是其影响微乎其微。这些组织虽然数量有限，但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政治暴力在欧洲卷土重来，在这场运动中，人们偶然会提到阶级斗争，但并没有信以为真。

当时出现了一种用枪射穿敌人膝盖骨或腿部的报复行为。我永远无法确定，比起夺人性命，令其受伤致残究竟是更仁慈还是更残忍。在我看来，这些人最值得警惕，因为他们正在重蹈31年的覆辙。他们对所谓的道义责任信以为真，并拒斥社会价值，妄图摆脱束缚，作出可怕的行径。在与其中一些人交往时，我注意到，他们并非真的希望改变任何事情。他们之所以会采取暴力，完全是出自对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世界的愤怒，以及对任何庸庸碌碌之辈的蔑视。他们视后者如寇雠，并自诩为“复仇者”。

与这些人相处越久，我就愈加对欧洲人的看法表示怀疑。因为欧洲人普遍认为，他们已将过去抛诸脑后，而这种自信正在与日俱增。然而，在我看来，这就像医生在癌症手术中漏掉了几个细胞，一旦遇到合适的环境，病症就会死灰复燃。20世纪90年代，欧洲爆发了两场区域战争，即巴尔干半岛的波黑战争以及高加索地区的车臣战争，但欧洲人对此不予理会，认为这两场战争不具代表性。他们对左翼极端分子也不甚关心，称他们也不具代表性。今天，他们同样对右翼暴徒熟视无睹，称他们不具代表性。这种观点反映了欧洲人的倨傲自信，它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非不证自明。

欧洲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就像人类社会的所有其他机构都会遭遇

艰难一样，欧盟也正面临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其中大多数是经济问题。欧盟的宗旨是促进“和平与繁荣”，假使繁荣不复存在，或者在某些国家消失不见，和平是否也会难以为继？我注意到，目前一些南欧国家的失业率已经与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持平，甚至超出这一水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以上就是本书将要探讨的问题。其中部分涉及“欧洲卓异论”，即认为欧洲已经解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尚未解决的和平与繁荣问题。这或许是事实，但仍需加以讨论。假如欧洲并非天赋异禀，而是陷入了困境，那么接下来将会如何？

这个问题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欧洲为什么会成为人类世界自我发现和自我转变之地？此事是如何发生的？其次，既然欧洲文明如此璀璨，那么欧洲是否存在自身缺陷，从而引发了31年的烽烟？如果这些缺陷确实存在，那产生的原因何在？最后，上述问题一旦澄清，我们就可以预知欧洲的未来及其潜在的危险地带。

如果欧洲已经翻过了血雨腥风的历史残篇，这无疑是一条重要的信息。反之，如果欧洲尚未超越这段历史，其暗含的信息将更加重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审视过去500年中欧洲人的境况。

目 录

致中国读者信
献词
导言　面对欧洲危机，美国如何能心安理得？
权威推荐
序言　下一场欧洲战争将在哪里爆发？
第一部分　欧洲卓异论
1　豺狼横行　战祸不断的欧洲
柏林逻辑：战败皆因犹太叛国
红军枪炮来袭
逃离匈牙利
绿卡背后的交易
2　大航海时代　欧洲人的征服之旅
葡萄牙一马当先
圣战or香料贸易战？
大赢家西班牙——发现新大陆
“双剑”统治世界
3　思维的裂变　神学与科学的死磕
《九十五条论纲》撬动神权
培根设计：欧洲征服自然的肇始
奉理性为至宝
第二部分　三十一年腥风血雨
4　大屠杀　启蒙运动的罪与罚
俄法夹击，肢解德国？
“大清洗”运动
希特勒上台的理论支撑
屠杀600万犹太人的逻辑
5　霸业成空　从权倾天下到仰人鼻息

30万“战争新娘”
超级大国角斗场
嫌隙渐生
6　欧洲一体化　美国抗苏的卫星国？
别有用心的“橄榄枝”
戴高乐的欧洲计划——谁将主导欧洲？
理性繁荣——一个欧洲人的联盟
来自欧元的主权挑战
7　从天堂到地狱　欧债危机撕裂欧盟
俄格战争挑战北约
次贷危机持续发酵
欧债危机引爆
边境海关或将重启？
第三部分　一触即发
8　巴尔干与高加索　永不磨灭的宿怨
南斯拉夫内战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殇
9　进退维谷　欧债危机阴影下的德国
德国复苏
“恐德症”蔓延
“正常崛起”成空想？
10　生死界限　处于俄欧边缘的夹缝国家
贫穷的霸主俄罗斯
划分欧洲的利刃
黑手党国家摩尔多瓦
11　西进　俄罗斯中兴背后的困境与宿命
角逐乌克兰
欧盟势衰，东欧重回苏联时代？
猎枪下的“俄德联姻”
德俄结盟，夹缝国家将何去何从？
12　双轴终局　德法从兵戎相见到分道扬镳

卢森堡：从古战场到欧盟之家
比利时或将解体？
冤家对头：既生英，何生法？
地中海联盟——法国唯一的出路
13　欧洲地中海　繁荣正在消失
文明汇聚＆烽烟四起
移民冲突
塞浦路斯危机
14　土耳其　从动荡中重塑奥斯曼帝国
欧亚大洲“翻译官”
心酸的脱亚入欧路
潜在隐患：库尔德分裂势力
重返奥斯曼帝国？
15　日暮黄昏　风光不再的英国狮
分而乱之：大陆均势政策
大英帝国解体之谜
从宗主国沦落到“特殊跟班”
谋求独立的苏格兰
16　欧洲危机　俄欧关系——未来冲突爆发点
富有而弱小的欧洲
博弈乌克兰
卷土重来的俄罗斯
后记　德国——又将成为欧洲新燃点？
致谢

第一部分

欧洲卓异论

FLASHPOINTS

The Emerging Crisis in Europe



1
豺狼横行
战祸不断的欧洲

希特勒为何认定德国战败的根源在于犹太人？结束了纳粹的残暴统治后，苏联红军出于何种原因制造出疯狂的逃亡潮？“二战”战火刚熄，柏林封锁、铁幕演说、“北约”成立接踵而来，美苏争霸火药味渐浓。一句“豺狼横行”，足见欧洲的风起云涌，这是一片从未停止过骚动的土地……

柏林逻辑：战败皆因犹太叛国

1949年8月13日夜，我们一家人打算逃离匈牙利。我们乘坐橡皮艇，沿着匈牙利境内的多瑙河岸，向目的地维也纳驶去。当时船上有我们一家四口：父亲埃米尔（37岁）、母亲弗里德丽卡（35岁，人称“杜西”）、姐姐艾格尼丝（11岁）以及6个月大的我。此外，船上还有一个走私贩。至于此人姓甚名谁、来自何方，我们一概不知。我想，这或许是有意为之，因为我父母认为，了解这些情况有可能会令我们丧命，而为了保护我们，他们总是不惜一切代价。

我们乘火车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向西北进发，去往多瑙河畔的乡村阿尔玛什菲芝多。我和姐姐都是在布达佩斯呱呱坠地的。20世纪上半叶，我的父母分别跟随其家人一起乔迁至此，然后相遇、相爱，但随后就被卷入欧洲战争的深渊。母亲于1914年出生在布拉迪斯拉发，那时当时被称作“波佐尼”，属于匈牙利的领土，而匈牙利当时仍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父亲于1912年出生在匈牙利东部的尼尔巴托尔镇。

我的父母出生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爆发。战争于1918年结束，战后的欧洲分崩离析、满目疮痍，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先后倾覆。位于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的江山原本固若金汤，如今却朝不谋夕。战争、革命和外交重新绘制了该地区的版图，一些国家凭空出现，而另一些国家屡遭打压。我祖父的故乡蒙卡克斯被划入乌克兰，成为苏联的领土。捷克与斯洛伐克合并后，波佐尼改称布拉迪斯拉发，并隶属于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

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对他们而言，边境的版图冲突如同一场暴风雨，无论乐意与否，灾难都会如期而至。关于匈牙利籍犹太人，有一点很有意思：他们讲匈牙利语，而东欧的其他犹太人却讲意第绪语，即由德语和其他几种语言混合而成的语种。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意第绪语采用了希伯来字母。一般来说，操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国家的国民，而这些国家也大都对此表示强烈同意。这些犹太人认为，流落他乡只是权宜之计，无法界定他们的真正归属。他们之所以普遍使用意第绪语，是因为这是他们与犹太群体之间存在某种微弱的联系的证明。对此，那些与他们比邻而居的人们既表示愤恨，又极力怂恿。

但大体来讲，匈牙利的犹太人只会讲匈牙利语。这也是我和姐姐的母语。虽然有些匈牙利籍犹太人会讲意第绪语，比如我的父亲，但也只是将其作为第二语言。我的母亲则完全不懂意第绪语，她的家人的母语都是匈牙利语。因此，当边界发生变化时，母亲及其家人一共12人在裁缝出身的外祖父的帮助下，向南迁往布达佩斯。与此同时，父亲和幸免于难的族人也向西迁徙，离开了战后划归乌克兰的领土，来到匈牙利的残山剩水间定居。虽然当时欧洲的反犹太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而匈牙利也不例外，但匈牙利人及其境内犹太人的联系反而更加紧密。尽管两者的关系错综复杂，但始终没有被切断。

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匈牙利也不算是一个糟糕的地方。共产党政权垮台后，反共政权取而代之。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这场混乱在

一片腥风血雨中终结。几个世纪以来，匈牙利首次获得独立，并由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摄政，但前奥匈帝国的海军已经不复存在，而匈牙利也没有国王。霍尔蒂本应遵照祖训“顺应潮流”，因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匈牙利出现了温和的自由思潮。正因为如此，我的父亲，一个来自东部的乡下青年，才得以迁往布达佩斯学习印刷技术，并在年仅20岁时就开了一家印刷店。这一次，他不仅选对了时间和地点，甚至可以说是生逢其时。20世纪30年代末，人们普遍认为，“一战”让欧洲饱受惩罚，其阴暗的天性已经被彻底消除。

但邪念并不容易消除，“一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这次战争因德国的地位而起。1871年，德国的统一彻底打破了欧洲的平衡和稳定。这个新兴国家既强大富饶，又极不稳定。德国地处法俄之间，英国经常在三者间巧妙斡旋。德国很清楚，一旦腹背受敌，则覆亡无日。法国和俄国都对其颇为忌惮，所以未必不会同时发动袭击。因此，德国必须首先战胜法国，然后集结力量挫败俄国。1914年，德国试图实施这一战略，但以失败而告终。

我的祖父参加过“一战”，曾在奥匈帝国军中服役。在我父亲年仅2岁时，祖父就随军开赴俄国前线。虽然他最终从战场生还，但就像其他许多士兵一样，他的身心饱受创伤。那些从疆场归来的战士与出征前往往判若两人。在重返家园后不久，祖父就与世长辞，而病因很可能是肺结核。

“一战”不仅没有解决德国的地位问题，反而在地缘政治上增添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德国认为，自己之所以战败，是因为有人背信弃义。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德国却将其单纯地归咎于犹太人，认为后者包藏祸心、图谋不轨。这个判断对我的家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从地缘政治上来看，由于希特勒企图确保德国的利益，因此要想“顺应潮流”，霍尔蒂必须向柏林看齐。从意识形态上来看，我的父母转眼之间成了德国的重大威胁。在此之前，居住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处境

还算不错，但如今形势已急转直下。一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人始终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留在欧洲或前往美国。现在，我的父母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我有一位姨母住在纽约，因此我父母在1938年成功拿到赴美签证，但具体过程我并不清楚。在当时，这样一纸证书可谓价值千金。对于那些能感受到山雨欲来的人们来说，这张签证无异于他们的救命稻草。

父亲虽然头脑聪明，但未能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从小与反犹太主义者一起长大，受到过其中有些人的殴打和虐待。1938年，他在布达佩斯的印刷店生意兴隆，因此并不希望放弃在匈牙利的一切，到另一个言语不通的国家重新开始。尽管地缘政治的现实迫使他必须设法逃离欧洲的乱世凶年，但他还是按照个人意愿，选择留在欧洲，并希望可以渡过难关。等父亲意识到这场反犹太运动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时，一切为时已晚。

这一决定对我的家人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在匈牙利，为了保国安民，霍尔蒂选择向德国屈服。他认为只要自己配合德国的冒险活动，希特勒就不会染指匈牙利内政。在6周之内战败法国后，德国将注意力转向苏联，并确信德军能够速战速决，攻占苏联领土。霍尔蒂顺应时局出兵参战。作为回报，他希望德国将“一战”后匈牙利丧失的领土归还，也就是我们曾经举家逃离的地方。然而，霍尔蒂很清楚，要想盟约永固，就必须有流血牺牲。

父亲应征入伍，一开始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但是显然，一旦匈牙利与德国并肩作战，犹太人就不可能只被当作普通士兵。随后，父亲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调往劳工营，他们的任务包括用传统的方法排雷，即从雷区穿行。所有战士都要出生入死，但劳工营的士兵却必死无疑。霍尔蒂反对犹太人或许并非出自本意，但他有责任维护匈牙利的独立，假如将犹太人派往劳工营能让他做到这一点，他一定会在所不惜。

对父亲以及家族中的许多男性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要从匈牙利的东部边境出发，穿越喀尔巴阡山脉，朝库尔斯克与基辅方向进发，直

到顿河河畔的沃罗涅日。当时，家族中的男性大都已经阵亡，而匈牙利的正规军也伤亡惨重。苏联看起来不堪一击，直到1942年秋，其实力才显露无遗。苏军在顿河东岸集结了大股兵力，向德国第六集团军发起反击，夺取了斯大林格勒的大部分地区。德国企图封锁苏联通往高加索山脉的咽喉要道，因为该山脉的另一面是巴库。19世纪末，瑞典的诺贝尔兄弟在当地发现并开发了大片油田，而苏联的大部分石油就来自巴库。希特勒对这片油田觊觎已久，他很清楚，假如德军能够攻占斯大林格勒以及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区，巴库就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而战争也将胜负立见。

然而，苏军并没有在斯大林格勒发起反击，而是从南北两侧发动进攻，包抄了德国第六集团军。德军在弹尽粮绝后缴械投降，全军覆没。苏联在北方的突袭直奔我父亲所在的地区。他们明白，德国的盟国是其中的薄弱环节。1942年冬，德国不得不倚靠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其他盟国的兵力，但这些国家并不想充当希特勒“大德意志帝国”梦想的炮灰。因此，当苏联集结力量发动猛攻时，匈牙利不攻自破、一触即溃。父亲后来告诉我说，当年他们最害怕的是“斯大林的管风琴”（即“喀秋莎”火箭炮），这种多管火炮发射系统一个炮台能同时发射12枚火箭弹，而一次齐射仅需数秒。这些火箭弹成了他余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匈牙利军开始长途跋涉，从沃罗涅日向1 000多英里以外的布达佩斯撤退。时值1942年与1943年之交，苏联的隆冬天寒地冻。死亡人数令人震惊，而犹太人几乎无一幸存。我父亲不得不徒步在雪原穿行，既没有御寒的冬装，也没有果腹的军粮，只能从垃圾里翻寻食物。他心里清楚，一旦遇上后方的德国党卫军，自己绝无生路。父亲解释说，他之所以大难不死，有三个原因：首先，他一直想象着我年幼的姐姐就在距离他咫尺之遥的地方，仿佛马上就能抱她入怀；其次，城市长大的孩子多半娇弱，而他来自乡下，锻炼出坚毅的性格。最后，他靠的是个人的运气，简直是天大的运气。

希特勒需要拿下巴库。从地缘政治上看，要想打垮苏军，他必须攻克巴库。德军和苏军对斯大林格勒的争夺绝非事出偶然。德国将其盟国安排在侧翼而非中心，而苏联集中兵力对后者发动袭击，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匈牙利军队在哪里，哪里就会最先受到攻击，而犹太人首当其冲，也就是说，我父亲将身处险境，这一点同样绝非出于偶然。偶然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父亲得以侥幸脱险。人算不如天算，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意志力、性格甚至机遇这些微乎其微而又弥足珍贵的东西往往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1943年，父亲终于返回布达佩斯的家中，而当时匈牙利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还没被德国占领。主权问题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虽然匈牙利的外交政策受德国摆布，但在国内事务上，本国政府仍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不过这一空间正在日趋减少。由于时局艰难，匈牙利人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而犹太人则更加举步维艰，但德国对犹太人的盛怒尚未在匈牙利蔓延开来。母亲和姐姐得以苟全性命，就连印刷店也能勉强维持生意。在霍尔蒂的庇佑下，他们暂且衣食无忧。也许霍尔蒂能够做到更多，但也许任何轻举妄动也有可能将纳粹分子的怒火更早引向匈牙利。在当时的欧洲，能为犹太人保留一点生存空间，无论这一空间有多么不稳定，对我的家人来说都绝非小事，而是霍尔蒂的莫大善举。生活在主权独立的匈牙利，与生活在山河破碎的波兰相比，境遇大不相同。在犹太人的生死问题上，主权国家能够也的确有所作为。因此，在评价霍尔蒂这类人物时，我不会只看到他们本来有可能做出哪些善行，而是会关注到其他人做过而他们却没做的恶行。匈牙利的局势可能提前恶化。有人对霍尔蒂作出了严苛的评价，但我父母的看法有所不同。虽然有关此人的争议仍然甚嚣尘上，但当时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他所做的一切攸关生死。欧洲已经走火入魔，就像其他人一样，霍尔蒂也深陷历史的泥潭。他手中的选择寥寥无几，而所有选择都是不幸的。

1944年，眼看德国大势已去，本着顺应潮流的原则，霍尔蒂与苏联人举行了秘密谈判，准备卸甲倒戈。德国情报部门获悉此事后，希特勒

在一次会议上召见霍尔蒂，要求后者驱逐匈牙利的近100万犹太人，并以出兵占领相威胁。霍尔蒂只得作出妥协，但仅同意将10万犹太人驱逐出境。在当时的欧洲，人道主义已经沦落至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是向希特勒妥协，虽然10万人会因此丧生，但起码能挽救其余80余万人。而德国一旦占领匈牙利，恐怕连这一点他也做不到。其结果是，霍尔蒂所顺应的潮流淹没了匈牙利，他的政治前途也就此终结。现在，匈牙利的命运将攥在希特勒和德国的其他法西斯分子手中。就像霍尔蒂一样，我和家人都危在旦夕。

阿道夫·艾希曼被派往匈牙利，负责就欧洲现存最大的犹太群体制定“最终解决方案”。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已经走向穷途末日，但仍然孤注一掷，将本已极其匮乏的人力和交通工具调往匈牙利，运送数十万犹太人前往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进行集体灭绝。

不知从何时起，德国采取的某些行动开始有悖常理。我试图理解希特勒有关犹太人的观点，并猜测他的想法。他之所以决定对犹太人大开杀戒，自有其道理，尽管这一道理十分荒诞，这一点我会在下文详谈。目前德国局势危如累卵，亟需集中所有资源进行周旋，盟军显然准备从法国登陆，还有大批苏联红军正向西挺进。此时决定屠杀匈牙利的犹太人，必然极难执行，但希特勒仍然一意孤行。

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有两个儿子，在他们年幼时，作为父亲，我经常一边看着他们入睡，一边思索他们的未来。我的脑海中偶尔也会闪过可怕的念头。假如他们生活在我出生的地方，那个强大而文明的国家会找到他们，并向其挥舞屠刀。无论这一政策在广义上存在任何道理，面对两个熟睡的孩子时，这些理由都无法成立。就像父亲在战争中吉星高照、大难不死这件事无法从个人角度作出解释一样，这种不折不扣的邪恶之举也无法用常理解释，它让人们不惜向蹒跚学步的幼儿下毒手，并将其作为战争的首要目标，这绝非意外之举。

地缘政治迫使人们在面对残酷的现实时，仍然要做他们必须做的

事，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预知该国的走向。考虑到德国面临的形势，至少从广义上来看，希特勒诉诸反犹太主义自有其解释。然而，从生活的微观层面来看，面对两个酣然入梦的孩子，任何解释都难以自圆其说。历史与人生在此出现断裂。或许，正因为如此，历史上才会出现人类无法理解的恐怖事件。

红军枪炮来袭

为了保全性命，我的父母拼尽了全力。父亲虽然头脑聪明，但再怎么聪明也无济于事。在风闻德国人即将在布达佩斯对犹太人进行搜捕后，父亲将他的母亲和姐姐送回故乡，即匈牙利东部的一座村庄，以免遭荼毒。但德国人并没有立即前往布达佩斯，而是开始在东部围剿犹太人。祖母和姑姑是第一批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之一。祖母很快被关进毒气室处决，姑姑则侥幸生还。随后，德国人在布达佩斯开展了凶残的围捕行动。1944年6月，我母亲及三个姐妹被强行带走，送往澳大利亚修建公路和工厂。其中2人客死异乡，另外2人死里逃生（包括我的母亲）。“二战”结束后，母亲返回布达佩斯时，体重仅有80磅，差点死于斑疹伤寒。

父亲不知通过什么手段救下了我的姐姐和堂姐。随着苏联人日渐逼近布达佩斯，德国政府开始疯狂运送和屠杀剩下的犹太人。5岁的姐姐和6岁的堂姐被强行掳走，被迫站在街道旁边排队等候，由卡车将她们送往刑场。姐姐只记得，一个身穿皮衣的高个金发男子找到了她们，并将她们带出队列。当时，就连5岁的孩子也知道这个人是“异类”，绝不应该现身于此。他告诉两个孩子，是我的父亲派他来到此地，将她们送往安全的地方的。接着，他把姐妹两人送到处于瑞士红十字会保护之下的一栋房屋。父亲每天都会穿行于遍布德军的市区，为她们送去食物。随后，他被调往劳工营，深入苏联腹地。

没有人清楚，父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无论是姐姐还是家里的其

他人，都不知道那个身穿皮衣的男子到底是谁。显然，父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至于他是如何获得这种影响力的，他从未向我和姐姐解释过。在当时的匈牙利，任何绝处逢生的故事如果不是因为时运亨通，就是需要尔虞我诈。那些时乖运蹇或者不够狡猾的普通人根本无法存活。不仅犹太人如此，几乎所有死里逃生的人们身上都发生过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直到临终，父亲都绝口不提此事，也从未做过任何解释。由于一时失算，他曾将祖母和姑姑送回匈牙利东部，他也未能很好地保护我母亲，为此他疚心疾首，毕生都饱受折磨。他从未原谅过自己，即使曾将姐姐救出虎口，他也认为自己的能力远远不够。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三缄其口的原因。然而，在斯时斯地，尔虞我诈也会将人带到更加悲惨的境地。

后来，父亲也被送往毛特豪森集中营。但最终，姐姐从战场生还，父母也重返故土。我们得以骨肉团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匈牙利随即被苏联占领。在苏联看来，匈牙利与德国没什么区别，它们都是曾经入侵和攻击过苏联的敌国。因此，在入侵匈牙利时，苏联实施了报复措施，虽然不像对德国的惩罚那样严厉，但无疑也十分残酷。布达佩斯战役持续了整整6周，苏军出动炮兵对这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美国也派遣飞机向地面投弹。在此期间，姐姐一直躲在地下室里。

德国人坚守不降。布达佩斯和多瑙河挡住了通向维也纳的平坦道路，而后者当时仍是第三帝国的领土。盟军将布达佩斯团团包围，发起持续猛攻，但德军仍然负隅顽抗。这样的环境就连成年人也会心惊胆寒，更何况年仅5岁的姐姐和6岁的堂姐。但她后来告诉我说，她们已经习以为常。当时的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她们随时都有可能被炮弹或炸弹击中身亡。

当魔鬼终于松开了你的咽喉，生活一切照旧。对父亲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养家糊口，于是印刷店重新开张。母亲逐渐康复，体重也有所增加。毫无疑问，家中的粮食都是由父亲从黑市购得。父母一向严守犹太

教规，但后来我听说，有一次他把猪肉带回了家中。这种做法是否妥当，家中曾有过争论。我是在数年之后才听说的，这无疑说明，我们的生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步入正轨。仅在一年以前，很难想象有谁会去关心食用猪肉是否合乎教规？

在苏联的统治下，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苏军在战争中伤亡惨重，所以既不可能也不愿意心慈手软。他们在交战期间就侵占了匈牙利，这显然是出于其本国利益，而不是为了匈牙利人。但直到1948年，苏联的占领才正式成为政治现实。苏联人突然良心发现，希望匈牙利能够公平合理地进行选举，以选出真正的共产党政府。1948年，他们举行了大选，但共产党在选举中失利。就算无法通过正当的手段赢得选举，他们也要千方百计达到目的。于是，他们再次举行大选。这一次，共产党大获全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而这一主权国家恰巧是一个亲苏的共产党政权。

实际上，整场选举就像一出闹剧。面对苏联红军的枪炮，匈牙利只能言听计从。这就是地缘政治的现实，而这一现实再次给我的家庭带来厄运。“二战”前，父亲曾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现在仍在党员名单之上。白纸黑字，不容辩驳。共产党憎恶保守主义者，更痛恨社会民主党，因为在对工人阶级的控制方面，后者对共产党构成了潜在威胁。1948年大选之前，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二为一，这在间接上表明后者的命运已经终结。这也意味着，父亲（很可能还有母亲）要么难逃一死，要么将陷身囹圄。由于匈牙利在上次选举中有过“不良前科”，所以斯大林绝不会掉以轻心。

早在20世纪30年代，20出头的父亲就加入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那个年代，所有人都热衷于参与政治活动，而犹太人大都左倾，因为至少在父亲看来，左派不像右派那样对他们恨之入骨。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他与40年代的他判若两人，在亲眼目睹权术争斗及其造成的恶果后，他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卷入其中。地缘政治能将你彻底压垮，而政治

信仰会在你挣扎求生时成为桎梏。因此，他从此不再涉足任何政治事务。

但这一点最终于事无补。匈牙利的秘密警察国家保安部处于苏联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控制之下，正在对叛徒展开搜捕。他们手中掌握着一份名单，虽然这份名单早已事过境迁，但他们仍在按图索骥。我父亲的同父异母兄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虽然多年以来，两人在政治问题以及其他所有事情上都心存芥蒂，但叔父还是透露了名单一事，并且告诉父亲，他也在名单之上。在那个时代，仅是“名单”一词，就足以让人闻风丧胆。

父母的处境可谓危如累卵。我出生于1949年初，也就是父亲得知这条消息之前。几年前，母亲的身体还很虚弱，因此分娩对她来说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年仅11岁的姐姐已经屡遭大难。如今他们将再次面临着一场地缘政治引发的灾难。面对国家保安部的搜捕，他们可以留在匈牙利坐以待毙，也可以设法逃离，但后者可能会让他们和孩子们一起命丧黄泉。父母从未向我解释过他们的想法。我认为，他们早已对纳粹的做法习以为常，即一人犯错、殃及全家，所以对苏联集团并不心存幻想。因此，他们决定举家出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铤而走险的选择，但也是当时唯一的办法。

逃离匈牙利

逃离匈牙利并非易事。即使是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苏联仍不遗余力地阻止人们出境。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边界被严密封锁，那里雷区遍布，除了牵着警犬巡逻的卫兵，还矗立着配备探照灯和机关枪的警戒塔。匈牙利的北方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者一样，捷克斯洛伐克也处在苏联控制之下，因此捷匈边境的把守不像奥匈边境那样严格，而捷克斯洛伐克也与奥地利接壤。父母唯一的希望就是抵达奥地利，但他们不可能从匈牙利直接进入，而是要首先穿越捷克斯洛伐克。

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捷奥边境相对容易穿越。1948年，以色列在本属于英国的领土上宣布成立。凡是能够削弱英国影响力的事情，都为斯大林所喜闻乐见。他推断英国将继续与以色列作对，从而认为自己有可能与以色列结盟。苏联早就希望开辟一条直达地中海的通道，为此一直在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暴动，希望从这两个国家打开缺口。然而，杜鲁门主义[(1)]出台后，美国开始在希腊和土耳其扶植反共势力，斯大林的如意算盘化作泡影。至于建国伊始的以色列是否会与苏联结盟，这对斯大林来说，虽然希望渺茫，但风险很低。1949年，以色列急需两样东西：武器和犹太人，而这两者斯大林都不缺乏。问题是，如何将他们运往以色列？从1947年到1949年年底，斯大林决定，允许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出售武器。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只要有人提供武器和犹太人，就是在帮助他们解决地缘政治难题，至于其他事，届时自会水到渠成。

从捷克斯洛伐克途径奥地利，直到意大利的港口，有一条运输管道。捷克斯洛伐克与以色列之间的军火贸易可谓尽人皆知。多年以后，我从父母在餐桌旁的交谈中无意间得知，犹太人也是从同一条管道被运往以色列的。当时，我父母决定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那里距离母亲的出生地仅有咫尺之遥，更为重要的是，维也纳就在数英里开外。父亲得到可靠消息，来自苏联的犹太人正从四面八方向布拉迪斯拉发聚集，然后被送往奥地利和以色列。但问题是，怎样才能抵达布拉迪斯拉发。

苏联在地中海采取的策略以及布拉格的政治局势为我们一家带来了机遇，但我们要克服以下三个难题：首先，要在不引起国家保安部觉察的情况下离开布达佩斯，逃到一个能够横跨多瑙河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地点；其次，前往布拉迪斯拉发，并混迹于以色列人当中；最后，前往奥地利，脱离以色列人。

要想在无人觉察的情况下离开布达佩斯绝非易事，而我的父母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由于御寒的衣物价格昂贵，所以他们不想随手丢弃，

因为再过几个月冬天就要来临。不幸的是，当时还是8月，假如我们一家人身着冬装走在街头，那情形一定十分古怪。更为麻烦的是，我们必须随身携带足够4个人数日之用的口粮，但既然要去逃难，就只能如此装扮。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带领我们横跨多瑙河抵达布拉迪斯拉发的向导。

幸运的是，早在罗马帝国时期，该地区的走私活动就十分猖獗。边境一侧总是有东西比另一侧更加值钱，也总是有人为了某件事或某些人企图逃之夭夭。走私贩们以在多瑙河上偷渡为生，个个冷酷无情。他们应付的都是为了牟利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人们，容不得半点儿优柔寡断。每一次旅程都可能有去无回，因此他们全都心狠手辣。边境地区的人们都清楚，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们，不啻于羊入虎口。但走私生意需要有人介绍，如果你总是烧杀抢掠，就不会有人将你介绍给他人。偶然为之也许可以侥幸逃脱，但这样无异于自断财路。

要想从边境走私或者偷渡，关键是要找到介绍人，比如：由甲介绍给乙，而乙听说丙可能知道该怎么做。父亲结交广泛，认识不少各色各样的人物。在一团混乱中，他居然顺利找到了一个中间人，此人将他介绍给了另外一个人。后者表示，只要我们拿出若干钞票，他就可以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当然，钱必须是现金，而且要预付。我不清楚父亲从哪里弄到的这笔钱，而他也对此讳莫如深。但要将4个人偷渡出境，费用肯定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们被告知，要在1949年8月13日夜间，到阿尔玛什菲芝多镇附近的多瑙河畔与走私者碰面。因为那里距离从布达佩斯到阿尔玛什菲芝多镇的铁路最近。多瑙河河面宽阔、水流平缓，每逢夏季，河心都会出现一座小岛。如果有探照灯射来，或者天亮得过早，我们就可以在岛上暂避。这就是我们一家人沦落到多瑙河橡皮艇上的来龙去脉。

但被捕的风险非常巨大，而我成了这次逃亡行动中最大的麻烦。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婴儿啼哭不止无疑意味着自投罗网。在这次冒险之旅

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我们在布达佩斯的医生昂加尔。父母把实情向他和盘托出后，他为我们准备了安眠药粉，好让我酣然入睡，不发出任何响动。整个逃亡过程中，年仅11岁的姐姐始终保持着清醒，这一点让我心生敬畏。要知道，她从5岁起就开始出夷入险。所幸，这趟旅程没有遇到任何麻烦。我们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和地点，顺利找到了走私者。夜幕降临后，我们乘坐橡皮艇，渡过多瑙河，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从那里，我们来到了数英里以西的科马尔诺。“二战”前，这里名为科马罗姆，是匈牙利的领土。

接下来，我们要前往斯洛伐克地区的首府布拉迪斯拉发。捷克斯洛伐克诞生于“一战”后的《特里亚农条约》。该条约在宣告奥匈帝国土崩瓦解的同时，也宣告一系列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的成立，但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是两个例外。前者是由多个互相敌视的民族组成的联邦，后者是由两个彼此厌恶的地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合并而成。捷克斯洛伐克的组合本就矛盾重重，而重划匈牙利的边界则使局势雪上加霜。匈牙利被迫将东南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割让给罗马尼亚，其北部的部分领土则被划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地区。斯洛伐克地区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科玛尔诺到布拉迪斯拉发的火车途经匈牙利语区。这样，我们一家人的行踪几乎不会引起外人觉察。

当天一早，我们登上火车，向布拉迪斯拉发进发。母亲拿出一根萨拉米香肠给大家充饥，她切下几片递给姐姐，然后开始喂我。就在这时，一名同行的乘客靠近母亲，并悄声对她说：“赶快收起来。这可是匈牙利香肠。”假如这里是斯洛伐克语区，我们会立即遭到逮捕，因为在斯洛伐克是买不到匈牙利香肠的。但这里是匈牙利语区，那名乘客对我们正在逃亡的事实心知肚明。幸亏有他提醒，我们才得以逃过一劫。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一根萨拉米香肠中也蕴藏着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

带我们越境的走私分子都是行家里手，有人负责从河上偷渡，有人

专司乘火车过境。按照事先约定，火车上应该有另一批走私者等着将我们送往布拉迪斯拉发。由于父亲是匈牙利国家保安部追捕的首要目标，所以父母决定两人分头行动，由母亲带着孩子们在原地等候，而父亲独自寻找走私者，并与其交涉。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事先约定明确的接头方式，但也可能是父亲忘记了暗号。他孤身一人坐在车厢里，极力分辨哪一个才是走私者。他开始挤眉耸肩，比划一些不太明显的手势以及任何在他看来可能是该地区亡命之徒接头暗号的动作。接着，父亲向他认为是走私者的某人问了个问题，尽管只有上帝知道他该向对方问什么，然后猛地晃了晃头，示意自己即将下车。那名“走私者”也略一颔首，起身准备离开。父亲紧随其后。与此同时，母亲在车厢的另一端找到了真正的走私者，但一切为时已晚。等她转过身去，父亲已经下了火车。他这才发现，所谓的“走私者”只不过是一名普通乘客。火车徐徐驶出站台，形单影只的父亲被落在了斯洛伐克境内的多瑙河北岸。情况显然不妙。只有在电影里，秘密行动才会无往不利。

我始终不清楚父亲是如何找到我们的，但最终全家人都平安抵达布拉迪斯拉发，并躲进了当地一所犹太学校的地下室，混进了犹太难民当中。我们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与此同时，以色列负责人源源不断地送来犹太人，准备将他们重新安置。捷克的秘密警察当然清楚，我们就藏在这些人之中，因为这座建筑位于市中心，而且只有人进来，没有人出去。斯大林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与戴维·本-古里安达成的协议可谓万无一失。显然，这一协议暂时没有变化，而我们也得以逢凶化吉。

不幸的是，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父母不想前往以色列。尽管父亲坚定地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强烈拥护建立犹太人的国家，但他不想卷入其中。以色列刚刚独立，远未站稳脚跟。因此，父亲不希望住在这样一个存亡未卜的地方。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他想要前往美国，因为美国的两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没有它强大。他希望生活在一个与弱国为邻的强国，而且这个国家最好没有纳粹分子以及任何可能因某种信

仰将他和家人置于死地的人们。

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与父亲的个人利益产生了冲突。以色列没有足够的国民，在人口数量上势单力孤。前往以色列的犹太人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安全。但对父亲来说，只有离开以色列，才能确保我们的平安。他对这座避难所心存感激，也的确希望帮助这些犹太人越过捷奥边境。但带着两枚手榴弹被送往内盖夫地区，肯定不符合他的个人利益。

事实上，以色列人刻板严肃，而父亲的处境愈趋复杂。他们到这里是为了接走犹太人，也就是我们。在他们看来，我们即将实现自己的梦想。父亲后来解释道，他需要以色列人帮我们越过奥地利边境；因此，在平安穿越边境之前，他不得不撒下弥天大谎，极力装作满腔热忱地希望前往一个有可能再次将他送上绝路的地方。因为他清楚，他不能过早惹恼这些以色列人。

随后，父亲想出了一条只有蹈危履险的人才会想出的妙计，并将其付诸实践。我们被送往奥地利边境，但我不记得乘坐的是客车还是卡车。抵达边境后，捷克的边防警卫似乎已经对这种场面司空见惯，所以格外仔细地搜查了我们的汽车，并逮捕了我们一家人。我们不清楚警卫究竟对以色列人说了什么，但这是一条车水马龙的干道，而以色列人大概也不在乎将我们几个留下，不管这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法律原因。以色列车队隆隆驶过边境，在进入奥地利后驶向亚得里亚海港，继续向目的地进发。

车队远去后，警卫将我们释放，让我们自行穿越边境。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一定是和某些人达成了协议，好让他们在车队过境时将我们逮捕。至于被关在布拉迪斯拉发地下室里的父亲是如何瞒天过海做到这一点的，他从未向我提及。姐姐也只是隐隐约约记得这次经历。长大以后，当我问起此事，母亲坚称这只是机缘巧合，让我别再问这些愚蠢的问题，然后给了我后脑勺一巴掌。不可否认，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来到了纽约的布朗克斯，而不是以色列的内盖夫。至于其间的具体经

过，此后再也无人提起。

穿越边境后，我们来到了维也纳，并立即被卷入了冷战的地缘政治之中。1949年，欧洲仍是被占领土。无论其中某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主权，其实际版图仍取决于同盟国划定的界限。苏联占领的国家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而美英两国占领的国家成立了不同类型的宪政共和国。更为重要的是，截至1949年，一系列事件陆续发生，其中包括柏林封锁[(2)]、丘吉尔的“铁幕演说”[(3)]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宣告成立。欧洲已经成为一个武装阵营。人们毫不怀疑，另一场战争即将爆发。

维也纳如同欧洲的缩影。和柏林一样，维也纳也被划分为四个区，分别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占领，但实际上相当于两个区，分别由盟军和苏联占领。如果你一不留神走错道路，进入苏占区，你很可能从此消失。这种事情就曾发生在我们的亲友身上。维也纳有许多救援机构，因为形形色色的难民汇聚于此。其中救助犹太人的最大机构是“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简称“联合会”），同时它也是其他慈善组织的保护伞。“联合会”将我们一家分配到前罗斯柴尔德医院，为我们颁发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文件，告诉我们耐心等候愿意接收我们的国家。

绿卡背后的交易

所幸的是，许多国家愿意接收难民，尤其是英国治下的移民国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都希望增加国民人数，但只接纳欧洲的白人，其中也包括犹太人。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前往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母亲急于离开难民营，认为两个选择都不错，但父亲并不希望进入这两个国家。他认为，澳大利亚距离日本太近，因此在“二战”中遭到了日本的侵略，最后还是美国救其于水火；加拿大是个弱国，只能寄希望于美国井水不犯河水。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阿尔贝·

加缪曾说过，他“既不希望成为受害者，也不希望成为加害者”。但父亲认为加缪的观点无异于痴人说梦。以他的个人经验来看，世界上只有两种人，那就是受害者和加害者，而作为加害者肯定强过受害者。因此，他想要前往美国。至于古巴或巴西之类的其他选择，都不予考虑。而奥地利有太多前纳粹分子，住在那里绝不可能称心如意。

就像现在一样，当时许多难民都希望移民美国，但很难获得批准，因为美国对每个国家的移民名额作了限定。过去10年，我们一直在东躲西藏，所以父亲不打算考虑非法移民，坚持必须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美国。这需要耐心等候，但时不我待，更何况他已经距苏联太近，等他意识到这一点时，恐怕早已祸不旋踵。父亲敏锐地感知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所以希望家人尽快离开欧洲，而不是坐以待毙。

欧洲各地遍布阴谋诡计。苏联人千方百计想要壮大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势力，打入刚刚复苏的德国军事和情报机关。此外，斯大林还想方设法向新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渗透，并巩固其多年深入英国情报机构的战果。苏联的情报机构在全球首屈一指，在斯大林看来，情报就是力量。如果他能够颠覆和瓦解盟国，也许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者轻松获胜。至少，手下的情报机构可以让他摸清美英两国的真实意图。

1948年，柏林封锁以及希腊和土耳其冲突发生后，美国一直饱受苏联困扰。有关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任何幻想都彻底落空。拿破仑入侵和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破坏让苏联人深信，他们必须建立一条缓冲地带，以消减西方袭击所带来的冲击。就苏联而言，所谓缓冲地带，是指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一带，而这一地带从德国穿越了欧洲中心。

美国认为，苏联在德国腹地驻扎军队，会引发人们对苏联征服西欧的恐惧。苏联不仅兵多将广，曾将德国国防军打得一败涂地，而且在法国和意大利建立了庞大的共产党队伍。此外，苏联还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情报机构。因此，苏联一旦占领欧洲大陆，就可以将国内的资源、欧洲

的先进技术和工业集于一身，并利用其建立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从而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如何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成为美国制订国家战略的基础。

美国面临着两个切实的难题：首先，美军实力比起苏军相形见绌；其次，对于苏联以及铁幕另一边发生的事情，美国几乎一无所知。但美国可以利用原子弹弥补第一个不足，而对于第二个缺陷，他们的应对之策是，与像我父亲这样的人物达成交易。

美国需要白手起家，建立情报机构。“二战”期间，美国关注的焦点是法德两国，但现在的麻烦在于远东地区。因此，对美国来说，有一点至关重要，即网罗那些了解苏联和东方阵营的情况、与后者存在联系的人。即便是那些对上述情况不甚了了而只会讲俄语的人也能派上用场，因为这类人才在美国国内极其匮乏。战争期间，莱因哈德·盖伦曾在德国军情部门任职，负责刺探苏联情报。尽管这类人物令人反感，但都成了美国试图拉拢的对象。此外，还有一些更加令人鄙夷的人，比如前党卫军成员也成了美国网罗的目标，因为他们曾经开展过不少情报行动。

但“二战”结束已经4年，前德国情报官员并不清楚苏联缓冲带的现状。此外，美国还幻想能够颠覆其中一些国家，以此逼退苏联。因此，美国计划招募难民重回故土，在当地煽动起义。这些人至少可以为美国情报机构所用，以阻碍苏联在西方开展行动。

这项名为“反击行动”的计划存在两个缺陷：首先，破坏某个国家的稳定并制造骚乱，不会削弱占领该国的苏军力量；其次，苏联人也向西方派遣了伪装成难民的特工，以诱使美国招募他们。但这些人极易辨别，因为他们全都形单影只，其家属被留在国内作为人质。一段时间以后，西方国家才恍然大悟，但苏联间谍已经成功打入这次行动。美国派往东方的特工被悉数活捉，在遭到严刑拷打后很快招供。

从情报角度来看，这次行动事与愿违，但对父亲来说却并非如此。为了让难民合作，苏联人扣留其家属作为人质，而美国人却为他们颁发

公民证和绿卡。虽然我并不清楚具体过程，但事后回想起来，父亲一定和美国达成了某种协议，才使母亲、姐姐和我得以离开维也纳，前往美国。我们首先来到萨尔茨堡，从那里飞往不来梅港，然后搭乘海军军舰，在船长室里漂洋过海抵达美国。

父亲落在了后面。官方的说法是，母亲虽然是匈牙利人，但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因此可以用捷克的移民配额进入美国，但父亲只能等待匈牙利的配额。这个解释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因为美国不会拆散难民家庭，尤其是持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文件的家庭。当我向母亲问及此事时，不仅后脑勺上挨了一巴掌，而且她一口咬定我不会明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逐渐了解父亲。他也向我讲起了奥地利发生的事情，一提起那些“愚蠢的美国混蛋”，他就会喋喋不休。根据家中保存的文件以及多年以后拼凑起来的记忆，我只知道：母亲在纽约登记文件的同一天，父亲也在哈莱因申请避难。那里距离萨尔茨堡山上希特勒的住宅很近，戈林曾将掠夺来的艺术品藏在附近的盐矿里。此外，哈莱因市与第430军反情报团分遣队总部仅有咫尺之遥。冷战时期，该分遣队是负责对苏行动的关键部门。

据我猜测，为了让家人免遭荼毒，父亲一定是与美国达成了某种交易。作为回报，他需要以匈牙利难民的身份，为美国情报部门执行任务。只有这样才说得过去，而他当时可疑的行踪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他只不过是当时数以万计的特工之一。曾经有好几次，他向我提起自己不喜欢大学生从事间谍活动。这至少说明，他对此有所了解。显然，父亲没有执行过重大任务，因为他毕竟活了下来，而苏联人已经彻底渗透到这些低级别的行动当中。父亲的处境一定让他极为痛苦。为了家人平安无事，他不得不继续在地缘政治的夹缝中如履薄冰，因为一面是苏联的坦克，另一面是美国的轰炸机。

1952年，父亲终于来到美国，与我们重新团聚。当时，美国在东欧的行动已经陷入瘫痪。美国想要派人潜入阿尔巴尼亚，在当地扶植游击

队，从而夺取政权，但这项行动从一开始就遭遇惨败。苏联的情报人员早已在海滩上等候。父亲是否参与过类似的行动？我有一张他佩戴臂章、站在船上的照片，他周围的人看起来就像一群暴徒。他从未对这艘船作出任何解释，只是声称，之所以要佩戴臂章，是因为他会讲英语，并且负责领导这支队伍。但直到20年后，在为《纽约时报》排版时，他的英语仍然十分蹩脚。显然，这一解释存在着漏洞。

抵达美国后，父亲很快找到一份印刷工人的工作。一开始，我们住在布朗克斯。当时这个区还没有后来那样糟糕，但治安很差。接着，我们搬到皇后区，在那里买了一座带有花园的小房子。虽然花园很小，但父母十分喜欢。后来，我们又迁往长岛南岸，住进了另一座小房子。姐姐嫁给了一名工程师，生下了三个孩子。我也开始求学生涯，逐渐长大成人。

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歌之父”皮特·西格尔创作了一首民谣，讥讽郊区成片开发的小型住宅千篇一律、粗制滥造。当父亲听我弹奏这首歌时，问我歌词讲的是什么。我解释说，西格尔不喜欢造价低廉、批量生产的住宅，就像他不喜欢品质低劣、千人一面的大众。你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你的身份，而我们正在成为千人一面的大众。当时，我们正在后院闲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反诘：“这就是美国人担心的事情吗？”

但事实的确如此。如果你平平安安、年富力强，那你担心的就是失去个性。父亲从未失去个性，而是担心丢掉性命。他之所以喜欢美国，是因为除了在噩梦里，他没有性命之虞。他来自欧洲，所以对于生命的宝贵有着切身体会，而他最大的敌人就是剥夺他人生命的人们。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很小。欧洲豺狼横行、猎物遍地，但美国没有这样的担忧。对父亲来说，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满足。

父亲永远不会原谅苏联人延续了纳粹带来的恐惧，永远不会原谅法国由于孱弱、腐败而在6个星期内失守，永远不会原谅波兰人一心指望法国施以援手而非奋起自救。最重要的是，他永远不会原谅德国人，永

远不会原谅欧洲变得丑陋怪异并在转眼之间宽恕了自己。在他看来，欧洲是一个充斥着恶魔、叛徒和受害者的地方。他毕生没有再返回欧洲和匈牙利，也根本不想回到那里。上大学期间，有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拒绝承认欧洲已经改过自新。他的回答很简单：欧洲永远不会改过自新，只会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

面对如今的欧盟，我忽然想起父亲的这番话来。这个机构表现得的确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并不是说，欧盟不清楚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或者不对过去的历史感到憎恶。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机构和一种信念，欧盟仿佛坚信这一切已成为过去，仿佛它已经用意念将魔鬼驱除，而后者也已俯首听命。但我怀疑，历史是否能被如此轻易地超越。本书涉及欧洲最阴暗的角落，而父亲相信，那里才能反映欧洲的真实面目。书中的故事远比当代欧洲的表象更加扑朔迷离，甚至也远比父亲的描述更加错综复杂。作为欧洲人，我们一家的人生意义何在？这正是本书旨在探讨的问题，而故事将从葡萄牙的一座小镇开始。

---

(1) 杜鲁门主义是干涉别国内政的代名词，它的提出标志着美苏之间的冷战正式开始。

(2) 柏林封锁，又称第一次柏林危机，是指“二战”后初期，苏联封锁西占领通向西柏林的通道而引起的国际危机。

(3) 铁幕演说是指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反苏、反共演说。

2

大航海时代

欧洲人的征服之旅

大航海时代为何发轫于欧洲？何以新大陆发现者并非同期派遣郑和船队浩浩荡荡下西洋的大中华帝国？虽然船舰炮利，但远离故土、战力有限，欧洲人又凭什么以少胜多，攻下一个个光怪陆离的帝国乃至最终征服全球？

葡萄牙一马当先

圣维森特角被认为是欧洲的尽头，它是欧洲大陆最西端向大西洋突出的一处海岬。据希罗多德记载，古希腊人按照天神阿特拉斯的名字，将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水域命名为“阿特兰蒂克”，也就是现在的大西洋。这片水域是阿特拉斯的王国，它浩瀚无垠、威力强大而又神秘莫测。如果你站在圣维森特角，你就会明白这个名称可谓恰如其分。据说当地有一位神灵，这位神灵暗示，这个世界既丑陋无比，又令人心醉神迷。

古罗马人将其称为“神圣海岬”，并且禁止人们夜间前往。他们认为，那里就是世界的尽头，而来自大西洋的魔鬼会在夜间上岸，夺去人们的灵魂。在一片漆黑中，人们很容易幻想，在渺无人迹的大西洋上，会有魔鬼前来捉走人类。到了白天，这里一片荒凉。只有一座葡萄牙海军通信中心，还有几个货摊向前来天涯海角的屈指可数的游客出售寥寥无几的纪念品。这里看似平淡无奇，但实际上是一个战略要地。

在距离此地以东不到一英里处，小镇萨格里什正南方，还有一处海岬。15世纪，一个史称“航海家亨利”的人在当地兴建了一座宫殿，但如今只剩下地面上一个巨大的圆环和一座教堂。教堂很可能是后来修建的，但没有人知道圆环有何用处。显然，这里曾经盛极一时。亨利就是从这里开始了欧洲伟大的探险活动，即探索和统治世界。如果说圣维森特角是旧世界的尽头，那么萨格里什就是新世界的肇端。

在萨格里什，欧洲人终于赶走了罗马帝国昔日的恶魔，但新恶魔再次出现。时至今日，这个恶魔仍是欧洲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随着每一个帝国的产生，魔鬼也会应运而生。欧洲帝国从此滥觞，既灿烂辉煌，又令人恐惧；既发展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度，又犯下了不容置疑的罪行。我们仍然生活在欧洲盛衰荣辱的阴影之中，而这一切都要从萨格里什和大西洋开始讲起。

葡萄牙王子亨利，即名闻遐迩的航海家亨利，是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之子。他创建了一所航海学校，数十年来，这所学校的航海家们一直对大西洋进行不懈探索。据说开辟通往印度航线的瓦斯科·达·伽马和环游地球的费迪南德·麦哲伦都是他的学生。就连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船只失事获救后，也曾在亨利的航海学校待过一段时间。人们很难弄清这到底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都有哪些人上过这所学校、这里发生过哪些奇闻逸事、到这里学习意味着什么，以及亨利本人在那里待了多久。虽然保存下来的史料凤毛麟角，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随着葡萄牙动用国库资金探索大西洋，以寻找未知的宝藏，欧洲从此踏上了征服世界之旅。

葡萄牙的探险活动是由国家开展的大规模行动。他们不惜斥巨资寻找未知的宝藏，此举既有国内政治、国际竞争、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纯粹的荣誉感。不知出于何故，亨利一丝不苟地记录了每一次失败和成功的航行历程。每一艘船都比上一艘更加坚固，行驶得更加遥远。其间没有任何突飞猛进，有的是数十年日积月累的知识。这是一次

由工程师、航海家和官僚机构齐心协力，在雄厚财力支持下共同完成的壮举，也是葡萄牙莫大的荣耀。

萨格里什不禁让我联想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最辉煌的岁月。就像萨格里什一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建立同样需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同样存在政治、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也同样出于纯粹的荣誉感。美国开展了“墨丘利计划”、“双子座计划”、“阿波罗计划”等以希腊诸神命名的航天计划，而这些壮举背后同样隐藏着枯燥乏味的工程学、航空技术和官僚政治。其英勇之处在于，他们利用自己精湛的技艺和良好的修养，在未知的领域抗击魔鬼。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训练有素、周密谨慎。每一艘飞船都比上一艘更先进，飞行得更遥远。无论是在萨格里什生活还是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他们的生命甚至比骚人墨客更富有诗意。欧洲帝国的兴起并非肇始于神话，而是发轫于破除神话的意愿。到了20世纪，随着神话的复兴，欧洲帝国也寿终正寝。

除非是贵为皇胄，否则很难具备开展此类冒险活动的身份和资源。亨利不乏接近基督骑士团的机会，而它是圣殿骑士团在葡萄牙的继承人，富可敌国。由于造船代价高昂，一旦失事，损失将极为惨重。亨利不仅小心谨慎、思维缜密，而且笃信宗教、极有耐心，因此他虽然掌握着巨额财富，但不会急不可耐地挥霍一空。他将航海计划付诸实施，以致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对世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认识。从15世纪末至19世纪末，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被欧洲列强占领过，并且受到了欧洲文化的严重影响。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开疆辟土以外，欧洲人还让这个世界从对自身一无所知变为了如指掌。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清楚地意识到，除了自身以外还存在着其他文明，那就不可能产生与人类社会休戚相关的概念。在此之前，印加人从未听说过哥萨克人，泰米尔人不知道有苏格兰人，日本人也不熟悉易洛魁族人。在一个文明相互隔绝的世界里，没有人可能了解一切，但欧洲的进攻摧毁了这些障碍。在欧洲的征服或影

响下，即使是最弱小的文明国度，也开始成为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不再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或孤立存在的。对欧洲人来说，这一发现成了一种革命性力量，同时也是一种残忍血腥的力量。

欧洲征服世界和发现人类社会的活动让世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谁也不能确定，在欧洲帝国主义的直接冲击下，有多少人死于军事行动、饥荒、疾病以及其他原因。有专家估计，欧洲雄霸天下的**400**年间，约有**1**亿人丧生，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更何况，当时的世界人口要远远少于现在，所以这一数字不能不令人瞠目。与此同时，欧洲巧取豪夺、日积月累并将其用于自身发展的财富数量同样令人震惊。当我漫步在伦敦或巴黎街头，我发现，欧洲对其从世界各地攫取的财富进行了巧夺天工的应用，它们存在于每一栋楼房和每一盏街灯之中。为此，整个世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也创造了无数种可能。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说过："每一笔巨额财富背后，都隐藏着一桩深重的罪行。"对于这一点，昔日的所有帝国都概莫能外。欧洲人的罪行不仅在于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而且在于他们所到之处，所有人的命运都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欧洲人的足迹几乎无处不在，而凡是他们接触过的事情，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选择和可能。无论是对某个文明还是所有个体来说，莫不如此。世人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控诉罄竹难书，但后者带来的机遇同样数不胜数。正如最终我们要从整体上对某个人的一生进行评价一样，看待欧洲时也同样如此。然而，要想对欧洲作出公正的评价，的确不是一件易事。

这场革命为什么会发轫于欧洲最西端萨格里什的航海学校？其他文明为什么未能承担这一重任？在亨利成立航海学校的同时，中国人也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并且漂洋过海，令沿途国家对其俯首称臣。罗马人和诺斯曼人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并非只有葡萄牙人或者说欧洲人掌握了先进的航海技术。然而，除了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外，其他文明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是什么让葡萄牙人一马当先，

而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等濒临大西洋的欧洲国家紧随其后，开启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探险活动。

圣战or香料贸易战？

许多故事都与伊斯兰教有关。欧洲是一个信仰基督教、崇拜耶稣的地方。与基督教一起发展的还有伊斯兰教。基督教主要分布在欧洲，而伊斯兰教支配着从摩洛哥到棉兰老岛、从中亚到桑给巴尔的大片地区，势力范围远超前者。这两种宗教息息相关，不只是因为《旧约全书》，还掺杂着贸易、政治、战争乃至结盟等诸多因素。但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看到，当伊斯兰世界和基督徒世界剑拔弩张时，二者既势不两立，又相互协作、相互影响。

伊斯兰教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广为传播的文明之一。它没有形成一个单一民族、自成一体的帝国。即便如此，如果说历史上有哪个实体曾经有可能征服全球，那么一定非伊斯兰教莫属。许多穆斯林国家都建立了商船队和战舰，而不需要建立深海舰队。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沿海船只，即从沿岸可以看见航行范围或距离沿岸较近的船只，从某个伊斯兰沿海国家的一端抵达另一端。因此，他们不必承担发展以及建造远洋轮船的开支，而只需在穆斯林国家兴建港口，就可以开展贸易、储备物资。此外，与葡萄牙人不同的是，穆斯林从不需要迫于经济压力而从事探险活动。他们只要更加高效地利用小型船只，开拓有效的陆上通道，就可以控制大片区域。

葡萄牙的问题部分源于伊斯兰教的战略地位对其造成的挑战。自伊斯兰教兴起之日，基督教便与其冲突不断。基督教主宰着地中海北岸，而伊斯兰教控制着地中海南岸。公元711年，穆斯林军队向北进入西班牙，最终占领了这个国家，并跨越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732年，查理·马特（法兰克王宫首相）在一场决定性战役中大败穆斯林军队，将其逼退到比利牛斯山后，围困在伊比利亚半岛。假如当时马特打了败仗，今

天的欧洲将会是另一番天地。

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在战争中，双方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共存。著于12世纪中叶的法国史诗《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是法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它讲述了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在西班牙进行的战争。故事发生在萨拉戈萨。查理·马特的孙子查理大帝出兵征讨穆斯林将军马尔西勒。马尔西勒提出，如果查理曼退出西班牙，他们将皈依基督教。早已对战争感到厌倦的查理曼答应了他的条件，但基督教伟大的勇士罗兰拒绝与敌人媾和。其间的故事既跌宕起伏又扑朔迷离。罗兰设法破坏这一协议，从而引发了一场大战。在这次战斗中，基督教徒取得了胜利，但罗兰英勇战死。这首史诗最令人着迷之处在于，它体现了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勇士之间的相似性。他们遵循着同样的封建社会秩序，对于忠诚和勇敢有着相近的观念。他们一面谋取政治利益，一面努力侍奉着心中的主。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许多方面都是彼此的写照。它们就像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双方既有阴谋和背叛，也有协作与结盟。它们互相讨伐，互相诱惑，又互相转变。如果不考虑基督教国家与穆斯林国家之间无休无止的征战和不计其数的合作，你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两者。因此，如果不了解穆斯林的历史，你就无法真正理解欧洲的历史。而现在，正是因为欧洲东西两端发生的事促使萨格里什作出了出海探险的决定。

1453年，穆斯林建立的奥斯曼帝国攻陷了君士坦丁堡。39年后，即1492年，西班牙人夺取了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穆斯林城市格拉纳达。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对基督教主宰的欧洲形成了致命威胁。但占领格拉纳达让伊比利亚人重获信心和资源，他们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发起还击。

欧洲需要香料，而这种中世纪末的高级奢侈品主要来自印度。香料既可以用于保存食物、增加风味，又可以用于制作药物和壮阳剂。胡椒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进口香料，主要用于食物保鲜。当时黑死病在欧洲蔓延，人们相信，胡椒还可以预防瘟疫。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属实，胡椒

的价格一再飙涨，甚至与黄金持平。

亚欧两洲之间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洋沟通。有船只从海上运来印度的香料，也有人从丝绸之路送来中国的丝绸。丝绸之路在过去和现在都十分活跃，只不过现在铺满了输油管道，而不只是运送丝绸。在阿塞拜疆的古城巴库，至今仍有商队旅馆的遗址，即沿途旅客用餐和住宿的地方。如果无人光顾，这些建筑就不可能大批存在，因此可推断出这条道路在当时一定熙来攘往，是不少人发家致富的途径。

这些海路和陆路都终结于君士坦丁堡，商人们在此经另一条海上通道抵达意大利各港口，再向其余欧洲国家运送货物。每途经一站，他们就会提高一次售价。那些最初价格低廉的货物，在到达终点时变得极其昂贵。随着财富的增加，沿线城市的政治实力也日益强大，包括索马里摩加迪沙在内的主要贸易港口盛极一时。一位哈里发[(1)]想要控制欧洲的香料贸易，并在10世纪时兴建了开罗港。

经由红海运来的香料必须从这里进入地中海。欧洲人用白银和羊毛交换香料，因为欧洲盛产这两种东西，但其在印度和中国却价格高昂。香料不仅影响了贸易的发展，人们甚至为此兴建了多座城市，而这些城市在一千多年以后仍然存在。

当然，这位哈里发是一个穆斯林，而君士坦丁堡处于基督教的控制之下，因此双方贸易产生的财富要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在开罗港建成、双方通商400年后，一股新势力开始在该地区兴起。在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帝国不仅征服了基督教徒，而且成为东地中海地区最大的海上强国。在战争胜利前，奥斯曼帝国就已经开始染指香料贸易。拿下君士坦丁堡后，他们立即封锁丝绸之路并对沿途的货物课以重税，从而对欧洲人进行压榨。

其中固然不乏宗教因素，但奥斯曼帝国的动机不只跟宗教有关。为了控制地中海，他们需要结交盟友。虽然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与不少地中海国家结盟，但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发现，自己最重要的盟友是信

仰基督教的威尼斯。随后，在奥斯曼人和威尼斯人的共同驱动下，香料价格一再飞涨。由于丝绸之路无法通行，欧洲与亚洲的陆上贸易渠道被切断。随着地中海的大门被奥斯曼人关闭，海上通道也被切断。假如欧洲人能找到一条道路绕开奥斯曼人，他们不仅能够重启通往印度之路，而且能够夺回奥斯曼人和威尼斯正在牟取的暴利。

穆斯林日渐增长的实力和一路飙升的香料价格，成为驱使亨利海外探险的两大动力。他资助了大批船长和航海家进行训练，以积累实践经验，并组建了一系列由这些人率领的远征队。但其中许多人和船只在向南进发后失去了踪影。

传说没有人能行驶过博哈多尔角，因为那里水温极高，甚至会沸腾。1434年以前，所有远征队都有去无回。实际上，该地区的确十分危险，但不是因为海水会沸腾，而是因为穆斯林控制着那里的海岸，所以沿途几乎没有获得补给的机会。年复一年，葡萄牙人不断向南推进。直到1445年，他们终于绕过西非西海岸，从而提高了航海技术，增强了在大西洋的实力。

当时，葡萄牙人还没有开始寻找通向印度的航线，而是希望发现黄金，以便购买香料。据说马里富甲天下、遍地黄金，所以葡萄牙人希望找到一条道路或河流，方便他们进入非洲内陆寻找宝藏。葡萄牙人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我在前文说过，当时人们对自己所处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虽然非洲大陆距离葡萄牙以南仅150英里，但就连精明老练的葡萄牙人对其内部情况也不甚了了，这一事实不能不令人称奇。随着葡萄牙人一步步跨越西非沿岸，这种无知蒙昧的状况发生了极大改变。

除香料以外，打败穆斯林是亨利和葡萄牙的另一个动机。穆斯林控制着西非，虽然他们没有深海舰队，但完全有能力并且的确捕获了许多过于靠近岸边的基督徒的船只。因此，为了继续向南探索，葡萄牙人不得不绕开沿海地区，以免受到穆斯林的攻击。随着不断远离海岸，他们发现了大西洋中的亚速尔群岛，并将其据为己有，但亨利并未满足。如

果继续向海洋深入并向南部挺进，葡萄牙人就可以从侧翼包围穆斯林。亨利是一名十字军战士，他曾亲率大军征服了摩洛哥的休达。此外，在他生活的年代，伊比利亚半岛正逐渐摆脱穆斯林的统治。对亨利来说，追逐财富和打败穆斯林的目标并行不悖。

相传，非洲有一个名为“祭司王约翰”的基督教君主，他富甲一方、威名远播，但遭到了异教徒的围攻，急需基督教军队赶去增援。也有人传说，他已经征服了异教徒，能够救欧洲于水火。有关祭司王约翰的传说流传了几个世纪，不能不让人匪夷所思。尽管如此，一旦绕过西非西海岸找到通往马里的道路，葡萄牙人就能与祭司王约翰取得联系，然后挥师北上，从非洲内陆向北非发动圣战。

除了穆斯林的因素，我们还应当考虑伊比利亚半岛的地理位置。该半岛向大西洋凸出，比利牛斯山将葡萄牙与其他欧洲国家一分为二。西班牙的海上实力虽然逊于葡萄牙，但一旦取得统一，并将穆斯林从格拉纳达驱逐出去，其陆上实力就会远超葡萄牙。由于双方互相对峙，海上通道显得极其重要。因此，面积较大的西班牙希望成为一个海洋大国，而面积较小的葡萄牙因为无法与西班牙在陆上抗衡，更希望在海上与其一决雌雄。

也就是说，葡萄牙的动机不一而足，包括遏制西班牙、前往印度、到马里寻找黄金、与祭司王约翰取得联系、传播基督教教义和争夺大西洋岛屿。这种复杂的动机是当时欧洲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他们的目标多种多样，其中有些不切实际，有些相互矛盾，但无论这些目标是否合理，葡萄牙正是在它们的共同驱策下，不断向前开拓。

大赢家西班牙——发现新大陆

在这场角逐中，西班牙人着手较晚。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与国内的穆斯林进行殊死斗争，企图将后者从格拉纳达驱逐出境，进而统

一国家。当西班牙忙于内战时，葡萄牙已经成为一个海洋大国。但结束战乱、江山一统的西班牙不仅比葡萄牙面积庞大，而且实力雄厚。葡萄牙仅仅稍微领先，而西班牙则竭力追赶。双方的竞争让探险活动变得更加艰难。

葡萄牙人控制着非洲沿岸向南的航线，当时西班牙还不足以对其发起挑战。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为西班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他认为，如果一直向西，也可以抵达中国和印度。问题是，即使向西可以到达目的地，但没有欧洲人敢保证这趟航程需要多久。当哥伦布向葡萄牙提议向西航行时，遭到了拒绝。葡萄牙人认为，向南航行抵达印度的可能性更大，况且这条航线已经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根本不需要冒险尝试。西班牙人也想前往印度，但不希望在向南的航线上与葡萄牙人发生冲突，于是接受了哥伦布的提议。他们准备在这场角逐中孤注一掷，因此对哥伦布予以支持。

南部的航线为葡萄牙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1498年5月，瓦斯科·达·伽马抵达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并宣布奉命进驻该市。慑于坚船利炮的威力，当地人很快同意与葡萄牙通商。在抵达印度之前，达·伽马发现并击沉了一艘名为“麦加”号的商船，船上全都是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他下令将船上的乘客全部杀害。在这起事件中，对伊斯兰教的仇视和对财富的觊觎仍然交织在一起。在印度，达·伽马发现当地人就像自己一样对穆斯林充满敌意。他无疑完成了亨利的目标，即绕开奥斯曼人，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航道。与此同时，他也为欧洲今后对印度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从表面上看，伊比利亚人似乎达到了鼎盛时期，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证明，哥伦布的航行尽管在当时难以想象，但显然更加重要。

虽然哥伦布首次出师不利，但西班牙王室仍然继续对他进行资助。最终，哥伦布完成了一件更有价值的事情，即抵达地球的另一边，而不仅仅是开辟一条购买香料的航道。西班牙人没有与当地人开展香料贸

易，而是发现那里遍地金银。他们误以为那里就是印度，并将当地人命名为“印第安人”。

葡萄牙人发现的地方在此之前就已经为世人所知，而哥伦布误打误撞发现了一片新大陆，这里无疑是人类文明的未知之地。这就意味着，世间还存在着大量未知事物，这一发现让欧洲人的思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最先抵达印度的葡萄牙人以为自己赢得了这场竞赛，但实际上，西班牙人才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他们的发现前所未见。

据《荷马史诗》记载，奥德修斯启程后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其中到处都是奇妙的生物：有独眼巨人、食莲者和一个个比他更像神灵的生物。按照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的说法，他来到了一个被施以魔法的世界。但奥德修斯在发现这个世界后开始逐渐了解它，并最终成为那里的主宰。他撕破了这个世界的面纱及其产生的魔法。随着他对那里越来越熟悉，它渐渐丧失了魔力。这就是奥德修斯的悲剧，在了解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后，便摧毁了它的魔力，令其变得平淡无奇，从而丧失了原有的吸引力。这也是欧洲的悲剧之一，即他们最初发现的极乐世界最终必然沦为缺乏魅力的平庸之地。

对人类社会来说，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是一个奇异的未知之境。这一发现让《荷马史诗》中人们对魔法世界的看法再次兴起。他的发现激起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但更激发人们对漂洋过海、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让欧洲人心醉神迷，让那些身陷日常琐屑事务的平庸之辈有了种种幻想。人们一度认为，大海里隐藏着种种可怕的未知事物。然而，哥伦布轻轻揭开了海洋另一端世界的面纱，人们发现，那里充满神秘和财富，海上的航程也因此变得不再那样艰苦卓绝。自哥伦布之后，不计其数的欧洲人横渡大西洋，寻找极乐世界。但是，在撕下那里的面纱后，他们创造了一个崭新但又平淡无奇的世界。哥伦布虽然发现了新大陆，但他并不清楚要如何在不摧毁其摄人魅力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深入了解。

归根结底，欧洲科学是不是这样一种信仰，即相信这个世界之内和之外，都巧妙隐藏着一些令人心驰神往的事物？而所谓科学，不过是一种对发现未知事物的渴望？这种渴望紧紧抓住了欧洲，这一点从《浮士德》的神话中可以得到最佳印证。为了换取知识，而非权力和金钱，浮士德不惜与魔鬼进行交易。他成为欧洲的象征，和哥伦布一样，都进入了一个未知之境，看到了自己无法理解或难以想象的事物。

然而，我们还是要把这些探险家们先放在一边，来谈谈下一波欧洲人，即征服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西班牙硬汉。

埃斯特雷马杜拉气候干燥，是西班牙最贫瘠的地方之一。但正是这个地区土生土长的人探索和征服了新大陆。他们的名字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征服秘鲁印加帝国的皮萨罗，前往巴拿马后第一个从新大陆看到太平洋的巴尔博亚，还有从中美洲北上发现密西西比河的迪索托。但其中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也许是征服墨西哥的埃尔南·科尔特斯。

在许多方面，科尔特斯与航海家亨利截然相反：亨利养尊处优，科尔特斯缺吃少穿；亨利温文尔雅，科尔特斯任性妄为；亨利希望维护家族统治，科尔特斯渴望得到自己不曾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亨利身为天潢贵胄，科尔特斯来自社会底层；亨利极有耐心，科尔特斯残酷无情、急于求成；亨利教养良好，科尔特斯粗野蛮横。两人就像随后500年里欧洲的两副面孔。他们身上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二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都善于激发部下的忠诚、责任感和敬畏之情。在对抗伊斯兰教的战争中，他们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定。

亨利希望了解世界，处事极富耐心、有条不紊。因此，他虽然循序渐进、永不言弃，但进展十分缓慢。他所做的一切为哥伦布等人发现新大陆奠定了基础。科尔特斯为人狡猾、残暴，擅长调兵遣将，在击败敌人后冷酷无情地对他们进行奴役。亨利从容不迫，科尔特斯急不可耐。当时，前者富埒王侯，后者一贫如洗。面对新世界，欧洲既小心翼翼，又机关算尽，一面担心那里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另一面却如同脱缰野

马般登上海岸，抢夺自己想要的一切，如饥似渴地希望取得胜利。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它们互相配合，再加上坚船利炮，让欧洲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正是科尔特斯之类的人物让欧洲对世界的冲击从一种隐喻变成了千真万确的现实。这是欧洲人第一次遭遇一个陌生的大洲和一种未知的文明。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四周是阿兹特克帝国的核心，约有20万人口，其中包括统治阶级及其臣属的部落。阿兹特克的战士英勇无畏、训练有素，这支军队绝不可小觑。阿兹特克不仅经济实力雄厚，其首都也比大多数欧洲城市更为精致、复杂。

科尔特斯在尤卡坦沿岸的科苏梅尔岛登陆，其位置接近现在宾馆林立、大型游轮遍布的坎昆。这里是玛雅人的领土。如果你离开坎昆，在乡间小路上行驶18个小时，进入恰帕斯山区，就会发现玛雅人后裔仍然住在那里，继续抵抗墨西哥政府。

科尔特斯率领500名部下和一些奴隶弃船登岸。传说，他们还烧掉了来时的船只。科尔特斯告诉部下，他决定背水一战，要么大获全胜，要么战死沙场，因为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争。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烧毁了船只，但以区区500人攻打一个帝国，结果不是全军覆没，就是以少胜多。科尔特斯想必清楚，其间绝无妥协的可能，而后一种结果无疑极其不合常理。

据说，当阿兹特克人看到西班牙人及其战马时，认为是羽蛇神显灵。假如今天我们亲眼目睹不明飞行物降落，我们一定与阿兹特克人一样惊诧。这些奇怪的生物穿着不知是由什么东西和奇异的金属制成的衣服，操着一种他们完全听不懂的语言，从他们从未见过的战船上走下来。可以想象，在初次遇见西班牙人时，当地土著有多么惊恐，而这一场面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早已屡见不鲜。

科尔特斯的手中拿着阿兹特克人闻所未闻的武器，而他出现的方向也从未产生过任何危险。虽然西班牙征服者们拥有长枪大炮，但阿兹特

克人却兵多将广、骁勇善战。更何况从心理上，他们无法与这个看似光怪陆离的帝国对抗。然而，这种感觉是相互的。阿兹特克人从未见过这些武器发出的声音、火光及其造成的死亡。西班牙征服者仿佛拥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让阿兹特克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注定要失败。因为只有神灵才会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而阿兹特克人一定是触怒了神灵，才导致他们降临凡间。

尽管这次战斗让阿兹特克人大伤元气，但他们很快重整旗鼓、继续抵抗。最初的冲击消退之后，他们终于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就是一群身经百战的伟大勇士，而对方只不过区区500人。即使这些西班牙征服者的手中拿着枪炮，也会被淹没在成千上万的战士组成的人潮之中。但最终阿兹特克人一败涂地，原因在于，科尔特斯手下凭空多出了数以万计的精兵强将，这些战士既不是西班牙人，也不是阿兹特克人。

阿兹特克人崛起还不到一个世纪。他们的统治异常残暴，对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有迹象显示，他们曾经使用活人祭祀，而祭品则来自臣属的部落。因此，人们对阿兹特克的统治者既充满畏惧，又恨之入骨。对许多人来说，西班牙人的到来无异于某种解脱。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位于墨西哥盆地中部，也就是今天墨西哥城的所在地。他们既没有占领尤卡坦，也没有征服玛雅人。但玛雅人仍然担心，随着阿兹特克不断发展壮大，两国必将发生冲突，于是他们站在了西班牙人一边。此外，还有成千上万来自其他部落的人，包括已经臣服于阿兹特克统治者蒙特苏马二世的部落，也加入了这支西班牙队伍中。

蒙特苏马二世不希望发动战争，因为他不敢确定，手下的军队是否会尽忠竭力。于是他诉诸外交手段，但这一次不是因为他对突如其来的西班牙人感到瞠目结舌，而是因为他的权力早已四分五裂，有些臣属甚至可能反戈相向。就这样，阿兹特克帝国南部的火药桶被科尔特斯亲手点燃，阿兹特克人望风披靡。

科尔特斯的胜利不是因为军事或心理上的原因，而是取决于外交因

素。蒙特苏马二世的政权建于流沙之上，科尔特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当时，皮萨罗正在秘鲁攻打印加人，两人的处境大同小异。印加帝国同样建立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但其中许多部落自认为是印加人的牺牲品，而不是受益者。皮萨罗利用印加帝国的暴虐统治，迅速招募起一支军队，最终击败了对手。

要想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能够征服全球，这一点至关重要。让当地人民遭受不公待遇的不只是欧洲人，因为早在他们到来之前，不公正的待遇就已经存在。当地统治者的行为方式与欧洲人没有区别。他们都是凭借权力和恐惧威慑邻国，并将其置于控制之下。欧洲人到来之后，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并向他们提供资助，从而导致当地政治体系分崩离析。之后，欧洲人乘虚而入，对其进行统治。因此，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的不只是500名西班牙人，还有千千万万阿兹特克的敌人。西班牙人正是利用了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弱点，最终得以取而代之，继续实施残暴统治。但是，对墨西哥或秘鲁的人民来说，其处境并没有任何变化。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即征服者们顽强的意志与近乎疯狂的勇气。我曾在其他书中谈到，人类文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野蛮状态。在这个阶段，正如乔治·萧伯纳所言，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群落的法律才是自然法则。第二阶段是文明阶段。尽管人们仍然相信，自己的做法才是公正合理的，但同时愿意承认，自己也有可能犯错。第三阶段是衰落阶段，即人们开始认为，世间不存在任何真理，或者所有谎言同样真实。

西班牙征服者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才变成了野蛮人，而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尚未开化，才有可能做出上述行径。他们对自己的宗教有着根深蒂固、不容置疑的信念，这并非因为他们是高深莫测的神学家，而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看法十分简单。在他们眼里，上帝既令人畏惧，又十分熟悉。对科尔特斯来说，上帝不是某种象征，而是某种切实的存在。这种观点并非天主教独有。无论是穆斯林、新教徒和犹太人，还有

其他许多人都曾在某个阶段有过同样的看法，并利用这种看法获得那些看似超出他们能力的事物。对于野蛮人来说，正是这种蒙昧无知的意志成了他们力量的源泉。

“双剑”统治世界

天主教的教义以“双剑论”为核心。这一概念由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提出。他认为，其中一把剑在物质世界行使权力，由国家掌控；而另一把剑由教会掌握，在精神世界行使权力。这并不意味着，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就要分开统治。这两把剑应当互相依存。其中一把到哪里，另一把也要亦步亦趋，即政治权力和精神权力不能分开行使。正是这一理论促使基督教开始热衷于传播福音。基督教徒虽然乐于利用手中的利剑让异教徒皈依，但同时也认为，向异教徒传播基督教要由传教士率领。基督教利用自身丰富的思想、战士严明的纪律和虔诚的信念吸引异教徒。就像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不需要你降志辱身，而是值得你钦慕效仿。

我们很难相信，西班牙征服者甘冒如此巨大的风险，纯粹是出于一片利己之心。无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被贪婪所驱使，他们战胜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希望都微乎其微。因为任何理智的人都会认为，他们无法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取得胜利。但西班牙的征服者是一群天主教徒，认为自己正高举教会的尚方宝剑替天行道。有人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为了掠夺财富，但这一点很容易反驳，因为这种看法无疑是对他们的误解和低估。他们对待自己的双重使命极为郑重，所以并不觉得利用刀剑逼迫人们皈依是一种讽刺。在与伊斯兰教的交锋中，双方的做法可谓大同小异。更何况，除非发生奇迹，他们生还的几率十分渺茫。而相信上帝会制造奇迹，是他们不避艰险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

基督教与欧洲对全球的征服密不可分，因为它既可以鞭策征服者，又可以驯服被征服者。当西班牙人身穿铠甲、跃马扬鞭、扛着火枪出现时，阿兹特克人目瞪口呆。这一点固然重要。但西班牙人还对阿兹特克

人造成了另一层心理打击，即宣称自己是在代天行令，而且他们信奉的神灵比对手的神祇更加强大。正是因为上帝显灵，西班牙人才能所向披靡，从而进一步摧毁了阿兹特克人的自信，迫使他们投降归顺。但不可否认，阿兹特克的被压迫者揭竿而起，才是导致阿兹特克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

人们很容易因此对西班牙人或基督教徒进行谴责。但是，就在几代人以前，他们的手下败将阿兹特克人在夺取政权时，也曾战胜了当时的统治者和神灵，并取而代之。伊兹科阿图攻克了墨西哥谷地的主要城镇，从而建立起阿兹特克帝国。1440年，伊兹科阿图去世后，蒙特苏马执掌大权，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他生擒了500名俘虏，并用他们进行活祭。在道德方面，西班牙人并不比受害者更加低劣。因为就在几十年前，这些受害者便是残民以逞的加害者。只不过西班牙人的行动规模要远大于阿兹特克人。最后，西班牙人发现，“双剑论”不仅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有效动力，也是进行统治的重要法宝。

西班牙人利用了墨西哥、秘鲁和其他地区土著之间的政治分歧，但欧洲人之间也存在龃龉。葡萄牙人宣称，对南美洲部分国家拥有主权，两国为此兵戎相见。在教皇的调停下，双方签订条约，将拉丁美洲分为西班牙区和葡萄牙区。巴西至今仍使用葡萄牙语，而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都讲西班牙语。葡西之间的紧张局势愈演愈烈，最后耗尽了双方的精力。西班牙人从新大陆获得了大量财富，这笔财富让他们有实力统一欧洲。但最终，他们帑藏空虚，未能控制并一统欧洲。于是，法国、英国与荷兰乘虚而入，开始谋求帝国霸业。

西班牙人的失策之处在于，他们将过多财富带回国内，而仅把极少一部分留在新大陆，用于当地的社会建设。英国人反其道而行之，在北美洲建立了多处微缩的新英格兰。但英国同样缺乏控制和统一欧洲的实力。欧洲人虽然有能力征服世界，却无法统一自身。事实证明，这将成为他们的致命缺陷之一，而这也正是萨格里什带给欧洲的教训。

一系列原因促使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征服世界，其中之一是技术因素。他们能够建造大型船只驶向外海，并携带足够维持数月之久的补给和足以让敌人魂飞魄散的枪炮弹药。然而，促使他们踏上冒险之旅的真正原因，源于他们的自身需求。在通往印度和中国的航线被切断后，无论是谁来开辟新航道，都会变得极其富有和强大。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葡萄牙人最终开始从事探险活动。

诚然，航海家亨利、达·伽马、哥伦布和科尔特斯的故事，只是欧洲列强征服世界的一个缩影。从1492年欧洲出现了第一个影响全球的壮举，到1992年欧洲最后一个全球大国土崩瓦解，这50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伊比利亚人发现新大陆，第二阶段是西欧和北欧人向外扩张，而第三阶段始于美国人赶走英国人，南美洲人驱逐伊比利亚人，即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对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的征服。但本书的重点不在于讲述欧洲人如何攻城掠池，而在于探讨它们为什么全部以失败告终。这个故事的序幕足以让我们理解欧洲人当时的真正面目，以及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如此穷凶极恶又骇人听闻的事。

然而，本书讲述的不只是欧洲对全球大部分国家在物质上的征服，还有欧洲对整个世界的痴迷以及对占有这个世界的渴望。这不仅包括对拉丁美洲或印度的统治，还有对小到细菌、大到星系的所有事物的控制。我最关心的是欧洲对占有一切事物的痴迷，以及这种痴迷来自何方又将去往何处。换句话说，也就是寻找浮士德与魔鬼达成协议的原因。我们不要忘记科尔特斯，因为当今有许多此类人物。我们也不要忘记亨利，虽然像他一样的人比前者鲜见，但他们同样在欧洲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以加强对殖民地的剥削，而这个机构的崛起就离不开像亨利那样一丝不苟的人。在欧洲的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和军人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浮士德情结，即对一切事物的渴求、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和对知识的向往。正是这种情结让世界变成了一个平淡无奇、索然寡味的地方，也让欧洲人变得虚有其表，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强大。

(1) 哈里发是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称谓，意为“代治者”、“代理人”或“继承者”。

3

思维的裂变

神学与科学的死磕

欧洲凭什么征服自然？人类终结神迹时代，到成为自然的征服者，期间付出多少血汗？广受赞誉的宗教改革、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为什么被指为欧洲分裂的元凶？科学与神学纠葛不断，一场场扣人心弦的变革随之展开。

《九十五条论纲》撬动神权

假如将亨利与科尔特斯的精神合二为一，两者的共同体既是一个知识精英，也是一个草莽强徒。此人不仅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且还会打破常规，将这种生活方式带到他选择的地方，突破习俗并揭示事物的真相。作为一个强者，除了自己的良知、理智和意志，他们不承认世上存在任何界限。对伟人来说，这种做法使他们得以发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未知、瑰丽而又危险的真相。但出类拔萃的人理解其中的危险，因此在公布真相时极为审慎。才智稍逊的人粉碎了高贵而又必要的谎言，仿佛他们不需要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最危险的是那些庸庸碌碌之辈，他们利用伟大思想家的见解，宣称他们有权相信自己选择的任何事情，并且认为，任何令人不快的事情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可信的。这些庸人夺走了天才的权利，只是因为他们从不尊敬任何事情。

在伟人和庸才的控制下，欧洲断裂成无数个碎片，其中有些绚丽夺目，但大多数乏味而平庸。欧洲思维的分化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四分五裂的地形。最终，这种分裂将导致欧洲及其精神轰然崩塌。

1500年，基督教控制着欧洲大陆东部边缘，而天主教主宰着欧洲大陆。天主教通俗易懂、神秘莫测。大体而言，它是一套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仪式和一种迷信观念，为人们提供了适度的畏惧和安慰。从智力层面来看，它更加微妙、复杂，甚至自相矛盾。天主教同时谋求政治上的职权和精神上的威信。它不得不参与政治生活，其间充满斗争与妥协。从精神层面来看，在理解基督人生意义的同时，它又不得不调停基督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政治需要把妥协和腐败区分开来，而前天主教需要从基督的献身精神去理解一切事情的意义。天主教是一个宏大的知识体系，如同中世纪的大教堂一样，它错综复杂而又绚丽多彩，在构建时历尽了重重困难，在维护时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1494年签订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中，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划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在此，我们不妨稍事停顿，考虑一下其中令人难以置信的自大心态。梵蒂冈不仅对天主教国家视而不见，而且罔顾当地土著的要求，尽管他们已经皈依了天主教。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学说之所以曲尽其妙，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天主教钩深极奥的感悟力，而它赏心悦目、引人入胜的宗教仪式很容易在所谓的普通修道者中引起共鸣。但在斯时斯地，天主教最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它宣称自己对全人类拥有普遍的政治权威。

无论是从精神和教化的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来看，这都是天主教的鼎盛时期。它控制了欧洲大陆，致力于促使异教徒皈依门下，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然而，有一件事让天主教感到十分困扰。《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虽然阻止了两个天主教强国走向战争，但他们发现，这个世界浩瀚无垠，其中大多数人都对耶稣之名闻所未闻。这一发现让人们开始对天主教宣扬的对全人类的普适性产生了种种怀疑。于是，细微的政治分歧和思想裂痕相继出现，但当时尚未引人注目。实际上，随着亨利和科尔特斯的精神互相融合，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联合体，他们既聪明睿智，又胆大妄为。他们确立了自己的术语和规则，从而扰乱了欧洲的思想秩序。

在1492～1543年的51年中，有3件欧洲人曾经认为确凿无疑的事受到了冲击。在欧洲大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有3件事情不容置疑：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欧洲是世界的中心；天主教是欧洲的中心。然而，在这51年间，欧洲产生了一系列激进的、不可抗拒的思想，从而使欧洲的思维框架受到了冲击，导致其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最终变得愈加分化。在人类历史上，这一切并非循序渐进地出现，而是像迅雷烈风般突然发生。

1492年，哥伦布环球航行促使后人了解到一个事实，即地球是圆的。当然，在此之前并非无人宣称，地球的形状是圆的，但他更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而开启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在这个世界里，存在许多高度发达的文明，但这些国家对欧洲和基督教闻所未闻。与穆斯林不同，他们并没有摒弃基督教，只是从未听说而已。如果地球是圆的，这不仅意味着地球表面没有任何中心，而且意味着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世界的中心。欧洲人只能宣称，他们的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文明。除此以外，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诸多文明，这些国家对欧洲既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这一点肯定不会令欧洲人欢欣鼓舞。假如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从未听说过基督教，那耶稣怎么可能成为救世主？世界之幅员辽阔，文明之多种多样，而且不存在任何中心，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欧洲人此前的想象。借用卢梭的说法，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文明一直自认为比“高贵的野蛮人”[(1)]卓异。但这种观点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因为现在看来，所有文明似乎都具有同等价值。

25年后，即1517年，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一座教堂的大门上，发起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是欧洲中心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他最主要的观点是：罗马主教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与上帝相通，无须神父从中引导。而作为个体，每个人都可以在良知和上帝恩典的指引下阅读《圣经》，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直以来，罗马自诩为基督教的中心，但东正教始终对此表示质疑。如今，罗马的这一地位岌岌可危，并在欧洲大陆遭到了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丧失了其作为世界精神中心的地位，而天主教在其曾经统治过的欧洲大陆部分地区，也丧失了昔日至高无上的地位。

26年后，即1543年，哥白尼清晰而详尽地阐明，宇宙的中心是太阳而非地球，而地球绕着太阳旋转。这绝不仅仅是一条有关宇宙的学说。虽然此前也有人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但哥白尼的论证更为有力，并且引发了这样一个疑问：假如上帝创造了世界，并按照自己的外形塑造了人类，那么他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杰作，也就是整个宇宙赖以存在的意义，放在世界的中心？数百年后，有人指出，地球只不过是一颗微不足道的行星，位于一个普通星系的边缘地带，而类似的星系不计其数。哥白尼的学说让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类并非举足轻重，但这种看法与许多宗教的教义相抵触。更何况，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曾将自己唯一的圣子派往凡间，这与哥白尼的学说显然更加格格不入。

天主教宣称，人们只能通过教会的教义了解上帝，而教义由各个等级的神职人员负责阐释。马丁·路德在沃姆斯国会上表示：“我的良知受到上帝之言的约束。而违背良知行事，既不正当，也不安全。”在这一宣言中，路德引入了个人责任、道德良知和怀疑精神，从而重塑了整个基督教体系，为下一场欧洲革命做好了铺垫，而这场变革也将带来无穷无尽、出人意料的后果。

对天主教来说，其教义代表着上帝的圣言，教会以外的个人不能对基督教教义进行解释。但路德在天主教中引入了良知和个人信念的概念。他认为，个人有权研究神的话语和《圣经》，并按照良知的指引对其进行阐释。尽管路德竭力避免绝对主观主义，但他所倡导的理念还是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基督教的教义虽然没有变化，但他将作为个体的基督徒提升到了基督教的中心位置，使罗马教廷的地位一落千丈，并改变了欧洲精神世界的面貌。

与此同时，欧洲科学革命也蓬勃兴起。印刷机发明于公元1440年之

前。截至1500年，欧洲大约有1 000台印刷机。在印刷机发明之前，书面的东西十分罕见。当时文盲众多，不仅因为人们没有学过如何读写，也是由于没有可供阅读的书籍。现在，所有人都可以接触到《圣经》，而且可以使用当地通行的语言，即母语进行阅读。这一举动看似简单，但进一步削弱了神父的权威。人们每天都可以在家中自行阅读《圣经》，而不需要等待礼拜日，由神父宣读并解释上帝的圣言。他们不仅可以阅读《圣经》，还可以对其意义提出不同的看法，从而与罗马教廷或者其他人决裂。因此，欧洲大陆的基督教开始分立教派，并逐渐分裂。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欧洲的国界线日益增多，这种状况进一步加深了教派的分裂。语言不仅是一种听说读写的能力，而且是人们相互沟通的纽带。当时，各个地区的人们虽然拥有某种共同语言，但这种语言尚未衍生任何政治意义。

印刷机使路德得以将《圣经》译成德语，并广为散发。也正是印刷机让基督徒可以依照良知，直接面对神的话语。此外，印刷机还可以把人们的讨论和争辩印刷成册，并将其公诸于众，使普罗大众得以首次直接参与到精神生活中来。

路德宗教改革的其中一个后果是促进了欧洲普通语言的合法化。在此之前，拉丁语是通向上帝之路的唯一语言，而现在许多语言不只是俚俗之语，在写作和思考时也具备同等的效力。通过德语表达的思想毫不逊色。由于共同使用一种语言，比如德语、英语或其他任何语言，各个群落的人们被联结在了一起。人们可以用母语阅读，或者听别人阅读那些与他们素昧平生的其他人的想法。语言成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特征，成了国家形成的基础，也成为欧洲冲突频发的另一个因素。

对德国人演讲时，路德使用德语。德国民众不再是历代王朝需要应对的次要问题，而变成了一台追求自身权利的政治发动机。德国掀起了一场挖掘历史记忆的运动，而路德教是这场运动的根本依据，并与德国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融为一体。新教引起民族主义的广泛兴起，而民族

主义也将导致欧洲多国林立。每一个国家都以语言基础，而每一种语言在上帝眼中都一视同仁。欧洲人的思维正在日益分化。

宗教改革的核心区域是德国，之后迅速传遍了欧洲北部的边缘地带、英伦三岛和斯堪的纳维亚。但不可否认，其根源仍在德国。值得注意的是，哥白尼是德国和波兰的混血儿，马丁·路德是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也是德国人。这不禁让我回忆起，当初日耳曼部落是如何抵抗罗马人并维护其独立地位的。现在，德国人开始反抗罗马教廷，以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

此外，宗教改革还催生了另一种形式的分裂。良知和信仰都是私人的事情，仅与个人看法相关。宗教改革把良知作为信仰的基础，在提升个人地位的同时，也产生了如下问题：谁对《圣经》的解读才是正确的？人们的疑虑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如何判断一个人良知和信仰的真挚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圣经》的诸多解读中，如何才能作出正确选择？路德刺激了宗教改革的发展，但并未使其达到顶峰。改革者之间开始相互质疑。宗教改革的形式在不同国家、不同宗派之间存在差异。不计其数的小派系分离出去，成立了自己的教会。如果说信仰和良知是理解《圣经》的准则，那么任何人的解读都不是不刊之论。每一个人都会用自己的信仰和良知，去衡量所有观点的是非。这不仅因为每一个人皆有如此行事的自由，而且良知也要求他们不得不如此。

天主教将信徒限定于一种单一的信仰和行动之中，而新教与其说开启了怀疑之门，不如说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与其说产生了怀疑精神，不如说警惕所有自诩为权威的说法。这无疑在与过去的认知决裂，而当时许多事情都处在风云变幻之中。它为另一场初露端倪的思想运动，即科技革命，提供了神学基础。

路德认为，圣迹时代在教会成立之初就已经终结。这就意味着，神灵的干涉不会再破坏上帝创立的自然规律。在自然规律的支配下，世界是恒定、可以预知的。既然自然规律支配着这个世界，那么问题是，我

们如何才能知晓这些自然规律？其中一个办法是研读《圣经》，但《圣经》涉及的更多是超自然现象，即上帝及其旨意，而非自然现象。按照路德教的思维方式，要想了解自然规律，还有另外一个领域需要探索，而不能仅仅通过《圣经》进行研究。这个领域即自然界，即意味着要对科学展开研究。

培根设计：欧洲征服自然的肇始

科技革命包含许多思想家和学说。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科技革命都不只是一场由新教教徒发起的运动，就其对自然的观点以及将良知和个人提升到道德和精神世界的核心位置而言，它是一场部分发源于新教的运动。此外，在科技革命初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一名新教教徒、政治人物以及一名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的支持者。正因为如此，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宗教改革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弗朗西斯·培根生于1561年，即路德逝世15年后。在《伟大的复兴》（*The Great Instauration*）一书当中，培根提出了一种获得知识的新方法。在承认上帝和精神至高无上的前提下，他提出，要根据人类感官能够感知到的一切去审视这个世界，即首先从物质角度进行评判。圣迹时代的终结意味着，从某些方面来看，物质世界及其规律应当被视作上帝最后的话语。中世纪经院哲学奉行的演绎推论不得不让位于归纳推论。现在人们有必要对这个世界及其隐藏的规律进行研究，而不只是阅读那些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的文章。

培根设计了一种揭示大自然秘密的方法。这种科学方法基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原则以及根据观察得出的论断。人们首先提出假设，然后通过观察和实验对其进行证实或证伪。

这种科学方法的原则是：人们对过去将信将疑的事情提出质疑，然后对其进行理性分析，从而掌握更多知识。这种科学方法的核心在于强

调有关物质世界的任何命题都必须通过证据和推理来证明，从而明确地奠定了科学的哲学基础。此外，这种方法还指出，在物质世界中，所有观念都要经得起挑战和质疑。奇怪的是，虽然培根似乎从未对基督教发起挑战，但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 无神论把人类付诸理性、哲学、先天的怜悯、法律、名誉。所有这些，即使没有宗教，也足以引导人类获得某种外在的美德。但迷信破除了上述一切，并在人们心中建立起绝对的专制。因此，无神论从未使任何国家陷入混乱，因为无神论使人谨慎自省，仿佛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顾虑。我们看到，那些倾向于无神论的时代（例如奥古斯都、恺撒的时代）都是治世。迷信成为许多国家混乱的根源，并引入一个新的原动天[(2)]，从而夺走政府的所有影响。

科学并不必然就是无神论。虽然它无法为精神世界提供指引，但并不需要否认这个世界的存在。科学界往往存在这样一种诱惑，即把物质世界置于精神世界之上。因为对于物质世界，人们可以开展精确的研究，而对于精神世界，人们很难进行中规中矩的分析。我们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而科学最看重的是自然。路德运用良知和个人观点对权威发起挑战，并进一步将思想（即理性）转变为某种机制，以探索自然的所有奥秘。迷信是科学的敌人，因为它是基于权威而非证据建立起来的信仰。培根反对迷信，为无神论进行辩护。因此，我们必须清楚，他是否认为与精神世界有关的一切都是迷信。

培根的做法十分伟大。尽管路德表示，圣迹时代已经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精神领域是虚幻且无关紧要的。此外，当路德宣布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良知自行阅读《圣经》时，他也没有打算将人们从《圣经》教义的限制中解脱出来。虽然从表面上看，路德曾倡导我们对自然规律进行研究，或者使人们摆脱束缚进行独立思考，但他并没有将其付诸实践。他只是让人们可以不受约束地通过《圣经》虔诚地思考上帝的旨意。

但培根作出了关键性突破。首先，他将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自然界。其次，他以理性为基础，创造了一种理解自然的方法。最后，他开启了通往思想的大门，在无需诉诸上帝的前提下，对这个世界进行探索。培根设法破除人们对自然界的幻想，将其置于人类理性的控制和意志之下。无论他外在的宗教或政治主张如何，培根都将人类理性上升到了天地万物的中心，从而开启了知识的大门，并彻底摧毁了欧洲人曾经深信不疑的事情。

托马斯·霍布斯与培根是泛泛之交。霍布斯在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中写道：“人脑中的任何观念，没有不是一开始就由感官而产生，或者全部皆是，或者部分如此。”换句话说，所有观念均来自感官。既然我们无法感知上帝，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认识上帝。

霍布斯称，人类的自然生活是“肮脏、野蛮和短暂的”，并因此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如果自然界果真如他所说的那样危险，那么人类应当征服自然。而征服自然的手段，培根曾经教诲他说，只有通过科技来实现。霍布斯的观点为人类利用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奠定了基础，从而为现代科技文明做好了铺垫。

科技革命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其实用性。培根从不认为科学应该成为某种玄妙莫测的东西，而应该为人类带来益处。如果萨格里什是欧洲征服世界的开端，那么培根就是欧洲征服自然的肇始。

人类迁徙、沟通、弥合创伤和学习新知的方式之所以会发生转变，莫不是基于将培根的科学研究方法推广到技术中。就像欧洲的探险活动和帝国主义改变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一样，这种方法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奉理性为至宝

启蒙运动[3]产生于上述三次冲击。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这场运动席卷了整个西欧，仿佛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变革。启蒙运动试图揭开迷信掩盖的奥秘，让世界清晰可见。它希望首先从理智上，其次从政治上，对人类、社会和人性进行重新定义。人们对自然的认知以及对思想复杂性和精密性的了解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这种势头有增无减。

启蒙运动中涌现了不可胜数的名人和思想流派。无论涉及任何话题，几乎都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例如，启蒙运动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宗教的，但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勒内·笛卡尔始终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尽管这一信仰与他的许多说法都互相抵触。正如让-雅克·卢梭曾经写道："虽然我发现了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但它们并没有对我形成阻碍。"卢梭认为，现实错综复杂，其间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观点和针锋相对的真理碎片。启蒙运动不仅向宗教发起了挑战，而且也向自身发起了挑战，从而使欧洲思想变得日趋分化。

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即认为人类的理智能够了解天地万物和人类自身。虽然还有许多事情尚不为人知，但是从原则上讲，世间不存在任何无法被理性认知的事物。如果把理性比作划开万物的刀刃，那么最富于理智的人就是其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传统社会寄希望于贵族阶层，而欧洲的贵族是由出身决定的。赞同这一观点的人认为遗传因素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具有美德，因此国家应该由出身高尚的贵族统治。但启蒙运动认为，一个人的出身是偶然的，因此最大的不公就是让这种偶然的出身决定人们的命运。对启蒙运动来说，唯一的贵族是那些才能出众的人，而才能是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的能力。这种才能也许与出身不无联系，但人们的命运不应当在出生之前就被决定。正是这样，启蒙运动将对理性的颂扬转变成了一场反抗旧政体的革命。

欧洲发展了美德的概念。如果理性是判断人类的唯一标准，那么国家应当由富于理性的人来统治。理性统治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开明的君主专制，即由集高贵血统和卓异才智于一身的国王进行统治。第二阶段是共和制，即由具备特定资格的选民选举出最佳人选，在政府系统中作为他们最适合的代表，而政府部门必须受到种种限制，即便他们充满热情。这就是欧洲自由主义的基础。但它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带领欧洲继续向前，产生了一种更加激进的思想。

假如伽利略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思考，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如法炮制。只要不伤害他人，他们为什么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那么，最终将由谁来确定天才和庸人之间的区别？其中一条道路是民主革命，另一条道路是精英政治，即由最富于理性的人进行统治。每一条道路都举步维艰。启蒙运动将理性视作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但并没有提供区分理性和非理性的可靠方法。由于缺乏尊重优秀思想体系的能力，思想和言论自由让欧洲人的思维越来越分化。因此，占据上风的往往是最令人信服的观点，而非最具理性的观点。

启蒙运动衰落后，产生了极端的个人主义，但个人的智慧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即使人们可以独自生活，人生仍将是肮脏、贫穷、野蛮和短暂的。个人主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必须融入社会才能变得更加完善。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合适的呢？显然，其领导人必须与追随者休戚与共。这种社会要么是通过代表建立的共和政体，要么是通过选举建立的民主政体。但上述社会组织并不能确定哪些决定才是公正、适当的。王朝和帝国不再具有合法地位。任何由专制君主统治的国家都不得再对个人进行控制。自治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但同样令人困惑的是，如何才能界定国家管理的地理范围？哪些人可以成为国民，哪些不能？哪些人可以参与投票，哪些人负责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源于路德的观点，即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国家就是上述因素的综合体。但问题是，国家在某些方面与启蒙运动水火不容，因为它建立在个人出身而非品性之上。德国人就是德国人，法国人就是法国人，不需要甄别他们的理性或才能，他本来是哪国人就是哪国人。国家为个人提供了属于人类特有的事物，即语言和个人诞生前的历史。启蒙运动和国

家主义不仅判若水火，两者之间的矛盾往往难以沟通。虽然民族自决权或民主主义可以弥合两者的分歧，但民主主义也可以像专制主义那样残酷无情、缺乏限制。在民族自决权的驱使下，国家在20世纪已经初具雏形。

无论两者的矛盾如何尖锐，人们都需要有一个出生、长大和保护自己的地方，因为这些事情对所有人来说都至关重要。要想理解这一点，有种观点十分关键，即人们都喜爱自己特有的一切。人们最初喜爱的父母、语言、宗教和家乡都是与生俱来的。从呱呱坠地起，这些就属于他们，是无法选择的事情。而爱情不一样，因为爱情出自选择，而这种喜爱之情却是人类最原始、最简单和最强烈的感情，因为它可以不假思索，也不需要经过任何选择。启蒙运动试图破除这种与出身有关的联系，将人们从种种与生俱来的身份限制中解脱出来。但是，在打破这些联系的同时，启蒙运动使人们迷失在自己的想法中。人们摆脱迷信的束缚，就意味着摆脱了宗教最低级、最缺乏理性的一面。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需要某种归属感，将自己与社会、责任及历史联系起来，以免个人想法造成巨大破坏。

但问题在于，科学和启蒙运动让人们只剩下生理属性和欲望。如果这就是他们的一切，那么他们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责任何在？哪些行为合乎道德规范，而他们又何以得知这一点？如果不能回答上述问题，人类将变得十分危险，甚至与禽兽无异。社会原子化[(4)]状态下，人们总要以某种方式重新融入社会，只不过他们需要一个理由。尽管他们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但这一点仍然必不可少。为把他们从自我和呆板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必须有事物诱使他们重返社会和历史，必须有人向他们讲述令人心驰神往的神话传说。他们仍然需要神话故事，以便向自己的灵魂交代，他们究竟是何许人也。

德国以及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父母讲给孩子们的童话既令人毛骨悚然，又令人激动不已。《韩塞尔和葛雷特》[(5)]（*Hansel and Gretel*）讲述

的是一对可怜的兄妹遭继母抛弃的故事。韩塞尔和葛蕾特的父亲是一位穷苦的樵夫，在他们的母亲去世后，不得不续弦。继母唆使樵夫把韩赛尔和葛雷特带到森林里遗弃，以便自己能享用更多食物。哥哥韩赛尔偷听了他们的谈话，决定在口袋里装满石子，好让自己在被父亲遗弃后找到回家的路。当孩子们返回家中，继母再次怂恿父亲抛弃他们。这一次，他们无法到外面捡石子，于是哥哥用面包屑在沿途留下了记号。在森林里，他们遇到了一个巫婆。她想把他们放进火炉里煮来吃，并准备首先把韩赛尔放进去，但葛雷特很快识破了巫婆的诡计，她灵机一动把巫婆推进了火炉。巫婆在尖叫声中死去。在小鸟的指引下，两个孩子带着巫婆的珠宝返回了家中。他们发现继母已经死去，父亲高高兴兴地把两个孩子和他们携带的珠宝迎入家中。从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些关于加害他人和巧妙脱险的德国童话传达了一则同样的政治信息。故事的开头讲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和难以置信的贫穷，迫使德国人对他们最应爱护的人作出可怕的举动。接着，人们对造成这种不公正待遇的根源发起了对抗，并将其摧毁。在讲述坏人为非作歹的同时，这些故事还歌颂了德国人的勇敢、聪慧和最后的胜利。孩子们显然比他们道德败坏的父母更加聪明，因为前者象征着未来，而后者代表着过去。此外，这些故事也可以视作欧洲历史的传说。故事中，德国人试图从其他人手中夺回自己的财产，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曾经偷走了自己的财富。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孩子们一直在读这些童话。其中的故事虽然令人胆战心惊，但是在家庭与更为广阔的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格林童话》中的人物很少信仰基督教，大多都是异教徒。这本书继承了基督教以前的文化遗产，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它与启蒙运动的联系在于，两者涉及的都是异教徒，而非基督教徒。启蒙运动以进步的名义逐渐摒弃了宗教，但正如彼得·盖伊所言，它最终发展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异教。格林兄弟描绘的是基督教出现之前的时代，彼时德国森林里危机四伏、战事不断。那是一个险象环生、神秘莫测之地，而这

些历史传奇也成为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基石。

启蒙运动试图让世界摆脱神话的束缚，但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国家就无法为自己正名。浪漫爱国主义设法应对这个问题，并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它。但一个新问题随之出现：如果人们对国家负有责任，那么这一责任的限度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处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一个国家权利的限度是什么？这一观点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人相信，他们的祖国比其他国家更加美好，或者他们曾经遭到了劣等民族的迫害。

浪漫爱国主义关注的是美感而非理性，因此放大了崇高感和受迫害感。肖邦通过奏鸣曲而非论文抒发了自己对波兰的热爱。奏鸣曲触动的是人们的灵魂，但每个人的灵魂对此将作何反应却往往不可预测。艺术的冷酷无情与理性不同。无论艺术看起来多么荒谬，最终都会产生合理的结果，而理性无论存在多少缺陷，都需要被人热爱。理性引导你自己得出结论，而艺术的目的在于产生美感，因此它本身就是结论。

最终，就像法西斯主义抬头时那样，国家本身变成了一件艺术品，而党的领导人变成了艺术家。法西斯分子杜撰了关于国家的神话，与理性的启蒙思想家如出一辙。尽管两者的根源和结果大相径庭，但它们都创造了某种思想体系。更加重要的是，两者都异常危险，因为理性会驱使人们走向逻辑的极端，而艺术一旦鞭策人们不择手段地追求美，就会产生可怕的事物。我们不妨想想斯大林和希特勒。然而说到底，人们还是需要社会，这个社会即国家，而这个国家就像一位善于嫉妒的主人。

哥白尼、哥伦布和路德分别对欧洲文明造成了冲击。这三次冲击最终粉碎了欧洲的秩序，使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摆脱了束缚，从而创造了单一的全球文明。其中最伟大的变化，就是把人置于宇宙万物的中心。通过将理性提升到人性的中心，整个人类也得到了提升，因为人是理性的化身，而科学和技术则是理性的产品。然而，这种做法也制造了某种幻觉。人类虽然可以处于宇宙万物的中心，但每个人都不可能孤立存在。

最终，个体的胜利与个人对社会的需要产生了矛盾，如此一来，必须有人重塑社会，并说服人们参与其中。欧洲人一反常态，变得日益分化，从而打碎了道德指针。当他们从思想上接受了建立在艺术和神话基础上的国家时，他们不再完美无缺，因为其道德指针被弃置不顾。艺术不分善恶，而虚构的爱国主义取代了形单影只的个体，如此美好诱人，但两者皆不能明辨是非。哥伦布、路德和培根所破除的东西不得不以某种方式重新结合起来。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其中一种途径是通过培根所赞美的科技及其带来的和谐的经济生活，另一种途径是通过国家及其带来的融洽的道德生活。遗憾的是，两者格格不入，以致世界充满了矛盾。

尽管矛盾重重，欧洲仍然令人叹为观止。它不仅征服了全球，还征服了人们的思想，让一切都发生了彻底变革。20世纪初，世界岿然屹立，似乎国家和自然都处于其绝对控制之中。1913年，人们似乎难以想象，这一切会改变。但事实却截然相反，因为世界不得不发生变化。一大批国家跃跃欲试。毋庸置疑，它们清楚什么是美好的事物，但误以为这就是合乎道义的行为，从而为接踵而至的恐怖铺平了道路。这一切都是上述三次冲击造成的意想不到而又顺理成章的结果。虽然每一次冲击都值得赞扬嘉许，每一次冲击也都把理性奉为至宝，但是它们共同动摇了欧洲人的思想，并将其变得支离破碎。

---

(1) 启蒙运动中，卢梭关于“天赋人权”的理论，将最美好的道德寄托于原始部落，而高更等人也受到这种思想的极大影响。因此，当高更来到塔希提岛，发现这里的人们没有工业社会的精神压力，没有被金钱欲望玷污的观念，每天的日常生活除了依靠简单的食物，就是唱歌跳舞、追逐异性，或者无所事事，这种局面令文明的欧洲人产生了极为矛盾的心理。首先，他们还是认为自己的文明有自信和自满，因为那些海岛上的人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用品和工具；其次，他们也感到自卑，因为虽然没有现代文明的用品和思想，但海岛上的居民比欧洲人更加快乐。欧洲当时出现了一个词汇——“高贵的野蛮人”，用来专门描述这种现象，意思是他们虽然物质贫乏，但是精神高贵。

(2) 在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动说中，原动天位于所有天体的最外层，能推动所有天体运动。

(3) 启蒙运动，通常是指在17～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与理性主义等一起构成了较长的文化运动时期。

(4) 社会原子化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即中间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及道德解组、人际疏离和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一般而言，社会原子化危机产生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时期。

(5) 《韩塞尔和葛雷特》又名《糖果屋历险记》或《糖果屋》，出自《格林童话》。

第二部分

三十一年腥风血雨

FLASHPOINTS

The Emerging Crisis in Europe



4

大屠杀

启蒙运动的罪与罚

曾经缔造了全球帝国，刷新了人类的辉煌成就，欧洲为何在31年间迅速坠落？而作为种族屠杀之典型，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的逻辑何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骇人听闻的战争屠杀，最大的罪魁祸首竟非希特勒们的野心，而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

俄法夹击，肢解德国？

1912年，当我父亲出生于匈牙利与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小镇尼尔巴托尔时，这里粮食丰盈，上一次兵革之祸还发生在很久以前，且彼时暴力活动尚未泛滥成灾，人们的生活还很美好。这里不是巴黎，而是欧洲大陆最荒凉的地区之一，但启蒙运动的足迹还是出现在这片土地。据说当地的医生读过巴鲁赫·斯宾诺莎[(1)]的著作。这里还有一座火车站，乘坐火车可以前往布达佩斯。在合理的范围内，人们可以衣食无忧、制定规划，甚至憧憬未来。如果当时你出生在此地，可以说是生逢其时。

对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的西部来说，1912年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年份。自1815年以来，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国泰民安，虽非太平盛世，但至少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兵荒马乱。这一年，民主共和思想开始广为传播，即使是德国这种皇帝仍然在位的国家，也出现了强大的议会、自由的媒体、著名的大学和繁荣的景象。此时，欧洲的经济增长令人惊叹，技术进步日新月异。

欧洲统治着整个世界。

欧洲的殖民地共有4 000万平方公里，其中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掌管着其中2 500万平方公里，弹丸小国比利时控制着刚果，荷兰统治着今天印度尼西亚一带数千万人口，法国在非洲和中南半岛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数字还不包括欧洲非正式控制或影响的地区，例如埃及和中国，也不包括重获自由的殖民地。欧洲就像一个横跨全球的巨人，富有、强大、充满创造力。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祸不旋踵。1914年8月，欧洲突然变成了一座屠宰场。截至1945年，这里共有1亿人死亡，不计其数的人受伤，整个欧洲大陆陷入极度惊恐之中。这场灾难的发生速度和破坏程度前所未有。作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欧洲亲眼见证了类思想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这里竟然会发生如此惨祸。大约400年前，欧洲开始改变整个世界和人类，从而令举世震惊。这一次，欧洲堕入了地狱的深渊，同样令人触目惊心。20世纪这场持续了31年之久的暴行不仅史无前例，而且使欧洲之前取得的一切成果都丧失殆尽。

1945年，欧洲大陆被占领，暂时失去主权。战争、结盟和抵抗让欧洲变得支离破碎、满目疮痍。欧洲人对自己所变成的恶魔以及表现出来的怯懦和缺点大惊失色。然而，更令人惊愕的是，他们终于意识到，在“一战”爆发前，欧洲的阴暗面只是被其取得的卓越成就所掩盖，这一点对曾经的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欧洲对全球的统治日渐衰落。最终，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统治权。400多年来，欧洲人亲手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都付出了令人咋舌的代价，但现在这一切似乎变得毫无意义。经过一番挣扎后，欧洲不仅丧失了对殖民地的控制权，甚至丧失了关注此事的能力。

与所有伟大的悲剧一样，那些让欧洲变得卓绝不凡的美德也是令其毁于一旦的重要原因。启蒙运动所推崇的国家独立原则和民族自决权，逐渐演变为对陌生人的愤怒。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正

是源于挑战一切道德限制的怀疑精神。技术不仅让世界面目一新，也制造出此前无法想象的种种惨剧。为了争夺全球霸权，欧洲内部冲突不断、烽烟四起。每一项伟大创举竟都为灾难埋下了伏笔。

即便灾难迫在眉睫，人们仍对此视而不见。英国著名作家诺曼·安吉尔曾在20世纪30年代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09年，他在其名著《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中提出，由于欧洲国家之间在投资和贸易上相互高度依存，所以欧洲内部不可能爆发战争。此外，他还假定，一旦欧洲内部爆发战争，随之而来的经济崩溃会将欧洲彻底摧毁。正因如此，欧洲不会有战争之虞。

这一“高明”的论断也引起了金融界精英的强烈共鸣。这不仅因为他们对经济关系推崇备至，而且这一论断让他们变成了世界的主宰，他们的利益将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这些金融大亨不仅掌控着全球的命运，而且为了防止其卑劣好战的本能造成破坏，他们还保卫着世界的安全。为此，他们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以免作法自毙。由于当时和现在一样，金融界考虑的只是如何赚钱，因此人们相信，只要有发财致富的机会，欧洲就不会爆发战争。安吉尔虽然聪明过人，但却大错特错。

毋庸置疑，安吉尔忽略了一点：如果两个国家间存在共同的经济利益，那么总会有人担心，其中一方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谋利，或者退出这种关系，转而与其他国家合作，最终打破原有的协定。双方互相依存的程度越高，他们就越希望确保对方信守承诺，并且即使在极端的情况下对方也不会对自己进行敲诈勒索。随着双方的互不信任感与日俱增，它们就会寻找更为有效的制衡措施，有时甚至会诉诸战争。由此可见，相互依存既能带来和平，也能导致冲突和战争。

1900年，尽管欧洲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事实是：德国已经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仅有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能与其相提并论。尤其是在出口方面，英德两国的出口总量甚至远超其他欧洲国家。然而，英国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德国却没有一

块殖民地。

随着德国的经济实力迅猛增长、日益强大，并能将其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军事力量，欧洲平原的其他国家开始胆战心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对其邻国同样感到提心吊胆。德国东邻俄国，西邻法国，并且其间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统一仅40年的德国担心，尽管它们之间存在跨国贸易和投资，但这两个敌国有可能同时从两面夹击。

德国的统一和崛起打破了欧洲的稳定状态，其东西边境成为一触即发的危险地带。此外，德国还改变了欧洲的经济秩序，引发了某种无法通过外交手段和新闻媒体平息的战略恐慌。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并且这种忧虑感随着互相依存的脆弱感变得愈发严重。安吉尔的论断大谬不然，欧洲并非没有战争之虞。由于各国的需求相互矛盾，摩擦随之产生，战争逐渐成为解决矛盾的必要手段。欧洲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削弱德国，要么调整现存体系，以增加德国的安全感。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在应对此类冲突，这一次依然如故。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即将面临什么样的战争。

德国认为，如果在敌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腹背受敌，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尽管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法俄联盟准备对德国进行两面夹击，但德国仍然认为，形势不会一成不变，尤其是随着其经济继续迅猛发展，对手可能感到危险将至，从而斥之战争以解除潜在威胁。德国不能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先发制人，即按照德国选定的时间率先开战，迅速歼灭其中一个敌国，然后再抽身对付另一个。德国之所以会挑起战争，是因为担心其他国家会率先发难。为此，德国陆军元帅冯·施里芬制定了一项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作战计划，即“施里芬计划”。这虽然听起来荒谬无稽，但实际上不足为奇。

按照“施里芬计划”，德国将首先进攻法国，并迅速迫使其投降。随后，德国可以通过中立国比利时发动攻击，将主力部队放在右翼，横扫英吉利海峡沿岸地区，并直捣巴黎后方，从而彻底孤立法军，占领这座

都城。这一切都要在英国出面干预前完成。德国人预计，届时俄国人会从东侧发起袭击，对此他们已经做好了撤退的准备，即便这意味着要暂时失去东普鲁士。一旦法国沦陷，该国境内的德军就可以通过德国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直奔东侧，并与俄国人决一雌雄。

就像其他所有人对这场战争的预期一样，德国人希望速战速决。然而，战争并没有按照德国人的设想发展。他们不仅没能速战速决，而且陷入了自蒙古人入侵以来欧洲闻所未闻的僵局和屠杀。从1914年9月6日到9月14日，仅在西线，德军就有50万人伤亡。

截至目前，欧洲有三个重大变化：其一，科技使人们具备了设计和制造新式武器的能力；其二，工业化使人们可以大规模生产这些武器；其三，民族国家的心理力量使欧洲的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三个大国得以控制并动员军队在血雨腥风的疆场上赴汤蹈火，即使他们的生命会因此变得肮脏、野蛮和短暂也在所不惜。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为了弥补步枪的不足，人们发明了机关枪。除非使用者训练有素，否则步枪的精确度差得惊人。正因如此，为了提高杀伤力，人们只得接连不断地急速发射大量子弹，导致到处血流成河。美国内战中使用的格林机关枪是早期机关枪的雏形，而海勒姆·马克沁则发明了现代机关枪。1882年，一位美国人告诉马克沁，如果他想大发横财，他就要发明某种“具有更大杀伤力、能够让欧洲人互相残杀的武器”。一挺机关枪便可以在冲锋的敌人靠近之前，造成数十人伤亡。但是，要想阻止对手的进攻，人们必须拥有这种大量的新型机关枪。

尽管机关枪的设想已经提出了一段时间，但当时尚不具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如果不能批量生产，这一设想就毫无意义，因为罐装食物、枪炮弹药、卡车和铁锹的批量生产让现代战争成为可能。在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下，战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武器的杀伤力呈数量级增长。

此外，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巨大变革，还是因为人们愿意为了国家出

生入死，而这一行为也被国家视作正义之举。假如没有士兵愿意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并将其视作道德的化身，即便世界上的技术再先进，也不会导致大屠杀。国家不仅意味着民众要使用同一种语言，而且成了某种道德上的纽带和共同的行政系统。这种纽带来源于从启蒙运动、社会契约论到同宗同源的语言所产生的种种观念。最终，个人的概念被国家的概念所淹没，而军队成为了国家的最佳象征。

过去，军队主要由一些极不情愿的臣民和雇佣兵组成。但是现在，士兵来自奉行道德准则的公民，而道德准则乃是国家精神的化身，背叛自己的职责无异于背叛自己的灵魂。此外，一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即政治制度的理性体现，在军队中也得以完善。国家即军队，军队即国家。因此人们应当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因为国家被提升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军队与职责、尊严与荣誉也随之产生。将士们宁可以身殉国，也不愿背弃、辜负上述责任。这一点在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些成熟民族国家的身上，要比在多民族、多语种的帝国民众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但即使是在奥匈帝国，其核心奥地利人也能感受到这种强大的吸引力。然而，这种吸引力在俄国十分微弱，所以其政权土崩瓦解。

在战争中，死亡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一战”却改变了死亡的规模、速度和概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运用如此高效的手段，造成如此众多人口的死亡，这一事实不仅加剧了战争的惨烈程度，而且让人、国家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大为改变。死亡的数量改变了死亡的性质，让它不再显得那么悲惨。假如每天都有数万人丧生，人们就会习以为常。而现实也的确如此，欧洲人麻木的神经已经不会再为之震动。死亡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大规模屠杀的禁忌随之打破。

欧洲人心甘情愿赴汤蹈火，甚至与敌人同归于尽，因此战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也使许多情况永远地发生了改变。但他们早已疲惫不堪，随着上百万生龙活虎的美军士兵的到来，胜负立即得见分晓。在东线，战争很快结束。由于苏军士兵尚未经历现代化和启蒙运动的洗礼，

所以他们先是顽强抵抗，然后群起哗变，并丝毫没有为此感到羞愧。对他们来说，重返故土远比捍卫国家荣誉更加重要。但在西线，战争一直持续到1918年才结束。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此时只有一个共同点：起初，士兵们如释重负，但随后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

在这场战争中，任何一方都没有如愿以偿。德国未能消除两面作战的威胁，法国也未能肢解德国。战争的后果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先后分崩离析，而此前臣服于这些帝国中的一系列国家，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大清洗”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象征着民族自决权的胜利。那些曾经埋没于多民族、多语言帝国之中的国家，无论是否已经做好准备，都纷纷迎来了独立。但是，在长达几代人的时间里，这些国家没有自行统治的历史，甚至连专制君主也没有出现过，因此要想决定自己的命运，对它们来说殊非易事。波兰在经过数百年的奴役后再次赢得独立，波兰人自始至终拥有同一种语言和宗教，将他们联结在一起。19世纪初，肖邦和其他浪漫主义者重新唤起了波兰人的民族自豪感。

然而，包括爱沙尼亚和罗马尼亚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虽然取得了独立地位，但始终没有弄清其意义何在。更令人费解的是，形形色色的条约制造出了一些奇怪的产物：捷克和斯洛伐克合并为一个国家，而西巴尔干的所有斯拉夫人一起加入了南斯拉夫。后一种决定尤其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其中的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互相憎恨。随着更多国家的出现，欧洲比过去更加拥挤，而这些国家之间充满了糟糕的记忆和宿怨。毫无疑问，西欧的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无论人们曾经如何幻想以这场战争来结束所有战争，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就像法国元帅斐迪南·福煦一样，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观察家们都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束只不过是一份为期20年的停火协议。

欧洲陷入了迷茫。这里的自由民主国家民生凋敝，民众对领导人丧失信心。德国人对战争结果耿耿于怀，对导致他们失败的政权以及他们认为暗地反戈的军队恨之入骨。苏联刚刚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并控制了欧洲大陆。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几乎不亚于战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的欧洲群情激愤、筋疲力尽、满腹怨恨又怅然若失。

所有欧洲国家中，只有刚刚诞生的苏联有着明确的目标：通过工业征服自然，并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社会。苏联人认为，如果能够克服物资匮乏的情况，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平等。但实际上，苏联远未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征服了自然。如果不考虑这一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是对启蒙运动的总结。科学与技术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处境，开辟了通往平等的道路，消除了人们之间的人为差别以及由于出身造成的悬殊状况。

启蒙运动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说，即通过对人类进行理性分析建立起对正义的世俗信仰，从而对世界的运行规则和人们应当如何应对作出前后一致、环环相扣的解释。其世俗性质尤为关键，因为启蒙运动与宗教格格不入，它通过否认上帝让思想家们摆脱了束缚，并按照理性的指引界定正义的概念、分析人类的处境。

此外，意识形态还要做到前后一致。这就是说，它能够解释人类思维的所有方面，从婚姻的本质到艺术的美感，乃至冶炼钢铁的方式。如果你能够制定一套基本原则，并将其毫无例外地运用到所有事物当中，那么一切事物和行动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你的目标越宏伟，逻辑就要越连贯，对原则的应用就要越坚决、越彻底。卡尔·马克思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从未有过任何暴力行为，但他却考虑使用暴力迫使他人接受自己毫不感情用事的思维方式。然而，如果你了解他的生平，你就很难断定，他的内心是否真正理解自己的学说。不过对于他的继承者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对广义和狭义的意识形态都知之甚深，并毫不留情地将其付诸实践，而这在1914年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意识形态导致了另一件大事的发生：革命。启蒙运动热衷条理分明的思想，从而热衷整齐划一的政治，并渴望将其加诸世界各国。自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以来，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将革命视作道义上的当务之急。但上述两场革命，即使是法国大革命，也相对温和。为了建立和完善新政权，革命者不惜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这两场革命爆发时，人们感觉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但他们只是未能预见到接下来即将发生更可怕的事情。

“一战”用革命重新界定了“合理”一词的意义。它消除了革命的界限，使其成为一种无限的运动，并泯灭人们可以想象的伤亡人数的极限。此外，它还削弱了那些有可能遏制大屠杀的机构和习俗，例如教堂和家庭，颠覆了简单的常识。根据传统制度，人们无权支配国界以外的任何事情。然而，战争解开了刚从战地返回的士兵以及知识分子身上的束缚，使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这个世界，而他们的想象无论是从范围还是目标上来看，都是令人惊心动魄的。

在“民众”这一概念上，法西斯主义构建了系统的思想，即把人视作整体而非个体。个体在职责上虽然千差万别，但都有着同样的渴望、幻想和恐惧。人们之所以要建立党和国家，其作用就是带领乌合之众走向人类的未来。莫斯科或纽伦堡群众集会的片段显示出当权者利用民众谋求权力的渴望，彼时人们为幻想所控制，而恐惧似乎就潜藏在咫尺之遥的地方。纳粹党是“一战”中的非常规力量，这支由群众组成的部队可以按照国家意志投入使用、进行布置。他们最渴望的是生存。由于害怕上级、畏惧敌人，他们不得不遵从上级的命令。这个群体能让个人变得更加强大，但首先他们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苏联共产党最初主要来自两个社会阶层，而这两个阶层都是卡尔·马克思未曾料想到的，即暴动后发动革命的士兵和控制革命党的知识分子。战争结束后，苏联士兵返回国内，在工厂和农庄谋生，但戎马生涯对他们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学会了两件事情：一是在面对逆境时训练

有素，二是对死亡甚至大量人员伤亡习以为常。一旦发生革命，这些人随时可以投入战场，在这个准军事化社会中承担自己的职责，甚至坦然面对祖国带来的死亡。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做过这一切。

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诸如列宁等知识分子的手中。他写过一本名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o-Criticism*）的著作，这本书内容艰深，无疑能够使他跻身知识分子之列。启蒙运动将知识分子提升到精神世界的中心，取代了此前神父的位置。既然理性是启蒙运动的核心，那么那些将实践理性视为己任的人们就是启蒙运动的典范，而位于该阶层中心的知识分子则需要面对成为神父的诱惑。如果他的事业位于万事万物的中心，那么由他来统治岂不更好？柏拉图虽然提出过哲学王[(2)]的观点，但他本意并非如此。启蒙运动认为，这种极为激进的观点是可能的，因此知识分子也有可能进行统治，并用理性推导出来的意识形态取代神赐的经文。

列宁等知识分子希望填补战争留下的真空，寻求改造世界的力量，与那些形同散沙、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截然相反。列宁不是漫不经心的大学教授，而是通过逻辑的棱镜不动感情地观察这个世界。他的革命同志托洛茨基写了一本有关波德莱尔的书，而且相当不错。托洛茨基也是红军的缔造者之一，并且发起了苏俄内战。

他们作为一类新型的知识分子，既是思想者，又是行动者。对他们来说，世界仿佛一张帆布，而他们将在上面创造崭新的、更优秀的人类。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此前存在于帆布之上的一切都要被完全抹去。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等思想家来说，由于要恪守逻辑，所以才会毫不留情；感情用事只会使其受到束缚，因此绝对禁止。对全人类的爱要求他们更关注全人类，而非个体。正如列宁所言，如果不打破几个鸡蛋，你就无法做出煎蛋卷来。

启蒙运动的威力强大，而“一战”则让欧洲人为了更伟大的事业对死亡和苦难变得麻木不仁，从而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估计，

约有**900**万人死于苏俄内战。在**1914**年之前，这个数字根本无法想象但是，在**1914**～**1918**年欧洲发生大屠杀后，这个数字不再令人难以置信，甚司空见惯。“一战”让毫无节制的大屠杀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人们不再只是坐而论道，而是为所欲为。他们所做的只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这一切都那样合乎理性，又那么冷漠无情。

革命结束后，就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那些缔造并控制苏共的知识分子经过辩论和争执，谁也无法独揽大权。其中唯一的强势人物当属格鲁吉亚人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后来更名为斯大林。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开始有组织地铲除知识分子，并下令将他们杀害。俄国士兵自1914年起就接受了战火的洗礼，因此对斯大林的响应要远比对沙皇热情。他们相信了斯大林的诺言，认为他们开展屠杀甚至牺牲生命，是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壮丽的未来。

斯大林延续并强化了俄国滥杀无辜的传统。除了屠杀知识分子，为了抢夺粮食，他还不惜杀害农民，随意迁徙那些可能怀有敌意的民族，并对工人阶级和军人危言恫吓。斯大林清楚，假如苏联政权不复存在，共产主义就会消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也许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为了捍卫政权，他发动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大清洗运动，令无数人死于这场运动。

20世纪30年代，苏联面临着另一场战争。如果不能完成工业化，它将在这场战争中一败涂地。粮食既可以让工人填饱肚子，也可以出售谋利，再从西方购买技术，因此极其重要。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兼顾上述目标并养活农民，所以斯大林下令征用粮食，导致大量农民饥饿至死。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既缺乏团结，又不够冷酷，因此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之一，绝非怯懦之辈，但仍然为斯大林对农民的做法感到极为惊骇。按照斯大林的意见，为了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布哈林和其他政见分歧者都遭到处决。

欧洲其他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竟然宽恕了斯大林开展的屠杀，其中

有的人否认发生过类似事件，有的人认为此种恶行不可能出现，还有的人赞同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假如他们亲眼目睹当时的惨状，或者奉命亲手执行杀人任务，他们是否仍作此想，不得而知。逻辑常常只有在置身其外、不殃及自身时才最为有效。然而，尽管斯大林杀人如麻，其中自有其理由。

希特勒上台的理论支撑

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欧洲并非只有苏联血流漂杵。事情的确如此，其原因也许十分简单，因为俄罗斯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它生性凶残。但更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在精神、社会还是经济发展上，在欧洲内陆都堪称首屈一指的德国，也同样陷入了噩梦。德国人与苏联人同时失控，但直到后来德国才挥起屠刀。

在苏联，革命是从士兵的手中夺权的。然而在德国，革命却是由在战壕里出生入死的无名小卒发动的，他们绝非昔日的军界显贵。在“一战”战前，他们本一文不名，而战后，他们仍然一无所获。关于希特勒是如何对德国人的思想产生强大影响的，一直存在颇多争论。最初，希特勒只不过是前线的一名下士，从战场载誉归来，并荣获铁十字勋章。战前的他还一无所有，战后他甚至险些因毒气双目失明。就像不同时代的许多军人一样，他感到自己所作出的牺牲毫无意义，因为有人夺走了他们应得的奖赏。希特勒无法接受，在自己付出一切之后，德国仍输掉了这场战争。他不能容忍牺牲和失败的想法，更何况愚蠢的《凡尔赛和约》不仅从经济上摧毁了德国，还将国家交到由自由派组成的政府手中，而这些人根本毫无执政能力。因此，阿道夫·希特勒及其战友虽然幸免于难，但他们既震惊又怨恨，甚至从许多方面开始怀念过去的军旅生涯。

早在19世纪初，德国出生的犹太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就曾对德国将要发生的事作出了预言：

> 事实将证明，德国革命不会比其他国家的革命更加温和、平缓，因为在此之前产生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和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这些学说致力于发展革命力量，一旦时机成熟，这股力量会破土而出。基督教虽然压制了德国人野蛮的战争热情，但并未将其彻底扑灭。当控制这种热情的法宝十字架被摔成碎片，狂暴斗士将再次横空出世。昔日石雕的神像也将从被人们遗忘的废墟中崛起，抹去数百年来蒙在双眼上的尘土。雷神托尔会带着巨大的铁锤再次出现，将哥特式的教堂砸成碎片。
>
> 不要嘲笑那些告诫你当心康德主义者、费希特主义者和其他哲学家的空想家们。不要嘲笑那些预言现实世界也会像思想领域那样爆发革命的人们在白日做梦。思想先于行动，正如闪电先于雷声。德国的雷声必将合乎德国的真正特征。它不会疾如旋踵，而是较为缓慢地轰隆作响。然而它终将来临，当你听到史无前例的一声巨响，你就会知道，德国的雷电终于落下。

德国的雷电也许是摧毁欧洲的最后一击。正如海涅所言，这最后一击来自一个遍布哲学家和教堂的国度，但是却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响。

对那些经历过战火的人来说，战争让他们饱受精神创伤，但他们仍然经常怀念过去战火纷飞的岁月。在他们的记忆里，战争和军队是一个充满了友谊、归属感、纪律和秩序的地方。战争失败后，他们退伍回国，却发现大家认为正是他们输掉了这场战争。他们不属于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甚至开始怀念往日的战友之情。

在与希特勒同时代的人之中，凡是干练之才无不出身行伍。其中大多数人都对《凡尔赛和约》与魏玛政府感到愤怒和轻蔑，因为该条约让德国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由于德国经济一蹶不振，那些希望通过参军来寻求慰藉和荣誉的人们变得穷困潦倒。然而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双亲也变得一贫如洗。对于穷人来说，即使失去一切，他们的人生也没有

太大改变。但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失去一切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发生巨大转折。为德国战败付出代价的绝不是达官显贵和黑市骗子，而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出生于奥地利的德国人。他曾在“一战”中赴汤蹈火，但负伤回国后却发现，当时的德国对军人不以为然，而其政治中枢也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虽然德国贵族和实业家仍然存在，但就像欧洲其他各国的统治阶层一样，他们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了民众的信任。魏玛共和国自由派既没有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也未能迫使当权者确保德国民众达到最低生活标准，从而同样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在希特勒生活的时代，文化正处于裂变之中，理性化的享乐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军队的准则被弃置不顾。

希特勒不属于学究式的知识分子，而是自学成才，内心对世界有着乖僻的见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但被科班出身的学者斥作怪人。希特勒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具有骇人的力量，就连20世纪登峰造极的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也对其臣服。许多人认为，海德格尔只是投机取巧而已。也许的确如此，但他并非只有这样才能生存。我猜想，海德格尔之所以支持希特勒，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对其感到信服，即使此人的观点缺乏高深的学术分析，甚至很不成熟，但无疑是强有力的。

随着旧体制逐渐丧失权威，德国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左派对这一体制嗤之以鼻，因为正是它们让德国陷入战争；中间派为了生存早已精疲力竭，心灰意冷；右派认为，如果能够复辟君主制和贵族统治，一切就将重回正轨。然而，希特勒重新界定了这个问题。他独辟蹊径，不再谈论体制，而是谈论国家本身。浪漫民族主义依赖于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在这一点上德国与其他国家毫无二致，所以德国并不比任何国家优越。对于已经发生的事，德国感到愤愤不平，因此对这样一个悲观失望、疲惫不堪的国家来说，浪漫民族主义很难再次触动其神经。

希特勒认为，为了复兴德国，他必须重新激发人们的自豪感。因此，他利用文化和血统、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神话，重新界定了德国的统治基础。希特勒辩称，民族存在血统之分，并且这一模糊的概念与遗传有关。同时，他强调血统及其产生的种族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他进一步提出，血统也有高下之分：日耳曼人，尤其是德国人，天生具有独特的才能，因此有权统治世界。此外，希特勒还杜撰了德国历史，不过他并非臆造了神圣罗马帝国或路德宗的历史，而是复活了条顿骑士、德国森林以及传说中的英雄，以便构建起血统和种族的观念。如此一来，历史成为一件人为创造的艺术品，虽然在许多方面纯属虚构，但其中真实的成分引起了德国人的共鸣。格林兄弟将神话视作国家的要素之一，而希特勒将神话和血统视作国家的本质。

血统、种族和神话填补了旧体制瓦解后所产生的真空。纳粹党对筋疲力尽的中间派和孱弱无能的魏玛共和国不屑一顾。他们在巷战中与共产党针锋相对，并将其彻底击垮，正是这些巷战激发了士兵的热情。他们在训练中毁掉了过去的自我形象，然后一点一滴地用德军昔日光荣的传说和对军队、国家的自豪感将其重新建立。其中有一点十分重要，希特勒是以一名军人的身份向同时代的战友发出号召，呼吁他们拿起武器纠正过去的错误，并向他们保证德国人能够征服其他任何种族。德国士兵经历过血与火的锻炼，加之德国将自身与军队视为一体，希特勒的观点和说教引起了广泛共鸣。

同样，希特勒对冷酷无情的号召也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军人在战场厮杀时必须毫无同情心，这是他们出生入死换来的教训，而现在希特勒使其成为一条历史准则。尼采和希特勒都认为，基督教通过向人们灌输仁慈之情，削弱了他们的意志力。希特勒企图消除德国人的这一弱点，用雅利安人的冷酷无情取代基督教的悲悯之心。发动战争不只是一项可供选择的国策，还可以作为考验军队及其强大国力的一种方式。由于憎恨基督教，希特勒反对宗教信仰，并投身于启蒙运动，但其目标与启蒙思想家截然不同，而是为了制造种族歧视。

屠杀600万犹太人的逻辑

在“一战”中，德军向士兵分发了尼采著作的复印件，其中包含有关“超人”的学说和对基督教的攻击思想。此外，尼采还提出了“视界”的观念：所有人都需要一个“视界”，即视觉上的某种幻象，从而将世界缩小到一个易于控制的范围里。启蒙运动创立了人类的概念，但这一概念过于广博，个体很难在其中发现自己。因此，德国士兵需要一种相对较小的概念。希特勒肯定读过尼采的著作，虽然我并不认为尼采会欣赏希特勒，但希特勒无疑对尼采十分钦佩。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就创造了一个“视界”，但正如一切有效的“视界”一样，希特勒忘记它本身便是一种幻觉。这是一种纯粹的虚无主义，因为希特勒毫无信仰，所以他可以不受约束地信奉任何学说。他认为，德国人需要相信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人们不禁要问，席勒和贝多芬的故乡怎么会信仰这类学说？这仅仅因为席勒和贝多芬乃至整个启蒙运动，都无法带领德国走出地缘政治、战争和失败的深渊。

魏玛共和国是启蒙运动的化身。希特勒痛恨魏玛共和国，认为它是失败和无能的象征。法西斯主义正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抗。启蒙运动反对出身论和社会不平等，从而提升个人地位，但希特勒信奉血统、不平等和群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反对科学与技术，尽管他并不反对对其加以利用。因此，他用模糊而未知的神秘主义取代了科学与技术。希特勒清楚，启蒙运动和现代科学赋予了他征服世界的武器，但同时也腐蚀了德国人的灵魂，在潜移默化中令其失去深度，并用物质主义取而代之，而这与有关血统和种族的国家神话格格不入。

对希特勒来说，启蒙运动就像基督教一样，削弱了德国人民的意志，而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向德国军队放暗箭。希特勒试图让德国人相信“种族是人类生活的核心”，但他必须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于是，犹太人不幸首当其冲。犹太人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民族，这不仅因为他们没有祖国，还因为他们在保持自己种族身份的同时混迹于其他国

家。希特勒辩解道，犹太人四海为家，他们所到之处，当地人无不为之蒙受苦难，因为犹太人的策略是利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谋取私利，他们带来灾难的同时聚敛财富。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启蒙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在启蒙运动之前，犹太人一直四处流浪，但这场运动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约翰·洛克等人更是撰写了《论宗教宽容》（*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等著作，以致犹太人在启蒙运动期间盛极一时：斯宾诺莎完成了最杰出的著作；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了最殷实的银行；马克思对享乐主义者的革命进行了最激进的反证。为此，希特勒指责犹太人要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负责，因为他认为两者的源头同为启蒙运动。

希特勒指责犹太人为了一己之私建立起现代世界，但这无疑是强词夺理。事实上，犹太人的确受益于培根、哥白尼和路德等人建立的现代世界。这些人为他们创造了空间，并让他们获益良多。然而，在希特勒炮制的神话中，犹太人绝不仅仅像其他人那样从中受益，他们还是现代世界的缔造者。希特勒指出，正是在这个世界里，德国人遭到犹太人控制的银行、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背地中伤。按照希特勒的逻辑，犹太人成为首席替罪羊：1914年为什么会爆发战争？因为犹太人蓄谋已久；德国为什么会输掉这场战争？因为犹太人削弱了德国人的力量；犹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想要从中谋取私利。

其中许多问题有待回答，但对希特勒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在犹太血统中，哪些因素促使他们作出上述举动？但这不是一篇科技论文，而是一件蛊惑人心的艺术品，因此无法根据逻辑或道理判断是非，而需根据其引人共鸣的方式进行评价。由于这种说法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以至于不需要任何证明或逻辑上的一致性。它只需要成为一件引人入胜、卓有成效的艺术品。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虽然德国人受教育程度极高且精明世故，但仍然对这种说法表示信服。虽然现在看来这荒唐至极，但与当时的德国极为契合。不可否认，希特勒激励了德国人，使其重振旗鼓，同时也为无

穷无尽的恐怖打开了大门。就像其他激进的思想一样，这件艺术品无法忍受任何限制。希特勒为下述观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即德国人天生优越、虽败犹荣，而犹太人即便获胜也仍是次等人种。希特勒企图矫正以往的不公，并根据自己的幻想重建欧洲。因此，席卷欧洲的德国国防军不仅仅是一支军队，而成为了这件艺术品的化身。

这虽然听起来荒谬绝伦，但“二战”既是一起地缘政治事件，也是一件艺术品。跟随德国国防军进入苏联境内、围剿“次等人种”的别动队，正是根据希特勒的构想重新划分欧洲的边界，而希特勒也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名设计师。德国国防军穷兵黩武，正是为了让希特勒这位艺术家开展创作。

欧洲的问题在于，文明的德国人何以堕落至此，沦为一头丑恶的怪兽。其答案是，这头怪兽是欧洲卓越成就、庞大帝国和启蒙运动顺理成章的结果。欧洲霸权建立在欧洲内战之上，而这场内战在“一战”期间达到顶峰。启蒙运动创造了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的科学与技术。此外，启蒙运动的无限性不仅最终削弱了人类对理性的信仰，而且打开了怀疑之门，让人们认为理性本身也不过是一种幻觉。

虽然这头怪兽具有独特的德国形式，但我认为，尽管欧洲的历史取决于“一战”后哪个国家伤亡惨重、实力弱小，但不可避免的是，欧洲必然出现这样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也必然要为自己的“视界”创造一件艺术品，从而恢复元气。我还认为，假如这件艺术品是为了复兴国家而炮制出来的伪历史，那么它就如同一头残酷无情、桀骜不驯的野兽。尽管我的家人在大屠杀中命途多舛，但我始终认为，如果换作其他国家处在德国的位置上，也许就不会出现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的惨剧，但也有可能导致类似的结果，其受害者也许会改变，也许不会。

苏联对历史作出了论断，并有志于对人类进行救赎。为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为了完善自己的国家，德国人不仅驱逐了外国人，甚至还对那些没有祖国和家园、损害了寄居国利益的人进行屠杀。毋庸置疑，

德国人为此也不惜一切代价。骇人听闻的是，为了实现这一神圣的目标，造成的伤亡甚至与“一战”相当，但战争只是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而对于大屠杀，至少在纳粹主义者看来，无论如何都有所收获。

意识形态是冷酷无情的，为了满足其逻辑的要求，它不仅不择手段，而且对此引以为荣。所有意识形态和宗教都概莫能外。我们可以想象，任何一种自以为肩负至高无上使命的宗教都无所不用其极。在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渡过约旦河的希伯来人、基督教徒的十字军东征和穆斯林的圣战。虽然在美国等国家意识形态可能受到常识的约束，但在德国、苏联等国家，某些意识形态却可以肆无忌惮。

“二战”只不过是“一战”的延续、扩大和强化，其模式大同小异。由于地处法国和苏联之间，德国极度缺乏安全感，并首先对法国发动袭击，只不过这一次它是通过阿登森林进入法国。但与“一战”不同的是，法国在6个星期内迅速沦陷。由于英国拒绝与德国媾和，以致德军无法渡过英吉利海峡，所以德国决定先消灭苏联。不曾料想，欧洲大陆广阔的地形吞没了希特勒的军队，而苏联更是以排山倒海的兵力将其碾作齑粉，德军功亏一篑。随后，德国对美国宣战。美国在参战两年多后，横渡英吉利海峡，入侵欧洲内陆。而在此之前，美国还入侵过北非和意大利，但其重要程度显然稍逊一筹。最终，德国被美苏两国击溃并占领。总而言之，这两场大战的起因如出一辙，结果也大同小异，但不可否认，“二战”的伤亡人数远超“一战”。无论是对德国还是对欧洲来说，“二战”更加惨绝人寰。

“一战”基本上限于欧洲，但“二战”无疑是一场全球战争，因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国家都被卷了进来。然而最重要的是，“二战”更加惨烈。谁也无法准确估算，在“二战”中欧洲究竟出现多少亡魂，但较为合理的估计是，约有5 100万人死于种族灭绝、轰炸和常规战斗，其中包括士兵和平民。1939年，包括中立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总人口约为5.5亿。由此，我们可以推算，从1939～1945年的6年间，有近10%的欧洲

人殒命，这一数字不能不令人瞠目。

然而，这还不是最骇人听闻的数据。据统计，在“二战”中，波兰丧失了16%的人口，德国牺牲了10%的国民，而苏联的死亡率则为14%。不仅如此，在欧洲各大半岛和欧洲大陆之间的边缘地带，也就是双方交战的主要场所，伤亡最为惨重，而波罗的海国家、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尤甚。此外，甚至西欧国家也损失了大量人口：法国约为50万，意大利和英国为近50万。

战争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而欧洲强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制造武器的工厂要比任何一种武器都更为致命，而制造武器的工人也要比任何训练有素的士兵更加危险。工业化在变得日趋重要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取灭亡的方式。尤为重要的是，载人轰炸机的问世抹杀了欧洲曾经制定的平民与军人的区别：首先，那些在工厂工作的平民间接参与了战争；其次，轰炸机的精确度极低。英国最初对德国发动空袭时，因是空地遇袭，所以德国人甚至不清楚英国人的轰炸目标究竟是什么。由于轰炸机的投弹精度极低，为了摧毁德国的工厂，盟军必须派遣大批轰炸机投掷大量炸弹，以致许多与战争工业无关的平民也惨遭横祸。战争结束后，德国的城市几乎片瓦无存，仿佛是被蓄意摧毁一般。

然而，最可怕的伤亡还是出自德国人之手。柏拉图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其大意是发动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天性。但毫无疑问，虽然发动战争的方式多种多样，德国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极其残忍的手段。假如血统决定德国人是优等民族，那么他们对劣等民族的所作所为就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波兰战败后遭到了残暴的镇压。与苏联交战时，德国的做法不仅极其残酷，而且毫无必要，这一点不能不令人震惊。乌克兰十分痛恨沙俄的统治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苏联时代，斯大林为了出口粮食以筹集资金，使乌克兰人蒙受了极大的苦难。如此说来，乌克兰人本可成为德国的盟友，但希特勒并不想与劣等的斯拉夫人厮混，并坚信自己打败苏联易如反掌。因此，他对乌克兰人进行了残暴的欺凌。相

比之下，他对法国和北欧国家的占领则较为温和，这种做法显然符合他的思想主张。

纳粹大屠杀的罪恶罄竹难书。总体而言，它没有任何军事目的，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希特勒的其他行为都存在一定的军事理由，但他有组织地屠杀600万犹太人以及数百万其他种族的人口，则不具有任何军事理由。兴建诸如奥斯维辛集中营之类的地方对战争毫无裨益，反而耗费了大量资源，因为即使德国为集中营囚犯分配的粮食微乎其微，也需要占用大量人力、车辆和其他资源。

不难发现，希特勒的观点中存在某种奇怪的逻辑。他认为，犹太人与欧洲各国的关系盘根错节，并且犹太人出于血统和天性而压榨并破坏收容他们的国家，因此他必须将他们从欧洲清除出去。希特勒表示，犹太人不仅引发了“一战”，还发动“二战”以完成前者未竟的目标。此外，他还认为，正是犹太人迫使英法两国因波兰问题而参战，并阻止英国与德国媾和。

希特勒亲手打造了一件艺术品，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件艺术品的力量不在于它的真实无虚，而在于它能够震撼人心。希特勒笃信，自己所说即为真理。他警告世人，假使犹太人在欧洲挑起另一场战争，欧洲人将面临灭顶之灾。他提出，犹太人已经发动了一场战争，为了终止他们的邪恶举动，他必须彻底消除犹太人这一心腹大患。

如果将启蒙运动崇尚的技术和无神论的神话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看似荒谬的结果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正是这些神话让德国人大开杀戒，而工业化让集体屠杀成为可能。在希特勒编造的神话中，所有犹太人都具有相同的种族缺陷，而且对德国和欧洲来说，呱呱坠地的犹太婴儿与正值盛年的犹太成人同样危险。因此，希特勒派出大批爪牙搜捕犹太儿童，并将其送到集中营进行集体屠杀。

战争达到了恐怖的顶峰：在广岛和长崎，逾10万人在顷刻间殒命；在东京，3天的常规轰炸也导致超过10万人丧生。毫无疑问，原子弹让

战争走向了极限。由于工业奠定了战争的基础，而工厂位于城市中，那么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就有必要摧毁这些城市。原子弹能够更加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因此成了一种合理且必要的做法。有人曾经把广岛的惨祸与大屠杀相提并论，但两者截然不同。不管我们是否认同轰炸广岛的军事理由，但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美国没有入侵日本，“二战”就不可能结束，而参战方也将有不计其数的人员死亡。我认可这种观点，但也有一些理性的人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指出，袭击广岛仅具备看似合理的军事意图。

纳粹大屠杀之所以绝无仅有，因为除了匪夷所思的荒谬借口外，它不具备任何合理的军事意图。然而，对于希特勒的血统与种族神话，大多数德国人竟然都表示接受，只有少数人提出了反对。当德国的年轻人追忆历史时，他们为祖父祖母曾经的信仰感到惊骇万分，但老一辈人在当时的确相信了希特勒的说法。其实，在其他时代，也有人相信某个种族、宗教或政治团体会带来危险。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就处死了成百上千的异端，区别只在于，当时尚不具备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技术。归根结底，让大屠杀成为可能的不是希特勒炮制的神话，而是先进的杀人技术。

1913年曾令人闻之色变的事，如今变得不再可怕。1914～1945年的31年间，约有7 100万人在常规战争中死亡，其中，“一战”约为1 600万人，“二战”为5 500万人。如果加上斯大林统治下遇害及饿死的约2 000万人，这一数字将飙升至9 100万，其中还不包括俄国和西班牙内战以及各种各样其他冲突造成的伤亡，例如土耳其独立战争。否则，即使保守估计，这一数字也将高达1亿之多。即使实际死亡人数比这一数字多出或少出100万，也只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纳粹大屠杀让欧洲一蹶不振，但这些死亡数字也预示着欧洲曙光在望。“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军队仍然盘踞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中，其中包括驻扎在英国的美军和散布在欧洲大陆的英军。战后的欧洲满目疮

痍、元气大伤，不仅沦落为被占领土，而且无法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欧洲各国的命运竟然取决于美苏两国军队的驻扎位置，很显然，欧洲霸权已经岌岌可危、大厦将倾。

在这31年间，欧洲的地位一落千丈，从战无不胜的全球中心没落为穷困潦倒、颓唐侘傺之地。1945年，当欧洲从肆虐的暴力中惊醒，并惊异于过去的所作所为时，他们猛然发现，就像昔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整个世界的版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不再是万众瞩目的中心。

---

(1) 西方近代哲学史重要的理性主义者，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

(2) 哲学王即哲学家为王，是柏拉图理想国家的核心内容。根据柏拉图设计的社会政治结构，哲学家垄断城邦全部政治权力，被置于等级结构的顶端，其他各等级则完全被排斥在城邦权力体系之外。

5
霸业成空
从权倾天下到仰人鼻息

曾经权倾天下的欧洲，战后竟出现多达30万的战争新娘？美国的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复苏了欧洲经济，但并未得到欧洲人的感激之情？曾经身为全球霸主的欧洲，战后却丧失主权、沦为任人摆布的角色。随着美苏争霸的局面展开，面对昔日的手下败将与如今的“恩人”，欧洲更是百感交集……

30万“战争新娘”

1945年5月5日，阿道夫·希特勒自杀身亡，从而结束了欧洲的战事，也为31年的风雨飘摇划上了句号。这段长达450年的历史从此宣告终结。然而，欧洲却被美国和苏联占领，主权已不再完整。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欧洲霸权土崩瓦解，其世界影响化为乌有。尽管苏联的全球影响力仍然存在，最终也将灰飞烟灭。转眼之间，曾经烽烟四起的欧洲火药桶偃旗息鼓，只有德国中部还剩下一块潜在的边地和一片一触即发的危险地带。

在1913年，这一切都无法想象。早已支离破碎的欧洲，在这31年间因战乱、危机、虚无缥缈的和平、人为饥荒以及内战变得更加内外交困，民众家贫如洗、食不果腹、流离失所。昔日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佼佼者，如今甚至比其他大部分国家还要拮据，一度权倾天下的欧洲变得如此虚弱无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大英帝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预感到这一切的发生，并在诗篇《曲终人散》（*Recessional*）中告诫世人：

远去了，我们的军舰消隐；
海嵎和沙丘上的烟火低沉；
啊，我们昨天所有的煊赫，
与尼尼微和推罗一同消尽！
万国的审判者，还求饶恕我们，
恐怕我们忘记，恐怕我们忘记！

如果眼前的权力使我们沉醉，
放肆的口舌对你失去敬畏，
像外邦人那样的夸口，
或像没有律法的贱胚——
万军之神啊，还求与我们同在，
恐怕我们忘记，恐怕我们忘记！

欧洲的确不乏鼓唇摇舌之辈，但实际上，即使是那些没有挑拨煽动者（除了丘吉尔早期的一些演说被认为过于狂热）的战胜国也同样是这场战争的失败者。1913～1945年，欧洲的地位迅速式微，其迅疾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在“二战”中，欧洲最非同寻常的一点在于：随着希特勒身亡，过去的一切突然烟消云散。此人苟延残喘之际，德军仍在负隅顽抗，但就在他死后的几个小时或至多几天内，德国的抵抗旋即停止。为了让德国东山再起，希特勒谱写了一段虚构的历史，并用尽毕生的精力深入过去。在他所杜撰的神话中，他的意志即德国本身，而德国本身即他的意志。然而，他命赴黄泉后，德国还只是一个共同使用德语的地区。随着那条将德国与往昔英勇壮举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被切断，德国似乎魔法般冰消

瓦解。这一刻，作为艺术作品和幻想产物的德国也最终寿终正寝。

大英帝国的传奇也曲终人散。它发起的声势浩大的殖民运动及教化落后民族的梦想也随之付诸东流。即使英国没有像德国一样猝然倒地，但无疑气数将尽，既是因为战争摧毁了它曾盛极一时的经济，也是因为它已经意识到自身虽胜尤败、满盘皆输。从1914年起，一连串事件让英国在经济和道义上都耗尽元气，以致到了1945年，人们对英国肩负“白人负担”的信心已经荡然无存，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任也化作泡影。无论丘吉尔的表现曾经多么振奋人心，事实却是，他在战后的大选中遭遇惨败。

美国两次出兵欧洲，严重削弱了英国的实力。虽然美国第一次出兵欧洲时没有驻军英国，但“二战”期间美军在英国驻扎了三年之久。据说，当时的驻英美军“报酬过剩，性欲过剩，赖着不走”，这虽然是句调侃，但并非空穴来风。美国人不仅夺走了英国人的权力，还总是趾高气扬。最令人不快的是，美国人对自身的傲慢态度竟然浑然不觉。他们认为自己拯救了孤立无援的英国，并希望英国知恩图报。但糟糕的是，英国并没有感激涕零。

在“一战”中，法国人虽然浴血奋战了4年之久，但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其战胜国身份名不副实，就连美国人也比他们更有决定权。1940年，法国在6个星期之内迅速沦陷。尽管关于法国人团结一致、英勇抵抗的说法广为流传，但不可否认，法国军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即一败涂地。最终，是美国、英国、波兰和其他国家解放了法国。虽然法国的确存在抵抗力量，但美国充裕的物资和庞大的军队使英国，尤其是法国相形见绌，而且确实是美国帮助他们夺回了主权。法国人继承了查理·马特和拿破仑的血统，马特曾经在图尔大败穆斯林军队，而拿破仑虽败犹荣。然而，在这两场世界大战中，法国并没有赢得任何荣耀。法国人对此心知肚明，并为此耿耿于怀。在诺曼底战役的登陆日，夏尔·戴高乐拒绝向法国民众宣读事先为他准备好的广播稿，似乎有些傲慢、忘恩

负义。因为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在法国战败、被占领和解放后夺回主权，所以感恩无疑是难以忍受的事情。

其他欧洲国家大都处于震惊之中。西班牙仍在佛朗哥的统治之下，力图从内战中复原。虽然墨索里尼的跋扈独裁较希特勒稍逊，但意大利同样元气大伤。波兰接二连三地遭遇悲剧，甚至被迫将主权和边境地区拱手相让给苏联。总之，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国失去了昔日的辉煌，那些企图崭露头角的国家一无所获，而那些仅仅希望国泰民安的国度也大失所望。在过去的31年间，无论是合理的还是荒谬的梦想，全都化作了泡影。

一般来说，战争的结束往往意味着些许希望的来临，至少对某些欧洲国家来说应该如此。然而，随着“二战”结束，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意识到，他们的损失十分惨重，并且许多欧洲人由于贫困潦倒而命悬一线。即使不包括维持庞大帝国、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付出的代价，欧洲国家仅是人员伤亡就难以估量，尤其是有些家族的全部成员都在战争中惨遭横祸，这些人的名字被永远从历史上抹去。诚然，我不会忘记犹太人，但是又有多少德国人在空袭中丧身火海？党卫军又杀害了多少被捕的苏联游击队员？此外，又有多少孩子变成了孤儿？

欧洲整整一代人的余生都处于震惊之中，这31年仿佛是挥之不去的梦魇。我认识一名来自罗兹市的犹太人，他自幼就躲藏在波兰的森林里，受到一个波兰基督教家庭的保护，他的家人全部在战争中丧生。“二战”结束后，他来到了美国，但始终一蹶不振。他经常感到恐惧和自责，每当此时，他就会反复念叨：“一切都没有希望了。”他总是戴着一条领带，而疯狂和悲痛就像那条领带，紧紧地攫住了他的脖子。

我还认识一位妇女，她从孩提时代起就住在汉堡市。当时，英国准备用火焰弹在夜间对德国各大城市发动空袭，而汉堡作为德国最大的港口，自然是英军的袭击目标之一。她的父亲是一名党卫军成员，在参战后一去不返。在危急关头，就像我的姐姐一样，她藏到了地下室，最后

得以死里逃生。我刚认识她时，她出奇地沉默寡言，既不需要也不想要任何东西。在找到毕生的爱人后，她倾尽全力去爱他，甚至与他形影不离。在她看来，由于身心俱疲，她所能给予对方的十分有限，因此不惜倾其所有，但她仍然终生饱受孤独的折磨。

上述两人中一位是犹太人，另一位是党卫军的女儿。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无辜的，而且都很不幸地因为过去31年的苦果备尝艰辛。我认为，德国人因其所作所为罪有攸归，但我无法让她为这些罪恶负责。这就是国家主义的悖论。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永远是无辜的，但她的国家恰恰相反。所谓“国家”，还应当包括这个国家的历史，而不仅仅指仍然健在的人。在我看来，他们两人都是受害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平等的。我对他们颇为熟稔，在认识他们以后，我从未见过他们哭泣。

美国人喜欢使用医学术语描述人体状态。由于恐惧导致的精神障碍被称作“创伤后应激障碍”。毫无疑问，上述两人都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困扰，而且永远无法治愈。实际上，罹患这一病症的人数多达百万，这些人的记忆被悉数抹去，这才是欧洲烽火遍地的真正后果。一个是由于精神失控而丧生的男人，而另一个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的女人，这才是欧洲31年烽火连天的真正代价。欧洲霸权固然很重要，但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对欧洲而言，正是其1913年的骄矜自负导致了1945年的彻底绝望。

战争结束后，生活不得不继续。不同国家民众的生活境况有着天壤之别，而这取决于你身在何方以及被谁征服。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躲过了那31年的劫难，其中包括瑞典、葡萄牙，或许还有爱尔兰。虽然，一些国家损失较少，另一些国家却苦难深重，但欧洲各国无疑都陷入了困境，它们的命运将由各自的占领国决定，尤其是美国和苏联。当然，在31年间，美苏两国的遭遇也截然不同：美国人不仅参战较晚，而且本土没有遭到破坏，苏联人却经历了“一战”、内战、大清洗、大饥荒

和“二战”。战后，美国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而苏联是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之一。因此，对欧洲各国来说，由哪个国家占领就显得极其重要。

美国控制了欧洲最富庶的地区，但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一种艰辛的责任。起初，美国人希望像“一战”结束后那样重返故土。与此同时，苏联人控制了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但毫无疑问，他们认为自己取得了重大进展：首先，他们以沉重的代价赢得了“二战”；其次，他们成功地向西推进了许多。

作为占领国，苏联通常显得残暴。1945年，欧洲各国本已惨不忍睹，但苏联却开始拆卸占领区的工厂，并将其运回国内。不仅如此，苏联士兵还将偷来的手表从海上运回家中。他们对手表极为痴迷，因为对尚不熟悉时间概念的农民来说，手表象征着财富与知识。毋庸置疑，被占领国家的财富让苏联士兵感到心醉神迷。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平生从未见过室内水暖设备，因此认为被占领国家普通市民的住宅极尽奢华。他们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感到嫉妒，从而使被占领者在心理上产生了某种优越感。尽管这些国家被苏联征服，但却受到了占领国的羡慕。这种羡慕的心态以及随后许多年里欧洲的悲惨境遇都真实无虚，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美国的情况大相径庭。美国人把德国的科学家和武器运回国内，因为欧洲的工厂已经不再需要这些。不可否认，就像所有士兵一样，美国士兵也会顺手牵羊，但比起食物，他们更想要的是纪念品。平心而论，美国占领者给予欧洲的比他们从欧洲盗走的要多。欧洲人急需美国的一切，但他们手中几乎没有美国人想要的东西。

即使欧洲已经穷困潦倒，但苏联士兵还是对欧洲的富有惊叹不已。即使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自信，但美国士兵还是对欧洲的文化肃然起敬。“一战”后，美国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对巴黎趋之若鹜，这一点在海明威《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中有着深刻的体现。那些读过或听说过父辈故事的士兵希望故地重游，而且有些人的确到过巴

黎、罗马和佛罗伦萨。

美国人至多是想要在回国前在欧洲各地游览一番。美军对欧洲深感同情，这从他们随手馈赠的礼物中可见一斑。众所周知，他们慷慨地把口香糖、巧克力和食物送给儿童和刚刚结识的人，而不只是女人。这既是因为美国士兵补给充足，也是因为他们对欧洲人不像欧洲人彼此之间充满敌意。一盒午餐肉对美国士兵来说可能不值一提，但对欧洲人来说可能攸关生死，所以他们毫不吝惜。更何况欧洲人对美国士兵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尽管他们心中也不无怨恨。在许多欧洲人看来，美国士兵的富有足以证明，他们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挫折。

苏联军队就像被占领国家的人民一样饥肠辘辘。在波兰和匈牙利，很少有妇女与苏联士兵甚至军官结婚。究其原因，部分在于苏联的禁令，部分在于这种做法无法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然而，许多德国、意大利、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妇女却愿意和美国人结婚。据估计，约有30万欧洲妇女成为“战争新娘”。对女人来说，这是一种寻求解脱的方式；对美国人来说，这充满了异国情调。但对许多欧洲男性来说，这是欧洲女人对男人的背叛以及美国人妄自尊大的体现。无论是对战胜国、被占领国还是昔日的敌国来说，情况莫不如此。

在欧洲人看来，美国人似乎浮华肤浅，但实力强大、科技发达。凡是见过大批美军涌入欧洲领空和街头巷尾的人们都无法对其视而不见，但欧洲人认为，即使是美国军官也不够高雅。在欧洲人的观念中，所谓高雅与阶级有关。就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欧洲人对高雅的定义也不外乎上流社会的言行举止和价值观念。

美国白人是欧洲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正是诗人爱玛·拉扎露丝笔下那些“可怜的垃圾”，其中包括英国的探险家和叛乱者、爱尔兰籍苏格兰农民、饥饿的爱尔兰人、失业的意大利人等。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出生于堪萨斯州的一个穷苦家庭，奥马尔·布拉德利在密苏里州的父母一贫如洗。乔治·巴顿虽然出身豪门，甚至还会写诗，但

是按照欧洲人的标准，他仍然是个粗鄙不堪、缺乏教养的家伙。在欧洲人看来，美国人就是牛仔。他们从美国电影中了解到有关牛仔的事情，但这些电影往往出自生平从未见过牛仔或印第安人的欧洲移民之手。欧洲人还看过德国作家卡尔·麦的西部小说，当时他的著作在欧洲广为流传，但此人仅在美国待了6个星期，而且从未到过美国西部。

欧洲人虚构了一个关于美国人的神话，并且信以为真。在他们眼中，牛仔粗野强悍、脾气暴躁，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总之，欧洲人对世界的看法过于简单，思维方式非黑即白，无法理解那些精妙复杂的东西，而且凡事喜欢诉诸武力。他们自以为十分高雅，认为美国人粗俗不堪。这种观点虽然不无讽刺，但考虑到欧洲的历史，也在情理之中。欧洲即使风雨飘摇，也难以纡尊降贵。无论美国人的实力如何强大，欧洲人对其慷慨之举如何感激，仍然会对他们的粗鄙深信不疑。这无疑是欧洲人的一种防御手段，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手段行之有效。按照欧洲人的观念，美国人固然不够高雅，但美国人也并不希望像欧洲人那样高贵。

人们很容易把美国人与那些简单淳朴的欧洲人混为一谈，但他们已经不再是欧洲人，而是老于世故的美国人。从教育培养到餐桌礼仪，欧洲和美国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与欧洲文化迥异，美国文化以技术为核心。因此，在美国男孩摆弄汽车的时候，出身名门的欧洲男孩正在学习古典文学。欧洲人最多只会把美国人看成一名商人，而美国人则把欧洲人看作屡战屡败的输家。先进的技术和大规模的生产让美国打赢了战争，所以对美国文化来说，一个摆弄汽车的男孩要远比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古典学者更加重要。因此，欧洲人对美国人既充满感激之情，又夹杂着嫉妒、憎恨和轻蔑，而美国人对欧洲人只有傲慢和冷漠。

苏联人强大而危险，但他们的粮食极其匮乏。虽然许多欧洲左派都对斯大林和苏联抱有浪漫的幻想，忽视甚至宽恕了他所开展的大屠杀，但被苏联占领的国家对苏联人却不抱任何幻想。苏联人毫不掩饰自己的

企图，他们与德国人的区别最多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尽管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异常困苦，但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心理关系却毫不复杂，因为被占领者恐惧并蔑视苏联人，因此双方一般相互隔离。总之，美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复杂，其间充斥着矛盾的感情，而苏联人与被占领国之间的关系却简单明了。

超级大国角斗场

与德国人不同，美苏两国都没有试图直接统治被占领国家，而是允许它们保留主权。苏联人虽然故作姿态，但也并不指望别人会相信他们的伪装。他们虽然也会在被占领国家举行选举，但一旦结果像匈牙利选举那样出乎预料，他们就会危言恫吓，并重新举行选举，直到最终如愿以偿。毫无疑问，在苏联看来，它所占领的国家理应维护苏联的战略利益。

美国与欧洲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它有一个极其消极的目的，即不希望欧洲被苏联占领。美国清楚，欧洲的均势已经难以为继，因为自1914年起，强大的德国先后两次打破欧洲的平衡。而现在，苏联取代了德国的位置。假如美国作壁上观，苏联就会出兵征服欧洲其他国家，当地的任何军事力量不足以阻挡他们。此外，苏联还可能通过强大的共产党施加政治影响，削弱其他欧洲国家的力量。“二战”期间，在打击德国的地下战争中，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一股长期存在的力量。

美国绝不能坐视上述情况的发生，因此像“一战”结束后那样完全撤出欧洲的提议很快便销声匿迹。美国清楚，除非异想天开，否则苏联绝不会从东欧撤军，所以美国必须巩固其在西欧的力量。与苏联占领的东欧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占领的国家的意向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想法相互吻合，因为这些国家不希望被苏联征服并建立共产党政府。此时，东西欧之间的边缘地带已经大幅西移。

这些被美国占领的国家无疑清楚，如果美国控制了欧洲，那么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会再把资源浪费在侵略欧洲上。它们也清楚，美国将会帮助该地区从经济上复苏，即使这只是为了巩固美国自身的战略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占区要远比苏占区更精诚团结。因此，这两个区域之间的边缘地带成了新的火药桶，一场核战一触即发。

冷战建立在相互恐惧之上。为了克服这种恐惧，美国人建立起稳固的结盟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其盟国发挥了主要作用，在美国的支持下有效阻止了苏联的扩张。而苏联人的战略主要依靠自身，就像1914年和1939年那样，他们组建起以针对德国为重心的庞大的地面部队。美国最担心的是，苏联会发起突袭，踏出德国范围，席卷英吉利海峡各大港口，从而有效封锁欧洲，并将其纳入自己的麾下。果不其然，这一噩梦变为现实，因为苏联将实现此前任何国家都未能完成的目标，即统一欧洲。欧洲人有可能面临另一场战争，但这一次他们完全无法控制局面。

在经历了大萧条[(1)]和“二战”之后，美国人只希望继续自己平静的生活。虽然美国军队不得不参与欧洲急需的人道主义救援，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对欧洲的重建负有责任。然而，苏联的地缘政治让美国别无选择。无论西方知识分子对约瑟夫·斯大林作何感想，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意志始终控制着苏联，而斯大林控制之下的政权绝不会受到任何人的约束。实际上，苏联人同样别无选择。他们已经将控制权扩展到德国中部。他们需要战略纵深，从而控制并瓜分德国，而德国在过去的31年间曾经两次入侵苏联。然而，随着苏军不断向西推进，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堪一击，因为他们的补给线所穿过的其他国家都对苏联十分仇视，尤其是波兰。

美苏两国分别根据对方可能采取的措施和假定的意图制定了战略。苏联的解决方案是在德国维持大批驻军，以镇压反抗、维持优势地位和抵御美国袭击。对于美国的核力量，苏联人需要某种制衡，但他们尚不具备核武器以及能够向美国发动核打击的轰炸机战队。战争一旦爆发，

欧洲势必成为双方角逐的战场。对苏联人来说，最佳的防御就是迅速出击，占领德国西部、法国和低地国家，形成美国核武器所无法逆转的既成事实。至少这是苏联的设想。

苏联并不希望再发动战争，“二战”已让他们心力交瘁。但他们无法确定美国的意图，但希望自身大规模的军事部署能够吓退美国。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无论苏联人的主观用意何在，实际效果是他们所制造的假象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有能力像德国一样，发动闪电战迅速攻占西欧。对于苏联的威胁，美国不可能无动于衷，否则苏联就有可能占领整个欧亚大陆，从而严重打破美苏均势，危及美国长期以来对海洋的控制权乃至美国的国家安全。1945～1947年，美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再是在战后从欧亚大陆撤退，而是遏制苏联向边缘地带扩张，尤其是在战略要地欧洲与苏联展开对峙。

美国的这一战略产生了两个关键问题。为了保护欧洲免遭苏联入侵，美国需要保卫德国，因此必须控制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港口。此外，美国还需要在英国建立空军基地，这个位置虽然仍位于潜在的作战范围内，但是足以为美军提供攻击预警。为了阻止苏联人派遣海军进入地中海，他们必须确保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安全，并对希腊和土耳其进行严密防守。为了便于在地中海使用海上力量，美国必须将意大利纳入结盟体系，因为西西里岛能够阻挡苏联进入地中海东部，这就像西班牙曾经占领直布罗陀海峡，从而彻底封锁地中海。

冷战于1946年开始初具雏形。由于希腊和土耳其发生共产党起义，再加上苏联大兵压境，美国不得不向这两个国家运送补给，并在暗中提供支持。从地理上看，苏联无法将大批海军开进地中海。这就意味着南欧相对安全，尤其是共产党势力日益壮大的意大利，但美国无法封锁苏伊士运河。一旦土耳其或希腊成为共产党国家，苏联就可以进入地中海，而美国将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战略挑战。因此，1947年，为确保希腊和土耳其的安全，杜鲁门主义宣告出笼。此时，美国断定，苏联已经成

为欧洲的威胁，因此竭尽全力想要封锁苏联。

与此前的31年不同的是，在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并未爆发真枪实弹的战争。火药桶并没有爆炸，美苏之间虽然剑拔弩张，但最终引而未发。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双方均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而且装备精良。战争似乎总是迫在眉睫，甚至不可避免，但美苏之间并未真正爆发热战。这是因为在地缘政治方面，美苏两国不像欧洲那样压力重重，双方都存在转圜的余地。

还有一个原因很少为人所提及。较之于1914年和1939年的欧洲人，美苏两国的政治家更为谨慎。他们亲眼目睹了31年的惨状，并了解核武器的风险，因此格外谨慎，竭力避免擦枪走火。一旦形势恶化，他们就会主动退却。1945年，世界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其中一个标志就是，与欧洲国家以往不计后果的做法不同，新的潜在参战国表现得异常谨慎。

嫌隙渐生

“二战”是一场全面战争。所谓全面战争，即所有社会力量均投入战斗，包括工业、社会和军事力量。当欧洲人征服全球并互相争斗时，全面战争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即使在拿破仑时代，法国也没有动员全社会参战，否则所有人都将处于危险之中。但“二战”的情况截然不同。实际上，全面战争动员从经济上和情感上摧毁了欧洲人的意志，是导致欧洲实力衰微的原因之一。

如今，欧洲人及其国家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行动。但与欧洲国家相比，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幅员更辽阔，机构更庞大。美国和苏联都井然有序，可以开展欧洲国家无法独立开展的行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是一场全面战争，其规模将超过“二战”。正因如此，吉卜林的担忧变成了现实。

在“二战”中，英美两国同仇敌忾，但在一个问题上却判若水火：英

国人参战是为了保卫大不列颠，打败德国人，维护大英帝国；美国虽然也希望保护英国、打败德国人，但对于维护大英帝国毫无兴趣。这一分歧使双方在战略上的冲突日益显露。美国倾向于入侵法国，但英国对此举棋不定。首先，英国人担心重蹈“一战”的血腥覆辙，继而摧毁他们仅剩的少量地面部队。其次，他们尤其看重地中海。对英国来说，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是通往印度的干线，所以保卫这条通道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因此，英国倾向于攻打北非，然后入侵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总之，英美两国的战略方针截然不同：美国希望对德国予以迎头痛击，但英国宁愿通过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发动间接袭击，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并确保对地中海的控制权。

其实，早在参战之前，美国就已经向英国暗示了自己在有关大英帝国问题上的态度。美国的《租借法案》有如下规定：第一，美国向英国出借驱逐舰，以保卫北大西洋的海上通道，打击德国的U型潜艇；第二，英国将其在西半球除了哈利法克斯和新斯科舍以外的所有空军基地租借给美国。事实上，这就意味着英国将其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拱手让给美国，虽然仍然保留了对这些岛屿的正式管理权，但它们现在实际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毫无疑问，在慷慨相助的同时，美国也趁机削弱了大英帝国。

1945年后，欧洲的霸业摇摇欲坠。为了谋求独立，印度拉开了长达数年的抗议运动。在被日本占领后，印度拒绝继续由法国统治。在荷兰统治的东印度群岛，当地民众发起了反抗荷兰的起义。最为突出的是，随着欧洲在东南亚被日本战败，亚洲国家开始抵抗欧洲试图在这些地方恢复殖民统治的行动。越南和马来西亚反对由欧洲继续统治，而印度和中国则希望将欧洲人驱逐出去。这股风潮不止出现在亚洲，阿拉伯世界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同样风起云涌。

尽管冷战让欧洲停滞不动，但在人称“第三世界”的诸多国家，冲突却从未停止。这些国家既不是发达的工业强国，也不是社会主义阵营的

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刚刚获得解放的殖民地，还有一个世纪以前解放的拉丁美洲殖民地。20世纪50～80年代，美苏两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就由谁继承欧洲霸业的问题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斗争，以致许多边缘地带成为两个超级大国斗法的场所，例如朝鲜半岛、越南以及阿富汗。

其中不乏讽刺意味。美国在反抗殖民主义战争中建国，苏联则推翻了沙皇封建专制统治。尽管现在它们仍然打着反帝的旗号，实际上却开始扮演帝国的角色。美国希望救困扶危，使自己免遭苏联的统治和压迫，而苏联也希望救民于水火，使自身免遭美帝国主义的践踏。最终，双方的逻辑及道德使命不再有任何关系。当然，两国都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土耳其到伊朗的欧洲前线已经成为一道铜墙铁壁，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在动荡不安的第三世界决一雌雄。

截至1970年，欧洲霸权已经名存实亡。实际上，在1960年以前，欧洲的大半江山就已经不复存在。显然，欧洲不再是一支全球力量。除苏联以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再称得上是世界大国。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逐渐复苏，尤其是美国占领的欧洲国家。人们开始懂得，欧洲即便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他们仍然可以生存下去，甚至蒸蒸日上。事实上，欧洲人最终得出了结论：他们已经开辟了人类生存的新维度，即在无需冒险和发动战争的前提下走向繁荣。

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尘埃落定，欧洲人恢复了过去的自豪感。他们以为自己已经从31年的浩劫中吸取了足够教训，即不值得为了从权力中获益而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而他们的自豪也正是建立在这些教训的基础上。

此外，欧洲人还相信，无论欧洲如何小国林立，他们都可能完成从前看似不可能的目标，即促进欧洲一体化，形成一个单独的实体，并永远根除欧洲内部的战争。

欧盟旨在完成昔日罗马人、查理曼大帝、拿破仑和希特勒未竟的事业，以建立统一的欧洲。按照欧盟的计划，欧洲人不仅要完成上述目

标，而且不需要再付出血的代价。总而言之，一方面，欧洲放弃了从前的幻想，不再把战争这一极端手段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另一方面，欧洲变得更加激进，梦想着在无需发动战争的前提下实现同一个目标，即欧洲一体化。

---

(1) 大萧条指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首先爆发于美国，随后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和除苏联、蒙古以外的全世界。它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遭遇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最深刻的经济危机。

6
欧洲一体化
美国抗苏的卫星国？

欧洲走投无路之时，美国“雪中送炭”。马歇尔计划旨在复兴欧洲，但却遭到了欧洲各国的质疑。想要不事事唯美国马首是瞻，富有远见的欧洲领导人意识到欧洲必须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然而这意味着国家主权遭遇挑战。从欧贸联到欧共体，再到欧盟，联盟前途未卜，欧洲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别有用心的“橄榄枝”

据记载，1945～1946年冬是欧洲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彼时，欧洲的煤炭极其匮乏，粮食和御寒衣物也奇缺。无家可归的难民在欧洲四处游荡，他们走投无路，处境危险。尤其是在德国等地，许多人忍饥挨饿。饶是如此，这个冬天似乎还是难以熬过。当然，法英等国的情况稍好一些。但毫无疑问，所有欧洲人都面临着可怕的贫困。

这些欧洲国家都建立在旧式的民族国家之上，政府往往是由回国的流亡人士组成。对于比比皆是的人道灾难，他们根本无能为力。东欧各国在苏联的统治下联合了起来，但西欧国家仍是一盘散沙。西欧没有人考虑过统一的问题，他们关注的只是如何生存以及怎样重建国民政府。

美国人不太关心占领的问题。有传言称，战争结束后，美国将立即着手与苏联开展冷战。然而，这一传言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若事实果真如此，美国就不会遣散部队。无论联合国有多么不可靠，富兰克林·

罗斯福也发自内心地信任联合国，况且美国并没有其他战略。虽然美国的确会对重大事件作出反应，但很少主动开展行动。有时，这种反应甚至与其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美国人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改变自己的战略信条，所以，虽然罗斯福已经辞世，但其影响依然存在。

自美军入驻欧洲后，他们举目四望之地都混乱不堪，因此美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义务施以援手。平心而论，如果认真研读当时美国国会以及其他部门的记录，你就会发现，人们确实认为美国在那时应当有所作为。美国的首要援助渠道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而急救物资也被送往除德国以外的欧洲国家。尤其是对德国，美国本可以表现得冷酷无情，但战争结束后，它却将投降的德国人认定为“被缴械的敌军”，而非“战争俘虏”。按照美国的既往政策，战俘与美军的口粮配给相同，但被缴械的敌军却没有任何给养。然而，随着1946年严冬降临，美国意识到，一场人道灾难正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上演，因此开始为德国提供救援。

此时，美国国内出现了两种自相矛盾的愿望，即美国人既希望离开欧洲，又希望伸出援手。虽然美国最终选择了留下，但其中的战略原因并不明显。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极易遭到驳斥，或者被视作美国冷战战略的组成部分，但现实情况却是，这只是斯时斯地美国的选择而已。无论如何，这个决定进一步影响了欧洲人对美国的看法。当然，美国需要付出的代价并非不可忍受，而当时的社会舆论也认为，美国“必须为那些可怜的人们做些什么”。有时候，美国的做法只能被理解为利他主义，但这种看法很快发生了变化。

我还记得，从小到大我经常听父母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当我们一家在维也纳避难时，难民营供应的是美国剩余的奶酪，并且一直供应到1949年。按照父母的说法，这种奶酪的质量不算上乘，颜色已呈深黄。母亲不愿给我喂食这种奶酪，但是家里的其他人都吃过。这无疑是威斯康星州的切达干酪，因为当时美国政府为了帮助奶农销售，购买了大量

干酪，并将其运往欧洲。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无力为难民提供援助，所以，美国向欧洲伸出了援手。多年以后，我的家人仍会谈起这种奶酪。

然而，随着年深日久，美国的慷慨义举演变成了某种战略。1947年，美国越来越清楚，苏联人不仅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东欧，而且企图向西扩张其势力，尤其是在希腊和土耳其。美国认为，这就是苏联的战略，并开始制定计划进行抵抗。此时，西欧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再仅限于是否需要援助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显而易见，如果欧洲经济脆弱，那么就避免不了会发生社会动荡，从而在面对苏联时不堪一击。与此同时，西欧也希望证明，资本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加富有成效，能够为人民提供更高的生活质量。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希望孤军奋战，而是希望将欧洲国家重新武装起来，以共同对抗苏联。为此，欧洲需要增强经济实力，美国也开始进行筹划。

1947年，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次卿威廉·克莱顿向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 如果美国不能迅速提供大力援助，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就会彻底崩溃。这一状况不仅会为世界未来的和平与安全带来可怕的后果，而且会对美国国内经济造成灾难性的直接影响：剩余产品的市场将不复存在；堆积如山的战争债务将会引发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和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等问题。所以，这种情况绝不能出现。

随后，他继续指出：

> 该计划应当建立在类似比、荷、卢三国关税同盟的某种欧洲经济联盟之上。如果欧洲经济继续如今天这般相互防范、各自为营，欧洲就不可能从战争中复兴并重获独立。

克莱顿是马歇尔计划的关键人物，他试图通过向欧洲投入资金并鼓励贸易往来以振兴欧洲经济。该计划正式确立了美国在此前与苏联对峙时的做法，并极大地扩展了规模。同时，该计划也是促进欧洲统一的真正起源。

在美国国会最后批准的马歇尔计划中，还包含以下内容：

> 考虑到美国过去从不存在内部贸易壁垒的大规模国内市场中获益，并且相信欧洲国家也可以同样受益，我们在此宣布，美国人民的政策是：鼓励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通过联合机构开展共同行动……以迅速实现欧洲经济合作，而这对持久的和平与复兴都必不可少。

马歇尔计划既没有试图让欧洲成为美国的翻版，也没有打算制定复杂的管理制度，而是希望建立欧洲自由贸易区以及协调欧洲经济发展的联合机构。自由贸易与合作政策需要的不是某种共同身份，而是某种共同利益。这些就是欧盟建立的思想基础。

欧洲人虽然乐于接受美国提供的援助，但对后者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计划感到忐忑不安，其中英国人尤其心存疑虑。英国曾经在帝国内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并使用统一的货币英镑。1947～1948年，英国政府仍不愿承认，大英帝国已经名存实亡，因为对英国来说，大英帝国仍是其经济体系的基础。由于在这一范围内，英国人可以按照有利自身的利率确定币值，所以他们仍然相信，大英帝国能够渡过难关继续存在。因此，为了维护帝国的地位，他们必须将其他欧洲人排除在外。

几个世纪以来，凭借英吉利海峡的天堑阻隔，英国人一直操纵着欧洲的政治天平，推行大陆均势政策。对英国来说，统一的欧洲大陆是一种威胁，更何况其中还包括法国和德国的部分领土。长期以来，英国始终和德法两国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并在双方之间巧妙斡旋。毋庸置疑，欧洲一体化的想法令他们震惊不已。一想到自己要在单一的经济结构

中，夹在复兴的德法之间左右为难，英国就会本能地退缩。

英国是“二战”的战胜国之一，所以英国人认为自己可以一如既往地享有特殊待遇。他们无法接受大英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的事实，也不肯承认英国的基本政策早已落后于时代。他们固执己见，认为美国有关欧洲一体化的想法既幼稚又危险。然而，考虑到美英之间深厚的盟友关系，他们希望参与马歇尔计划，但又要求该计划必须建立在类似《租借法案》那样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并且要给予英国同等的优先权。由此可知，英国无法接受自身与法德相提并论，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曾在“二战”中一败涂地。

法国同样对经济合作的前景感到担忧，更何况这一体系还将德国纳入其中。在德法两国经历了三次战争后，法国丝毫不愿意看到德国复兴。此外，那些信奉戴高乐主义的人力主恢复法国主权。然而，法国如今已经千疮百孔，尽管它不喜欢马歇尔计划，但急需美国援助。法国人希望保持帝国的辉煌，但也清楚自己不可能单枪匹马使经济复苏。

无论法国对德国的复兴如何畏惧，美国关注的都是依靠欧洲抵御苏联。从地形上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将成为美国防御苏联的堡垒。因此，德国急需人力和军队，以修建防御工事。这就意味着，德国的经济实力将日渐增强。受此影响，1947年，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都认为，战争似乎迫在眉睫。当然，也有人认为，避免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德国建立堡垒。

法国人虽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他们仍为美国重新武装和建设德国的想法感到惊恐不已。这无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此一来，法德之间的火药桶可能一触即发。然而，美国人认为，法德之间的宿怨固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但并非需要顾及的重点。在美国人眼中，如果不能复兴德国，那么它将仍然一蹶不振、不堪一击，欧洲经济复苏便不可能实现。因此，欧洲必须促使德国经济复苏，并完成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的一体化。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诺曼·安吉尔的理论，但

同时也是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想法，即建立某种不仅仅是相互依存，而是某种将德法两国结合起来的正式体系。

法国人不认可这种做法，但也清楚本身所面临的现实。他们意识到，要想发展经济、避免战争，欧洲就必须改变整体结构。因此，无论他们对德国人多么恨之入骨，在这一点上，法国和西德的利益是一致的。从政治上来看，如果法国政府不能在战后减轻贫困，已经在法国政坛上颇有影响的法国共产党就有可能控制政府，从而严重削弱法国防御苏联的能力。

此外，法国人还有两种考虑：首先，因英国选择不加入欧洲一体化组织，法国便自然是欧洲的龙头老大。因此，法国人认为与其勉为其难，不如因势利导。其次，法国人清楚，他们无法独自重新获得主权。更何况，如果法国一意孤行，美国就会利用自身强大的实力，迫使欧洲采取不利于法国的行动。为了抗衡美国，法国需要与其他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对于日趋一体化的欧洲，他们的最佳选择是成为其主导力量，并施加自身的影响，而不是尾随他人或自我孤立。

一旦苏联入侵，美国的战略是由欧洲盟国展开主要战斗。届时，尽管美国将向欧洲部署若干兵力，但主要还是提供增援、空中力量和后勤补给，以及在紧急关头提供核武器。苏联入侵必然向西穿过西德，因此后西德必须被纳入同盟体系，因为该国领土将成为主战场。为了实施这一战略，美国需要成立两个组织：其一是将西欧军队合为一体的军事联盟，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司令部进行指挥；其二是一体化的经济体系。最终，德国也将加入这两个体系。

1947年7月，欧洲各国首脑在巴黎会晤，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然而，该委员会未能满足美国的期待，因为它不是开展欧洲重建的一体化和过渡机构。反之，这只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委员会，一个由独立国家讨论合作计划的论坛。但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令人出乎意料

的是，很快法国便一反常态，转而支持美国的设想，不仅同意与德国合作，而且接受了以马歇尔计划为主导的一体化方案。当英国人继续做着帝国梦，德国人等待着其他国家决定自己的命运，其他欧洲国家墨守战前的不可靠模式时，法国率先转变了态度。

欧盟的成立常常被归功于时任法国总理的罗伯特·舒曼，因为他曾经积极致力于欧洲一体化运动。但不可否认的是，舒曼的后盾是戴高乐，而此人十分清楚3件事情：首先，没有美国以及某种集体防御机制，欧洲将无法抵御苏联的进攻；其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旦成立，德国最终必将复兴，因此法国参与德国的复兴，并与其建立紧密关系，就成为必要之举；其三，他意识到，如果由法国主导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并将德国纳入其轨道，法国就可以利用自身地位主宰欧洲，使其发展成为对抗苏联和制衡美国的有效力量。当然，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必将曲折艰难，随着这一过程逐步展开，戴高乐很可能已经不再当权，但他本人对此了然于心。

戴高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戴高乐主义的力量也不容小觑。舒曼希望欧洲成为美国的翻版，但戴高乐对此毫无兴趣，他关注的是如何利用欧洲达到法国的目的。因此在这一点上，法国人顺理成章地与美国人达成了一致。法国对欧洲未来的模式作出了明确阐释，即在一体化的欧洲，主要国家能够为己所用。这是欧洲历史上一个崭新的阶段，将过去的民族利益置于全新的框架之内，从而平衡了爱国主义和欧洲一体化思想，促使欧洲所有力量在无需放弃国家利益原则的前提下，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法国人在委员会组建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该委员会力量薄弱，其成员国只是迫于美国的压力以及对苏联的恐惧才被捆绑在一起。所以，只有少数成员国对欧洲的未来有所展望，况且这种憧憬传播有限、缺乏活力。相反，狭隘的国家利益、机会主义以及对美国压力的屈从占据了上风。在这个委员会中，穷困潦倒的战败国、日暮途穷的帝国

和企图借结盟增强实力的国家混杂在一起。

最终，美国不断增强的国际实力促使欧洲朝着军事与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发展。除北约以外，欧洲人从未实现过军事一体化。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他们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成就虽然超越了美国设立的框架，但不可否认的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根源并非来自欧洲国家的设想。实际上，欧洲今天所获得的一切正是源于美国的设想和战略，但美国在促进和实现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欧洲人所做的抵制，常常为世人忽略。

戴高乐的欧洲计划——谁将主导欧洲？

欧洲国家最不情愿的一件事就是放弃国家主权，成为某个全面联盟的一部分。当然，也有少数颇有影响的人士梦想在欧洲建立真正的联盟，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将其付诸实践。对国家主权的渴望十分普遍，而英国尤其强烈。英国认为自己赢得了“二战”，因此不应该与其他欧洲国家等量齐观。即使大英帝国已经难以为继，他们仍然不希望过多卷入欧洲事务。英国外交政策的依据是，只有平衡欧洲列强的势力，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同样，英国也将自己视作平衡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

与此同时，法国人虽然在主权问题上的态度同样坚决，但他们比英国人乐于参与更多的欧洲事务。随着欧洲日趋繁荣稳定，“二战”后下野的戴高乐于1958年复出。他很清楚，法国要想拥有真正的权力，就要率领欧洲联合起来，而所谓真正的权力，是指不再依靠美国与苏联打交道，而是独自对付苏联人。戴高乐看到，欧洲已经不再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由于精明老练的欧洲人有效利用了救济资金，如今欧洲经济蒸蒸日上。对欧洲来说，现在的危险是美苏争霸，因为战争与和平不再由欧洲各国决定，而是令出莫斯科与华盛顿。作为法国新任总统，戴高乐希望，以法国为首的欧洲能够收回全部主权。

戴高乐希望将欧洲的两方对峙转变为三方博弈。在这场博弈中，欧洲虽然不会在苏联扩张问题上保持中立，但也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完全依赖美国进行防御。他尤其不希望欧洲被美国人占领。因此，1958年，戴高乐下令所有北约军队离开法国领土。当然，他并没有退出北约组织，而是在数年后率领法国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此后，法国继续与北约开展合作；而一旦爆发战争，法国的参与计划仍然存在。但是，如果真的爆发战争，他已经下定决心，法国和欧洲将自行作出决定，而不是等待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命令。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戴高乐认为，有两件事情必须完成。首先，欧洲需要拥有自己的核计划。鉴于欧洲国家无法齐心协力制定核计划，戴高乐坚持认为，法国应当扩大本国的小型核项目。他表示，在现有战略下，一旦苏联发动常规袭击，要想保住欧洲，唯一的办法就是由美国发动核打击，但他不相信美国会为了欧洲放弃芝加哥。更重要的是，苏联人也不相信美国人会这样做。因此，美国的核保护并不可靠，只有依靠法国自身的核力量才能达到目的，否则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将面临一场浩劫。戴高乐主张，欧洲人必须让苏联人清楚，欧洲很可能会动用核武器。只有这样，苏联人才会三思而行。正如戴高乐所言，法国不需要具备摧毁苏联的能力，而是需要具备壮士断臂的勇气。正因如此，他坚持认为法国应当发展独立的核计划。

其次，戴高乐意识到，欧洲经济一体化极其重要，尤其是法德两国的密切合作。一旦爆发战争，德国必将成为战略要地，其领土需要加强防御。同时，他认为，只要法德两国团结一致，就能保卫整个欧洲，因为它们要远比其他欧洲国家幅员辽阔、实力强大。正因如此，他十分乐意将英国排除在欧洲大陆的政治事务之外，从而给予法国更多操纵的余地。他相信，只要德国与法国联手合作，其他西欧国家将不得不向核心集团靠拢。

戴高乐清楚，法国不具备竞争力强的现代经济，而德国的经济如日

方升。他诚恳地希望德国出现所谓的“经济奇迹”，从而带动法国经济发生转变。经济一体化不仅将增强欧洲的经济实力，减少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而且将形成某种联盟，将欧洲的防御权夺回到欧洲人手中。更何况，这一联盟不一定就是一个过渡性组织。

此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法国将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而欧洲也将跻身世界超级强权之列。鉴于法不责众的观念，德国人受到了宽宥。这一原则是指，德国作为一个整体不应当为纳粹的罪行负责，需要负责的是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个人。尽管如此，德国人仍然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和羞愧。因此，法国人顺理成章地成为欧洲的政治领袖，德国人毫无颜面争夺地缘政治的领导权。其他国家也不可能反对法德联盟，因为这种关系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以欧洲为基础的防御体系。英国人摇摆不定，与美国的关系过于复杂，并热衷于维护本国利益，所以试图从中作梗。按照戴高乐的计划，在“二战”中被打败和占领的法国，最终将东山再起，率领经济繁荣、军事强大的欧洲联盟，捍卫自己的全球利益。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按照戴高乐的计划发展。在东部的危险地带，德国几乎没有部署任何兵力，更何况美国对德国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欧盟。同时，其他小国也不希望成为法德联盟的卫星国，甚至认为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比该联盟更加温和。此外，法国发展缓慢的经济与德国蒸蒸日上的经济存在根本冲突。戴高乐主义信奉者曾经梦想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欧洲，但这一宏图并没有完全实现。

问题的关键在于，戴高乐主义才是欧洲一体化雄心勃勃的真正源头。戴高乐认为，欧洲不应当仅仅是美国的卫星国。自1871年起，民族主义就让欧洲祸起萧墙。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并让欧洲变得更加强大，德国和法国必须建立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广泛的欧洲联盟必须围绕法德联盟这个中枢进行运转。当然，对戴高乐来说，如果没有军事同盟，就无所谓经济联盟或一体化。所以，他希望将北约重新界定为一支欧洲力

量，并逐渐减少美国的驻军。但他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其中也暴露了欧洲潜在的弱点。

理性繁荣——一个欧洲人的联盟

欧洲一体化正式开始于1957年，标志是《罗马条约》的签订。在此之前，欧洲还出现过一些其他类似组织，包括1951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然而毋庸置疑，《罗马条约》涉及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其中蕴含的远大梦想最终促成了欧盟的形成。

该条约将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意大利这6个国家联结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德国与法国建立了密切联系。而比利时、荷兰与卢森堡只不过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边缘地带。

对欧洲人来说，这代表德国与法国达成了谅解。自1871年来，甚至从拿破仑战争以来，双方在边境地区的敌对状态就对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在《罗马条约》中对和平与繁荣作出了承诺，这无疑是向欧盟又迈出的重要一步。欧洲人现在的理想如同他们父辈前往美国时的希望一样：生命安全和谋生的机会。但该条约还有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在欧洲各民族之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盟。

无论是欧共体，还是随后成立的欧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它们承诺给予欧洲人民和平与繁荣，而为了获得和平，各民族之间必须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但是，该条约中并没有对所谓“更加紧密的联盟”作出限制，而每一个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上述提议必然会对各国的独立性造成挑战。然而，如果不能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有着深仇宿怨的法国和德国怎样才能获得和平与繁荣？从一开始，这就成了欧洲无法解决的问题。

欧共体也是冷战的工具。它将法国和德国置于北约之内，让德国位

于前线保卫北欧平原，而使法国位于后方，以便美国的增援部队可以在法国登陆并继续前进。此外，欧共体还将意大利也吸收进来，从而使欧洲的防御变得更加全面。在起草条约的过程中，比起其他国家，意大利的参与度虽然很低，但极为关键，因为它控制着北约的南翼。除了正式表示中立的瑞士与奥地利以外，将意大利纳入欧共体，就意味着在整个欧洲大陆筑起了一条防线。

英国人仍然游离在欧共体之外。他们虽然希望继续控制本国经济，但同样需要自由贸易区。他们担心，欧洲大陆的自由贸易区会缩减对英国的出口量。为此，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发起成立一个类似欧共体的组织，名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简称“欧贸联”），并于1960年正式成立。成员国包括英国、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瑞士、列支敦士登公国和葡萄牙。欧共体和欧贸联的区别十分明显，欧贸联不仅只有英国一个大国，而且它由位于欧洲边缘的国家组成，其中大部分成员国均不在欧洲大陆。长期以来，英国一直担心被卷入欧洲大陆错综复杂的事务中，并渴望通过支配其他国家来掌控本国的经济政策，成立欧贸联正是英国对欧共体作出的回应。

最终，欧贸联功败垂成，其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国对欧贸联的反对以及对欧共体的支持。美国不希望欧洲四分五裂，所以较之于欧贸联，美国更偏爱欧共体的法律体系和贸易政策，尤其是地理布局，因为这更符合美国的利益。总之，欧贸联只是试图在欧共体之外提供另一种选择，但最终不了了之。

实际上，欧贸联的失败标志着英国希望成为欧洲领导者的最后一搏落空。不可否认，大英帝国气数将尽，它缺乏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无法争夺欧洲霸权。此外，随着英国日渐衰微，其集结起来建立自贸区的国家总共只有5 200万人口，而英国的人口为9 400万。尽管英国、丹麦、葡萄牙等国家最终退出欧贸联加入了欧共体以及之后的欧盟，但挪威、冰岛、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公国仍是欧贸联的成员国，足以证明该国

际组织并未消亡。欧贸联的发展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它的成立无疑表明，英国对欧共体不无担忧，而其一贯奉行的原则是不愿过度卷入欧洲大陆事务。然而，这一次，历史站在了不利于英国的一方。让英国始料不及的是，欧共体不断壮大，最终演变为欧盟。

虽然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日趋密切和复杂，但直到1973年，随着英国、丹麦和爱尔兰的加入，欧共体才开始渐渐扩大。其缓慢扩张一直持续到1991年，在增加了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之后，共有12个成员国。欧共体的增长缓慢而谨慎，始终力图确保其成员国自给自足并适合加入。该组织既未向其成员国索取巨额资金，也没有给予它们过多优惠，而是创建了一个稳定的贸易区，以促进经济繁荣和地区和平。无论在政治上、历史上还是地理上，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都错综复杂，而这种复杂性撕裂了欧洲社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共体的雄心也在与日俱增。

1991年，冷战宣告结束，曾经对欧共体发展尤其是在其成立之初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美国，不再显得那样重要。与此同时，欧共体潜在的激进性质暴露无遗。同一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出笼，标志着现代欧洲联盟的框架初具雏形。

马斯特里赫特是荷兰最南端的一座小镇，毗邻比利时边境，位于阿登森林的边缘，而阿登森林是两次世界大战西线战事真正结束的地方。此外，这座小镇还靠近亚琛，即查理曼大帝的加冕之地。马斯特里赫特距离特里尔仅有一小时的车程，后者是康斯坦丁大帝首次定都的地方。这里是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也是诸多欧洲思想的发源地。

同时，马斯特里赫特既是法德之间边境地区的中心区域，还是大多数欧盟主要机构的所在地。欧洲议会的官方地点便坐落于莱茵河畔法国阿尔萨斯省的斯特拉斯堡，而欧盟委员会则位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这里现在虽然安静祥和，但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曾经暗流涌动。如果欧洲想要实现和平与繁荣，一切都要从马斯特里赫特开始。人们毫不怀

疑，这里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欧盟的生命力所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欧盟的诞生，而马斯特里赫特在地理上恰恰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这也并非出于偶然。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俗称《欧洲联盟条约》，是对“在各民族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这一观念的合理扩展。它旨在超越欧洲在经济领域的联盟，走向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合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激进的构想。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它在道义上的目标，即成立一个欧洲人的联盟，而不只是欧洲国家的联盟，从而使欧洲人的身份认同与其国籍同样重要。它希望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某种将欧洲人联合起来的文化现实。该条约为欧洲人提供了欧洲公民的权利和身份，但并不排斥国家公民的权利和身份，力图在保留民族认同的同时克服这一难题。

欧盟距离成功仅有一步之遥。世界各国在提起欧盟时，仿佛其成员国拥有共同的政治身份，而不只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集合体。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欧盟虽然没有废除国籍，却创造了“欧洲性”这一包罗万象的观念，从而使欧洲人开始相信，他们拥有共同的命运。该条约希望把国籍视作处于共同欧洲文化背景之下的某种民族特性。这的确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有意思的是，美国内战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美国人在参战时以州为单位，但认为自己来自同一个经历浴血奋战后共同缔造的国家。但是，这一点在欧洲很难实现，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欧盟并非浴血而生，而是建立在和平与繁荣的思想之上；其次，美国各州之间的差异与那些难以改变的因素无关，譬如语言和文化，而是关系到那些可以通过战争解决的问题，比如取缔奴隶制和改变经济结构。

欧盟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抵制。时任英国首相的约翰·梅杰反对在条约中使用“联邦目标”一词，为此欧洲议会主席将其更改为“联邦使命”，但梅杰仍大为光火。显而易见，英国人无意加入某个联邦，或者某个朝

着这一目标发展的组织。他只准备签署一项能让英国从中获益的条约，而不打算让英国成为统一欧洲的一个州，因为届时欧洲的权力将处于欧洲议会而非英国人的掌控之中。但是，欧洲当时尚不具备从这个民族国家的混合体中缔造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能力。

然而，那些可以直接达成的目标也可以通过复杂的体制来实现。也就是说，这种管理体制越复杂、越难操作和理解，就越难以反对。因此，作为折中方案，欧盟制定了一套极尽复杂的管理体制，不仅设立了轮值主席国，还成立了欧洲议会和法院。但轮值主席国的权力混淆不清，而欧洲议会和法院的权力就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显现。

更为重要的是，欧盟建立了一套决策机制，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决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多数成员国通过即可，所以这种制度并未固定，而是在慎重地发展演化。除此之外，欧盟还建立了一套官僚制度，甚至可以在无需投票的情况下，暗中施行针对全欧洲的方案。由于欧盟尚且没有能力建立某种制度，在保留各国主权的同时确保全体通过，所以只能建立一套极其复杂、难以理解的管理体制，而这一体制只能由行家里手操纵。

来自欧元的主权挑战

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欧元无疑对各国主权形成了挑战。不难发现，这种货币上没有统一的头像。虽然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上都印有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名人，但欧元没有，因为欧洲各国无法就在欧元上印制谁的头像一事达成共识。然而，硬币似乎不太重要，所以各国在欧元硬币的反面印制了不同的头像。在美国货币上，人们一致认为应当印上华盛顿、林肯、杰克逊、富兰克林等美国名人的头像。这是因为美国人拥有共同的历史，但欧洲人没有。不难理解，一个国家不一定会喜爱另一个国家的英雄，正如拿破仑在法国也许声名赫赫，但在西班

牙很可能不受欢迎。

欧元无疑是对国家主权的僭越。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本国货币币值，而使用某国际组织的通用货币就意味着其关键经济决策将处于另一政治实体的控制之下。更何况，这还表示，欧元的对内和对外币值将由欧洲中央银行（简称“欧洲央行”）统一确定，而税收政策、公共开支和其他财政政策由主权国家自行确定。目前，欧盟共有18个国家在使用欧元[(1)]，使用欧元的国家集中于西欧西部，东部的一些国家基本被排除在外。但即使在欧元区内，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状况也天差地别。比如，发达国家作为国际市场上的净债权国，通常希望货币保持稳定，以保护该国贷出款项的价值。而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也许希望货币疲软，从而减少出口成本，或者希望通货膨胀，以减少尚未结清贷款的价值。毫无疑问，货币是操纵经济的重要杠杆，一个国家可以偶尔利用这一杠杆，让市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大规模经济危机中，货币贬值甚至还可以增加出口和稳定经济。

人们很难完全理解，欧盟为什么将欧元区向南部和东部扩展，以及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同意加入欧元区。唯一的解释是，欧洲人具有轻率的乐观主义和欧洲梦。这种乐观主义建立在某种信念之上，即认为欧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消除了经济危机，再也不会面临由谁来承担经济紧缩重任的艰难抉择。此外，还有人认为，加入欧盟和欧元区，就意味着成为了欧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无需放弃本国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成为西欧的一部分，并且拥有西方的价值观、财富和文明。正是出于这种乐观精神，人们对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身份的陷阱视若无睹。如此一来，那些难以度过经济危机的国家开始大声疾呼，要求获得成员国资格，并且得到了批准。

如此众多的国家使用同一种货币，不免会出现一些重大问题。例如，由于德国和希腊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各异的经济问题，拥有不同的税收政策，所以两国需要不同的货币政策。然而，在欧洲央行，

德国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国家，因此欧洲央行是围绕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理念成立的，而该银行的主要目的是对抗通货膨胀。德国的经济规模在欧洲首屈一指，所以对欧洲来说，德国经济健康与否至关重要。相比之下，希腊的经济状况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因此，欧洲央行制定的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向德国倾斜，而不利于希腊的发展。总而言之，只有将上述情况与欧洲所有的变数结合来看，你才能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战”结束后，欧洲的许多梦想都化作泡影，甚至只剩下对安全与繁荣的渴求。启蒙运动的世俗梦想建立在对生活和欢乐的热爱之上，超越了用理性洞察万物的渴望。如今，欧洲人已经对抽象的梦幻感到厌倦。于是，他们砍下了启蒙运动的胳膊，只保留了它的双腿。虽然他们极不情愿，但除此之外，他们又能怎么做？

欧盟的盟歌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歌词出自德国诗人席勒的手笔。席勒在开篇写道：

>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
> 灿烂光芒照大地！
> 我们心中充满热情，
> 来到你的圣殿里！
> 你的力量能使人们,
> 消除一切分歧，
> 在你光辉照耀下，
> 四海之内皆成兄弟。

显而易见，《欢乐颂》中歌颂的欢乐来自“四海之内皆成兄弟”以及人们克服不同习俗所造成的分歧。若事实果真如此，人们的确应当感到欢欣鼓舞。

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意味着人们将同呼吸、共命运。如果和平与繁荣能够让人们齐心协力，那么他们永远不应偏离这一轨道。然而，假

如各国间贫富悬殊，或者有的国家兵荒马乱，有的国家国泰民安，那怎能称为共命运？因此，对欧盟来说，关键在于让命运将所有成员国团结起来，而不是使其彼此分离。当然，只要和平与繁荣长存，就不会产生诸如国籍和命运等棘手的问题。

欧洲向成员国民众承诺，欧盟将会为他们带来更美好的未来。对此，欧洲人深信不疑，但美国人清楚，不仅和平本身不是目的，而且社会也无法保证始终繁荣。在欧洲，有关“更加完善的联盟”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等观念将欧洲人联结为一体。然而，与此截然不同的是，美国按照一套超越一切的原则，联合不同民族共同缔造了国家。不仅如此，它还从未向民众承诺和平与繁荣，它承诺的只是获得和平与繁荣的可能性。

欧盟的问题在于，除一曲《欢乐颂》（即和平与繁荣）以外，欧洲无法为其人民提供其他任何东西。然而，如果欢乐不再，和平与繁荣消逝，接下来的欧盟将何去何从？到那时，什么才能让“四海之内皆成兄弟”，什么才能让欧盟屹立不倒？

---

(1)　2015年1月1日，立陶宛加入欧元区，成为欧元区第19个成员国。

7
从天堂到地狱
欧债危机撕裂欧盟

声称捍卫欧洲安全的北约，在俄军亮剑格鲁吉亚的时候却毫无动静？由次贷危机引爆的欧债危机波及欧盟各主权国家，头号强国德国为何拒绝施以援手？各有打算的欧洲各国，面对如此危机与分歧，昔日同心同德追求的繁荣之梦是否已破碎？

1991年12月，苏联宣布解体。同月，欧洲完成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起草工作。随后，苏联的所有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首次全部摆脱俄国大陆的控制。最重要的是，这些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都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同样，这也是近500年来欧洲第一次缺乏一个真正的全球强国。欧洲本来面积狭小，如今更是小国林立。

不出所料，《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后，欧洲开始迅猛发展。它不仅建立了新的政治框架和更加强大的管理体制，而且开始使用新货币。更加重要的是，欧洲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有人甚至提议像美国那样成立欧洲联邦。在21世纪初，这种想法似乎有可能实现。

为此，欧洲人变得极其乐观。苏联解体后，欧盟以东的国家摆脱了苏联的统治，迫不及待地希望加入欧盟。毫无疑问，欧洲已经进入繁荣时期。此时，尽管欧洲各国间发展并不均衡，但不可否认，所有欧洲国家都兴旺昌盛。由于这些国家不愿放弃掌控自身命运的基本权力，所以它们仍然保留着主权。与此同时，欧洲没有整体的防御或外交政策，严格来说，欧洲的统一只是经济意义上的统一。然而，在欧洲人眼中，这

些似乎并不重要。他们认为欧洲已经不再需要进行防御，而其外交政策就是贸易政策，两者的区别似乎仅限于纸上。此外，他们坚持经济才是重中之重。正如欧盟承诺的那样，现在的欧洲和平而繁荣。

从成立之初到2008年，欧盟如日中天。随后，在短短的6个星期里，欧洲曾经把握十足的所有事情开始化为乌有。当繁荣的景象烟消云散，欧洲陷入一场生存危机中。除了加入欧盟带来的满足感，其成员国不得不陷入痛苦之中，被迫作出牺牲，此时的它们怎样才能同舟共济、患难与共？

俄格战争挑战北约

2008年8月7日，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简称俄格战争）爆发。紧接着，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从表面上看，这两起事件毫不相干，更不会有人将其视为一个时代的终结。然而，与此截然相反，这两起事件不仅至关重要，而且的确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事实上，俄格战争改变了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也绝非无关紧要。此外，战争还打破了欧洲人的幻想，即欧洲国家之间不可能爆发战争，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导致欧盟首次陷入金融恐慌，最终削弱了欧洲的经济体系，打破了欧盟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微妙平衡。总之，这两起事件共同酿成了一场无法解决的危机，动摇了欧洲的和平与繁荣。更重要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活在这两起事件的阴影之中，比如2014年的乌克兰冲突以及欧洲经济增长放缓就与这两起事件息息相关。毋庸置疑，它们对我们整整一代人的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

欧洲存在一个自相矛盾之处。自始至终，它都对民族主义感到惶惶不安。随着苏联的瓦解，欧洲不仅有一些国家重获自由，还有一批新兴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彼时，欧盟在担心民族主义泛滥的同时，也为这些国家感到庆幸，而后者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尚未完全界定清楚。这些新兴国家既没有加入北约，也没有加入欧盟。而大多数东欧国家，

甚至苏联都希望加入北约和欧盟，以保证自身的安全与繁荣，并基于欧洲的价值观建立自由的政治体制。当然，它们也希望保留刚刚获得的主权。一言以蔽之，其中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但这些并没有吓倒欧洲人。

欧盟现有成员国认为，东扩能够确保欧洲和平，既可以封锁俄罗斯并建立牢固的屏障，防止其卷土重来，也可以为俄罗斯以外的欧洲国家带去繁荣与自由。不仅如此，一些人甚至认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将俄罗斯也纳入欧盟。由此可见，欧盟扩张和新兴国家加入欧盟的欲望同样强烈，并且二者都是基于同样的假设，即繁荣意味着和平，而欧盟能够保证繁荣。至于主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也没有人要求作出确切的解答。

欧盟没有制定统一的防御政策。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北约仍然存在。毫无疑问，北约是一个奇怪的组织，因为它过去的目标是对付苏联，而此时苏联已经解体。美国是北约的成员国，其军事实力远超欧洲各国，所以美国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如此一来，美国严重扰乱了北约的秩序，并将该组织分为几派：选择与其合作的国家；拒绝与其结盟的国家；阿富汗战争参战国；伊拉克战争参战国。作为一个国际机构，北约虽然能力十分有限，但仍然囊括了大部分欧洲国家，尽管严格来讲，这些国家并不属于欧洲。

截至2008年，北约和欧盟经历了急剧东扩。它们肩负着一个共同使命：将刚刚获得自由的东欧国家乃至苏联解体之后独立的加盟共和国纳入一体化进程，使其与西欧成为一个整体。这一过程并不仅仅意味着防务和经济上的一体化，还有精神和文化上的一体化。在北约和欧盟的成员国看来，新加入的成员国即将融入世俗的、多民族的与和平的欧洲。而在新加入的成员国看来，它们即将分享欧洲繁荣的经济、和平的环境以及发达的文明。

欧盟与北约极其相似，除了美国没有加入。总体来看，两者最大的

区别在于，土耳其加入了北约，但它并非欧盟成员国。其次，这种差别还存在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除此以外，这两个组织大同小异。随着两者的疆界向东推进，它们全都忽略了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边境地带。俄罗斯被排除在北约与欧盟之外，因此出人意料地重演了昔日的历史。

对俄罗斯来说，20世纪90年代无异于遭遇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灾难。苏联垮台后，俄罗斯经济崩溃，其巨大的影响也不复存在。弗拉基米尔·普京之所以能够掌权，是因为他掌管着苏联少数几个仍在运作的部门之一，即克格勃。该组织曾是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使整个国家得以维系在一起。许多特工曾在20世纪90年代浑水摸鱼，参与了对俄罗斯经济的掠夺，而现在他们不得不保护自己以及和他们沆瀣一气的人们所窃取的东西。截至目前，普京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仍大权在握，而他所建立的政权仍然决定和影响着俄罗斯的方方面面。

普京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承诺，他们将保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虽然俄罗斯的领土已经大为缩减，但人们仍然担心它会进一步分崩离析。普京一面着手稳定经济和社会，一面重建俄罗斯维护其地缘政治利益的实力，从而保住了俄罗斯的边境地区，使已经将波罗的海国家招致麾下的北约和欧盟无法继续东扩。

21世纪初，北约和欧盟东扩的势头不减。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试图在乌克兰建立亲西方政府。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并恢复军事实力，俄罗斯的卧榻之侧就会受到威胁。因此，俄罗斯绝不会坐视不理。美国开始支持乌克兰境内那些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看来支持民主的政治团体，但俄罗斯却认为，美国妄图在基辅扶植反俄政府，为瓦解俄罗斯联邦进行铺垫。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1)]，最终掌权的恰恰是美欧看好的政府。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改变了俄罗斯对美国和欧洲的看法。革命爆发时，美国正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沼，而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仍

十分疲弱。俄罗斯需要传达一条信息，但这条信息与其说是针对美国，不如说是针对乌克兰和其他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最终，俄罗斯选择在格鲁吉亚传达信息，而该国是美国在高加索地区的盟国。战争的形势十分复杂，俄罗斯的表现也不尽人意，但它并不需要面面俱到。俄罗斯的表现足以达到目的，因为它打败了格鲁吉亚，清楚地将自己的意图传达了出去。

对此，乌克兰和苏联的卫星国心领神会。格鲁吉亚向北约寻求支援，但徒劳而返。此时，北约早已形同虚设，但还没有人会向其发出挑战，所以尽管该组织十分虚弱，人们对此却视而不见。欧洲统一的前提是：欧盟应对经济问题，北约应对安全问题。然而，当俄罗斯对北约发出挑战，并且没有国家对格鲁吉亚进行支援时，这一前提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诚然，格鲁吉亚不是北约国家，但美国和北约的主要盟国英国一直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展开角逐，并且对格鲁吉亚表示支持。不可否认，北约的缺陷已经暴露无遗。总之，上述因素共同导致了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出现。

北约的新成员国一直以为，俄罗斯绝不敢挑战北约或者北约主要成员国的利益，但格鲁吉亚事件无疑给了它们当头一棒。虽然在法国的斡旋下，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达成停火协议，但俄罗斯悍然违反该协议，只是为了表明它完全可以对北约国家置之不理。对此，北约没有作出任何回应，这无疑让刚刚加入该组织的国家感到更加震惊。曾经，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俄罗斯已经支离破碎，所以它不愿再承担任何风险。然而，在2008年8月，这一设想以及北约能够有效御敌的假设全都不攻自破。出人意料的是，格鲁吉亚事件固然令人深受打击，但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

俄格战争暴露了北约的无能，改变了苏联地区的战略动态，对西方国家形成了长期挑战。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对欧洲各国的生活方式和欧洲一体化的意义产生了直接影响。总之，这两次打击结束了后冷战

时代，将所有国家带入了新的未知之境。2008年9月15日，由于无法兑现债务，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导致全球金融系统陷入了混乱。

次贷危机持续发酵

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原本十分保险的投资也会具有极大的风险。自“二战”结束以来，住房价格持续攀升。美国人认为，这种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因此购买住房成为一种增值方式。此外，他们还认为，向购房者贷款是一种毫无风险的投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抵押借贷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借方向银行贷款，然后进行偿还。银行有责任确保借方有能力偿还贷款，或者以住房作为抵押。但这一制度不断演变，最终银行家不再从贷款中营利，而是通过交易本身赚钱。借方拿到贷款后，再将其出售给其他机构。由于交易一旦达成，贷方、抵押经纪商和所有相关人员都可以从中大赚一笔，所以他们从不担心，借方是否能够偿还贷款。这种模式下，借出的贷款越多，各方营利就越多。既然他们不需要担心借方是否能够偿还贷款，他们就会希望尽可能多地发放贷款，而不去考虑信用度和期限等问题。最终，贷方和经纪商放出了所有贷款，导致5年期房产抵押贷款不仅低于房产的价值，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利息。这样一来，购买者也被拖入市场，房价随之飞涨。

这些贷款被廉价捆绑出售给保守的大型投资机构。没有人认真调查其中到底捆绑了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里不存在任何风险。由于金融机构可以从每笔交易中获利，他们发明了利用抵押贷款赚钱的新途径，但这种方法过于复杂，几乎没有人能够弄清。既然所有人都认为房价持续看涨，那么其中就不存在任何风险。由于其中没有风险，投资银行家和养老基金也开始买卖这些贷款。因此，那些本来买不起房子的人们得到了房屋贷款，而投资者完全不清楚其中的风险，只是盲目地坐等财源滚滚来。

然而，2008年9月15日，3件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首先，房价下跌；其次，对于分期付款中最后一笔大金额付款，大批不合格买家面临着拖欠的风险；第三，人们突然意识到，他们对抵押贷款的价值一无所知。大型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虽然掌握着一大批此类文件，但无法再凭它们借入贷款进行短期交易。由于政府拒绝斥资帮助雷曼兄弟公司走出困境，该公司只能宣告破产。由于雷曼兄弟公司没有偿还任何债务，这一事件迅速波及外界。随后，没有人继续贷款，而许多人不得不拖欠还款。

很久以前，荷兰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1637年，郁金香球茎的价格持续上涨。人们开始在郁金香球茎交易所进行交易，其售价甚至达到了天文数字。人们痴迷于购买郁金香球茎，由于它的价格居高不下，以致许多人一夜暴富。因此，几乎所有人都相信，郁金香球茎的价格只会看涨。最终，有些人的确大发横财，但更多的人却因郁金香球茎价格猛跌而倾家荡产。所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崩溃的事古已有之。

当然，美国也有过同样的前车之鉴。“二战”结束之后，这是美国第4次某种“稳赚不赔”的资产价格猛跌，并引发了金融危机。20世纪70年代，州、市两级出售的地方政府债券面临着拖欠债款的危机。然而，在这之前，人们一度以为，政府绝不会拖欠债款。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发生了债务危机。随着能源和矿物的价格飞涨，大量资金涌入发展中国家，资助当地政府和商人进行资源开发。投资者认为，他们不可能亏本，因为价格只涨不跌。但事实却截然相反，最终他们纷纷破产，第三世界开始拖欠债款。此外，80年代还发生过一次储蓄和贷款危机，主要归因于银行允许向商业房地产投资。同样，投资者们以为这是一桩万无一失的买卖，谁料市场崩溃，银行随之破产。

美国联邦政府一向以同样的方式应对此类危机，即印制钞票，为银行提供资金。虽然这是一种痛苦、混乱而又无能的做法，但效果的确显著。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之际，美国已经建立起应对此类危机的模式，

即政府和联邦储备银行同舟共济。尽管每一场危机都各不相同，并且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政府可以从政治上和技术上按照路线图进行操作。金融危机是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出现的危机，因此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召集大型投资银行的总裁，共同制定了解决方案。这一方案的优势在于美联储能够应对金融问题，而政府部门也会从政治上予以配合。于是，所有人都开始朝着混乱的方向前进。

欧债危机引爆

欧洲国家也发生了房地产危机，因为它们也买进了美国捆绑销售的抵押贷款。然而，它们没有现成的路线图。事实上，欧盟还从未遭遇过程度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截至此时，欧洲央行成立不足10年，其政策涉及多国政府，决策程序缓慢而复杂。更何况，欧盟要服务于众多主权国家，这些国家的利益千差万别。这一点是不争的政治现实。

欧盟并没有囊括所有欧洲国家，其成员国也并非都在使用欧元。即便使用欧元的国家，就像希腊与德国那样，各国间的情况也存在着天壤之别。由于欧盟没有足够的管理权限，所以它不可能制定统一的方案，这暴露了欧盟的自相矛盾之处。欧盟的成员国都保留了基本职权，而欧盟控制着欧洲央行，或者说至少某些国家可以对欧洲央行产生影响。这些国家不愿将主权拱手让给欧盟。这就意味着，主权国家虽然具有足够的权限，但它们不能代表整个欧洲的利益，而那些能够代表欧洲利益的机构，却没有任何实权。

欧盟的核心是法德关系，但这两个国家不再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德国的经济要远比欧洲其他国家强大，而欧盟主要致力于经济问题，所以德国自然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法国不仅落在德国后面，其内部分歧也让法国人很难齐心协力。德国虽然拥有欧洲最大的话语权，但德国总理并不代表欧洲，德国的利益也不等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利益。

目前，德国的出口量相当于其GDP的35%～40%。无疑，这一比重很大。相比之下，美国的出口量仅相当于其GDP不足10%，而中国的出口量约占其GDP的30%。尽管一些小国的出口率超出了德国，但其他所有大国的出口率都低于德国。德国是一个极其高效的生产国，但经济状况极其依赖进口国，因为德国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消费能力。如果商品无法出口，或者进口国不能或不愿购买其产品，德国就会面临经济危机。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欧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德国出口的一半商品都是在欧盟自由贸易区销售的。对德国来说，自贸区让经济繁荣成为可能。无论德国的生产效率有多高，如果市场受到关税保护，那么德国就无法维持国内的经济水平，失业率随之攀升。因此，德国比其他出口依赖程度较低的成员国更需要欧盟。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后贷款人，但它对欧盟政策的影响与其地位极不相称，因为它只能影响欧洲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以迎合自身的需求。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欧洲后，德国人不希望为银行系统提供过度担保。彼时，德国的国内形势良好，问题出在其他国家。但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是其他国家的选民选出的，她需要对她的选民作出回应，而选民不一定清楚，他们的福利和工作有赖于欧洲其他国家购买德国产品的能力。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欧洲其他国家的问题源于它们的懒惰和放纵。但在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些人看来，问题出在德国身上，因为该国操纵欧盟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正是欧洲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导致德国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

由此，抵押贷款问题演变成为主权国家的债务危机。为此，这些国家不得不实行经济紧缩政策，以稳定金融系统，从而导致欧洲经济增长减缓。然而，削减公共开支则意味着减少政府雇员和政府采购，从而进一步放缓经济发展速度。由于税收下滑，一些欧洲国家政府难以偿还债务，从而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欧洲银行购买了大量欧洲债券，认为这

是稳赚不赔的投资，所以如果希腊或西班牙等国拖欠偿还贷款，银行就会破产，并将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崩溃。

上述情况有三种解决办法：其一，由欧洲富有的国家，尤其是德国，为希腊和其他南欧债务国偿清贷款；另一种极端的做法是，希腊大幅削减政府开支，以偿还贷款；第三，由银行承担贷款以及其他呆账的费用。但欧洲不会考虑第三种办法，因为如果由欧洲银行为自己的过失买单，它们就会遭受严重损失，甚至彻底破产。德国倾向于第2种方案，而希腊倾向于第1种。最终，各方达成妥协：银行免除希腊的部分债务，其他大部分债务由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偿还，希腊也将削减开支，实行经济紧缩政策。

这似乎公平合理。但希腊削减政府开支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正如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希腊的许多经济活动都由国家经营，包括医药和其他必不可少的服务业。希腊的医生和其他医疗保健从业人员都是政府雇员。因此，希腊政府削减公共领域开支和裁减政府雇员严重影响了本国的专业人员和中产阶级。

在随后几年中，希腊的失业率一度高达25%，甚至超过了美国在大萧条期间的失业率。但是，也有人认为，希腊的黑市经济弥补了这一差距，情况也许没有那样糟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的确是事实，但黑市经济的规模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庞大，它只不过是其他经济行业的一种延伸，更何况当时希腊国内的各行各业都很不景气。事实上，希腊的情况比表面上更加严重，许多政府员工虽然没有被裁减，但大幅降薪，其中许多人的薪酬甚至减少了三分之二。

西班牙重蹈了希腊的覆辙，接着还有葡萄牙、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南部，只不过后者的情况稍好于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在加入欧盟时，期望入盟后能够提高生活水平，向北欧国家看齐。但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却对它们造成重创，因为在自由贸易区内，该地区的经济并没有按照预期发展。因此，第一场经济危机就摧毁了它们。

这场危机让欧洲产生了严重分裂。《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后看似前途光明的一体化遭遇了首次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打破了来之不易的欧洲统一。符合德国利益的事情不见得符合西班牙的，反之亦然。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德国问题”，因为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出口国，并坚决主张经济紧缩是解决欧洲问题的唯一出路。然而，德国不需要承担经济紧缩的负担，这一负担将不同程度地由地中海国家担负。

然而，这种做法可能产生的影响将比金融危机更加深远，因为这意味着要打破欧盟基本的社会契约：首先，欧盟对繁荣的承诺以及人们对成为欧盟成员国后的期望悉数破灭；其次，此前任何关于同呼吸共命运的观念都烟消云散。希腊和奥地利发生的事情就像两种极端，它们的情况截然不同。无论是对所有欧洲国家还是对所有家庭来说，欧盟当初所做出的或明确或隐含的承诺，都已经不复存在。

我们不妨设想，一个在家中负责养家糊口的男人是一名年逾不惑的专业人员，他拥有一处住宅、几部汽车和一栋很小的避暑别墅。他偶尔会去度假，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突然之间，这个人失去了工作，无法偿还房屋贷款和汽车贷款，甚至不得不搬进狭小的公寓，靠微薄的薪水挣扎着继续生活。假如他还有几个孩子，那么他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计划和对未来的憧憬都会消失不见。人们虽然尚未完全理解，但已经感觉到，这个问题不会迅速解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全球大萧条是通过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解决的，而人们花了10～15年的时间应对这一难题。也许，这个45岁的男人不会意识到，他的余生都将生活在赤贫之中。

穷人本就一贫如洗，很难变得更加贫穷，即使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其境况也不会有太大改变，因为他们对生活本来就没有多少期望。但是，对一名四五十岁的专业人员来说，突如其来的危机会深刻地改变他对自我的认知。他不仅丧失了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也迷失了自我。假如他不再是一名律师、一位医生或一名店主，他又是什么人？当

中产阶级莫名其妙地沦为失业的穷人，而且更为糟糕的是，这一变化似乎永无转机，政治动荡就会随之出现。

因此，他需要对此作出某种解释，而这个世界似乎总是难以理解，他只能编造理由，或者接受那些声称找到问题答案并且能够匡时济世的人们的说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全球陷入萧条时，罗斯福表示，除了恐惧本身，我们不需要惧怕任何事情。这不只是危言耸听，因为罗斯福清楚，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而这场灾难才刚刚开始。如果不能作出明确的解释或给出合适的理由，民众就会感到恐惧，并渴望了解事情的真相。然而，欧洲央行的解释既让人难以理解，又毫无说服力。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大萧条，有些人的解释是，它源于资本主义的贪婪或者犹太人的本性。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没有人作出明确的解释，哪怕是错误的解释。在这个难以理解的世界里，人们急于接受任何能够被理解的解释，即使这一解释荒谬不堪。

在希腊和西班牙，25岁以下人口的失业率徘徊在50%至60%之间。这意味着这两个国家中半数以上的年轻人没有工作，或者没有希望找到工作。相比之下，法国的情况要好得多，在25岁以下的人口中，只有25%的人没有工作。失业的年轻人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很容易成为窃贼，或者被吸引到极端组织中去。他们本身缺乏形成政治威胁的力量，但是与那些遭受重创、年长一些的中产阶级结合起来，两者就会具备危及现状的智慧和能量。

在当前的危机中，有两件事情遏制了这股势头。首先，人们仍然相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技术上的失误，而不是严重的体制故障。如果他们耐心等待，总有一天噩梦会成为过去。欧洲人笃信精英政治，即当局清楚他们在做什么。虽然其中经常夹杂着怀疑，但从总体来看，人们仍然没有丧失信心，并且愿意耐心等待。

其次，一些管理欧盟的技术官僚认为，局势已经在2010年得到控制，并将很快完全处于掌控之中。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已经得到解

决，因为银行已经具备偿还能力且相对稳定，而金融系统仍在运行。这些技术官僚极度缺乏同情心，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过去的欧洲贵族。技术官僚并不真正理解失业的重大意义，而是过分沉迷于金融体系的健康。奇怪的是，这种看法反而有助于稳定政府部门对金融体系所作的回应。当权者的自信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想法，他们认为，当权者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经济紧缩使复苏成为可能。要想经济正常运行，就需要基础建设和相关机构。假设政府希望出资修建桥梁，除了技术和工人以外，还需要对该国国有或私营建筑企业进行管理。然而，在遭受经济危机重创的国家，建筑公司被迫停业。其建设能力大为降低，至于倒闭是由于预算削减还是破产，几乎没有任何差别。通常情况下，经济低迷的应对办法是刺激经济发展，即通过建立项目、进行拨款或削减税收向新的需求项目注入资金。但是，如果经济遭受重创，导致某些关键领域甚至整个生产系统不复存在，那么任何刺激都无济于事。

欧洲爆发的危机缘于德国重新获得了欧洲大陆的领先地位。作为最后贷款人，对于如何处理这场危机，德国具有决定权。尽管刺激经济的做法可能奏效，但德国表示反对。它希望保留本国资源，以应对国内失业可能引起的问题。统一后的德国和奥地利是欧洲失业率最低的国家，因此它们当然希望继续维持这一状态。

同时，法德之间冲突不断。由于失业率较高，法国希望制定一揽子刺激计划，但遭到了德国的反对。在1947年，最坏的可能就是：德国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法德联盟从此破裂。但这不一定意味着爆发战争，因为德国不希望发动战争，甚至也无意占领欧洲。但无论德国作何想法，它都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因此法德之间的摩擦十分强烈。欧洲共有4个区域：德奥地区、北欧、南欧和东欧。每个区域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在每个联盟内部，不同国家之间也会产生冲突。

欧盟仍然存在，但没有人为其代言。每个国家都在算计自己的利

益，并与其他国家形成了独立于欧盟之外的各种联盟。此时，欧盟已经无法再作出重要决定，而是由各国领导人根据各自的国家利益进行选择。欧洲又回到了民族国家时代。事实上，1992年之后，欧洲出现了更多民族国家，它们比从前更加珍惜本国主权。这场危机复活了人们心头的怀疑和恐惧，而这种情绪在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为严重。但是它们都清楚，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禁开始怀疑，无论欧盟如何发展，也不可能解决自身的问题。

在此，我们需要提出如下问题：欧洲是否可能重返过去的状态？如果欧盟不复存在，或者像联合国那样由于相互抵触而陷入瘫痪，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东欧国家对北约丧失信心，认为有必要与日渐崛起的俄罗斯媾和，情况又会如何？在2008年以前，这些都是异想天开的问题。

边境海关或将重启？

有人表示，欧洲国家早在1945年就认识到，民族主义摧毁了欧洲，因此欧洲人绝不会重蹈覆辙。同时，也有人认为，欧洲已经筋疲力尽，不再相信任何事情，所以不可能发生冲突。也许事实的确如此。但不可否认，德国重新成为欧洲大陆头号强国，并招致了诸多怨恨，俄罗斯也正竭力让欧洲大陆重回自己的怀抱。这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不久之前。

时光荏苒，民族主义情绪的热度不断衰减，但并未消失，而且有可能被重新点燃。对于那些被剥夺了意识形态、不得不割地求和的国家来说，恐惧和仇恨依然存在。你可以跟一名波兰人坐下来，谈谈他的家人在德国和苏联占领时期的经历，或者同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聊聊，听听他们对英国长篇大论的谴责。你也可以问问波斯尼亚人，他们对塞尔维亚人怎么看。了解这些后，你就不会再认为，民族仇恨在欧洲已经烟消云散。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甚至比现在更加真切，并且这些记忆会再次

浮现。它们虽然不像过去那样充满敌意，但其影响力是巨大的。

欧洲人的情感与美国人不尽相同。美国人痴迷于未来，过去的经历似乎微不足道。正因如此，在美国内战爆发地弗吉尼亚州的马纳萨斯，如今建起了一座大型购物中心。美国人不会遗忘历史，但在回首往事时，他们不像欧洲人那样充满悲痛或自豪。自1945年以来，欧洲人试图集体失忆。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里行之有效，但世易时移，往日的记忆正再次浮现。

这一点在边境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边境地区，是指各国交汇融合的地方，它是一个地区，而非一条界限。欧洲有许多边地，而欧盟试图使其成为过去，仿佛国家之间的差异已经被抹平。但是，在昔日的边境地区，老式的简易海关仍然存在，很容易勾起人们对往事的怀念，而重新启用它们也并非难事。在欧洲，随着德国实力的急剧增长，尤其是出口量的激增，多久以后人们会重新启用过去的海关？无论是在欧盟以内还是以外，在各国之间的边境地区，譬如斯洛伐克与乌克兰，情况又将发生哪些变化？

2011年9月的一天，我穿越了斯洛伐克与乌克兰的边境。从乌克兰方面过境需要好几个小时。对进入欧盟的乌克兰人，斯洛伐克的卫兵显得格外警惕，态度就像冷战时期一样生硬。由于过境处没有洗手间，人们往往急不择路。我走到附近一座出售黑方威士忌的楼前，那是一家国营商店，里面也没有洗手间。于是，我只得绕到楼后。事有凑巧，一名女性卫兵立即跑了过来，制止我作出这种有损乌克兰尊严的举动。我挥了挥手中的美国护照。她顿时安静下来，然后转身离开。我感觉就像回到了1975年，一本美国护照要么害你遭到拘留，要么为你带来皇室般的礼遇。

等待过境的人们操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其中一群匈牙利人正站在汽车旁边剥花生吃。他们边吃边把花生壳丢在地上。刚才那名卫兵立即冲上前来大声呵斥，好像是在喝令他们捡起花生壳。显然，双方存在某种

恩怨，但我不清楚是为什么。那群匈牙利人会讲乌克兰语，而乌克兰人也会讲匈牙利语。一些罗马尼亚人也过来凑热闹，而且明显能够听懂双方的语言。于是，我用匈牙利语向那群匈牙利人打听情况。这才得知，他们把货物装在汽车的后备箱里，定期从欧盟向乌克兰运送。他们已经“做好了安排”，但我怀疑，那名边检人员十分清楚他们的身份，所以才会因花生壳大发雷霆。

　　这些人显然互相认识，并且听得懂彼此的语言。他们仿佛故意对边界视而不见，其中自有缘由，但不只是私人恩怨，而是更加深刻的历史原因。这里混杂着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人，一旦机缘凑巧或者出于某种需要，就会发生爆炸性事件。过去并非没有先例。几个世纪以来，这段历史就蛰伏在那里，但并没有消失。

　　边地的消失需要很长时间，这是欧盟潜在的问题。人们可以试图遗忘、假装忘记，甚至原谅过去，但记忆、恐惧和仇恨并没有销声匿迹。每逢时局艰难，这些记忆就会与恐惧和仇恨一同浮现，而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并不鲜见。欧洲人认为，他们不会重蹈覆辙。他们试图忘记南斯拉夫和高加索发生的事情，并且对乌克兰视而不见，但这一切早已积重难返。

---

(1) 橙色革命，又名栗子花革命，是指2004～2005年因乌克兰总统大选中各种舞弊行为而导致的一系列抗议和政治事件。

第三部分

一触即发

FLASHPOINTS

The Emerging Crisis in Europe



8

巴尔干与高加索
永不磨灭的宿怨

欧盟的成立会使欧洲人获得期盼已久的和平吗？事实上，欧盟成立之际，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发生了两场欧洲大战。而自欧盟成立之后，欧洲爆发战争的次数甚至比1945～1992年更加频繁。最终，我们不得不认为，欧洲的战争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与欧盟的崛起而结束。

南斯拉夫内战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起草、签署和实施旨在使欧洲迎来一个和平时代。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欧盟成立之际，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发生了两场局部战争：波黑战争以及车臣战争。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冲突中，约有25万人丧生；而在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兵戎相见，导致11.5万人遇难，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尽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没有引发这些战争，参战的各方也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欧盟成立之际也是战争爆发之时，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实际上，在欧盟成立之后，欧洲爆发的局部战争甚至比1945～1992年更加频繁。

许多欧洲人有意回避这一现实。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只是个例，无法反映当代欧洲的现状，而高加索地区并不真正属于欧洲。过去的历史让欧洲渴望寻求某种能够引以为傲的事物，渴望证明除了帝国主义和大屠杀以外，欧洲还有某种卓绝超伦的东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欧洲人已经得到了教训，由于战争得不偿失，他们规划的欧洲社会已经摒弃了

战争。同时，他们认为自己即将作出某种壮举，从而垂范世人。随着欧洲逐渐恢复昔日的繁荣，和平是否能够持久成为欧洲复兴的关键因素。欧洲人拒绝承认这两场战争属于欧洲，这一点在他们看来非常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并且它提醒着人们，和平其实脆弱不堪。

此外，欧洲人还有一种回避事实的态度。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向塞尔维亚发动了袭击，美国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一些北约盟国也参与了战争。在欧洲人看来，这场战争从心理上很快转变为一场美国战争。他们既强调集体安全，又认为战争中的实际行动属于他人，比如美国，从而否认这是一场欧洲战争。

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都属于欧洲的边境地区，而这两个地区内还藏着更多边境地区，仿佛层层相嵌的俄罗斯套娃。每一个边境地区都比上一个更小，但令人惊异的是，总是有更小的边境地区出现。最终，就连弹丸之地的村庄也被划分为不同家族和派系，历史和冲突进一步加深他们的分歧，而这种宿怨永不磨灭，他们也很难握手言欢。

毫不奇怪的是，这两场战争都发生在山区。那些蕞尔小邦之所以能够在战争与征服中得以存活，有赖于崇山峻岭的屏障和庇护。但山区难以建立国家，因为绵亘不绝的群山既可以遮风挡雨，也会让当地变成一盘散沙。在山区，家族和宗派的势力甚至比国家实力更加强大。千山万壑间往往隐藏着国家的雏形，即前现代的社会实体。在这些实体中，不同的宗族被共同的语言和宗教联系起来。

山区经常是法网不及之地。如果征服者不能彻底铲除四分五裂的小国，就根本不可能在当地推行法律。这些小国仍然维持着独立，所以能够自行执法。但在山区，这就意味着执法权掌握在家族和宗派手中，他们的法律常常由当地的习俗构成。一旦遇到困难，除了附近山区的盟友，他们没有其他人可以求助。由于地处偏僻，山区的人们性格坚韧，骁勇善战。在这些地区，各大帝国相继兴起和衰亡，其重大地缘政治力量固然会对山区部族产生影响，但从未泯灭其存在的现实。因此，山区

充斥着人数较少、凶猛彪悍又四分五裂的民族，而能够遏制各派矛盾的压力稍有松懈，它们就会爆发出来。

苏联解体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后爆发的战争还有一个特点：它们都发生在欧洲各国边境地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混杂的地方。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是穆斯林地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是基督教地区；阿塞拜疆是穆斯林地区，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是基督教地区。苏联解体后，最初几场战争都发生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这些战争预示着，伊斯兰教与欧洲之间的矛盾将重新出现。这种冲突与其说与宗教有关，不如说与民族有关，但仍不属于新型战争，而是旧式战争的复兴，也是昔日的火药桶死灰复燃。

巴尔干战争不仅更加血腥，而且令举世震惊。“一战”结束后，巴尔干半岛西部被更名为南斯拉夫。就像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这个国家由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历史上有着深仇宿怨的共和国组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战胜国将这些国家组成了联盟，并认为联盟可以克服彼此的矛盾。但1991年，也就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的同一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解体，从而表明，欧洲人曾经信以为真的一面已经消失不见。

许多人认为，巴尔干地区不是欧洲真正的组成部分，那里发生的事情也不能代表欧洲。然而，将巴尔干半岛逐出欧洲的想法固然令人欣慰，但并不正确，因为它不仅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且对欧洲历史十分重要。我们不应忘记，1888年俾斯麦曾经说过：“假如欧洲再次爆发战争，一定是巴尔干又出了什么该死的蠢事。”

父亲过去经常告诫我远离巴尔干地区。他说，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你会因为口袋里的零钱或者不经意的一瞥而丧命。在“二战”前的法国，“巴尔干”一词会让人联想到暴力和野蛮，人们甚至把暴徒称作“巴尔干”。但我认为，之后的情况有所好转。在冷战期间，南斯拉夫被公认是较为开明的共产主义国家。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人，

至少南斯拉夫地区的巴尔干人，开始再度声名狼藉。

巴尔干半岛位于三个大国之间：其东南部是土耳其，东部和东北部是俄罗斯，西北部是日耳曼国家。虽然欧洲的几个帝国都曾在这里展开对峙与角逐，但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在在这里久留。它们只是借道巴尔干半岛前往更加重要的地方。换言之，巴尔干半岛就像一座防御堡垒或者跳板，而不是大国争霸的目的地。14世纪，奥斯曼帝国经过这里，前往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布斯堡王朝也穿越这里，将奥斯曼人击退。20世纪，苏联人希望夺取亚得里亚海的港口，但遭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阻挠和严词拒绝。最后，苏联人只得绕道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在经过巴尔干半岛时，这些国家也留下了各自的印记。这里既有穆斯林，也有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就像一个宗教与民族的大杂烩。在巴尔干地区的崇山峻岭间，新的征服者在留下自己印记的同时，却没有能力或兴趣抹去旧的印记。其结果是，对于这里诸多人口较少、相互仇视的民族之间所形成的地缘政治问题，一批又一批征服者并没有进行干预。因此，这些民族变得愈发坚韧强悍，被征服的次数越多，他们就越冷酷无情。想要彻底将其铲除不仅难以实现，而且过于棘手。

外界压力一旦不复存在，巴尔干火药桶就会爆发。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漠然置之，德国忙于统一，土耳其相对封闭，巴尔干地区不再处于压力之下，南斯拉夫获得了自建国以来最大的自由。巴尔干半岛外部压力的缺失与其内部战争存在某种联系。冷战期间，北约和华约组织都试图将南斯拉夫置于势力范围之内。南斯拉夫畏惧苏联的统治，而北约可以成为制衡苏联人的力量，但南斯拉夫只有在铁拳之下才能团结一致。苏联垮台后，北约对南斯拉夫失去了兴趣，而铁托早在10年前就已辞世。压抑已久的仇恨再度浮现，南斯拉夫的火药桶突然爆发。

南斯拉夫境内存在许多边缘地带，几乎所有的事情对于不同的人来说都有不同的意义。就连一座小桥也会成为导火索。波斯尼亚人伊沃·安德里奇曾经因其著作《德里纳河上的桥》（*The bridge on the Drina*）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德里纳河上的一座桥描述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生活：

> 我们可以看到，对镇上的居民来说，他们的生活就是在这座大桥和“卡皮亚”（桥中央加宽的部分，人们可以在此聚集）四周或者与桥有关的地方，不断流淌和展开……基督教儿童出生在德里纳河的左岸，他们从人生之初就开始过桥，因为在降生的第一周，他们就要被抱过大桥接受洗礼。但出生在右岸的其他孩子和穆斯林儿童不需要接受洗礼，他们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就像他们的祖祖辈辈一样，都是在大桥附近度过。

在这段文字里，安德里奇刻意传达出了井然有序与太平安宁的感觉，但不无反讽的意味。他清楚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他们之间的新仇旧恨。边境地区总是令人不寒而栗，而位于边地之内的边地更加令人恐惧。因为即使躲过其中一场冲突，你还是会来到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由于担心失去自己熟悉和热爱的东西，这里的人们紧紧团结在一起。但这种莫名的恐惧让他们对大桥另一面的人感到愤恨，他们恐惧的对象不只是远方同样惶惶不安的人，还有那些高枕无忧或权势亨通的人。与此类似，在世界各国的边境地区，生活从来都不是那样轻松，恐惧之情也并非不合情理。

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种仇恨与恐惧在欧洲引起了共鸣。1912年，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与希腊结盟，对奥斯曼帝国发起了攻击，当时奥斯曼帝国仍盘踞在巴尔干地区。战争很快结束，奥斯曼帝国继续进行长达一个世纪的撤退。1913年，战争再次爆发。这一次，出于对上一场战争结果的不满，保加利亚向马其顿发起了袭击。希腊也与保加利亚结为盟国，一致对抗马其顿。罗马尼亚和奥斯曼帝国也参与进来，与保加利亚一同作战。总之，这些小国及其内部四分五裂的派系组成了各式各样的联盟，如万花筒般不断变换。1914年，塞尔维亚秘密组织“团结或死

亡”成员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刺杀了斐迪南大公夫妇，从而引发了一场欧洲战争。此后，人们互相恐惧，并作好了最糟糕的准备。显然，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一战”结束后，战胜国决定在西巴尔干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信仰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们认为该国民众信仰伊斯兰教，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为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国家，但它们统一的原则本身就充满矛盾。这些国家全都不是单一民族，而且都拥有许多飞地。这些飞地中的人口属于其他民族，并且信仰其他宗教，所以都想独立出去。

欧洲对巴尔干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建立联盟，希望借此打破俾斯麦的谶言。该联盟成立于1918年，最初被命名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其分裂程度从名字便可窥一斑。奇怪的是，在这个国王已经丧失权力的时代，欧洲却决定由塞尔维亚国王掌管这几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于是，亚历山大在此实行独裁统治，直到1941年德国入侵。随后，该联盟在外界压力下解体，所有潜伏的仇恨重新出现。其中的一些群体与德国人结盟，另一些与其对抗，还有一些对德国人视而不见，专注于内部争斗。

“二战”结束后，该联盟恢复统一，各方的冲突被另一个政权镇压下去。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元帅领导的共产主义政权用铁腕手段对国内冲突进行镇压，并作出了慎重妥协，从而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但他继续让南斯拉夫处于苏联的统治之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南斯拉夫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拥有更加自由的经济政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该国经济在共产主义世界最为活跃，但这也许无法说明什么问题。

但1974年，当我前往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时，我发现，这几座城市与华沙或布拉格的对比十分鲜明，与苏联城市的对比则

更加明显。尽管受到地理条件和意识形态的约束，巴尔干半岛的这些城市仍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此外，我还记得，尤利安山脚下有一座美丽的小镇叫布莱德。在其他东欧国家，我很难见到这样安逸舒适的生活情景：有人在湖边漫步，也有人在可以俯瞰山光水色的餐厅里用餐。餐厅的价格不菲，甚至连我也负担不起。一开始，我认为在里面用餐的都是南斯拉夫的上流人士。但是，当我与他们交谈后，我才发现他们不过是一些中层官僚和小商人。当时，我住在当地一座价格低廉的小型寄宿学校，里面有羽绒床垫和精美的窗户。店主们住在其他地方，他们还拥有好几栋房屋。奥地利与这里仅有一山之隔，两国之间有无数条地图上没有标示的小路。南斯拉夫人不在乎哪些人会离开境内，但奥地利人却担心有人潜入国境。1974年，在一个共产党统治的边地国家，这种情况不能不令人瞠目结舌。

1980年，铁托逝世，之后南斯拉夫岌岌可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决定不让任何人接替铁托，而是成立了由8人组成的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轮值主席之职。这也是各方能够达成的唯一方案，该方案消除了自成立之日起将南斯拉夫合为一体的君主制和独裁制。现存的民族差异为社会所认可。

1989年，随着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趋于瓦解，南斯拉夫潜在的矛盾被释放出来。苏联解体后，当局丧失了道德威信，只剩下南斯拉夫的几个联邦以及联邦内相互仇视的社会群体。当时，该地区的许多家庭都持有武器。20世纪70年代，我站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一座火车站，看见许多士兵带着从家中拿来的武器，正准备离开这座城市。战后的南斯拉夫曾经是个由游击队员建立的党派国家，其道德规范也存在于军队中，并激起了战火。当地盛产梅子白兰地，这种烈酒足以让人的肠胃翻江倒海。此外，许多家庭都在前厅的洗手间里藏有自动手枪。以上种种因素让各方切实存在的矛盾迅速演变为暴力事件。

1991年，昔日的敌国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兵戎相见，在相对和平的

联邦内展开了小规模的屠杀。双方的仇恨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二战”期间，克罗地亚对纳粹主义较为友好，而塞尔维亚则是抵抗法西斯的中心。长期以来，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一直与欧洲国家十分默契，包括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究其原因，部分出于文化渊源，部分在于克罗地亚始终对面积更大的塞尔维亚提心吊胆，因此需要结交盟友。众所周知，塞尔维亚人信仰东正教，甚至就连共产主义者也认为他们与俄国的东正教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共产主义者试图超越民族主义的界限，所以克罗地亚的非正规军乌斯塔沙开始追捕他们，并且与纳粹分子沆瀣一气。尽管这些共产党员大多都是塞尔维亚人，但也仅占后者的一小部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发生了许多不可原谅的事情。这些问题从未解决，也从未消失。

20世纪70年代初，我曾与萨格勒布大学附近的几名马克思主义者彻夜长谈。他们不是斯大林主义者，而是新左派成员，即当时所谓的“实践派”，但这种称呼的由来着实令人费解。这些人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他们全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精通哲学。他们显然自认为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有责任把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带给南斯拉夫，因为这种思想比南斯拉夫当前的政治体制更加人道。但实际上，即便是南斯拉夫当前的政体，也比当时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苏联的政体更加开明。

几杯梅子白兰地下肚后，我谈起了自己在贝尔格莱德遇到的一些人。毫无疑问，对方的情绪渐渐发生了变化。最后，一位声名显赫的哲学家朝地板啐了一口，开始咒骂这个城市和国家。此外，他还坚持要对塞尔维亚人的畜生进行诅咒。从表面上看，这个人与美国的大学教授没有什么区别，但酒过三巡，他早已醉意醺醺。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不禁真情流露。事实证明，他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克罗地亚人，既不会原谅，也不会忘记塞尔维亚人对他的祖国所做的一切。午夜过后，启蒙运动的影响渐渐远去。

你尽可以去挖掘这种仇恨背后的原因，但最终他所热爱的还是他所拥有的一切以及自己的身份。祖祖辈辈的记忆就是他的记忆，因此无论启蒙运动能够产生多大影响，这些记忆都不会被磨灭。在巴尔干半岛，就像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一样，人们的回忆往往是可怕的，而且总是会带来愤怒与怨恨。尽管这些回忆可能被独裁统治压抑下去，或者被经济繁荣暂时平息，抑或与启蒙思想格格不入，但随着这些力量逐渐消失，往日的记忆就会再次浮现。

战争终将演变成无休止的多边斗争和错综复杂的谋略，即使是精通对弈的南斯拉夫人也会手足无措。其结果不仅是导致长期内讧，还有集中营。这些集中营虽然在工业效率上不及德国的集中营，但在制造饥饿和使用暴力方面没有太大分别。在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陷入混战，但位于波斯尼亚北部的塞尔维亚人最为强悍。这些塞尔维亚人甚至南下萨拉热窝，包围了穆斯林的这个首都。如果不是出现了连天的炮火，那么他们制造的局面让人仿佛置身于中世纪。

在巴尼亚卢卡市被围困14年后，我曾经前往此地参观。作为波黑塞族共和国的首都，巴尼亚卢卡显得和平而繁荣。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在市中心的街头漫步，恍若置身上流社会。在公园里，两名棋手正在移动巨大的国际象棋棋子，旁边还有十几名聚精会神的观众。当地的冰淇淋味道颇佳，旅馆餐厅里的年轻人也都衣着得体。我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信步游荡，无意间看到一座挂着毕马威会计事务所标志的建筑。尽管波黑塞族共和国已被宣布为非法，但其首都仍然悬挂着该国旗帜，而非波斯尼亚的国旗。令人惊叹的是，这里甚至还可以发现现代文明的重要迹象，即美国一家大型会计咨询公司的名称。

这里的大部分标志要么是英语，要么包含有英语，对此我已经见怪不怪，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惊讶。当我还年轻时，波斯尼亚的第二语言是德语。虽然美国在这里将叛乱镇压下去，但现在，所有的外部迹象都显示，当地居民正满腔热情地希望与美国冰释前嫌。

从巴尼亚卢卡向南有两条平坦的大道，山路沿途许多建筑工程正在施工。显然，有人认为，巴尼亚卢卡和萨拉热窝之间的道路上一定生意兴隆。在接近萨拉热窝的地方，人们正在大规模地修筑公路、兴建办公楼。即使在下午3点，通向镇上的干道也交通繁忙。道路旁边就是一条河流，河水缓缓流向这座古老的城市。当地的建筑古色古香，街道曲折迂回。夏日的夜晚，山脚下的人们仍然十分活跃，他们一边享用美食，一边聆听音乐。

十几年前，波黑塞族共和国领导人拉特科·姆拉迪奇在巴尼亚卢卡登台掌权。当时，通向南方的道路上挤满了军用车辆和大炮。这支队伍直奔萨拉热窝，对这座城市狂轰滥炸。然而在此之前，欧洲发生过更加惨烈的战斗，但这次事件无疑是1945年至今最可怕的一幕。

波斯尼亚的重建工作令人惊异。它不仅清理了废墟，而且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人们经常会说，某地“饱受战火摧残”，但这个短语也许不只适用于某个地方，而更适用于当地民众。那些刚刚经历过战火的人大多看起来面容憔悴，但巴尼亚卢卡和萨拉热窝的民众是个例外。对他们来说，曾经大兵压境的道路也不过是一条道路而已。然而，即使他们已经清扫了战场，即使每逢傍晚在萨拉热窝清真寺里祈祷的人们与其他欧洲人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他们和在巴尼亚卢卡下棋的人们一样没有忘记过去，也不会原谅对方。对他们来说，500年前或者1995年发生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们的确想要遗忘，但记忆却不会轻易丧失。

欧洲认为南斯拉夫正在倒退，仿佛它是某个与欧洲无关的史前国家。在欧洲人看来，欧洲各国之间不会再发动残暴的战争，也不会再因种族歧视而将人们送往集中营，更不会再成为令全世界憎恶的对象。既然南斯拉夫在1995年作出如此行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并非真正的欧洲人。无论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其所作所为显然与欧洲精神格格不入。然而，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时，人们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欧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要远比巴尔干战争更加可怕。

我们住在萨拉热窝一家小旅馆里，店主是一位上了年纪、教养良好的妇女。她体型偏胖，让我联想起自己的几位姑妈。为了让我们住得舒适一些，她总是不停地忙碌。我们几经试探，她犹豫再三后，终于平静地谈起了萨拉热窝遭受巴尼亚卢卡军队轰炸的日子。我告诉她说，如今毕马威会计事务所也进入了巴尼亚卢卡，就足以说明这里不会再发生战争。她悲伤地笑了笑，并向我保证，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与金钱无关。战争必将卷土重来，她说，但“眼下至少我还有一家旅馆”。让她感到欣慰的不是和平，而是暂时的休战能让她高高兴兴地开一家旅馆。她的期望虽然不高，但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警告。

这一轮巴尔干战争的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战争的后果。此次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许多人惨死沙场。虽然各方在美国的调停下达成停火协议，但最终还是就科索沃问题与塞尔维亚开战，因为科索沃省主要由阿尔巴尼亚人和伊斯兰教徒组成，而塞尔维亚人认为科索沃对自己的民族认同至关重要。人们没有忘记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它的意义在今天与600年前同样重要。

欧洲人未能防患于未然，也未能阻止战争的发生。几乎毫无意义的是，他们只是在战后进行了巡查。战争之所以能够结束，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所有各方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感情上都已经筋疲力尽。但正如过去一样，这次战争仍未解决任何问题。人们曾经以为，南斯拉夫不会再发生类似1912年和1913年的流血事件，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种幻想。敌国仍是敌国，即使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别国的国旗之下。许多人认为，只要加入了欧盟，所有这些都会画上句号。我不清楚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这种观点，但的确有人对此深信不疑。当然，也有人认为另一轮战争即将爆发。因此，欧盟的支持者越是满腔热情，与我交谈的那些人们就越觉得战争迫在眉睫，而我更认同后一种看法。

西巴尔干本身就是一个火药桶。此外，由于土耳其再次崛起，俄罗斯重新成为地区大国，德国日渐强大并有可能脱离软弱无能、动荡不安

和多民族的欧洲，巴尔干遂成为此间的危险地带。在南斯拉夫境内，任何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而维持和平的诸多因素正逐渐消失。那些一度被人遗忘的大国正重新崛起，而巴尔干地区既是它们开展贸易的通道，也有可能成为发动战争的起点。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不要忘记，美国曾向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派遣军队，而这支军队已经在那里停留了数年之久。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殇

高加索山脉是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大陆桥，连接了欧洲大陆、安纳托利亚半岛（又称小亚细亚半岛）和伊朗。

高加索山脉由两大山系组成，北部是大高加索山脉，其中包括欧洲海拔最高、最险峻陡峭的山脉，例如厄尔布鲁士山的海拔就高达18 510英尺。高加索山脉南部是小高加索山脉，此处地势相对较低，但与巴尔干地区的山脉一样崎岖不平、易守难攻。这两大山系之间是一片平原，西部绵延起伏，东部地势平缓。这片平原由库拉河冲积而成，河流从土耳其东部的山脉发源，向东注入里海。平原向西延伸到黑海，沿岸地带向西部凸出。在三个外高加索国家中，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位于该平原之上，而亚美尼亚的大部分国土位于南部山系。

高加索地区被三个大国包围，其中西南的土耳其和东南的伊朗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边缘，而俄罗斯位于北部。这三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曾经试图控制高加索地区，但大多数时候，该地区处于这三个国家的同时控制之下。崇山峻岭为此处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只要能够占据立足之地，至于在哪里划定边界，对该地区来说并不重要。即便小高加索山区也十分险峻，任何军队都难以长驱直入。对俄罗斯人来说，大高加索山脉必不可少，因为北部是一马平川，既难以进行防御，又是欧洲平原的尽头。一旦有人深入此地，就可以直捣俄罗斯的心脏。尽管苏联已经解体，穆斯林也在车臣和达吉斯坦发起了抵抗，但俄罗斯人并不打算退出

高加索地区。

实际上，俄罗斯人需要尽可能南下，以阻挡其他国家的进攻。19世纪，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已经不堪一击，俄国人得以穿越库拉谷地进入小高加索，吞并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俄国革命爆发后，这些国家暂时获得独立，但苏联故伎重施，将这三个国家并入本国版图。当时土耳其和伊朗都十分软弱，对此无计可施。

这一举动让苏联人一箭三雕。首先，他们不会再失去对大高加索地区的控制。其次，他们通过小高加索建立了一条通道，这一点在冷战初期尤为关键，因为当时苏联担心美国从土耳其和伊朗发动袭击。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苏联人能够获得欧洲最大的石油产地，即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从而使苏联得以实现工业化。假如没有巴库的石油，我很怀疑苏联人是否能够赢得“二战”。希特勒同样认为，如果他能够攻克巴库，德国就会稳操胜券。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目的正是为了打开通向巴库的大门，但德国人被苏联人和崇山峻岭阻挡，最终功亏一篑。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高加索地区险峻的地形。

事实上，苏联解体是从高加索地区开始的。盖达尔·阿利耶夫是苏联政治局委员，曾经担任阿塞拜疆的克格勃头目。在遭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排挤后，他返回阿塞拜疆，认为苏联必将葬送于戈尔巴乔夫之手。回到阿塞拜疆后，他一边等待时机，一边建立政治基地，最终带领阿塞拜疆毫发无损地退出苏联。

大约同一时间，阿塞拜疆还发生了另一起鲜为人知的戏剧性事件。阿塞拜疆某地区的州议会要求，在得到莫斯科的允许后，脱离阿塞拜疆，加入亚美尼亚。对此，戈尔巴乔夫表示强烈反对，因为他担心其他地区群起效尤，从而导致苏联边境出现变化。在历史边界问题上，斯大林经常随心所欲、轻率变更，以致苏联的许多边界本身就含糊不清，因此戈尔巴乔夫担心，这种做法从整体上会成为苏联的不稳定因素。

问题的根源在于苏联的政策。苏联人曾经重新规划了苏联加盟共和

国的边界，导致其居民四处迁徙，有时甚至会出于政治和战略需要将大批民众驱逐出境。“二战”期间，阿塞拜疆人被赶往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居民经常变动不定。因此，亚美尼亚人得以大批进入阿塞拜疆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属于阿塞拜疆的地方成了亚美尼亚人的栖身之所。

亚美尼亚要求阿塞拜疆交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管辖权，但遭到戈尔巴乔夫的拒绝。然而，随着苏联的衰落和解体，反对变得毫无意义。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成为主权国家后，双方的矛盾与日俱增，以致许多阿塞拜疆人在亚美尼亚丧生，而不少亚美尼亚人死于阿塞拜疆。1992年冬，大约在巴尔干战争爆发的同时，亚美尼亚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发动了袭击，双方拿起苏联的武器刀剑相向。最终，80余万阿塞拜疆人和25万亚美尼亚人沦为难民，同时约有3万阿塞拜疆人和6 000亚美尼亚人遇害。虽然双方于1994年停战，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矛盾仍在恶化。目前，双方仍在边境地区布置狙击手，并对联合国的决议置若罔闻。

这场战争结束十几年后，我初次来到阿塞拜疆，受到一名政府官员的接待。他立即将我带往一座缅怀那些为了阿塞拜疆独立而牺牲的人修建的纪念碑，并让我敬献了鲜花。他们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的立场。这是我首次来到阿塞拜疆，虽然我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但并不清楚它所激起的情感。除非身在其中，否则你很难理解这些事情。我只好作出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但表示赞同双方遵守联合国决议。坦率地说，我很好奇为什么会有人关心我对此事的立场。

这次采访和我接受的其他一些访谈的内容被贴到了互联网上。出乎意料，我很快遭到了亚美尼亚人的攻击，他们指责我受到阿塞拜疆人的收买，因为我首先造访了阿塞拜疆，并对巴库大加揄扬，但巴库的确是一座引人入胜的城市。亚美尼亚人断章取义地认为，这一言论意味着我

被阿塞拜疆人所收买。虽然两国都呼吁美国解决这一问题，但最终解铃还需系铃人。

人们很容易认为，其他人的政治热情不可理喻或是受人误导。一般来说，我们对自己的爱恨一清二楚，因此对这种情感极为重视，但认为其他人的爱恨微不足道，甚至难以接受。事实上，我们都有自己的回忆，但只有那些最强大的国家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这些错误很难被改正。对巴尔干地区来说如此，对高加索地区来说亦是如此。如果不能理解其他人的感情，我们就会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但其他人关心的事情并非总是合情合理。在高加索地区，我终于清楚，什么是回忆和感情。在此声明，我从未接受过阿塞拜疆人的贿赂。

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对欧洲人关于新欧洲的表述发出了挑战。当欧洲步入正轨之际，这两个地区却战乱肆虐，其中包括2008年的俄格战争。迄今为止，1945年前曾对欧洲产生重大影响的感情，仍然在欧洲十分活跃，尽管这些国家并未加入欧盟。例如，巴尔干战争就发生在欧洲。

一些欧洲人反驳说，这些冲突都发生在欧洲的落后地区（例如巴尔干半岛），或者并非真正属于欧洲的地区（例如高加索地区）。然而，无论巴尔干半岛落后与否，我们都不应当忘记，“一战”就是从那里爆发的，而俄罗斯仍在大高加索、车臣和达吉斯坦镇压伊斯兰教徒的叛乱。如果对这些冲突置之不顾，我们就需要对欧洲进行重新定义。最终，我们不得不认为，欧洲的战争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与欧盟的崛起而结束。不可否认，欧盟内部没有发生战争。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欧盟能够成功地遏制欧洲人对战争的欲望。但这种观点也引出另外一些疑问：如果欧盟崩溃、分裂或者停止有效运作，结果将如何？如果欧盟的体制能让欧洲实现和平，那么这一体制一旦出错或者失灵，什么才能约束欧洲？

我早就表示，欧盟难以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欧盟正在衰落之

中，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恢复自身的平衡。但我认为，欧盟不可能重获平衡，因为它的问题是结构性的，所以必然导致失败。如果欧洲一体化真的能够消除战争，而在没有加入欧盟的地区，就像在巴尔干地区和高加索地区那样，冲突会重新出现，那么欧洲的未来将与多数人的期盼大相径庭。

以上就是笔者的论断，接下来我将对潜在的危险地区进行逐个分析。欧洲有许多老传统，其中之一就是某些地区的冲突会一再出现。

9

进退维谷

欧债危机阴影下的德国

欧债危机中，一枝独秀的德国被推向欧洲主导位置，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德国若不愿救助重债国家，会遭到不愿承担责任的指责；另一方面，德国若是稍许展示自己的“肌肉”，为欧债危机的应对定调，即被认为德国企图主宰欧洲。基于德国的经济实力和历史责任，“只做一个正常国家”已成空想……

德国复苏

如今，欧洲问题再次成为德国问题，人们担心的是德国的需求与顾虑，以及德国可能做出或者不会做出哪些举动。这个问题在欧洲由来已久，并与欧洲最古老的问题相伴相生：下一场战争将在何时何地爆发？不可否认，德国的统一让欧洲陷入了31年的风雨飘摇之中。随后，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德国被一分为二，欧洲才得以拥有和平。现在，德国不仅再次统一，而且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如果欧盟运转失灵，合作机制崩溃，人们不禁要怀疑，曾经同室操戈的欧洲是否会回到从前的状态。

1945年，人们一度以为，德国不会再次强大起来。但如今德国即使不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至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这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当然，今天的德国与阿道夫·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德国的军事力量十分有限，其内在信仰和原则也深受宪法和民主的制约，但这无法改变德国的实力目前在欧洲首

屈一指的事实。对欧洲来说，德国所作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将比其他国家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这个新的角色无疑不适合德国。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一度改变了欧洲的运作方式，在欧洲平原的中心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富于创造性的不稳定力量。早在欧洲文明发源之初，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部落就限定了罗马帝国的界限。这些部落分布在阿尔卑斯山以北，莱茵河以东，其东部边界尚不明确，但实力不容小觑。

1871年，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不只是一个由数十个州组成的政权。从此以后，德国三度成为政治经济强国。1871年，统一后的德国在战争中大败法国，重新划定了欧洲的界限。1918年，在“一战”中受挫后，德国东山再起，最终导致纳粹党上台。1945年，德国再次崛起，东德和西德于1990年宣布合并。德国从分裂中产生，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一再崛起，如今的它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而是欧洲的主导力量。

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德国的地形。欧洲的历史表明，任何位于欧洲平原北部正中央的国家都不容忽视，无论该国江山一统还是一盘散沙，例如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德国。如今，德国再次崛起成为欧洲强国，进而引发了更为复杂的问题。1945年，几乎没有人能够预见，德国在进入21世纪后会如何发展，而少数拥有先见之明的人也将极为惊恐。

我们不得不再次谈论德国这个欧洲不可或缺的国家，谈论德国所制造和解决的问题，谈论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以及其他国家对它取得该地位的怨恨之情。在讨论这一切有何意义之前，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为什么自1871年后，尽管德国屡逢劫难，但仍然能够再次崛起。

德国的情况不禁让人联想起位于俄罗斯东南方的日本。当德国统一后开始蒸蒸日上之时，日本也完成了统一，并迅速发展。相比德国，日本的自然资源更加匮乏，对现代战争更加缺乏历练。然而令人惊异的

是，1905年，日本利用英国制造的战舰和德国建立的军队打败了俄国海军。“二战”前，日本已经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就像德国一样，日本在压力下急速发展，但其基础无疑更为薄弱。同样，日本也曾诉诸战争手段，试图矫正地区的不平衡状态。与德国一样，日本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几乎没有恢复元气的可能。日本与德国同时卷土重来，前者甚至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强国。“二战”期间，日本遭到的破坏远比苏联、英国和法国严重，但这几个同盟国在取得胜利后，其发展状况反而不如日本。

有鉴于此，与其质疑“为什么会是德国”这个问题，不如扩大范围去思考“为什么会是德国与日本？”显然，德国并非独一无二。一些国家实现统一的时间相对较晚，德国只是其中之一。此外，德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也晚于其他国家。19世纪末，日本和德国都完成了统一，随后两国的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因此，它们急需原材料，以发展新兴工业。但两国的发展都受到强国的制约，而其他强国实现统一和工业化的时间要早于它们。为了确保能够获得原材料和市场，日本和德国都诉诸战争。虽然都曾遭受严重打击，但战后两国的经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迅速复苏，只有军事实力较为薄弱。有趣的是，与德日大致在同时期完成统一的意大利，虽然遭到战争破坏的程度较轻，但其工业化过程较为缓慢，也未能获得与德日相当的重要地位。

德国与日本的工业革命都受到了国家的鼓励，甚至由政府实施。当然，这些都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普鲁士人希望在统一后吞并英国和法国，因此迅速完成工业化尤为关键。当日本遭遇美国的坚船利炮，看到英国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它深刻地意识到，假如日本不能实现统一、完成工业化，就会重蹈中国的命运。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日本一直处于割据状态。直到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重新建立起统一的政府，并出于经济和军事的考虑开始强制推行工业化。

德国和日本的上述行动并没有形成国家所有制，但其国家政策对工

业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两个国家，上层贵族协助政府推行工业政策，既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肩负国家的命运，也是出于一己之私，所以他们准备领导工业化。与德日不同的是，意大利并没有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威胁，因此该国的贵族如同一盘散沙，很难像德国与日本那样采取集体行动。

工业化、国家统一和军事力量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其结果是，德日两国都产生了军国主义思想，即认为军队是国家的化身，贵族阶层是军队天生的领袖，而黎民百姓是狂热的参与者。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意大利的军国主义思想也蠢蠢欲动，但其国内的法西斯党根基不够稳固，仿佛建立在流沙之上。

“二战”过后，日本放弃军国主义，德国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彻底反省。按照宪法规定，日本应成为一个和平主义国家。而在北约，德国虽然沿袭其军事传统，但不再热衷于任何意识形态。尽管如此，两国的经济仍然迅猛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有助于国家复苏，而且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军国主义的思想体系（我们姑且称之为“经济主义”），即致力于经济发展，并以此作为主要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

此外，日本与德国还有另一个共同特征。在冷战期间，两国都对美国极其重要。“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约占全球GDP的一半。德日两国与美国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并从中获益颇丰，因为它们可以接触到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既需要德国与日本对苏联进行遏制，也需要这两个国家富强起来。因此，美国在战后很快放弃了任何对德日两国进行惩罚或者任其陷入赤贫的念头。考虑到战后的地缘政治格局，两国的经济必须尽快复苏。因此，德日不仅接受了美国的援助，打开了美国的市场，而且可以利用关税保护国内市场，从而获得经济复苏的能量。

毋庸置疑，德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十分严峻，因此只要有人一声令下，这种社会现实足以使其民众在战争中作出极端邪恶的事情。但是，德国人也正是得益于他们本身能够在战后忍辱负重。面对经济上的

窘境，德国人一向训练有素，他们能够面对其他民族无法面对的苦难。在这一点上，德国不仅与意大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在一个世纪里两次超越英国与法国。

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而德国在世界综合国力排名中位于第四。迄今为止，两国仍是经济巨人，而非军事强国。德日两国所发挥的国际影响远远小于它们的实力。虽然德日在美国的扶植下在战后生存了下来，但它们的外部环境并不太平。美国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他处，而地区问题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如今，两国正在权衡利弊，希望本身不必施加影响，或者承担任何风险。

在谈到德国时，我们也应该提到日本，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此一来，我们可以避免将德国作为一个个案，而是将其置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下。德国统一和发展并非与日本毫无二致，但两者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极富启迪性。由于实现统一和工业化的时间较晚，它们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这种局面是意大利等其他国家无法完全驾驭的。德国与日本虽然陷入了灭顶之灾，但它们最终从灾难中重新崛起。

德日两国统一后，社会趋于稳定，民众团结一致。这种状态在“二战”后并未消失，无疑有助于它们从失败中复苏。时至今日，德国社会仍然存在一定的纪律性。虽然这种纪律性也许正从德国文化中逐渐解体，但这并非定论。德国的经济表现迥异于欧洲其他国家，从而证明这种纪律性仍然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参与德国重建的一代人大都已经不在人世，虽然其后代在六七十年代一度沉湎于激进主义，但他们与先辈并没有明显不同。

当然，他们对军事理念的态度截然不同。无论是否情愿，生活在冷战时期的德国人不得不面对严峻的威胁，必须保卫自己的国家。而冷战后的一代人对军事毫无兴趣。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德国不再面临任何军事威胁，因此他们的态度合情合理。

“恐德症”蔓延

对德国人来说，胜利与灾难息息相关。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德国人既感到忧虑，又引以为傲。德国人担心，这种成功会迫使他们扮演自己不希望扮演的角色，并将其再次压垮。德国人并不热衷于领导新的欧洲，但他们担心自己无法逃避这一职责。同时，对于德国公众所表现出来的忧虑和持重，欧洲其他国家心存疑虑，认为这只不过是装模作样，昔日的德国并没有死去，只是酣睡未醒而已。所有欧洲国家都对德国充满了可怕的回忆，甚至德国自身也不例外。

德国人希望相信，令人恐惧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这就如同有人做了某件可怕的事情，但他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虚假的或者发生在其他世界的梦。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甚至可以装作这一切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他从未真正忘记事实的真相，他清楚自己不只是做了一场梦，这一切确实发生过。正因如此，他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再次发生。而他身边的所有人也清楚这不是梦幻，并且怀有同样的恐惧。换句话说，今天德国人的心态就是所有欧洲人的心态。

德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它试图控制或操纵邻国的每一项措施，或者它所做出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周边国家命运的每一次行动，都会引起人们的恐惧。但对德国来说，这一次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不是因为德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或者强大的实力，而是因为德国担心自己与这一切产生任何瓜葛。一方面，人们可以认为，这种恐惧会成为约束德国的力量。但另一方面，虽然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存在某种荒谬的念头，但这并不能确保它不会控制你的思想。

对德国人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谨言慎行，表明自己毫无恶意。其中包括大范围公开进行的自我反省，从而向全世界证明，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德国的态度极其严肃。与此同时，德国人的生活异常普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那些受害国家极其相似，因为两者都经常进行反思，

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生存下去。当然，尽管两者的生活方式十分接近，但这并不能抹杀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区别。

有意思的是，德国的年轻人与上述说法格格不入。在某个周六晚上，如果你来到柏林，你就会看到一些更加奇特的生活方式。这不禁让我联想起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的一出戏剧。在这出戏剧里，布莱希特对人类奇怪的生活方式进行了研究，并对其中潜在的救赎可能性作出了深刻剖析。长期以来，玩世不恭一直是德国青年的传统，时至今日仍然如此。但是，当我拜访在20世纪70年代结识的年轻革命者时却发现，他们现在不是在西门子股份公司就是在德意志银行出任要职。我意识到，这些人年轻时的自我放纵只不过是一种程式化的做法，因为他们在弱冠之年口口声声痛恨不已的权威人士和乏味生活，如今反而成了他们自身的真实写照。

年轻的一代喜欢标新立异、桀骜不驯，但随后不得不向人生屈服，这种现象远非德国所独有。但是，如果你在星期六的晚上来到柏林，你会发现这种感觉尤其强烈。20世纪70年代，源于大学校园的欧洲新左派广为流传。其中一些团体甚至参与了直接行动，包括制造爆炸案、枪击事件和绑架。在德国，有一个名为“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组织，即后来的“红军派”。该组织成员实施了不计其数的恐怖主义行径，并被宣判有罪。1976年，该组织主要成员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在接受审判期间自杀身亡。1977年，巴德尔和其他人也在他们所谓的“死亡之夜”集体自尽。

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有年轻人耽于声色，而且许多地方的年轻人热衷于信奉某种意识形态。20世纪70年代，许多国家都存在由年轻人组成的恐怖组织。而德国恐怖分子的“死亡之夜”反映了比其他地方更加深刻的黑暗现实。在此，我不打算过于深入地谈论死亡崇拜，因为我并不清楚他们的动机，但提起德国的哲学家，我们有句俗语：“比起其他所有人来，他们沉沦得更深，潜伏得更久，因此一旦出现，他们会更加卑

劣。”我并不完全确定，这句话是否适用于德国哲学家，但它无疑适用于“红军派”。正如前文所言，几乎所有极端分子最终都回归了正轨。但“红军派”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他们的暮年同样异乎寻常。当然，这与左派或右派无关。正因为他们年轻无畏，有着狂热的信仰，所以才会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这不是某种集体罪过，但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集体行为。当我得知“死亡之夜”一事时，我不由想起了海涅及其谶语。虽然与过去相比，德国的雷声逐渐减弱，但仍然清晰可闻。

虽然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当它们发生在德国时，无论公正与否，都会被赋予更加深刻的意义。德国人只是希望继续生存下去，维持过去曾经保护他们平安无事的体制。但与此同时，德国人也清楚，他们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

德国人不得不在平凡与卓越之间进退维谷。他们对出类拔萃有着切实而强烈的担忧，并躲在平庸的表象之后，以免引起他人的注意。然而，德国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也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人们不可能对其视而不见。德国人虽然试图紧紧抓住那些能够避免让自己崭露头角的东西，但仍然希望有所改变。他们既希望留在北约，又希望有所作为，阿富汗是他们最后一次极为有限的尝试。他们既希望留在欧盟，又希望它能够符合德国的利益。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不希望表现出德国拥有某种利益，因为德国曾经正是因一己之私而失控。然而事件频发，迫使德国不得不打破自我施加的束缚。

德国仍然执着地希望，在对外事务上采取非军事手段。德国的出口约占其GDP的40%，而其工业生产能力远大于国内消费能力。因此，只要有部分产品无法出口，德国国内经济就会受到严重波及。德国无法仅靠出口高附加值产品维持充分就业，而是需要盯紧所有产品。这一代德国人对出口的执迷源于美国，正是在美国的鼓励下，德国开始了迅速而不均衡的发展，以致其工厂的生产能力远远超出了国内需求，而剩余产品则由美国和其他国家购买。但当时还是20世纪50年代，迄今已经年深

日久。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对出口政策作出了相应调整，但对出口的依赖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德国希望本国的经济政策不会产生任何政治影响，尤其是军事影响。它希望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无需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人。同时，它只希望运用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不必残酷无情地追求国家利益。此外，它还希望保留国家主权，但前提是超国家机构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这些想法完全可以理解。它们虽然含糊不清，但切实可行。

欧洲陷入了一场经济危机。德国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而且其繁荣主要得益于欧洲。但德国公众认为，希腊懒惰而腐败，所以不希望为他们买单。因此，过去的一种说法在德国重新出现，只不过措辞极其温和，即把勤奋努力、纪律性强的德国人与软弱无能、不负责任的南欧人进行对比。

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那样，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这种观点意味着，德国认为自身不应当承受南欧的债务负担。此外，它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即认为北欧人，尤其是德国人，至少在文化上比南欧人更加优越。这也许无关血统，而关乎价值观念。德国人不相信南欧人能够成功地处理自己的事务，而应当交由责任心强的北欧人接管，并迫使南欧人遵守纪律、勤奋工作。

归根结底，这还是经济紧缩的问题，即由谁来承担欧盟债务危机的负担？德国人自认为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因为他们辛勤工作和井然有序的状态有可能丧失殆尽。他们认为，南欧人应当偿还所欠的债务，即使无力全部偿清，至少也应当归还大半。这不仅因为理应如此，也是为了让南欧人认识到不负责任的后果，并通过经济紧缩迫使他们改弦易辙。

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政策和舆论产生了分歧。让问题更为复杂的

是，纯粹的经济处罚已不再有效。南欧人不仅会对惩罚予以抵制，而且就像所有欠债者一样，他们可以拖欠不还。有时，偿还债务的代价要高于拒绝偿还债务的代价。虽然将来很可能不会有人再借钱给你，但还钱比这种后果更加痛苦。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对大型公司来说，破产并不会导致其丧失信誉。对国家来说，道理亦然。

“正常崛起”成空想？

德国计划实施经济策略，但只有各方愿意参与到这场经济博弈中来，德国的策略才会奏效。更何况，一旦有国家拖欠债务，这场博弈就会发生改变。德国怎样才能通过纯粹的经济手段迫使借方偿还债务？德国要么在经济上作出妥协，要么只能朝着某种政治方案迈进，而第一种方法对德国人来说十分困难。彼时，德国面临的现实是，他们在欧盟的框架内仅从经济角度解决问题的希望将遭遇挫折。在这场债务博弈中，德国要么接受失败的后果，要么制定的策略需要超出经济领域。

活跃于战后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经表示，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是既富有又虚弱。只有实力才能保护一个人的财富。与穷人不同的是，富人容易受到嫉妒，因为他们拥有其他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与强者不同的是，弱者容易向权势屈服。父亲过去经常对我说，即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躲不过一颗不值钱的子弹。对国家来说，道理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既富有又虚弱，灾难就会接踵而至。正如我在前文所言，能够既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加害者，固然很好。可不幸的是，这一愿望无法实现。

在这场危机中，一些欧洲国家经济萧条，不仅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动者失业，而且面临着巨额债务。那么，它们接下来的情况将会如何？这些国家的政治运动随之出现，并且相关人员提出了如下要求：首先，这些国家不应当偿还债务；其次，要对制造债务的恶棍进行惩罚；第三，要让其他所有人都能够获得现有的财富。上述党派的主张存在种族

主义成分，因为他们反对在欧盟国家之间相互移民和自由迁徙。总之，这些问题互相关联。

他们认为，欧盟的受益者主要是上层精英，导致其他人只能与移民争抢工作机会。失势的中产阶级不仅遭受物质财产损失的灾难，在情感上也觉得自己成了祖国的异乡人，因此成为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就在移民不断改变这些国家民族性格的同时，欧洲却无法从文化上同化他们，而他们也不愿接受同化。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民族结构会发生改变。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也许没有国界，但底层阶级不仅拥有国界，而且紧紧抱住不放。随着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杂糅在一起，对外来人口的恐惧也不断增长，其结果是右派开始施加政治压力。这种心态不仅限于那些处于衰退之中的国家，同样也适用于北欧国家，甚至包括德国或美国，只不过后者的程度较轻而已。

毫不奇怪的是，这类政党早已存在，例如希腊的“金色黎明”，意大利的“五星运动”，法国的国民阵线，或者匈牙利的约比克党。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有一个突然出现的右翼政党，有些甚至积聚了相当强大的力量。虽然现在这些党派只是初露头角，但它们还会不断发展演变。不管它们呼喊的是左派还是右派的口号（右派的可能性更大），其实都不重要。关键问题是，这些政党会让德国在债务问题上陷入僵局，因为它们宣称德国及该国在这些国家的合作伙伴有罪，并呼吁抄没并重新分配他们的财产。

处于绝望之中的国家将不惜铤而走险。它们可以对那些富有而虚弱的国家采取措施，因为其中的风险很小。随着反德情绪和反经济紧缩的呼声日益高涨，拥有巨大资本、投资额和市场的德国无疑会成为其首选目标，而对德国利益的攻击也将逐步升级。德国要么选择接受惩罚，要么利用手中充足的资源，化财富为力量。一个国家之所以变得强大，不是因为它想要如此，而是因为它必须如此。届时德国将面临严峻的抉择，而比起其他方案，增强所有领域的实力将会成为更容易接受的选

项。

这样一来，德国就会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国家。随着压力的不断增加，德国将逐渐显示其政治力量，并迟早展露军事力量。而促使德国作出此举的不是军事因素，而是经济上的顾虑。距离那一天已经为期不远。德国将开始应对自身的根本问题、对出口的过分依赖以及难以增加的国内需求，并且需要为出口型经济建立稳定的框架。如果欧盟仍然摇摇欲坠，或者继续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德国就需要另寻主顾，而它已经开始做出尝试。

显然，无论欧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德国仍将深陷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但是，随着欧盟在观念上越来越倾向于国家主义，并试图加强与俄罗斯或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德国将会面临更加艰难的局势。尽管德国的主要兴趣在经济领域，但它新结交的合作伙伴很可能会将经济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举例来说，假如德国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对后者来说，经济问题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所以俄罗斯向德国提出的条件之一，将会是要求德国接受俄罗斯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支配地位。这一点将来势必会成为美国或波兰所不愿看到的事情。因此，美国可能会与波兰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引起俄罗斯的警惕，并迫使德国作出抉择。

一个国家不会主动选择制定旗帜鲜明的外交政策，除非形势迫不得已。对德国人来说，他们将不得不与北约合作，或者与其他国家建立双边关系。问题是，在冷战期间，德国虽然没有全副武装，但已经被重新武装过，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与日本不同的是，德国对重新武装存在心理障碍。但不可否认，如果没有武器，任何国家的主权都不可能完整，而无论德国有过多么糟糕的记忆和噩梦，永久和平也只能是一个梦想。如果不能对繁荣的经济进行保护，那么这种状态必然难以为继。

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德国不存在回避政治问题的可能。全球发生的一切都有可能波及德国的利益，而欧洲发生的一切无疑都会对德国

造成影响。德国可以选择抱着最理想的期望听之任之，但就像其他国家一样，该国国内政治不允许采取这种做法。假如德国不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利益，经济衰退及其引起的政治反应必将压垮当局。那么，德国该怎么办？

首先，最明显的做法是设法维持欧盟和自由贸易区的存在。这并非绝无可能，但德国需要进行大量投资，而且要承担失败的风险。无论是解决南欧的失业危机，还是确保东欧国家忠于欧盟，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德国虽然将赌注下在了欧盟身上，但不得不规避其中的风险。因此，德国需要一边继续公开致力于解决欧盟问题，一边另寻出路。

就像过去一样，德国不得不就两件事情作出决择，即对法关系和对俄关系。由于地处北欧平原，德国总是需要就此进行权衡。自1871年以来，德国的历史对此概莫能外，而这个问题也反复出现。“二战”结束后，密切的德法关系始终是德国的重中之重，而苏联占据着德国半壁江山（即东德），并且威胁要夺走德国的另一半（即西德），因此苏联一直是德国的心腹大患。

尽管德国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发展与法国的关系，但两国的利益出现了分歧。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法国希望刺激本国经济，即使这意味着会产生通货膨胀，而德国仍然倾向于实行经济紧缩的策略。对德国而言，俄罗斯很难成为适当的合作伙伴，但两国在许多方面更加契合。就像所有国家一样，德国也希望各方兼顾。因此，德国有可能稳定欧盟，继续维持与法国的关系，并与俄罗斯达成和解。但是，要想在实现上述目标的同时，满足德国的需求和公众的要求，这一政策实践起来的难度着实令人难以想象。

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随着法国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非洲与地中海，并且试图与俄罗斯结盟，德法之间的经济分歧将日益严重。这一切不仅有可能导致大国之间开展和平的竞争，而且会导致位于德俄边境甚至德法边境的小国之间变得更加剑拔弩张。

10
生死界限
处于俄欧边缘的夹缝国家

谁最了解俄罗斯与欧洲的纠纷？答案必然是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东部与乌克兰西部的人民。他们对战争的嗅觉，如同轻松预知天气的农民。作为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夹缝地带，这里既是西方通往东方的跳板，也是俄罗斯一方通往里海的道路和保卫国家安全的关键，可想而知：错踏一步，即是生与死的界限。

贫穷的霸主俄罗斯

我外祖父的出生地是普莱斯堡，他的孩子出生于波佐尼。“一战”结束后，外祖父举家离开了布拉迪斯拉发。但事实上，这三个地名指的是同一座城市，而城市的名称取决于其占领者是奥地利人、匈牙利人还是斯洛伐克人。在边境地区，一座城市可能在某个人的一生中数易其名，但他提起这座城市时也许只会用其中一个，并不一定是现有的名称。不过，在与斯洛伐克人交谈时，尤其是在午夜过后的酒吧里，你绝不能称这座城市为波佐尼。因为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边缘地带，一个地方的名称相当重要，甚至会引发流血冲突。所有边境地区莫不如此，只不过这里尤甚。

欧洲南部是地中海和黑海，北部是北海和波罗的海。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市位于波罗的海最东端，罗斯托夫市位于黑海最东端。如果在圣彼得堡和罗斯托夫之间划一条线，你就能够确定欧洲大陆的位置。这条线

以西即欧洲大陆，以东为欧洲大陆。

这条线也大致相当于俄罗斯的西部边界。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曾经都是沙俄和苏联的领土。它们位于欧洲大陆东侧，这里既有天主教徒，也有东正教徒。数百年来，俄国的边界在此变动不定，忽而将其包括在内，忽而又将其排除在外。甚至有时俄国的边界还会进一步向欧洲大陆西移。

在冷战期间，苏联一度将其势力范围扩展至德国的中心地带。但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从未长期占领过俄国的领土。欧洲那些铤而走险者，如拿破仑和希特勒，都被俄国或苏联打得一败涂地。在分裂的欧洲与统一的俄罗斯之间，从波罗的海国家到乌克兰以及从波兰到保加利亚这两列国家构成了一触即发的边缘地带。

欧洲与俄罗斯有着天壤之别。欧洲面积较小，其最宽处从丹麦北部到意大利南端的距离仅有1 500英里。欧洲大陆从东向西逐渐变窄，最窄处位于比利牛斯山一带，仅有300英里。无论是从人口数量还是国家数量来看，西欧地区都是欧洲最拥挤的地方。

幅员辽阔的俄罗斯恰恰相反，它从白俄罗斯边界到乌拉尔山南北长约1 100英里，从西向东穿越西伯利亚，显然宽达数千英里。但西伯利亚只是俄罗斯的附属地区，并非其中心地带，更不属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多为平原，之所以很难被占领，不是因为有天堑阻隔，而有河流作为屏障。俄罗斯的语言、宗教和民族比欧洲国家相对单一。欧洲的民族、宗教多种多样，而俄罗斯的同一性很难被打破。虽然俄罗斯约有上百个民族，但其中80%的人口为俄罗斯族，其次是约占其总人口3.9%的鞑靼人。这就意味着，尽管俄罗斯民族众多，但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都不会过于庞大。车臣地区的人民虽然生性凶残，但无法推翻莫斯科政权。宗教固然重要，但民族更有影响力，尤其是当不同民族拥有不同语言的时候。俄罗斯的穆斯林人口众多，但不能

误以为他们是一个单一的群体。在俄罗斯，穆斯林由于所处地区、使用的语言、所属教派和激进程度不同，差异巨大。

俄罗斯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大部分人口都远离海洋。但海洋包围了欧洲大陆，因此其经济和文化都与海上贸易有关。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指出，斯巴达是贫穷的内陆国家，而雅典是富庶的海洋国家。雅典与世界各国均有贸易往来，而斯巴达只能以内陆出产的粮食为生。当然，修昔底德也表示，近海地区的人们生活奢侈，所以往往性格软弱，而那些生活在远离海洋地区的人们更能忍辱负重。俄国士兵坚韧顽强，足以证明修昔底德所言不虚。

这种地理上的差异导致俄罗斯与欧洲各国在经济上产生了巨大差异。迄今为止，欧洲西部共有逾5亿居民，而俄罗斯在大陆部分的人口约为1.4亿。欧洲西部国家的GDP约为14万亿美元，人均2.8万美元，而俄罗斯的GDP约为2万亿美元，人均14 246美元。由此可见，前者的人均GDP大致相当于后者的两倍。此外，俄罗斯内部的不平等要远远超过欧洲西部国家。

俄罗斯是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生活在俄罗斯的中型城市与欧洲的中型城市里，你的经历将会截然不同。在俄罗斯，从就业机会到预期寿命，几乎任何方面都无法与欧洲相比。尽管俄罗斯的社会结构相对单一，但这并没有为民众带来更加幸福的生活。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曾经表示，俄国人虽然普遍贫困，但是作为个人，他们在精神上要比欧洲居民更加富足。也许的确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人的生活十分艰难。

除海洋以外，欧洲的河流也让欧洲人变得更加富有。其中最大的河流多瑙河为人们从阿尔卑斯山东麓到黑海提供了成本低廉的运输道路，而莱茵河则连接了北海、罗纳河流向地中海、德涅斯特河注入黑海。这意味着，欧洲内部的所有地区都可以参与全球贸易，而不只是港口城市。俄罗斯虽然也有河流，这些河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距离俄

罗斯的大部分地区较远。正因如此，该国的贸易主要通过陆地交通开展。

划分欧洲的利刃

欧洲大陆与亚洲大陆边缘地带的中心，即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东部与乌克兰西部的交界地区。波兰距离罗马尼亚约60英里，但在这短短的距离内，共有5个国家汇聚于此，并有5种语言、5种历史互相交织。同时，这里也是我父亲的故乡。因此，这里还有第6种历史，或者说是历史的幽灵，即犹太人的历史。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这个中心地区都至关重要。它将这个边缘地带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部是一马平川的欧洲平原，南部是崎岖不平的崇山峻岭，易守难攻。实际上，欧洲平原和欧洲山区存在天壤之别。喀尔巴阡山的最北端，也是该地区的中枢，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二。

穆卡奇曾经属于匈牙利，如今是乌克兰的城市，被称作穆卡切沃，恰巧位于喀尔巴阡山麓的中枢地带。这座城市的人们大都能讲多种语言，即使不太流利，也足以进行沟通。这里的所有人都了解地图上没有标识的小路，清楚哪一种货物在边界哪一边更加值钱。此外，就像农民能够预知天气一样，这里的所有人都能预知战争的到来。总之，这个地区就像一个高压锅，而当地的人们懂得如何在压力下生存。

这无疑是一桩幸运的本领，因为这里是欧洲的半岛与大陆压力汇聚的地方，多次产生了令人无法承受的力量。该地区以西是奥匈帝国残余势力占领的地方，但如今已被并入欧盟。该地区西北方向就是德国，该国既是欧盟成员，本身也是一个强国。此外，该地区西南是巴尔干半岛。位于乌克兰以东的俄罗斯，虽然实力有所削弱，但始终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及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当地的居民清楚，这里的边境时常处于变动之中。

同时，这里也是如今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冷战时期，欧洲的火药桶位于德国中部以南的地区，但现在已经东移，并进入了乌克兰。为了确保这个缓冲地带的安全，俄罗斯与西方一直在角逐此地的霸权。如果西方获胜，双方的边缘地带将位于乌俄边境。反之，若是俄罗斯获胜，这一界限就在此地，也就是数百年来俄罗斯与欧洲争夺的边缘地带。因此，下一代美军士兵的基地位于哪里，很可能取决于乌克兰战争的结果。总之，该地区的地图瞬息万变。

我们不妨看一看，在3代人的时间里，这里的地图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以下是我父亲出生时该地区的地图。

当时，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巴尔干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还不是独立国家。当时欧洲大陆的边缘地带位于奥匈帝国、俄国和德国这三个大国之间，德国控制着该地区北部的一小片领土。

我生活在冷战时期，这个时期的边缘地带与上述描写存在很大差异。彼时，奥匈帝国烟消云散，德国一分为二，许多新兴国家纷纷出现，而苏联则大幅西进。

双方的边界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入西方。但如今边界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不再像父亲生活的时代那样易于穿越。对他来说，这一边缘地带是一个含糊不清的地方，存在许多种解释。但对我来说，这个地带仿佛一把利刃，精确地将欧洲分为两半。更加重要的是，在这里错走一步就可能意味着死亡。当时，我内心深处始终认为，华沙永远是敌国的领土。

然而，对我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看到的欧洲地图与我年轻时看到的大相径庭。

此时，俄罗斯已经退回了彼得大帝进行领土扩张之前的边界。几个世纪以来从未取得过独立的国家纷纷获得了主权。在50多年的时间里，

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从德国中心转移到斯摩棱斯克附近，它曾经是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对我来说，这里曾经是一道生与死的界限，但对我的孩子们来说，欧洲已经截然不同，成了一个旅游胜地。

黑手党国家摩尔多瓦

虽然这样一片辽阔的地区很难描述清楚，但我们可以从其中的一小片土地开始讲起，因为这片土地反映了这个地区所有的复杂性、含混性和危险性。其中，摩尔多瓦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认清这块边地乃至大部分边地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影响。

自1800年以来，摩尔多瓦先后被划入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苏联和罗马尼亚，但最终获得了独立。如果你不喜欢摩尔多瓦现在的地位，那么不出数年，它就会发生改变。由于面积狭小，摩尔多瓦的地位并不重要，但在地理上却具有战略优势。此外，该国的主要语言是罗马尼亚语的某种方言，但也有许多人使用俄语。

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三国在此交界。在“二战”以前，德国人尚未占领此地时，这里曾经是犹太人定居点。1903年，这里发生了一场屠杀，在犹太历史上极其著名。当时，在摩尔多瓦的首都基希讷乌（时称基什尼奥夫），一名基督教妇女死于一家犹太医院。当地一家俄语报纸刊登了一则报道，声称是犹太医生毒死了她。在随后的报复行动中，有50多人遇害。为此，世界各地的媒体纷纷对这场屠杀进行了报道，尤其是《纽约时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专题报道。当我造访基希讷乌时，我不由自主想起了此事，但是对此我感到有些奇怪。1903年，50多名犹太人死在这样一个寂寂无名的地方，仍是一件引人瞩目的事情。50年后，不计其数的犹太人惨遭杀害。相比之下，基什尼奥夫发生的屠杀甚至微不足道。因此，边缘地带既存在于不同的地区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的时代之中。

世界上有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摩尔多瓦，但它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它位于普鲁特河与德涅斯特河两大河流之间，普鲁特河是该国与罗马尼亚的边界，德涅斯特河大致相当于摩尔多瓦与摩乌的边界。乌克兰最大的港口是敖德萨，过去俄国正是通过这里进入黑海和地中海。因此，敖德萨一旦落入敌国之手，比如纳粹德国，苏联就会蒙受重大损失。反之，如果能够控制此地，俄罗斯就能通向全世界。所以，无论乌克兰与俄罗斯是分是合，后者都对敖德萨格外关注。如今，俄罗斯人竭力扩大在当地的影响，而罗马尼亚人则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对其进行遏制。这个危险地带虽然未必会爆发战争，但有可能会发生内部冲突。

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希望将普鲁特河作为乌克兰边界，因为如果以德涅斯特河为边界，它距离敖德萨仅有大约50英里。一旦其他国家控制了德涅斯特河西岸，两国将很难进行防御。由于第聂伯河也流向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所以俄罗斯通向海洋的道路就有可能被阻断。总之，谁能控制摩尔多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说，它是通向里海的道路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手段。而对西方列强来说，它是通往东方的跳板。因此，当希特勒与斯大林签署条约时，两人在秘密附件中规定，苏联有权占领巴撒拉比亚，即摩尔多瓦的一部分。2014年，为数不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摩尔多瓦举行了军事演习。虽然没有人认为，这里会立即爆发战争，但各方都在观望，不是因为摩尔多瓦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因为该国是解决重大问题的关键。

官方统计显示，摩尔多瓦是欧洲最贫困的国家。我前往该国时，随行的还有我的妻子和一名女性下属，她们都头脑冷静、态度认真。当我们沿着基希讷乌的街道步行时，她们对身旁年轻女子所穿的靴子进行了价格评估。我从她们那里得知，这些靴子并不便宜。在最贫困的欧洲国家中，当地的妇女竟然穿着价格不菲的靴子。就像妻子和下属一样，我突然对摩尔多瓦有了更多了解。这个国家并不像我预料中那般贫困，她们告诉我的是我此前根本意料不到的事情。

更加有意思的是，我们还造访了基希讷乌之外的一座城市——奥尔海伊。从统计数字上看，这也是一个贫困地区，但街头的汽车随处可见，其中不少甚至是宝马汽车。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银行也比比皆是，其中包括诸如法国兴业银行在内的大型国际银行。在此之前，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在那里看到宝马汽车、国际银行和衣着考究的普通人。

官方统计数字未必能反映事实，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这里是乌克兰与罗马尼亚的边境地区，也就意味着处于俄罗斯和欧盟的双重影响之下。罗马尼亚的银行是欧洲银行，存入其中的资金可以得到清洗，在转换成欧洲资本后向全球流动，并不断增值。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希望将资金注入欧洲，因为毕竟谁都不清楚存在德涅斯特河以东的资金的前景将会如何。

从法律上讲，位于德涅斯特河以东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属于摩尔多瓦，但实际上该共和国已经独立。有人将其称为黑手党国家，即有组织犯罪团体开展非法活动的中心，其中包括贩毒和洗钱。无论该地区属于乌克兰还是摩尔多瓦，它都处于俄罗斯石油寡头的控制之下。当时，对于来自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资金，其命运无从知晓。这些资金在向西流入欧盟后销声匿迹，当它们再次出现时已经变成合法资金。英国著名间谍作家约翰·勒·卡雷在小说《通缉要犯》（*A Most Wanted Man*）中，将其称之为“利皮扎马资金”。这是因为利皮扎马[(1)]

在出生时是黑色，后来会变得通体雪白。洗钱活动成了当地的主要产业。至于未来将会如何，谁也不清楚，因此当地人认为必须加以警惕，并尽快清洗资金。

如今，摩尔多瓦人可以拿到罗马尼亚护照，这是罗马尼亚政府给予他们的特权，但这种权利遭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抵制，尽管这种抵制并不强烈。如果你带着一笔资金来到摩尔多瓦，交给一个你信任的或者畏惧你的当地人，而这个人恰好又持有罗马尼亚护照，你就可以让资金

流入欧盟进行投资，从而清洗成为干干净净的合法资金。这个过程相当复杂，但正好能够解释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大批银行、昂贵的靴子和宝马汽车。

在所有边境地区，走私都是一桩必不可少的生意。在上述情况下，这里走私的对象是资金。与此不同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里走私的对象是女人。据说欧洲的合法妓院里有一大批妇女都是摩尔多瓦人，她们不顾一切地想要在这个岌岌可危的世界里生存下去。

欧盟和北约从未像现在这样影响深远。虽然有传闻称，摩尔多瓦有可能被并入罗马尼亚，但欧洲人并不希望看到摩尔多瓦正式成为欧盟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当前情况下。至少有一部分摩尔多瓦人利用本国作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跳板的地位大发横财，因此很难接受并真正遵守欧洲的法规。罗马尼亚之所以没有被包括在《申根协定》之内，部分原因正在于此。该协定规定，凡是持有欧盟国家护照的人，都可以在不受盘查和搜身的情况下进入其他欧盟国家。虽然罗马尼亚人越来越希望对上述非法活动进行限制，但无论他们的打击多么有效，走私活动都是边境地区一种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摩尔多瓦反映了边境地区的本质与罗马尼亚的希望之间的冲突。虽然罗马尼亚的愿望是诚恳而合理的，但无疑给边境地区带来了挑战。

我们应当记住，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地区虽然数易其名，但一直在开展走私活动，只不过对象不同而已。毋庸置疑，这一点十分重要。这里古老的清真寺如今已经变作教堂，操着各种各样语言的人们汇聚于此，酒馆里经常可以见到身材结实、衣着讲究、深沉冷峻的人相互低声耳语。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事情的真相。此外，我们也不应忘记，这个地区曾多次爆发战争，尤其是在31年当中，这里受到苏联和纳粹军队的重创，而罗马尼亚人不得不两面作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的历史就是欧洲的历史。与文明整洁的欧盟国家相比，这里肮脏而又混乱。

这里的边境地区再次变得地域广阔、易于渗透，甚至比“一战”前充

斥着更多贸易往来以及其他合法与非法活动。事实将会证明，就像过去一样，在欧洲，欧盟作为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利用俄罗斯的退却，继续向东推进。但问题在于，欧盟究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还是一种虚无的幻想。

当然，目前人们尚不清楚，欧洲会作出何种举动。如今，在欧洲东部，尤其是在过去的东欧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动荡。德国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从而打破了欧洲的力量平衡。而美国正处于冷漠观望阶段，这也意味着，所有人都担心美国会坐视不管。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个曾经多次爆发可怕冲突的边缘地带是否会偃旗息鼓，或者南斯拉夫只不过是该地区即将爆发冲突的一个缩影？

---

(1) 利皮扎马是产自西班牙的一种高级骑术马，是竞技场上最受欢迎的马种。

11

西进

俄罗斯中兴背后的困境与宿命

> 欧洲势衰的前提下，日益西进以抗衡北约东扩的俄罗斯与德国结盟将是大势所趋。问题在于，俄德联姻之后，俄罗斯将如何对付时刻威胁其生命安全的夹缝国家，尤其是波罗的海国家？虽然边缘地带到处都呈剑拔弩张之态，但或许这里才是俄罗斯与欧洲大陆之间一触即发之地。

苏联解体使俄罗斯的领土大幅缩减，从而变得极其脆弱。俄罗斯的经济陷入混乱，但混乱的源头不只是私有化。该国的工业落后于西方一至两代人，因此无法与后者进行竞争，除非俄罗斯能和同样较为落后的前加盟共和国联合起来，并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帝国里开展贸易。苏联虽然做到了这一点，但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俄罗斯的工业虽然无法与西方竞争，但原材料极为紧俏，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欧洲急需这两种能源，而俄罗斯通过现有和新建的输油管道以及海上航路为西方提供油气资源。

俄罗斯经济依赖于欧洲国家对石油的采购。幸运的是，欧洲急于得到俄罗斯的石油。但其中存在几个问题：首先，俄罗斯需要能源价格上涨；其次，俄罗斯必须确保，欧洲不会另寻获得能源的渠道；最后，俄罗斯还要确保能够顺利将油气运往西方。然而，俄罗斯所有现存和计划修建的管道都要穿越几个独立国家。具体来说，这些管道首先要穿过白俄罗斯或乌克兰，然后途径波兰、斯洛伐克或匈牙利，最终抵达对油气必不可少的奥地利和德国市场。

为此，俄罗斯不仅必须确保管道能够通往德国，而且需要保证其他国家不会征收过高的附加费用，否则德国就会另寻能源，或者迫使俄罗斯稳定能源价格、承担附加费用。因此，这个问题关系到政治而非经济。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征收附加费用完全合理。所以俄罗斯需要设法劝阻管道途经的这些国家收取高额附加费。但即便如此，俄罗斯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国家可以阻碍俄罗斯运输油气资源。虽然它们很可能并不会做出如此举动，但俄罗斯人不能过于乐观，因为他们曾经吃过多次亏。

角逐乌克兰

因此，俄罗斯必须从某种程度上控制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而它也正为此进行努力。随后，俄罗斯必须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根据俄罗斯在冷战后的经济策略，就像过去一样，它将不得不继续西进。尽管俄罗斯目前无意发动战争，但它也绝不会对边境地区的未来作壁上观。俄罗斯的战略重点首先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目前，白俄罗斯还不足以构成威胁，因为该国实力薄弱，而且需要俄罗斯的资源，因此该国领导人往往屈服于俄罗斯的意志。但即使是对这个国家，俄罗斯也不能完全放心。一旦白俄罗斯现任领导人卢卡申科下台，谁也无法预料该国的政治走向。因此，俄罗斯人必须借助经济手段以及与白俄罗斯情报机构的关系，迫使其认可莫斯科的影响。也就是说，俄罗斯必须积极参与白俄罗斯的内部事务。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乌克兰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欧洲作出的战略决策。当时，它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允许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作为中立的缓冲区继续存在；二是尽可能将这些国家并入北约与欧盟。俄罗斯人无力阻挡北约或欧盟向东推进。此前他们认为，北约永远不会向苏联地区推进，并且声称曾经得到过后者的承诺。然而，当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后，这个承诺无论是否属实，都已被打破。北

约朝着莫斯科的方向向东推进了500英里，距离圣彼得堡只有100英里之遥。

双方就乌克兰问题展开了首次角逐，而这个地区无疑是俄罗斯的战略要地。这不只是能源管道问题，而是关系到俄罗斯的长治久安。乌俄边境长达700多英里，距离莫斯科仅有500英里，其间一马平川、毫无遮挡。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都在乌克兰境内，为俄罗斯提供了通向黑海与地中海的贸易和军事通道。如果乌克兰被并入北约和欧盟，俄罗斯就会在波罗的海和乌克兰面临威胁。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俄罗斯丧失进入乌克兰的通道，其经济战略必将遭受沉重打击。总之，一旦乌克兰与北约结盟，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无疑会受到威胁，而如今这种威胁已经再次浮出水面。乌克兰局势远未尘埃落定，所有曾经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正在重新出现。鉴于乌克兰对俄罗斯至关重要，这一点完全说得通。

“乌克兰”一词意为“边区”。这个地域广袤的边缘地带将欧洲大陆与俄罗斯连接了起来。该国东部主要是俄罗斯族，以俄语为母语；西部则为熟悉欧洲的乌克兰人所控制。越往西去，当地的乌克兰人就越西化。

最近我正在摩尔多瓦作客，那里是我祖先的故乡。一个周日的清晨，我看到有许多人正开车或步行前往教堂。由于不方便停车，司机说他把我们送到教堂以后，会到远离市中心的地方等候。他不敢把一辆波兰牌照的新车留在那里，因为他担心我们回来时轮胎被撬或者汽车被盗。

当我们来到街上，发现街道两侧分别有一座大教堂，其中一座是罗马天主教堂，另一座是东正教堂。时值秋季，气候宜人，两座教堂里都水泄不通，许多家庭都站在教堂外面聆听布道，甚至连街上都站满了人。随着参加祈祷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意识到，这两座教堂正在暗中较劲。布道者的声音越来越高，情绪越来越激动，似乎想要竭力压倒对方。突然，天主教堂打开了扩音器，开始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向街上布道。而东正教堂虽然没有公放布道声，但礼拜者纷纷离开教堂，涌上街

头，替自己的教堂发出呼喊。当时，我们距离信仰天主教的斯洛伐克只有几英里，但这里自1920年起就属于乌克兰。显然，这个问题在摩尔多瓦也没有得到解决。

显而易见，这是乌克兰的一个弱点。在该国东部，俄罗斯的影响巨大，而西部则受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影响。从政治上看，乌克兰人分为以下几派：一派希望加入欧盟，另一派希望向俄罗斯靠拢，还有一派希望乌克兰完全独立。这让俄罗斯人感到更加焦虑。毫无疑问，类似分歧让乌克兰极易受他人操纵。俄罗斯人十分清楚这一弱点，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对乌克兰进行操纵。正因为如此，俄罗斯人才把外界参与视作对乌克兰的操纵，以及对他们在乌利益的潜在威胁，而在乌利益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美国和欧洲对苏联地区的政策是，力图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转变成宪政民主国家，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做法能够促进社会稳定，使其融入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中。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和美国都资助了一些在他们看来赞成民主制度的非政府组织，但这些组织有悖于俄罗斯的利益。乌克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但美国人并未察觉俄罗斯人将其视为一种严重的干涉行为。更加关键的是，俄罗斯人不相信，西方国家真的动机单纯。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尚无暇顾及此事，因为他们本身已不堪一击、四分五裂。当时，美国和欧洲国家认为，俄罗斯不需要做出任何回应，因为北约显然并不构成任何威胁，况且与欧盟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只会让之前的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从中获益。因此，美国和欧洲开始利用俄罗斯的商业机会开展活动，并且认为各方已经捐弃前嫌。随之产生的还有非政府组织，它们自视满怀正义和美好的愿望。这些人认为，凡是对他们表示怀疑的人，不是已经落伍，就是腐败无能。在他们看来，只要其用意良好，所有人都应对他们友好相待。

2001年，美国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伊斯兰世界，彼时欧洲的军事

力量被彻底挖空，北约形同虚设。有人指出，欧美国家支持拥护民主制度的非政府组织，会让俄罗斯人感到岌岌可危，但美国对此不予理会，认为这种观点毫无根据，而俄罗斯人也不可能对此信以为真。坦率地说，彼时的欧美国家对俄罗斯不屑一顾，认为它贫困脆弱，而西方可以为所欲为。

正是这种轻敌的态度造就了弗拉基米尔·普京。他发迹于圣彼得堡，并在当地影响巨大，尤其是科索沃战争让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塞尔维亚人参与了这场战争，在南斯拉夫地区犯下战争罪行。1999年，当占据优势的阿尔巴尼亚地区与塞尔维亚政府之间爆发冲突时，西方进行了干预，并对塞尔维亚实施了两个月的空袭。

俄罗斯人虽然不希望看到此事发生，但还是选择冷眼旁观。他们协助开展了斡旋，促使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并表示希望参与科索沃的维和行动，但最终未能如愿。俄罗斯人认为，西方对他们过于轻蔑，但实际上，西方只是漠不关心而已。普京认为，这种冷淡态度令人难以容忍，并在取代叶利钦上台后，试图改变自1991年来双方的状况。

普京出身于克格勃。他从特定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是一个冷酷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会陷入空想。我怀疑，苏联解体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克格勃是苏联唯一不会刻意进行自我欺骗的机构。同时，尤里·安德罗波夫也是一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众所周知，在安德罗波夫的统治下，苏联深陷危机。这个国家需要进行改革，并对西方资本开放。如果他们不去利用地缘政治优势换取改革开放，那么他们必须付出代价。为了实施安德罗波夫的救国战略，戈尔巴乔夫制定了行动计划，而改革和公开正是该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但这次改革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作为一名极端现实主义者，普京马上意识到这一失败意味着什么。在苏联，私有化意味着将公有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对缺乏法制的国家来说，在这种转化过程中财产必然会落入强者之手，而苏联出类拔萃的

强者往往来自安全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组织建立了后来的寡头政府。俄罗斯的政治寡头、黑手党和前克格勃有时浑然一体，其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圣彼得堡时，普京就为自己的权力奠定了基础。

然而，作为克格勃成员，他对政权和祖国怀有深深的忠诚。但情报人员生性多疑，训练后变得更加疑神疑鬼，因此他们并不相信关于忠诚的声明。他们知道空谈无益，但不愿接受薪水微薄的行政工作。对某些人来说，其中可能存在潜在的投机风险，因为他们将其视作通向财富和荣誉的途径。但事实上，这份工作既不能为他们带来财富，卑微的地位也无法给他们带来荣誉。因此，在内心深处，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结和职业自豪感让他们无法接受失败。

普京也是失败的一方，并为此深感痛苦。他亲眼目睹祖国陷入贫困，而欧美国家冷漠和轻蔑的态度更让他难以忍受。在积累财富和权力的同时，他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后来他在政治讲话中公开表示的那样："总之，我们应当承认，苏联解体是本世纪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现在，他已经具备了有所作为的权力，并从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俄罗斯的实力。从这些行动中，人们既不难看出他对此引以自豪，也不难看出他对祖国的热爱，尽管这种感情被深深埋藏在情报人员必需的怀疑精神之下。毋庸置疑，他所立下的誓言和对祖国的热爱让他热血沸腾。

普京清楚，美国远比俄罗斯强大。同时，他也知道，从长期来看，华盛顿能够影响欧洲，尤其是位于边缘地带的国家。但是，现在美国正深陷中东泥沼，俄罗斯可以借机重整军事实力，重塑边缘地带，尤其是乌克兰，以确保本国安全。如果他继续等待，机会将稍纵即逝。反之，如果他轻举妄动，俄罗斯的军队尚未准备就绪。但是，由于欧洲离不开俄罗斯的能源，导致僵局出现，从而为他提供了行动的机会。

俄格战争的目的在于削弱美国在边缘地带的影响，打击亲美欧力

量，而俄罗斯成功地达到了目的。显然，美国和欧洲都不会出兵干预。无疑，俄格战争改变了该地区的力量平衡。俄罗斯的这一举动不仅加强了在高加索地区的地位，也改善了在乌克兰的处境。在格鲁吉亚，俄罗斯直接采取了军事行动。而在乌克兰，面对巴尔干地区军事行动引发的国内动荡，俄罗斯暗中以及公开施加了政治压力。尽管处在和平时代，但边缘地带的矛盾正与日俱增。经济固然重要，但过去的战略布局同样不容小觑。

虽然目前俄罗斯没有面临军事威胁，但它清楚，军事威胁一旦出现，必然来自欧洲，也必然令人猝不及防。鉴于乌克兰的前景仍不明朗，这种军事威胁恐怕随时会出现。当然，俄罗斯不需要仓促出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尚不具备这种军事力量。但如果俄罗斯仍未采取任何措施，就会显得过于轻率。这种思维在今天的欧洲似乎有些落伍，但弗拉基米尔·普京经过地缘政治现实的长期锻炼，懂得要为最坏的情况作出打算。在这件事上，他有关苏联解体是一场地缘政治灾难的说法正在逐渐应验。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有两种选择：一是尽可能在欧洲平原向西推进，形成战略纵深，获得工业和技术资源；二是抵达喀尔巴阡山，利用它作为屏障。但目前看来，两者都不太可能实现。如果白俄罗斯仍然处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内，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就会成为扩张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一旦白俄罗斯出现状况，这条界限就会向东移动。为了在喀尔巴阡山获得南下的据点，俄罗斯的问题不仅在于罗马尼亚，还在于乌克兰。综上所述，俄罗斯人面临着严峻的战略问题。而从整体上看，他们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经济和战略困难。

但上述问题均与对手的能力有关。俄罗斯本身就比波罗的海—白俄罗斯—乌克兰一线上的国家更加强大。如果能够阻碍第三方进行干预，俄罗斯就能强行或者通过颠覆活动向西推进。此外，它还可以继续深入，在波兰—罗马尼亚一线发挥自身的决定性影响。迄今为止，俄罗斯

之所以引而不发，一是因为它担心欧盟和北约如果予以抵制，就会形成一股潜在的力量；二是因为对俄罗斯来说，建立真正的缓冲区与直接占领获得的益处，实际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归根到底，俄罗斯的目的在于保卫国家，而非领土扩张。

欧盟势衰，东欧重回苏联时代？

苏联的卫星国在加入北约与欧盟时，认为能够实现3件事情：首先，北约所提供的军事实力能够保护它们将来免遭俄罗斯侵袭；其次，欧盟能够保证它们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这既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也是为了进一步融入兴旺发达的欧洲；第三，加入上述组织，能够确保国内长期实行受宪法保护的自由主义。换言之，这些国家认为，它们将成为西欧的一部分，消除独裁与腐败。

第三个愿望取决于前两个愿望的实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北约较之以前大为衰落。除了美国以外，北约的军事实力极其有限，仅英法的情况稍好，但仍远远不及美国。只有美国参与其中，北约才真正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美国不是欧洲国家。此外，只有在全体成员一致同意的前提下，北约才能顺利运作，因此单个国家无法阻止任何行动。而欧盟步履蹒跚，没有任何重获繁荣的迹象。因此，东欧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战略地位。

与以前相比，东欧人的生活质量不算太差，但远不如苏联解体后他们曾经期望的那样。这些国家不仅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也毫无起色。由于它们的起点低于其他欧洲国家，所以对它们来说，即使维持经济平稳也困难重重。

匈牙利人对俄罗斯人的仇恨由来已久。他们仍然对1956年的革命和苏联坦克记忆犹新。匈牙利政治文化有两大支柱，其一为对俄罗斯的恐惧，其二是希望成为欧盟成员，从而实现宪政民主和经济繁荣，过上美

好的生活。但事实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现实的人生比预期的生活更加复杂。

布达佩斯的瓦茨街就像纽约的第五大道，10年前曾经熙来攘往，如今却破旧不堪。许多全球顶尖品牌陆续离开，被一些不太著名的商家取代。2005年，我曾经到过这里的一家珠宝店，里面价格昂贵的珠宝琳琅满目，但现在早已不复存在。贡德勒是布达佩斯首屈一指的餐厅，很容易预约。这家餐厅的一半顾客都是来自美国的犹太游客，其中许多人还穿着运动服。不仅如此，餐厅里的小提琴演奏的是犹太乐曲，而不是吉普赛旋律。然而，价格较低的餐馆里挤满了匈牙利人。

从多瑙河沿岸和布达山上望去，这座城市依旧美丽动人，但昔日的繁华已经成为过眼烟云。2008年以前，布达佩斯正在追赶西欧城市的节奏。那时，布达佩斯的街头熙熙攘攘，人们忙于生意和赚钱。2011年，这种紧迫的节奏开始减缓。布达佩斯的街上很少出现人潮，人们可以轻松地穿过街道。

我们需要了解，为了应对欧洲经济危机，匈牙利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一点十分重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是中间偏左的青年民主党主席，在获得绝大多数人支持后上台执政。与该地区其他大多数首脑不同，他能够大权在握。匈牙利共产党失势后，奥地利和意大利银行纷纷进入匈牙利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开始提供抵押贷款。匈牙利不在欧元区内，而是使用本国货币福林（1元人民币相当于43福林）。福林有可能贬值，为抵消这一风险，以福林计算的抵押贷款利率相对较高。因此，这些银行在向匈牙利借款时，使用的是欧元、瑞士法郎，甚至日元。因为人们认为这些货币风险和利率都较低。

正如美国人一样，匈牙利人也对低利率趋之若鹜。但随着福林贬值，匈牙利人每个月需要用来偿还抵押贷款的福林越来越多，导致他们最终不得不开始拖欠贷款。银行不愿取消赎回权或承认呆帐，借方无法偿清贷款。有鉴于此，欧尔班出面干预，宣布将以福林而非借方贷款时

使用的货币偿还款，并声明匈牙利只需要偿还其中一部分贷款。

这一决策虽然保护了匈牙利人，但违反了欧盟就如何处理债务危机达成的基本共识。如果任何一国政府都可以宣布对其他国家的银行拥有最高及单方管理权，这场博弈将无法进行下去。尽管欧尔班的决定事关重大，但这些银行和欧盟最终不得不委曲求全。由于欧尔班削弱了宪法法院的地位，从而影响到媒体，并提高了他继续执政的概率，所以欧盟一度威胁称要对匈牙利进行制裁。但随着欧尔班的态度趋于缓和，欧盟遂收回了这一威胁。随后，欧盟对贷款的态度变得更加犹豫不决。最终，各大银行不得不屈服，而欧盟却对此置之不理。

这场风波涉及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第一，欧盟竭力想要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留在机构之内；第二，欧元危机迫使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的决策者们转而关注欧洲货币联盟的问题，从而忽视了东欧发生的事。最后，匈牙利期望得到的益处未能实现，欧尔班开始转向民族主义立场。他关心的不是欧盟，而是匈牙利以及个人仕途。显然，他对匈牙利债务人的保护让他在国内备受拥戴。令人惊讶的是，欧盟并没有对匈牙利的做法表示质疑。

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欧盟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它已经失去了经济上的吸引力，而且其成员国没有共同的对外防御政策。如今，欧洲的防御政策仍然由北约制定，但北约从军事实力上看，与其说是一个欧洲组织，不如说是一个美国组织。1991年，东欧国家发现，俄罗斯软弱无能，而欧洲则日渐强大，但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从波兰到罗马尼亚，北约和欧盟的表现一再令人失望，更何况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能确定。这种局势也为俄罗斯人寻求战略利益打开了方便之门。

俄罗斯并不想公然占领该地区，但希望限制北约在东欧的力量，阻挡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因为通过向东欧提供经济援助，欧洲一体化有可能对俄罗斯形成战略威胁。由于美国人对此漠然置之，而欧洲人又没有能力开展大规模经济行动，俄罗斯便利用有限的资源，趁机扩大在东欧

的影响。对喀尔巴阡山一带的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来说，情况尤其如此。

俄罗斯人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其一我称之为“贸易地缘政治”。如果不能控制这些国家，俄罗斯怎样才能阻止它们朝着自己不希望的方向发展？为了拉拢这些国家，俄罗斯向其能源、矿产和其他行业提供了投资。虽然俄罗斯并不打算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商业，但希望拥有足够的力量影响这些国家的商业决策。俄罗斯人感兴趣的是如何赚钱，而该地区无疑有利可图。

尽管在其他地区投资可能利润更大，但俄罗斯的目标在于地缘政治。俄罗斯在不同产业建立起一个从属于自己的网络，从而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决策。对喀尔巴阡山一代的国家来说，疏远俄罗斯是不明智的做法。因为此时它们正处于风口浪尖，欧洲投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匮乏，而美国投资无法带来政治保护，所以它们无法承担与俄罗斯为敌的风险。总之，它们欢迎俄罗斯对本国的任何产业进行投资，而为此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微不足道。因此，欧盟一体化进程并未加快，而与北约合作就像是与幻影结盟。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俄罗斯拥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并且与上述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在后者被占领期间，还是独立之后。俄罗斯掌握着这些东欧国家所有人的档案，了解人们想要隐瞒的一切事情。它不需要公开进行敲诈勒索，因为情况显然更加微妙。那些有过不法行径的人们当然知道俄罗斯的情报机构，也清楚该情报机构掌握着有关记录，于是只能自我约束。在2008年以前，情况并非如此，而在2001年以前，这种事情更不可能发生。当时人们认为，这些都已成为过去。但是随着欧洲出现动荡，俄罗斯开始玩弄手段，对于这些人来说，乖乖就范显然是更加审慎的做法。这一点虽然不会对普通人产生影响，但凡是涉及政治、工会和商业的人都十分清楚，这足以影响他们的决定。

俄罗斯人始终将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流经的匈牙利大平原视作理想

的缓冲区，但并不需要占领这个区域。事实上，俄罗斯人已经有过教训，占领这些地区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此之前，正是此举掏空了苏联和俄罗斯帝国。对于这个问题，普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办法，即为了维护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俄罗斯必须拥有足够的控制力，但在具体操作时，要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手段。

不可否认，普京的办法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它符合俄罗斯的商业和政治利益。然而，越来越多人认为，苏联治下的国家开始独立自主，不再受到其他人控制，因此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一些国家希望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就意味着，要想重获平衡，它们需要一面取悦俄罗斯，一面保留加入欧盟的选择。

猎枪下的“俄德联姻”

鉴于俄罗斯薄弱的实力以及欧盟的不确定性，边缘地带发生的一切都是试探性的举动，各国的立场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只要法国、苏联、德国有一点风吹草动，这些国家就会玩弄同样的把戏。但当时的国际环境更加冷酷无情，令人不堪重负。随后，双方的合作不再事出偶然，而是成为猎枪下的“婚姻”。只是如今“新郎”的手中没有猎枪，而是拿着巧克力向百般不愿的“新娘”求爱。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谁也无法估计，但至少目前看来情况是如此。

喀尔巴阡山以北的局势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因为那里的地形相对单一，都属于平原地区。历史证明，这一地形让北部地区的风险更大。俄罗斯只在冷战时期占领过喀尔巴阡山附近的国家，但显然这并非历史常态。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俄国和德国一直试图对北部地区施加影响，并就此展开激烈的角逐。受此影响，各国的边界也沿着平原地区来回变动，尤其是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经常消失于大国的版图之中。

但该地区无疑利害攸关。德国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而平原以西是

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法国。两者结合起来，其经济实力在全球位居第三，超过了日本，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如果再加上波兰、俄罗斯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波罗的海三国这些小国，该地区的经济实力就会超过中国。作为整体，北欧平原是全球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鉴于该地区极其重要，此处任何政治分裂都意义重大、错综复杂。德法两国一度密不可分，但现在开始互相疏远。德国和波兰虽然关系密切，但两国都有着可怕的回忆，而波兰或者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也如出一辙。在“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的31年间，该地区的人们曾经饱受苦难。因此，在对冲突爆发点进行考虑时，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个地区始终一触即发。

德国再次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强国，但从未试图成为哪怕最低限度的军事强国。然而，随着局势发生变化，这似乎变得微不足道。因为德国正在决定着欧盟未来的走向，同时也正是德国施压导致欧盟采取经济紧缩政策。不可否认，在就削减债务的条款进行谈判时，德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外，欧元的价值由中央银行掌控，因此德国对欧盟拥有最大的影响力。

德国既让人羡慕，也惹人憎恨，这一切仿佛昨日重现。在南欧和东欧，人们认为德国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出口国，对小国的需求漠不关心。他们认为，德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欧洲强国，并且再次对此感到恐惧。1945年后，德国的复兴令人惊奇。法国曾经担心，德国将会主宰欧洲，但如今这一顾虑已成为现实。众所周知，德国最初的经济复苏与美国有着莫大关联，因为当时德国主要得益于向该国的出口。然而，德国从经济上和军事上依赖美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现在的德国不仅独立自主，而且已经成为支离破碎的欧洲首屈一指的力量。

在欧洲，德国同样感到担忧，因为德国商品的主要市场由于经济衰退而严重收缩，甚至有可能分崩离析。此外，德国还担心欧洲日渐抬头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不仅让德国招致怨恨，而且有可能激起德国

国内的民族主义。在德国，许多人认为希腊不负责任，并且对呼吁德国救济希腊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行为深恶痛绝。这既是因为德国人对本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感到满意，也是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认为，那些陷入困境的国家损害了德国的利益。至于德国的繁荣在多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这些国家为代价的，他们并没有考虑。但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欧洲的民族主义。

德国领导人清楚，一旦跨越心中的界限，德国将重蹈覆辙。而这条界限就是，德国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以及正面临着军事威胁。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尽管德国国内的确有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成了受害者，但德国并没有面临外部的军事威胁。总体而言，德国唯一潜在的威胁是俄罗斯，但目前还不足以成为事实。因此，目前德国并不存在跨越界限的危险。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俄罗斯出于恐惧，本能地不断向西推进。该国很难从北面进行防御，所以白俄罗斯是不可或缺的缓冲地带。但俄罗斯更担心的是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三个弱小国家。当然，引起麻烦的不是这些国家本身，而是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波罗的海三国就像一把直插圣彼得堡的刺刀，任何一个大国都可能利用它们作为据点，对俄罗斯发起袭击。从许多方面来看，波罗的海国家与其说属于欧洲平原，不如说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但正是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酿成了它们的历史悲剧。

尽管俄罗斯唯一可以想到的威胁就是德国，但德国丝毫无意重新进行大规模武装，更不用说对俄罗斯发动袭击。但正如前文所言，一个国家的战略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从长远来看，俄罗斯无法确保下一代德国人仍然坚持这种想法。更何况欧洲的未来尚不确定，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也充满变数，因此谁也无法预料将来德国人的想法。俄罗斯需要建立缓冲区，而历史上这个角色一直由波兰扮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有过20年的独立时间。随后，波兰被苏联占领，直到1989年才

完全独立。此后，波兰开始迅速发展，并成为欧洲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波兰仍然夹在俄罗斯与德国之间，既对两国充满了恐惧，又不得不与它们共存。

最根本的问题是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为这一关系将从整体上决定欧洲的未来。两者的关系就是西欧与东欧之间的关系。德国是西欧最大的经济强国，而俄罗斯控制着东欧。因此，它们将塑造乃至决定处于两者之间那些边缘地带国家的命运。

基于以上考虑，德国仍积极致力于欧盟的发展，但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一旦欧盟崩溃，随着贸易壁垒重新出现，严重依赖出口的德国必将面临深刻的经济危机。德国当然不希望欧盟崩溃，但也许对此无能为力。假如欧盟解体或者陷入长期困境，德国就必须与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然而，在欧洲，德国找到理想盟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同时，作为出口大国，中国是德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美国虽然是进口国家，但时常卷入冲突之中，并且希望德国也参与进来。众所周知，美国向来不惜使用贸易手段迫使盟国合作，参与本国的冒险行动。

俄罗斯是德国唯一潜在的合作伙伴，而且该国的能源供给对德国不可或缺。但问题是，两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极不对称。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和资金数量不足以吸纳德国的全部出口，而德国也不希望完全依赖俄罗斯的能源，而是开始另寻出路。当然，双方的历史记忆也十分糟糕。

另一方面，虽然德国与俄罗斯的人口都在迅速减少，但俄罗斯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以及大量失业和贫困人口。虽然随着人口日渐减少，俄罗斯可能解决部分经济问题，但对德国来说，其实际情况远非如此。除非德国能够发明出不可思议的生产设备，否则人口减少就意味着经济衰退。然而，德国也不希望接纳更多移民。德国境内的穆斯林移民数量庞大，在许多德国人看来，这已成为一种不稳定因素。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用增加移民的手段来弥补人口萎缩造成的缺口，都会对

德国造成严重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德国进退维谷，它既需要更多工人发展经济，又无力接纳更多移民。因此，解决该问题的一种方案是，将工厂建在俄罗斯等劳动力充裕的国家，从而获得更多劳动力资源，而无需承担社会成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德国已经开始将其付诸实施。然而，关键在于，两国希望相互依赖的程度有多深。笔者在前文提到过，国家间相互依赖会导致摩擦出现。尽管德国人和俄罗斯人都不希望发生冲突，但假如欧盟从整体上崩溃或者人们感觉它开始崩溃，德国就需要重新结盟，那么届时俄罗斯必然成为其缔盟的不二选择。

这也并非双方的首次结盟。19世纪中叶，俄罗斯支持德国统一，以形成防御法国再次发动袭击的缓冲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和苏联达成了《拉帕洛条约》，使双方得以开展合作。虽然希特勒上台后废止了这项条约，但两国又于1939年达成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相互勾结瓜分了波兰。事实上，双方过去达成的类似条约都是试探性和短期的，而且经常被冲突所打破。

德俄结盟，夹缝国家将何去何从？

如果德俄结盟，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和白俄罗斯的命运将岌岌可危。这并不意味着德俄会对它们进行军事占领，而是指这两个欧亚大国一旦联起手来，上述小国将不得不屈从德俄的强大势力。届时，这些小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选择将极其有限。如果德俄两国在军事上结盟，那么唯一的问题将是，双方将从哪里画疆分野。

白俄罗斯很可能愿意被俄罗斯吞并，或者说至少不会进行顽强抵抗。实际上，一些人甚至对此表示欢迎。其结果是，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将处于噩梦之中。经过多年的努力，上述国家终于赢得独立，然而，即使继续保留主权，它们也不再具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一向在夹缝中生

存的波兰将不得不重新跳进火坑。

不可否认，在过去20年中，波兰刚刚从长期以来被德国和苏联占领的梦魇中苏醒，但该国复苏的程度令人惊异。冷战期间，华沙是一座前景黯淡的城市，甚至在白天也阴郁昏沉。如今，这座城市的人们向往美好的生活，希望历史不再重演。毋庸置疑，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华沙市中心只能用可爱一词来形容，而霏霏小雪中的肖邦故居不禁令人心驰神往。如果你一路向南，接下来会来到克拉科夫，继续南下则是喀尔巴阡山北部。那里仿佛是瑞士的翻版，到处都有人在修建度假木屋。如果你还记得华沙在被德国人摧毁和被苏联人洗劫后的惨状，并知道克拉科夫附近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那么你一定会无限感慨，这里20年来的变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但无论如何，波兰还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地方，也尚未完全恢复活力。克拉科夫开辟了前往奥斯维辛的旅游路线，路边停着不少顶部由某种蓝色材料制成的小型巴士。这些巴士可以将游客送往那里，而且也的确有许多人前往参观。但我无法坐巴士去往奥斯维辛，因为一想到要把公共汽车和这座镇子联系在一起，我就感到如鲠在喉。波兰人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奥斯维辛，因为那里除了被害的除犹太人以外，还有波兰的天主教徒。尽管如此，奥斯维辛仍然是一个景点，也是缅怀欧洲历史的纪念地。人们需要借助交通工具前往那里，而驾驶蓝色巴士的司机也只不过是借此谋生。这里似乎有什么地方十分不妥，但我又很难说清怎样才算妥当。奥斯维辛虽然位于波兰，但并不属于波兰，而是属于德国。这一点需要被历史铭记。

布雷斯特位于波兰和白俄罗斯的交界地带，我们可以从华沙和这座城市之间的道路清楚地看到，波兰并没有真正复苏。如果来到布雷斯特郊外20英里，你就会感到仿佛离开了欧洲。这里的建筑还保持着苏联时代的风貌，其中一些早已年久失修，似乎自“二战”结束后就没有进行过重建。这里的道路和司机一样糟糕，据说当地是欧洲公路事故死亡率最

高的地方。我不清楚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因为说这种话的人似乎带着某种可怕的自豪感，但或许事实的确如此。波兰东部虽然有许多交通环岛，但不是向上架起的平台，而仅仅是一种装饰。在这些环岛上，有的司机漫不经心地横穿而过，有的却沿着道路绕行，其中潜在的危险不可估量。

布雷斯特地势平坦，随处可见旧式的工厂和农庄。这里也是波兰籍犹太诗人肖洛姆·阿莱赫姆的祖籍所在地。曾获奥斯卡三项大奖的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 was taken*）正是改编自他的作品。布雷斯特以南的海乌姆镇已经没有犹太人，这里不仅土地贫瘠，人们大都衣衫褴褛。俄罗斯人的恐惧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必将从这里越过边境，直逼华沙。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俄罗斯和德国并不希望入侵波兰。他们甚至也不希望与对方结盟，但随着欧盟陷入危机，而美国又过于苛刻，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假如俄德加强经济联系，波兰也将参与其中，甚至有可能从中受益。所以说，造成危险的不是合作，而是恐惧。对俄罗斯人来说，恐惧的根源在于依赖欧洲，低估它的实力，并误解其意图。

这是斯大林犯过的错误。苏联对德国的依赖并不比现在德国在小麦和原材料上对俄罗斯的依赖更加严重，但希特勒不愿为此取悦斯大林，而斯大林也低估了德国对资源的需求及德国对自己的痛恨程度。斯大林本应清楚希特勒的阴谋，因为两人的想法十分相近。当然，斯大林也应当看到，希特勒过于需要俄罗斯，因此不可能对其置之不顾。但实际上，斯大林的主观臆断导致苏联2 000万人死亡，甚至险些丧失独立地位。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始终没有从心理上复原。由于日本在最出乎意料的地点、最猝不及防的时间对美国发动了袭击，以致在此后的数十年里，美国一直忙于确保本土不会再遭受任何意外袭击。但“9·11”事件再次令美国措手不及，甚至使整个国家陷入疯狂。同样，俄罗斯的思

维仍然停留在1941年6月22德日国入侵苏联之时。对苏联人来说，所有安全都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因此，他们必须控制白俄罗斯，加强在加里宁格勒和波罗的海三国的防御。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在波兰边境上的一小块飞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同时，他们也必须将波罗的海国家视作潜在的威胁。

在上文中，我已经阐述了波罗的海国家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军事上潜在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在被苏联占领的年代，这三个国家面临着两个现实：其一，它们不是真正的斯拉夫国家；其二，它们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尤其是芬兰有着更多共性，而且它们的历史与条顿骑士关系重大。尽管苏联的建筑风格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城市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它们的民众仍然是日耳曼族。

这三个国家都埋藏着一颗俄罗斯人可以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在这三国的国内，俄罗斯族虽然是少数民族，但人口数量庞大，而俄罗斯也曾明确表示，无论这些人在哪里生活，都处在本国保护之下。这一承诺在其他地方也许毫无意义，但对波罗的海国家来说事关重大。俄罗斯人对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及该举措对未来的影响深感担忧。正因如此，在这三个国家里，俄罗斯族不仅遭人厌恶，而且也感到遭到了区别对待。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进行说明。假如某个波罗的海国家发生了某些真实或蓄意制造的事件，而当地的俄罗斯族人开始举行示威行动。为此，警方动用催泪瓦斯，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暴力事件，导致一些俄罗斯族人被杀。于是，俄罗斯政府要求行使自己的权力，以保护公民，但遭到该国拒绝。随着暴力事件逐步升级，俄罗斯要求北约出面制止。但该波罗的海国家坚持认为这是该国内部事务，声称是俄罗斯情报部门引发的暴力冲突，并且要求俄罗斯停止干涉。最终结果很可能是，由于一系列爆炸导致大批俄罗斯族人丧生，俄罗斯将随即出兵占领该国。

目前，俄罗斯人暂时无暇旁顾，然而情况一旦有变，波罗的海国家就会对其造成严重威胁。俄罗斯人总是担心某个地方会出现差错。正是出于这种恐惧，俄罗斯不能对波罗的海国家稍有松懈。虽然在这个边缘地带，到处都是剑拔弩张的动乱地区，但这里才是欧洲国家与俄罗斯之间一触即发之地。

12
双轴终局
德法从兵戎相见到分道扬镳

拿破仑之后，法国衰落、德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德国现在成为欧盟的主宰便是明证，但法德战争与否仍然关系到欧洲的繁荣与未来。夹在英德两个大国之间，曾经雄霸欧洲大陆的法国又该如何自处？出走地中海，与北非的前殖民地国家建立地中海联盟或许是它唯一的出路，至少可以籍此重获在欧盟输给德国的地区领导权……

卢森堡：从古战场到欧盟之家

在参观卢森堡市时，我和妻子雇用了一名导游，以便仔细游览。在经过一排普通而又整洁的房屋时，我们看到一位器宇不凡的长者正从汽车后备箱里取行李。导游热情地向他问好，并回头告诉我们，此人便是卢森堡首相让-克洛德·容克。我妻子想要与这位首相攀谈，而此人也停了下来，表示乐意与她交谈。我走上前去，听他说起明天将到芝加哥参加北约和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我提到一条似乎对当天的会议十分重要的消息，即普京很可能不会出席。但他告诉我，几个小时前他刚与普京通过电话，并认为后者有可能会参加。

这一时刻恍如梦境。当我们得知导游也是卢森堡人，其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时，我们更加感慨不已。导游告诉我们，他与首相曾经是同窗。他还表示，希望容克不会遇刺，否则卢森堡就要像其他国家一样，给政治领导人配备无数保镖。卢森堡之所以独一无二，在于它

的开放性以及缺少保安措施。

就在刚才，我们的谈话从过去直接转入当代。这一点似乎与卢森堡市有些相像。1973年，我首次来到这里，随后多次故地重游，因为这座城市干净整洁、景色宜人，但城堡和堡垒的遗址不禁让我想起，这个国家曾多次经历战火。这座城市非常适合散步和游览，一座美丽的公园将它一分为二，但公园里到处都是战时建筑的遗迹。

卢森堡市之所以令人愉悦，部分原因在于环绕四周的乡村。这里随处可见风光旖旎的乡村和城堡。从瑞士出发，沿着A35号公路一路向前，穿过莱茵河谷和阿尔萨斯，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硕果累累的田园之间，很难想象德法两国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兵戎相见。现在这里属于法国，但过去曾经被归入德国，所以当地人都能听懂和使用这两种语言。进入卢森堡市后继续向北，地势变得崎岖不平，到处都是茂密的森林。如果沿着乡间小路步行，你会发现这里地势崎岖、杂草从生、森林遍布，很难从中穿越，更不用说在其间作战。

这里就是阿登高地。1944年，突出部战役就是在这里爆发的。当时，乔治·巴顿将军在卢森堡指挥了反击战，成功解救了被困的第101空降师。而在1940年，希特勒也是从这片陡峭的林地对法国发动袭击。他之所以会选择阿登高地，是因为当时的法国人就像我一样，认为这里的地形无法逾越。“一战”中，德国人的首次行动就是对卢森堡发动袭击，以占领当地的铁路线。距此15英里向西是凡尔登和色当，“一战”中最血腥的几场战役便发生在这里。

该地区不只在近代发生过战争。卢森堡市80英里以北是亚琛。查理曼大帝就是从这里开始创建庞大的帝国的。向东20英里是特里尔，这是卡尔·马克思的出生地和君士坦丁大帝发动战争的地方。正是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带到了罗马。古罗马城门约有四五层楼那么高，至今仍然矗立在市中心，并时刻提醒着人们，罗马人曾经征服这里。虽然人们对这座城门已经司空见惯，但它显得那样格格不入。

该地区之所以战火频频，而罗马军队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未能打败日耳曼人，是因为罗马人的战术不适合茂密的森林地区，所以当他们跨越莱茵河征服了高卢（即近代法国）以后，却败在了日耳曼人手里。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跨越莱茵河一步，而罗马文明也始终未能超出这一地区。莱茵河以西既有日耳曼语（包括荷兰语）区，也有法语区，两地居民相互混杂，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因此，该地区冲突不断，两大文明多次交锋，双方都试图征服对方，以求得统一。

迄今为止，地中海沿岸仍然为拉丁人所控制。但当你从罗纳河谷向北，沿着昔日尤利乌斯·恺撒征服高卢的足迹，或者美国第5军在“二战”中经过的路线前行，越过阿尔卑斯山后继续向东，你就会来到另一个世界。在瑞士，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交相混杂。在瑞士到北海之间的地带，法德两国的历史渊源极其复杂。如果你从巴塞尔出发，沿着E25号公路北上，穿过斯特拉斯堡、卢森堡、列日和阿姆斯特丹，你所经过的古老边地不仅对古罗马，也对当代欧洲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一点从卢森堡便可窥一斑。

今天的卢森堡境内遍布欧盟机构，尤其是金融类机构。从卢森堡驱车向北，你很快就能抵达马斯特里赫特，建立现代欧盟的条约就是在这里签订的。该地区西北就是海牙，即国际法庭所在地。从这里返回斯特拉斯堡，在你所经过的法德边界上，战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 000年前。但与此同时，你也会经过欧盟所在地，而该机构设立的目的正是为了让战争不再重演。这条线上包含如此众多的重要机构并非偶然。在提出欧盟的设想时，人们最担心的是法国与德国的边界。所以说，这些机构的选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即希望在两国之间的边缘地带用和平取代战争。

如果欧洲的半岛与大陆之间的边缘地带是欧洲最主要的分野，那么法德之间的边境地区就是欧洲的重要界限。虽然欧洲的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战争，但假如法德边境地区安然无事，欧洲将很难爆发全面战争。

欧洲的地形遏制了战争的发生，除这两个国家以外，其他国家的实力尚不足以挑起将所有国家卷入其中的大战。阿尔卑斯山将该地区分为南北两半，各个半岛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封闭。但如果法德交战，必将波及欧洲南部和东部，从而使所有欧洲国家卷入其中。正因如此，自拿破仑时代起，维持该地区的和平就至关重要。

19世纪60年代，卢森堡市周围的防御工事被拆除，法国与日耳曼国家达成了外交和解。几个卢森堡人告诉我，条约签订后，这些防御工事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才被拆除。显然，人们下定决心，不再让这里重蹈战争覆辙。从此以后，卢森堡市将变成一座和平的城市，它唯一关注的是商业和贸易。从中我切身感受到卢森堡人对和平的热爱和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信奉。但奇怪的是，他们竟然无法预料，这一举动徒劳无功。在接下来的80年中，卢森堡周边烽烟肆虐。在19世纪，假如卢森堡人真的认为，他们不再需要防御工事，这显然大错特错。但问题是，他们眼下的自信是否同样大谬不然。当然，欧洲最大的问题在于：在1945年之后乃至欧盟建立之后，这里是否仍会爆发战争，尤其是全面战争。

比利时或将解体？

对于比利时的问题，卢森堡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比利时所在地区在历史上被称为“欧洲战场”，因为它是德语区和法语区发生冲突的关键地区。1830年，该地区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以充当英法之间的中立边缘地带。英国希望确保其主要港口，尤其是安特卫普不落入法国人之手，以免该地成为法国挑战英国的潜在基地。总之，这个地区最好既不属于法国，也不属于荷兰，而是一块位于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中立边地。

在建国之初，比利时的领土部分来自荷兰，部分来自法国。位于荷兰语区的日耳曼人讲佛兰德语，位于瓦隆尼亚的瓦隆人讲法语。此后，

双方的摩擦十分剧烈，有时甚至会引起骚乱。过去，瓦隆人的境况要优于佛兰德人。但现在的情况恰好相反，该地日耳曼人的境况要比法语区的瓦隆人更好。因此，比利时本身就是一个微缩的边缘地带，而双方的摩擦对法德未来关系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两个语区已经统一了近两个世纪，但仍然泾渭分明，而两地的民众也对此一清二楚。对法德两国来说，这里的情况就像一本活生生的教材。

近年来，双方就分裂问题和分别重回法国与荷兰一事开展了重要谈判。英国不再是此事的决定性力量，也无权要求英吉利海峡以东的地区保持中立。因此，比利时的解体并非没有可能。当然，尽管国内骚乱不断，甚至有人煽风点火，迄今为止该国并未分裂。不过，解体的结果并非难以想象。这将成为衡量边缘地带是否稳定的重要指标。一旦比利时解体，人们将没有理由继续充满信心。

目前，在这一边缘地带，比利时法语区与荷兰语区的冲突并不普遍。该地区整体和平，但此前并非没有意外情况。问题是，该地区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和平，而这取决于德法两国目前的友好关系是否能够持久。上文我们已经对德国进行了详细探讨。接下来，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法国。

法国曾经是欧洲启蒙运动璀璨的中心。在18世纪，法国是世界的精神中心。直到20世纪上半叶，法语一直是文明社会的语言，有过良好教养的人没有不会讲法语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启蒙运动将基督教排挤出精神世界一样，法语也取代拉丁语成为精神生活的语言。

我认识的第一个法国人是一名政治哲学系的研究生，主攻笛卡尔和帕斯卡的哲学思想。笛卡尔和帕斯卡虽然都是杰出的数学家和伟大的哲学家，但两者又截然不同。笛卡尔是一位富于条理的思想家，他的所有观点都有条不紊。而帕斯卡擅长创作短小精悍的格言警句来认识这个世界。对笛卡尔来说，只有从整体上理解他的思想，你才能理解局部。但

对帕斯卡来说，不存在整体认识，除非你想要强加于他。尽管两人判若水火，但仍有两个共同之处：其一是天主教，他们一边是忠诚的信徒，一边从逻辑上对其予以批判；其二是为了显得机智，他们不惜歪曲自己的想法。当时，我误认为这是他们的不足之处。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卢梭的一句话可以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我已经发现了这些矛盾，但它们并没有成为我的障碍。"此前，我一直以为这是卢梭的败笔。年轻时，你总会为这种情况的发生感到奇怪。随着阅历加深，你会意识到，最简洁的答案往往是错误的。无论自然还是人类，都不会整齐划一、毫无矛盾可言。笛卡尔和帕斯卡信仰天主教是为了忠于过去。而他们对天主教进行批判，是为了忠于未来。两人都清楚，他们只能生活在过去与未来的矛盾之间。

过去，我经常坐在圣日耳曼大道的咖啡馆里，参加学生们热烈的讨论。当时，我们还能负担得起那里的餐费。我们的话题不断变换，常常会偏离原来的主题。我还记得，在谈到某个话题时，别人一句信心十足的俏皮话，或者一个简单的法式表情，就能在瞬间战胜我的美式逻辑。当我还停留在这个话题时，其他人早已转向毫不相干的内容。

我经常觉得这种做法极不公平。但我后来懂得，人们在交谈时，即使是对笛卡尔的信徒来说，纯粹的逻辑也不足以对某个人进行全面评价，因为进行逻辑分析只是评价人的一种方式。那时，我的法国朋友懂得最重要的不是逞口舌之快，而是通过更能体现人类本性的方式进行辩论，其中体现的风度和智慧不仅比逻辑更为深刻，而且显示出人性中更加重要的另一个维度。如果人生就是一连串矛盾，那么对法国人来说，他们必须超越矛盾，而非将其消除。自信、风度、犀利的眼神和尖锐的言辞可以收到理性无法获得的效果。我不喜欢向他人示弱，尤其是当我的论点看似更加严谨的时候，但我一再处于下风。当我与妻子发生口角时，我的胜利很快会转化为失败。不过对法国人来说，失败也可以转化为胜利。

时值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形形色色的阿拉伯和欧洲恐怖组织聚集在巴黎。同时，这里也汇聚着他们的敌人：美国人、以色列人和英国人。美国人认为，他们必须找到并消灭这些恐怖分子。而法国人不希望在自己的地盘上发生战争，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加复杂。他们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时间和地点，其中一些事物不得不被毁掉，另一些则保留下来。他们的目标总是变动不定。虽然每一个组织都应被视作独立的个体，但不应忘记它们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法国人尽可能不采取任何行动，并将这一做法发挥到极致，有时候似乎还庇护恐怖分子。法国虽然也是反恐联盟的一部分，但该国对恐怖分子的看法与其他盟国却有所不同。

借用卢梭的话来说，这一矛盾并没有对法国人形成障碍。有时，他们不无夸张地将反恐称作欧洲战争。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事关重大，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大获全胜。为此，各国不得不进行巧妙斡旋，以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不是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这一结果很难用三言两语阐述清楚，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如果对所有被视作恐怖分子的人格杀勿论，那么你只能消灭你所知道的恐怖分子，但无法铲除你所不知道的。有人曾告诉我，监视和分辨恐怖分子就像集邮，你必须从容不迫、小心谨慎，并且对不同类型都要加以注意，绝不能仓促买卖。这是一种无声无息、深思熟虑的活动。对法国人来说，他们的目标不是在法国的领土上，尤其不希望在巴黎作战，否则就会招致更多恐怖分子。此人还告诉我：“我们势单力薄，无法为全世界而战。因此，我们只能为巴黎而战，以保卫和平。你们美国人可以为世界而战，但不能在巴黎开战。”

当时我年轻气盛，对法国人背信弃义的行为感到异常愤怒。这些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废话，但法国哲学同样如此，最终我理解了他们的想法：我们想要消灭所有恐怖分子，但不知道该怎么做。火车一辆接一辆地抵达巴黎。虽然我们不知道如何消灭全世界的恐怖分子，但若能阻止恐怖分子在巴黎滥杀无辜，我们也算有所作为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做法令盟国感到困惑，这将是我们不得不忍受的事情，而且我们也能够忍受，因为我们是法国人。对法国人来说，决定人生的不是职业规划，而是随机的会面、突然的醒悟、偶发的事件等。他们认为，这些会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沉思的时刻以及对人生的热爱，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与此同时，你还拥有家族、门第以及其他与生俱来的东西。更加重要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家人绝不会将你拒之门外。上文提到的法国人虽然是一名居无定所的国际学者，但每年夏天他都会到孚日山脉探望家人。尽管这种前后矛盾的人生态度令人惊异，但我知道不能让这一矛盾对我形成障碍。此外，我还认识一位聪明美丽的女子，她对我十分友善。她虽然过着纯粹的波西米亚式生活，但每天晚上她必然回到父母家中，睡在自己的房间里。

除了那些过于机智的人们，法国人的想法大都十分微妙，以至于他们常常为自己感到困惑。对于这个世界的矛盾之处，他们的做法是拭目以待、静观其变。要想理解法国甚至欧盟，我们需要清楚，他们不会让矛盾、失败或者衰退成为自己的障碍。

冤家对头：既生英，何生法？

19世纪初，拿破仑失败后，法国开始衰落。随后，德国经济突飞猛进，超过法国，从而加剧了法国的衰退。法国随之发现，自己被夹在两大工业强国之间：西面的英国位于狭窄的英吉利海峡对岸，东面的德国位于莱茵河对岸。19世纪末，两国国力都远远超过了法国。

人们对法国衰落的原因进行了激烈辩论。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指出，与天主教相比，新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基础。这种观点虽然很有说服力，但忽略了如下事实：德国的巴伐利亚和莱茵兰都是信奉天主教的地区，而莱茵兰是德国工业的心脏地带。也有人认为，法国的衰落应该归因于法国农民对工业革命的百般抵制。此外，还

有其他形形色色的说法，其中许多无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都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更倾向于如下解释。拿破仑战败后，英国一度称雄海洋，并以印度为中心，建造了一个辉煌的帝国。大英帝国规模宏大，并将其他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排除在外，从而使英国获得巨大的贸易优势。法国人虽然也有自己的帝国，但从许多方面来看，法兰西殖民帝国不过是囊括了一些残山剩水，不仅远远落后于英国，也没有形成像大英帝国那样自给自足的贸易体制。

另一个区别在于英国与美国的关系。英国虽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战败，但它继续与美国尤其是盛产粮食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由于粮食开支较低，英国可以敦促农民进入城市的工厂。但法国对本国农民予以支持，并且对美国粮食产品利用较少，从而限制了投入工业化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城市的粮食开支。英国人对农民的态度更加果断，自然也更为成功。

与此同时，德国也实现了工业化。德国虽然没有建立英法那样庞大的帝国，但在欧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接近莱茵河和易北河，尤其是毗邻欧洲最主要的交通枢纽多瑙河。此外，德国经济与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经济相比，明显占据优势地位。总之，无论原因何在，法国都被落在了后面。它虽然既没有被排除在欧洲最发达国家之外，也不缺乏重要的产业，但已经不再独占鳌头，而是屈居英德两国之后。

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人一直在与英国人进行斗争。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和诺曼底曾经被英国占领，两国还为此兵戎相见。法国人将拿破仑的失败归咎于英国人，因为英国人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打败了法兰西联合舰队。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封锁还切断了法国的补给线。在法国看来，为了不使自身陷入险境，英国不仅支援了法国的敌人，而且阻断了法国进入海洋的通道。从“背信弃义的英格兰”这一称谓中，就可以看出法国人长期以来对英国人的态度。17世纪的一名法国主教博叙埃说过：

英格兰，噢，背信弃义的英格兰，
是她的重洋将罗马人阻断，
基督的信仰也在那里降临。

英法两国之间的历史并不美好，“二战”更是加剧了法国对英国的反感，因为按照法国人的观点，英国在法国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弃它于不顾，撤走了军队。不难发现，两国的历史关系不仅间接导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而且经常造成彼此间的伤害。

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历史也很不愉快。普鲁士军队在拿破仑的惨败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在德国统一过程中，普鲁士和法国再次爆发战争，结果普鲁士大获全胜。当时，盛气凌人的德国人不仅割走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且坚持要在巴黎举行阅兵仪式，借此羞辱法国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法德关系甚至比法英关系更加糟糕。

法国夹在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宿敌之间，麻烦不断。随着德国的崛起，法英两国结盟，最终将俄国也包含进来，以遏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法英之间潜在的矛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英国人试图利用法国人遏制德国人，从而使德国无法成立舰队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而过于畏惧德国的法国别无选择，只能肩负这项重任。然而，即使在英国的支持下，法国人也忧心忡忡，但又不得不扮演英国人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的角色。

“二战”结束后，人们开始讨论欧洲一体化，而戴高乐之所以对此表示关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对英国人极其厌恶和怀疑。这种情绪自有其历史根源，但英国在“二战”中的表现更让戴高乐深信不疑。正因如此，他不希望英国加入当时的欧共体。在他看来，如果能够改造德国，使其处于法国的控制之下，要比与英国结盟更好。此外，戴高乐认为英国正在衰落，如今只不过是美国用于剥夺法国主权的一个傀儡。

因此，我们必须清楚，法德关系在欧洲受到法英关系的制约，在全

球则受到美国的影响。如果法国希望抵制德国，只有在英美两国愿意支持法国的前提下才能付诸行动。在这里，我要谈的不是战争，而是重新界定各方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问题。如果法国孤立无援，那么它只能跟随德国的步伐。相反，如果法国得到支持，它就可以考虑其他选择。由于法国无法与其他国家并驾齐驱，就像它目前无法企及德国和美国一样，所以这种支持显然必不可少。一言以蔽之，法国不可能孤军作战。

英国正从欧盟退步抽身。当然，英国并未放弃欧盟，而是不愿加入欧元区，也没有参与欧洲的几项规划。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人一直对欧洲大陆表示关注，但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英国才会投身其中。否则，英国将难以在一边参与欧洲事务的同时，一边维持本国的其他利益。这一利益在过去是大英帝国的霸业，而如今是它借以平衡自身与欧洲关系的英美联盟。

目前，美国正从穆斯林世界撤军，并避免承担其他海外义务。美国认为，欧洲问题仅靠美国无法解决，因此除了维持双方的贸易往来以外，美国不愿过多卷入欧洲的经济事务中，以免惹祸上身。但事实上美国已经参与了法国的两次军事冒险。第一次是2011年对利比亚的空袭，美国选择响应法国的号召采取行动。起初美国犹豫不决，但最终不得不承担主要责任。同样，2013年，当法国派兵稳定马里的局势时，美国也对法国表示支持，并提供了后勤保障。

我们必须注意到，德国并没有参与这两次行动。这就说明法德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上面两起事件中，法国人认为其根本利益受到威胁，而美国也出面予以支持，但德国人拒绝提供军事增援。由此可见，法国与德国的经济利益也产生了分歧。法国失业率约为12%，而德国不到6%。因此，法国人希望欧盟能够出台应对失业问题的政策，但德国人则希望欧盟的政策能够增加财政责任。

但这些矛盾尚未导致法国与德国分道扬镳。法国人清楚，德国人在军事干涉上面临着历史和政治局限。因为德国人急于在经济问题上弥补

这一隔阂，所以他们无疑希望双方保持密切的交往。当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领导层的主观愿望，而是他们迫于国家利益和内部政治问题可能做出哪些举动。众所周知，经济问题一直难以解决。德法两国都比表面上更加脆弱。由于依赖出口，德国不得不受制于进口国，而法国从2008年起就开始出现经济疲软。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就像在过去200年中一样，法国在欧洲将越来越缺乏竞争力，尤其是与德国相比。这将迫使法国执行不同于德国的经济政策，而这一点在欧盟的现行体制下很难实现。在法德关系中，虽然双方都无意与对方决裂，但都希望对方作出政策调整。很难想象，双方在马歇尔计划中建立的密切关系会导致彼此间的敌对情绪。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它们争吵。在彻底一体化和战争之间，有许多种可能会让德法两国继续生存下去。它们可以一面保持良好的关系，一面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为了促进出口，德国战略政策的核心是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建立经济关系。从这种角度来判断，德国具有某种全球视角，因为其伙伴遍及全世界。但德国绝不会使用经济以外的手段，迫使这些国家进口德国的商品。当然，这些国家既不依赖德国，也没有与德国开展贸易的义务。因此，欧盟制定的法律文件是德国能够支配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唯一手段，而这些国家消耗了德国的一半出口。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对诸如自由贸易、规章制度、欧元价值和银行系统等欧盟杠杆使用得越多，这一体系就越发朝着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从而不可避免地使其他欧洲国家感到厌恶。其中，法国对德国的憎恶情绪尤其明显，而且它具备足够规划本国发展方向的力量。虽然德国人希望欧洲央行将工作重心放在通胀膨胀上，但法国人希望放在失业方面。因为通胀膨胀与德国息息相关，而解决失业对法国而言至关重要。

地中海联盟——法国唯一的出路

虽然德国人赢得了这场斗争，但法国人不会就此罢休。德国之所以

要求欧盟实行经济紧缩政策，是为了满足本国的需求、打破限制，同时疏远那些承担这一经济负担的国家。因此，德国不可能提供法国要求出台的政策，欧盟也将成为各方明争暗斗的场所，而不是人们曾经梦想的和平与繁荣的舞台。

法国既不会离开欧盟，也不会安于现状，而是必须制定自己的税收政策，解决本国的财政赤字问题。法国领导人必须设法通过政策手段降低失业率，这些政策从长期来看可能不起作用，但其短期效应足以帮助他们再次当选。当然，任何其他策略都不可避免要涉及其他国家。但关键问题是，法国还有哪些其他选择，以及如何协调这些选择与法德关系以及法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法国国内还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这一因素同样不容忽视。在法国，从农民到右翼的“国民阵线”，一系列群体都希望法国减少对外界的依赖。因此，不管他们的想法如何不切实际，对于这一重大政策意向，法国政府都不得不认真考虑。

总之，法国人可以从三个方向进行设想：欧洲平原和德国、英吉利海峡和英国、地中海和非洲。地中海联盟的设想始于2008年7月，源自法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法国既是一个北欧大国，也是一个地中海国家。按照这一设想，位于地中海盆地的国家将另外组成一个经济联盟。这就意味着，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所有国家，包括欧洲和北非的部分国家以及以色列在内，将建立起一个自由贸易区。在这个自贸区内，法国可以参与竞争，并取得控制权。

为了弥补经济上的不足，法国的策略是与非洲的前殖民地国家建立密切关系，并加强自身在中东和地中海的地位。为此，法国提议成立地中海联盟，试图使该联盟既独立于欧盟，又与其保持联系。虽然这种设想无果而终，但地中海联盟早就存在，共包括43个成员国，其中28个加入了欧盟。地中海联盟主席任期两年，在欧盟成员国与非成员国间轮流产生，决策将由外交部长年会和两年一次的首脑峰会制定。这一设想虽

然被付诸实施，但缺乏现实基础。人们并不清楚，该机构如何才能有效运作？叙利亚与以色列是否能够同时加入？其规章是否能够与欧盟相互协调？这的确是一个杰出的构想，但本身存在深刻的矛盾。法国人看到了这些矛盾，但并没有畏缩不前。

在这个联盟里，任何事情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不过也许存在某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在法国，该联盟的支持者们试图使其起死回生。对于法国的经济与政治地理，从中我们可窥一斑。法国发现，自己很难协调该联盟与德国的利益，但极力希望建立一个维持“二战”后欧洲秩序的基础。法国认为英国对这个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影响不大，因为英国正忙于纠集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尽管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早就是一个过时的概念。法国不仅是北欧国家，也是南欧和地中海国家，而且地中海地区，法国无疑是一个强国。尽管该地区同样四分五裂，但法国必须将其作为自己的备选方案之一。

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关系相比，法国与欧洲殖民地保持着更加密切的联系。法国不仅是殖民地的常驻力量，而且往往是决定性力量，并频繁进行军事干预。与英国前殖民地不同的是，法国的前殖民地尚未完全做好独立的准备，而法国也继续将它们视作半殖民地予以对待。

在中东地区，法国仍然与黎巴嫩和叙利亚保持着关系。但法国之所以没有出兵干涉叙利亚，唯一的原因是美国拒绝参与这一冒险行动。黎巴嫩和叙利亚在“一战”后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而法国在北非的利益同样事关重大，并且仍在继续扩大。因此，地中海联盟的设想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从某种程度上看，法国已经成了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中心。

按照法国的想法，如果得到穆斯林国家的允许，以色列也将加入这个联盟。这一设想无疑对以色列人极具吸引力。此外，遭到欧盟拒绝的土耳其也有可能加入地中海联盟。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最初看似荒诞不经的设想开始变得合情合理。正因如此，欧洲人才开始热衷于谈论

这一话题。在北欧国家进行工业革命之前，地中海曾经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地区之一。虽然穆斯林居多的北非和基督徒居多的南欧存在分歧，而且该地区并非始终天下太平，但双方的分歧最终得到了遏制。

对法国来说，如果地中海联盟能够成为对欧洲关系的补充，那么它显然利大于弊。至于法国能够获得多大利益，取决于这个以法国为中心的组织能够创造多少财富。迄今为止，这一点尚不明确。如果法国能够将土耳其、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与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等能源充裕的国家联合起来，其中的可能性将极大地增加，而法国也可以藉此重获在欧盟输给德国的地区领导权。

然而，法国不太可能成立一个类似欧盟的组织，而人们也不太可能对这样一个组织感兴趣。我们并不清楚，该联盟如何才能将诸多成员国联合起来，以及如何才能使它们从中获益，尤其是法国。同样，我们也不确定这一组织是否能够和平共处，因为其中许多成员都互相敌视。

尽管上述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是目前法国唯一的出路，除非它能够提高生产力、增加利润，从而与德国分庭抗礼。但是，鉴于法国选举受失业问题影响严重，届时政府将不得不出台相关政策，因此很难想象法国能够与德国平起平坐。实际上，从工业革命之初，结构缺陷导致的效率低下就一直让法国困扰不已，而如今这一缺陷仍然存在，所以法国只可能在欧盟节节败退。如果仅凭一己之力，法国只不过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可供选择的余地极其有限。虽然地中海联盟的方案不一定能够实现，但不失为法国的一种选择。

这就意味着，法德之间的边缘地带可能继续处于和平之中，虽然两国的关系或许并不愉快。对于这一点，比利时是最好的例证。在这个为了缓解英国人的顾虑而人为制造的国家中，法语区与荷兰语区被合为一体。但问题是，荷兰语区变得更加富有，而法语区愈发贫困。随着佛兰德人和瓦隆人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我们不确定比利时是否能够继续存在。即使该国能够继续存在，我们也不可否认其前途未卜。这一事实对

欧洲十分重要，因为欧洲早已对类似危机深恶痛绝。

比利时可以被视作法德关系的象征。虽然这一关系并不完美，但双方都不希望分道扬镳，而许多比利时人的想法恰恰相反。随着德国变得更加富有，法国变得愈发贫穷，德国人虽然不希望被法国人拖累，但也不愿放弃法国提供的心理和政治安全保障。同样，法国人虽然不希望放弃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但是无法忍受本国无限期的经济衰退。

德国人将选择向东，结纳俄罗斯和其他希望购买德国产品的国家。而法国人将选择向南，拉拢地中海国家。法德关系开始陷入衰退之中，尽管双方暂时不会各奔前程，但曾经将两者紧紧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已经不复存在。德国不再力争偿还自己的罪孽，法国不再谋求主宰一体化的欧洲。然而，双方都有各自的邻国，这些邻国不仅颇具吸引力，而且正向它们暗送秋波。据我分析，未来德法两国的分手可能是温和的，而E25号公路也将一如既往地呈现一派和平景象。但法国以南发生的事将是另一番状况。

13

欧洲地中海
繁荣正在消失

为向拖欠债务的国家发出信号，德国抄没南欧小国塞浦路斯普通公民合法财产以偿还债务的做法震惊欧洲。事实上，从西班牙到希腊，欧洲地中海地区正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债务危机、迫于外部压力实行经济紧缩政策、日渐抬头的反欧盟情绪、反移民浪潮……

文明汇聚&烽烟四起

地中海是欧洲大陆的南部边界，也是一片封闭的水域。要想从这里进入海洋，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向西穿过直布罗陀海峡，二是向东穿过人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虽然世界上还有其他相对封闭的水域，但都不像地中海这样面积辽阔又与世隔绝，更不像地中海这样曾经对世界历史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地中海盆地不仅孕育了犹太教和基督教，而且是伊斯兰教的活动中心。此外，它还是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历史的中心。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盆地连接了欧、非、亚三洲。1492年，哥伦布就是从地中海启航，并且深受当地政治影响。总之，作为欧洲的南部边界，地中海既为欧洲带来了动荡，又带来了显著的影响。

除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以外，自古以来地中海北部沿岸大都是基督教分布地区，而南部沿岸（即北非）则是穆斯林占绝大多数。地中海东部沿岸被称作“黎凡特”，该地区宗教和教派混杂，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不同派别。这是历史上战争和移民造成的，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地中海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整体。它长约2 000英里，最窄处不到100英里，最宽处为500多英里，南北两岸在直布罗陀海峡处距离最近，并在黎凡特地区接壤。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地中海沿岸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对其他任何国家发生的事件产生影响，甚至决定其发展趋势。

地中海同样对罗马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将这片海域命名为“中间之海”或“我们的海”，因为这里是罗马帝国统治的重心。那时，要想通过地中海，进而有效地开展贸易，比如将粮食从埃及运往罗马，罗马人不仅需要船只，还要有舰队护航，以免遭海盗劫掠。因此，除了陆军之外，是贸易和海军将整个罗马帝国维系在一起，而地中海相对狭窄，从而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罗马人将南北两岸合为一体，时至今日，这种联系依然存在。罗马与埃及和黎凡特之间的往来，虽然并未促成单一的思想体系，但沟通了不同的文明和经济体系，使得罗马得以继续维持统治。

地中海风光如诗如画。我坐在山顶的悬崖之上，俯瞰位于欧亚大陆板块边缘的圣托里尼火山岛（最初名为“锡拉岛”），只见一望无际的深蓝色海水一片静谧，将克里特岛隐没在地平线之下。在距离我较近的地方，有一个不规则的深蓝色圆环。这里就是大约2 500年前曾经爆发的火山山口，它将圣托里尼岛一分为二。火山爆发不仅摧毁了米诺斯文明，而且很可能催生了有关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并在随后数年中改变了全球气候。我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比圣托里尼岛更美丽或者更动荡不安的地方。

莎士比亚生前的最后一部戏剧《暴风雨》（*The Tempest*）讲述了一场发生在一座地中海岛屿上的海难，这座岛屿充满了巫术和魔法。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塞巴斯蒂安看到了其中的腐败。文森特·梵高说过：“地中海的颜色宛如鲭鱼般变幻莫测。你经常难以确定，它究竟是绿色还是紫色，抑或是蓝色，因为下一刻，它变幻的倒影中也许会呈现一丝玫瑰色或灰色。”荷马曾经提到，这片海域的颜

色仿佛深色的葡萄酒。我一直不理解这种说法，直到我读到了梵高对地中海颜色的描述。但即使是荷马，也很难描述清楚地中海这种难以言表、变幻无常的色彩。

众所周知，地中海气候适中，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暖多雨。对短期造访的过客来说，地中海似乎气候宜人。当地的居民了解地中海的历史，清楚这里既令人愉悦，又充满诱惑。但在美好表象之下，这里还是一个暴力肆虐的地方。包括威尼斯和英国在内的欧洲文明、北非文明、发源于黑海盆地的强国以及包括巴比伦和波斯在内来自东方的大国，皆汇聚于此。因此，地中海沿岸经常烽烟四起。“二战”结束后，南斯拉夫、黎巴嫩、以色列、埃及、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先后爆发战争，而且其中许多都是在近年发生的。提起地中海，人们既会联想起慵懒的生活，也会联想到无情的战争。

这里也是一个对比鲜明、矛盾重重的地方。例如，地中海南北两岸相距不过数百英里，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是伊斯兰教分布地区，另一边是基督教势力范围。

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地区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两者又截然不同，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们、你所面对的方向以及投入的时间。就像梵高在描述地中海的颜色时所说的那样，这两个地区始终变幻莫测。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如出一辙。此外，两者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它们既是敌人，又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撒哈拉沙漠和南欧茂密的山区，它们既是一个整体，相距不过500英里，而且有着共同的历史，但又存在天壤之别。

我们在前文中谈到了边地，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分隔。这处海洋上的边地虽然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但又具有边地的基本特征。双方既比邻而居，又存在分歧。这一地形既有利于开展贸易，又便于发动战争。因此，地中海就像欧洲的另一个边地，人们对它既倍感熟悉，又极其陌生。

伊斯兰教曾两次从地中海入侵欧洲，第一次侵犯了伊比利亚半岛，第二次是东南欧。与此同时，它还不断蚕食西西里岛等地。基督教也曾多次入侵伊斯兰教地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便将穆斯林从伊比利亚半岛驱逐出去。随后，基督教迫使土耳其人退回中欧。

19世纪，基督教徒终于横渡地中海，占领了北非的大部分地区。显然，这两种宗教都希望控制对方。虽然双方都曾胜利在望，但最终均功亏一篑。

事实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初次遭遇时，就为对方困扰不已。例如，罗马和埃及既有贸易往来，又曾发生兵革之祸。

19世纪末，欧洲人在谋求全球霸权时征服了北非，拿破仑出兵埃及更是一度闻名天下。众所周知，狮身人面像也许是世界上最大、最神秘的建筑之一，但却没有鼻子。这是因为它的鼻子被一名法国炮兵射了下来，只为了表明他具备这种能力。

在占领北非后，欧洲人得以控制地中海地区。英法两国就此展开角逐。最终，英国取得胜利，完成了法国人开凿的苏伊士运河。这让英国得以进入红海和印度洋，并且来到印度，从而将大英帝国及其殖民地联结在一起。

后来，北非成为德国与英国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战场，而英国再次获胜。但随着英国海军的衰落，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取而代之。美国虽然控制了印度洋，但并未登上陆地。

移民冲突

欧洲对北非的征服导致当地起义不断。埃及推翻了英国扶植的法鲁克王朝，并将苏伊士运河收归新政府所有。随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试图重新夺回运河，并推翻埃及的新政权，但以失败而告终。20世纪50年代，由于法国力图维持其在阿尔及利亚的据点，当地爆

发了一场血腥的起义，最终穆斯林推翻了法国人的统治，并将法国殖民者驱逐出境。欧洲人不得不从殖民地抽身，退回地中海北岸，集中精力进行战后重建。

但重建工作让双方不得不再次接触，而北非地区的居民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随着欧洲经济不断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发迫切。由于欧洲最近的劳动力来源是伊斯兰世界，所以数百万穆斯林先后前往欧洲赚钱。尽管欧洲并没有因此改头换面，但的确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例如，比利时目前约有10%的穆斯林人口，英国的数字小于5%，而德国为5%。这一比例在城市里更加惊人。比如，巴黎的穆斯林约占10%～15%，而布鲁塞尔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穆斯林。

当然，地中海北岸一直都存在着穆斯林。其中土耳其和波斯尼亚是最鲜明的例子，而保加利亚的穆斯林虽是少数民族，但人口众多。然而，穆斯林的这次迁徙有三点与以往不同：首先，这次移民的数量庞大。其次，移民定居的范围有所变化。长期以来，马赛和巴塞罗那都是迁徙穆斯林的定居地。但是，这一次穆斯林（并非所有穆斯林都来自地中海地区）纷纷迁往伦敦、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等北欧城市，而这在过去从未出现过。第三点差异是这次移民的速度。实际上，这一变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社会并不擅长吸收大规模移民，以致部分欧洲国家由于无法安置大批移民，不得不回归政权的本质。正如前文所言，欧洲民族国家的基础源于共同的命运感，而这一命运感来自共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你从出生之日起就是匈牙利人或西班牙人，而其他通过法律程序加入该国的人，虽然同样可以获得匈牙利或西班牙的公民资格，但他们的身份有悖于人们过去对国家的认识，即一国公民应当具有共同的血统，至少具有共同的出身。

欧洲人试图通过文化多元主义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新的移民无法加入德国或瑞典国籍，而欧洲又不愿重返种族歧视的老路，所以欧洲国家

在试图接受这些移民作为公民的同时，承认他们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在多元文化的宗旨下，移民不仅可以保持自身的差异，而且他们的文化正式获得了与本土文化平等的地位。当然，宣布某件事情合法并不等于大多数人能够将其付诸实施，因为这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问题。

此外，多元文化和移民计划面临着另一种挑战。与美国不同，欧洲人口稠密，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数百万移民，更不用说进行长期安置。尽管欧洲的人口数量在不断减少，但欧洲国家，尤其是经济较为繁荣的国家，很难控制这些新增的移民。多元文化必然从某种程度上支持分裂主义。所谓文化，即意味着希望与本身相似的人群生活在一起。由于这些移民来自伊斯兰世界，其经济状况让本土居民在承认多元文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甚至无意之中对其加以排斥。人们总是希望和自己相似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因此穆斯林居住区往往人口拥挤、条件较差。巴黎周围随处可见高高矗立的公寓楼，就将穆斯林与居住在其他地方的法国人分隔开来。

在这一点上，除了一件事情以外，欧洲与美国并没有太多差异。在美国，你可以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但必须接受美国的语言和文化规范，否则你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排斥。接受这些规范可以使你顺利进入美国社会，但也意味着除了在节日里享用特殊的餐点，你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本土文化。这一代价虽然十分高昂，但并未阻挡你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在欧洲，情况显然更为复杂。与美国相比，欧洲的文化过于深厚、复杂和悠久。因此，要想成为地道的法国人，无疑更加困难。

在战争爆发前，我的父母都非常热爱匈牙利。虽然他们并未表明这一点，但他们毕竟是匈牙利人。此外，他们还是犹太人，因此无论他们已经从多大程度上融入匈牙利，这一身份都关系重大。来到美国后，我决心成为一名地道的美国人，而我遭遇的唯一障碍，借用小学同学的话来说，就是我在打棒球时像一个小女生。于是，我苦练举手过肩投掷的技巧。在实现这一目标后，我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同样，在康奈尔大

学读研究生期间，我唯一的障碍不是犹太人的身份，因为这所大学里有许多犹太人，而是浓重的布朗克斯贫民窟的口音，还有我的举止显然更适合布朗克斯区的校园。不过这些缺点都能够加以改正。当时，还有许多新来的其他移民会受到轻视。虽然美国也有反犹太主义，但影响十分微弱，与欧洲的反犹太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在欧洲，外地人始终是外地人，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举止不够得体，而是因为他们的出身。

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是对欧洲的反证，即将恶习归结于血统，血统归结于出身。时至今日，欧洲仍然不会把外来人口视作自己的一部分加以欢迎。现在穆斯林的经历就是过去犹太人的经历。欧洲虽然能够容纳小规模的外来人口，但无法接纳19世纪成群结队来到欧洲的东方犹太人。同样，他们也无法接纳近年来大批迁徙至欧洲的穆斯林。这并非欧洲富有阶层的问题，因为他们能够将自己与欧洲的下层阶级隔绝开来，而是欧洲中下层和贫困人口的问题，因为他们无法忽视外国人的存在，并憎恨后者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压力。双方的摩擦也因此而起。

尽管多元文化使移民和本土居民之间的差异得到了正式认可，但受到这一根本文化差异影响的往往是欧洲最缺乏安全感的民众，而对身份和文化多样性持开明态度的人几乎不可能受到这些差异的深刻影响。

这一点从德国特里尔的市立博物馆里便可窥一斑。在这座博物馆里，一个小型展区用于说明特里尔的开放性，展示了居住在当地的所有民族的物品。比如，其中一个小型柜子里陈列着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工艺品。但当地俄罗斯族或意大利族的展品被放置在其他地方，人们对待这些展品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我相信，馆长并非居心叵测，有意将特里尔的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展品放在一起。特里尔不仅是一个天主教城市，而且比德国其他地方更加虔诚。当地墙壁上和橱窗里的海报大都在宣扬和庆祝宗教活动和节日。的确，在特里尔人看来，犹太人和穆斯林都不是基督教徒，这一点是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作为国际化都市的特里尔，这一事实让当地民众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尽管犹太人和穆斯林在特里尔定

居的时间有异，命运也不尽相同，但这一点却不足以成为区分他们的首要标志。

现代欧洲正日趋世俗化。在大多数国家，不管是哪种宗教，前往教堂的人数都在逐渐减少。民意调查显示，欧洲人对宗教的态度越来越冷漠，甚至怀有敌意。“二战”前，犹太人也是这种世俗主义力量的一部分，但他们还不至于因宗教引发冲突。穆斯林则笃信宗教。这一点也许并不普遍，但足以使他们与欧洲的世俗主义格格不入。例如，法国曾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开场合佩戴面纱。这一禁令虽然出于安全考虑，但人们普遍认为，此举旨在破坏伊斯兰教的公众形象，而非控制人口众多的穆斯林教徒。

对于渡过地中海来到北岸、从巴基斯坦抵达英国和从印度尼西亚进入荷兰的穆斯林来说，欧洲的问题层出不穷。欧洲的前殖民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其民众可以选择移民欧洲。这就意味着，除了德国所支持的经济移民外，那些前殖民帝国还拥有其他形式的移民。

综上所述，欧洲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体现在服装和举止上的文化与宗教差异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城市严重失衡。在战后重建期间，欧洲急需外来移民，但他们并未成功融入欧洲社会，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首先，欧洲的社会结构使大批移民难以获得选举权。其次，许多穆斯林希望与社会隔离，以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他们来到欧洲仅仅是为了谋生，不愿为此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他们只是需要工作机会，而不是为了建设欧洲社会。

此外，还有两件事情促使这种局势进一步恶化。其一是恐怖主义。欧洲虽然没有经历过类似“9·11”的恐怖事件，但西班牙和英国都曾遭到袭击。受此影响，一些国家开始认为，如果要继续接纳穆斯林移民，移民国家的文化就需要作出调整，以保护言论自由。丹麦首相拉斯穆森甚至将恐怖袭击事件称作该国自“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关头。这种说法虽然不一定是实情，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忧虑。

第二件事情是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前，欧洲急需大量工人，尽管在欧洲人看来，这些工人的行为异乎寻常，但他们准备对此予以容忍。当时，欧洲的失业率普遍较低，这就意味着，人们只可能在文化而非经济上受到移民的威胁。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尤其是随着失业率一路飙升，穆斯林不再仅仅被视作文化威胁，而且也被视为经济威胁。在穆斯林聚居的欧洲国家，尤其是那些经济压力较大的国家，金融危机使人们的反穆斯林情绪不断高涨。虽然这种情绪未必甚至往往不会转变为种族问题，但无疑会导致双方发生冲突。

随着反穆斯林情绪遍及欧洲，穆斯林社会也出现了反欧洲情绪。穆斯林抗议自己遭到不公待遇，巴黎爆发了大规模骚乱。这一问题主要是社会问题，即外来人口在欧洲国家引起的矛盾。但在南欧，反移民和反穆斯林情绪与当地的社会危机结合起来，使欧洲陷入了更深层次的危机。马赛和巴塞罗那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穆斯林。这两座城市虽然是极端的例子，但它们也是遭到经济萧条打击最严重的地区。这里的许多人在失业后，将外国人视作竞争对手，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双方的矛盾不断升级。因此，在失业率低于6%的德国与失业率高于20%的巴塞罗那，穆斯林人口引发的问题截然不同。

全球经济危机让欧洲发生了严重分裂，南欧比北欧遭到的打击更加严重。但南欧人的生活方式有异于北欧，因为地中海沿岸的经历对他们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南欧在其他许多方面有别于北欧。南欧属于多山地带，地势比北欧更加崎岖，不仅难以通行，而且军队也很难在在乡间展开搜索。即使遭到入侵，南欧当地的宗族也能继续存在，因此较之于民族国家的抽象概念，家族的观念反而更加真切，影响也更为广泛。因此，罗马与西西里岛、马其顿与雅典之间虽然相距遥远，但只要是你热爱的地方，它们就仿佛近在咫尺。北欧平原难以藏身，而南欧遍布藏身之地。南欧不仅有民族国家，也有着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结，但在某些方面，南欧的民族主义比北欧的民族主义更温和，不像北欧那样至高无上。这一点我们从意大利法西斯与德国纳粹之间的区别便可窥一

斑，因为前者比后者虽然更为夸张，但显然更加灵活。

我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南北欧之间存在着这些差异的人，但它们的确存在，而且至关重要。工业革命发生在北欧，这里曾经是欧洲较为富有的地区，并恰巧位于地中海的贸易通道上，但如今反而成了相对贫困的地区。而南欧向来落后于北欧。我和许多人都认为，南欧人和北欧人对生存有着不同的认识，因为大自然并没有让南欧人变得像北欧人那样冷酷无情。当然，这并不是批评南欧人不够勤劳，相信任何见过希腊渔夫或者西班牙农民劳作的人们都会清楚，事实并非如此。但不可否认，南欧人的生活确实不像北欧人那样紧迫。在南欧人看来，即使冬天来临，而他们毫无准备，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死亡。此外，南欧的工业制度也没有北欧那样至关重要。要而言之，事实很简单，即南方的表现不同于北方。

德国人认为，南欧人之所以在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上不同于北欧人，也许是因为适宜的气候让他们变得更加懒散。除此以外，也许是地形的问题，又或者是因为南欧国家没有殖民地。其中可能存在许多原因，但南欧在2008年的遭遇的确不同于北欧。不仅是对欧洲整体而言，即使是对单个国家来说，在对金融危机的反应上，南北方之间也存在天壤之别。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曾表示：“法国是北欧的出口强国，还是地中海债台高筑、依赖他人的经济体？这两者兼而有之。”

塞浦路斯危机

法国的矛盾状况也是南欧的写照。在这里，也许我们最应当讨论的是地中海地区以及欧盟危机对塞浦路斯岛的影响。这座岛屿毗邻黎巴嫩和以色列沿岸，是目前南欧部分危机的缩影。有时，极端的案例反而有助于我们看清事实。

塞浦路斯岛位于地中海东部，很可能是南欧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

的地方。在1960年独立以前，这里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塞浦路斯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其余人口是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1960～1974年，该国由希土两族联合统治。然而，1974年，希腊族的民族主义者希望该国与希腊合并，并发动了政变。作为回应，土耳其入侵了土耳其族占据主导地位的北部地区，导致塞浦路斯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尽管大多数国家并不承认该国的南北分裂，但这是不争的事实。南部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是唯一的正式国家，并于2004年加入欧盟。这既是源于希腊政府的要求，也是源于欧盟扩张的抱负，此外还与土耳其问题不无关联。人们认为，凡是加入欧盟的国家都会从中受益，并且将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土耳其也希望加入欧盟，但需要得到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因此希腊可以加以阻挠。此外，欧洲人并不希望看到这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大国加入欧盟，因为他们可能无法控制土耳其的穆斯林向欧洲移民。欧洲人不愿说明这个原因，但土耳其占领北塞浦路斯正好给了欧盟口实，欧盟得以拒绝促成其成员国资格。因此，以希族为主的南塞浦路斯加入欧盟并成立正式政府，无疑是对土族发出的一个信号。就像欧洲与穆斯林一样，欧洲与土耳其人在许多方面也会相互影响，尤其是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而且双方的相互影响极其明显。

从历史上看，塞浦路斯的土族比希族更加贫困。但风水轮流转，地中海的经济危机对希族造成重创，而土族地区则相对良好，因为与土族地区息息相关的土耳其经济较为健康。如今，这两个地区的差别十分典型。如果你不租车，而是亲自从一个地区来到另一个地区，你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这两个地区已经共存了很久，因此塞浦路斯就像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一块边地，而希土两国长期以来互相仇视。虽然这种敌对情绪目前相对缓和，但在过去，双方有时会变得剑拔弩张。

当你来到塞浦路斯，沿着南岸驾车前行，你会觉得自己进入了某个南欧地区。这里既感觉不到分裂引起的紧张局面，也没有任何贫困的迹

象。但奇怪的事情很快就会出现。有一次前往塞浦路斯时，我们在利马索尔的四季酒店预订了房间，并且坚信自己没有走错地方。但是，我们很快发现，这里虽然是一家不错的豪华酒店，但绝对不是四季酒店的连锁店。毋庸置疑，使用四季酒店的名字不仅能让店家要价更高，而且能吸引更多游客。在其他地方，商标至关重要，但在塞浦路斯，这一规定相对宽松。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当地游客使用的主要语言不是希腊语或英语，而是俄语。在一个露天酒吧，我无意听到两名俄罗斯人在谈论一笔价值7 500万美元的交易。我环顾四周，发现人们都坐在那里交头接耳，神情极为专注。

我们租了一条小船离开海岸后，经过利马索尔以西一处庞大的英国空军基地，并绕过该岛的部分地区，来到拉茨。时值2013年9月，美英两国威胁将要出兵叙利亚。所以，我很想看看，这座基地有没有什么动静。在返程途中，接近利马索尔时，小船的两个引擎中有一个突然失灵了。因为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所以我们并没有惊慌失措。但是那时海面上刮起了强风，我们很难用一个引擎控制小船。因此，船长试图联系利马索尔港的巡逻队和海岸警卫队。令我诧异不已的是，竟然没有人在紧急频道上回应我们的呼叫。船长说，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他们很可能是出去喝咖啡了。”直到那时，我才猛然意识到，这里是第三世界。在这座岛屿的四周，虽然海上运输极为繁忙，但警卫队员可以中途休息，不再接听求救信号。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这里已经不再是欧洲。

这一事实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要让塞浦路斯加入欧盟？部分原因在于，2008年以前，除了当时经济发展最快的土耳其，欧盟几乎接受了其他所有欧洲国家的申请。另一个原因在于，希腊人希望塞浦路斯加入欧盟。我们不应当忘记，一段时间以来，塞浦路斯一直希望成为第二个瑞士，而欧洲人对此信以为真。当然，塞浦路斯的地理位置十分理想，并非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该国不仅距离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仅有咫尺之遥，而且接近北非、土耳其、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因此，只要能够负担得起，任何人都能来到这里。近年来，塞浦路斯成了各国

特工互相刺探情报的臭名昭著之地。此外，它还是各国资金交汇的十字路口，其中包括阿拉伯国家、俄罗斯、伊朗和以色列。在这里，间谍与金钱的结合浑然一体。

塞浦路斯试图以瑞士和列支敦士登为范本，建立本国的银行和法人体系。在这里，巨额存款可以建立秘密银行账户，并且无法对公司的所有者进行追查。正因如此，当地才聚集着许多俄罗斯人。他们大都是来查看自己的资金状况。显然，这也促进了塞浦路斯旅游等行业的发展，包括内战爆发前向叙利亚等地运输石油。

塞浦路斯人决定加入欧盟的原因一直令我感到十分困惑。欧盟无疑会关闭这里的秘密银行和法人系统，而这也是瑞士不愿加入欧盟的原因之一。尽管瑞士人已经大幅缩减了相应的活动，但仍不愿向布鲁塞尔屈服。对塞浦路斯人来说，欧盟的魅力令人慑服。他们于2004年加入欧盟，从2008年起开始使用欧元。他们显然认为，放弃对银行系统的控制，能够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然而，如果瑞士加入欧盟，就不会再有人称其为瑞士，而塞浦路斯如果加入欧盟，就不可能成为第二个瑞士。但是，加入欧盟的欣喜之情冲昏了塞浦路斯人的头脑。

解散秘密法人和银行系统并非易事，因为银行家和律师们喜欢这门生意，而储户也很难将存款转移到其他地方。直到2008年，塞浦路斯仍然存在不法交易。但日益增长的经济对银行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随后，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塞浦路斯陷入了金融危机，无法偿还其主权债务。解决这个问题向来有两种选择：一是帮助塞浦路斯人还清债务，二是迫使他们自行偿还。

德国人不仅倾向第二种方案，而且他们对塞浦路斯不同于对希腊等国，态度十分坚决。塞浦路斯政府无力偿还债务，因此欧盟迫使该国冻结了所有银行账户，并没收了个人账户中超过10万欧元的财产。其中将近一半资金未被归还，而是在那些即将破产的银行中转换为股份。

就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塞浦路斯也有许多不法之徒。欧盟十分清

楚，该国的金融系统成了这些人的避风港。德国人暗示，他们赞成没收俄罗斯黑手党的存款。据估计，非法资金约占被查抄资金的三分之一，而另外三分之二则来自塞浦路斯的企业和个人。尽管10万欧元不是一笔小数目，但这笔钱财有可能来自个人退休金、个人出售房屋所得或者其他收入的存款。事实上，欧盟抄没的是塞浦路斯和希腊企业普通公民的财产，其中大多数都是合法收入。塞浦路斯政府正是利用这笔资金，向持有塞浦路斯国债的欧洲银行偿清了债务。

这种做法在塞浦路斯引起了骚乱。公司无法支付员工工资，人们的退休计划遭到破坏，而企业纷纷从该国撤资，以避免更大的损失。由于宾馆、饭店的资本被没收，该国倚重的旅游业也遭到严重打击。我们听说，其中一家酒店失去了600万欧元，而这笔资金始终没有被归还。几个星期以来，由于大量账户被冻结，员工薪水无法全额支付，以致他们只能拿到平时75%的工资。塞浦路斯虽然偿还了欧洲银行的债务，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仅该国经济遭到重创，普通人的生活也受到冲击。迄今为止，该国许多被没收的财产仍未解冻。

德国之所以通过没收财产向塞浦路斯施加压力，是因为德国人既要向拖欠债务的国家发出信号，又不愿得罪任何一个欧洲大国。他们无法对西班牙、希腊或匈牙利下手，因为这些国家可以拒绝合作，而德国人无法承受大国对自贸区带来的威胁。塞浦路斯不仅对欧盟来说微不足道，而且深陷政治分裂之中。此外，这里严重腐败、效率低下，还有大批俄罗斯人。就像其他南欧国家一样，塞浦路斯失业率居高不下，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接近15%，经济严重衰退，甚至无法带来税收收入，同时黑钱泛滥成灾。严格来说，塞浦路斯不属于南欧，而且实力弱小，所以它无法进行抵抗。欧盟通过塞浦路斯传达出了一条重要信息，即它有能力强行采取不利于某国重大利益的措施。

有趣的是，塞浦路斯的政治领导层自愿遵从欧盟的基本要求，选择实行严厉的经济紧缩政策，而非继续拖欠债务。由此可见，该国领导人

迫切希望塞浦路斯留在欧盟，为此甚至不惜同意没收银行存款，并坚决执行这一决定。虽然这种合作态度无论对社会还是政治来说都事关重大，但该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希望继续留在欧盟，他们的兴趣才是重中之重。

事实上，大多数上层人士储蓄账户的资产净值为零。因此，上述决定对中产阶级和小型企业造成了更大冲击，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资产净值都存在银行。欧盟的策略让偿还债务的负担落在了中产阶级而非塞浦路斯政府身上。塞浦路斯政府之所以屈服，是因为从整体上来看，继续留在欧盟意义更加重大。如果不区分阶层而仅看GDP总值，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但对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利益无疑受到了践踏，因此这一决定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塞浦路斯从整体上反映了地中海地区的动态。德国坚决要求，由债务国自行解决其主权债务问题，而债务国的唯一选择是将资产转入北欧银行。由于塞浦路斯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希望继续留在欧盟的框架之内，因此准备实施上述协议，从而导致该国上层与普通民众间产生严重分歧，而人们对欧盟和本国政府的信心大为下降。此外，塞浦路斯的希族和土族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张。其后果是，许多塞浦路斯企业，尤其是服务业，纷纷制定政策，只雇用本地工人，迫使大批希望在塞浦路斯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多为非欧盟国家的穆斯林）陷入贫困或从事犯罪活动，甚至不得不离开该岛。

从西班牙到希腊，欧洲地中海地区的情况与塞浦路斯大致相同。尽管这些国家各不相同，但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债务危机、本国政府迫于外部压力实行的经济紧缩政策、日渐抬头的反欧盟情绪以及将本国政府视作问题所在的反移民政党。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穆斯林的范围。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出现了分离运动。而在意大利、法国和希腊，右翼政党纷纷出现。在这些国家中，移民被视作对民族认同和工作机会的威胁。

欧洲南北部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虽然双方存在深刻的差异，其矛盾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逐渐凸显，但不会导致战争的爆发，因为双方不存在可能擦枪走火的地理因素，而地中海地区也很难与北方开战。尽管如此，南方还是无法避免内部的动荡。只要失业率超过25%，其中还不包括薪水大幅削减的在岗员工，为政府工作的医生或工程师等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人生就会毁于一旦，从而将引发一连串可怕的后果。

首先，欧盟南北方之间的裂痕将越来越大。其次，亲欧盟的上层集团与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将日渐增长，而民众对欧盟的态度不是半信半疑，就是坚决反对。从整体上看，北欧与南欧各国的政府都必须认真处理两种关系：与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关系以及与下层民众的关系。但归根结底，无论上层集团作何希望，他们回旋的余地都将大为收缩。

鉴于目前的经济局势，穆斯林移民将成为南欧国家的不稳定因素。随着失业问题日益严重，欧洲有关民族国家的思想造成的潜在分歧将会进一步加剧。此外，这些国家中激进的政党与主要政党之间的矛盾也将不断增加。在这些激进的政党中，一部分可能是左派，但大多数实力较强的政党会成为右派，因为它们将会利用民众的反移民情绪。在欧洲，一旦阶级和种族矛盾同时出现，不稳定局势必然产生。

这并不意味着，南欧比北欧对移民问题更加敏感。相反，它可能对此更不敏感。因此，丹麦对移民和穆斯林的态度也许比任何地中海国家都令人不快。

实际上，地中海国家就像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边缘地带。从许多方面来看，对于不断北上的移民，这些国家反而更容易接受。但随着经济状况日趋严峻，这些国家对移民的温和看法正逐渐消失。

如果经济问题继续蔓延，那么南欧的不稳定局势就会向北方扩展。这种局势虽然不会在国家间引发战争，但是会在国内民众与当权者以及各个民族之间引起冲突。对于这一点，地中海国家的政治向来心慈手软。部分原因在于当地的文化习俗，南欧人往往是得过且过，所以他们

情愿忍受北欧人无法忍受的事情。上文曾经谈到，当我们急需塞浦路斯海岸警卫队的救援时，无人响应我们的呼救。对此，船长却做出了宽容的回应。我问他会不会举报这种违法行为时，他只是耸了耸肩。显然，船长绝不是对此无能为力，而是宁愿纵容。这些警卫队队员需要喝咖啡，而船长对此表示理解。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即南欧人位于欧洲的边缘。位于欧洲南部的人虽然也是欧洲人，但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仿佛置身局外。北欧人的工作效率极高，并将职场文化视作生命，因此他们与地中海对岸的阿拉伯邻国格格不入。一千多年以来，南欧与阿拉伯国家既征战不断，又始终保持贸易往来。这种贸易文化与工业文化的节奏截然不同。在南欧，讨价还价是一种社会活动，甚至可以持续一整天，而双方也都乐在其中。但在北欧，价格全都一目了然，没有商榷的余地。

当然，贸易文化也可能极为深厚，例如16世纪的威尼斯。但对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来说，其现状并非如此。和平与繁荣的理想在这里比在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岌岌可危。因为和平有赖于繁荣，而这里的繁荣正在消失。与此同时，欧盟之外的另一个大国正在崛起，并且面临着变幻无常的时代。这个国家就是土耳其。

14
土耳其
从动荡中重塑奥斯曼帝国

处于世界十字路口的国家，土耳其一直奉行“东张西望”的外交政策。“西望”便是加入欧盟，脱亚入欧，成为欧洲国家；“东张”则是突厥主义政策，加强与中亚突厥国家的联系，扩大土耳其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影响力。而中东变局，为土耳其提供了一个“南下”的机会。随着土耳其日益壮大，重塑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将不仅仅是一个爆炸性的设想……

欧亚大洲“翻译官”

许多人认为，土耳其不是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亚洲向西延伸的国度。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在地理上，土耳其位于欧洲板块之上。此外，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及其前身奥斯曼帝国始终与欧洲息息相关。这个帝国不仅曾经向欧洲扩张，而且它对欧洲历史产生的影响不亚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土耳其曾与一些欧洲列强为敌，也曾与另一些国家结盟。总之，就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土耳其的历史也是欧洲史的一部分。

欧洲人之所以将土耳其人视作异己，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土耳其人主要是穆斯林，而非基督教徒，因此不完全是欧洲人；其次，奥斯曼帝国摧毁了拜占庭帝国，而拜占庭帝国的前身是君士坦丁大帝建立的东罗马帝国。1453年，当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后，欧洲人认为，他们是对欧洲文明的极大威胁，就像曾经威胁和摧毁了罗马帝国的蛮族

游牧部落一样。对欧洲来说，土耳其是危险的局外人。

但即使是在1453年，也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将土耳其视作不受欢迎的入侵者。当时，欧洲的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双方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其中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奥斯曼人历来对宗教十分宽容，这即使不是一种道德原则，也至少是一种政治原则。帝国的建立不只是攻城略地，还包括对当地人进行统治。奥斯曼人十分清楚，统治盟国比统治敌国更加容易。因此，君士坦丁堡沦陷后，他们给予东正教宗教自由，允许相关机构继续存在，也没有强迫东正教徒皈依。天主教对野蛮的奥斯曼人横扫欧洲感到恐惧，担心东正教在奥斯曼人的支持下，势力不断壮大。如此一来，东正教适应了新的环境，但天主教却开始退缩。然而，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虽然存在神学问题，但双方对待彼此的方式显然更加实际。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并理解奥斯曼帝国向欧洲以及其他地区渗透的情况。

奥斯曼帝国在鼎盛时期控制着北非、尼罗河盆地、红海和波斯帝国以西的土地。此外，它还深入欧洲，越过布达佩斯，来到接近维也纳和克拉科夫的地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扩张部分是依靠武力征服，部分是依靠本身及其盟国一起卷入地区政治。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布达佩斯都是奥斯曼帝国的城市。

布达佩斯有一座犹太教堂，距离我出生的地方只有两个街区。这座教堂名为“Dohany Utca Templom”，即“烟草街教堂”，是欧洲最大的犹太教堂。“Dohany”是土耳其语，意思是“烟草”。匈牙利人不仅借用了这一词语，其犹太教堂也沿袭了土耳其人的建筑风格。这座教堂混杂着匈牙利不同征服者的风格，其中包括土耳其式（也被称作拜占庭式，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摩尔式和哥特式等。虽然这座教堂就像各种风格的大杂烩，但如果你仔细观看，就会发现其中的土耳其风格更加明显。烟草街教堂虽然建于19世纪，但反映出如下事实：布达佩斯曾于1541年被奥斯曼人征服，并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始终处于其统治之下。奥斯

曼人对犹太人实行宽容的政策，从犹太教堂的建筑风格中便可窥一斑。

15世纪流传着这样一段祈祷的经文：请主拯救我们，使我们免遭魔鬼、土耳其人和彗星的伤害。对魔鬼的恐惧可以理解，而在15世纪，一颗巨大的彗星确实曾让欧洲人心惊胆寒。但相比之下，他们更害怕土耳其人。因为土耳其人曾经扬言，要征服更多土地。天主教对此深感恐慌，而这显然是天主教的经文。但情况远不会这样简单。为了控制地中海，土耳其人与当时最大的海上强国威尼斯结盟。威尼斯人信仰天主教，而奥斯曼人信仰伊斯兰教，但战略归战略，生意归生意，双方包容了宗教上的分歧。我们在前文讲过，正是因为奥斯曼人控制了丝绸之路，伊比利亚人才开始征服欧洲。因此，奥斯曼人几乎影响了欧洲历史的方方面面。

此外，还有一点可以说明土耳其属于欧洲。就像土耳其文化融入了欧洲一样，欧洲也对土耳其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只剩下安纳托利亚半岛、伊斯坦布尔和东部山区。“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阿塔土克采取了两项互为补充的措施：其一是按照欧洲启蒙运动设计的模型建立民族国家，取代此前的多民族帝国；其二是政权世俗化，将社会和私人区分开，使宗教成为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他对穆斯林国家的改造，恰恰反映了当时欧洲的价值观。

显然，土耳其不只是一个欧洲国家，也是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边界地带。在土耳其，这两者被融为一体。它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角色，就像一座桥梁般从经济、政治和思想上沟通了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土耳其就像双方的翻译官，尽管它的翻译不一定有效。同时，土耳其也像一条公路，尽管这条公路迂回曲折、伤亡不断，但它仍在尽力履行自己的历史职责，并试图从这一职责中获得益处。在这一点上，土耳其与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丝毫差别。中间人的角色必须带来收益，而作为中间人，土耳其力图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中站稳脚跟，绝不仅仅是横跨两洲，而是真正属于这两个世界。

在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集市上，你可以轻易看到两者的融合。集市上虽然遍布游客，但也有伊斯坦布尔的居民。你可以买到德国的商品或者伊朗的地毯。如果走进一家商店，会有人为你搬来椅子，递上香茶，然后上上下下地对你打量一番。数百年来，当地（或者说所有地方）的人们就是这样打量顾客，然后准备宰你一笔。这里是丝绸之路的终点，也是通向意大利海上航道的起点。这里既不是亚洲，也不是欧洲。这里虽然是土耳其，但任何有钱人都会受到欢迎，而任何语言也都可以使用。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是亚洲通向欧洲的商业和文化入口，而这一入口由土耳其把守。

奥斯曼帝国的精兵强将被称作苏丹亲兵。这支军队最初组建于14世纪，士兵均来自基督教家庭。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宗教，而在于对巴夏（昔日对土耳其高级官员的尊称）的忠诚，所以，这些士兵不仅收入可观，而且在服役期间或者退役之后还能得到提升的机会，而这确保了他们的忠诚。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离不开这些基督教出身的士兵。正是他们横扫欧洲，直到布达地区。此外，奥斯曼帝国之所以依靠基督教徒士兵维持统治，还与另外一个事实密切相关：所有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除了奥斯曼一世以外，他们的母亲都不是穆斯林，而是在后来皈依伊斯兰教。奥斯曼人正是通过这两种方法，将这个多元化的帝国维系在一起。

在过去数百年中，土耳其始终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对那些希望将土耳其视作欧洲国家的欧洲人来说，这一点最让人头疼。尽管欧洲已经普遍世俗化，但仍需摒弃基督教的影响。反抗宗教的影响，就意味着需要有一个反抗的对象。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个对象就是基督教。在土耳其，世俗主义者摒弃了伊斯兰教。事实证明，这一点并没有成为双方沟通的桥梁，反而成为一种障碍。虽然双方已经宣布废弃宗教，而宗教的影响也正在消亡，但潜在的宗教仍对双方影响至深。

土耳其其实可以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伊斯坦布尔，另一部分是土耳其的其他地方。尽管伊斯坦布尔已经世俗化，但土耳其的其他地区仍

然趋于保守，并且以穆斯林人口居多。当然，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国际性都市，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这条咽喉要道沟通了地中海和黑海。因此，伊斯坦布尔既是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桥梁，也是地中海世界与俄罗斯之间的纽带。这座中枢城市被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分为二。

同时，伊斯坦布尔也是一个商业中心。这里的大巴扎集市代表了旧式的、以小商小贩为基础的经济形式。而市中心的商业区则是商业和工业的新型融合体。众所周知，伊斯坦布尔及其前身君士坦丁堡都是国际性都市。来自不同文明、有着不同信仰的人们在这里定居，并希望发财致富。因此，各个民族、各种宗教的人们由于生意被联结在一起。无论是对小商小贩还是资深的银行家来说，这座城市最体面的活动就是开展交易。正是因为这种城市骨子里就充满了包容精神，所以人们才不会小看生意人。

心酸的脱亚入欧路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这一点发生了改变。凯末尔·阿塔土克掌权后，认为土耳其必须放弃帝国，专注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事务。他还认为，土耳其必须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由于土耳其在战争中输给了欧洲人，所以凯末尔希望使土耳其欧洲化。在他看来，欧洲化就意味着世俗化，从而使宗教成为个人事务，不再进入公共生活。对土耳其来说，这就意味着禁止在政府部门穿着伊斯兰教服装，并劝阻人们在公共场合穿着宗教服装。

凯末尔关于现代化的观点十分复杂。他既希望建立民主制度，又认为民主制度会为处于重重压力之下的国家带来不稳定因素。对他来说，现代化的另一种工具是军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军队是发展中国家最具现代化的部分。军队的社会组织和科学技术能够使其成为最先进的机构，而我认为，这正是凯末尔当时的想法。通俗地说，军队确保了土耳

其的稳定，也界定了对土耳其来说什么才是稳定。他还认为，军队是由欧洲所谓的专业人员组成，因为他们不仅技艺娴熟，而且遵循职业道德准则。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显然强于职业政客。凯末尔认为职业政客道德败坏、自私自利，而士兵诚实可靠、忠于职守。此外，他还认为，这些欧洲专业人员也胜过土耳其社会的大部分人，因为后者缺乏专业素质。在随后的数年中，土耳其军方曾多次干涉政治进程。按照凯末尔的观点，军队既是世俗生活、国家稳定和道德准则的捍卫者，也是欧洲专业原则和精英原则的保卫者，因此军队从整体上将成为土耳其社会的典范。

凯末尔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统治的伊朗以及由纳赛尔掌权的埃及。土耳其建立了世俗的军事化国家模型。但从伊朗伊斯兰革命开始及其在20世纪90年代向逊尼派穆斯林中缓慢扩展，这个世俗模型逐渐受到了伊斯兰教信仰的挑战。其中最极端的例子是伊朗和“基地”组织。但纵观伊斯兰世界，世俗的军事化国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西方的魅力不复存在，部分原因在于源自凯末尔主义的纳赛尔主义根本行不通。对一个由家族和宗派构成的民族来说，个人生活和公共领域很难截然分开，因此我十分怀疑，纯粹针对个人领域来遏制宗教影响是否能够实现。虽然基督教仍然竭力想将两者区分开来，而世俗主义更是毫无保留地尊重这一原则，但伊斯兰教从未真正接受这一区分，而凯末尔建立的国家也必然面临重重压力。

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世俗主义的发源地，但即使是在该国，情况也极其复杂。除伊斯坦布尔外，土耳其其他地区仍然趋于保守，民众笃信宗教。土耳其信奉民族主义，这种思想虽然与凯末尔主义有所联系，但又始终存在分歧。2000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宣告成立，并于2002年获得压倒性胜利。该党致力于为占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代言，并放宽了一些世俗主义禁令，例如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妇女不得佩戴头巾。与此同时，该党也希望加入欧盟、保护世俗主义者，并对军队进行了约束。但世俗的土耳其共和人民党担心，展现中庸姿态的正义与发展党可能建立

伊斯兰政权，因此坚决表示反对。如此一来，土耳其政治呈现白热化状态，各种主张和反对之声此起彼伏。

有一次，我们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恰鲁夏姆巴一带散步。有人告诉我，这里是伊斯坦布尔最虔诚的社区。一名世俗主义者甚至将其称作“沙特阿拉伯”。这个社区虽然贫穷，但充满朝气，随处可见学校与商店。孩子们正在街上玩耍，男人们三三两两地交谈争论，女人们则身穿长袍，戴着头巾。此外，当地还有一所大型学校，年轻男子可以在那里学习《古兰经》和其他宗教科目。

实际上，这个地区让我想起了布鲁克林区的威廉斯堡。我的青年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威廉斯堡有许多哈西德派的犹太人，还有不少犹太中学。孩子们在街头嬉戏，男人们则在店铺外交谈。我对社区十分敏感，并且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局外人，因此往日的记忆历历在目。在这里，我本应该概括一下这两个社区的共同之处，但事实是，即使同样生活在城市里笃信宗教的贫困社区，人们也无法克服不同宗教之间的重大差异。

恰鲁夏姆巴让我明白了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或者任何计划统治土耳其的政党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伊斯坦布尔，大部分地区在感情和价值观上已经欧洲化，而这些地区无疑极其重要。但恰鲁夏姆巴以及安纳托利亚的村庄和城市对本土文化仍然极其自信，如今，这一点我们同样无法忽视。

一些世俗主义者深感忧虑，因为担心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有可能实行伊斯兰教法。在专业人士的圈子里，这种担忧尤其强烈。有一次，在与一名土耳其医生共进晚餐时，他告诉我，如果正义与发展党继续这种做法，他就准备移民欧洲。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会离开土耳其，但一两杯酒下肚后，他开始变得慷慨激昂起来。他的观点即使是在世俗主义者当中也颇为激进，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清楚，正义与发展党并没有这种打算。有时我甚至觉得，这种担忧只是故作姿态，其目的仅是希望

鼓动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关注土耳其政府的做法。

但我还是想起了恰鲁夏姆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俗主义者可以对恰鲁夏姆巴的存在置之不理。但随着时移世易，如果不能使这里的学者和店主融入土耳其社会，任何党派都无法对土耳其进行统治。然而，考虑到席卷伊斯兰世界的巨大力量，这一点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些学者和店主反映了伊斯兰世界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趋势。唯一的选择不是抑制这种趋势，而是适应这种趋势，否则就将面临长期冲突，而这种冲突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早已不再限于唇枪舌剑。恰鲁夏姆巴虽然是伊斯坦布尔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反映了土耳其最为严峻的问题。

伊斯坦布尔位于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边缘地带，因此欧洲各宗教的价值观在那里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欧洲主义者急切地希望加入欧盟，但这不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土耳其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正在放缓，但在过去10年中表现极为出色，在过去5年中甚至好于欧洲大部分国家。即便如此，欧洲主义者仍然希望土耳其加入欧盟。他们认为，这是土耳其世俗主义与自由民主制度的保障，因为土耳其加入了欧盟便等于承认它属于欧洲。然而，伊斯兰教徒对此漠不关心。就像世俗主义者一样，他们清楚，土耳其不会得到批准。然而，是否支持加入欧盟成了世俗主义社区的试金石。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将继续玩弄手腕，因为他们几乎不会损失任何东西。

潜在隐患：库尔德分裂势力

这一切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的惨败。战后，奥斯曼帝国把阿拉伯地区输给了南方，把领地输给了巴尔干半岛，但保住了帝国的心脏安纳托利亚半岛，而该地区由土耳其族控制。实际上，安纳托利亚半岛东起格鲁吉亚在黑海沿岸的边境，西至地中海的亚达那，这两点呈对角线状分布。安纳托利亚半岛以东是一片山地，土耳其在此向北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接壤，向西南与伊朗接壤，向南与叙利

亚和伊拉克接壤。

这片山地越往东走，地势越崎岖。周围的海域和山区不仅让安纳托利亚半岛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带和必不可少的核心区域，也让任何国家都难以入侵土耳其。而奥斯曼人花了一个多世纪，才占领了这座半岛。

越往东走或越往西走，不同族群之间的内部边境就变得越不重要，而民族国家之间的外部边境就变得更加重要。土耳其东部是亚洲、阿拉伯世界和欧洲的交汇地，这里不仅矛盾、暴力事件和战争此起彼伏，而且经常走到战争的边缘。库尔德自治区、亚美尼亚、伊拉克、阿塞拜疆和叙利亚都与土耳其毗邻，库尔德自治区的一部分更是深入伊拉克。因此，土耳其内忧外患不断。总体而言，从土耳其直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和欧洲，越往西走，暴力冲突就越少见，但政治动荡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由于历史原因，土耳其边境存在各种各样的民族。其中最重要的族群是位于东部的库尔德人。他们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但没有建立政权，而是散居在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土耳其。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国家。这里无疑是该地区最脆弱的边地之一，因为这个民族分别处于4个不同的国家，必然会经常出现不稳定因素。

库尔德自治区共有大约3 000万库尔德人，其中一半以上住在土耳其。土耳其人口约为7 500万，而库尔德人占20%。事实上，他们主要聚居在该国东部，并与边境另一面的库尔德人保持着联系，因此是土耳其的心腹大患。萨拉丁是12世纪伊斯兰教一位伟大的英雄。他是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曾率军抗击十字军东征。但丁在《神曲》中甚至把萨拉丁与荷马、柏拉图和尤利乌斯·恺撒相提并论，称他是英勇无畏的非基督教徒。萨拉丁是伊斯兰教的功臣，因此基督教徒对他十分畏惧。此外，他还是库尔德人的后裔。

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库尔德人没有自己的国家这一点让人十分奇怪。“一战”结束后，各国虽然就建立库尔德国家的问题开展了

重要谈判，但最终不了了之。根本原因在于，该地区的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这些大国都不希望成立一个库尔德国家。各国认为，边境地区的安全有赖于地势陡峭的山区，而库尔德国家会侵占山区的领土。如果库尔德国家成立，那么其外交政策显然无法预测，更何况库尔德人数量众多。但如果库尔德地区分裂，其中一个地区大国就可能乘虚而入，比如伊朗可能向西推进，深入土耳其，而土耳其也可能直插伊拉克。库尔德人也许会日渐强大，并危及上述三个国家。当然，由于库尔德的局势尚不明朗，它也有可能被一分为三，分别并入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

但上述三国不可能顺利实现愿望，因为库尔德人无疑会进行抵抗。由于地处欧洲边缘，该地区在许多方面有异于其他国家，但为了维护民族权力，他们同样会诉诸武力。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开展了频繁的外交谈判。土耳其的主要库尔德分裂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偶尔还会对伊斯坦布尔和库尔德地区发动空袭。而土耳其军队也会发起突击。该地区是一个贫困的伊斯兰教地区，并与土耳其人相互敌视。

一天晚上，我们住在多乌巴亚泽特。这是一座库尔德小镇，位于土耳其和伊朗边境附近。由于两国关系良好，当我们乘车来到镇外数英里处的边境时，卡车顺利地穿过了边境。我甚至认为，我们可以自由进入伊朗。但返回多乌巴亚泽特时，情况出现了变化。多乌巴亚泽特比埃尔祖鲁姆更加贫困，而后者是进入库尔德地区之前最后一座较大的土耳其城镇。从人行道和两旁的旅馆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

当晚，我们9点就上床睡觉了，因为我们既无事可做，又不愿在夜间上街散步，这倒不是有什么原因，而仅仅是凭自己的直觉。熄灯后不久，我们就听到了两声枪响，仿佛是从几个街区以外的地方传来的，而间隔不过数秒钟。或许是有人在燃放烟火以庆祝喜事，但那里似乎没什么值得庆贺的，也没有人面带喜色。这种声响也不像汽车发生回火，而是像手枪发出的声音。甚至在我听来，这种声音就像在处决某个人。直到后来我才得知，即使是在类似凡城的一些较大的城镇，这种事情也并

非不可能，但很可能不是出于政治原因。

丝绸之路仍然存在，但现在交易的商品变成了海洛因。这些毒品来自伊朗，由库尔德人走私到土耳其，然后转运到欧洲。就像所有走私活动一样，其中的规则由参与者执行。我们听到的像是处决犯人的声音很可能是因为毒品，而不是政治。正如前文所言，边境地区的走私活动由来已久，以增加价值并从中牟利。至于这些交易是哪些人在开展以及哪种生意最赚钱，我并不清楚，也不希望知道。正因如此，对于这个地区，仅了解其政治局势远远不够，还要了解其经济状况。

库尔德斯坦[(1)]不是土耳其东部唯一的火药桶，因为亚美尼亚就是另外一个。我们来到了两国边界位于土耳其境内一个名叫阿尼的地方。这里在中世纪曾经是亚美尼亚的首都，而亚美尼亚是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曾在中世纪占领过土耳其东部。阿尼位于一座平坦、干燥、多风的高原之上，与亚美尼亚仅有一河之隔。让亚美尼亚人愤怒的是，土耳其人正在挖掘当地的遗址。奥斯曼帝国垮台后，土耳其人为了确定疆界，不可避免地开展了种族清洗，导致大批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尽管亚美尼亚人从未忘记这段历史，但土耳其人不仅拒绝承认此事，反而对亚美尼亚人的做法进行谴责。在欧洲，各国的记忆都由来已久，远远不止100年。如今，亚美尼亚的古都处于土耳其的控制之下，但它却无能为力。

从阿尼继续向西北进发，你会来到卡尔斯城。这里虽然是土耳其的领土，但建筑风格更像俄罗斯。事实上，在“一战”以前，俄国人曾经占领了亚美尼亚、阿尼和卡尔斯。“一战”期间，奥斯曼人与俄国人作战，俄国便在阿拉胡克伯·达吉拉里地区的萨瑞卡密斯部署了重兵，该地区位于土耳其境内，距离俄国边境较近，但遍布崇山峻岭。1914年至1915年冬，土耳其派出了大约9万人的军队，对俄国人发起了袭击。一天晚上，当地有人告诉我，这场战斗持续了约一个星期，近8万土耳其人丧生，但其中大部分人是被冻死的。至于这场人间惨剧发生在一夜之间还

是几天之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的31年间，欧洲发生的屠杀也曾波及这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仍然处在欧洲。

我朋友的一位表亲住在伊斯坦布尔，他在距离卡尔斯大约一个小时车程的格列镇接待了我们。一天晚上，他带领我们穿过土路，越过土耳其东北部寸草不生的山地，来到一座小乡村里。据说那里有一位110岁高龄的老人。这位名叫拉兹的老人眼盲耳聋，是土耳其族的格鲁吉亚人。他们一家四世同堂，住在山冈一侧的两层楼房里。他的儿子已年过六旬，如今在镇上工作，而他40来岁的孙子是这里的村长。他的重孙只有4岁，这个小孩看到我们这些陌生人来到他的家中，感到既害羞又好奇。拉兹是高加索南部的格鲁吉亚人。在这个村子和附近的村庄里，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格鲁吉亚人。这片地区十分偏僻，曾经处于俄国人的控制之下，但现在属于土耳其。拉兹家是全村最富有的家族，他们养着50头奶牛。在这里，边界的意义不大。只要当地人的生活不被打扰，无论是谁统治这个地区，想必都会受到欢迎。

当我们喝完第三杯茶后，大门突然开启，拉兹的儿媳走了进来。这个女人也在60岁左右，看起来身材结实。她自豪地告诉我们，刚才她在外面照料奶牛，这是她的责任，而他们家奶牛的数量在村子里首屈一指。虽然已经牙齿不全，但她极有个性、待人热情，整个家庭显然都在围着她转。尽管这里地处偏远，但他们安装了卫星互联网，能够上网了解外界发生的事情。至于这位老人究竟是90岁还是110岁，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清楚，在这里，他们家境优裕。他们为此感到骄傲，并自豪地向我们这些来自美国的客人展示。

在这次旅途中，还有另一个故事值得讲述。参观卡尔斯和萨瑞卡密斯战役的遗址时，我们驱车经过了一座山谷。除了几个村庄外，这里几乎荒无人烟。这些村庄似乎既不属于现代的土耳其，也不像周边任何国家的村落。它们并不贫困，而是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当地既没有树

木，也没有泥炭，村民的能源来自牲畜的粪便。虽然这里的牲口数量很少，但这些粪便成了宝贵的财富。人们把粪肥堆在一起，看起来就像一座座小屋。这些粪肥的上面都有凸出的记号，但我无法辨认。我记得，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而当地的老妇正在装饰粪堆。

在我们经过的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户人家门前停着一辆干净的现代拖拉机。这也许比粪堆更令人感到惊异。这里既没有电力和其他能源，也曾是8万名土耳其士兵被冻死的地方。我们正处于欧洲的边缘，这里的人们悄无声息地活着，忍受着欧洲人所无法容忍的事情。

除走私毒品以外，丝绸之路还被用于运输石油，而石油也涉及库尔德人。伊拉克战争让伊拉克变得支离破碎，其中一个碎片就是伊拉克东北部紧邻伊朗和土耳其的库尔德地区。尽管在很久以前人们就知道那里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没有人胆敢进入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开采石油。萨达姆政权垮台后，库尔德地区拥有了很大程度的自治权，而石油公司也开始在当地进行开发。

土耳其对此事的立场十分奇怪。一方面，他们坚决反对库尔德人独立。但另一方面，由于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他们急于寻找其他能源来源。土耳其人发现，他们可以对库尔德地区政府加以利用，以满足本国能源需求，但这无疑是为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里的重点不是土耳其的能源战略，而是该国对库尔德政策的复杂性，以及各种利益互相冲突的方式。伊拉克与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虽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他们都是库尔德人。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自治权与商业潜力引起了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注意。就像过去一样，土耳其人正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重返奥斯曼帝国？

当叙利亚爆发内战时，土耳其曾经陷入过同样的艰难处境。土耳其

人敌视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即阿拉维派教徒领导的世俗政府。土耳其支持逊尼派，而这一派系正在反抗阿萨德的统治。但逊尼派本身四分五裂，其中一些派系不乏极端主义者，而这些极端主义者甚至希望建立伊斯兰国家。对于这场内战，土耳其人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引火烧身。

在东部和南部边境地区，土耳其人一向格外谨慎。在高加索地区、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当中，或者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当中，任何事情都不会过于简单。他们四周的新月形地带充满了动荡，有时会带来诱人的机会，有时却危机四伏。实际上，这个新月形地带只是欧洲的边界之一。它的东侧是伊朗，南侧是阿拉伯国家，两者都不属于欧洲。这里是欧洲的边缘地带，所有事情都变幻无常，并且经常会引起暴乱。这一局势正在向欧洲蔓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正与土耳其移民一起进入欧洲。

在冷战期间，其中一个最敏感的动乱爆发点位于土耳其西部，即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欧洲大陆上属于土耳其的一小部分领土。苏联人一直想要占领这个海峡。早在18世纪，俄国人就对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心存觊觎。不过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地中海，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富饶的海洋盆地，但博斯普鲁斯海峡却将俄国人阻挡在外。显然，如果能够夺取这个海峡，俄国就能进入地中海，从而摆脱陆地国家的贫困状态。届时，俄国将转变成为富有的海上强国，它的海军将与英国、法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海军一较高下。反之，如果不能占领这个海峡，俄国人将永远只是地中海的过客，等待土耳其人或者其他海上强国允许他们从这里通过。

当时，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遏制苏联，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确保土耳其和希腊不会处于苏联控制之下。与此同时，土希两国却多次因为爱琴海岛屿的控制权、塞浦路斯危机以及长期的宿怨走到了战争的边缘。

如今，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俄罗斯人利用博斯普鲁斯海峡运送石油，而土耳其人正大量购买。希腊人深陷危机之中，丧失了与土耳其发生冲突的能力。因此，在安纳托利亚半岛边界线上的一切都显得十分安宁，而这种局面似乎可以持续下去。然而，在土耳其的东北边境和俄罗斯南部边境的高加索山区，情况截然不同。目前，除了以色列和反对以色列的国家偶尔会采取行动外，地中海一片风平浪静。

然而，地中海的安宁不会持续太久。这片海域及其四周的陆地既十分宝贵，又过于棘手。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局势持续紧张，随着北非有可能重新焕发活力，而南欧处于经济衰退之中难以自制，该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土耳其正在崛起。它虽然不一定呈直线发展，但正在逐渐变得强大。与此同时，土耳其周边的许多国家不是正在衰退，就是处于冲突之中。在土耳其，重返奥斯曼帝国的设想是一个爆炸性观念，尤其在世俗主义者当中。他们认为，这是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前兆。但无论这一观念如何敏感，不可否认的是，土耳其的实力正在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力量不仅会对欧洲的土耳其和穆斯林移民造成冲击，而且必将对高加索地区以及巴尔干半岛产生影响。

---

(1) 库尔德斯坦是指库尔德人聚居或以其为主要居民的地区。在西亚北部，其范围大体从幼发拉底、底格里斯和阿拉斯等河上游起到伊朗的哈马丹为止，包括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部若干地区，以及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一小部分。

15
日暮黄昏
风光不再的英国狮

“二战”之后，衰落的英国在战争中唯美国马首是瞻，换得英美的“特殊关系”，籍此制衡欧洲——这是英国大陆均势政策的延续。然而，如今英国的危险并非来自它对欧盟事务的参与，而是在各个地区与全球体系之间谋求平衡的美国。

分而乱之：大陆均势政策

我并未到过多佛港的悬崖上，但我知道，站在那里可以将远处法国和欧洲大陆的风光尽收眼底。此外，你还可以倾听脚下海底隧道里车辆隆隆驶过的声音。这正是英国自相矛盾的地方。从表面上看，就像往常一样，英吉利海峡把守着通往英国的所有道路，将欧洲大陆阻挡在海湾之外。但海底隧道却将英国和欧洲大陆连接了起来，其间的天堑似乎不复存在。从这一悖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历史和战略上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而欧洲大陆的未来至少部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不妨放宽视野，先来看看事情的全局。英吉利海峡沟通了大西洋和北海，前者是大英帝国及其属地的纽带，后者是英伦三岛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桥梁。这是欧洲两个不属于欧洲大陆的地方，两者的文化互相关联，都以新教和海洋为中心。1066年，诺曼人（或者说诺斯人）从法国横渡英吉利海峡，征服了英国，重新划定了该国的疆界。英国人一向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荷兰和比利时往来密切，与法国的关系也长

达数百年。这让我想起了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以及其他几十家英荷公司。然而，能够决定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不只是英吉利海峡，还有北海和前文提到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该贸易区由英国成立，以北海为中心，成了英国在欧盟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北海盆地使该自贸区与欧洲大陆脱离开来，并向北海周边的国家靠近。该贸易区虽然人口规模较小，财富和资源也不足以与德国相提并论，但它可以与丹麦、荷兰和法国的一部分联合起来，作为在欧洲大陆相互关系的一种替代。仅从这方面来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进一步使欧洲处于分裂之中，虽然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但仍成为欧洲统一的障碍。

英国远非该地区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就像是欧洲大陆的调速轮。欧洲大陆虽然总是专注于内部事务，但对来自周边国家的威胁也时刻保持警惕。而英国四面环海，逐渐形成了全球观念。当然，英国也会参与欧洲大陆的事务，但只是选择性的。与法国和德国不同的是，英国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卷入其中，而法德无法对周边发生的事情漠然置之。英国时刻调控着自身与欧洲大陆的经济与军事关系。这样一来，英国经常能够对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使局势朝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而这往往意味着鼓励欧洲大陆专注其内部事务，继续处于紧张状态。

欧洲之所以从未统一，其中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北海，而是附近的英吉利海峡。这个海峡将英国与欧洲大陆分隔开来，由于水域狭窄，所以异常险恶。大西洋和北海的海水在海峡内流进流出，随着潮汐的方向不断变换，让航行变得极为困难。这里的气候寒冷潮湿、狂风不断，但又瞬息万变。因此，无论是从哪个方向出发，都很难驶过英吉利海峡。

1944年6月，当盟军准备从诺曼底登陆时，在之前的几天里，他们最大的顾虑就是当地的天气及其对英吉利海峡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

军事因素就是晕船。由于英吉利海峡风急浪险，步兵可能会在运输舰和登陆艇上晕船，导致他们在登陆后无法作战。因此，盟军必须选择最佳的登陆时机，但最终事与愿违。由于大西洋风暴接连不断，盟军只能趁两场风波之间的时机迅速通行。庆幸的是，虽然仍有大批士兵呕吐，但盟军最终胜利登陆诺曼底。

罗马人和诺曼人都曾成功入侵英国，但都发生在很久以前。自16世纪以来，英吉利海峡阻挡了所有试图入侵英国的重大行动。它在16世纪挫败了西班牙人，在19世纪挫败了拿破仑法国，在20世纪挫败了希特勒德国。这三个国家虽然都拥有极其强大的军队，但都未能跨越英吉利海峡并成功登岸。然而，让入侵者畏惧的不只是英吉利海峡的惊涛骇浪。对英国人来说，是英国皇家海军（简称“皇家海军”）保卫了他们的王国。

皇家海军的起源与其说是某种宏大的战略，不如说与窃取了西班牙人的财富有关。当时，随着滚滚的财富从南美洲流入西班牙，英国人对此极为关注。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运往西班牙的财富数量惊人，对西班牙发动突袭可以让英国大发横财；第二，日渐强大的西班牙海军对英国造成了直接威胁。如果西班牙海军控制了大西洋，他们就能占领英国周围的水域。届时，英国将毫无防御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家海军发展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尤其是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大败拿破仑海军后，他们不仅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全球海军，也成为英国建立帝国的基础。19世纪末，大英帝国在欧洲帝国体系中独占鳌头。英国海军不仅维持着这个帝国的秩序，最重要的是，它还保证了航道的畅通，使得帝国内部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能够正常开展。

英国的安全取决于是否能够继续维持对海洋的控制权。所谓英国，最初是指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联盟，但在北爱尔兰脱离联盟之后，只剩下英格兰和苏格兰。一旦丧失了海洋控制权，英国也将丧失整

个帝国。要想打败敌军的舰队，最好的办法就是防患于未然。要想阻止敌国建立舰队，最好的办法就是确保所有资源被用于陆地战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确保欧洲大陆的列强互相猜忌。而这些国家之间的确互不信任，因此英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使它们内斗下去。为了保持各方的均势，英国支持的对象不断变换，好让欧洲大陆忙于自己的内部事务无暇旁顾，从而确保英国的安全。当然，这个战略也存在问题，并非始终有效。欧洲大陆总是有国家周期性崛起，打破英国的遏制体系，并有可能长期控制欧洲大陆，从而危及英国的安全。然而，最终西班牙、法国和德国都功亏一篑。在极端的情况下，一旦英国的均势外交和经济平衡政策都不再奏效，从长期来看，英国对海洋的控制权就会受到威胁。只有此时，英国才会出兵干涉。英国的陆军规模相对较小，所以不得不利用精准性武器，并避免参加大规模战役。因此，就像在滑铁卢战役中一样，英国的做法是在小规模战役中采取决定性措施，削弱正在崛起的大国力量。然而，这种战略的缺陷在于，英国并非总是能控制自己的敌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被拖入消耗战，导致这一战略不再奏效，而英国最终丧失了大国地位。

大英帝国解体之谜

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声称，英国是“一个乏味而正直的民族，他们躲在25万把刺刀后面，把玩并加强自己的无聊”。比起欧洲战场上以数百万计的刺刀，英国的25万把刺刀实在微不足道。但有意思的是，一向目光如炬的奥威尔却认为英国人乏味而又正直。他既尊重正直的品行，也不讨厌乏味的个性。这虽然是英国人对自己的看法，其中却包含着巨大的矛盾。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将欧洲的政客玩弄于股掌之上，因此获得了“背信弃义的英格兰”的名号。欧洲人认为，英国人在欧洲只是在冷酷无情地谋求自身利益，丝毫不顾及自己所作的承诺或应负的责任。因

此，欧洲人才会认为英国人“背信弃义”。更有甚者，英国一面操纵欧洲大陆，一面建立起庞大的帝国。英国通过结盟、操纵、欺骗和最低限度的武力，统治着数以亿计的印度人。不仅如此，英国在中国也占据主导经济地位。此外，他们还控制着伊斯兰世界。因此，你很难认为英国人令人乏味、品行正直。虽然英国的历史充满了智慧、狡诈和冷酷，但奥威尔却认为他们乏味而正直。他指的到底是什么人？

剧作家乔治·萧伯纳在《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Caesar and Cleopatra*）中写道，在听到西奥多特斯对埃及婚姻规则的描述后，布列塔尼斯立即接腔说：“恺撒，这是不对的。”这句话触怒了西奥多特斯。为了安抚他，恺撒说道：“原谅他吧，西奥多特斯。他（布列塔尼斯）只不过是个外乡人，把自己部落和小岛上的风俗当成了自然法则。”

英国人征服了全球大部分领土，而大英帝国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文明，但英国人仍然相当狭隘。波斯人、罗马人和希腊人也建立了庞大的帝国，但与这三者不同的是，英国人不仅认为本国文化更加优越，而且相信自己最微不足道的习惯也彰显了文明。布列塔尼斯对埃及皇家婚礼的风俗感到震惊，但这种惊异不是源于双方的差异，而是认为他们违反了礼仪的标准。恺撒虽然是个骄傲的罗马人，但他认识到布列塔尼斯过于狭隘。众所周知，所有社会都有其风俗，而这些风俗各不相同。但有时候英国人似乎认为，尽管社会风俗多种多样，他们的风俗才是唯一恰当的生活方式。

我还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我曾受邀前往英国某所著名的大学参加宴会。在我小时候，用餐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不过是使用刀叉并在需要时使用勺子而已。因此，我对英国人在用餐时的繁文缛节感到瞠目结舌。这件对我来说本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到了英国人那里却变成了一套复杂的仪式，其间许多主观刻板的规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我从未见过如此众多的器皿，也不清楚有些器皿的用途，况且他们喝汤的礼节既复杂又费时。他们以为，任何坐在这张桌旁就餐的人都接受过适当

的教育，掌握了正确的进餐方法。这一点并非不近人情，但我却困惑不已、手足无措，因为我不知道该用哪只手拿哪样东西，喝汤时身体应该呈何种角度以及从哪个方向从碗里舀汤。宴会的主人倒是非常友善，对我显然缺乏教养这一事实只字未提。

后来，我和一名澳大利亚女子结了婚。她所在的地方沿袭了英国的遗风，而她也将自己从小学会的餐桌礼仪视作自然法则。最终我作出了让步，学会按照她所喜欢的方式用餐。她也清楚，这些只不过是一种习俗，但仍坚持认为这才是唯一有教养的进餐方式。不过，在她看不见时，我仍会用碗喝汤。

当然，她绝不乏味。如果你了解英国历史，你就很难理解奥威尔为何认为英国人乏味。但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促使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帝国。英国人承认，世界上存在许多文明，他们对其他文明也非常感兴趣。但在内心深处，英国人相信，即使是喝汤这样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不只是他们的习俗，而是自然法则。

英国人不仅始终固守自己的文化，仿佛自然法则本身就十分狭隘，而且形成了一套规则。这套规则不但将他们团结在一起，还按照他们的想法改造了殖民地。因此，不可否认，英国人的乏味具有某种强大的力量。他们不愿承认日常习俗的多样性，这种观点的确十分乏味，但迫使那些希望效仿英国的人，不得不按照他们的规则行事。让人在宴会上感到惊慌失措、举止失当，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对大英帝国来说，比起残酷的暴力，这是一种更加适宜的武器。

英国人按照自己的想象建立了北美殖民地。起初，即使是那些激进的异见分子，也仍然按照英国的方式表达异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英国文化和英国霸权发出了挑战。美国既是英国的第一个大型殖民地，也是帝国衰落的开始。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文化，因为美国人将英国哲学融入了自己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形成的原则反过来影响了英国的制度。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建立在移民之上，而移民使美国文化始

终处于变化之中。即使不考虑战后移民对英国文化产生的影响，美国文化及其率性随意的特征和精英管理的理念也让英国感到异常烦恼，但并没有让欧洲大陆感到不安。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人狭隘的思想和乏味的性格让他们很难与日渐强大的美国抗衡。因此，在争夺海洋控制权的斗争中，英国输给了美国，同时也输掉了自己的帝国。

美国与英国有着同样的利益。美国虽然面积辽阔，但作为一座岛屿，同样需要抵御外来入侵。因此，美国最大的威胁是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国家——英国。1812年，英美两国开战。随后，双方在俄勒冈的控制权问题上以及美国内战期间，多次爆发周期性冲突。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美国在“一战”后制定了一系列作战计划。其中的“红色作战计划”是为了应对英国从加拿大入侵美国。当然，这种说法有些不着边际，这只是军事参谋部门制定的应急计划之一，因此意义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确制定了针对英国的作战计划，这是不争的事实。

英国人虽然无意入侵美国，但双方为了大西洋这片海域展开了角逐。美国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家，因此需要在大西洋畅通无阻。为了维持帝国的统治，英国也需要控制大西洋。随着双方的战略意图发生了变化，两国的实力就显得更加重要。虽然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没有真正的冲突，但美国对英国控制着西半球海军基地一事深感不安。自1900年后，英国也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忧心忡忡。

然而，局势在“二战”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国沦陷后，英国人处于德国的巨大压力之下。美国同意借给英国50艘老式驱逐舰。而作为回报，英国同意把西半球的属地和基地租借给美国，租期为90年，其中包括东巴哈马群岛、牙买加南岸、圣卢西亚、西特立尼达岛、安提瓜岛和英属圭亚那部分地区，并允许美国在百慕大和纽芬兰建立军事基地。

为了得到美国的50艘驱逐舰，英国让出了西半球的海军基地，不仅消除了自身对美国的任何威胁，也丧失了向北大西洋投射武力的能力。而美国借给了英国急需的驱逐舰，以应对德国U型潜艇的威胁。因为美

国帮助英国遏制了德国，所以英国允许双方在北大西洋的势力均衡出现变化。

战争结束后，美国成为第一个控制了全球所有海洋的国家，它把日本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从太平洋驱逐出去。现在，美国不仅控制了北大西洋，而且通过北约控制了或者说至少部分控制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残部——大英帝国至此终结。这个昔日的海上强国已经无法控制海上航线，而美国人也无意继续维系大英帝国。因此，尽管大英帝国的瓦解存在诸多原因，但不可否认，1940年美国利用英国的困境，将其逐出北大西洋，这一事实对大英帝国的解体至关重要。

随着大英帝国的瓦解以及美国控制了西欧国家，英国逐渐沦为一个普通国家。虽然英国也是“二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它丧失了最重要的领地，从而导致英国人的做法也发生了转变。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致力于维持均势，如今却转而希望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取得平衡。当然，英国仍在寻求某种均势，只不过采取的方式更加复杂。

我们曾在前文提到，大英帝国瓦解后，英国与欧洲大陆维持着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并非没有先例。纵观历史，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时而亲密，时而疏远。18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竞相效仿法国人。但19世纪末，他们开始转而效仿英国人，包括英国的服饰和举止。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欧洲大部分皇室都有维多利亚女王的后裔，但也是因为英国值得他们模仿。当时，英国的全球实力和工业革命让该国的风俗习惯充满了魅力。通过模仿，人们就能分享英国人的成就。但这些习俗也许只有与生俱来才能真正掌握，所以英国的上层阶级甚至是中产阶级由于掌握着更为复杂的习俗，从而比欧洲其他国家的人略胜一筹。与此同时，年轻的英国绅士开始环游欧洲，前往雅典、罗马和巴黎瞻仰，但这更多是为了历史和诗歌，而不是这些城市的居民。简而言之，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就像一桩不太和睦的婚姻，双方虽然因激情维系在一起，但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例如尊重、信任和共同的命运

感。

“二战”过后，英国人在欧洲大陆失去了实力和魅力，欧洲大陆开始关注美国及其截然不同的文化。英国文化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的复杂和神秘，而美国文化却以率性坦诚著称。英国人不希望外国人和下层社会渗入他们的文化，但美国人却希望所有人都能完全融入美国文化。从整体上看，美国文化以理智为中心，其典型的象征是计算机。对美国人来说，午饭只是为了充饥，而不是为了赏心悦目。成功需要全身心的投入，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欧洲人希望与大家庭住在一起，但美国人习惯于随工作地点定居。我和妻子有4个孩子，每个孩子都住在不同的城市，不跟我们在一起。他们是美国人，所以崇尚事业为先。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较之于为了获得成功而四处奔波，家庭成了次要的东西。

美国人对欧洲人的吸引力就像过去英国人对欧洲人的吸引力一样，甚至更加富有魅力，这既是因为美国文化向所有阶层敞开，也是因为美国文化拒绝客套地疏远他人。但是有一点，美国的吸引力也许稍逊一筹，因为美国文化要求所有人都融入美国，这种要求不仅极其强烈，而且不容置疑。如此一来，英国被夹在了美国与欧洲之间。

从宗主国沦落到“特殊跟班”

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法德两国曾经提到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制定经济政策的方式。即使撇开它们对美国目前种族特点的误解以及欧盟接踵而至的危机不谈，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欧洲大陆将英国归入了美国阵营，认为它接纳了美国文化以及居于美国文化中心的美国经济模式。

欧洲人认为英国人有异于自身，美国人也认为英国人与自己不同。但英国人认为，他们独一无二，需要同时在这两个阵营中站稳脚跟。从

经济上来看，如果将欧盟视为一个整体，那么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欧盟。但是，如果将欧盟视作众多单个国家的组合，情况就会有所不同。2013年，美国是英国商品的头号进口国，它购买了英国出口商品的13.4%。德国位居次位，购买了英国出口商品的9.8%。荷兰、法国和爱尔兰紧随其后。但德国、荷兰、法国和爱尔兰合计起来，总共购买了英国出口产品的31%。这就意味着，英国不仅有近三分之一的出口产品进入了英国对岸的国家，还有10%的出口产品进入了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样看来，英国出口商品约有40%流向了北海盆地。

因此，英国人面临着两大主要经济关系，即与北海盆地和英国周边其他海域之间的经济关系。如果这些国家作为整体，那么它们是英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但是，如果按照单个国家计算，美国仍是最大的进口国。从历史上看，英国的国家安全和影响有赖于北海盆地这个区域，而非欧盟。在经济上，英国也已经返回了地理中心，并借此维持了与其最大的进口国美国的关系。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合计起来占英国市场的一半，其中包括中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

英国人显然不愿过深卷入欧盟。他们只是欧盟的一部分，并始终与其保持着距离。其中的原因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战略。英国已经没有能力操纵欧洲的均势。但与此同时，欧洲日益严重的分裂状态和矛盾需求有可能将英国拖入其中，并对其造成损害。英国既不希望依靠欧洲央行解决问题，也不希望陷入欧洲各国之间的政治攻讦。但英国对欧洲十分关注，尤其是对北海地区，因为英国与此地区的关系至关重要。欧盟的益处在于，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能够在正常的自由贸易模式内，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但英国感兴趣的是自由贸易区，而不是统一货币，更不是建立欧洲联邦。

为了维持平衡，英国始终与其最大的进口国美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但这不只是经济关系，还包括军事关系。尽管欧洲计划裁军，但英国仍与美国保持着重大军事关系。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在大多数地区，英国

军队都不具备单独开展行动的能力，其军事作用在于使美国依赖英国，从而使英国获得与欧盟抗衡的实力。从过去10年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开展的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进程正在展开。

英国军队并非毫不重要。与其他盟国军队不同的是，英国军队的作用远不止于某种象征。例如，英国空军特别部队曾在许多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对美国来说，英军最重要的益处在于政治方面。当法德两国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时，英国和其他较小的欧洲国家对美国表示支持。正是英国的支持为这次行动提供了合法性，否则美国很可能师出无名。

当然，英国自愿参与美国开展的战争，遭到了许多人批评，但这一做法的确事关重大。法国人也曾多次提出，要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但这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一种设想。英国与美国建立了真正的特殊关系，而这一关系的基础源于英国人的行动。因此，英国人可以向美国提出要求，获得美国的技术，分享美国的成功。从这一意义上看，英国虽然远非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借用他们的话来说，英国却能够超常发挥，因为美国会成为它的后盾。

英国人正继续谋求均势，但这一均势一如既往地错综复杂。无论这一均势如何盘根错节，英国最终目标仍是尽可能地维持自身实力，以确保国家利益，而无需担心被卷入本国无法控制的局势中。就像以往一样，英国正操纵着周边国家，以免自身陷入灾难。其结果是，英国一面操纵美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也绝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操纵。为了保存实力，英国采取的战略是，在战争中唯美国马首是瞻。显然，英国利用欧盟成员国的地位，获得了进入欧盟市场的权利，但又从不深陷其中。

英国的危险并非来自它对欧盟事务的参与，而是来自它用以制衡欧洲的砝码，即美国。英国是一个地区大国，而美国是一个全球大国。英国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寻求平衡，而美国在各个地区和全球体系之间寻求

平衡。英国本身就是均势的一部分，因为能够为美国所用，所以获得了回旋的余地。这就意味着，英国经常要面对两种选择，即在美国的冲突中扮演从属角色，或者失去自身的影响乃至平衡。因此，英国的地位十分独特，为了间接维持自身进行斡旋的余地，它将不得不继续卷入冲突之中。

英国过去也曾卷入冲突，但这种类型的冲突已不复存在。英国将对欧洲大陆的重大事件产生影响，但在冲突结束时，它将不会再次成为决定性力量。英国可能参与前殖民地的维和行动，但不会再次发动殖民战争。北爱尔兰也许会再次爆发种族冲突，但英国不可能发动战争迫使爱尔兰就范。昔日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

其结果是，英吉利海峡将仍然是一个风平浪静的边缘地带，而不是一根一触即发的导火索。

在莱茵河一带，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假如比利时分裂，法国政治将会出现严重转向，一旦极右或极左政党上台，该地区的形势有可能变得剑拔弩张。但这些假设很难成为现实。只要美国仍然控制着各大洋，英国继续与美国维持关系，至少英国的周边地区会天下太平，而英国奇特的文化也将得以继续。

因此，就像历史上一样，英国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擦枪走火，但这个地点不一定出自英国的选择。例如，在后冷战时代，随着俄罗斯的实力不断增加，美国可能不得不在该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边缘地带部署军队。而一旦美国出兵，英国很可能紧随其后。冲突发生后，为了在各个地区和全球发挥重要作用，这将是英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谋求独立的苏格兰

然而，对英国来说，苏格兰仍是一个未知数。17世纪被英格兰征服后，苏格兰被划入了大不列颠的版图，大不列颠的国旗即综合了英格兰

的圣乔治十字旗和苏格兰的圣安德鲁十字旗。在这个联盟中，英格兰居于主导，苏格兰人虽然怨声载道，但几乎没有反抗的理由。以市场和技术实践为核心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就像一股精神动力，催生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此外，英国还在苏格兰对北海油田进行了开发，并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繁荣。

目前，苏格兰出现了独立运动。在就独立一事举行的全民公决中，55%的民众投票支持离开联合王国，这一数字令人震惊。它反映了曾对欧洲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最根本的革命性力量。随着每一个民族都要求拥有民族自决权，欧洲将变得四分五裂。但人们认为，苏格兰要求独立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而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同样，英国对独立的抵制也源于经济问题，而不是出自民族自豪或义愤，而民族主义正是过去数百年中战火连绵不绝的原因。

苏格兰希望重获国家主权，但不同寻常的是，双方显然都缺乏热情。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爆发的天鹅绒革命[(1)]。“一战”结束后，是局外人将两者合为一体，双方从未对这一结合表现出热情。但英格兰与苏格兰的统一是在血雨腥风中完成的，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斗争、阴谋和背叛后，苏格兰失败，英格兰获胜。因此，两者之间就像存在某种核能，巨大的能量将原子结合在一起，但是当这种能量不复存在，就有可能爆炸。事实上，在过去的数百年中，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已经丧失了这种能量。苏格兰也许会离开英国，如果它真的希望离开，那么英国将面临分裂。但是，两者之间不会有爱尔兰从英国独立时或北爱尔兰发生危机时的那种愤怒和痛苦。

无论苏格兰离开联合王国，还是英国对其加以阻挠，都不会令人觉得奇怪。当然，如果双方没有爆发战争，也不会出人意料。正如奥威尔所言：“英国人乏味而又正直。”苏格兰人也曾深受影响。但即使双方没有冲突之虞，苏格兰人也有可能证明，欧洲的民族主义仍然十分活跃。此外，他们还有可能证明，不是所有民族主义都会受到对他人仇恨和对

自身热爱的驱使。

---

(1) 天鹅绒革命狭义上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于1989年11月（东欧剧变时期）发生的民主化革命。从广义上讲，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的，指没有经过大规模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的革命，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

16

欧洲危机

俄欧关系——未来冲突爆发点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制衡欧洲，但如今它已不再是国际体系的中心，美国也变得更加强大。然而，富有而弱小终究是一对危险的组合，事实上现在任何国家都可以军事挑战欧洲。随着俄罗斯的日益强大，与欧盟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增多……

富有而弱小的欧洲

本书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欧洲是如何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称霸全球的？第二，欧洲存在哪些缺陷，让它在1914～1946年丧失了这一霸权？第三，欧洲的未来是否会像1945年后的和平时期一样，或者欧洲是否会重蹈战争覆辙？如果不能回答前两个问题，我们就无法解决最后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才是笔者撰写本书的真正原因。

简言之，欧洲冲突的历史远未结束。欧洲的基本结构一如既往，四分五裂、小国林立。其中一些国家虽然已经走出了历史上的怨恨和痛苦，但这些负面情绪并没有彻底消失。在有些地方，这种情绪甚至仍居于主导地位。总体而言，尽管它们在一些地方已经销声匿迹，但在许多地方，欧洲人之间的仇怨仍然存在。

1945～1991年，世界处于和平时期，但这不是欧洲人的功劳，而是

处于美苏威压之下的和平。1991～2008年，欧洲曾经获得了短暂的和平。事实证明，只有在经济极其繁荣、德国致力于统一时，欧洲才能避免战争。严格来说，这17年并非没有爆发战争，只是没有发生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而已。2008年以后，随着人们对欧盟不切实际的幻想逐渐破灭，并对德国的不满不断扩散，以及俄罗斯重新确立其大国地位，对欧洲的考验也即将到来。这一结果将对欧洲产生决定性影响，但谁也无法预知结局将会如何。

我认为，那31年的灾难不会在欧洲重演，因为欧洲已经不再是国际体系和全球文化的中心。这一灾难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当时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控制欧洲。1918年和1945年，美国曾两次扑灭了欧洲的战火。在冷战期间，美国也成功遏制了战争的爆发。今天，美国变得更加强大。就像过去一样，美国仍然能够做到这一点。目前，虽然欧洲遍布小型动乱区和小规模冲突，但我认为不会爆发全面战争。但即使是眼下看似绝不可能产生摩擦的国家之间，将来也有可能爆发重大冲突。欧洲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这里之所以会爆发战争，既不是因为人们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也不是因为欧洲人态度糟糕，而是因为这里利益分歧过深，不开战的后果比开战更加惨重。不难理解，仅凭希望，冲突不会自动消失，而欧洲人也无法摆脱人类贪婪的本性。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但我认为，这也是不容置疑的真相。

欧洲已经丧失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如今的欧洲虽然具有强大的商业实力，但这种实力只是欧洲人所谓“软实力”的一部分，并且有赖于国家安全的保障，其中包括在海上和空中自由通行、其他国家愿意与其开展贸易、海外投资安全可靠。因为欧洲仍然技术先进、经济发达，所以与其中一些欧洲国家建立关系会使其他国家从中受益，而欧洲一旦决定中断这种合作关系，将会对其合作者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这一实力不可小觑。

然而，迫使其他国家接受欧盟投资、遵守相关协议的能力，取决于

人们对未来投资和贸易的期望。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欧洲不再是霸主。尽管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强国能够提供和欧洲同样的益处，但违反协议的后果更加严重。从目前来看，这一点也许无关紧要。但是，一旦这些全球大国出现分歧，而欧洲被夹在中间，它缺乏的硬实力就会显得至关重要。总之，富有而弱小是一种危险的组合。

欧洲人生活在一个豺狼遍布的世界里。迄今为止，有些豺狼已经出现，有些正蠢蠢欲动。在欧盟这个国际组织中，德、法、英等国可以使用经济手段为自身谋利，但大多数欧洲国家并不具备这一实力。然而，即使对前者来说，经济力量也是它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手段了。正因如此，它们无法与美国抗衡，这才是理解欧洲的重中之重。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对欧洲发出军事挑战，而欧洲人要么破财消灾，要么置之不理并希望问题自行消失，要么表示屈服，但无论如何，欧洲暂时不会走向战争。

博弈乌克兰

最重要的冲突已经出现，即俄罗斯与西欧国家为了争夺两者之间的边缘地带而展开的斗争。双方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因为波罗的海三国已经加入了欧盟和北约。这场争斗的根源众说不一：西方声称，为了反对腐败专制的总统，民众举行了起义；俄罗斯人则声称，在美欧的支持下，合法的民选总统遭到了暴民罢黜。

重要的不是孰是孰非，而在于地缘政治因素。乌克兰是俄罗斯南部的缓冲区，一旦它成为欧洲的势力范围，伏尔加格勒距乌克兰边境就不到200英里，无疑会对俄罗斯造成重大威胁。伏尔加格勒即斯大林格勒，“二战”期间，为了保卫这座城市，苏联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乌克兰与北约结盟，北约向东推进的程度几乎相当于希特勒在“二战”期间东进的程度。北部的白俄罗斯被夹在波罗的海国家与乌克兰当中，一旦该国发生政变，昔日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中心城市斯摩棱斯克将会沦

为边境城市。届时，整个欧洲大陆都有可能落入俄罗斯人手中。

俄罗斯人清楚，各方的意图可能迅速改变。即使目前欧洲和美国毫无恶意，但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意图乃至实力都有可能发生变化。1932年，德国既不堪一击，又处于分裂之中，而且几乎没有军队。但1938年，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军事强国，其意图和实力迅速发生改变。俄罗斯没有忘记这一点，更没有忘记克里米亚战争。因此，它必须做出最坏的打算，因为事情往往会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迄今为止，俄罗斯并不十分强大，军队远远不能与过去的苏联红军相比。但不可否认，这支军队比欧洲任何国家的军队都要强大。因此，俄罗斯不需要入侵欧洲其他国家。由于乌克兰经济遭受重创，德国不愿对俄罗斯发起挑战，美国又鞭长莫及，这让俄罗斯获得了巨大的优势。乌克兰对俄罗斯意义重大，也对欧洲至关重要，因为欧洲需要在俄罗斯边境建立缓冲区。但对美国来说，乌克兰无足轻重。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只能依靠自身，但仅有经济实力不足以产生决定性影响。乌克兰对俄罗斯过于重要，因此后者不会使经济问题形成障碍。此外，俄罗斯手中还掌握着一张王牌——欧洲需要的天然气。然而，得到天然气需要付出政治代价。

俄罗斯试图在西部重建缓冲区。但欧洲人和美国人希望突破这一缓冲区，以便能对俄罗斯的做法施加影响。由于欧洲缺乏军事实力，这将是一场极不平衡的博弈。在乌克兰以西的边缘地带，一系列国家已经接受了欧洲的观念，认为军事实力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其中包括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但是，随着俄罗斯不断西进以确保其缓冲区的安全，对上述国家来说，唯一的问题是俄罗斯人将会走多远。

这个问题可以从另一个问题中找到答案：欧洲东部的边境究竟有多么脆弱，以致俄罗斯人不需要入侵该地区便可获得更强大的实力？欧洲四分五裂，北约软弱无能，这个地区暴露在危险之中。由于欧洲经济危

机尚未解决，欧洲东部地区不得不寻找其他解决方案。俄罗斯的经济在全球位居第八，虽然存在严重的经济缺陷，但不需要大量投资就能使匈牙利或斯洛伐克等国获益。俄罗斯只需要将这些国家划入自己的圈子，届时较为强大的波兰和罗马尼亚就会受到孤立，从而不得不与俄罗斯和解。

对这些国家来说，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增强防御能力。但即使联合起来，它们的力量也十分薄弱。它们所覆盖的狭长地带极易遭受军事袭击，也经不起经济诱惑，因此亟需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从某种程度上予以支援。欧洲东部的国家联盟既需要经济支援，以缓解自身面临的问题，也需要军事支援，以支持它们发起的抵抗。当然，其中的关键在于德国的支持。

德国不仅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此外，它还是全球第三大出口国。因此，德国惯于从经济角度看待这个世界。这不仅是因为1945年德国遭遇惨败，也是因为德国实现了经济繁荣，从而使军事冒险活动显得极不合理。但问题是，是否进行军事干预，并不完全取决于德国人。如果俄罗斯对东欧的弱点加以利用，那么德国必须作出战略决策。德国可以选择与俄罗斯结盟，但如果德国仍然缺乏军事实力，这个联盟就可能成为一个陷阱。相反，德国也可以对俄罗斯进行制衡，支持东欧国家结盟，或者做好准备，将俄罗斯人逼退。

目前为止，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缘地带正处于一触即发的活跃状态，但这并非俄罗斯周边唯一的危险地带。高加索地区仍然剑拔弩张，为了施加压力，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签订了长期条约，向该国派遣了大批军队。这一局势不仅让西方支持的格鲁吉亚夹在俄罗斯与亚美尼亚之间，而且对阿塞拜疆造成了严重威胁。如果欧洲不想依赖俄罗斯的能源，那么阿塞拜疆无疑是替代选择。

这一局势也会将土耳其牵涉进来。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由于发生过屠杀，因此互相敌视。此外，土耳其还需要俄罗斯的能源，因而

在找到其他替代能源之前，它不可能对俄罗斯发出挑战。但对俄罗斯的石油，土耳其很难找到其他替代。与此同时，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形成了一个舒适的缓冲区。随着俄罗斯的影响逐渐恢复到冷战时期的水平，土耳其不希望这个缓冲区消失不见。因此，土耳其人与俄罗斯人会在政治上展开角逐，尤其是在阿塞拜疆境内。

土耳其所处的地位十分复杂。它将发展成为一个大国，但实力尚不够强大。目前的土耳其正经历周期性经济衰退和国内政治动荡，但这两方面的影响都不会持续太久。由于经济力量强大，而周边动荡不安，土耳其必将发展成为一个强国。混乱的局势既使土耳其获得了进行投资和开展贸易的经济机会，也有可能将其卷入冲突之中。黑海的未来与土耳其息息相关，因此乌克兰局势关系到该国的切身利益。此外，伊拉克、叙利亚、伊朗以及阿拉伯半岛和巴尔干半岛都关系到土耳其的利益。随着黑海的局势变得日益紧张，土耳其南部和东部要么会发生暴力冲突，要么会处于动荡之中。目前看来，土耳其周边唯一不会爆发冲突的地区是巴尔干半岛。但是，从过去数百年的历史可以得知，在巴尔干半岛，宁静只是暂时的。除了欧洲大陆，土耳其周围遍布危险地带。

我们需要根据北非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对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进行重新考虑。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的主要方面是能源从北非，尤其是从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向南欧的流动情况。这两个国家的能源不仅对欧洲极其重要，而且也是俄罗斯能源的替代选择。但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都很不稳定，尤其是利比亚。利比亚爆发内战后，法国和意大利曾经为了是否进行干涉而争执不休。随后，法国发动了空袭，并要求美国动用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进行支援。显然，法国人无法单独开展这场战役，以致美国人不得不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对美国来说，这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更何况这次事件的余波不断。

欧洲需要依靠美国控制埃及等地的局势。但除非事态紧急，美国不愿卷入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埃及的问题有可能扩散开来。在北非，除

了对付极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美国没有激进举动，更不会试图发动政变。但对欧洲人来说，能源运输事关重大，而确保能源供应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地中海地区的第二条导火索是从北非和土耳其迁往欧洲的大批移民。由于欧洲需要廉价劳动力，这些移民被吸引到欧洲。但他们的出现引起了严重的内部矛盾，并危及欧洲的免签证区，而欧盟的大部分国家都加入了免签证区。因此，丹麦等国希望阻止穆斯林进入，许多国家就限制穆斯林移民的问题达成了共识。这在北非也成为了重大问题，并有可能引发反欧情绪，从而转变为跨地中海的恐怖主义活动，或者危及北非各国的政权。一旦出现上述情况，欧洲人将不得不卷入他们所不希望看到的局势中。

在欧洲，这个问题还会引发另一种情况，即右翼政党的崛起。对金融危机和大规模失业来说，其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民众对现存的政党和欧洲一体化失去信任，从而导致一大批右翼政党崛起，其中包括匈牙利和法国。这些政党对欧盟采取敌视态度，并激起了狂热的反移民情绪。此外，它们还对本国的国家利益表示支持，反对欧洲上层集团的跨国利益。目前，虽然这些右翼政党的势力还不足以上台执政，但有些已被纳入联合政府，还有一些正在迅速壮大。

卷土重来的俄罗斯

从整体上看，欧洲昔日的火药桶莱茵河谷和英吉利海峡等地仍然十分太平。尽管法德矛盾日益加剧，但远不足以擦枪走火。但在上述表象之下，引发冲突的根源正蠢蠢欲动。浪漫爱国主义者对将国家管理权转让给跨国机构的合法性发出了挑战，导致昔日的民族冲突死灰复燃。右翼政党的崛起只是冰山一角，因此这股力量绝不容忽视。但是，对欧盟各国在经济问题上让渡主权所产生的后果，人们普遍感到忧虑，而这种情绪正与日俱增。

目前看来，冲突爆发点位于欧盟边境，但欧盟本身已经步履蹒跚。事实上，欧盟一共包括4个部分：日耳曼国家（德国与奥地利）、其他北欧国家、地中海国家以及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正面临着昔日的边地再次被俄罗斯占领的危险。地中海的欧洲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一些国家的失业率甚至超出了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北欧国家的情况整体良好，但比起德国仍相形见绌。

在欧盟的不同地区，各国的状况和人们担心的问题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反映出欧洲正处于分裂的边缘。每个地区对现实都有不同的看法，而它们的分歧很难调和。事实上，很难想象它们会达成和解。欧洲已经一分为四，而这四个地区仍在进一步分化。它们正在重回昔日民族国家的道路，重回它们希望超越的历史。

归根结底，当代欧洲的问题也是启蒙运动时期让它困扰不已的问题。这个问题便是浮士德精神，即纵使付出灵魂的代价也要占有一切的渴望。今天，欧洲人既渴望占有一切，又不希望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希望永久的和平与繁荣。他们既希望保留本国的国家主权，又不希望其他国家完全行使自己的主权。他们既希望欧洲能实现统一，又不希望与其他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他们既希望使用母语，又不认为这会成为实现互相谅解的障碍。他们既希望获得胜利，又不希望承担任何风险。他们既希望安全无虞，又不希望进行防御。

但除此之外，欧洲还有另外一部分，即被亚洲包围的欧洲大陆。这片土地从未被彻底征服过，也从未风平浪静。现代欧洲的历史始于1991年，苏联消亡之日也是欧盟诞生之时。2014年，俄罗斯卷土重来，该国与欧盟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多，历史再度上演。令人惊异的是，欧洲人对欧盟的幻想只是昙花一现。欧洲最危险的地带在2014年死灰复燃，距离让整个欧洲坠入地狱深渊的“一战”已有100年。

如今，欧洲已经走出了地狱。但浮士德为了无所不知宁愿出卖自己的灵魂，而现代欧洲希望达到尽善尽美，却不愿付出任何代价。任何事

情都需要付出代价，而最危险的是，欧洲不清楚自己即将付出何种代价，甚至也许根本不想知道。

对于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即欧洲是否走出了31年的阴影，我的答案是有条件地予以否定。欧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国际体系的从属部分。因此，欧洲所面临的风险与过去有所不同，而它依靠美国等外界力量平息冲突的趋势却比20世纪更加明显。然而，如果有人认为欧洲已经超越了使用武力冲突解决问题的时代，那么这一观点无疑只是一种幻想。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希望至少在部分地区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德国正在国家利益和欧盟利益之间进退维谷，而今天这两种利益已经不再是一体。

人类之所以要发动战争，不是因为他们头脑愚蠢或者没有吸取教训。事实上，他们很清楚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他们之所以要发动战争，是因为现实让他们别无选择。欧洲人也是人类中的一部分，因此正如其他人一样，他们仍将面临曾经出现过的可怕选择。他们将不得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出抉择，而就像从前一样，他们有时会不可避免地选择战争。任何事情都尚未终结。对人类来说，任何重大的事情永远都不会终结。

后记
德国——又将成为欧洲新燃点？

迄今距《欧洲新燃点》英文版面世已有一年，而本书的构思始于数年之前。在此期间，我们看到，欧洲曾多次出现摩擦，但本书的主要概念并没有因此动摇。

欧洲成立欧盟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维持欧洲的繁荣，二是为了阻止欧洲重蹈战争的覆辙。纵观历史，尤其是1914～1945年这31年里，战争令欧洲饱受创伤。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欧盟在这两点上可谓卓有成效。但是随后，欧洲经济整体上步履维艰，而且各国发展不均匀。虽然德国经济状况良好，但南欧却陷入难以摆脱的萧条之中。欧洲日趋分裂，从而导致民族主义抬头、宗教冲突不断、仇外情绪高涨。本书中论及的“燃点”正死灰复燃。

2014年，我们目睹了希腊危机、移民危机、地中海紧张局势日益升级以及俄罗斯及其西方邻国和美国之间的摩擦不断加剧。在此，我来简要分析一下欧洲时局动荡的根源。

希腊危机无疑处于关键阶段，但这场危机不仅关系到希腊一国，而是涉及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即其他欧洲国家能否与德国共存。自1871年德国统一后，欧洲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德国经济一直十分繁荣，但正因如此，它也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德国严重依赖出口，尤其是向欧洲国家的出口，以维持本国经济发展。这种依赖性让德国提心吊胆，因为其他国家有可能将德国商品拒之门外，或者在受到德国经济实力威胁时对其发动攻击。

尽管第二种担忧目前大可不必在意，但德国对失去欧洲市场的担忧

却迫在眉睫。欧盟承担了德国约50%的出口商品，而德国的出口总额占其GDP的一半。因此，德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欧洲自由贸易区以及能够使其优化出口环境的工具，即欧元和《布鲁塞尔条例》。假如希腊未能偿还债务，并因此情况好转，那么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意大利，就有可能群起效仿。拖欠债务意味着资本控制，而资本控制意味着贸易限制，这不啻于把枪对准了德国的脑袋。

希腊无力偿还债务。尽管这种情况最终不会发生，但德国必须确保，希腊的拖欠行为不会向其他国家蔓延。更确切地说，德国必须确保，拖欠债务会受到足够严厉的惩罚，以防希腊果真采取这种做法。或者说，即便希腊拖欠债务，这种惩罚也能以儆效尤。免除希腊债务不会使德国或欧洲蒙受任何损失，因为希腊经济只占欧洲经济总量的2%，但是会开创一个先例，从而危及欧盟的整体规划。

在希腊问题上所作的决定还会为欧洲带来其他危险。德国较其他欧洲国家相对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对希腊进行严惩，会在两个层面引发人们对德国的怨恨。其一是政府之间。当法国总统与德国总理会晤时，他们不再作为欧洲两个不同地区的主要领导人，朝着欧盟共同的目标携手并进，而是各为其国、各自为政。即使某些领导人仍把欧洲视作一个整体，并试图为其代言，但欧盟将成为各方利益角逐的场所，而不再是一个由多国共同领导的独立实体。

除国家之间的分歧外，我们看到，欧盟各国民众反对欧盟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希腊、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左翼人士，尤其是右翼人士当中，出现了反对欧洲联合的政党。民意和这些新政党将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在德国以及其他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其中包括欧洲的穆斯林问题。穆斯林社会中某些人制造的恐怖袭击引发了欧洲人的反穆斯林情绪，并导致人们希望阻止穆斯林进入欧洲。此外，由于大批穆斯林难民从地中海国家涌入，以躲避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战火，许多欧洲人感到惊恐不已。这种恐惧使他们不断要求加强边境

管制，不仅包括欧盟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边境，而且包括欧盟内部各国之间的边境。

正如本书所述，1 000多年来，地中海地区始终并且仍是欧洲的主要“燃点”之一。欧洲民众以信仰基督教为主，而北非和中东国家居民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双方的军队都曾渡过或绕开地中海，穆斯林一度攻占伊比利亚半岛，甚至远征维也纳，而欧洲人也曾控制了中东和北非。自《欧洲新燃点》一书出版至今，就有一大波移民渡过或绕开地中海，前往欧洲避难。欧洲人曾经设法阻止他们入境。当然，这些难民不是军队，但地中海仍是通向欧洲的主要障碍。

“二战”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现代土耳其逐渐兴起。英法两国获得了该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并建立了多个现代国家，这些国家即所谓的黎凡特地区。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这些国家开始解体。其政府不是软弱无能，就是在严重的内战中四分五裂。

其中一些派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超越国界、按照伊斯兰教法运行的哈里发国家。数年前，这只是一种匪夷所思的设想，现在虽然同样难以实现，但并非不可想象。该地区将在欧洲或美国的大规模介入下进行重建，而这个过程将会再次引发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的“燃点”。难民潮只不过是该地区即将爆发更为严重的冲突的先兆，它触及了欧洲有关民族国家观念的核心。欧洲人根本无法应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众多移民。《欧洲新燃点》一书表明，欧洲国家建立在不同于美国的基础之上。

另一个更为严峻的“燃点”是位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之间的边境地带。本书首次出版时，该地区一度擦枪走火，但在2014年逐渐降温。虽然第一幕已经结束，但这出戏并没有剧终。在第一幕里，俄罗斯面对的是亲近西方、装备精良的乌克兰。而美国和中欧国家担心，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采取行动有可能危及欧洲。事实上，俄罗斯军队不可能大规模纵深入侵乌克兰。美国人开始在中欧进行部署，但只能向乌克兰派遣军事训练人员。德国人亦对其东部有可能爆发冲突深感恐惧。

有鉴于此，这个“燃点”虽然一触即发，却相对风平浪静。但平静不是永久的，双方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力量，并预期该地区至少会爆发另一轮冲突，其严重程度尚未可知。与此同时，笔者预计，在爆发下一轮冲突前，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将在数年内有所缓解。

最后，《欧洲新燃点》末尾所讨论的国家解体过程已经开始。英国选举开启了英国脱离欧洲的大门，也重申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分歧。仅在5年前，这种公投还难以想象。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分歧象征着欧洲其他地区之间的分歧，其中长期分裂的最大危险来自俄罗斯。

在《欧洲新燃点》出版前，我撰写了不少有关欧洲民族主义加剧的文章，而这种势头无疑仍在加剧。这不只包括现存民族国家内部的权力下放，还包括国家之间敌对状态的不断发展。我们所看到的希腊的反德情绪以及德国领导人对希腊的极端蔑视，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整个欧洲，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国与国之间，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其中最明显的现象是人们对德国越来越不信任，甚至充满敌意。

“燃点”以德国与欧洲的关系为中心。欧盟本应以经济繁荣为纽带，使德国成为其普通一员，以消除这种紧张局势。但随着欧盟的繁荣日渐衰退，损失并没有被均等承担。在希腊危机中，德国成了欧洲的真正决策者，而这一角色为许多人所深恶痛绝。

《欧洲新燃点》一书旨在说明，欧盟只是暂时缓和了欧洲的核心问题，即民族主义与国家实力的问题，尤其是德国。目前，在我们所处的时期，这种缓和正处在衰退之中。

乔治·弗里德曼

2015年8月

致谢

在此，我需要对许多人致以谢意。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好友和编辑詹森·考夫曼，是他的耐心指导帮助我完成了这本著作。同时，我还要感谢罗布·布卢姆，是他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编辑，并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评论。其次，我想要感谢吉姆·霍恩菲舍尔，他是我的好友和作品经纪人，是他向我阐明了商业规则。

此外，我还要向战略预测公司的同事们表示感激，他们不仅通读了本书，而且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其中，最突出的同事当属罗杰·贝克、雷瓦·巴拉、阿德里亚诺·波索尼、安东尼娅·克里巴萨努、阿里森·菲德尔卡、丽贝卡·凯勒·弗里德曼、劳伦·古德里奇、凯伦·胡珀、内特·休斯、马克·兰热曼、约翰·明尼克以及其他我有可能遗漏的人们。我尤其要感激朋友兼同事戴维·贾德森，是他为我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并且极富幽默感。我还要感谢图表设计师T.J.兰辛，他耗费了很长时间为我绘制了关键的地图，澄清了书中许多重要的概念。感谢泰勒·克里斯曼让我变得有条不紊。感谢马特·鲍尔斯用自己一流的研究给予我的全面支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必须感谢妻子与合著者梅瑞狄斯。虽然梅瑞狄斯不愿在书中提及她的名字，但我没有完全听从她的意见，因为我必须要在这里写下她的名字。就像往常一样，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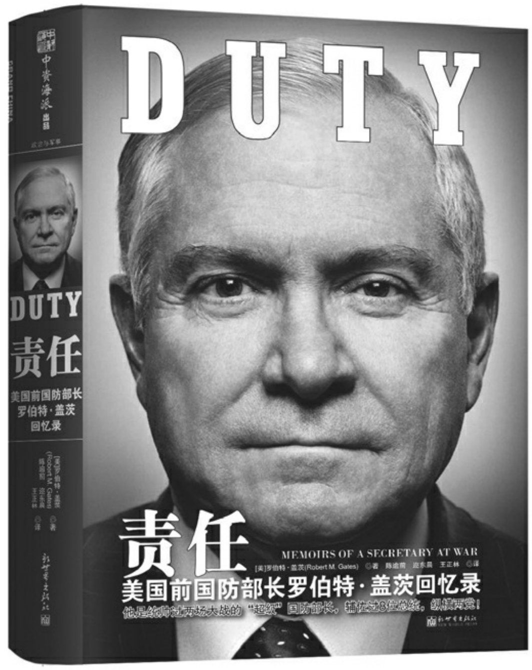
中资海派出品
为精英阅读而努力

一个战时国防部部长的自述与反思

《责任》这本书是我在2006～2011年指挥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亲身经历。我们最初取得的军事胜利，正因我们的短视、错误政策及在战场和华盛顿的内部冲突而被挥霍殆尽，战争已变成为避免失败而无谓坚持的野蛮冲突。

为挽救这两场战争，我与白宫、国会、五角大楼及军方高层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通过回顾国会、白宫、国家安全班底的决策过程，我认为他们更关注的是党派之争和媒体宣传，而非保护将士和取得战争胜利。对此，我深感愤怒和失望。而我与五角大楼、军方高层的官僚斗争则是为了将国防部的角色从战争策划者转变为发动者，并将军队打造成一支胜利之师。

期间，我见证了诸多热点事件，如增兵与撤军、部署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叙利亚和伊朗核危机、前线换帅风波、关塔那摩虐囚案、猎杀本·拉登和维基泄密等，而这些事件背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隐情。



［美］罗伯特·盖茨　◎著

陈逾前　迩东晨　王正林　◎译

中资海派出品

定　价：6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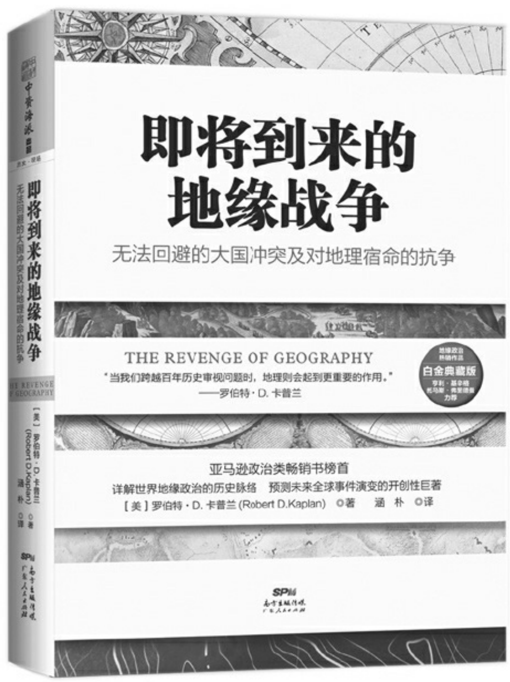
一部令美国政府尴尬不安的批判之作

曝光当权执政者众多不为人知的绝密隐情

中资海派出品

为精英阅读而努力

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



［美］罗伯特·D.卡普兰 ◎著

涵 朴 ◎译

中资海派出品

定 价：59.80元

在本书中，卡普兰以地理为主线，通过地图导出地缘政治，并将地

理作为手术刀，结合其毕生的观察、发现和相关理论来剖析国际关系和全球化中无法解释的冲突。同时，他将地理与历史完美融合，生动诠释地理如何塑造人类历史，并对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热点进行深入解析，预测未来全球事件的演化。

通过考察各地方的气候、地势和所处地理位置，卡普兰回顾了世界历史上发生的热点事件，并将他的研究所得用以分析各地的危机，如欧洲、俄罗斯、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朗和中东，全面地预测了欧亚大陆的下一次冲突周期。

而最为重要的是，卡普兰为我们展示了展示了应如何通过地图和人口学研究等工具，进一步解读各国的外交政策，从而找到更深层和更强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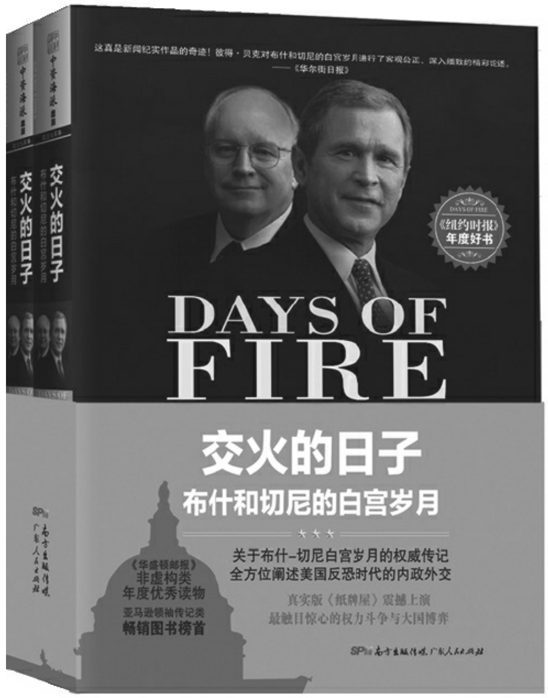
详解世界地缘政治的历史脉络
预测未来全球事件演变的开创性巨著
亚马逊政治类畅销书榜首

中资海派出品
为精英阅读而努力

布什和切尼的白宫岁月

布什与切尼，一个是初入政坛的总统，一个是深谙政治的冷酷副总统，他们在8年任期里经历了恐怖袭击、两场战争、金融海啸等一系列重大危机，成为继尼克松政府后最具争议与戏剧性的总统任期。

在这部近800页的厚重作品中，《纽约时报》驻白宫首席记者彼得·贝克向读者展示了当代历史上意义最深远的总统任期，细述布什与切尼如何侥幸夺占白宫，一度被视为民族英雄而轻松连任，最终又在各种指责与背叛中告别政坛的曲折历程和内幕经历。对于两场失败的反恐战争，空前艰难的经济危机、各种不堪的外交困境，以及如何勾心斗角，赢得竞选与党派之争，本书都进行了精彩的再现。



［美］彼得·贝克　◎著

李文远　潘丽君　王文佳　◎译

中资海派出品

定　价：89.80元

真实记录布什—切尼政府的执政内幕

立体呈现美国烈焰四射的交火时代

全方位披露反恐时代白宫决策的台前幕后

立体再现美国与世界、白宫与国会、布什与切尼的激烈交火

THE NEXT 100 YEARS

A Forecast for the 21st Century

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

21世纪陆权与海权、历史与民族、文明与信仰、气候与资源大变局

地缘政治大师以绵延几
百年的历史纵深和宽广
的战略视野
推演布局世界未来100
年发展图景



[美] 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著
魏宗雷　杰宁娜 ◎译
魏宗雷 ◎专业审

《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出版商周刊》《参考消息》
CNN等多家权威媒体鼎力推荐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弗里德曼说，
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

21世纪陆权与海权、历史与民族、文明与信仰、气候与资源大变局

[美] 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 著
魏宗雷　杰宁娜 ◎ 译
魏宗雷　◎ 专业审

THE NEXT 100 YEARS
A Forecast for the 21st Century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 / （美）弗里德曼著；魏宗雷，杰宁娜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1

ISBN 978-7-218-11344-9

Ⅰ．①弗…　Ⅱ．①乔…②魏…③杰…　Ⅲ．①地缘政治学　Ⅳ．①K9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0791号

The Next 100 Years: A Forecast for the 21st Century by George Friedman
Copyright © 2009 by George Friedma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in any manner what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or review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Grand China Publishing House**（中资出版社）授权广东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Fulideman Shuo, Xiayige Yibainian Diyuan Dachongtu

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

［美］弗里德曼　著　　魏宗雷　杰宁娜　译

出 版 人：肖风华

策　　划：中资海派

执行策划：黄　河　桂　林

责任编辑：古海阳　张　静

特约编辑：王　影　梁桂芳　王利军

版式设计：王　雪

封面设计：WONDERLAND Book design 仙境 QQ:344581934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深圳市汇亿丰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5

字　　数：25.6千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 1 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8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524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前言

地缘政治学是西方政治地理学中创立较早、影响较深的核心理论。它历经兴衰，至今仍通行于世界大国，成为其制定国防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中，作者与我们分享了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热点图。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很多专家都认为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由于自身原因，超级大国的地位将被撼动，但弗里德曼却认为，在未来一百年的时间里，美国依然是主导世界格局的核心力量，其优势将得到延续。他认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已经从亚欧大陆转为对海权的争夺，而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海上霸权，控制了所有的海上贸易运输线，因此也将继续控制全球经济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逾70年，世界总体处于和平时期。不过，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情况并不会保持太久。由于美国一直不希望出现一个可以与其抗衡的国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支持欧盟东扩以遏制俄罗斯，支持土耳其以稳定中东，支持日本以制衡中国，“但是，迟早会有一天冲突会爆发”。金砖国家、日本和土耳其都不是美国的对手，那未来的一百年，美国的对手在哪里呢？弗里德曼把目标锁定为美国的近邻墨西哥。

弗里德曼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证据，“通过观察2000年墨西哥裔居民在美国各州的比例，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其集中程度。沿着太平洋到墨西哥湾边线，有一处明显的墨西哥裔人口集中地。与料想中的一样，边地周围很容易成为墨西哥人的聚集地”。弗里德曼提到，2006年墨西哥的经济位居世界第15位，依据购买力来衡量，墨西哥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已略超每年1.2万美元。这使得墨西哥在拉丁美洲成为最富有的大

国。“等到墨西哥移民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时，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国家内部是一个独立实体。基于自己的地位，他们开始要求一系列的特殊权利。当他们自然而然地喜欢上美国时，该团体的一部分人会把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的本地人，而非移民。与此同时，墨西哥国内也会出现鼓动两国合并的运动。”美国虽然控制着太空和海洋，但是墨西哥的挑战来自地面。墨西哥人可以越过边界，深入到美国内地，发起挑战，“而这正是美国最不擅长的方式”。

事实上，类似《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的预测一直存在。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本书能够提供分析问题的方法，并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产生深刻的认知。对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学者或关注时事热点的读者来说，本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诚然，由于作者弗里德曼的身份、立场和角度的限制，在这场美国制造的科幻大片中，书中某些观点和论述不可避免地以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作者对此也直言不讳，他认为“事实上，这个世界正在绕着美国旋转”。显而易见，作为一名美国人，弗里德曼在谈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时难免有失偏颇。但在如何看待和分析世界方面，作者确实提供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应辩证性地对待，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毕竟对于在全球各领域扮演关键角色的中国来说，未来充满机遇和挑战，而改革和完善也是恒久不变的主题。

目 录

出版前言
致中国读者信　从最坏处着眼
荣耀榜
权威媒体推荐
名人点评
译者序　再忍美国100年
作者的话　拨开迷雾看未来100年
序曲　美国还能“臭美”100年？
第1章　21世纪的美国　青春期的“莽撞少年”
　　焦虑的年代：美国时代正在谢幕？
　　被割裂的“欧洲帝国”
　　地缘政治决定了美国霸权？
　　麦金德VS马汉：陆权与海权的较量
　　美国正处于莽撞的青春期
第2章　势不两立　美国与伊斯兰圣战者的战争
　　点燃火药桶的南斯拉夫
　　冷战结束，伊斯兰世界动荡开始？
　　伊斯兰世界打乱了美国的世界大棋局
　　对“全球公敌”敢怒不敢言
　　美国与穆斯林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第3章　混乱的秩序　文化战争、人口爆炸和计算机的逻辑
　　“默罕默德”与“耶稣”背后的较量
　　人口爆炸使得出生率剧降？
　　人口停止增长将如何影响世界？
　　人口剧减在政治上的反应
　　实用主义与计算机造就的美国文化
　　美国的社会模式将主导世界？

第4章　左右21世纪的地缘政治断层线
21世纪名副其实的火药桶：太平洋盆地
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棋局
走下帝国神坛的欧洲
剪不断，理还乱：俄罗斯与欧洲的历史纠葛
谁将成为穆斯林世界的领头羊？
身处潜在断层线的墨西哥
谁将更有力地挑战美国？
第5章　迈向世界大国的中国
破釜沉舟后的“世界引擎”
“中国龙”如何走出“日本陷阱”？
“唱衰”中国的逻辑
日本的算盘与中国的考量
第6章　对峙的断层线　2020年俄罗斯第二次解体
极力挽回势力范围的俄罗斯
高加索地区的战略演变
“北极熊”的中亚棋局
俄罗斯与欧洲：“新冷战”中胶着前行
美国在俄欧关系中的角色
第7章　移民缔造的美利坚奇迹如何延续？
1776美利坚的诞生：从创始人到拓荒者
林肯的时代：从拓荒者到美国小城镇
罗斯福的改革：从小城镇到工业城市
里根的补救：从工业城市到服务郊区
“50年循环模式”的延续：从服务郊区到永久移民阶层
第8章　偷猎时代的地缘政治谋局
中日亚洲大角逐
2030年的日本将如何自保？
乱世中崛起的“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伊斯兰世界的守卫者还是美国的拥趸？
欧盟与俄罗斯的支点：躲在美国身后的波兰

2030：不可一世的美国时代
第9章　战争前夜　被逼上绝路的日土联盟
2050年的土耳其：走上神坛还是陷入泥潭？
让美国感到不安的区域性海洋强国
波兰：尴尬的大国角力场
四面楚歌的“美国代理人”？
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合纵连横
无懈可击的“战斗星”堡垒
美国肆意操纵的战争游戏
土耳其和日本被美国逼上了绝路
第10章　美国VS日土联盟　一场胜券在握的战争？
核武器和载人航天引发的战争变革
全面战争的终结：美国精确打击时代的到来
太空战：未来全球战场制高点
如何在太空中有效管理战场？
抹平日土联盟的战争计划
走上绝路的日本将会如何反击？
于事无补的“B计划”
第11章　第三次世界大战　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
日本人击中了太空堡垒！
末日回击：美军击毁日土联盟
革新的战备，不变的战术
德国会再次进攻波兰？
联盟如何摧毁美国的电力系统？
幸运的美国人，永远的战争受益者
第12章　鼎盛时期的美国　21世纪60年代的黄金十年
战后的波兰：逃脱束缚还是继续做棋子？
经济强盛的美国将独霸太空
巩固霸权的能源革命
世界再次以美国为中心？

第13章　美国VS墨西哥　2080年谁将成为北美统治者？
墨西哥移民与美国社会的交融
矛与盾：技术移民抑制移民需求？
2050年墨西哥将成世界领先经济体？
毒品和犯罪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
颠覆还是融入美国：墨西哥的地缘政治定位
墨美跨界民族问题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墨西哥的战略与美国的应对
后记　天堂与地狱：21世纪美国地缘政治挑战
致谢
译后记

致中国读者信
从最坏处着眼

本书旨在识别那些塑造当今世界的主要力量，所使用的方法是地缘政治分析法。我们不可能精确预测未来的细枝末节，只能大体勾勒出宏大宽泛的未来图景。本书的中心点就是探讨几个主要国家的强项和弱项。因此，在谈弱国的时候，我突出强调它们的强项。在谈比较强势的国家（中国也是其中之一）时，我反而更注重探讨它们的弱项和软肋，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弱点足以在未来几十年影响国家发展的良好势头。这些国家能否扬长避短，克服自身最大的缺陷？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趋势会是怎样？正是这些问题驱使我写作本书。

在所有现代国家中，中国当然是历史最悠久的国家，这个国家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只要看看20世纪，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已经把各种可能的制度都试遍了，其制度多样性无国能比。

过去30年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此前却经过了30年的疑惧和与世隔绝。由此追本溯源，这是中国经历漫长的内部冲突和外国入侵之后由大一统国家实现转型的必由之路。对中国任何片面的看法都是瞎子摸象，无法展现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全貌。

因此，任何试图勾画21世纪中国前景的作者，都不得不考虑中国历史所具有的戏剧性驱动力。绝不能假定未来30年的中国与过去30年的中国完全相同。不一样的时代，将会孕育不一样的中国，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正在应对世界其他国家都在应对的问题，从不断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到能源价格的上下波动，各种问题接踵而来。在21世纪，中国还不

得不与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博弈，这真是“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日本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大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这一点不可否认。俄罗斯介于复兴与衰落之间。土耳其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将在中亚谋求利益。当然，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和军事的巨无霸，其行为看似有规可循，但也并不总在意料之中。

因此，不管中国采取怎样的发展策略，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处在一个复杂而危险的世界中，其他大国的利益与中国不尽相同，而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冲突却一直存在。本书的重点是研究国际体系，而不是某国的内部问题。当然内部问题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存在极大风险，每一个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处理这些险情。中国已成为一个大国，正面临着国内发展和外部风险的双重压力，因此必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处理各种社会问题。

正如我在后面所说的那样，我没有能够透视未来的魔法水晶球。虽然我所做的微不足道，但我希望自己可以洞悉可能影响下一世纪并重塑世界的驱动力和危险。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世界里，总是充满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反倒是最安全的方法。

乔治·弗里德曼

荣耀榜

国际畅销书
《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

亚马逊2009年1月最佳畅销书

美国科学／未来预测类畅销书排行榜第1名

版权被10多个国家和地区争购

《纽约客》政治类畅销书排行榜第1名

《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第5名

被《新闻周刊》国际版总编、畅销书

《后美国世界》作者扎卡利亚推荐为“必读书”

权威媒体推荐

《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

乔治·弗里德曼视角独到，既冷眼看世界，又大胆卜未来，为读者安排了一次领略未来世纪战争与和平的全球之旅。作者断言，美国以其非凡的气势和压倒一切的优势，注定是未来世纪的主宰，扫除恐怖主义威胁，防止俄罗斯在未来10～20年东山再起，最终独占天基导弹系统（即弗里德曼所说“战斗星”）的制天权。

作为战略预测公司总裁，弗里德曼看似权威的预测主要基于自然资源和人口等元素，在此基础上做短期预测更具可信度，但100年周期的后半段听起来着实有点悬乎，让人跌破眼镜。2080年美墨边界很有可能爆发战争，但预测日本、土耳其联合起来对美国及盟友发动太空战争，而且日子掐算到2050年感恩节这一天，未免有些夸张，读来如同离奇惊险的科幻小说。不管弗里德曼水晶球里的预言能否实现，其书中充满智慧的观点总会为我们带来阅读的快感和享受。

《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

见到乔治·弗里德曼本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把他当做太极八卦神算。

《书目》（***Booklist***）

关于后“9·11”的世界，没有哪本书能比《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

年地缘大冲突》分析得更清晰、更深刻、更细腻。阅读此书比我们在电视上收看脱口秀大腕们的杂谈要强100倍。

《纽约观察家》（***New York Observer***）

弗里德曼总是冷静地思考，清醒地看世界。他能力非凡，不仅能用美国人的眼光，也能用世界领导人的眼光观察世事。

《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

我们大多数读者可能对有关伊拉克和中东方面的书籍看腻了，但我敢保证，弗里德曼的这本巨著绝对值得花一晚上工夫仔细品读。

《巴伦周刊》（***Barron's***）

弗里德曼创办的“战略预测公司”预测一向很准确。它拥有众多从传媒公司到政府机构的客户，近年来盈利良好。

《弗林特日报》（***Flint Journal***）

弗里德曼的书读来引人入胜，尤其是对于那些兴趣不只限于简单观点的挑剔读者来说更是过瘾。

名人点评

周　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

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在未来没有能力在类似危机上担当领导者的角色。美国在全球中的地位肯定会发生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发展带来的，而且危机会加快这一进程，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和金融监管模式的主导地位将会逐渐消失。因此，不能把美国在21世纪的地位定得太高。

樊吉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类似《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的预测一直就有，比如不久前就有俄罗斯专家预测美国会分裂，结果美国人并没把它当回事。对于美国冒出来的这种预测，中国也没必要当回事。像弗里德曼这样一些从东欧国家出来的学者，往往受意识形态的驱使，对社会主义国家抱有极深的偏见。这本书之所以能撰写出来，反映出在美国有一批对中国和俄罗斯不了解，甚至怀有偏见的读者潜意识里希望看到这样的预测，但无论如何，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观点也不可能成为主流，难以对美国的政策产生实质的影响。

刘建飞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弗里德曼在《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中断言美国世纪才刚刚开始，这实在有悖于大家的共识。各种因素严重制约着美国“一超”战略的推进，其中有些因素如世界大趋势和美国国内因素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在《老鹰坠地》一文中所说：“为美国霸权作出贡献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同时也将是不可抗拒地导致美国衰落的因素。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霸权是否正在衰弱，而是美国是否能设计出一种办法，使之跌降得有点绅士风度，把对世界和它自己造成的损害减到最小限度。”毫无疑问，未来100年里，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决定性力量将继续减弱。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弗里德曼对未来100年和美国今后走势的判断也许是对的。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看，很难断定美国从此开始走下坡路。我感觉今天的美国还是走在一个平顶山上——尽管这座平顶山有些凹凸不平。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个平顶有多大，但说美国从此一蹶不振了，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至今没有哪个国家能对美国构成全面的挑战。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再维持二三十年没有问题。

朱　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21世纪到底是谁的世纪？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轨迹了吗？美国不会甘心付出美元霸权地位被削弱，以及国际制度话语权被弱化的代价。问题的关键是，霸权之所以需要维持，是因为它保障了无可企及的

霸权利益。《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进一步证明，美国人至少还要“向天再借100年”。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

在弗里德曼眼中，美国俨然是一个不倒翁。美国的崛起和霸权确实有其独到的经验和特点。美国之所以能维持霸权，其生命力首先是其制度霸权的性质，其次是美国软硬实力的平衡。美国的成功经验能够给我们许多启发。

卢·道布斯（**Lou Dobbs**）
CNN晚间新闻主持人

乔治·弗里德曼可谓美国首屈一指的战略专家。

译者序
再忍美国**100**年

也许你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但你可曾料想过未来100年的世界？

也许你善于分析、精于判断，但你可曾做过21世纪大预言？

有人这样做了，而且做得有理有据，他就是美国战略预测专家乔治·弗里德曼。

众所周知，西方的预言传统主要源于古希腊神话。德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是古希腊非常有名的预言，在德尔斐城的阿波罗神庙里，女祭司皮提亚（Pythia）在进入一种类似昏迷的催眠通神状态后，由别人提问题，而她做出对未来事件的预测。《柏拉图对话录》记载了苏格拉底的一位朋友前往德尔斐向预言女神皮提亚询问谁是最有智慧的人。德尔斐是古希腊神话中可预测未来的阿波罗神殿所在地，成为预测未来的代名词。20世纪40年代，美国兰德公司以“德尔斐”为代号，研究如何通过有控制的反馈更加可靠地搜集专家意见，德尔斐调查法（Delphi Survey）从此闻名世界。美国著名网络计算机公司甲骨文公司（Oracle）的名字也是取神谕的意思。中西方都有各自源远流长的预言传统。西方用的是有能够预测未来的魔法水晶球，中国人传统上用的是太极八卦和推背图。预言大多使用比较神秘莫测的语言工具，谁拥有解释权，谁就拥有预言权。

这不是一部科幻预言小说。20世纪70年代末首部引进我国国内公映的美国科幻电影《未来世界》（*Westworld*），讲的是一个高科技娱乐场的老板用机器人替换各国前来旅游的重要人物，以图谋世界霸权。由此看来，不管是机器人还是美国人，都有一个想法——企图控制世界，

这是美国人的本能。

本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未来说，不是对人类命运或未来科技的预言，只是对21世纪的世界来一次“大派位”。其中心思想就是，美国不但没有衰落，而且美国世纪才刚刚开始，21世纪是美国的天下。世界还要忍受美国100年或者更久。

只有把握未来，才能把握世界。毛主席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00年实在太快太短，大致是人一生的时间，最多也只是比人的一生稍长一点。21世纪已经快过10年了。

战略预测公司是一家美国私营机构，专门向大公司和政府机构提供预测分析，曾被《巴伦周刊》称为“影子中情局”。该机构的总裁兼首席分析师正是本书的作者——乔治·弗里德曼。

叫弗里德曼的人很多，很多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如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及《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作者、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者和观察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等。太多的弗里德曼让人眼花缭乱，难怪有人不同意本书的预测观点，说乔治·弗里德曼应该读读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作品。

作为首席国际战略预测分析师，乔治·弗里德曼无愧于他的封号，在本书中他极尽描述之能事，将未来一个世纪里将发生的每件大事都具体到每个细节、每个时间点，使整本书犹如一场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的科幻电影。现在就让我们拉开这美国大片的序幕，看看陆续登场的主角吧！

世界观狭隘的“国际警察”

与现在大多唱衰美国的舆论不同，弗里德曼顽固地断言，美国世纪

才刚刚开始，美国还将统治世界100年。

21世纪的美国，是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还是旭日东升、蒸蒸日上？是将走向崩溃的边缘，还是步入黎明前的黑暗？从“9·11”事件之后美国与恐怖分子的激战，一直到近年来全球金融海啸导致的经济衰退，也许现在人们有越来越多的理由不看好美国，认为它正在一步步告别昔日的繁荣与辉煌，但本书一开场，乔治·弗里德曼就展现了他一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企图力排众议，将美国的现状比喻成新世纪的黎明，认为21世纪将是美国的世纪。经历了上个世纪每隔20年就上演一次的世界格局变革，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上，它从一个边缘国家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军事上，它从一个无名小卒崛起为主宰全球的国家；政治上，它更是无孔不入。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弗里德曼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的前世今生。从地理上来看，美国占据着北美大陆黄金地段，有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相隔，天然地免遭袭击或占领，而且它的军事实力远远强于周边国家。上世纪，在全球几乎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遭受过毁灭性战争摧残的情况下，美国不但能够独善其身，还从历次战争中屡屡受益，正是军事力量和地理位置成就了美国经济的辉煌。

2001年9月11日，三架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这是美国时代面临的第一个真正的考验。但针对美国展开的战略性挑战正在走向终点——基地组织未能实现目标，美国已经取得成功，与其说美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不如说它阻止了伊斯兰激进分子获得胜利，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已经足够了。在作者看来，美国的行事方式或许还不够成熟稳重，但这恰恰证明了美国现在还处于青春期——其整个历史的早期——有朝一日，它会变得更加稳重，更加强大。因此，美国不但没有今不如昔，反而正处于强盛的最早期。

作者将一个国家比喻成个人，把轻率莽撞的美国视作血气方刚的青年，这尚可理解，但如果作者将美国开战的目的归结为“受到一种恐惧

的驱使，也就是害怕失去现有的东西”，未免文过饰非。如果我们想考查美国是否真的如弗里德曼所言，对其他国家实施干预的目的只是想守住自己的利益，那我们只需看看它干预的结果如何——是利人利己，还是损人利己？在美国维护自身地位、权威、利益的同时，它还获得了什么？他国政权被颠覆，经济被殖民化，社会稳定性遭到破坏，动乱不断。也诚如作者在文中所言，“它（美国）的目的不是获得稳定，而是要破坏一个地区的稳定性”。由此可见，美国不但居心叵测，而且世界观也非常狭隘，打着“国际警察”的旗号到处煽风点火，看似推广民主，实则唯恐天下不乱！

“山姆大叔”快要干垮“北极熊”？

接着来看看俄罗斯。俄罗斯地处欧洲东部，多次与欧洲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独立统一的俄罗斯在战乱中得以幸存，也成为欧洲人眼中一个潜在的巨大挑战。考虑到冷战后美国并没能给俄罗斯致命一击，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久之后，当俄罗斯重振雄威之时，它的地缘政治问题必会卷土重来。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俄罗斯需要动用它的财富来增强军事力量，建立自己的缓冲区以保卫本国不受美国侵犯。俄罗斯的宏伟战略计划包括在北欧平原建立深度缓冲区域的同时，划分并操纵它的邻国，从而在欧洲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平衡态势。

考虑到美国的势力，俄罗斯无法直接进攻美国，美国也不会冒险去激怒对方。相反，俄罗斯会试图在美国在欧洲地区或世界其他国家的事务上施压。它的基本战略是试图瓦解北约组织并孤立东欧国家。随着对周围国家的争夺不断升级，美俄之间的竞争也将愈演愈烈，但美国这次将仅用到远不及冷战时期的力量便足以应付俄罗斯。作者称，2020年后不久，俄罗斯将再次土崩瓦解，但这显然是一相情愿地唱衰对手。

再聊中国。与现在国际舆论追捧中国崛起不同，不管是否心怀好

意，弗里德曼对中国的态度比一向低调的中国人还要低调。他有一句话倒也中肯，“中国不但不是美国的敌手和威胁，相反是美国应联合的对象和合作伙伴”。21世纪，中国对世界将有怎样的影响？中国还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吗？中国还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势头吗？

这几个问题应该是中国或者是世界其他各国都曾考虑过的问题。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正在崛起的大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实行稳健的经济政策，中国再次树立起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也正因如此，更多的人对中国怀有信心，而非怀疑。

当然，弗里德曼的一些疑问也有他的道理。根据世界银行截止于200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贫富差距程度）已升至0.49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最高点。这一个惊人的数字反映出我国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这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悬殊等方面，当然也不排除由此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但由此就推断出中国将在2050年南北分化恐怕有些言过其实。现如今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1，作为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经济体之一的香港也似乎很少低过0.5，世界上存在悬殊的贫富差距的国家并不少见。由此可见，我们需要更好地解决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生态和谐之间存在的矛盾。

搅动未来世界的三匹“黑马”

弗里德曼极力抬捧三个国家，它们也是未来100年里三匹可能出现的黑马，即波兰、土耳其和墨西哥。

波　兰

波兰可能成为美国的同盟，这也是近年来美国竭力拉拢扶持波兰的原因。美国执意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把波兰这样的东欧国家推向美俄争霸的前沿阵地。这些曾经是铁幕后面的国家一旦走上两极对峙的前台，将很难摆脱多舛的历史宿命。

土耳其

拥有7　100万人口的土耳其一直是穆斯林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中心，同样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现代化速度迅猛的国家。经济上看，土耳其的GDP达到6　600亿美元，是全球第17大经济体。过去5年，土耳其GDP的年平均增速在5%～8%之间，在全球大国中，是持续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若与欧洲国家相比，土耳其的经济规模也能占到第7位，而且增速远高于其他国家。它是伊斯兰世界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一个现代化经济体。在战略位置上，它坐落于欧洲、中东和俄罗斯之间，有多重方向可以自由行动。更重要的是，它并不是美国利益的挑战者，因此也就不会时常遭遇美国的打压。这意味着它不用浪费资源来抵制美国。在经济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它很可能会复兴，成为这个地区的支配力量。

在过去几个世纪，土耳其历来拥有强盛的国力，同时，社会内部关系复杂，它有一个受军事力量和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运动支持的世俗政权。它最终能够形成什么类型的政府，现在还远不确定，但对美国来说，中东哪个国家值得严肃对待，答案似乎很明显，这个国家必定是土耳其。但作者认为，到本世纪中叶，土耳其与日本可能结盟，向美国发起挑战。一场世纪中叶的全球性战争将在美波轴心与日土同盟之间展开。这听起来有点像20世纪上半叶世界大战的翻版。

墨西哥

墨西哥是本世纪最后一个崛起者和美国的挑战者。

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墨西哥的年人均收入约为1.2万美元，全球排名第16位，它在拉丁美洲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就算称不上领先的经济强国，至少也置于发达国家的行列，从这方面来看，它无疑是个大国。墨西哥的人口数量将在未来50年基本保持稳定，拥有扩张所需要的劳动力。因此，在人口方面，墨西哥不是一个小国。

墨西哥地处国际体系重心所在的北美，同时濒临大西洋和太平洋，还与美国共守着一段很长而且态势紧张的边界。因此，墨西哥的社会和经济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墨之间的自由贸易给墨西哥经济发展带来帮助，但它的战略位置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使它有可能成为一颗埋在美国后院的定时炸弹。为了争夺北美霸权，它将在下个世纪末与美国发生大战。

这是美国人内心深处的隐忧。这种担心源于英裔与西裔之间的世仇。自始至今在美国和北美占主导地位的是盎格鲁-萨克逊人，他们与占据整个南美和墨西哥以南的拉美人一直存在着争斗。随着拉美人口的增加，特别是西裔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在美国的逐渐增多，说英语的白人会感到失落同时面临挑战。

我们着手翻译这本书时内心充满了好奇与挑战，一是想看看这位语出惊人的战略专家这回又发表了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二是对于预言，我们抱有和大多数人同样的想法，那就是趁着自己的有生之年，看看他的预言能否成真。

其实预测结果的准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分析方法，看到了人口、习俗与地缘的关系，看到了科技、军事与利益的联系。

他会告诉你即使看起来荒谬的战争，其实是出于理智的决定；

攻打他国是因为惧怕被他国攻打，惧怕别人掠夺自己现有的一切；

即使看起来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却是完完全全的成功。虽然我们对于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尤其是事关中国的第5章）不太赞同，但作者的分析确实让人增长见闻、开拓眼界，也让我们了解了国外的政治学家是如何看待国际局势，尤其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前景的。作者的许多观点很具代表性，对中国的地区差异、贫富差距、不均衡发展、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新旧交织的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做了很深刻的分析。虽然他的分析某些地方失之偏颇，但对于国人来说非常有参考价值，因为他从一个新的侧面解读了中国发展的潜在问题。

尽管每个时代里人们所经历的事情都十分相似——生、老、病、死，但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弗里德曼也是如此，他认为21世纪确实不同以往，因为它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将见证一个全新的世界大国主宰全球，这便是美国。

纵览全书你可能会发现，无论各个章节主题有何差异，但全书自始至终都围绕美国展开，尽管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各大霸权国家或争斗、或联合的巨幅图卷，但都是以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为中心。在这场美国制造的科幻大片里，作者对自己的出发点直言不讳，因为他认为“事实上，这个世界正在绕着美国旋转”。当然，这可以理解成作者作为一名美国人，本身就带有政治优越感而无法做到中立，但这并不影响本书的质量与价值。

与其说乔治·弗里德曼是在极度自负地夸夸其谈，不如说他为我们分析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与工具。读罢此书，纵使我们不赞同他的说法，但至少看到了国际关系未来的走向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也许我们不会“速成”为地缘政治专家，但至少得到了一个观测未来的水晶球，看看未来霸权国在国际棋局上如何博弈；尽管我们对下一个世纪的走向还存在未知与疑虑，但至少对未来的局势获得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和开阔的眼界。

对于预言，大家都抱有将信将疑的心态，但谁都无法穿越时空去一

探究竟，所以目前谁也无法断言《弗里德曼说，下一个一百年地缘大冲突》里的预言能否灵验，唯有将检验的权利交给时间。至于读者对作者言论观点是首肯还是摇头，从来都是见仁见智的。只要乔治·弗里德曼作出的推论逻辑合理、有理有据，并能够自圆其说，这便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作者是站在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立场上，鼓吹21世纪仍是美国世纪，中俄等国都难以对其构成真正的挑战；美国不但不会衰落，反而越战越强，别国不是再次解体就是崛不起来。这实际上是长美国士气，灭别国威风。相信读者一定会自有主见，批判地去阅读。

魏宗雷　杰宁娜

作者的话

拨开迷雾看未来100年

我没有能够透视未来的魔法水晶球，但有一套能玩转自如的分析方法，尽管它可能并不完美，但也足以让我理解过去、预测未来。我的任务就是拨开历史表面的重重迷雾找寻其内在规律，并预测这种规律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重大事件、未来趋势以及技术革新。预测未来100年的世界看似很无聊，但在本书中，我希望你能看到这是一个理性和可行的过程，绝对没有任何玩弄技巧的成分。我在不久的将来会子孙满堂，而他们当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会生活在22世纪，这样看来，书中的一切并不是空谈。

我试图在书中传递一种未来意识，当然，关于未来的许多细节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的目的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预测地缘政治、科技、人口、文化以及军事等方面的主要趋势，并描绘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重大事件。这本书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冗长乏味——如果它能够揭示当今世界运行的某些规律，并能令人信服地描述这些规律在未来将如何发挥作用；如果我的孙子在2100年看到这本书时说一声“真不错”，我也就知足了。

序曲
美国还能“臭美”100年？

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在1900年夏季的世界中心——伦敦。当时，欧洲统治着东半球，在那里，普天之下，莫非“欧”土，几乎每一个地区都直接或间接地处在某个欧洲国家的控制之下。欧洲正享受着和平与空前的繁荣，投资和贸易带来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一些言辞谨慎的人都断言战争已在欧洲绝迹（即便没有彻底消失，也会在开始后的几周内迅速结束），因为全球金融市场无力承受战争的重压。未来似乎被定格：永久和平与繁荣的欧洲将一统世界。

想象一下，现在你生活在1920年的夏季。灾难深重的战争让整个欧洲支离破碎、伤痕累累。奥匈帝国、沙俄、德意志和奥斯曼帝国全部分崩离析，数百万人在硝烟战火中丧生。最终，美军火速降临，结束了战争——这支军队的撤离就像它的到来一样神速。共产主义主宰了苏俄，但尚不清楚它能否在此地存活下来，而处于欧洲势力范围边缘的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则突然崛起。此时，有一点似乎确定无疑：受到强制性和平条约的制约，德国将不会在短时间内再次崛起。

想象一下，假如你生活在1940年夏季。你不仅会看到德国东山再起，还将目睹这个国家统治法国，称霸欧洲。共产主义存活下来了，苏联与纳粹德国结盟（1939年，苏联采取“祸水西引”策略与德国秘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译者注）。放眼全球，只有英国在独自抗击法西斯德国的侵略，而在大多数理性人士的眼中，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即便纳粹德国不会统治欧洲长达千年之久，但毫无疑问，欧洲在那个世纪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德国将继承欧洲的帝王宝座，统治整个欧洲。

想象一下，假如你生活在1960年夏季，情况又大不相同。在刚刚过去的战争中，纳粹德国被撕得粉碎。整个欧洲被美国和苏联一分为二。欧洲帝国轰然倒塌，美国和苏联则为帝国的皇位继承权继续明争暗斗。美国将苏联置于自己的包围圈中，如果动用核武器，数小时内便可以让苏联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此时，美国崛起为全球性超级大国。它不仅控制了世界各大洋，还倚仗自己拥有核武器，在全球范围内横行霸道、漫天要价。因此，对苏联来说，除非自己能入侵德国并征服欧洲，否则保持同美国的权力制衡才是最好的结果。当时西方都在为这场可能发生的入侵战争做准备。同时，人们还隐隐感觉到，毛泽东领导下的红色中国对于西方来说是另一种威胁。

1980年的夏季，美国在一场为时七年的战争中被击败，击败它的不是苏联，而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北越。当时，全世界都认为美国的影响力在逐渐消退，就连美国自己也这样认为。先是越战失利，而后又被逐出伊朗，那里的石油似乎已经不受美国控制，看起来更可能落入苏联之手。为了遏制苏联，美国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结盟——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在北京举行了一场默契十足的会谈。看起来似乎只有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才有可能遏制强大且不可一世的苏联。

20年后，也就是2000年夏季，苏联早已解体。北约继续向东欧扩展，触角甚至已经伸进苏联的地盘。全世界都呈现出富庶太平的良好态势，世人也都知道，地缘政治的斗争已经让位于经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次要因素。为数不多的冲突也只是出现在一些局部地区，比如海地和科索沃。随后，也就是2001年9月11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当天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所吸引。

在一定意义上，思考当今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时，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常识不一定行得通。世上不存在神奇的**20**年轮回，也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力量来推动这种轮回。在历史上的某一特定时刻，那些看起来永恒不变、举足轻重的事情可能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

变化。时代更替，现在眼中的这个世界可能将在20年后（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变得面目全非，苏联的迅速垮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传统政治分析法的想象力严重匮乏，它把过眼云烟当做常态，却对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重大而快速的转变视而不见。

如果生活在20世纪初，我们不可能预测上述重大历史事件。但这个世界上仍有一些事情能够被预测，而且有的已经被预料到了。例如，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人们不难看出这个地位极不稳定的强权（身陷法国和俄国的包围之中）将可能重塑欧洲和全球体系。20世纪前50年的冲突大多是因德国在欧洲的地位问题而起。虽然不能预测那些战争的时间和地点，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却被许多欧洲人预测到了。

这当中更难预测的一点就是战争的破坏程度，谁也没料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会失去帝国宝座。但即便如此，也有一些人早就预计到那两场战争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在炸药被发明之后。如果在预测的时候，将技术的进步与地缘政治一并考虑，那么欧洲的分崩离析并不意外。早在19世纪，人们就预测到美国和俄罗斯的崛起。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当时就预测到这两个国家日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站在20世纪的起点，只要凭借规律外加几分运气，就能预知这个世纪未来的总体轮廓。

21世纪：大国的起点or终点？

站在21世纪的起点，我们需要掌握本世纪的标志性事件，其重要性相当于德国统一对20世纪的影响。如今，欧洲帝国留下的断瓦残垣已经除尽，苏联也余威不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依然屹立不倒，且愈发强大，它就是美国。毫无疑问，就像历史上的其他大国一样，美国目前似乎把世界搅得乌烟瘴气，但我们千万不要被此乱象所蒙蔽。无论是在经

济、政治，还是在军事上，美国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迄今无国能敌。当今，美国－伊斯兰圣战者战争被炒得火热，但就像100年前那场美西战争一样，不久后这场战争将会被人们遗忘。

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经济就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它从一个边缘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且经济规模高于排在它后面四个国家的总和。军事上，它从一个无名小卒崛起为主宰全球的国家。政治上，它更是有意无意地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本书似乎是以美国为中心，从美国人的角度来展望世界的。也许本书真的有点“臭美”，但我的观点是，目前的世界的确是在围着美国转。

这不仅归因于美国国力的强大，还在于全球秩序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过去**500**年，欧洲一直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欧洲帝国创建了人类历史上首个单一全球体系。通往欧洲的交通要塞就是北大西洋，谁控制了北大西洋，谁就控制了通往欧洲的咽喉，也就相当于控制了欧洲通往世界之路。全球政治的基本版图大致就是如此。

而后，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令人称奇的事情频频发生。太平洋与大西洋两岸的贸易达到同等规模，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二战”后，欧洲沦落为次要强权集团，全球贸易模式也悄然转变，北大西洋不再是影响全球形势的唯一关键因素。现在，谁能控制北大西洋和太平洋，谁就能够控制全球贸易体系，进而控制全球经济。在21世纪，毗邻这两个大洋的任何国家都拥有巨大的优势。

考虑到建造庞大海军的巨大花销以及在全球部署兵力的昂贵成本，毗邻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国家将占尽先机，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海洋之国”——英国才能成为19世纪的全球霸主。这样看的话，北美已经取代欧洲成为全球中心，谁控制了北美，谁就能统治全球。至少在21世纪，这个国家会是美国。

美国自身实力配合地缘政治的优势，使其成为21世纪的主角。这不

仅没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敬爱，反而令它们感到恐惧。因此，21世纪的历史，尤其是前50年的历史将围绕两个敌对力量展开：一是次要强权结盟以遏制美国的发展；二是美国先发制人，阻止这种结盟。

如果将21世纪看做是美国时代的开端（取代欧洲时代），那么序幕将由穆斯林拉开，他们试图重建伊斯兰帝国（昔日辉煌的伊斯兰帝国曾一度从大西洋扩至太平洋）。毫无疑问，他们将在美国头上动土，以便将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拖进这场战争，并试图通过证明美国的软弱来刺激伊斯兰东山再起。作为回应，美国将会入侵伊斯兰国家，但它的目的不是赢得战争，它甚至搞不清楚胜利意味着什么，它的目的仅是分化伊斯兰世界，引发其内讧，以遏制伊斯兰帝国的崛起。

美国不需要赢得战争，只需要分化各国，使它们难以形成强有力的联盟。在一定意义上，21世纪将会发生一系列冲突，一方面，一些次要强权试图通过结盟来控制美国；另一方面，美国则运用军事力量破坏联盟。与20世纪相比，21世纪的战争会更加频繁，但战争的破坏程度会更小，其原因在于技术的革新以及地缘政治的挑战。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引领下个时代的变革通常都不可预测，21世纪前20年也不会例外。美国与伊斯兰的战争已经结束，但下一场冲突迫在眉睫。俄罗斯正在重塑其势力范围，这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形成挑战。俄罗斯将挺进西部的东欧平原，在这个过程中，它势必会与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相冲突，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世界其他地方也会在21世纪早期出现一些摩擦，但美俄之间的新冷战将成为美国与伊斯兰战争销声匿迹之后的主要冲突点。

俄罗斯将试图重振国力，美国不可避免地会予以阻止，但最后的输家还是俄罗斯。俄罗斯严重的国内问题、锐减的人口以及糟糕的基础设施将使其长期复兴计划成为南柯一梦，而且第二次冷战的结果也将与第一次一样，以俄罗斯的溃败而告终，尽管这次冷战在恐怖程度和所波及

的地域范围上均逊于第一次。

许多人认为美国的下一个挑战者是中国，而非俄罗斯。对此我不敢苟同，原因有三：

> 第一，仔细看看中国地图就会发现，这是个在地理上极度孤立的国家。它北靠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南接喜马拉雅山和热带丛林，而其多数人口却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使其不能轻易扩张。
>
> 第二，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都不是海军大国，而建造一支海军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为海军不但需要军舰，还需要训练士兵，创建相应的海军文化。
>
> 第三，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让美国不必对中国感到担心，那就是中国的地区差异。每当这个国家对外开放时，沿海城市就变得越来越繁荣，而内陆大部分地区却发展较慢，这将诱发紧张、矛盾和不安。

一些人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趋势无疑会继续，我也相信中国的发展周期将在未来10年延续，但这个国家不但不是美国的挑战者，相反，是美国应该支持、拉拢、团结起来制衡俄罗斯的一股力量。

到21世纪中叶，其他一些国家将会崛起。这些国家目前还不是超级大国，但我认为它们在未来几十年会逐渐变得强大且富有侵略性。有三个国家尤其值得关注，其中首推日本。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最为脆弱。因为日本本土资源匮乏，它不得不高度依赖进口原材料。这个国家有军国主义历史，因此不会满足于一直扮演太平洋边缘小国的角色。日本的人口正在逐渐减少，情况日益严重，加上它对大规模引进移民深恶痛绝，因此，日本必将被迫去他国寻找劳动力，日本的脆弱最终将促使其改变政策（我曾经撰文对日本脆弱的经济进行了阐述，至今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比我预计的好）。

接下来就是土耳其，它目前是全球第17大经济体。历史上，每当伊斯兰帝国崛起时，它的统治者都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陨落，致使土耳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但在周边地区都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如混乱不堪的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地区以及南部的阿拉伯世界，土耳其却一直保持稳定的局势。随着土耳其国力不断增强——目前在中亚地区已经拥有最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其影响力也必将扩大。

最后一个是波兰。自16世纪以来，这个国家就不再强大。但它一度强盛过，而且我认为它在未来也会再次成为超级大国。有两个原因使我做出这一论断：

> 首先是德国的衰落。虽然目前德国的经济规模庞大且不断扩大，但不会给全球经济秩序带来革命性的转变。此外，德国的人口也将在未来50年锐减，这将进一步削弱其经济实力。
>
> 其次是随着俄罗斯从东部向波兰施压，德国不会与俄罗斯发生第三次冲突。而美国将支持波兰，为其提供大规模经济和技术支持。战争将刺激经济发展（前提是不摧毁整个国家），而波兰将在对抗俄罗斯的结盟国家中，处于主导地位。

日本、土耳其和波兰这三个国家将面对一个充满自信的美国，这种自信程度甚至远远超过苏联解体时美国的自信程度，这将是一种极易引发冲突的状态。就像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这四个国家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21世纪的历史，最终可能导致下一次全球战争的爆发。这次大战将有别于以往——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今天只有在科幻小说中才能看到。就像我试图描述的那样，在新世纪初崭露头角的国家将在21世纪中期成为冲突的根源。

就像“二战”那样，这次大战也将会使科技突飞猛进，而其中一些科技进步至关重要。全世界都将目光聚焦于寻找可以替代碳氢化合物的新能源，理由不言自明。理论上，太阳能是地球上最高效的能量来源，但

太阳能需要大量接收器，这些接收器占用大量地表面积，而且会对环境产生许多负面影响，更不用说还要受日夜更替的周期循环的影响。太空发电技术在未来的全球大战开打之前已进行研发，从太空中以微波辐射的形式把电力传回地球，但战争会促使此项技术从概念变为现实。这种新能源将搭上政府的太空军事科技的便车，免费得到传送，像当年铁轨的铺设和因特网的研发一样，它将由政府买单，而这也将全面促进经济繁荣。

但所有这一切都将基于21世纪的一项最重要的事实：人口膨胀时代的结束。到2050年，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数量将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而到2100年，即便是目前最不发达国家的出生率都会保持稳定，不再增长。自1750年以来，整个全球体系是建立在“人口持续膨胀”的期之上的，一直以来，人们都期待有更多的工人、消费者和军人。然而，到了21世纪，情况不再如此。全球生产体系将发生转变，这迫使世界更加依赖技术，尤其是能替代人工的机器人以及基因研究（这样做更多地是为了延长人类的生育年龄而非寿命）。

全球人口锐减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显而易见。到本世纪中叶，先进工业化国家将出现大量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如今，发达国家想方设法驱逐与排斥移民，但在未来50年里，这些国家会绞尽脑汁吸引移民入境，甚至愿意花钱让外国人移居本国。美国就是其中之一，为了争取越来越少的移民，它将积极展开竞争，吸引墨西哥人移民美国——这个转变颇具讽刺意味，但又不可避免。

这些转变将引发21世纪最终的危机。墨西哥目前是全球第15大经济体，随着欧洲的逐渐衰落，墨西哥将和土耳其一样，全球排名会迅速上升，到本世纪末，它将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之一。在美国的鼓励下，许多墨西哥人将纷纷北上，涌入美国，在那些美国境内的墨西哥割让区（也就是19世纪美国从墨西哥割走的土地），人口平衡的状态将会被迅速打破，直至墨西哥人成为这个地区的主流人口。

上述社会现实将被墨西哥政府看做是一洗国耻的机遇。我预计，到**2080**年，美国与日益强大和自信的墨西哥之间会爆发一场大规模冲突。对美国来说，这场冲突可能会产生不可预知的结果，而且不大可能会在2100年结束。

我所说的大部分事情看起来都很难理解。的确，在2009年很难想象21世纪的时局将在土耳其和波兰的不断强大以及美墨冲突中达到高潮，但回到本章开头，当我描述世人如何以20年轮回这一所谓的规律来看待整个20世纪的变迁时，你可以体会到我的言下之意：用常识来预测未来无疑是错误的。

很显然，一件事情预测得越具体，其可信性就越低。预知未来一个世纪的精确细节是不可能的，何况我那时已长眠地下，对自己犯的错误一无所知，但我的信念是，我们至少可以预测未来的大致轮廓，而且不管包含多少臆测成分，都会试图给出一些解释。这就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未来**100**年：美国的时代

在我深入分析全球战争、人口趋势和技术革新的任何细节之前，很有必要先阐述一下我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即我是如何预测未来的。

我的目的不是让你看重我预测的**2050**年所发生战争的细节，而是我所预测的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未来战争的作战方式、美国中心论、其他国家对美国形成挑战的可能性等。任何事情都需要合理的理由，美墨之间发生冲突甚至爆发战争可能会让许多理性的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我非常愿意证明我的观点，并且阐述这些观点从何而来。

我曾经说过，理性的人不可能预知未来。新左派有句老话叫“实事求是，大胆追求”（Be Practical，Demand the Impossible），现在应改为“实事求是，大胆预测”（Be Practical，Expect the Impossible）。这个

观点是我研究方法的核心。从另一个更本质的角度来说，这可以被称做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并不是“国际关系”的另一个狂妄自大的代名词。它是一种预测未来的思维方法。经济学家经常谈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这只看不见的手中，人们追求自我利益的短期活动带来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的“国民财富”。地缘政治学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国家以及其他国际事件的参与者的行为上。根据这种观点，各个国家及其领导人短期内对本国利益的追求，即使不能带来国民财富，至少也是有迹可循的。人们可以据此预测到可能会发生的事件，从而产生预知未来国际形势的能力。

地缘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假设参与方是理性的，至少知道自身的短期利益所在。作为一个理性角色，现实提供的选择很有限。从总体上看，个人和国家都会追求自己的短期利益，即使达不到完美，也不会随机作出选择。这就像下象棋，从表面上看，似乎每一个博弈者第一步都有20种选择，但事实上，可选的棋路要少很多，因为大多数选择都非常糟糕，会很快被击败。象棋下得越好，你就会越发清楚自己的选择，而棋路也就越少。棋手的棋艺越高，就越容易预测他的下一步棋。大师级的选手都有绝对精细的打算，直到拿出“撒手锏”。

国家也是一样，一个拥有上百万甚至上亿人口的国家也要受现实的约束。人民所选择的领导人如果失去了理性，就起不到领导作用。能从千千万万的民众中脱颖而出，爬到万人之上的高位，绝非等闲之辈。领导人都知道自己下一步的大体方向，并据此开展行动，因此，即使他们的计划并不完美，至少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偶尔有一些领导人会做出意料之外的成功举动，但绝大多数仅仅是执行必须的理性步骤。当一位领导人实施国家的对外政策，他们也会如此行事。如果领导人逝世或换届，新任的领导人更可能是萧规曹随，而非另辟蹊径。

我并不是说政治领导人就是天才。很简单，政治领导人都深谙领导

之道，否则他们不会走到这一步。各个国家都乐于贬低他们的政治领导人，的确，领导人也会犯错，但仔细研究你会发现，他们很少犯低级错误。在大多数情况下，错误的政治决定都来源于外部大环境。我们都希望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永远不会犯错，但这很难。因此，就像经济学不会过分看重单个商人，地缘政治学也不会太在意领袖个人。政治领袖和商人都是参与博弈的玩家，知道如何依规矩行事，但他们都没有打破行规的金科玉律。

因此，政治家几乎不可能自行其是，大环境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公共政策也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只有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内，政治抉择才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即便是冰岛历史上最杰出的领导人，也不会试图将这个国家打造成为一个世界级大国；同样，罗马帝国在鼎盛时期，即便是最愚蠢的皇帝也不会自挖墙脚，削弱罗马帝国的根本实力。

地缘政治学不涉及事情的对错，不涉及领导人的品行，也不辩论外交政策，它只涉及制约国家和人类的客观力量，这种力量迫使人们以特定的模式行事。

无心插柳柳成荫，接受这个观点是理解经济学的关键。人们依计划行事，可结果总是不如愿。地缘政治学也是如此。当罗马的村庄在公元前7世纪开始扩张时，就蓄意在500年后征服地中海，这种说法完全值得怀疑。但当时的罗马居民第一次向附近的村落发起攻击时，其实就已经开启了这项进程，这项进程不但受制于当时的现实，还充满了不可预知性。罗马帝国不是刻意设计出来的，但也绝非巧合。

正因为如此，地缘政治学假设一切都不是预先设定的。这意味着人们想要做的事情和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最终的实际结果并不一致。国家元首和政治领导人都在追求他们最直接的目的，但也要受到现实的约束，就像棋手受到棋盘、棋子以及规则的约束一样。有时，政治领导人的行动会提升国家实力；有时，也会将自己的国家带入万劫不复之地，他们很少能在最初就预料到最终的惨痛结果。地缘政治学有两个

假设：

> 首先，它假设人类会融入比家庭更大的组织，这样，人类就必须参与政治活动。同时，人类对出生地的人、事、物，对自己的部落、城市与国家会产生一种自然的忠诚感。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国民身份意义重大。地缘政治学教导人们，国际关系是人类生活中的关键部分，这也就意味着战争是家常便饭。
>
> 其次，地缘政治学认为一个国家的特征以及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其地理位置。地缘这个词含义广泛，它不仅包括一个地方的自然特征，还包括一个地方对其居民以及社会的影响。在远古时代，斯巴达和雅典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内陆城市，一个是海洋帝国。雅典非常繁荣和国际化，而斯巴达则贫穷闭塞。两者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存在差异。

如果你理解了上述两个假设，就能够想到由自然纽带联结在一起，并以特定方式行事的大量人口会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美国之所以是美国，是因为它有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同理，日本、土耳其和墨西哥也是如此。当你深入了解铸就这些国家的各种力量时，你可以看到，它们的选择实在太有限。

21世纪将和其他已经逝去的时代一样，有战争，有贫穷，有胜利，有失败，也会有灾难和好运。人们将一如既往地工作、赚钱、恋爱、生子，直到最后入土为安。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周期循环，那就是恒久不变的人类环境，但21世纪将在两个方面上格外不同：它将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将见证一个全新的世界大国主宰全球。这种情况非常特殊。

我们目前处于以美国为中心的时代。为了理解这一时代，我们必须了解美国，其原因不仅在于美国的强大，更在于美国的文化无孔不入，影响全球。就像英法两国在鼎盛时期，其文化主宰全球那样，美国文化也将如此，它的年轻和野蛮将影响这个世界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因

此，研究21世纪实际上就意味着研究美国。

如果我只能对21世纪下一个论断，那就是：欧洲时代已经终结，北美时代已经到来，而在未来100年，北美将由美国主导。21世纪将围绕美国展开。这并不能保证美国必然是一个公正和道德的政权，也不能说明美国文明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但却意味着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是21世纪的历史。

第1章
21世纪的美国
青春期的“莽撞少年”

骄傲自大与深度忧虑构成了美国文化的独有特性。当相信宿命的美国人还在为自己国家命运担忧时，殊不知自己的国家已经站在世界之巅：美国的国力强大到其他国家无法撼动，美国的海军已经统治全球，控制了全球贸易，并将曾经风光一时的欧洲帝国赶下神坛。特有的地缘政治优势使得美国国力在21世纪势头不减。此时的美国就像一个莽撞的少年，纵然内部分歧不断，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勇猛向前。

美国民众的心中都深藏着一个信念：美国正濒于毁灭。读一读杂志的读者来信，浏览一下网页，听听公众的言论，你就可以大致了解情况。灾难性的战争、居高不下的赤字、飞涨的油价、校园枪击案、企业和政府的腐败，以及无休无止的其他问题（所有这些都非常现实），都不由地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美国梦已经破碎，美国的鼎盛时期已经逝去。如果这还不能说服你，那么听听欧洲人是怎么说的吧。他们将确信无疑地告诉你，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奇怪的是，早在尼克松时代，美国人已经有这种不祥的预感，那时的问题也和现在一样。人们一直担心美国的繁荣昌盛只是南柯一梦，灾难随时都会降临。环保主义者和基督教保守派都传递着同样的信息：除非我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否则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可能现在悔改都为时已晚。

焦虑的年代：美国时代正在谢幕？

有趣的是，相信宿命的美国人不但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恐惧感，而且还隐隐觉得自己的国家今不如昔。现在的美国人都有深深的怀旧情结，认为20世纪50年代是一段单纯美好的时期。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信念。50年代，先是朝鲜战争爆发，麦卡锡主义（McCarthy，极端的反共主义者、美国共和党人麦卡锡在全美掀起反共运动，打击和迫害进步人士。——译者注）盛行，而后是轰动一时的“小石城事件”；到了末期，人造卫星Sputnik发射升空，东德竖起柏林墙，加上核战威胁几乎贯穿了整个年代，因此，50年代实际上是一个充斥着焦虑和不祥的时期。在此期间，一本名为《焦虑的年代》（*The Age of Anxiety*）的书广为流行，而当时的人们都怀旧地追忆早期的美国，就像我们现在怀旧地追忆20世纪50年代一样。[1]

美国文化是骄傲自大和深度忧虑的狂热结合体，这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自信不断被恐惧感所侵蚀，比如美国人害怕会被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极地冰盖融化所淹没，会因同性恋惹怒了上帝而被鞭笞致死，反正没有人能辞其咎。美国人的不稳定情绪使其很难在21世纪初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精神。但事实是，美国的国力极其强大。或许，美国会遭遇大灾难，但当你面对最基本的事实时，就很难再得出这种结论。让我们来比较一些颇具启发性的数据。

> 美国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4%，但提供了全球大约26%的商品和服务。2007年，美国GDP约为14万亿美元，大约占全球GDP总规模（约为54万亿美元）的26%。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是日本，其GDP（约为4.4万亿美元）约占美国的1/3。美国经济规模是如此巨大，甚至超过了排名在美国后面的4大经济体——日本、德国、中国和英国的规模总和。

许多人提出，美国的汽车业和钢铁业正在衰退，而这两个行业在20年前还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因此，他们将此看做是这个国家当前的工业空洞化的例证。的确，许多产业已经将生产移到海外，使得美国的工业产出仅为2.8万亿美元（2006年），但这依旧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是全球第二大工业产出国日本的2倍多，甚至比日本和中国的工业产出总和还多。

也有许多人谈论石油短缺，这的确是事实，而且这个缺口还将扩大，但同时也要意识到，2006年美国石油日产量达到830万桶。同年，俄罗斯的石油日产量为970万桶，沙特阿拉伯为1 070万桶。美国的石油产量为沙特阿拉伯的85%，高于伊朗、科威特和阿联酋。美国的石油进口量大得惊人，但考虑到其工业生产规模，也就不难理解了。再比较2006年的天然气产量，俄罗斯以22.4万亿立方英尺的年产量高居全球榜首，美国以18.7万亿立方英尺紧随其后，高于排在其后5个生产国的产量总和。换句话说，尽管有些人担心美国完全依赖外国能源，但实际上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之一。

考虑到美国的巨大经济规模，其人口密度仍然偏低（以全球标准衡量）。若以每平方公里的居住人口计算，全球平均人口密度为49，日本和德国分别高达338和230，而美国仅为31。若剔除很多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如阿拉斯加，美国的人口密度也只有34。与日本、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人口密度很低。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人口和可耕用地（适合农业种植的土地）之间的比例，就会发现，美国的人均土地占有量是亚洲的5倍，几乎达到欧洲的2倍，也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一个经济体由土地、劳动力和资金构成。以美国为例，上述数据表明，这个国家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有许多答案可以回答美国经济何以如此强大的原因，但最简单的一个莫过于其军事力量的强大。这个国家完全占据着一个几乎不可能遭到袭击或侵略的大陆，它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其周边国家。在20世

纪，全球几乎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遭受过战争毁灭性的摧残，但美国是一个例外。军事力量和地理位置成就了美国经济的辉煌。当其他国家都在忙于治疗战争创伤的时候，美国却能够独善其身，它实际上是历次战争的受益者。

考虑一下这个我以后将多次重复的简单事实：美国海军控制了全球海洋。不管是中国南海的舢板、非洲沿岸的小帆船、波斯湾的油轮，还是加勒比海的游艇，全球每一艘船的任何举动都逃不过美国太空卫星的法眼，这些船只能否得到保障或者通行也取决于美国海军的意愿。全球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合起来都不能与之抗衡。

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尽管也出现过一些区域性的海军统治力量，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能够统治全球。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入侵他国，而永远不会被入侵，也意味着美国最终会控制国际贸易。海军力量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财富的基石。美国对海洋的控制始于“二战”后，在欧洲时代的末期得到巩固，现在它是美国经济实力的保证，也是军事实力的基础。

撇开美国存在的问题不谈，国际局势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全球经济、军事以及政治力量的严重失衡。对21世纪所做的任何预测如果不以美国实力的独特性为基础，就会偏离现实，但同时，我还要提出一个更大胆且更出人意料的论断：美国目前仅处于婴儿期，21世纪才是美国的世纪。

有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论断。过去500年，全球体系完全依赖于大西洋欧洲的实力，也就是那些濒临大西洋的欧洲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甚至荷兰。这些国家改变了世界，创立了人类历史上首个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众所周知，欧洲强国随着欧洲帝国在20世纪的瓦解而轰然倒塌，留下的权力真空被北美的统治力量、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所占据。北美替代了欧洲已经占据了500年（从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远航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位置，成为

国际体系的重心。[2]

何以如此？为理解21世纪的历史，我们必须理解20世纪末发生的全球基本结构的转变，这些转变将为一个新世纪的创立搭建平台。就形式和本质而言，这个新世纪与以往迥然不同，正如美国和欧洲的区别。我所说的与政策无关，只是客观的地缘政治力量的一种运作方式而已。

被割裂的“欧洲帝国”

直到15世纪，人类都生活在自我的封闭世界里，不知道自己只是沧海一粟。中国人不知道阿兹特克人（Aztecs），玛雅人（Mayas）不知道祖鲁人（Zulus），欧洲人可能听说过日本人，但从未真正了解过他们，也从未与日本有过联系。巴别塔（The Towel of Babel，《圣经》中提到的一座通天塔。人类起初只有一种语言，彼此交流畅通，所以有很强大的力量，他们想利用这种力量，造一座通向上天的高塔。结果上帝不乐意，他将人类的语言打乱，使人们无法沟通，于是巴别塔最终没能造成。——译者注）阻碍了人类的沟通，也使得文明无法得以传播。

生活在大西洋东岸的欧洲人打破了地域界限，世界统一成一个整体，使得各地区密切相连。澳大利亚原住民所遭遇的灭顶之灾与英国和爱尔兰关系的转变密切相关，一切似乎源于英国需要为流放犯人寻找一块殖民地（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把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安放流放囚犯的殖民地。——译者注）；而阿兹特克国王们的命运则与葡西关系息息相关。大西洋欧洲以帝国主义缔造了一个单一的世界。

大西洋欧洲成为全球体系的重心。欧洲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进程，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要看欧洲的眼色行事。从16世纪到20世纪，实际上几乎没有哪个地方能够脱离欧洲的势力和影响而独立存在。无论是好是坏，当时世界就是在围绕着欧洲运转，而欧洲的轴心又是北大西洋，因此，谁控制了这片海域，谁就掌控了通向世界的钥

匙。[3]

当时，欧洲既不是文明程度最高，也不是最先进的地区，那么，到底是什么成就了它世界中心的地位？早在15世纪时，欧洲还是全球技术和知识的盲区，与当时的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为什么这些面积狭小、地理位置偏远的国家能够统治全球？为什么它们恰恰在那时开始统治全球，而不是之前的500年或之后的500年？

欧洲的实力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金钱和地理位置。欧洲依赖于从亚洲进口商品，尤其是印度，这是欧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到处都是欧洲需要的奢侈品，后者也愿意为这些奢侈品买单。在历史上，亚洲商品能够通过横跨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和其他路径抵达地中海，但崛起后的土耳其封闭了道路，这使得地中海国家进口商品的成本大为提高。

欧洲商人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绕过土耳其抵达亚洲的道路。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以非军事方法选择了一条避开土耳其通往印度的道路，那就是沿着非洲海岸南下，而后北上进入印度洋。他们还在理论上假设地球是圆的，只要一直向西航行，就可以到达印度。

在历史上，这是一段独特的时期，如果换作其他年代，大西洋欧洲只会在落后和贫穷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但迫于经济上的困境以及虎视眈眈的土耳其，他们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而在心理上，这段时期也尤为关键。西班牙人刚刚将穆斯林赶出他们的国家，狂妄之气正盛。最后，航海所需的工具也已经完备，如果能正确运用的话，就能为土耳其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伊比利亚人有一种小吨位的轻快帆船，能够帮助他们进行深海航行。此外，他们还有指南针和星盘等大批航海工具可以使用。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枪，尤其是大炮。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从其他文明社会借鉴过来的，但伊比利亚人能把它们有效地应用于自己的经济和军事体系。因此，他们能航行到很远的地方。所到之处，他们都有能力开战并赢得战

争。一旦开战，看到建筑物被大炮炸毁的对手很容易在谈判桌上屈服。当伊比利亚人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就会强行闯入，并将其占为己有。在之后的几个世纪，欧洲人用探险船、枪炮以及金钱统治了世界，并创建了人类历史上首个全球体系。[4]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欧洲人统治了全球，但却未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在横行世界的500年中，欧洲在无休止的内战中将自己撕得四分五裂，从未形成一个“欧洲帝国”，取而代之的是不列颠帝国、西班牙帝国、法兰西帝国、葡萄牙帝国等。这些国家在入侵并逐渐统治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的同时，也在彼此无休止的战争中消耗殆尽。

导致欧洲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很多，但最终却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地理因素：英吉利海峡。历史上，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国都先后费尽周折统治过欧洲大陆，但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跨过这道海峡，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击败英国。因此，前赴后继的征服者都未能将欧洲统一成一个整体，这期间的和平时期也仅仅只是临时的休战。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下伤痕累累，在这场战争中，1 000万人失去生命——几乎占到整整一代人的总人口。随着欧洲经济日益下滑，欧洲人的自信也灰飞烟灭。在人口、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此时的欧洲已经与过去相差甚远。糟糕的情况还远不止于此。

地缘政治决定了美国霸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崛起为一个全球大国，但美国那时才刚刚崭露头角。从地缘政治上看，“一战”是欧洲引发的另一次内讧，而且美国也没有从心理上准备好永远在全球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但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这一状况。在一战中，美国借助令人瞩目的实力宣告了它的存在，还在欧洲留下一颗能够在下次战争继续维持其影响力的定时炸弹。这颗定时炸弹就是《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这

份合约结束了一战，但未能解决引发战争的核心冲突。《凡尔赛合约》使下一轮世界大战的发生成为可能。

战争在1939年再次打响。此时，距“一战”结束仅仅21年。德国再次挑起战争，6周后占领了整个法国。美国在开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参战，但承诺不会允许德国成为最后的赢家。英国未能置身事外，但美国给它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我们都只记得好的那一面，美国通过为英国提供大量驱逐舰和战争物资来对抗德国，但很少有人记得英国人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为了得到美国的帮助，英国几乎将西半球的所有军事设施交给美国。美国控制了这些军事设施，并获得了英国北大西洋的钥匙，而这把钥匙正是欧洲通往世界的入口。与此同时，德国在英吉利海峡上败北，可以说，这条浅浅的水道再次拯救了英国。

据合理估计，全球大约有5 500万人在“二战”中殒命（包括军人和平民）。欧洲在战争中已被撕得粉碎，参战国都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战争中仅损失了大约50万名士兵，而且几乎没有平民伤亡。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工厂数量远远超过战前，这种情况在参战国中仅此一例。美国没有哪座城市遭到轰炸（除了珍珠港），没有哪片土地被占领（除了阿留申群岛的两个小岛），美国的伤亡数量不到战争伤亡人员总数量的1%。

美国以如此小的代价在“二战”中崛起，不仅控制了北大西洋，还掌控了全球的海洋；不仅占领了西欧，还掌握了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以及英国等国的命运；与此同时，它还征服并占领了日本。欧洲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帝国版图：

> 部分原因在于精疲力竭，部分原因在于它已经无力承担作为帝王的成本，还有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不希望它继续占据帝王宝座。

欧洲帝国在此后20年里逐渐瓦解，期间只是零零星星做些抵抗。地缘政治现实使得欧洲以灾难性的方式终结了自己（几个世纪以前的西班

牙也面临过同样的困境）。

问题来了：美国在1945年明显崛起为一支全球性决定力量，是不是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an，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音乐家、诗人和浪漫喜剧剧作家，主张君王要工于心计，用威胁、利诱、恫吓等手段巩固权势，统治天下。——译者注）导演的一出戏呢？美国崛起的成本仅仅是牺牲了50万人，相比于整个战争5 500万生命的代价，简直微乎其微。是罗斯福总统异常杰出，还是美国在追求“四项自由”以及推动联合国宪章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发展成为超级大国？都不是。在地缘政治学中，“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并不少见。

美苏冲突，也就是冷战，就是一个现实的全球冲突。从本质上来说，这场冲突是为继承欧洲的帝王宝座而展开的竞争。尽管双方都有巨大的军事实力，但美国拥有天然的优势。苏联国土面积广大，但地处内陆。美国的国土面积与其相当，但能轻而易举地通往全球海洋。苏联不能遏制美国，但美国无疑能遏制苏联。而这也是美国的策略：遏制并绞杀苏联。从挪威的北角到土耳其，再到阿留申群岛，美国的盟国建立了范围广泛的包围圈，这些盟国都与苏联接壤，从1970年开始，中国也加入了这个包围圈。苏联每个拥有港口的据点，都被美国的盟国以及美国海军所包围。[5]

麦金德**VS**马汉：陆权与海权的较量

地缘政治学在地理和国家实力方面存在两个相互冲突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的创始人是英国人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他认为控制了亚欧大陆就意味着控制了世界。就像他所说的“控制了东欧（俄罗斯欧洲部分）也就是控制了亚欧大陆的中心区域，而控制了这个中心区域就控制了亚欧大陆，进而也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这一思想在冷战时期主导了英国和美国的

战略，促使他们寻求遏制和绞杀俄罗斯欧洲部分。

> 持有另一个观点的是美国人艾德米拉·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dmiral Alfred Thayer Mahan），他是美国最著名的地缘政治思想家。在他名为《海军实力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History*）一书中，马汉阐述了一个与麦金德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控制海洋才等同于控制全球。

历史证明，两人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正确的。麦金德的观点之所以正确，在于苏联解体将美国提升到了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而马汉这个美国人则理解了两个关键因素：苏联解体是因为美国海军力量的强大，而前者也为美国海军打开了统治全球的大门。此外，马汉认为海运是最廉价的货物运输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马汉的观点也是正确的。早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就比斯巴达人富裕，因为他们有港口和商船，以及保护港口和商船的海军。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拥有海军的国家一直都比没有海军的邻国富裕。随着全球化在15世纪出现，这个事实越发接近人们在地缘政治学中得到的绝对真理。[6]

美国控制海洋，意味着这个国家不但能参与全球海上贸易，还能对其进行控制。它能制定规则，或者至少打破其他国家制定的规则。它以非公开的方式来阻止其他国家进入世界贸易路线来限制海上贸易（尽管它偶尔借助制裁来实施这一策略）。总之，美国借助其他国家进入巨大的美国市场这一杠杆，以更加微妙的方式决定了国际贸易体系。这是理解美国是如何靠强大的海军力量称霸全球的关键。除却自身的天然资源外，美国依靠其海军力量变得无比繁荣，而被陆地包围的苏联则无力与之竞争。

此外，控制海洋还给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政治优势。美国可免于被他国入侵，但却具备侵犯他国的实力——无论选择何时以及何种方式。1945年以来，美国可以给其他国家提供战争给养而不必担心补给路线被

切断。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北美大陆上发动战争。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未得到美国许可的情况下发动海陆空军事行动。英国和阿根廷1982年因福克兰海峡而大动干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只有得到美国的默许，两国才可以兵戎相见。而在另一个例子中，由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1956年入侵埃及的做法违背了美国的意愿，它们不得不看美国的脸色结束战争。

在整个冷战过程中，与美国结盟的利益永远大于与苏联结盟的好处。苏联能够提供武器、技术、政治支持和其他东西，但美国却能够提供进入全球贸易体系的途径，以及将商品销往美国的权利。这令其他的一切条件都相形见绌。被排除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意味着贫穷，而进入这个体系则意味着富裕。朝鲜与韩国以及东德与西德之间的差异就是最好的例证。

有趣的是，在冷战过程中，美国在心理上一直处于防御姿态。朝鲜、麦卡锡主义、古巴、越南、人造卫星、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左翼恐怖主义，以及欧洲盟友对里根政府的严厉批评，都使美国产生了持久的沮丧和不安。外部环境使美国不断感觉到：自己在冷战中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然而，在忧伤的表象以及客观权力关系的现实中，苏联永远没有取胜的机会。

> 记住，美国人的心理与地缘政治现实之间的脱节至关重要，原因有二：第一，这表明美国国力还没有成熟；第二，这也揭示了美国巨大的潜能。因为美国人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这使得他们更发奋进取。在冷战期间，美国人民（上至政治领导人，下至工程师和军事情报人员）一直都没什么信心。

这也是美国取得冷战胜利之后，美国人感到意外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及其盟国包围了苏联，后者无力承担在海洋上挑战美国的成本，只好转而致力于陆军建设和导弹研究，但他们根本不能在经济增长率上与

美国相匹敌，更不用说拿经济利益引诱其盟国。因此，苏联越来越落后，最终以解体收场。

苏联在1991年（也是哥伦布第一次远航探险后的第499年）的解体，终结了一个历史时代。500年以来，世界的权杖首次没有驻足欧洲，欧洲也不再是全球竞争的焦点。这一年之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美国，它已名副其实地成为全球体系的中心。

美国正处于莽撞的青春期

我们已经了解了美国成长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历程，但还有一个我之前提到过的，不起眼但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数据需要提及：到1980年，随着美苏冷战步入白热化，跨太平洋贸易的规模与跨大西洋贸易的规模达到同等水平，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仅仅在10年之后，随着苏联解体，跨太平洋贸易的规模已经比跨大西洋贸易规模超出一半。整个国际贸易规模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全球体系都经历了惊人的转变。

这又如何影响到世界其他的地方？答案很简单，控制海洋航道的成本非常庞大。许多贸易国家都负担不起这种成本，因而只能仰仗那些拥有这类资源的国家。因此，海军强国都拥有巨大的政治筹码，而且其他国家不打算对其进行对抗。控制邻近水域的成本已经非常高昂，控制全球数千公里以外水域的成本更无法估计。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才能负担得起这些开支。直到今天，这并没有变得更容易，成本也没有更低。了解一下美国的国防成本和海军开支，以及与之相关的太空系统方面的支出，你会发现，维持航母战斗群在波斯湾战斗能力所要花费的成本甚至高于许多国家的国防开支总和。如果国家并不处于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而又想控制这两个大洋，其成本可能会超出任何国家的经济负荷能力。

北美能够独立供给一个横跨大陆的国家，又能够同时在大西洋和太

平洋部署兵力。因此，北美成为国际体系的重心。在美国时代初期，这个国家不但早已是北美的超级大国，而且能在1944——1945年间同时进攻欧洲和日本。它用武力控制了大西洋和太平洋水域，而且至今依然享有控制权。这也是美国为何能够主宰新时代的主要原因。

但也要记得，西班牙也曾主宰欧洲，并开创欧洲时代。虽然我认为北美将在未来几个世纪成为全球重心，而且美国将至少在未来一个世纪统治北美，但就像西班牙一样，北美成为全球重心的论断并不能保证美国将永远统治北美，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内战、对外战争以及邻国的崛起等。

不过，我的观点是，在短期内（也就是未来几百年），尽管会受到战争和危机的侵扰，美国的国力依旧会很强大，这种强大根植于其经济、技术和文化现实之中，而且在21世纪势头不减。

美国人容易产生一种自我怀疑，但这与美国的崛起并不矛盾。实际上，美国是极度自大和深度忧虑的奇怪结合体。有趣的是，这类似于对青少年心理的描述，但的确是美国21世纪的现状。这个领导全球的国家正在经历不断增长的青春期认同危机，以及对其新生力量的不信任和非理性情绪波动。历史上，美国就是一个年轻而不成熟的社会。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对美国期望太高。除了它的自大和深深的不安，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国家还应该对自身及其所处的国际地位有什么其他的认识呢？

如果我们认为美国现在还处于青春期——其整个历史的早期，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不管美国如何看待自己，它都将慢慢成熟起来。成年人会比青少年更加成熟、更有稳重。因此，我们就可以合理地推断出，美国还处于其强盛的最早期，没有完全走向文明。现在的美国依旧处于野蛮时期（这是对现象的描述，而非道德判断），一如16世纪的欧洲。它的文化还未完全成型，它的意志非常坚定，激情将驱使它向不同以及相矛盾的方向发展。

文化存在于以下三种状态之中：

第一种是野蛮状态。原始人相信他们村庄的习俗就是自然法则，如果哪个人不遵守这种法则将会受到众人唾弃，而且会被要求改正，否则将遭遇灭顶之灾。

第二种就是文明状态，同时也是最罕见的文化境界。文明人能够在他们的意识上平衡两种相互抵触的思想。他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真相，而且他们的文化已经接近那些真相。与此同时，他们对自己可能存在的错误持包容态度。信念和怀疑的结合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在怀疑主义削弱自我肯定的过程中，文化就经过野蛮主义的洗礼形成文明，而后陷入第三种状态——颓废。文明人会有选择地进行有效的战斗。通常，所有文化都包括野蛮人、文明人和颓废者，但每一种文化在不同时期都被同一种原则所支配。

第三种是颓废状态。颓废主义者以怀疑的态度认为，万事万物都差不多，没有什么事物更好，也没有什么事物更差。他们对那些坚守信念的人都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值得为之去战斗。

欧洲在16世纪还处于野蛮状态，当时，基督徒自视甚高的态度煽动了第一波侵略。欧洲在18～19世纪进入文明社会，而后在20世纪陷入颓废时期。美国则刚刚开启文化和历史之旅。截至目前，它还没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来形成一种定型的文化。在成为世界重心的过程中，美国也不可避免地形成自己带有野蛮特质的文化。在美国社会，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人士都看不起穆斯林，前者是针对穆斯林的信仰，后者则是不认同穆斯林对待女人的方式。这两种看似不同的观点都一致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最好的。就像野蛮状态的文化那样，美国正准备为了自己确信的真理而战。

这样说不是要批评美国（正如青少年不能因为他是青少年而受到批评），而是说这是美国发展过程不可或缺的一种状态。美国文化才刚刚

起步，它笨拙、直率，有时候也很野蛮，并且经常被深深的内部分歧所困扰，所以美国的异议人士只有在确定“自己的价值观是最好的”这一点上才团结一致。美国就是上述事物的结合体，但就像16世纪的欧洲一样，尽管有时会横冲直撞，但你仍不得不叹服它的发展速度。

注释

［1］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29～30.

如果说对于慕尼黑阴谋的类比关乎普遍性，是对世界上其他地人民的眷顾，对越南战争的类比则是一种自我关怀。5.8万人在那战争中死去了。越南战争的教训就在于，盲目的热情会导致事情向误方向发展，而悲剧性思维有助于避免悲剧。事实上，一开始正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使命意识，将美国拖入东南亚的冲突中。当时的美国处于和平盛世，享受着“二战”后繁荣的顶点。还有比这更应该参与的战争吗？地理和距离被抛诸脑后，当军队进入越南战场时，人们心目中最近的战争往事，是60年前菲律宾丛林的残影。

越南战争是每当美国遭受重创后就容易引以为戒的战例。现实并不精彩，血淋淋的教训只有在事情恶化后才再度得到尊重。事实上，有近5 000名美国人在伊拉克死亡，超过3万人重伤，几十万伊拉克人死亡，另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成本，截至本书发稿时尚在统计中。即使伊拉克将来演变成一个半稳定的民主国家，或成为美国的准盟友，如此过度的代价仍显得得不偿失，正如某些人指出的那样，坦率地讲，很难看到我们的胜利成果有什么道德价值。

不过，伊拉克战争倒是打破了一些思维定式，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美国在向国外部署军力时，总要得到些道德上的回报。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任何国家，即使像美国这样标榜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如果无

节制地使用权力，也不一定会形成良性循环，时常“善”无善报。在现实主义重获尊重的同时，知识舆论界重新燃起了对17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兴趣。他对于“恐惧”的道德优势大加颂扬，并认为暴力的无政府状态是社会的主要威胁。在霍布斯看来，对暴力与死亡的恐惧，是人类自我利益的觉醒。这种恐惧可以通过建立国家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只有违法者才需要面对的恐惧。然而，这样的概念很难得到城市中产阶级的理解，因为这些人早已失去任何与人类自然状态接触的机会。

［2］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08～109.

斯皮克曼也证实，美国最初的繁荣得益于东海岸密布的河口提供的“无数有利于建设港口的位置”，以及蜿蜒的海岸线。地理也是早期美国自由最重要的捍卫者。在确立了西半球的地区霸权之后，美国就可以腾出力量应对“新世界以外的活动”，最终奠定其超级大国地位。它能够影响东半球的权力平衡，也正得益于此。

这一切绝非易事，更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所有的成就都植根于拉丁美洲的地理细节。地理的关键作用，使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成为占有整个半球的霸主。斯皮克曼以南美洲为例对此作出了解释，这也正是麦金德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的一个地区。麦金德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心脏地带有浓厚兴趣，这对于理解冷战地理至关重要；而斯皮克曼对于地球的整体性把握得更好，因此在当今全球各地高度连通的时代，比麦金德更具现实意义。

［3］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53.

麦金德说过，欧洲的命运是由成群结队涌入的亚洲游牧民族塑造的。在21世纪，欧洲与东方的关系将继续给它带来关键性影响，特别是与俄罗斯的关系。中欧和东欧想要进一步发展，成为繁荣稳定的国家

带，从而保护整个欧洲不受俄罗斯威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在欧洲寻求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统一时，它也将继续受到其内部分歧的困扰。这些困扰从表面来看是经济方面的，如德国对于希腊债务危机的愤怒，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永恒的地理真理的表达形式。也就是说，这体现了北欧的德国、地中海的希腊和巴尔干欧洲的不同发展模式。由于欧洲的人民运动主要是由技术促进的，因此其历史发展越来越频繁地与南边的非洲和东方的亚洲交织在一起；但是，欧洲内部的多样性仍然存在。换句话说，欧洲目前虽然没有面临传统军事威胁，却可能成为自我陶醉的牺牲品。反过来讲，斯皮克曼担心统一的欧洲可能挑战美国，这显得为时过早。

尽管现在设立了许多泛欧机构，但欧洲地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包括海洋、半岛、河谷和群山的不同地貌，以及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民族国家，都将在未来岁月里继续促进欧洲政治和经济上的分裂。

［4］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41～42.

有人可能会补充说，尽管“9·11”事件震惊全球，但大西洋仍然很重要。事实上，正是大西洋决定了美国和欧洲奉行不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我们也同样可以说，俄罗斯直至今天仍然是一个不安全、不稳定的陆权大国，它渴求更多的出海通道。从一方面来说，俄国在13世纪是蒙古汗国入侵的受害者，只靠着时间、距离和天气这些自然因素逃过一劫；另一方面来说，因为欧洲、乌拉尔地区和东欧地区之间没有大的障碍，尽管人工边界柏林墙倒塌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依然存在，百年来并无变化。是美国通过支配整个大陆的资源，才最终保住了欧洲的和平。

的确，地理是人类活动轨迹的前戏。欧洲文明的重要来源是希腊的克里特岛和基克拉迪群岛，前者是“从欧洲独立出来的碎片”，是欧洲连接埃及文明的最近地点，后者则是与小亚细亚的最近地点。德国是陆权

国家，英国只是一个岛国，这是欧洲历史不可争辩的事实。

德国东西两边均无山脉保护，为了应对其危险的地理位置，它选择的道路从军国主义到当代的新型和平主义；而英国边界安全，面向海洋，可以比其邻国更早地发展民主制度，并与美国建立了特殊的跨大西洋关系，与它共享一种语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过，如果英国不是一个岛国，其军事制度将会与欧陆国家一样霸道，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某个极权势力的受害者”。正是其地理位置保证了英国在历史上免遭最危险的入侵，并在几个世纪以来对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对岸的法国及其他低地国家的政治付出战略关注，使他们能够顺利发展。一切事实均表明，国际事务的构成往往以地理为基础，而我们却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5］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22～123.

马汉认为，帝国的地理枢纽不在于所谓欧亚大陆心脏地带，而在于印度洋和太平洋。这两个大洋可使相关国家沿欧亚大陆边缘投射力量，并借助发达的铁路和公路网影响大中亚地区政治发展。从这一点来说，斯皮克曼对印度洋和太平洋周围大陆边缘地带的看重，同时受到了马汉和麦金德的深刻影响。

俄罗斯对中心地带的控制实力，让麦金德备感吃惊；马汉的著作《亚洲的问题》（The Problem of Asia）比麦金德的“枢纽”一文还要早4年，他当时就发现了俄罗斯的弱点在于与印度洋温暖水域相距甚远。他说，俄罗斯“与任何开放性海域之间的遥远距离是其先天弱势，并使它在积累财富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既然如此，它有理由感到不满，而这种不满也很容易通过侵略的方式表现出来”。于是，马汉深入研究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特别是其最深层的心理意识流，而地理正是他研究的基础。那些位于俄罗斯南部、印度洋北部的国家，被马汉称为亚洲的“有争议地区”，即“俄罗斯陆权和英国海权之间的冲突区”，中

国、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的重要性都得到了强调。这里也正是40年后被斯皮克曼称为大陆边缘地带之处。事实上，马汉在1900年选定的一些枢纽国家，直到当前仍具有地缘政治意义。这不是巧合，地理是不可改变的。

冷战期间的地理刺激，使西方制定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它从欧亚国家的南部梯队实施，涉及该领域内的所有大陆边缘国家。地理确定了中国的重要地位，这个国家的地域和文明从欧亚的心脏地带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的温暖水域；地理也有助于将阿富汗和伊朗确定为心脏地带国家，并成为中东命运的关键力量。

［6］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91.

在麦金德看来，欧洲和中东更多地受到心脏地带的影响，而印度和中国的亿万人民能够自给自足，因此保持相安无事，和平发展。由此，他预测未来我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倚仗“印度和中国的季风地带”。但心脏地带到底为何如此重要呢？对欧亚内陆广阔的低洼地带和高原山脉的控制，对于世界强国来说真的举足轻重吗？没错，这些地域蕴藏着丰富的石油、战略性矿产和金属，但这就足够了吗？麦金德的想法有极端机械性的缺点，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工具，可以部分地解释东半球各国及其人民的空间安排。以大陆中心而非任何沿海边缘地带作为参考，会比较容易解释欧亚大陆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但是，心脏地带最好被视为世界岛的权力缓存器，而非决定性力量。

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结尾处，麦金德断言，如果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并以德国的征服者面目出现，“它必将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陆权国家”，因为它有能力驻守心脏地带。苏联的确这样崛起了，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做到了同样的事。正如麦金德预示的那样，它也因此可以迎面抗衡美国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海上力量。此外，正是出于对海上力量的追求和在印度洋上寻找不冻港，苏联最终入侵阿

富汗（阿富汗原应是心脏地带的一小部分，却成为超越其掌握的漏网之鱼），后因深陷阿富汗游击队的伏击圈而使整个帝国土崩瓦解。现在的俄罗斯联邦，规模已大大缩小，但仍试图重新巩固其心脏地带的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麦金德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理论，竟然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地缘政治的主要剧本之一。

第2章
势不两立
美国与伊斯兰圣战者的战争

当美国习惯性地用“胡萝卜加大棒”压制对手，让其他国家敢怒不敢言时，伊斯兰圣战者就如挥之不去的梦魇，让美国丝毫不敢松懈。无论是冷战的结束还是南斯拉夫的解体，既有格局的打破使得伊斯兰运动更加活跃。“9·11”的发生更是将美国拖入伊斯兰世界的泥淖，使得两者更加势不两立。面对新世纪ISIS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死灰复燃，未来美国又将如何应对？

美国时代始于1991年12月，当时，苏联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美国也就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但21世纪的历史真正开始于在此10年之后的2001年9月11日，也就是数架飞机撞击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那一刻。这是美国时代面临的第一个真正的考验。美国是否真正已经赢得了这场与伊斯兰圣战者的战争尚且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它已经实现了自身的战略目标，还有一点也非常明显：这场战争和其他所有战争一样，正慢慢走向终结。

人们都预测这是一场持久战，甚至有观点认为，美国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将持续一个世纪。但是，就像通常所见到的那样，那些看似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事情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转瞬即逝的插曲。回想一下我们之前所使用的20年周期分析法：冲突可能会持续下去，但美国面对的不再是战略性的挑战。基地组织未能实现目标，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赢得战争，但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美国能击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已经足够了。21世纪伊始，美国就赢得了开门红，但这个成功从表面来

看不但像失败，更像是一场深深的政治和道德尴尬。[1]

基地组织2001年袭击美国，其目的不在于对这个国家发动一次攻击，而是想证明美国的软弱和自己的强盛。基地组织相信，揭露美国的弱点会削弱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以及印度尼西亚等亲美的伊斯兰国家的实力。基地组织想要颠覆这些国家的政府，因为它知道，只有控制一个比阿富汗强大的国家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在他们看来，阿富汗与世隔绝且过于弱小，只能作为一个临时基地。

点燃火药桶的南斯拉夫

很明显，苏联的解体给国际体系带来了巨大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尤其让人意外。势力相当的美苏两大强国实质上已经稳定了整个国际体系。这种情况在苏联的边境线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当时，边境线两边的国家都为战争做好了准备，例如，在被冷战冰封的欧洲，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引发战争，因此，苏联和美国都极力遏制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冷战最有趣的一点就是美苏双方相互遏制，但都不会诉诸武力，苏联既没有袭击德国，美国也没有入侵波斯湾。最重要的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核战浩劫”。

仔细审视过去20年非常必要，这20年是此后100年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将在这一章花费更多精力探讨过去，而非展望未来。苏联的解体犹如在一场激烈的拔河比赛中，一方突然变弱松开了绳子，没有放手的一方虽然获胜，但也失去了平衡，因此，这种胜利掺杂着巨大的困惑和矛盾。此前被双方锁定的缆绳突然松弛下来，并且开始以无法预测的方式运行，这种情况在两大集团的接壤边界上尤为突出。

一些变革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德国统一，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重获自由，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摆脱了苏联统治。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在原来的基础上分裂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其他变革则要血腥

得多，罗马尼亚经历了喧嚣的国内革命，南斯拉夫则四分五裂。

事实上，在所有与苏联接壤的国家中，南斯拉夫是人为拼凑痕迹最严重的国家。它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是由不同民族、种族和宗教交织而成，矛盾重重。“一战”的获胜者在理论上认为，为了避免巴尔干再次发生战争，应该创建一个统一实体，使所有分裂的部分组合成一个单一国家。这是个有趣的理论。但南斯拉夫是一系列僵化、陈腐的国家的集合体，那些由远古征服者留下来的、充满历史积淀的小国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

历史上，巴尔干半岛一直是欧洲的火药桶。这里是罗马通往欧洲的必经之路，也是土耳其进入欧洲的中转站。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于巴尔干，每个征服者都留下了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彼此之间互相仇视、充满敌意；每个战争集团都对这里其他的民族和宗教实施了大规模惨无人道的暴行，而受此虐待的民族和宗教又都将仇恨铭记于心，就好像这些事情刚发生在昨天。这个地区根本不存在遗忘和原谅。

南斯拉夫在“二战”中分裂，克罗地亚站在了德国一边，而塞尔维亚则成为同盟国的一员。战争结束后，二者被共产党联盟领导下的铁托统一。南斯拉夫也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反对苏联，它不想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于是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政策。夹在北约和华约之间的南斯拉夫组成了一个单一国家，但极不稳固。[2]

1991年，当这个角力场瓦解之后，南斯拉夫分崩离析，犹如一个政治断层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地震。这个古老并且被冻结已久的民族突然发现自己重新获得了行动自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波黑、马其顿以及斯洛文尼亚等一战前从未听说过的国家突然冒了出来。在这些国家内部，从邻国移民来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活跃起来，纷纷要求独立。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将极大地影响21世纪早期的世界局势。

南斯拉夫战争以前一直被误认为是一个简单的局部现象，一次独特的事件，但事实上远非如此。它是对苏联解体做出的最早也是最轰动的

反应，此前被压抑了50年之久的激情突然被重新点燃，固定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它可能，甚至一定是全球体系转变带来的一个地区现象。除此之外，南斯拉夫战争也绝非一个单一现象，它只不过是第一个断层（印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群山以北方向的延伸线）引发的结果。南斯拉夫战争拉开了由苏联解体引发的更大动荡的序幕。

冷战结束，伊斯兰世界动荡开始？

美苏冲突的区域横跨苏联外围区域。冷战结束时，苏联的边境有三个不同的地段：从挪威一直延伸至德国和捷克边境的欧洲段，从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直到中国的亚洲段，以及从阿富汗北部一直延伸到南斯拉夫的地段。苏联解体对第三个地段的影响最大。南斯拉夫率先解体的混乱状态将逐渐蔓延至整个地段，甚至殃及一些与之不相邻的国家。

从南斯拉夫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广大区域在很大程度上被卷入冷战。虽然冷战期间，有些地区也发生了一些区域冲突，比如伊朗从原来的亲美立场转变为同时反美和反苏、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两伊战争，但该地区却因冷战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维持着自身的稳定。不管这里发生过多少国内冲突，但从未完全爆发，也未升级为全球“热”战。

随着苏联解体，这个地区的稳定态势不复存在。这片从南斯拉夫延伸至阿富汗，向南深入阿拉伯半岛的区域是全球三大穆斯林主要聚居区之一，其他两个聚居区是北非和东南亚。这一区域面积广大，国家众多，而且民族分歧非常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一地区，但我们将其看做单一地区，因为这里是苏联包围圈的南线。

冷战的分界线从这里直接穿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国都是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苏联加盟国，后来都在苏联解体后建立了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也有一些穆斯林地区，比如车臣。

上述整个区域历来就极不稳定。穿过这一区域需要历经周折，它也是从亚历山大港到英国的征服者们的贸易和入侵路线。这个地方一直是地缘政治的一个火花点，但直到冷战结束，这个火药桶才真正被点燃。苏联解体后，它的六个加盟共和国突然宣布独立。南部的阿拉伯世界不是失去了靠山（伊拉克和叙利亚），就是失去了敌人（沙特和其他波斯湾国家）。印度也失去靠山，而巴基斯坦则感觉到从印度的威胁中解放了出来——至少是暂时的解放。整个国际关系体系被扔到九霄云外，任何极其微小的稳定状态都会被破坏。

1992年，苏联从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撤军，犹如退潮。许多已经遭受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奴役的国家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它们没有自己的政治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也没有功能齐全的经济体系。与此同时，美国对该地区的兴趣也日趋减小。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结束后，美国认为阿富汗这类国家似乎作用不大。冷战已经结束，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之前美苏激烈争夺的地区已经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发展了。

详细描述这个地区（尤其是阿富汗）是如何陷入混乱状态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它不像南斯拉夫发生的频繁战端那样具有借鉴意义，但可以被总结为如下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苏联解体，美国帮助阿富汗创建了一支能够抵抗苏联的力量，而在苏联解体后，这些力量反过来又将矛头对准了美国。这些经过秘密训练并且熟知美国情报机构运作过程的人员发动了一系列反美行动，而这些行动在2001年9月11日达到高潮。美国以入侵行动作为针锋相对的回应，首先是阿富汗，而后是伊拉克，很快，这个地区就变得面目全非。

就像“二战”后苏联遇到的情况一样，美国将伊斯兰圣战者作为打击目标，不得不应付自己亲手培育出来的“怪物”。但这还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更加严峻的两难处境在于，苏联解体打破了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该地区秩序的国际体系。不管有没有基地组织，苏联加盟共和国及其

南部的穆斯林国家都将变得动荡不安，就像南斯拉夫一样，这种动荡不安必将以某种方式将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拉进泥潭。这是一场完美风暴。从奥地利边境到印度克什米尔的广大地区都动荡不安，美国试图使它们处于可控状态，但结果很难预料。

这一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值得关注，尤其是考虑到将在下一章探讨的人口趋势问题。穆斯林世界内部极不稳定性。在人口趋势变化的推动下，伊斯兰传统人士对改变习俗（尤其是关于妇女地位的问题）的抵制，是该地区不稳定性背后的重要推动力。穆斯林传统人士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破坏了这个地区的稳定，而美国则对日益增长的世俗化情绪负有责任。这像是对该地区状况的肤浅解读，但就像我们将看到的，这比第一眼看到的表象有更深、更广的意义。家庭结构的改变、对这种改变的抵制，以及“9·11”事件，三者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更广泛意义上的地缘政治观点来看，“9·11”事件终结了从冷战结束到下一个时代（美国—伊斯兰圣战者战争）开始前的真空期。如果我们将胜利定义为重新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或伊斯兰帝国的话，那么伊斯兰圣战者根本不可能获得成功。伊斯兰世界难以克服极为严重的内部分歧，而强大的美国又不可能被轻易击败，如此混乱的局面永远也不可能使伊斯兰圣战者获胜。

事实上，这场战争是大国角力场转移造成的，它不会持续太久，只是暂时爆发的区域冲突。伊斯兰世界的种族和宗教分歧意味着，即使美国不能继续控制这个地区，伊斯兰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稳定的政权。伊斯兰世界的分化和动荡已经持续超过一千年，很难立即变得团结。而且，即使美国在这个地方被打败，也不会削弱它统治全球的基本国力。一如越南战争，它仅仅是过眼云烟。[3]

同时，美国和伊斯兰圣战者之间的冲突似乎又是如此激烈和势不可挡，因此，很难想象这场战争将草草收场。一些言辞谨慎的人都认为这场冲突将支配整个世界，但从本书此前阐述的20年周期的观点来看，到

2020年，美国和伊斯兰圣战者之间的冲突依然主导世界走势的可能性非常小。事实上，目前正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事件最终将无足轻重。如果美国能继续保持国力的上升趋势，那么到2020年，美国要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挑战。

伊斯兰世界打乱了美国的世界大棋局

美国的活力还包括另一个我们必须阐述的元素：促成美国外交政策的总体战略。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看起来一团糟，而且很随意，但实际上，这都是按计划行事。如果一个人能出来盘点全局的话，那么美国这些看起来随意的行动实际上都颇有深意。

美国还没有在心理上为“9·11”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不管是否准备好，这场“地震”都已爆发，而美国则以适合其总体战略的方式给予了积极回应。从巴尔干半岛到伊拉克，美国都自动对当地局势做出了回应，而它似乎没有仔细审视自己正在做什么或者这么做的原因。美国就好像是在自动领航仪上进行操作，不论是克林顿总统，还是布什总统，他们都一直在运作这种模式。

政策结束之时，就是总体战略开启之日。设想，假如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没有在1940年第3次参选总统，那么日本和德国的做法就会有所不同吗？美国会容忍日本统治西太平洋吗？会接受英国战败以及英国军舰落入德国之手吗？战争的细节可能会不同，但很难想象美国会袖手旁观，或者战争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或者这场由美国总体战略决定的冲突的大体轮廓发生改变。

冷战期间，除了遏制苏联之外，美国还可能存在其他总体战略吗？首先，美国不可能入侵东欧，因为苏联军事力量非常雄厚；其次，美国也不可能允许苏联占领西欧，因为如果苏联占领西欧的工厂，长期下来，苏联的国力就会凌驾于美国之上。因此，遏制苏联不是随机性的选

择，而是美国能对苏联所做的唯一反应。

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总体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能够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立陶宛的目标是摆脱外国的干涉（尤其是俄罗斯）和占领从而恢复自由，但其经济、人口以及地理状况决定了它不可能永久性地实现目标，只会偶尔达成心愿。西班牙的战略目标以16世纪自身的经济地位为后盾，但受到军事实力的限制。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已经实现大多数的战略目标（我将在后面对此进行阐述）。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都开足马力向这一总体战略目标挺进。

一个国家的总体战略已经根植于它的DNA中，而且看起来十分自然，以至于政治家和将军们都没有特别留意到它，只是在潜意识的逻辑中深受总体战略的影响。但从地缘政治或者宏观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总体战略和逻辑都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推到了风口浪尖。

总体战略并不总是与战争相关，它涉及能提升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所有进程。但对于美国来说，它的总体战略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多地涉及战争，以及战争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美国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好战的国家。

自宣布独立后，美国有10%的时间都处于战争时期。这个数据还只是包括了一些主要战争，如1812年美英战争、美墨战争、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并未囊括美西战争以及“沙漠风暴行动”这类小规模的冲突或军事行动。整个20世纪，美国有15%的时间都在打仗；在20世纪后50年，这一比例升至22%；而21世纪以来，美国更是不断卷入各种战争。战争是美国历史的核心，它的频率正在不断增大。战争渗透进美国文化，并且深植于美国的地缘政治之中。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理解其目的。

美国诞生于战火之中，而且还在以更快的步伐进行战斗。挪威的总体战略可能更多的是关于经济而非战争，但美国的战略目标及其总体战略都涉及战争，这主要是出于恐惧。其实，许多国家也是如此。罗马并

没有打算征服世界，它只是想保护自己，而正是在保护自己的过程中，罗马逐渐成为一个帝国。可能最让美国满意的地方在于自己不会被英国击败，就像1812年的那次战争一样。不过，每当一种恐惧消失之后，美国又会产生新的弱点和新的恐惧。每个国家都会受到一种恐惧感的驱使，那就是害怕失去现有的东西。以下提到美国总体战略的部分，我们不妨从“恐惧”这个角度来理解。

美国有五个地缘政治目标来推动其总体战略。从下文中你可以发现，其重要性、野心和困难程度都在递增。

美国军队称雄北美大陆

如果美国依旧是一个坐落在海岸和群山之间、由互不相关的各州组成的国家，那么它绝不可能生存下来。它不但需要统一，而且还需要将国土延伸至阿勒格尼山脉和落基山脉之间的广大区域。这不但给美国提供了战略纵深（指作战部队由边界至中心可做战略性运动的地域空间，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的重要因素。——译者注），而且还赐给了美国全球最肥沃的土地。更重要的是，这使美国拥有可通航河流的优越地理位置。这条河流把美国的过剩农产品运送到全球市场，并因此创造了一个商业农场主（businessmen-farmers）阶级，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1803年买进路易斯安那使美国在名义上拥有了这块土地的所有权，然而，直到1814年的新奥尔良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领导的军队击败了英国]，美国才拥有了这片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因为新奥尔良是当时整个河流体系中的一个盲点。如果说约克镇战役造就了美国，那么新奥尔良战争则为美国经济打下了基础。而对这一切提供安全保障的是新奥尔良以西几百英里远的圣哈辛托。墨西哥军队在那里被击败，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再对密西西比河流域形成威胁。墨西哥军队的战败并非必然。那时，墨西哥在许多方面都比美国更

发达和强大，它的战败使得美国军队成为北美洲的统治力量，也使这个大陆成为富饶辽阔且无人匹敌的美国的囊中之物。

绞尽心思做西半球的“老大”

在北美洲的地位得到保障之后，拉丁美洲便成为唯一紧迫的威胁。事实上，南北美洲都是岛，没有实际相连，大规模军队不可能跨过巴拿马和中美洲。将南美洲统一为一个实体还是很遥远的事情。看看南美洲的地形图，就可以发现当中有一大块都是无法通行的地带。

因此，南美洲不可能出现横跨大陆的力量：美洲大陆被一分为二。也正因如此，南美洲不可能出现一个威胁美国的本土力量。

美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欧洲国家在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域的海军基地，以及墨西哥的陆上力量。这也就是门罗主义的核心。很久以前，阻止欧洲在上述区域建立基地就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事实上，直到“二战”前，这一任务还没有完成。1940年之前，英国海军遍布美国东海岸，但在这一年后，美国以向英国租借驱逐舰和其他装备为条件从英国手中换来这些基地的使用权。至此，在拉丁美洲，唯一能让美国担心的就是其他国家建立的军事基地。

用强大的海军为美国打造“金钟罩”

1812年，英国海军驶入美国的切萨皮克湾，并火烧华盛顿。整个19世纪，美国都害怕英国会对北大西洋实施高压政策来关闭自己的海洋通道，围困自己。这种恐惧并非杞人忧天，实际上英国不止一次考虑过这种做法。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这也是美国从美西战争到冷战期间对古巴心存成见的根源。

在19世纪末确保西半球的安全之后，美国又转移兴趣，致力于控制

能够抵达美国海岸线的航道，使其免受外国海军力量的侵扰。美国首先保证了它的太平洋航道的安全。在南北战争中，美国得到了阿拉斯加，而后在1898年取得夏威夷。通过掌控补给舰的停泊地点，这两步行动消除了任何敌方舰队从美国西岸接近其陆地而造成的威胁。美国又借用“二战”中英国的弱点控制了大西洋，将英国从美国近海岸驱逐出去。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创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海军，甚至连英国海军都不能在没有得到美国允许的前提下在大西洋实施行动。这使得美国能够有效地避免外敌的入侵。

紧掐“世界咽喉”的海洋霸主

美国在“二战”中崛起，它不但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而且其海军基地遍布世界各地，这一事实改变了世界的运行方式。就像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在海洋中航行的任何船只（无论军用还是商用，从波斯湾到中国南海），美国海军都不会对其进行直接监控，但可以选择监视、拦截或击沉对方。自“二战”结束后，与美国的制海权相比，全世界现存海军力量的总和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这强化了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地缘政治现实：美国控制了全部海洋。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对全球海洋的控制不但是美国安全的基石，也成为美国左右国际体系能力的基础。如果美国不允许，任何人在海洋上都寸步难行。因此，保持对全球海洋的控制是美国唯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

“胡萝卜加大棒”压制潜在对手

在完成统治全球海洋这一前所未有的伟业之后，美国当然想保持这种优势。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阻止其他国家建造海军，而这又可以通过确定没有任何国家存在建造海军的动机或者拥有建造海军

的资源来实施。美国的策略之一是“胡萝卜政策”，这项政策确保每个国家都可以在没有海军的前提下有权使用海洋；另一项政策是“大棒政策”，其宗旨是以陆地对抗来束缚潜在敌手，迫使他们将大部分军费花在陆军和坦克上，而只有很少一部分用在海军方面。

冷战中，美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崛起：不断膨胀的利益和坚定不移的策略。不断膨胀的利益在于破坏任何亚欧大陆国家的陆上安全，从而使它们无暇建造海军。既然亚欧大陆已经不存在单一国家的威胁，美国就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地区性大国的崛起上，这些国家所形成的区域安全程度可能足以使它们开启自身的海洋势力。因此，美国致力于创建一系列不断变换的联盟，试图束缚任何潜在的地区性大国。

美国必须准备好对整个亚欧大陆进行常规或突发干预。苏联解体后，美国确实参与了一系列旨在维持区域平衡，阻止地区性大国崛起的行动。第一个重大干预发生在科威特，美国通过干预科威特战争击溃了伊拉克的野心。当时，苏联虽然已经解体但其影响力还未彻底消除；第二次干预是在南斯拉夫，目的是阻止塞尔维亚控制巴尔干半岛；第三次的一系列干预行动是在伊斯兰世界，目的是遏制基地组织（或其他任何人）创建一个牢固的伊斯兰帝国的欲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干预都是这一系列行动中的一部分。

相对于美国的总体战略来说，这些干预都微不足道。在伊拉克，美国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仅用了不到20万军队，而阵亡士兵更是不到5 000人，是越南战争中伤亡数量的6%～8%，更只占“二战”伤亡数量的1%左右。对于一个人口超过2.5亿的大国来说，这点损失真的不算什么。美国倾向过分夸大小规模干预，这是因为美国是个不太成熟的国家。

上述内容使我们理解了美国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袭击的回应，以及许多其他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实现战略目标之后，美国还有一个终极目标，那就是阻止亚欧大陆上崛起任何可能对美国利益造成威胁的大

国。不过，就像下文将阐述的那样，还存在一个矛盾，美国实施这些干预的目的永远都不是为了获得什么（抛开政治辞令的粉饰），而是为了阻止。美国想要阻止，甚至破坏某些可能会崛起的另一个强国的地区稳定性。这也就解释了美国对伊斯兰恐怖袭击所作的回应，它想阻止一个幅员辽阔、实力雄厚的伊斯兰国家的出现。

美国对亚欧大陆的和平丝毫没有兴趣，那只不过是政治辞令。美国也没有兴趣在一夜之间赢得一场战争，就像越南和朝鲜战争。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的目的就是阻止一个国家的崛起或破坏这个地区的稳定性，而非强加一种秩序。即使美国彻底战败，但如果是在合适的时候发生，这也是可以接受的结果。不过，动用最少的力量（当绝对需要时）来维持亚欧大陆的力量平衡——现在是，以后也仍然是美国21世纪对外政策的驱动力。未来将有无数个科索沃和伊拉克在未知的地方和未知的时间出现。对于美国而言，将稳定巴尔干和中东当做自身的首要目标是非常不明智的。但是，既然美国的首要目的可能仅仅是遏制或破坏塞尔维亚及基地组织的稳定性，那它的干预行动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在这些地区，似乎永远不会有任何接近“解决办法”的办法出现，也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决定胜负。

对“全球公敌”敢怒不敢言

现在，国际体系已经严重失衡。美国如此强大，以至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几乎不可能控制其行为。国际体系的自然趋势是走向均衡。在一个失衡的世界中，弱小国家都面临来自强大国家的威胁。因此，它们倾向于与其他国家结盟，以致能在力量上与强国相抗衡。越战败北之后，美国与中国结盟以遏制看起来正在变得极其强大的苏联。

在21世纪创建一个联盟来遏制美国将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弱小国家会发现，与美国共处比加入反美联盟更容易——创建一个团结一心

的联盟并非易事，而且一旦这个联盟分崩离析（通常情况都是这样），美国可能就不会那么宽宏大量了。

结果，我们看到了以下这种矛盾：一方面，各国都对美国深感愤怒和恐惧；但另一方面，每个国家仍试图寻求一种与美国和睦相处的方法。这种失衡状态将主导21世纪，各国将费尽全力遏制美国的发展。21世纪危机重重，尤其是对那些美国之外的国家而言。

地缘政治学中有一个核心衡量指标：误差幅度（**margin of error**）。它预测一个国家能够犯错误的空间有多大。误差幅度包含两部分内容：一个国家所犯错误的类型以及这个国家的国力大小。一些国家的误差幅度非常小。这类国家很容易被外交政策中的细枝末节所困扰。它们意识到，即便非常小的失误也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因为它们的国土面积狭小，而且所处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与此相反，爱尔兰却拥有很大的误差幅度。它的国土面积虽然也很小，但周围空间广阔。

美国拥有的误差幅度非常大。它在北美非常安全，而且国力十分强大。因此，美国倾向于在全球以随意的方式炫耀其实力。美国并不笨，只是不需要那么谨慎——事实上，太过谨慎经常会降低效率，就像一个银行家准备发放不良贷款，是因为他希望自己能放长线，钓大鱼。在其他国家看来，美国的政策常常很鲁莽，而且后果可能十分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但美国一切照旧，进行得轰轰烈烈。

这种情况在越南出现过，现在，这一幕又在伊拉克重新上演。在美国历史上，这些冲突都只不过是一些个别片段，几乎没有任何持续性的影响——除了对越南人和伊拉克人自己。美国仍是一个年轻和野蛮的国家。它很容易变得情绪化，并且缺乏一种用历史观点去看待问题的意识。实际上，这也提升了美国的国力，因为可以通过提供情感资源来使它克服逆境。美国经常采取过激行动，那些在某一时刻看似是巨大灾难的事件却能激发美国去果断地解决问题。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会采取过

激行动，一个成熟的国家会寻求平衡，而一个衰退的国家则会失去恢复平衡的能力。

美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作为统治全球的大国，它甚至只是个新生儿。就像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青少年，它会对一些事产生过激的情绪，而这些事会在几年之后被忘得一干二净。黎巴嫩、巴拿马、科威特、海地、索马里、波斯尼亚以及科索沃等一些国家在当时看起来都格外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影响。但现实是，在美国，很少有人记得这几个国家，即便记得，他们也不能清楚地解释当初自己到底为什么卷入那些冲突。美国常因一时的冲动而过快地消耗了自己的实力。

反过来看，上述现象的关键在于，那些国家的人民都清楚地记得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各种纠葛。在美国看来如过眼烟云的事却是其他国家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这里我们发现了21世纪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不对称现象。美国在全世界都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它将自己置于大量的全球冲突之中，任何其他国家的参与都不甚重要。不过，对于那些作为美国利益目标的国家来说，任何干预都是一次大变革。通常，这些利益目标国在面对美国的行动时都显得很无助，而且这种无助会逐渐演变成愤怒，即便冲突并不激烈。当作为“公敌”的美国刀枪不入而又冷漠无情的时候，这种愤怒就会不断膨胀。21世纪历史将呈现出两种面貌，一方面，美国对自己的行动结果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全球其他国家都对美国进行抵制并心怀怨愤。

美国与穆斯林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随着美国—伊斯兰圣战者战争的逐步终结，美国对抗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第一防线将深入穆斯林国家内部。这些国家是基地组织的最终目标，但不管伊斯兰和西方的观点如何，穆斯林国家都不打算将政权交给基地组织。与此相反，它们将运用自己的国力（如情报、安全以及军事

力量）来镇压基地组织。

基地组织的失败就相当于美国的胜利，一个混乱分裂的伊斯兰世界意味着美国已经实现其战略目标。自2001年以来，美国一直在伊斯兰世界制造混乱，制造对美国的憎恶，或者将在未来袭击美国的恐怖分子，但该地区的动荡不安使其没有衍生一个联合的区域性超级大国。事实上，这个地区比以前更加破碎，这也可能就是它在这个时代的最终结局。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战争似乎都将以“败北”或“僵局”等不利于美国的结局而告终。毫无疑问，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战争技巧是笨拙的、失之优雅的，而且在许多方面都不老练。事实上，美国在弱化冲突以及使用力量方面都还很莽撞幼稚，但从一个更加广阔、更具战略意义的水平上来看，这无关紧要。只要穆斯林相互争斗，美国就赢得了战争。[4]

这并不代表伊斯兰世界在未来不会产生一个强大的、对美国利益形成挑战的单一民族国家。历史上，土耳其就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大国，我们将在下面几章看到，它将再次崛起。它的崛起不是苏联解体引发混乱的结果，而是源于新的活力。愤怒不会创造历史，但国力的确会。国力可能会因愤怒而得到提升，但它更多地来源于基本的现实，如地理、人口、技术以及文化等。所有这些都将决定美国国力，正如美国国力将决定21世纪的历史一样。

注释

[1] 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255～256.

正如霍奇森所说，某些中东国家的建立虽然是西方殖民地时代地图任意裁定的结果，但在古代也有其地理基础。这些国家的多样性，加上宗教、意识形态、民主化的力量，竞相操纵其发展进程，并进一步为阿

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理论提供部分具体论据。处于地球干旱地带最核心的地区，也是地球上最不稳定的地区，这是21世纪世界政治最关键的事实。

中东看起来非常无序，令人眼花缭乱。王国、苏丹、神权、民主、军事独裁，其共同边界像是由一把没有握稳的剪刀任意裁出。整个区域包括非洲之角、北非、中亚，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印度次大陆，构成一个压缩版的“不稳定轴心”（axis of instability）。在这里，各大洲、历史道路网、海上通道相互交错衔接，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各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70%和40%。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布拉肯提到的所有病症，本地区都容易发生：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从众心理、重叠覆盖的导弹射程范围，还有唯利是图的传媒，其观点的偏执程度丝毫不亚于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事实上，中东是除朝鲜半岛以外核扩散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2］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5.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欧”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身处地理之中的文化，或者就是这种文化组成了地理的每一个节点，像山脉一般连绵不绝，或像苏军坦克的履带一般回环往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随着种族冲突在南斯拉夫爆发，“中欧”这个概念竟从统一体变成了分支；

“巴尔干”也在人们的意识中被肢解出来，成为了新近东的一部分。

巴尔干是古老的土耳其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同义词，崇山峻岭阻碍了发展，这里的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低下，比起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帝国，要落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始终遭受着一定程度的贫困和压迫，但在北方，即前苏联的“中欧部分”则对此并无体会。

我们目前聚焦于地理，是在坚持部分的或迟疑的决定论，承认族群和地形之间的明显差异，但并不过份简化，并且留下许多可能性的窗口。自由国际主义者普遍支持在巴尔干地区进行干预，但反对入侵伊拉克，就反映了这一精神的细微差别。他们凭直觉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个主要的地理事实，那就是前南斯拉夫处于前奥斯曼帝国最西端，毗邻中欧，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处在前奥斯曼帝国最混乱的东部末梢。因为这一事实一直影响着那里的政治发展，在伊拉克的干预将被证明只是这种影响的延伸。整个冷战期间，南斯拉夫是一个比其巴尔干邻国更加开放的社会，但是种族和宗教分歧几乎毁掉了它。

［3］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64～65.

汤因比悲叹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声称“在‘西方化’目力所及范围内，任何伊斯兰世界国家都难逃其手”。伊斯兰教构成了世界上的一大文明体，这是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它被确立为一个政体。正如霍奇森所说，文明有许多不同的人口节点，丰富多彩的前伊斯兰时代已过去，现在轮到后殖民时代粉墨登场了。伊朗高地就其本质而言，一直与美索不达米亚有政治和文化联系，历史上不乏明显的证据；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为伊朗重新进入该地区打开大门。事实上，第3章“地理的历史轮廓”中说到，波斯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不断转移的边界，正是幼发拉底河本身，只不过现在它正处于伊拉克的心脏地区。

［4］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41.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伊斯兰教也部分地上演了城市化剧目，其范围横跨北非和大中东，这也是2011年激进的民主示威者推翻各个阿拉伯政权的故事。忘记阿拉伯游牧民族或高原沙漠上绿洲居民的形象吧，现在的他们大多是城市居民，混迹于拥挤破旧的都市民居中。城市生活的人情淡漠，更助长了宗教感情的加深。在古老的村庄，宗教是广义的大

家庭之间日常传统和生活的自然延伸；但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穆斯林们逐渐走进了贫民窟式的生存环境，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为了保持家族的凝聚力，让年轻人不致滑向犯罪深渊，宗教必须经过重新改造，刻意显得惊世骇俗，或具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国家的职能因此被削弱了，或至少让它三分，有时甚至不得不容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宗教行为，这些都是城市化推进的后果。最终，新的宗教社区站稳了脚跟，超越了传统的地理障碍，甚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空间格局。

第3章
混乱的秩序
文化战争、人口爆炸和计算机的逻辑

以圣经和计算机为代表的价值观和积极创新的不稳定结合体构成了美国文化的根基。文化冲突甚至成为了本·拉登与美国对立的根因。作为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人口增长的停滞不仅造成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悄然无息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风向。随着美国国力的继续增长，未来以混乱的家庭模式和计算机逻辑为代表的社会模式是否将主导世界？

“默罕默德”与“耶稣”背后的较量

2002年，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在他《致美国的信》中说道：“你们是一个把女人当做消费品或者广告工具的国家，你们号召消费者去购买她们，让她们来服务乘客、游客以及陌生人，以此来提高利润，而后你们再高喊着支持妇女解放。”

这段引文表明，基地组织为之战斗的是传统的家庭观念。这并不是他们纲领的次要部分，而是核心。传统家庭是围绕一些清晰界定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第一，家庭是妇女的主要活动范围，而家庭之外则是男人的领域；

第二，性生活被局限在家庭以及住所内，私通以及家庭外的性生活是不可接受的；

第三，妇女的主要任务就是生育和抚养下一代。因此，需要对女人进行极端控制来保全家庭以及社会的完整。

有趣的是，本·拉登的一封信就把伊斯兰世界关于女人的问题讲清楚了。他之所以憎恨美国，是因为这个国家提倡的关于女人和家庭的观点和他完全相左。

基地组织的观点并不为本·拉登或者伊斯兰所独有。这个组织准备走多远可能是它自己的事，但妇女和家庭问题，是罗马天主教、新教原旨主义、正统的犹太教以及佛教的各个分支都必须面对的。在这些问题上，所有的教派内部观点不一，所有的社会也是如此。在美国，我们谈论"文化战争"，其主要分歧就是关于家庭及其定义的问题。所有社会都在传统主义者和试图重新定义家庭、妇女以及性的革新者之间分化。

这场冲突将会在21世纪愈演愈烈，但传统主义者会一直处于战争的守势，而且必将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在于，过去几百年，人类生活的基本构造（尤其是妇女的生活）已经改变，家庭结构也已经随之发生变化。欧洲、美国、日本这些国家所历经的变化，正蔓延至世界其他地方。这些问题将使社会分化，但并不能阻止家庭变革的步伐。

这并不是说改变本身是好是坏，而是说这一趋势不可阻挡，因为全世界的人口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当前，世界人口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全球的出生率出现急剧下降趋势。有一点需要重申：在世界人口方面，最有意义的统计数据就是出生率的整体下滑。妇女的生育数量每年都在减少。这不仅意味着上两个世纪的人口爆炸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而且意味着妇女养育子女的时间将大幅减少，即便女性的人均寿命已经上升。

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我要解释的是，这件再平凡不过的事情，是基地组织（甚至更多类似组织）形成和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同时，它也说明了为什么人口不断增长（无论是通过征服其他民族，还是生育更多婴儿）的欧洲时代，正在被美国时代所取代。与欧洲不同，美国历来是

一个人口不足的国家。现在就让我们从人口爆炸时代的终结来开始阐述吧。

人口爆炸使得出生率剧降？

近几十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全球正面临严峻的人口激增问题。失控的人口增长过度消耗了稀缺资源，破坏了环境。人口越多，需求也就越大，如食物、能源以及消费品，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及其他生态灾难，但在人口激增的基本前提下，人们一致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如今这一模式已经不再适用。我们已经目睹了先进工业化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而由于出生率下降，年轻工人的数量根本不能填补日益增多的退休老工人造成的岗位空缺。欧洲和日本正在经历这种困境，美国不久也将品尝到其中的滋味，但日益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是由人口增长停滞引起的第一个问题。

人们假设，虽然欧洲的人口增速可能会减弱，但全球总人口仍将处于失控的增长状态，原因是不发达国家的出生率非常高。事实上，现状正好相反，全球各地的出生率都在急速下降。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正在下降，世界其他地方也将紧随其后，而这一人口趋势的转变将成为塑造21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力量。[1]

世界上一些地位极其重要的发达国家，如德国和俄罗斯，将面临严重的人口负增长问题。今天，欧洲人口总数约为7.28亿。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欧洲人口数量将降至5.57亿～6.53亿，降幅非常大。5.57亿是假设平均每个妇女将生育1.6个孩子，而6.53亿则假设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是2.1个。当今欧洲，平均每个妇女的生育数量是1.4个。这就是我们关注未来更低的预期生育率的原因所在。

从传统观点来看，人口下降意味着国力下降。对于欧洲来说，这确

实是事实，但对于美国这类国家来说，想在未来几百年继续保持政治影响力，维持人口水平或者寻找其他的技术手段增加正在日益下降的人口数量将至关重要。

要想论证这一极端论断，我们必须整理一下思路，并在考虑其结果之前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的了解。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核心问题，我们需要理解它发生的原因。

我们从简单的数据开始。从1750年到1950年的200年间，世界人口大约从10亿增至30亿。从1950年到2000年的短短50年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全球人口从30亿增至60亿。在此期间，不但世界人口在持续增长，人口出生率也呈现出惊人的加速增长趋势。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全球都将因此面临灾难。

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人口出生率并没有持续增长下去，而是正在急剧下降。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从2000年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持续增长，但只会增加50%，为此前50年增速的一半。本世纪后50年，这一数字将更加有趣：全球人口会继续增长，但增速仅为10%。这就好像是踩了急刹车。事实上，有些人（不是联合国）甚至预期，全球总人口将从2100年开始下降。

这一趋势将最先在先进工业化国家中显现出来，其中许多国家的人口都将明显下降。巴西和韩国这类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将在本世纪中叶趋于稳定，到2100年开始缓慢下降。世界上只有一些不发达地区，如刚果和孟加拉国，其人口到2100年还会继续增长，但增幅肯定要小于过去几百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人口爆炸的时代即将结束。

让我们来仔细了解一个临界值——2.1，这是为从总体上维持全球人口水平而要求每个妇女必须生育的平均数量。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女性的平均生育数量高于这个数字，全球人口就会增长，反之就会下降。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女性在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生育数量为4.5，到2000年，这一数字降至2.7。记住，这是世界平均水平。这

是一个很明显的降幅，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全球人口仍在持续增长，但增速较之以往已经减慢的原因。

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全球出生率将降至平均每个女性仅生育2.05个小孩。这刚好低于上述的“2.1”的临界值。根据不同的假设，联合国还做了另一项预测：到2050年，全球女性的平均生育数量仅为1.6个。因此，如果根据拥有最便利数据条件的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人口要么会维持稳定，要么会急剧下降。我相信，后者更接近于未来的现实情况。

1800年拥有**10**个孩子是财富，**2000**年则是灾难

世界上最发达的44个国家的人口状况更有趣。在这些国家，女性目前的平均生育数量为1.6个，这意味着人口已经开始下降。中等发达国家女性的平均生育数量为2.9个，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下降。即使是在不发达国家，女性平均生育数量也从6.6个下降到5个，预期到2050年会下降到3个。毫无疑问，出生率正在急剧下降。原因何在？这个答案可以追溯到人口爆炸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人口爆炸本身所带来的压力让人们下决心终止它。

人口爆炸有两个明显的原因：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提高。两者在重要性上旗鼓相当，也都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现代医疗、更丰富的食物，以及18世纪末期开始引入的基本公共医疗。

1800年，世界上还不存在可靠的出生率统计数据，但对每个妇女平均生育数量的估计可能在6.5～8.0个之间。当时的欧洲妇女平均生育数量与现今孟加拉国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相当，但人口却不见增长。1800年出生的许多婴孩还没到生育年龄就已经夭折。2.1的规则仍然有效，每8个新生儿中就有6个不到12岁便早早丧命。

医疗、食物以及公共卫生的飞速进步降低了婴孩的死亡数量，直到19世纪末，大多数儿童都能活到拥有自己的孩子。即使婴儿死亡率下降了，家庭模式却没有变化，人们的生育数量还和以前一样。

这不难理解。首先毫不避讳地说，人们喜欢性生活，而当时还不存在避孕措施，这就导致大量婴儿出生。人们不介意养育大量小孩，因为在那时孩子是财富的基础。在农业社会，每一双手都可以创造财富，你不需要会读书或编写计算机程序就可以除草、播种和收割。同时，孩子还是退休的保障，如果你寿命足够长的话。因为当时还没有社会保障，只有依靠自己的孩子来养老送终。因此，之所以多生育，一部分原因是出于风俗习惯，但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出于理性的经济思维。一个父亲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或者有耕种的权利，孩子要想有权使用这片土地来维持生存，就必须听从父命。

因为孩子能给家庭带来财富和退休保障，所以妇女的主要责任就是尽可能多地生育。如果妇女生育了婴孩，而且他们都能够活到拥有自己的孩子，这个家庭就会变得更富裕。这需要运气，而且从家庭和男主人的立场来看，这也是值得一试的。在性欲和对财富的贪婪的双重作用下，当时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养育更多的孩子。

习惯很难改变。当家庭成员开始全部迁居到城市时，孩子依旧是很有价值的资产。父母可以在孩子们6岁时将他们送到原始工厂里去工作，并领走他们的工钱。在早期的工业社会，工厂不需要大量熟练技工，而是需要农业劳动力，但随着工厂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他们对6岁孩童的使用也就越来越少。不久，这些工厂就需要熟练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再后来，拥有MBA学历的管理者便炙手可热了。

随着工业复杂性的提高，儿童的经济价值就下降了。为了保持自身“摇钱树”的地位，儿童不得不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这不但不会增加家庭收入，还会消耗家庭财富。儿童需要衣食住，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孩子需要受教育的程度也急剧提高。直到今天，许多“儿童”直至25岁都

在学校接受教育，没挣到一分钱。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全球最发达的20个国家的孩子平均受教育时间介于15～17年之间。

尽可能多生育的趋势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祖父和曾祖父一辈的家庭都有10个孩子。几十年前，10个孩子当中能有3个存活下来就算是幸运的。现在，他们几乎全都能存活下来。不过，1900年的经济环境让大部分孩子在青春期之前就外出谋生。

在18世纪的法国，一个家庭拥有10个孩子可能就是上天的恩赐，但到19世纪末，10个孩子对一个家庭来说可能意味着负担，而到了20世纪末，他们就成为家庭的灾难了。人们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意识到现实的改变：大多数孩子不会死亡，而养育这些孩子的成本又非常昂贵。因此，人们开始生育越来越少的孩子。生育孩子的目的更多在于享受天伦之乐，而非出于经济考虑。节育等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出生率降低，但生养孩子的净成本的增高才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很明显，孩子从财富的创造者已经转变为消费者。父母开始满足于只养育1个小孩，而非10个小孩。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平均寿命的问题。毕竟人们的寿命越长，在任何特定时间点上的人口也就更多。在婴儿死亡率下降的同时，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增加了。1800年，欧洲和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约为50岁。到2000年，这一数字已经接近80。事实上，人们的平均寿命在过去200年间翻了一番。平均寿命的持续增加是可能的，但很少有人会预计这一数据会再次翻番。联合国预计，在先进工业化国家，人们的平均寿命将从2000年的76岁升至2050年的82岁；在最贫穷的国家，这一数字将从51岁升至66岁。虽然人们的平均寿命仍在增长，但并不是呈现几何增长形式，且它的增速也在逐渐降低。这也将帮助削减人口的增长数量。

先进工业化国家几十年前发生的出生率下降的现象现在也出现在不发达国家。在圣保罗，生育10个孩子无疑是经济自杀。多生育这一习惯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改变，但它必变无疑，而且在抚养和教育成

本持续增长的情况下，这个习惯不大可能会卷土重来。在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增幅放缓的双重作用下，人口增长的趋势终将结束。

人口停止增长将如何影响世界？

所有这些与21世纪的国际影响力有何关系？人口增长趋势的停止将影响所有国家（就像我们将在后面几章看到的那样）及其民众的生活方式。人口数量减少会影响军队数量、国内劳动力以及内部政治稳定等。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不但会影响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也将改变人们，甚至国家的行为方式。

让我们考虑以下三个关键的事实：发达国家中人均寿命的延长（高达**80**岁），妇女的生育数量的下降以及孩子受教育时间的增长。现在在发达国家中，大学教育被认为是维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的最低教育水平。大多数学生本科毕业时都已经22岁，如果继续深造，那么他们的从业年龄将延迟到25岁。当然，并非每个人都遵循这种模式，但有相当比例的人是这样的，他们其中的大多数日后将成为国家政治和经济界的精英。

婚姻模式也因此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们的婚龄推迟，生育时间也相应延后。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这对女性的影响。200年前，女性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养育小孩。她们不断生育、抚养孩子（甚至常常亲手埋葬夭折的婴孩）直到自己辞世。这是女性对家庭幸福和社会应尽的义务，也是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务。

在21世纪，婚姻模式发生了巨变。假设一个女性在13岁进入青春期，并在50岁步入更年期，那么她的寿命将达到她祖先的2倍，而其中超过一半时间，她都无法生育。假设一个女性一生养育两个孩子，她的孕期将少于18个月，大约占她整个寿命的2%。我们再假设一个很常见的模式：妇女养育两个孩子的时间间隔为3年，每个孩子都在5岁入学，

当年长的孩子开始读书之后，这位母亲就能返回工作岗位。

如此算来，这位母亲一生中花费在生育以及全职抚养孩子方面的时间是8年。在人均寿命是80岁的情况下，专门花费在生养孩子方面的时间惊人地降至她整个寿命的10%。哺育孩子从一个女性的主要活动降至次要活动。此外，许多现代女性只生育一个孩子，而且还可能在孩子5岁之前采取日托或其他抚养形式，这使得女性的整个生活结构被完全颠覆。

我们可以在人口方面找到女权主义运动的根源。既然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她们就比50年前更少地依赖男人。过去，在离异或者丧夫的情况下养育孩子对于女性来说是场彻头彻尾的经济灾难，但现在的情况与从前大不相同，尤其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来说，结婚不再是建立在经济需要之上了。

这使得结婚更多的是为了爱情而非需求。爱情是飘忽不定的，它来无影去无踪。若结婚仅仅是靠一时的激情，那么离婚率必将上升。经济需求的下降打破了婚姻的稳定性。爱情的火花可能会延续，但如果仅靠爱情来维持婚姻，其稳定性可能就没有经济需求维持得那么好。

婚姻在过去被当做“至死不渝”的保证。在以前，这种因丧偶而夫妻分离的情景不但来得早，而且很普遍。在过渡时期，许多结婚时间长达50年的夫妇都有10个存活的孩子。但在那之前，婚姻常常因为一方死亡而早早结束，存活下来的另一方要么再婚，要么独自面对经济困境。欧洲就已经历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连续多配偶”（serial polygamy）时期，在这种情况下，鳏夫（通常都是妻子去世，因为女性容易在生育过程中死亡）在后来的日子里多次结婚。19世纪末20世纪初，习惯使得婚姻能保持长久。不过，到20世纪末，一种新的模式出现了，“连续多配偶”现象再次大量出现，但这一次是受到离婚的驱使而非配偶的死亡。

让我们再讨论另一种婚姻模式。以前许多婚姻发生在一方或双方都还处于青春期的时候，但现在，大多数人的婚龄已经推迟到30岁左右。

过去，人们在14岁结婚前不会发生性行为，但现在，如果期待一个30岁结婚的人还是个处子或者说在进入青春期17年后还没有性行为是不现实的。

如今，人们即使已经发生性行为但还未必能保持经济独立，这种现象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经济独立的人们发生性行为，但却选择不生育。传统生活的整个模式正在瓦解，但目前还没有明显的替代模式出现。在过去，同居意味着正式、合法的婚姻，但现在同居与婚姻根本就是两回事，而且两者也并不意味着生养后代。寿命的延长、死亡率的下降以及受教育时间的增长都彻底瓦解了以前的生活和社会模式。

这种趋势不会被扭转。妇女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少，因为在工业化的城市社会，供养许多孩子无异于经济自杀。抚养孩子的成本有增无减，而且也不可能再让6岁孩童去工作。婴儿死亡率同样不会上升，而是会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而出现下降趋势。因此，在21世纪，人们将继续倾向于养育更少的孩子。

人口剧减在政治上的反应

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活方式转变得也就越剧烈。自工业革命之后，最贫穷的人都生活在功能失调的家庭中。混乱的生育模式对于他们来说，再平常不过。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商界富豪与下层阶级处在两个极端，而夹在这两端之间的人中只有一部分经历了这种人口转变。在蓝领和粉领工人之中还存在其他趋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受教育的时间较短，这就导致青春期和生育年龄之间的距离被缩短。这类人群倾向于早婚早育。他们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彼此，因此，离婚会对个人的经济情况影响很大。他们的婚姻存在一些非感情的因素，而且离婚正如私通和婚前性行为一样，都是家庭生活的禁区。

这类人群中包括许多社会保守主义者，数量不多却颇具影响力，因为他们是在为传统价值观代言。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所处的混乱状态还不能被称之为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要融入一个前后一致的道德体系还需要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因此，社会上的传统主义者有其内在优势，他们的说辞只需与官方的传统立场相一致就有足够的分量了。

不过，男女之间的传统区别正在消失。由于女人的寿命更长，而养育的孩子更少，她们不再迫于环境的压力而扮演传统的角色（就像在人口大爆炸以前发生的那样），而家庭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成为至关重要的经济工具。离婚不再带来经济上的灾难，婚前性生活也很正常。同性恋（存在性乐趣却无法生育）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如果感情是婚姻的基础，而婚姻又与生育无关的话，同性婚姻为什么不能在事实上取得与异性婚姻同样的合法地位？所有这些改变都源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而生活方式的变化又是人口爆炸带来的结果之一。

因此，所有教派中的传统主义者（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以及其他教派）都极力想重返传统的生育模式，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他们都为大家庭辩护，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也都有自己的大家庭。在这种背景下，维持女性的传统角色就尤为重要。同理，对于早婚以及纯洁和永恒的婚姻的传统预期也是这样。

传统主义者秉持的最关键的原则就是养育更多的小孩，其他的一切都不那么重要。这个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例如，有一个反美国主义基金称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赞颂女性的不道德行为，这不但会导致家庭破裂，还会滋生人们“不道德”的情感。如果你读到本·拉登的讲话就会发现，他不断提到这一主题。他认为，世界正在改变，我们正在远离传统观点中被认同的道德行为规范。他想要阻止这个进程。

上述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战场，而在许多先进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些问题也成为国内政治的大漩涡。一方面，一整套根植于

现行宗教组织的结构化政治力量已经存在。[2]另一方面，与一个势不可挡的行为模式（漠视自身行为带来的政治后果）相比，目前采取的政治力量微乎其微。这种行为模式背后的推动力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当然，也有一些运动来保护这种发展的不同方面，例如同性恋权利运动，但这种变化并非有计划、有准备，而是自发形成的。

实用主义与计算机造就的美国文化

随着美国时代的来临，美国在传统社会模式的瓦解中获利，因为这种瓦解使得社会不稳定，这就给美国提供了改革的契机。美国文化是圣经和计算机（即传统价值观和激进式创新）的不稳定结合体，但随着人口模式的改变，计算机重塑了美国文化，并随之成为美国文化繁荣的根基。这在未来几百年将变得尤为重要。

计算机与先前的技术迥然不同，是一项非常独特的技术，因为它的目的是操作可量化的数据，即数字。此外，由于它将所有的信息（音乐、电影以及文本文档）都简化为数字，因此，它也是一种检视理性的独特方法。

计算机是基于二进制逻辑而设计的，这意味着它仅仅读取命令。这种命令以0和1的形式发出，要么被拒绝，要么被接受。它使用一系列二进制数码来代表我们所认为的非常简单的事情。因此，大写字母A就被看做是010 000 01，而小写字母a就是011 000 01。这一长串数字被重组成机器语言，并受到电脑编码的控制，这些编码是由Basic、C++或者Java计算机语言编写而成的。

如果你觉得看起来有点复杂，那么只要记住下面这些就行了。对于计算机来说，屏幕上的字母或音乐等所有东西都是用数字来表达的。所有东西都简化成0或1。为了能够控制计算机，完全人工化的语言就被创造出来了。这些语言的目的是让计算机使用它提供的数据。

但计算机只能管理以二进制数码表达的信息。你可以用计算机听歌，但它可不会写歌（至少不会写得那么好），更不会诠释音乐的美妙；它能存储诗歌，但不能解释其含意；它能够让你搜索任何一本你能想到的书，但不能判断语法对错（最起码不会很容易地区分）；它能很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但面对许多人脑能做的事却无能为力。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计算机是一个强大而富有魅力的工具。它运用逻辑来进行运作，但这些逻辑缺乏其他一些更复杂的理性元素。计算机只是一台用冷冰冰的数字来表达信息的机器。有了计算机后，人们经常思考是否其他方面的知识已经无关紧要了。计算机将理性看做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而非思考的过程。它大大缩小了理性所指代的意义和目的的范围，但在这个狭小的领域里，计算机的作用非常强大，它的数据本身甚至比这些数据的内涵更有意义。

任何一个学程序语言的人都知道计算机逻辑的严密性和人为性，它与自然语言决然不同。事实上，它是自然语言的对立面。后者充满了由上下文和推理决定的细微、精妙以及复杂的意义，而逻辑工具必须排除所有这些东西，因为二进制的计算机逻辑不能对其进行处理。

美国文化先于计算机而产生。实用主义的哲学概念是基于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等人的观点建立起来的，查尔斯·皮尔士认为“为了弄清一个知识概念的意义，应该先思考一下能从这个概念的真相中得出什么令人信服的实际结果，而这些实际结果将构成整个概念的意义”。换句话说，一个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其实际结果。如果一个思想没有实际结果，那就没有意义。“思考理性”的概念本身并不包括在它的概念意义中。

美国的实用主义概念给欧洲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美国文化充满实用性，而形而上学则遭到蔑视。计算机和计算机语言是对理性的实用主义观点的最好体现。每一行代码都必须有一个实际

结果。实用是唯一的标准。一行代码不因其用途而因其内在美丽而受赏识的观点是不可理喻的。

实用主义观点（现在已经逐渐发展为C++这类语言）是对理性领域的彻底简化和浓缩。当今美国，理性只涉及能以实际结果来衡量的现实存在。任何缺乏实际结果的事情都被从理性领域排除，并贬低至低等范围。换句话说，美国文化不涉及真相和美感。它推崇完成任务，而不是关心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意义。

这是美国文化的核心真理和巨大的推动力。大多数对美国文化的指控在于，这种文化将实用性提升至其他所有形式的真相之上。这种指控是有道理的，但它却没有意识到：历史正是由事实演绎而成的。

美国文化的精髓不仅仅表现在将实用主义当做一种哲学，更重要的是将计算机当做实用主义的具体体现。没有什么能比计算机更能作为美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了，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快、更彻底地改变这个世界。计算机比汽车和可口可乐更能展示美国人理性和现实观念的独特一面。

根据定义，计算机文化同样也是原始文化的一种。原始文化的本质就在于将文化简化为一种具有超强凝聚力和竞争力的推动力。它不包括能够阐释自身含义的理性思维，但会考虑将自己简化为最简单的表达形式，并通过实际成果来证明自己。

实用主义、计算机、微软（或其他任何美国公司）无情地聚集在一起，它们的作用巨大，效率也很高。美国文化正在发生分裂，它正慢慢分解为计算机的原始主义以及最终能够使用并塑造计算机和公司的工具，但就像其他美国意识形态一样，尽管美国文化具有明显的多样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自我肯定。

美国的社会模式将主导世界？

尽管别国模仿美国的社会模式，但在政治上，美国却遭到批判。它处于国际体系的意识形态断层上。随着人口因为生育模式的转变而下降，美国成为以激进方式重新定义社会生活模式的中心。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计算机和公司，就不可能存在现代经济，如果你打算编写计算机程序，就必须懂英语和计算机语言。一方面，那些想抵制现代化趋势的国家必须积极地避开美国人的生活和思维模式；另一方面，不采取美国方式的国家又不可能拥有现代经济。正是它赋予美国力量，同时又不断地挫败那些对美国诟病的批评家们。人们必须分析人口下降所带来的影响。反抗传统生育模式的瓦解、“9·11”事件和美国文化的崛起有着密切的联系。

旧的国际体制已经瓦解，但新模式还没有建立。在21世纪，一系列新型社会机制、道德体系以及社会风俗将首次试探性亮相。21世纪前50年将发生激烈的宗教冲突，传统稳定的婚姻模式与“非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模式将同时出现。一生之中只拥有一个性伴侣的人数已经大幅下降，在新的纪元里，社会模式间的互相角力将制造一种“混乱中的秩序”，也就是说，在美国时代，美国的社会模式将会主导整个世界。美国混乱的家庭模式和计算机逻辑将会胜出。它们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实力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

注释

［1］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77.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麦金德的许多预言都变成了现实。几年前，在堪萨斯的莱文沃思，我参加了美国陆军指挥和总参谋部学院研讨班，学到了一句谚语：同类相耗之力，巨大变革之本（Attrition of the same adds up to big change）。如果说大航海时代或大发现时代大致截止于

1900年前后，那么整个20世纪直到今天，以及未来几十年，这个本就已相当拥挤的世界地图，将进一步被塞得满满当当。正如我已指出过的，不管是人口还是武器射程方面，都将处于饱和状态。

［2］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45.

然而，全盘接受地理因素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同意“世界必然受到种族和宗派分裂驱使”这一观点，也不意味着对全球化的抗拒。事实远比这更复杂。全球化本身促使地方保护主义重生，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重生建立在种族和宗教意识基础上，而这些意识必须与具体地形相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参考地图得到最佳解释。因为大众传媒和经济一体化的力量已经削弱了许多国家的权力，包括无视地理因素人为划定的国家，一些关键地区显得难以控制、动荡不安。由于通讯技术的发展，尽管单个穆斯林国家内部风雨飘摇，泛伊斯兰运动还是在整个亚非伊斯兰弧形地带得到了壮大。

第4章
左右21世纪的地缘政治断层线

伴随着世界主要地区势力的崛起，21世纪的大国纷争必将愈演愈烈。躁动的太平洋地区、貌合神离的欧盟、不安稳的伊斯兰世界，太平洋盆地和欧亚大陆上时刻都充斥着火药味。纵然美国还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老大”，但面对一心想收复势力范围的俄罗斯，自家后院毒品犯罪泛滥的墨西哥，迅速崛起的中国，未来伊斯兰世界“领头羊”土耳其，“世界老大”是否会心力交瘁？

下一场地震将发生在什么地方，又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审视一下21世纪的地缘政治断层线。像地理分界线一样，这样的地缘政治断层线也不胜枚举。我们需要识别出那些活跃断层线，以便确定那些小摩擦可能会升级的地区。随着人们关注的视线逐渐从伊斯兰世界转移，哪里将成为下世纪人们关注的焦点？

目前，世界上有五个地区最有可能：

第一，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的太平洋地区。美国海军统治着这片大洋，亚洲环太平洋地区基本上全部是由贸易国家组成的，它们极度依赖这条海洋通道，因此也就依赖美国。太平洋地区的两个重要国家（中国和日本）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力量，它们可能会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潜在挑战。1941年到1945年期间，美国和日本为争夺太平洋的统治权而发生战争，美国取胜，并且直到今天还将其控制在稳定状态。

第二，我们必须考虑苏联解体后亚欧大陆的未来。自1991年

以来，这个地区就一直处于分裂和萧条状态。接承了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带着重建的自信逐渐崛起。然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位置也同样不稳定。除非这个国家竭力创建强大的影响范围，否则可能会再度瓦解，另一方面，创建这样的影响范围可能会引发与美国和欧洲的冲突。

第三，人们还在不断质疑欧洲最后的体系框架。500年来，欧洲一直战火不断。在过去的60年中，欧洲各国不是忙着应对战争，就是试图构建一个远离硝烟战火的联邦。同时，欧洲还要不断应对俄罗斯的崛起、美国的恐吓以及国家内部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毫无疑问，冲突的大门依然大敞。

第四，伊斯兰世界。它的麻烦不是来自于不稳定，而是源于它以联盟为基础形成的单一民族国家体制（除了它的意识形态问题）。土耳其一直是穆斯林世界中最强大的权力中心，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发展迅猛的现代化国家。它的未来是什么？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未来又会怎么样呢？

第五，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讲，墨西哥的地位不会升至全球断层的等级，但它在北美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远超出国力的重要意义。此外，因为墨西哥的GDP在全球排行榜上位居第15位，它的其他优势也不应被低估。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纠葛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它们之间社会力量的纷争会在下个世纪凸现出来，这种趋势不是两国政府任何一方所能左右的。

为了准确地描述未来将发生的事件，我们现在需要仔细审视一下上述事件中哪些可能会发生，以什么顺序发生。或许，一条存在上千年的断层线只是偶尔引发一些轻微的震动，但由于上述几条主要断层线的存在，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在21世纪爆发。

21世纪名副其实的火药桶：太平洋盆地

过去半个世纪，太平洋西岸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为迅猛的地区。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体中，有两个就位于这个地区：中国和日本。它们和东亚其他几个经济体都严重依赖海上贸易：向美国和欧洲出口商品，以及从波斯湾和太平洋其他地区进口原材料。因此，在商品运输中，任何干扰都会带来严重的损失，而持续性的干扰必将引发灾难。

让我们看一下日本。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唯一一个资源贫乏的工业大国。它需要进口从石油到铝的所有矿物资源。一旦切断进口来源，特别是石油，日本的工业就会在几个月内遭受重创，工业化强国的地位将一落千丈。进口供给对于日本的重要性，我们从1941年它偷袭珍珠港中可见一斑，它偷袭的原因正是美国阻塞了它进口原材料的通道。

过去几十年，中国也崛起为一个工业化大国，尽管它的经济规模仍远小于日本和美国，但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中国现在是太平洋地区的核心角色。它在原材料方面的自给程度要远胜于日本，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国内的原料供给已经不能满足发展需求，中国也将成为一个原材料进口国。

太平洋盆地的两个亚洲大国都严重依赖进出口商品来发展经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日本以及韩国都依靠太平洋通道运送成品和原材料。由于美国海军控制了太平洋，它们不得不仰仗美国。对任何国家来说，将发展希望寄托在其他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赌注。

这种状况还存在另一面。美国采购了亚洲大量的工业成品。就整体而言，它受益于亚洲提供的廉价商品，但这种贸易模式也削弱了美国国内的工业能力，进而影响了部分美国经济领域和地区。这些廉价商品给美国消费者带来实惠的同时，也导致美国国内的失业率不断攀升，降低了工资水平，因此遭到了美国人的强烈抵制。由于美国自身在外交政策

方面拥有游刃有余的空间，因此很容易对国内政治问题过分敏感，这是美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尽管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在整体上令其受益，它也极可能会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而改变对亚洲的进口政策。虽然这种改变的可能性很小，但对东亚国家的利益来说仍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中国近1/4的出口商品都销往美国。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设限，或者征收使其商品失去竞争力的关税，中国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对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来说，境况也一样。经济危机会让这些国家乱了阵脚，它们会为了开辟新的市场而变得有侵略性，甚至不惜施加政治压力，动用军事威胁。

军事上，美国随时可以封锁通往太平洋的通道。经济上，美国虽然依赖与亚洲的贸易往来，但依赖程度远没有像亚洲依赖美国那么严重。美国也很容易受到国内政治压力的影响，如那些遭受亚洲廉价商品冲击严重的集团的抗议。美国可能在国内政治压力的驱使下尝试重塑太平洋的经济关系。美国能够使用的工具之一就是在军事力量支持下的保护贸易立法，而在回应美国的军事和经济行动方面，东亚国家并没有切实有效的对抗方法。

从主观上讲，这个地区的任何国家都不希望发生冲突。从客观上讲，该地区的力量又严重失衡。美国政策的任何改变都可能给东亚带来灭顶之灾，况且这些变更常常超乎想象。例如，美国通过对华制裁，它设法限制中国石油进口，直击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因此，中国必须借助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来发展军事力量，以便对抗美国。它们仅仅根据战略计划的基本原则来行事：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过去50年，太平洋西岸的经济实力已获得极大提升，但军事实力却并未随之跟进，这种失衡让东亚国家变得不堪一击。因此，在本世纪，中国和日本除了提升军事实力之外别无选择，而这在美国看来，是对其太平洋西岸控制权的潜在威胁。美国会将这种防御性战略理解为挑衅——不管中国的主观目的是什么，从客观上来看确是如此。再加上局势

不断变化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在21世纪，太平洋西岸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火药桶。[1]

而且，任何亚洲国家，只要它确信石油价格会高涨的话，都不会忽视美国对能源控制的威胁。在短期内（未来20～50年），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情况，任何理性的亚洲国家都必须为此未雨绸缪。这个地区唯一有能力挑战美国海上霸权的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日本，两国虽有宿怨，但对于美国操控油价都有所顾忌。

美国控制能源运输的海上通道，其明确的用意就是加强对太平洋要塞的控制。石油价格越高，非碳氢能源的实现就越遥不可及，海洋航道的争端也会随之愈演愈烈。这个地区力量失衡的加剧以及能源运输的争议性问题的凸显，都会促使太平洋地区成为备受关注的地缘政治断层。

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棋局

20世纪后50年的多数时间里，苏联控制了从德国到太平洋，向南延伸到高加索和印度的亚欧大陆。苏联解体后，其西部边界向东缩减了近1 000公里，从西德边界移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边界。南部边界从印度向北退回了1 000公里，至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边界。俄罗斯也被迫从土耳其边界向北退至北高加索地区。俄罗斯为了稳固在高加索地区的统治，不断与车臣武装分子激战。与几个世纪以前相比，俄罗斯边界已经东扩了很多。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它西扩的势力范围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在未来的几十年，俄罗斯东西边境线的势力范围将会确定下来。

苏联在20世纪末解体后，外国势力纷纷涌入俄罗斯，在这里攫取经济利益，使其一度陷入混乱和贫穷的泥淖。俄罗斯迅速行动，尽可能地将原俄罗斯帝国纳入自己的版图。东欧成为北约和欧盟成员，波罗的海各国也纷纷投靠北约。美国与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以及其他许多中亚

的“斯坦”国家建立了密切关系。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俄罗斯允许美国军队进驻中亚，插手阿富汗战争。更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逐渐疏远俄罗斯，转而投靠美国，这可称之为俄罗斯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2004年12月到2005年1月发生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是后冷战世界结束的一个时机。俄罗斯将此看做美国拉拢乌克兰投靠北约的一次尝试，俄罗斯分裂的帷幕由此拉开。坦率地讲，俄罗斯的想法不无道理。

如果西方国家成功控制乌克兰，俄罗斯就失去了重要的防卫屏障。它与白俄罗斯的南部边界，以及它西南部的边界都将处于不设防的危险境地。此外，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西的距离仅约为400英里，这也将成为俄罗斯掌控高加索地区战略部署的一个缺口。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俄罗斯很可能会失去控制高加索地区的能力，并且不得不从车臣进一步北撤，进而放弃自己的部分联邦成员。这样的话，俄罗斯的南部侧翼也会变得不堪一击。如若俄罗斯不能重整旗鼓，夺回俄罗斯帝国时期的版图，那么它将会继续分裂。

当俄罗斯的分裂事态达到一定的程度，必将在亚欧大陆引起混乱。正如我们已经知晓的，美国对这些事态的发展不会有任何异议，它一直将分裂亚欧大陆并加强对海洋的控制视为重大战略。因此，美国完全有理由支持这一进程，而俄罗斯会坚决制止。

在俄罗斯认定美国会进一步使事态恶化之后，莫斯科政府就着手恢复以前的策略，重申苏联的影响范围。它的影响力会在乌克兰事件上偃旗息鼓，但在中亚、高加索以及西部的波罗的海和东欧，却日渐高涨。未来几十年（大约到2020年），俄罗斯将会把主要精力投放在重建俄罗斯联邦和重振本国在这一区域的声威上。

有趣的是，地缘政治形式的转变总是与经济状况的转变紧密相连。俄罗斯前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认为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和能源出口大国（特别是天然气），而非一个工业化国家。他致力于将能源产业置于国家的监管之下，即使和石油公司合作，也不会允许外国

利益集团分羹。他确立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策略，尤其注重对欧洲市场的拓展。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维持了俄罗斯国内经济的稳定，但普京不会将他的努力仅限于能源产业。他同时也将寻求对国内农业、木材、黄金、珠宝以及其他原材料进行投资的机遇。他正引导俄罗斯从一个赤贫的灾难性国家转变为一个虽然贫穷但是多产的国家。普京同时赋予了俄罗斯挟制欧洲的杀手锏——天然气管道的阀门。

俄罗斯正在重回它原有的边界。它正将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中亚，只要假以时日便会在此取得成功，但它在更加关键的高加索地区将会颇费周折。俄罗斯人不打算让任何一个联邦分离出去。因此，在恢复影响范围的过程中，俄罗斯必将在未来10年内与美国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发生冲突。

但在所有的可能性中，真正的摩擦点将集中到俄罗斯的西部边境。白俄罗斯将与俄罗斯结盟。在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白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较少，它对于任何愿意重建苏联的志同道合者都很感兴趣。在以某种方式与俄罗斯建立联结之后，白俄罗斯将使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重新恢复到苏联时期的边界。

从波罗的海到南部罗马尼亚边境的这片区域，历史上一直是不稳定和冲突频发的地方。北部是一条从比利牛斯山脉延伸至圣彼得堡的狭长平原。这里曾爆发过几次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也是拿破仑和希特勒入侵俄罗斯的必经之路。这里没有什么天然屏障，因此，俄罗斯人必须尽可能地向西扩展势力范围，创造一个缓冲区。“二战”后，他们一度将边界推进到这块平原上的德国中部地区。今天他们虽然已经向东回撤，但必定还会卷土重来，而且尽可能地向西扩展。这就意味着像以前一样，波罗的海各国及波兰仍然是俄罗斯亟待解决的问题。

限制俄罗斯的影响力势必会引发一些争议。美国以及苏联加盟共和国都不希望俄罗斯走太远。波罗的海各国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再次被纳入俄罗斯的统治范围，北欧平原南部各国也是如此。苏联的卫星

国，尤其是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很清楚，若俄罗斯重新将边界推至它们的边境，不知将会给它们的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这些国家现在已经加入北约，它们的利益必然会影响到欧美的利益。问题是这条边界线会延伸到俄罗斯西部的哪一个区域。这一直是个历史问题，在过去几百年，它也是欧洲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

未来10年，俄罗斯虽不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但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主要的区域性大国。这意味着它将与欧洲发生冲突，因此，俄罗斯和欧洲的边界将是一条断层线。

走下帝国神坛的欧洲

在走下帝国神坛，并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仍处于自我调整中，但这种调整能否以和平方式进行仍有待观察。最然欧洲不会再出现帝国，但这不代表欧洲内部从此没有战争。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欧洲究竟是一座死火山，还是暂时处于休眠期。欧元区的GDP总规模超过14万亿美元，比美国还高出1万亿美元。一个如此富饶多产的地区理论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这不是绝对的。

将欧洲当做一个单一实体来谈论是不合乎逻辑的。虽然有欧洲联盟，但这个地区仍不能被视作一个单一的实体。欧洲是由一系列独立自主和争强好胜的国家组成的。这个总的实体被称做欧洲，但相比于单一欧洲，三个欧洲的说法更加合理（我们从这份名单中剔除俄罗斯和其他苏联成员国，尽管它们也属于欧洲，但与欧洲相比，它们拥有完全不同的特性）。

大西洋欧洲：这些国家地处大西洋和北海沿岸，它们是过去**500**年欧洲帝国的主要力量。

中欧：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直到**19**世纪末才以现代单一民族国家的面貌出现，而正是它们过分强调自身的国家利益才酿

成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大错。

东欧：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广大区域，它们在“二战”中被苏联军队占领，“二战”结束之后，这些国家才慢慢发展出现在的国家认同。

20世纪前50年，大西洋沿岸的欧洲是世界帝国的核心，中欧是后来者和挑战者，而东欧则是受害者。两次世界大战让这里四分五裂，欧洲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德国在欧洲体系中的身份是什么。德国从大西洋沿岸欧洲创建的帝国体系中挣脱出来，转而颠覆这个体系，并维护自己的统治。“二战”最终以德国被粉碎、分裂以及占领而告终，这个国家的东部被苏联占领，西部则被英国、法国和美国分割。

迫于苏联的压力，西德极其依赖美国和它的北约盟友。创建一支德国军队显然又会引发一系列问题。若两次世界大战爆发都源自德国的力量壮大。如果德国的实力提升，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阻止第三次欧洲战争呢？答案在于德国军队与北约的整合——从本质上将其置于美国的号令之下，但更宏观的答案在于统一后的德国作为一个整体融入欧洲的程度。[2]

20世纪50年代，北约建立之后，欧洲经济共同体也诞生了。而从这个共同体衍生出来的欧盟则是一个在精神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实体，它创建的初衷是在保证主权独立的前提下，组建一个欧洲经济的共同体，同时它也被视为欧洲组建一个拥有欧洲中央政府、议会和专业的民事委员会的联邦国家的序幕。中央政府管辖欧洲联邦，统筹国防和外交事务，各国独立处理其内部地方事务。

欧洲尚未实现这个目标。它虽然已经创建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和一种欧洲单一货币（自由贸易区内的一些成员国使用这种货币，另一些成员国则依旧使用自己原有的货币）,但还没有创建自己的宪法。欧洲各国各自拥有主权，并未形成一体化的防御和外交政策。对外防御策略，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掌控在北约手中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北约成员都是

欧盟成员（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苏联解体之后，东欧的单个国家也被允许加入北约和欧盟。

总之，后冷战时代的欧洲有些混乱,要打破其内部极为复杂而又模棱两可的历史关系不太可能。鉴于欧洲历史，这种混乱一般会引发战争，但欧洲（除了前南斯拉夫外）已经没有精力应付战争，也没有欲望制造混乱，而且毫无疑问，它们也不希望发生冲突。欧洲心理的转变历程是独特的。在1945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屠杀和战争在欧洲司空见惯，而在1945年之后，即使是欧洲现行体制引发的混乱也仅局限于口舌之争，并未引起大的冲突。

在欧盟的表皮底下，旧的欧洲民族主义虽然并不活跃，但是依然在坚守阵地。这可以在欧盟内部的经济谈判中窥出端倪。例如，法国坚持保护本国农民免遭过度竞争，如果之前签署的协议会导致贸易逆差，法国就不愿意遵守协议的规定。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背景来看，欧洲还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跨越国界的实体。

基于上述原因，将欧洲当做一个单一实体来谈论（就像谈论美国或者中国那样）是不切实际的。它只是一些单一民族国家的联合体，而且仍然在经受“二战”、冷战以及失去帝国权杖后的落寞。这些民族极度狭隘，它们都是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来决定地缘政治行动。在这里，最基本的交流活动不是发生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欧洲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从这点来看，欧洲国家的行为更像拉美等国而非世界强国。在拉丁美洲，巴西和阿根廷的大部分精力花费在改善彼此的关系上，因为它们清楚自己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剪不断，理还乱：俄罗斯与欧洲的历史纠葛

俄罗斯是欧洲面临的最直接的战略威胁。俄罗斯的兴趣不是占领欧洲，而是重新夺回苏联的控制区域。在俄罗斯看来，这不仅是重建小范

围影响力的一次有益尝试，而且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一项防御策略。可是，这项防御性策略也将直接影响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国家，它们现在已经是欧盟的一员了。

很明显，东欧想要阻止俄罗斯的复兴。现实问题是，欧洲其他国家会对此作何反应，尤其是德国。它现在是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缓冲区，这样一个安全的位置，使它能够腾出精力专注于国内经济和社会事务。此外，“二战”的“包袱”仍然沉重地压在德国肩上，因此，德国人更愿意作为一体化的欧洲的一员参与行动，而不愿单独行动，但是德国的状态是无法预测的。考虑到自身所处的地缘政治位置，它已经认识到过分强调国家利益的巨大危害。1914年和1939年，德国试图果断地回应来自地缘政治的威胁，但是每一次的努力都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德国分析后认为：在大范围的联合行动之外独自参与政治军事冲突行动，会面临巨大的危险。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各国将德国看做是应对俄罗斯的缓冲区，也不在乎波罗的海地区的局势。所以，它们不会加入德国所需的反俄联盟当中。大西洋欧洲国家不会与德国联合阻止俄罗斯势力的扩张，所以俄罗斯将再度西进。

但还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德国意识到，俄罗斯统治波罗的海国家会令波兰面临极大的危险。德国将波兰看做是本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因此会主动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旨在通过保护波罗的海保护波兰。德国和俄罗斯都不会轻易放弃该区域。因此，为了增加自身在波兰和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的影响力，德国会与俄罗斯进行大范围的对抗。

德国必将与好战的过去决裂，而且将与欧洲其他国家分道扬镳。当欧洲国家极力置身事外的时候，德国将卷入到传统的政治力量冲突当中，在此期间，其行动效果和潜在国力都将上升，而它的心态也将随之发生改变。一夜之间，统一的德国将再现欧洲，德国也将一改其防御性姿态变得越来越有进攻性。

当然，这种状况出现的概率很低。但是，事态的演变也有可能会让德国重蹈覆辙。它再次将俄罗斯视作大敌，将波兰和东欧视作自己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为了保护它们而与俄罗斯对抗。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俄罗斯行动的激进程度，波罗的海国家顽强抵抗的程度，波兰愿意承担风险的程度以及美国插手这件事情的程度，但最终还是取决于德国国内的政治决策。

就内部而言，欧洲还是比较迟钝的，它仍未从丢失帝国权杖的冲击中苏醒过来，但外部力量（比如伊斯兰移民的进入或者俄罗斯试图重建帝国）可能会以不同方式使这条年老的断层再度蠢蠢欲动。[3]

谁将成为穆斯林世界的领头羊？

我们已经从整体上将穆斯林世界作为一条断层讨论过了。虽然当前的危机已暂时解除，但是穆斯林世界依然动荡不安。虽然这种不稳定还不会导致穆斯林世界的暴动，但是它确实增大了穆斯林世界单一国家利用这种动荡不安的可能性，它们利用其他国家的软弱强调自己作为区域强国的可能。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不可能担当这个角色。巴基斯坦是穆斯林世界第二大国家，且拥有核力量，但它处在西部阿富汗、北部俄罗斯、中国，以及东部印度等国的包围圈之中，没有任何地理优势，因此它也不可能崛起成为穆斯林世界的领头羊。

除了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之外，世界上还有三个主要的穆斯林国家。最大的就是埃及，它有8 000万人口；土耳其以7 100万人口位居第二；拥有6 500万人的伊朗居于第三。

从经济上看，土耳其的GDP达到6 600亿美元，它是全球第17大经济体；伊朗的GDP达到3 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29位；埃及凭借1 250亿美元的GDP，位居全球第52位。在过去5年中，土耳其GDP的年平均增速在5%～8%之间，在全球大国中，是持续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与

此同时，伊朗和埃及过去5年间只有2年经济衰退，其余3年经济增速均超过6%。这两个国家也处于高速增长期，但它们经济发展的起点远低于土耳其。在欧洲，土耳其是第7大经济体，而且增速惊人。

不过，经济规模不见得决定一切。从地缘政治方面来说，伊朗似乎是这几个国家中最好战的一个，但这也恰恰是它的软肋。为了使自己的政权免受美国、逊尼派穆斯林以及反伊朗阿拉伯国家（伊朗不是阿拉伯国家）的侵袭，伊朗常常过早地表明其坚定立场。在这个过程中，伊朗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后者不可避免地将伊朗看做是危险国家。

伊朗在波斯湾和伊拉克有利益关联，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与美国这样的国家发生冲突。这意味着伊朗必须分神防御，保护本国免受美国的攻击，然而此时正是伊朗经济需要高速发展，提升自身区域地位的关键时期。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就是触怒美国。美国可能会发出摧毁伊朗的严正警告。伊朗可能还没有为成为区域强国做好准备，因为它常常过早地消耗了自己的力量。要成为一个区域强国，伊朗每一步的行动自然都会受到世界强国的关注，因此这个过程可说是举步维艰。

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问题。伊朗处于穆斯林世界的边缘，它的东部是阿富汗，那里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资源。若伊朗打算北扩，那就会与俄罗斯的利益相悖；向西部的伊拉克扩张确实可行，但这又会令伊朗陷入泥潭，成为阿拉伯国家及美国关注的焦点。因此提升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轻举妄动都会得不偿失。[4]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国家，而且传统上一直是这个世界的领头羊。在纳赛尔的领导下，埃及在成为阿拉伯世界领导者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不过，阿拉伯世界已经深深地陷入分裂状态，埃及也在设法与这个世界的主要角色之一的沙特阿拉伯划清界限。在1978年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之后，埃及就中止了扩张的步伐。不管怎么说，它已经不战而败了。考虑到它的经济状况，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以及该国狭隘的胸襟，可以预测，埃及在将来很难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

它也不可能依附任何国家，不管是土耳其、美国还是俄罗斯。在过去几个世纪，它的命运一直如此。

土耳其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个主要现代经济体，而且截至目前，它还是穆斯林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规模远大于伊朗，也许还是这个世界唯一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战略位置上，它坐落于欧洲、中东和俄罗斯之间。

土耳其并没有与世隔绝，或者被缚住手脚。在战略位置上，它有多重方向可以自由行动。最重要的是，它并不是美国利益的挑战者，因此也就不会时常遭受美国的打压。这意味着它不用浪费资源抵制美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下，它很可能崛起，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主导力量。［5］

对于“一战”前土耳其把持世界主要帝国皇位，人们一定记忆犹新。在帝国坍塌之后，土耳其成为一个政教分离的穆斯林国家。1918年之前，它是全球最强大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帝国在14～16世纪步入鼎盛时期，国力极其强盛。

16世纪，土耳其成为统治地中海的强国，不仅控制了北非和地中海东岸，而且还统治了东南欧、高加索地区以及阿拉伯半岛。

土耳其社会内部错综复杂，既有受到军事力量庇护的政治体制，又有逐渐成长壮大的穆斯林运动，最终哪一股力量会成为主导，现在定论还为时过早，但是当我们审视美国入侵之后伊斯兰世界的残骸，并考虑这个地区哪个国家值得认真对待时，答案似乎显而易见，这个国家必须是美国的盟友、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土耳其。

身处潜在断层线的墨西哥

如果有人在1950年宣称半个世纪之后，日本和德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听者可能一笑置之。如果你在1970年断言，到2007

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那么听者也一定嗤之以鼻。但是与在1800年预言美国到1900年将成为世界强国相比，前两者远没有这个好笑。世界在变，一切不可预知的事情都将成为可能。

在2007年，墨西哥就已经是全球第15大经济体，紧随澳大利亚。当然，墨西哥的人均收入排名要低一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墨西哥的年人均收入约为1.2万美元，全球排名第60位，与土耳其不相上下，略胜于中国。单就这点而言，它毫无疑问也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

人均收入固然非常重要，但是经济总量对于衡量国家实力来说尤为关键。贫穷是个问题，但是经济规模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军事和相关事务上的资源投入比例。苏联和中国的人均收入都较低，但两国经济规模成就了它们的大国地位。事实上，在历史上，不管贫穷与否，庞大的经济规模加上人口数量足以让一个国家受到重视。

墨西哥1950年的总人口约为2 700万，之后50年，增加到1亿，到2005年，这一数字已经升至1.07亿。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这个国家的人口将在1.14亿至1.39亿之间，而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此，在过去50年大约增长了3倍之后，墨西哥的人口数量将在未来50年基本保持稳定，这样可以保证它有充足的劳动力。这是一个优势。因此，墨西哥在人口方面不是一个小国。当然，由于毒品和商业垄断的肆虐，它也无疑是一个不稳定的国家，但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全球还有许多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但我们却不能给它们贴上地缘政治断层线的标签。从根本上来说，墨西哥与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如巴西和印度）都不相同。它地处北美，我们之前已经论述过，这个地区目前是国际体系的重心所在。墨西哥也同时濒临大西洋和太平洋，还与美国共守着一段距离很长而态势紧张的边界。为了争夺北美霸权，它与美国也发生过大战，但以失败告终。墨西哥的社会和经济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战略位置和逐渐提升的国际地位让它成为一条潜在

的断层线。

为了理解断层的本质，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边缘地带的概念。在两个毗邻的国家之间，通常都会有一块纷争地，它被两个国家轮番操控。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就成为一个烙上了双边国家的民族和文化特点的区域。例如，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处法德两国之间，它们都存在独特的混合文化，这里的居民也有着不同的国家归属。他们讲法语、德语和一种混合方言。现在这一区域归法国管辖，但是不管哪一方管理该区域，它都是一个拥有两种文化氛围，充满潜在紧张态势的边缘地带。全球存在很多这样的边缘地带，像北爱尔兰，它是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边缘地带，克什米尔也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边缘地带；还有俄罗斯和波兰的边界；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边缘地带科索沃；以及法国、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边界。这些都是存在不同紧张程度的边缘地带。

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也存在一个边缘地带，这里居住着拥有共同混合文化的墨西哥人和美国人。这个边缘地带紧靠双方的官方分界线。在这里，属于美国的一边与美国其他地方不尽相同，属于墨西哥的一边也与墨西哥其他地方大不一样。和世界其他边缘地带一样，这里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美墨边界线两边的墨西哥人和美国人都与自己的国家交往密切。在经济和文化融合的表象之下，边缘地带永远都存在政治紧张气氛，而这一点在美墨边境的边缘地带尤为显著，因为墨西哥人在不断涌入边缘地带，穿过边境，进入美国，但是美国人南下移民墨西哥的现象倒很少发生。

全球许多边缘地带的归属权都多次易主，但截至目前，美墨边境边缘地带的归属权仅仅更换过一次。

墨西哥北部逐渐被纳入美国，这一进程始于得克萨斯的暴动，并在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期间达到顶峰。它构成了今天的美国西南部诸州。两国的边境被确定在里奥格兰德河，后来在西部进行调整之后又将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包括进来。墨西哥当地的土著居民并未被强行迁

出，墨西哥人也在不断进入这块地方，而后来，这里的大部分地区都被从美国东部迁居而来的人占据了。在20世纪后50年，墨西哥开始了另一波进入边缘地带和美国纵深区域的人口迁徙运动。这进一步使这个地方的人口组成复杂化了。

我们可以对传统的移民和进入边缘地带的人口流动加以区别。当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移民群体移入另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接受了新的文化和经济的冲击，其后代也深受这些主流文化和经济的吸引。进入一个边缘地带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后者相当于是祖国的延伸，它并没有与祖国彻底分离。边界只是一个政治分界线，而非文化和经济分界线，进入这个地方的人与自己的国家也相隔不远。他们在物质上仍紧密相连，其归属感复杂而多变。

进入边缘地带的墨西哥人与定居芝加哥的墨西哥人在行动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后者更像是传统上的移民，而迁居边缘地带的墨西哥人潜意识里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居住在国内一块被占领的区域，而非国外，这与定居得克萨斯的美国人在革命前看待自己身份的方式没有差别。

在一定时间点上，边缘地带的情况将简单地转化为军事和政治势力问题。边缘地带属于强势的一方，而力量的强弱又将取决于双方的陆军力量。自1848年以来，美墨的政治边界就一直由超级大国美国来划定。人口可以流动，走私也时常发生，但政治边界只能由军事力量来划定。

到本世纪末，美墨当前边界的状况会一直维持两个世纪。墨西哥的国力可能会再次复兴，而在美国这边，边缘地带的人口流动可能会非常频繁，以至于其政治边界可能将难以为继。到本世纪末，墨西哥很可能已经不再是全球第15大经济体，而是进入到前10位。更令人称奇的是，美墨之间的自由贸易给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帮助。那些经济规模巨大、暂时位居墨西哥之上的许多欧洲国家其实已面临严峻的人口问题。[6] 考虑到美墨边境冲突的潜在可能性，毫无疑问，这条断层线必须引

起重视。

谁将更有力地挑战美国？

如果我们寻找美国和伊斯兰圣战者之间战争结束后的新挑战者，那么有两个地区需要关注。墨西哥和土耳其显然还未准备好担当全球性大国的重责，而欧洲也将保持与世隔绝和四分五裂的状态（它将对国际重大事件做出反应，但不会是这些事件的发起者）。这样的话，全球就只剩下两条断层线——太平洋盆地和亚欧大陆，而且如果放在2020年的背景下，这意味着有两个国家可能会有突出的表现：中国和俄罗斯。还有第三种可能性，那就是日本，但时间远在2020年之后，而且这个国家的行动将严重依赖于中国。因此，我们需要细心查看中国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态势，以预测哪个国家将率先发起挑战，并在未来10年对美国构成威胁。

从地缘政治方面来看，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所谓的“系统性”冲突。冷战是个系统性冲突，它使得全球两个主要大国互相对抗，而它们对抗的方式则界定了整个国际体系。世界上还存在其他冲突，但其中大多数都被卷进主要冲突的漩涡。因此，从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到智利国内的政治问题，再到刚果独立，一切都被卷进冷战，并且被冷战所左右。两次世界大战也是系统性冲突。

根据定义，系统性冲突必须在冲突发生时有全球性大国参与其中。因此，它必须包括美国。进一步说，美国对任何主要冲突都不能置身事外。如果俄罗斯和中国互相对抗，美国几乎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或保持中立。对抗的结果对美国意义重大，而且在没有美国会置身事外的承诺的情况下，中俄双方不可能开战。美国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结盟都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失败。

中国和俄罗斯，哪个国家更可能将自己置于与美国的冲突之中？参

照一下美国的宏图大略，它并不倾向于引发冲突，除非有好战的区域性大国要致力于提升自己的安全等级，对美国分裂亚欧大陆的利益构成了威胁。因此，放眼未来几十年，我们需要将阐述重点放在中国和俄罗斯。我们就从中国——这个人人都相当关注的国家开始。

注释

［1］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35～136.

亚洲的概念是由西方海权国家创立的，始于16世纪之初的葡萄牙，并在冷战期间被分割成许多单独的区域。但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自由经济热潮席卷东亚，“太平洋盆地”（Pacifc Basin）这个新的大型区域形成了，在此基础上亚洲地图回归其整体性。这种经济成功的故事之所以成为可能，绝非仅仅是以武力相威胁的结果；相反，正是因为军事霸主美国的存在，才保证了亚洲的地区和平。现在，随着亚洲重返单一的有机整体，美国的力量正在慢慢后撤，而中国、印度和其他本土国家的军事实力随之上升。随着区域次单元逐渐崩溃，亚洲变得越来越大；又因为人口规模和导弹射程不断扩大，它越来越令人感到恐惧。武器装备在逐渐累积，同时却没有伴随联盟结构，这样一个亚洲，愈加显得不稳定。

［2］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8～20.

如果我们抽丝剥茧地深入到两次世界大战的逻辑核心，就会发现其本质是关于德国是否能够主宰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而冷战的本质则是苏联如何主宰东欧，那里正处于麦金德心脏地带的西部边缘。这里所指的东欧包括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东德，历史上的普鲁士正是为了领土的需要进行同样的东扩，最终奔向“心脏地带”；而西德则成为北约海洋联盟

的一部分，以天主教为精神依托，借助其雄厚的工业力量和商业头脑，向北海和大西洋挺进。

冷战时期，美国著名的地理学者索罗·B.科恩（Saul B. Cohen）指出，“划分东德与西德的边境区，正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区域”，中世纪区分法兰克和斯拉夫部落的分界线正在这里。换句话说，东西德之间的边境，几乎不是人为划定的。科恩认为，西德“反映的是海上欧洲”，而东德属于“陆权王国”，他因此支持德国分裂，认为“它在地缘政治上是合理的，在战略上是必要的”，因为它是欧洲中心连年战斗间的稳定地带。

麦金德在1919年也预见性地写道：“贯穿德国的分界线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我们可以借此从战略意义上，把大陆地带与海洋地带划分开来。”柏林的一分为二，本质上是人为的，而对于德国的分裂，人为的成分则相对较少。

科恩把中欧称为“单纯的地理概念，却缺乏地缘政治的实质”。按照这个逻辑，德国的统一，不会导致中欧的浴火重生，反而会导致欧洲重燃战火。由此推理，对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而言，德国的钟摆朝向何方，意义非同小可。如果向东倒向俄罗斯，将会对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前苏联卫星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是向西倒向英美，是否会为这两个海洋大国提供胜利的契机？这一点我们尚不知晓。在冷战后的早期阶段，科恩和其他学者都未能准确地预见今天统一德国“处于停摆化”的情况。如今的德国“厌恶军事解决方案”，同时保留着深厚的文化水准，这在未来可能成为有助于欧洲大陆稳定的积极砝码，也可能成为使这个大陆重陷动荡的原因。

德国作为强权国家之一，一直占据着欧洲的中心。因此，德国人总是表现出强烈的地理意识和敏锐的战略观，并将其视为一种生存保障机制。目前，德国人亟须完成的正是超越一时持有的准和平主义观念，恢复其敏锐特性。一个统一而自由的德国难道不可以成为一种平衡力量

吗？有德国横贯于大西洋和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之间，为“中欧文化”提出大胆的新诠释，是否可以使中欧的概念成为调节地缘政治的整流器呢？果真如此，加顿·阿什等人的理论将得以印证，他们也将享有超过麦金德和科恩的声誉。

［3］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15～116.

也许，斯皮克曼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对欧洲的观察。他反对德国或苏联统治欧洲，也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实现一个统一的欧洲。他更倾向于在欧洲国家之间形成权力平衡，认为这比欧洲联邦（即便是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实现的）更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利益。他写道，一个“欧洲联邦……有可能凝聚力量，彻底改变我们对于大西洋地区的重要性，并大大削弱我们在西半球的地位。”目前欧盟仍处于发展中阶段，各个强国的国家领导人虽加强相互协调，并建立了单一货币区，但仍奉行各自独立的外交政策；要评判斯皮克曼的预测是否准确，还为时过早。然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欧洲越是统一，与美国的关系就越是紧张。一个拥有武装部队并奉行单一外交政策的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超大国，将是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甚至可能成为在南美洲南部的“等距离区”占主导地位的外部力量。

［4］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263～276.

伊朗其国近乎浑然天成。其神职政权内部的激烈竞争，倒也体现一种更高的制度化水平，比该地区除以色列和土耳其以外的任何地方都要高。正如中东对于非洲和欧亚大陆来说是一个四边形，对于世界岛而言，伊朗就是中东的万向节。麦金德的枢纽不应在中亚土地上，而应向南转移到伊朗高原。这样，伊朗正日益受到中国和印度的青睐也就毫不奇怪了，其海军甚至可以在21世纪的某个时间与美国海军分享欧亚海上通道的优势。虽然伊朗在面积和人口上远不及以上两个大国以及俄罗斯

或欧洲，但因为它处于关键的地理位置，在人口、资源和能源方面也十分重要，因此是地缘政治的根本。

伊朗当下的广泛影响力主要在于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公开挑战。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出它还有什么魅力，其辉煌文化如此浪费着实可惜。除非某一天其政权自由开放，或者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诞生一个民主化或准民主化的新伊朗，它才可能凭借地理优势，激发起阿拉伯世界和中亚穆斯林千百万同胞的能量。

再来看1979年巴列维的倒台。亨利·基辛格曾经告诉我，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发生反对国王巴列维的叛乱，如果当时卡特政府能更好地处理，国王有可能保住，伊朗现在会像韩国一样成为充满活力的准民主体制，尽管偶尔与美国有不痛不痒的摩擦，但基本上算是一个盟友。在他看来，当时的巴列维政权是能够改革的，尤其是苏联的民主动荡十年后才发生。虽然基辛格对吉米·卡特总统的指责可能过于轻率，但是由此提出伊朗革命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仍然耐人寻味。谁说不是呢？20世纪90年代我走遍了伊朗，最近又刚从埃及回来，前者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情绪其实比后者要小得多，对此我心知肚明。其实，伊朗与犹太人的关系从古代一直到巴列维王朝都还是良性的，对于伊朗人来说，仍有许多希望和可能性。

再来看看“9·11”恐怖袭击给美国提供的机会。袭击发生后，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和时任总统的穆罕默德·哈塔米毫不含糊地谴责逊尼派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伊朗人在德黑兰街头组织为受害者守夜的活动，而其他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却在为攻击欢呼。当年晚些时候，美国组织联军打击塔利班，伊朗亦为其提供帮助。2003年春天巴格达陷落后，伊朗提出举行实质性谈判。这都说明，在现今时段，历史没有必要像以前一样发展。其他结果也是可能的。

伊朗丰富的文化、辽阔的地域、丰富多彩的城市，与中国和印度一样自成一体，其未来必将取决于政治和社会条件，最关键的节点就是伊

拉克。伊拉克的历史和地理与伊朗交织在一起，没有任何国家能与其相比。此外，德黑兰若采用更自由的制度，将激发伊朗文化的连续性，既无愧于老波斯帝国的光彩，又不再受神职人员的约束。一个更自由的伊朗，将拥有为数众多的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以及北部等地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可能随着中央集权的解散，民族的边缘地带将脱离德黑兰的轨道，渐行渐远。伊朗并非一个单纯的国家，而是一个形状不定的跨国家帝国。其真实大小与任何正式指定的版图总不相符。今天的伊朗西北部是库尔德和阿塞拜疆土耳其人居住区，而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西边的一部分在文化和语言上与伊朗国家更为兼容。伊朗回归的最终目标，可能正是这种国无定形，正像帕提亚帝国一样，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和毛拉政权的合法性将日益式微。

［5］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280～284.

像伊朗一样，土耳其自成关键地区，并按顺时针依次影响巴尔干、黑海、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高加索和中东阿拉伯国家。战略家乔治·弗里德曼写道，与阿拉伯世界相比，土耳其“是混乱中的稳定平台”。虽然影响周边的所有地方，但土耳其作为大陆桥夹在两个海洋中间，南有地中海，北有黑海，从这一点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岛国。无法与干旱陆地连接，使土耳其在地理方面不能像伊朗那样成为影响其邻国的关键。它在西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和南部对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主要是经济上的。在南斯拉夫，它最近已参与冲突后的调解进程，只有在高加索地区，特别是阿塞拜疆，因其语言非常接近土耳其语，土耳其的外交影响力可以极大地影响其日常政治。

土耳其控制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地理优势，赋予它控制叙利亚和伊拉克水源命脉的能力。当然，如果土耳其真的切断其水源，就从事实上构成一种战争行为，因此土耳其必须小心使用这一优势。为了满足自身农业发展的需要，土耳其有可能将河

流改道或从上游拦截水流，而中下游国家对水流减少的可能性的担心，使土耳其在阿拉伯政治局势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事实上，多年以来，土耳其一直希望加入欧洲联盟，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曾多次访问该国，土耳其官员明确指出这是他们的既定方向。但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现实看来，土耳其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理由看起来很牵强，源于充满腐朽气的地理和文化宿命论：尽管土耳其是一个民主国家，是北约的成员，但它也是穆斯林国家，因此人家欧洲不要。入欧盟被拒，对土耳其政体是极大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它早已与其他社会发展趋势相融合，因此土耳其的历史和地理可能会经历重大调整了。

［6］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323.

汤因比在比较野蛮人和罗马人时写道，在高度发达与不那么发达的社会边界，“天平不会达到稳定的平衡，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向边境上更落后社会的一侧倾斜”。自1940年以来，墨西哥人口已上升超过五倍多，1970年至1995年间几乎翻了一番，1985年至2000年又增长了1/3以上。

墨西哥人口现在是1.11亿，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不过，美国东海岸精英对墨西哥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墨西哥与美国边境各州，如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的生活挑战、大小事件、商业往来、文化互动等，在地理上远离东海岸精英的关注视野，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以及美国在那里的地位。也许在精英的想象力范围中，墨西哥的位置远远低于以色列或者中国，甚至不如印度。然而，墨西哥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可能影响美国的命运。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一起，构成麦金德“世界岛”周围最关键的大陆卫星国。

第5章
迈向世界大国的中国

作为传统的大陆型国家，缺乏活跃的地缘断层带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多次选择闭关锁国。直至1978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才使得中国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然而，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巨额的政府负债、结构化转型的乏力增长等问题，使得中国在步入世界大国的道路上布满荆棘。面对美日的围堵及周边国家的挑衅，未来的中国能否在解决内部问题的情况下再次惊艳世界？

任何关于未来的探讨，都必须先从中国说起。拥有全球1/4人口的中国常被列入未来世界强国，它的经济在近30年里突飞猛进，这无疑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强国。但是30年的持续增长并不意味着这种势头永不停滞，也可能正在逐渐减弱，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它可能要面对一系列的问题。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那就是：谈论未来，绝对要从中国开始。

那么，让我们以地缘政治学作为框架溯本求源。首先，中国是一座岛，虽然没有被海水环绕，但被众多无法逾越的国土和荒漠所包围，这使得它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

中国北临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荒无人烟，难以逾越；西南部是难以攀爬的喜马拉雅山；南部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遍布山地和丛林；东部临海；只有毗邻哈萨克斯坦的西部地区可供通行，但也需要花费很大的工夫。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布于距海岸线不足1 000公里的土地上，居住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人烟稀少。

中国在历史上唯一一次完全被征服要追溯到12世纪的蒙古人入侵，但是中国几乎从未在现有版图下对外扩张。在历史上，中国也从不侵略他国，只是偶尔卷入与他国的纷争中。中国在以往的世界贸易中并不活跃，经常间歇性地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对外通商之后，中国又会开辟丝绸之路这样的陆上通道穿越中亚地区，开放东部港口供商船航行。19世纪中叶，欧洲人看中了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自给自足的时期，团结统一却一贫如洗。欧洲人强行闯入中国，在沿海地区频繁进行贸易活动。这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中国沿海地区由于对外贸易，财富激增；另一方面，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悬殊不但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力，而且引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沿海地区更愿意与能为自己带来经济利益的欧洲国家保持密切联系，也不愿受限于当时的政府。[1]

动荡时期从19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1949年共产党执政。共产党一开始试图在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开展革命，但没有成功，于是开始了著名的长征。在内陆省份，毛泽东组织了一支由贫农组成的军队，发起反击，收复沿海地区。后来，他使中国恢复到欧洲国家未介入以前的封闭状态。从1949年直至毛泽东去世，中国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团结统一，但在西方看来有些闭塞排外，贫困问题仍很严重。

破釜沉舟后的“世界引擎”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邓小平深知，中国若想保持安定团结，闭关锁国绝不是长久之计，经济处于弱势的中国定会被别国觊觎。于是邓小平决定破釜沉舟，他认为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对外贸易，中国不会再因为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

沿海地区随即重新繁荣起来，并与世界强国密切往来。上海等沿海大都市凭借廉价的商品交易迅速累积财富，而内陆地区的贫困状况却没

有得到彻底改善，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贫富悬殊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尽管如此，北京的地位并没有动摇，既没有丧失对各个区域管制的权力，也无需强力高压。

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30年，30年在历史长河中算不上很长的时间，而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却十分漫长。问题在于，是否能妥善处理中国国内存在的问题。于是又回到了讨论的起点：21世纪中国对世界将会有怎样的影响？中国还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吗？

中国在21世纪初破釜沉舟，以期求得永久的稳定。中国作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逐渐把相对富足的沿海地区资源运送到内陆。这个提议没有遭到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反对。中国领导人试图让全中国的人民都满意，并且竭尽全力实现这一目标。

世界各国对廉价出口商品趋之若鹜，而这些廉价商品交易是靠巨额贷款维持的。中国对商品定价越低，利润也就越低。这种无利润出口商品虽然使经济引擎频繁运转，却没有在实质上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这样一种交易：以成本价或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如此一来，的确有巨额资金在商业领域流通，然而这些资金也会迅速流失。

这是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日本就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跻身为世界经济大国，这对美国商界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工商管理硕士不得不向日本人学习借鉴，效仿他们的经营方式。日本经济迅猛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并不是源于经营管理，而是由于日本的银行体制。

由于政府的监管，日本银行支付给一般储户的利率普遍很低。同时由于各种法律条令和政策的倾斜，邮局存款利率比银行高出一倍，因此大多数日本人只好把钱存入邮局。政府转而用这笔钱借贷给日本各大银行，但它的利率仍然远低于国际标准。银行继而又把钱贷款给业务伙伴，例如住友银行（Sumitomo Bank）贷款给住友化工厂（Sumitomo

Chemical）。20世纪70年代，相较于美国公司两位数的银行贷款利率，日本公司的贷款利率不过是美国的一个零头。

这样看来，日本企业比美国企业运营得好也就不足为奇，因为成本远低于美国。同样，日本极高的存款比率也就不足为奇。其实日本当时不但没有公共退休计划，其企业退休基金也微不足道，日本人只好通过储蓄存款为退休养老做准备。如果不节俭，那将来就没有保障。这些可怜的储户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低利率存款。

高利率保障了西方经济的规范性，通过优胜劣汰，可以剔除那些毫无竞争实力的孱弱公司，限制其在低利润条件下的无限扩张，而日本银行人为降低利率，贷款给合作伙伴，因此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货币流通，社会关系是关键，因此，许多坏账应运而生。

日本主要的融资手段不在于增强股票市场的公平性，而在于银行贷款。董事会是由公司职员和银行家组成的，比起利润，他们反而更关心资金流动，以保证公司的运营，偿还贷款。因此，日本曾一度成为世界上资本回报率最低的国家，但是由于日本人采取独特的方式规划经济——依赖出口，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是快得惊人。

日本人不得不这么做。用一个极高的储蓄率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普通的日本公民几乎很少消费。因此，日本想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几乎不太可能。由于日本的公司不受投资者的限制，而是受到组织内部人员和银行家们的控制，所以他们想要做的就是增加资金流的注入量。至于能产生多少效益（如果有的话），则关系不大。因此，低成本出口潮高涨。借贷资金增加，现金需求扩大，出口量也就随之提升。表面上，经济是在增长，但其内部危机四伏。

日本银行那种随意的放贷方式使不良贷款数目上升——这种贷款不会得到偿还。许多糟糕的企业得到了资助。日本银行非但没有取消这些贷款或是让这些企业破产，相反，它们用更多的贷款来填补这个漏洞，让这些企业继续存活下去，贷款也随之水涨船高。为了利用储户的资金

来维持该银行体系，它就迫切需要利用出口来吸收更多的资金。这一体系虽然资金充裕，但底下暗流涌动，众多依靠政府得以存活的公司，以及那些极力增加现金流入而无视赢利的公司，正逐渐削弱整个银行体系。出口的巨大潮流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利润。整个体系被搅得一塌糊涂，这时的日本光是要维持正常运作就已经异常艰辛了。

从表面看来，日本经济正在急剧上扬，用超乎想象的高质量、低价位的产品占领市场。这与沉迷于高利润的美国公司有所不同，日本人对未来表现得志在必得。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日本正依靠少得可怜的、受到政府限制的“遗产”度日。低价位是他们的一着险棋，以试图保证资金不断注入，这样银行体系就不会在短期内崩溃。

最终，贷款迅速膨胀，以至于凭借出口的利润都难以为继。日本银行开始破产，政府不得不为其买单。但是日本绝不会对此种大规模的经济衰败坐视不理，它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挽救措施来延缓这种极度的痛苦，并以此来克服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经济萎靡。经济萧条使得市场每况愈下。有趣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当经济危机席卷而来的时候，西方并没有注意到日本的经济已经溃不成军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还在谈论着日本经济的奇迹。

“中国龙”如何走出“日本陷阱”？

这与中国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如出一辙。两国的经济都严重依赖出口，它们都保持着起伏不定的高增长率，并且当增长率开始出现衰退时，它们都可能崩溃。

中国的经济显现出兴旺与生机，如果你只着眼于其经济的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它确实令人瞠目结舌。然而，增长只是检验经济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这种增长是否有利润回报。中国的经济确实呈现了实实在在的增长，所获得的经济回报也确实满足了银行业的需求。但一旦增

长出现减缓趋势，比如说由于美国方面导致经济不景气，那么整个经济结构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滑坡。

这在亚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照常理而言，日本将会压倒美国。但实际上，日本高速的增长率没有持续下去。当这种增长大幅度下降时，日本就经受了巨大的银行危机。危机过后，日本在接下来的20年里都没有彻底复原。同样，当东亚经济于1997年出现危机之后，许多国家都措手不及，因为当时东亚的经济正在突飞猛进。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也十分迅猛。中国人认为自己可以持续保持这种增长势头，但这种想法与基本经济规律是相悖的。有时经济循环在淘汰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的同时，也孕育了它们的丑恶弊端——的确如此。有时候，技术工人的极度缺乏也将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可以说，经济增长将受到许多结构限制，而中国也将无法避免。[2]

“唱衰”中国的逻辑

日本用一代人的缓慢增长来解决自身问题。它运用政治规律和社会准则来对该事务进行处理而没有引起动荡。东亚用了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诸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大刀阔斧地强制执行强硬的措施，但是可行性却非常有限，除非它们有强大的政府能够承受这种压力。而另外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则就此一蹶不振。

中国的挑战是政治方面的。当国内出现经济下滑和资金终止注入等问题时，中国的银行体系，甚至整个社会组织都会动荡不安。企业发展的减缓会造成企业倒闭和人口失业，而在一个区域性贫穷和大范围失业的国家里，经济下滑的附加压力会引发一系列的不稳定。

回想中国是如何在近代美国的干涉与现代毛泽东的胜利领导之间被分成沿海和内陆的。沿海的企业在对外贸易和商业投资中蓬勃发展。由

于受到外部利益的驱使，它们力图自行发展。它们受到中国境内一些掌有金融权益的欧洲帝国主义者和美国人的拉拢。这和今天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如出一辙的。一名上海商人乐于跟洛杉矶、纽约和伦敦保持利益往来。实际上，他从这些联系中赚到的钱远比与北京的商业往来中赚到的更多。与此同时，中国内陆的穷人将会努力迁往沿海城市，或者向北京施压给沿海地区加税从而获得资金资助。

如果中国政府曾想要努力挽回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力，那么很难想象促进那些地区发展而后又对这些地区施压的行为是出自同一个政府。19世纪，同样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沿海的政府官员们不想推行北京的法令，他们想与外国人做生意。

因为在经济问题方面与外国存在实质性的对抗，所以中国政府要保护自己的经济投资。国际争端将会帮助中国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最有可能发生在21世纪的头10年。[3]

到那时，中国有三种可能的未来发展方向。

> 第一个可能的方向是中国继续无限期地迅猛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做到过这一点，中国也可能不会例外。过去30年里中国的飞速发展已经使经济失衡，这一点是将要加以改正的。从某些观点来看，中国必须得经历艰难的调整期，而亚洲的其他国家已经经历过这些了。
>
> 第二个可能的方向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化。利益冲突将会显现，而中央政府则会发布命令并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以防止经济下滑。这个方案与前者相比更具可实施性。但是实际上，政府机构充斥着那些为个人利益而反对中央集权化的人，这点使得该方案很难实施。政府不能只依靠自己人来实施那些规定。爱国主义是使他们团结一致的唯一王牌。
>
> 第三个可能的方向是在经济低迷的压力下，中国沿着传统的区

域界限分崩离析，同时北京的势力也大不如前。从传统观念来看，在中国这是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对富人和外国投资者都有好处。这会使中国回归到毛泽东领导前的状态，在一个努力治国的中央政府之下存在着区域之争，甚至是地区冲突。如果我们接受中国的经济将不得不在某个时刻做出调整，以及中国也会像其他国家那样产生严重的紧张态势的事实，那么第三个结果就最符合中国的历史及现状。

日本的算盘与中国的考量

先进的工业世界会在21世纪头10年面临人口紧缩和劳工匮乏的现象。一些国家基于旧有的观念指出，移民入境不是可选择的办法，至少不是个令人满意的办法。比如说，日本极其反对移民入境，但是它又必须找到劳动力的来源。这些劳动力受日本政府的控制并交纳税款来供养老龄工人。大多数移民工人不会选择日本，因为日本对想要成为日本公民的外国人非常不友好。在日本的韩国人到哪都没有公民身份。即使他们终生都居住、工作在那里，他们在身份证明文件中还会被日本警察叫做“韩国人”（不管是朝鲜人还是韩国人），不能够成为日本的合法公民。

然而，考虑到中国是一个低成本劳动力的集中地，即使中国人不想去日本，日本人也会来中国，就像他们过去那样。日本人在中国办厂，并雇用中国劳动力，这可以看做是另一种移民入境。而这种方式并非日本人的专利，其他国家的国民也会如法炮制，涌入中国。

从传统上来看，当北京受到压力时，它就会准备接受较慢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从长远上来看，大规模的、集中的日本企业占据并吸收中国的劳动力，对于当地企业家和政府，甚至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都存在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但却毫无政治意义。日本不希望北京将资金转投向自

己国家的企业，那样会使自己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

大约到了21世纪20年代，日本会吸引中国来引进它的日资开发（有益于日本的）项目。中国的沿海地区会有足够的竞争力来吸引日资。不同于沿海地区，内陆的企业和政府不会从日本企业中获得多少利益。拥有大量资金的日本人将会在沿海城市而非内陆地区招募新的同盟。

对于像日本那样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又无力应付大规模移民的国家来说，中国将会被视作一个救星。不幸的是，这个前景不容乐观。

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为中国没有对未来20年描绘出一个地缘政治断层线，而且，就中国的地形来说，这在任何环境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的军事需要花费至少10年的时间来克服这种地形上存在的局限。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内在压力将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国内问题，而这些问题超出了它的负荷能力。因此，中国没有太多的时间开展外交政策的冒险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将被卷入国外权力的纷争中，并用自我防御来抵制外来的侵犯，而不是构建自身的实力。

注释

［1］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200～201.

麦金德在著名的“枢纽”一文末尾谈到中国时，颇有惊人之语。他先是阐明欧亚大陆内部为什么会形成世界地缘战略强国的支点，随后断言，中国人“可能构成威胁世界自由的黄色危险，原因正是他们能够为其大陆资源再增加海洋前沿据点，这种优势就连占据枢纽地区的俄罗斯人都无缘享有”。这个论断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当时种族主义情绪甚嚣尘上，对任何非西方力量的崛起都报以敌视态度。且抛开这些不管，先来看看麦金德的分析，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大陆强国，其唯一的海洋前沿主要由北极冰封锁，而中国虽也是大陆强国，但其阴影区延伸到前

苏联所属中亚地区的战略中心，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矿物和碳氢化合物资源。中国有9 000英里长的海岸线和许多天然良港，其中大部分是不冻港口，此外还与3 000英里以外的太平洋主航道相连。麦金德于1919年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写道，如果欧亚大陆与非洲连接，由此形成的“世界岛”相当于北美大小的四倍及其人口的八倍，中国作为欧亚大陆上最大的陆权国家，海岸线兼跨热带和温带，将因此占据全球最有利的位置。他在该书的结论中预言，中国将与美国和英国并驾齐驱，最终引导世界，为人类1/4的人口建设一种“既非完全东方化又非完全西文化”的新文明。

［2］弗里德曼.未来10年[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192～195.

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能实现突飞猛进的增长，部分原因在于，之前毛泽东始终对发展经济采取压制性政策。随着毛泽东的逝世，邓小平成为中国的新一代领袖，中国的思想解放，令需求突然释放，再加上中国本土的大批人才的出现，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便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在此后的每个10年中，中国经济均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增速却不断放慢，这种发展速度的下降隐含着不稳定的种子。

在历史上，中国始终游走在两个极端之间：要么闭关自守，忍受贫穷，要么打开国门，导致社会动荡。从19世纪40年代英国第一次迫使中国开放其沿海口岸开始，到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为止，在此期间，中国也曾开放部分地区，个别地域也曾繁荣一时，但整个中国基本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当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带领农民武装赶走西方列强时，尽管中国也曾陷入贫困，但也给中国带来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曾有过的团结和统一局面。

在开放而不稳定与封闭而统一之间摇摆不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中国主要经济资产的特性：劳动力廉价。在允许西方强国在中国投资建

厂时，他们通过各种规模的工厂和企业充分利用中国的富裕劳动力。列强开办这些工厂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生产产品在中国销售，而是重新出口销往其他国家。因此，他们的投资也主要集中于港口附近或是能便利连接港口的地方。加之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沿岸地区，因此，他们没有理由到深入内陆的地区建设基础设施。外国投资的绝大多数工厂均建在海岸线几十英里以内。即便是在中国社会出现繁荣、工厂变成国有之后，这种模式依旧如此。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公认标准为家庭年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该数字及下文的相关统计数字源自中国人民银行）。或许我们会对这个数字有所争议，有些人可能会说，中国的生活成本远低于其他国家，但是在沿海地区，住宅及公寓价格已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水平。约6 000万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中产阶级水平（他们的家庭年收入达到2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全部人口。但中国有13亿人口，生活在中产阶级的6 000万公民还不足全部人口的5%，而且他们的绝大多数集中在沿海地区或是北京等大都市。

与这种相对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还有6亿人口生活在年收入不足1 000美元的家庭里，换句话说，他们每天收入不足3美元。还有另外4.4亿人口的家庭年收入在1 000美元到2 000美元之间，或者说，每天平均收入在3～6美元之间。如此狭小的发达地区不仅造成了巨大的地域差异，也造就了明显的社会鸿沟。沿海地区的利润来自贸易，而其他地区却并非如此。实际上，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利益更多地与国外贸易伙伴休戚相关，这种相关性不仅超过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关系，甚至超过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正是沿着这条断层线，19世纪的中国支离破碎，也正是在这里，它在未来可能产生新的裂痕。事实上，由于国外利益驱使，沿海地区往往与中央政府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加上贫富鸿沟，中央政府的权威自然要受到削弱。英国入侵后的清政府就是这种情况，毛泽东在20世纪四五十

年代的决定就是彻底消除贫富差距，驱逐国外资本，没收富人财产分配给穷人。

那么，中国在未来10年将会采取何种措施处理这种困境呢？在经济状况相对繁荣、经济增长相对稳定情况下，国家还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贫富不均程度不断加剧，但随着大多数中国人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差距还不足以引发民众的消极情绪。但是在经济疲软、人们生活水平出现总体下降时会怎样呢？对于那些达到或超过中产阶级的人来说，这也许只会给他们带来一点麻烦和不便。但是对生活实际上很贫困的十亿中国人来说则完全两样了。而这也是中国在近期可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经济形势恶化，经济增长相对放缓，这种矛盾一旦在经济和社会上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引发不满情绪。

由于中国经济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完全不成比例，因此，问题注定极为棘手。在这里，中国厂商生产的iPod和高档服装并不是卖给本国相对贫困的民众。与巴基斯坦或菲律宾等国家相比，中国的低工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此外，有限的半熟练劳动力（相比无技术的农民供给的无限性）价格已经上涨。在竞争压力下，中国已经开始降价，这就降低了出口收益。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部分目标市场国家经济疲软，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将有所下降，因此，企业还贷能力的削弱必将加大整个金融体系压力。

但最严酷的现实还是在于中国如何应对失业问题。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一旦失业，他们要么滞留在城市，给城市带来不安定因素；要么回到农村，进一步加剧农村的贫困程度。中国可以通过鼓励银行向应破产企业发放贷款、提高出口补贴或是创办国有企业等手段维持就业水平，但这些举措都将无一例外地令经济空心化。简言之，中国迟早要面对现实，即便不是现在，以后也无法逃脱。

未来10年那个长期问题也许就将见分晓,即中国该如何解决自身问题，是闭关自守、关停沿海企业并驱逐外国资本，还是回到19世纪末和

20世纪上半叶那种各自为政、动荡不安的局面。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中国政府将以解决国内问题为首要任务，同时，小心翼翼地在中日美这个三角框架内维持竞争力的均衡，并对日本和美国保持更高的警惕性。

［3］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14～115.

斯皮克曼以1942年作为基点，其目光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使我们看到了地理学家心系未来的先见之明。虽然当时盟国的优先目标是彻底摧毁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但斯皮克曼也非常担心战后德国一旦非军事化，会给世界局势带来什么影响。他解释说，一个“从乌拉尔到北海”的俄罗斯民族国家，可能比一个“从北海到乌拉尔”的德国好不到哪里去。苏联若在英吉利海峡设立机场，将和德国机场一样威胁大不列颠的安全。因此，在希特勒垮台后，一个强大的德国仍然是必要的。基于同样的道理，虽然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夺岛恶战还要打三年，斯皮克曼仍然建议与日本结成战后联盟，以对付苏联等大陆强权，特别是正在崛起的中国。日本是一个粮食净进口国，石油和煤炭产量不足，但其悠久的海军传统是一大优势；对美国来说，这个强大的东亚海上岛国在远东可以发挥同英国在欧洲一样的作用。斯皮克曼特别强调，虽然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初因遭受日本的侵略而异常虚弱，但将来必然会重新振作，因此联合日本这个盟友实属相当必要：一个现代化、军事强大、生机勃勃的中国……不仅会对日本构成威胁，还会向西方列强在“亚洲地中海”的地位提出挑战。中国幅员辽阔，控制着广大周边海域，它在亚洲占据着类似于美国在美洲地中海的主导地位。当中国变得强大时，它对该地区的经济渗透无疑将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可以设想，这片海域将不再由英国、美国、日本海权控制，而是由中国的空中力量控制，这种结局可能为时不远。

第6章
对峙的断层线
2020年俄罗斯第二次解体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往日雄风早已不在，但“北极熊”从未停止过对大国梦的执着。以“能源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犹如一把双刃剑，使得俄罗斯在与西方大国的对决中难免伤及自身。面对美国撑腰的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的步步紧逼，“北极熊”欲重新控制高加索地区显得尤为乏力。纵然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暂时性的收复了失地，但北约的东扩犹如一把匕首，已经直插其心脏。面对复杂的国际及地区局势，未来强人普京带领下的俄罗斯将如何继续走下去？

在地缘政治学中，许多重大冲突周而复始地上演。例如，法国和德国之间、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多次战争。当一场战争无法解决某个潜在的地缘政治事件时，战争就会持续不断，直至此事尘埃落定。就算战争没有继续，双方之间也会呈现持续紧张的态势，出现一系列的冲突。这些重大的冲突深植于现实之中，不是能轻易解决的。一个世纪以前，巴尔干半岛的地缘政治问题所引发的频繁战争就很能说明问题。

俄罗斯地处欧洲东部，多次与其他欧洲国家发生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都涉及俄罗斯的地位以及该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团结独立的俄罗斯在这些战争中幸存下来或获胜，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巨大挑战，所以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纠纷最终都没有解决。

俄罗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虽然该国比欧洲其他国家贫穷，但是它拥有两项重要资产——土地和自然资源。正因如此，欧洲强国总是对

俄罗斯垂涎三尺，企图东扩以扩大国土面积和增加财富。但是，据历史记载，但凡入侵俄罗斯的欧洲国家都惨遭失败。这些欧洲国家要么被俄罗斯打败，要么就是身心俱疲致使其他战线的战败。俄罗斯偶尔会将它们的权势向西扩张，利用自身的人口和资源优势来威胁整个欧洲。其他国家经常会趁俄罗斯处于衰落时期利用俄罗斯，但不久之后，这些国家就会为低估俄罗斯的实力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冷战是专门针对俄罗斯的。假如苏联解体时，美国、欧洲和中国能给俄罗斯致命一击，那么俄罗斯问题最终也就能够尘埃落定了。但是，欧洲在20世纪末濒临分裂，势力太弱；而当时的中国则没有发展到可以涉足国际政事。另外，“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忙于与伊斯兰教徒开战，在对俄策略上举棋不定。美国所采取的行动显然准备不足且有些盲目。事实上，美国所采取的行动仅仅让俄罗斯开始警惕美国对其所造成的潜在威胁，并确保俄罗斯能做出回应。

考虑到俄罗斯依然是个统一的大国且雄心勃勃，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问题不久必会卷土重来。这种冲突不会以冷战的方式重演，正如世界大战并非按拿破仑战争的方式重演一样。但它将会回到俄罗斯的根本问题上：如果俄罗斯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它的边境在哪，与邻邦是何关系？这个问题将会占据世界史下一个主要阶段——从现在直到**2020**年。

极力挽回势力范围的俄罗斯

如果想要了解俄罗斯的行为及其意图，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俄罗斯的根本弱点：该国的边境线，尤其是西北边境线。即使在乌克兰受俄罗斯管辖的几个世纪里，以及在白俄罗斯仍属俄罗斯的时期里，俄罗斯北部也没有天然的边境线。俄罗斯中部和南面的边境线固定在喀尔巴阡山脉，北面的边境线远伸至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边境，东面的边境线位于普

里皮亚特沼泽。由于地处沼泽地带，所以入侵者无法由此通行。但是，俄罗斯北面和喀尔巴阡山脉以东的地区并无坚固的缓冲区保卫俄罗斯本国，或者说，保卫俄罗斯的邻国。

无论俄罗斯的边境线划到哪，俄罗斯北部平原总是很容易受到攻击。这个平原上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天然屏障。虽然俄罗斯于1945年将其西部边境线延伸到德国境内，但是此举并没增强其边境线的稳定性。俄罗斯唯一的自然优势就是其地域广度。俄罗斯西部的边境线向欧洲延伸得越远，入侵者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就越久。因此，俄罗斯总是向西迫近至北欧平原，而欧洲则总是向东挺进。

俄罗斯其他的边境线却不是如此（苏联当时也是这个情况）。俄罗斯现在的大体轮廓源自19世纪末的边境线。俄罗斯南面原本有一个天然的安全边境线。黑海流向高加索山脉，俄罗斯隔着黑海与土耳其和伊朗相望。此外，里海和土库曼斯坦南部的卡拉库姆沙漠对伊朗起了一定的防御作用。

卡拉库姆沙漠沿着阿富汗边境线蔓延，直到喜马拉雅山脉。俄罗斯有些担心阿富汗靠近伊朗的地区，所以可能会向南迫近（俄罗斯之前也曾多次这么做），但是其他国家无法从南面的边境线入侵俄罗斯。单从地图上看，俄罗斯与中国的边境线很长，很容易受到攻击。入侵西伯利亚实际上是不可行的，那是一片辽阔的荒野。中国西部的边境线存在一个潜在的弱点，但不算很严重。因此，除了在欧洲北部面临着地理上的劣势以及强大的欧洲国家所带来的巨大威胁之外，俄罗斯“帝国”是十分安全的。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开始变得勇敢无畏。1989年，俄罗斯的掌上明珠圣彼得堡距离北约组织的部队约1 000英里；到2008年，此距离缩短为70英里。1989年，莫斯科距离俄罗斯军事界限1 200英里；而现在仅为200英里。乌克兰独立之后，俄罗斯只控制着黑海的一小部分，所以俄罗斯不得不向高加索山脉的最北面迫近。目前，阿富汗暂时被美国

占领，而喜马拉雅山脉对俄罗斯所起的保护作用也已消失。事实上，不论哪国军队有意侵略，俄罗斯都毫无还击之力。[1]

俄罗斯的战略问题在于其幅员辽阔，但交通不便。如果周边国家同时攻打俄罗斯，那么即使俄罗斯兵力充沛，防御的难度还是很大。俄罗斯在调动兵力方面存在困难，不可能在每条阵线上都部署兵力，所以俄罗斯需要保持相当数量的常备军供其重新部署。这种压力会给俄罗斯经济带来巨大的负担，降低它的经济实力，从内部瓦解俄罗斯，这也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当然，俄罗斯并非第一次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

目前，保卫边疆并非俄罗斯所面临的唯一难题。俄罗斯很清楚地意识到它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危机。目前，该国人口约1.45亿，预计2050年人口将减少到9 000万～1.25亿。不久，是否有能力派遣足够的军队来满足它的战略需求将成为俄罗斯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国内，与其他民族相比，俄罗斯人口逐年减少带来的巨大压力，迫使该国需尽早开始采取行动。就目前的地理位置来看，俄罗斯的国防安全隐患很大。考虑到俄罗斯人口逐渐减少的趋势，如果在20年之后才开始采取行动则为时已晚，而该国领导人很清楚这点。俄罗斯无需征服整个世界，但必须重新控制该国的护身符——也就是苏联的边境线。

俄罗斯必须设法从根本上解决其在地缘政治、经济以及人口方面的问题，通过工业化让俄罗斯成为现代化国家，赶上欧洲其他国家。但是它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2000年，俄罗斯改变了策略，并没有像在过去几个世纪那样，把重点放在工业发展方面，而是重新成为自然资源的出口商，尤其是能源出口。此外，矿物质、农产品、木材和贵金属也是俄罗斯出口的商品。

把重点从工业发展转向原材料，俄罗斯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一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为普遍的道路。由于突如其来的能源和商品价格上涨，这一举措不但拯救且巩固了俄罗斯的经济，而且使得该国能够实施它们精心选择的再工业化进程。更重要的是，较之工业生

产，自然资源生产所需的劳动力要少得多。所以，即使俄罗斯人口数量正逐年减少，该国的经济基础还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此外，这项举措还增加了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筹码。欧洲对能源的需求非常急迫，而俄罗斯正在修建往欧洲输送天然气的管道，此举不但能帮助欧洲解决能源以及自身的经济问题，而且还能将欧洲置于俄罗斯附庸国的位置。在整个世界都急需能源的大环境下，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如同海洛因。一旦某些国家开始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就会对此上瘾。俄罗斯已经用天然气来迫使它的邻国屈从于它的意愿。这种权势已经深入欧洲的中心地带，苏联的东欧附庸国和德国都依靠俄罗斯的天然气。俄罗斯在天然气和其他资源的供给方面会给欧洲国家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附庸国也可能是把双刃剑。如果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弱国，那么它不仅无法给其邻国造成压力，而且反而会被它的邻国侵占。所以，俄罗斯必须恢复它的军事力量。富裕但软弱对一个国家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俄罗斯必须有能力保卫自身拥有的自然资源，并以此来影响国际大环境。

在未来的10年里，俄罗斯将会日益富裕（至少和过去相比），但地理上却缺乏安全性，所以俄罗斯需要用财富来增强军事力量以保护自身利益，建立缓冲区以保卫国土不受他国侵犯，然后在缓冲区之外再增加进一步的第二级缓冲区。俄罗斯的宏伟战略计划包括在北欧平原建立深度缓冲区，同时划分并操纵邻国，从而在欧洲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平衡态势。俄罗斯所不能容忍的就是虽然拥有牢不可破的边境线却没有缓冲区，也不愿意看到邻国联合对抗自己。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未来的行动会显得进攻性极强，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在防守。

俄罗斯的行动将会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俄罗斯会恢复苏联时期的影响力和有效的控制力，重新建立苏联时期形成的缓冲区域体系；其次，俄罗斯会试图在苏联的边境线之外建立第二级缓冲区，但俄罗斯不

会树立起一道对立墙，因为在冷战中，这种对立墙让俄罗斯无法呼吸；最后是俄罗斯需要解决的头等要事：阻止反俄联盟的形成。回想一下，为什么苏联能够在20世纪后半叶保持完好无损？苏联并非靠武力团结在一起，而是靠支撑苏联的经济关系体系。苏联与俄罗斯一样，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内陆国，位于亚欧平原的中心。苏联的国内运输系统匮乏，这就像内陆区域的河流灌溉体系无法与农业体系相匹配一样糟糕。因此，俄罗斯很难运输食品——在工业化以后则很难运输工业制成品。

苏联是亚欧大陆的一部分。亚欧大陆从太平洋向西一直延伸至中国北部荒原，北部气势磅礴的山脉源起中国西北部，从中南亚边界继续绵延至里海，一直到高加索山脉。黑海和喀尔巴阡山是亚欧大陆的缓冲区域。北面就是北极。此间存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经济萧条的俄罗斯。[2]

如果我们将苏联看做一个由地形封闭且经济落后的国家组成的自然联盟，就能发现是什么让苏联如此牢不可破。苏联的各个国家注定要联系在一起。虽然它们在经济上无法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竞争，但是它们可以相互帮助和扶持。这个自然联盟欣然接受俄罗斯的支配。喀尔巴阡山以外的国家（“二战”后被俄罗斯占领，并成为俄罗斯的附属国）并不包含在这个自然联盟当中。如果不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力量，这些国家将会以欧洲的其他国家为导向，而不是俄罗斯。

苏联的成员国实在无路可走。经济模式非常陈旧，而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的新经济模式让这些成员国比以往更加依赖于俄罗斯。虽然乌克兰对欧洲其他国家充满了诱惑力，但它无法与欧洲竞争或者开展合作，于是很自然地与俄罗斯建立了经济关系。该国在能源方面需要依靠俄罗斯，这导致军事上要受到俄罗斯的支配。

俄罗斯需要运用这些优势重塑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俄罗斯不需要在莫斯科重新创建一个正式的政治结构——虽然这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在未来5～10年里，俄罗斯会展现出对这个区域的影响力。为了分

析这一情况，让我们把俄罗斯分为三个战区——高加索战区、中亚战区以及欧洲战区（包括波罗的海）。

高加索地区的战略演变

高加索山脉是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分界线。有史以来，它一直是两个帝国之间的导火索。冷战期间，它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土耳其和苏联的边境贯穿高加索山脉，其中，苏联这边包括三个加盟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这三个国家目前都已独立。高加索山脉向北延伸至俄罗斯联邦境内，包括达吉斯坦的穆斯林区，更重要的是还包括车臣。自从苏联解体之后，反对俄罗斯统治的游击战在车臣地区愈演愈烈。

从防御角度来看，只要俄罗斯和土耳其双方将分界线的基点定在高加索山脉，那么俄罗斯和土耳其双方如何精确地划分边境线所带来的影响并不大。在崎岖地带，防卫要简单许多。然而，如果俄罗斯完全失去在高加索山脉的阵地并向北收缩至低地地区，那么俄罗斯的情况就会变得很严峻。由于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峡谷宽度仅为几百英里，俄罗斯可能会因此陷入战略危机。

这也是俄罗斯不愿意与车臣妥协的原因。车臣南部处于高加索山脉北侧。如果失去车臣，那么整个俄罗斯的地理防御将会受到极大冲击。如果可以选择，在亚美尼亚是俄罗斯的同盟国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宁愿向南趋近格鲁吉亚。如果格鲁吉亚属于俄罗斯，那么整个局势就会更稳定。控制车臣势在必行。重新与格鲁吉亚建交值得一试。控制阿塞拜疆无法为俄罗斯提供战略优势，但是俄罗斯并不介意将阿塞拜疆和伊朗作为其缓冲区。俄罗斯对于这样的战略位置尚可接受，但是格鲁吉亚与美国的关系向来密切，这是俄罗斯所不能忍受的。

战争在这个地区愈演愈烈，而且总是在位于山地地区的小国爆发，

例如，亚美尼亚人憎恨土耳其人。它们指控土耳其在20世纪早期对亚美尼亚人实行了种族灭绝。亚美尼亚人指望着俄罗斯来保护它们。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对抗局势仍然很紧张。尽管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格鲁吉亚人对亚美尼亚人有很强的敌意，并小心谨慎地提防俄罗斯人。俄罗斯相信当武器经由格鲁吉亚运往车臣时，格鲁吉亚人的看法就会改变。俄罗斯还认为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过近的地理位置使得局势趋于恶化。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也持有敌意，因此，阿塞拜疆与伊朗和土耳其的关系相当密切。

高加索地区的局势不仅很难理解，而且还很难处理。事实上，苏联曾设法解决了这一错综复杂的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高加索附近的小国全部并入苏联，并被残忍地剥夺了自治权。无论现在还是未来，俄罗斯都不可能不重视这个地区——除非俄罗斯准备失去它在高加索地区的战略地位。因此，俄罗斯要从格鲁吉亚开始，重塑该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

由于美国视格鲁吉亚为其战略资产，俄罗斯想要重申其在格鲁吉亚的战略立场就意味着要与美国对抗。除非车臣地区的武装反抗彻底消失，否则俄罗斯就必须向南行进，孤立车臣的武装反抗力量，从而在高加索地区站稳脚跟。[3]

有两股势力不愿意此事发生，其一是美国，其二就是土耳其。美国认为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控制会逐渐削弱它在该地区的势力。土耳其则认为，如果俄罗斯控制了格鲁吉亚，那么俄罗斯军队会重新回到它的边境。而俄罗斯相信，正是由于他国的阻碍，它更加需要行动起来。因此，高加索地区必定会有一场决斗。

“北极熊”的中亚棋局

中亚幅员辽阔，位于里海和中国边境之间。该地区是穆斯林信徒的

聚集地。苏联解体之后，穆斯林世界爆发大规模动乱。因此，正如我们所见，中亚地区的局势同样动荡不安。中亚地区的能源储备增加了自身的经济价值，但是该地区对俄罗斯的战略并不重要——除非另一大国有意统治中亚并将中亚作为对抗俄罗斯的战略基地。如果那样的话，中亚地区的重要性将不容小觑。只要控制哈萨克斯坦，距离伏尔加河就仅有几百英里，那可是对俄罗斯农业至关重要的水路。

20世纪90年代，西方能源公司在中亚地区涌现。俄罗斯对此并无异议。俄罗斯无力与西方国家竞争，也无力用军事控制该地区。俄罗斯对中亚地区持相对冷淡的态度，因为对俄罗斯来说，这不过是个中立地区。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9·11”事件对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重新下了定义，使美国入侵阿富汗变得更为紧迫。由于美国无法立即发动侵略战争，它需要向俄罗斯求助。

美国希望俄罗斯能够帮助它让北方联盟（阿富汗地区的反塔利班组织）在战争中发挥主要作用。该联盟由俄罗斯发起建立，并受到了俄罗斯的有效控制。此外，美国还希望俄罗斯支持其在几个中亚国家建立安全基地。严格说来，这些中亚国家都是独立国家，但是美国向北方联盟寻求了帮助，也不想得罪俄罗斯。此外，中亚地区的国家都不愿惹恼俄罗斯，而且美国的战机必须越过苏联的上空才能抵达中亚的各个国家。

俄罗斯赞成美国军队出现在中亚地区。俄罗斯认为已经和美国就此达成非正式协议——美军出现在中亚地区不过是暂时的情形。但是由于阿富汗战争久拖未果，美军需要继续待在阿富汗；而由于美军没有撤离，美国逐渐开始影响这个地区。俄罗斯意识到中亚这个缓冲区将要被另一个世界强国所控制，这个世界强国不断在乌克兰、高加索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紧逼俄罗斯。另外，由于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而俄罗斯又采取了新的经济战略，所以中亚地区的能源显得尤为重要。

俄罗斯不希望看见美军出现在伏特加河100英里之内。显而易见，俄罗斯必须采取行动。但是俄罗斯不会直接行动，而是操控中亚地区的

政治形势，削弱美国的影响力。这一行动旨在重新将中亚地区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内。而美国作为另一世界强国，混乱的阿富汗、伊朗以及巴基斯坦使其面临孤立的状态，无法做出还击。俄罗斯随之重新夺回了该国原先的战略位置。显然，中亚地区也是美国海军无法到达的少数地区之一。

迫于俄罗斯的压力，美国无法继续留在中亚地区。中国可能对中亚地区造成潜在威胁，但可能性较小。中国的确对中亚地区有经济上的影响力，但俄罗斯的财政和军事实力足以胜过中国。俄罗斯也许会让中国进入中亚，但是中俄双方在19世纪达成的协议将继续生效。因此我认为，2010年之前，即在欧洲出现重大冲突之前，中亚会重新回到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内。[4]

俄罗斯与欧洲：“新冷战”中胶着前行

欧洲战区位于俄罗斯的正西方。在这个区域，俄罗斯的西方边境线正对着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独立共和国。这些国家都是苏联的成员国。除了这些国家以外，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国家都是苏联的附庸国。为了国家的基本安全，俄罗斯必须控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控制波罗的海各国也很重要，而只要俄罗斯南部根植于喀尔巴阡山脉，并且在北欧平原拥有雄厚的军事力量，那么东欧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但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

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意味着一切。如果这两个国家落入敌手（例如，加入北约组织），那么俄罗斯将身陷险境。莫斯科距离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交界处仅200多英里，而乌克兰距离伏尔加格勒（伏尔加河下游城市，曾称为斯大林格勒）甚至不到200英里。因为地理的纵向深度，俄罗斯保卫了自己的国家不受拿破仑和希特勒的侵略。没有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没有了地理上的优势。当然，现在去猜想北约是否会对俄罗斯造成威胁似乎很荒谬，但是俄罗斯相信20年的轮回，它认为一切皆有可能。

俄罗斯知道美国和北约正有条不紊地扩展它们的势力范围，它们不断吸收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成为北约成员国。一旦美国着手将乌克兰纳入北约，俄罗斯对美国的意图和乌克兰的看法就会改变。俄罗斯认为，将乌克兰纳入北约威胁了俄罗斯的利益，就好比墨西哥进入华约将会威胁美国的利益一样。当橙色革命（反共亲美的暴动）要将乌克兰送入北约时，俄罗斯指控美国试图包围俄罗斯并将其毁灭。美国决定公开与俄罗斯争论，它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不会潜在性地破坏俄罗斯的国土安全。

俄罗斯并没有调动它们的军队而是调动了情报部门。该部门安插在乌克兰的秘密特工就像是潜伏在得克萨斯州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俄罗斯在暗中破坏了橙色革命，在乌克兰东部亲俄派以及乌克兰西部亲美派之间挑拨离间。事实证明做到这点并不困难，很快乌克兰的政治形势陷入了僵局。俄罗斯恢复对基辅（乌克兰首都）的影响力不过是时间问题。

白俄罗斯的问题就更简单了。正如之前提到的，白俄罗斯是苏联成员国中改革力度最小的国家，它仍是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更重要的是，白俄罗斯领导层曾多次缅怀苏联，并提议与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结为联盟。当然，这个联盟无疑需按照俄罗斯的意愿而建立，这必将造成局势紧张，但是让白俄罗斯加入北约是完全不可能的。

五年之内，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重新被纳入到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已知的事实。那时候，俄罗斯大致已将其边境线退回到与欧洲接壤的地方。南面根植于高加索山脉，并可以保卫乌克兰；北面边境线位于欧洲平原北部，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毗邻。那样的话，又会出现两个问题：北部最强盛的国家是哪个？边境线该如何精确划定？

而真正的导火线将是那些波罗的海国家。

入侵俄罗斯的一贯路径是喀尔巴阡山脉北部和波罗的海之间的峡谷。这一地区地势平坦，几乎没有河流障碍，所以入侵者可以平稳地穿过欧洲平原北部。欧洲入侵者可以从正东方进入莫斯科，或者从西北方进入圣彼得堡。冷战期间，圣彼得堡距离北约前线超过1 000英里。如今，这一距离缩短至70英里。这解释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面临的战略紧迫性。

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曾是苏联成员国。苏联解体后，每个国家分别独立，并纷纷加入北约。正如我们所见，欧洲极有可能因为距离北约太远而没有能力充分利用这一形势。然而，俄罗斯不会拿自己的国土安全去冒险。1942年，俄罗斯眼睁睁地看着德国这个在1932年已经几乎瘫痪的国家踏入了莫斯科的门槛。将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一起纳入北约，可以使北约的边境线非常接近俄罗斯的中心地带。在过去200年里，俄罗斯三次被他国入侵。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俄罗斯不得不重视北约成员国可能对自己造成的威胁。

俄罗斯认为，入侵俄罗斯最主要的路径不但完全暴露在外，而且那些对俄罗斯持有敌意的国家还控制着这一路径。波罗的海国家至今痛恨俄罗斯对它们的统治。波兰人同样对俄罗斯充满了仇恨，对俄罗斯的意图也深表怀疑。由于它们已经是北约的成员国，这些国家也就形成了一条前线。尾随它们的就是德国，就像波兰人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人不信任俄罗斯人一样，俄罗斯人压根就不信任德国人。的确，俄罗斯人有些偏执，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敌人，或者断言他们是疯子。

这也许会成为某种对抗的导火索。俄罗斯原本可以与中立的波罗的海国家和平共处。然而，波罗的海国家加入了北约，与美国的关系密切。显然，俄罗斯无法冒险与这样的波罗的海国家和平共处。另一方面，美国已从中亚地区撤离，在高加索地区也少有行动，所以美国不会从波罗的海国家撤军。如果在这三个北约成员国的问题上有任何妥协，

那么整个东欧地区就会陷入恐慌。东欧国家的行动也将无法预料，而且俄罗斯影响力向西蔓延的可能性也将增大。俄罗斯可以获得很大利益，但是美国的位置不容小觑。[5]

俄罗斯下一步行动可能会就联合防御体系与白俄罗斯达成协议。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建交多年，所以两国恢复之前的关系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俄罗斯会将其军队派往波罗的海边境。另外，俄罗斯还可以派军前往波兰边境，此举将导致对抗全面升级。

波兰害怕俄罗斯和德国。夹在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地理防卫的波兰，总是害怕更强大的那个国家。其他东欧国家至少还有喀尔巴阡山脉这个障碍挡在俄罗斯面前，且这些国家是与乌克兰而非俄罗斯接壤。与此不同，波兰地处危险的北欧平原。在与波罗的海国家对抗的过程中，当俄罗斯大规模进军至其边境之时，波兰必将做出反击。波兰并非小国，现有人口4 000万。而且，有美国在背后做支援，波兰绝不容小觑。

在争取波兰的支持之前，俄罗斯首先要获取波罗的海国家的支持。俄罗斯会将乌克兰拉入其与白俄罗斯的联盟当中，并将俄罗斯军队派往波兰边境并向南延伸至黑海。到那时，俄罗斯就会开始尝试让波罗的海国家保持中立。我相信，这一切将会发生在2015年左右。

为恢复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影响力，俄罗斯可采取三种手段：

> 首先，秘密行动。如同美国秘密为世界上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及能源，俄罗斯将以同样的方式为这些地区的俄罗斯族和亲俄力量提供资金和能源。
>
> 其次，如果波罗的海国家镇压这些行动，那么俄罗斯就有借口使用第二种手段——经济制裁，尤其是切断天然气的供应。
>
> 最后，俄罗斯会派遣大批军队至波罗的海国家边境，给这些国

家造成军事压力。毫无疑问，这将对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美国在俄欧关系中的角色

近几年来，有许多关于俄罗斯军事弱点的会谈都准确指出了苏联解体10年以来俄罗斯的军事软肋。但是现在，新情况又出现了：俄罗斯军队的弱点在2000年发生改变，而到2015年之时，那些弱点将不复存在。欧洲东北部的对抗不会突然升级，但是这场对抗将会长期持续下去。俄罗斯有充裕的时间去发展军事力量。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坚持研究发展的一个领域就是高端军事科技领域。到2010年，俄罗斯肯定拥有该地区最高效的军队。2015～2020年，俄罗斯将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挑战任何企图往波罗的海地区派遣兵力的国家，包括美国。

俄罗斯将面对北约一群缺乏自卫能力的国家。只有当美国准备使用武力之时，北约才能起作用。正如我们所见，美国在亚欧大陆问题上始终坚持一个核心政策：阻止任何国家支配整个亚欧大陆或者亚欧大陆的一部分。如果中国和欧洲方面的势力减弱，那么美国能够避免一场全面战争的爆发，从而获取根本利益，其方式就是让俄罗斯无法顾全全球战略，只能聚焦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美国会使用技术援助的传统方式来支持这些国家。2020年，这种方式将会变得更加有效。为战争发明的新技术使得军事力量规模越小，效率越高，这就意味着如果小国家能够获得高端技术，它们就可能拥有远远超越其国家规模的军事力量。美国急切期望增强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力量，以此来约束俄罗斯，这也是控制俄罗斯的最好方法。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是第二条导火索，是激怒俄罗斯的原因，也是转移欧洲兵力的关键。所以，美国必将入侵格鲁吉亚。但是，真正的关键地区在欧洲，而不是高加索。

考虑到美国的强大实力，俄罗斯对美国发动直接进攻，美国也不会让它的同盟国去冒险。相反，俄罗斯会试图给美国在欧洲地区或世界其他国家的事务上增加压力。例如，俄罗斯会试图破坏其邻国政府的稳定，像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战火将蔓延至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所有边境线。

俄罗斯的基本战略是试图瓦解北约并孤立东欧国家。这一战略的关键在于德国，然后是法国。这两个国家都不想再与俄罗斯对抗。法德两国都是岛型国家，而且德国需要依赖俄罗斯出口的天然气。德国正尝试降低这种依赖性，但这种依赖不会立即消失。因为，俄罗斯会提醒德国，美国会再次利用德国来抑制俄罗斯，而俄罗斯不但不会威胁德国，而且还与德国共享利益（即两国之间稳定中立的缓冲区域——波兰）。俄罗斯还表明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不应该掺杂其中。波罗的海国家不会成为美国的主要控制对象，除非美国计划入侵俄罗斯。考虑到要形成一个更庞大的联盟，俄罗斯时刻准备着保障波罗的海国家的自治权以及波兰的国家安全，用以回报这些国家的中立态度。德国和法国对另一种选择（战争）也没有任何兴趣。

在欧洲看来，美国的侵略欲望极强，可能会在东欧激起不必要的麻烦来威胁俄罗斯。如果德国允许北约这么做，那么德国将会卷入到一场冲突当中，这将损害德国的利益。因此，我认为德国会阻止北约对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支援——北约需要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运作，而德国是其中的主要国家之一。俄罗斯期望北约撤销支援会对波兰和其他国家造成打击，迫使这些国家做出让步。

但是，事实恰巧相反。地处俄罗斯和德国之间，这一直是波兰的历史噩梦。所以，波兰需要更多地依赖美国的支持。美国看准这是个用较少的花费便可压制俄罗斯的大好机会，它可以从中线开始分裂欧洲，弱化欧盟的势力。从这点来说，美国将会增加其对东欧的支援。到2015年，一个新的多国集团将会出现，主要包括苏联的附属国和波罗的海国

家。这一集团远比西欧国家富有活力。靠美国的支持，这一集团将爆发令人惊叹不已的能量。

为回应美国这一抢夺势力的狡猾举动，俄罗斯将试图在别的方面给美国施加压力。例如在中东地区，巴以冲突永无休止，而俄罗斯将增加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援助。总的来说，俄罗斯的军事援助会轻易进入任何反美政权存在的地方。到2015年，一场全球性对抗即将发生，而这场对抗将在2020达到高潮。对抗双方不会冒险开战，但是双方会调遣兵力增强自己的军事筹码。

到2020年，这场对抗将成为最主要的世界话题，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这场对抗是个长期问题，但也许没有冷战涉及的范围那么广泛。俄罗斯没有能力控制整个亚欧大陆，也不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威胁。但是，俄罗斯会对某一区域造成威胁。那样的话，美国就必须做出回应。俄罗斯边境局势会很紧张，但是美国没有能力（或者也不需要）像对付苏联那般，在俄罗斯边境周围部署警戒线。

如果这场对抗发生的话，欧洲对碳氢化合物的需求将成为一个战略问题，因为欧洲主要从俄罗斯进口它们需要的碳氢化合物。美国不再将其战略重点放在碳氢化合物能源上，而是将关注点高度集中在开发替代能源上。俄罗斯一如既往地将重点放在其现有工业上，而不是去开发新能源。这就意味着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将增加，而不是新能源。因此，俄罗斯不会走在高新科技发展的最前端，而主宰本世纪的后半叶的恰巧正是高新科技。

相反，俄罗斯需要发展其军事力量。因此，正如过去的两个世纪那样，俄罗斯将会把资金致力于应用新科技以开发尖端军事武器，拓展现有工业。这样，俄罗斯仅在非军事方面落后于美国及世界上其他国家，而在高端科技方面并不落后于这些国家,但事与愿违，俄罗斯将深受碳氢化合物这一财富的影响，因为俄罗斯没有开发新科技的刺激因素，而且军事开销也会增加俄罗斯的负担。

俄罗斯重整旗鼓的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10年左右。到那时，它国将会低估俄罗斯的实力。其他国家会认为俄罗斯已四分五裂、经济萧条、兵力软弱。2010年，俄罗斯边境的对抗加剧，且其邻国提高警惕。那时候，越是强国就越倾向持蔑视态度。

美国尤其倾向于先低估敌人，然后再高估敌人。到2015年左右，美国又将受到俄罗斯的困扰。此处有一个有趣的过程值得深入观察。美国情绪摇摆不定，但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美国所执行的外交政策始终保持一如既往的理性。那样的话，尽管俄罗斯的发展会引起美国的不安，但美国仍将利用非战争手段来最大限度地牵制俄罗斯。

对峙的断层线在哪里很重要。如果要将俄罗斯复苏带来的危机降至最低，那么俄罗斯会占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还可能将摩尔多瓦纳入其势力范围，但是它不会占领波罗的海国家，也不会占领高加索西部的国家。如果俄罗斯千方百计想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并得到巴尔干半岛地区国家的支持，或者是与斯洛伐克这样的中欧国家结盟，那么，美俄之间的竞争将愈演愈烈。

但事实上，事态并没有那么严重。为回应俄罗斯的行动，美国只需动用一小部分军事力量，就会让俄罗斯难以招架。暂且不管欧洲其他国家会如何行动，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会全力以赴制止俄罗斯的进攻行动，并与美国签订任何协议以换取美国的援助。因此，如今这条断层会定在喀尔巴阡山脉，而不是像冷战时期那样定在德国境内。波兰北部平原将成为这一对抗的主干线，但是俄罗斯不会采取军事行动。

引发这场对抗的原因（也是之前冷战的原因）会造成与冷战同样的后果，只不过在这次对抗中，美国付出的努力更少些。上一次美俄对抗发生在中欧，而这次对抗的发生地远至欧洲东部；上一次对抗中，中国是俄罗斯的同盟国（至少在对抗开始阶段是这样的），而这次，中国不再参与其中；上次对抗中，俄罗斯完全控制了高加索地区，但如今，俄

罗斯不再拥有高加索地区的掌控权，而且其北部还需承受来自美国和土耳其的压力；上次对抗时，俄罗斯人口众多，但如今俄罗斯人口呈下降趋势。受国内压力的影响，尤其是南部地区的影响，俄罗斯的注意力不得不从与西方国家对抗转移到处理内政。最终，即使没有战争，俄罗斯也将会四分五裂。1917年，俄罗斯爆发革命；1991年，苏联解体；而在2020年后不久，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将再次土崩瓦解。这就是所谓“俄罗斯二次解体”。

注释

［1］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71～173.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独特的陆权大国，经度跨越东经26°至西经170°，几乎占地球的一半。主要出海口在北方，一年中数月被北极冰层封锁。马汉曾暗示过，俄罗斯作为陆权国家常年处于不安全境地。在获得海洋屏障之前，他们永不满足，要么继续扩张，要么坐视别人征服。俄罗斯土地平坦宽阔，几乎没有自然边界为其提供保护，因此他们对陆地上的敌人充满恐惧，这也是麦金德学说的一个主要议题。因此，俄罗斯想方设法把边界推到中东欧中间，以阻止19世纪法国和20世纪德国的进犯。为了限制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并寻求在印度洋的温水出海口，俄罗斯多次出兵阿富汗，他们还把边界强推到远东，以限制中国。此外，俄罗斯对高加索山脉的作用极为重视，将其作为屏障，以防御大中东的政治和宗教争端。

俄罗斯面临的另一个地理事实是严寒。俄罗斯的大片陆地都位于北纬50°以北，大部分人口居住在比加拿大更寒冷的气候带上。地理学家索尔·科恩（Saul Cohen）写道，“俄罗斯纬度较高，又远离海洋，加上山脉的屏障作用和大陆性气候”，使得该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寒冷干燥，

不适宜永久定居。但高加索和靠近朝鲜边境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例外，这也是高加索的另一个吸引力所在：处于北纬43°，气候相对温和。

俄罗斯的气候和地貌确实严酷到极点，这也是掌握俄罗斯人性格和历史特点的钥匙。俄罗斯史学家菲利普·朗沃思写道，俄罗斯的极度高寒，似乎正是这个民族“能够承受苦难，普遍具备集体主义意识，甚至愿意为共同利益牺牲个人”的原因。他解释说，北部高纬度地区农作物生长季节很短，需要农民之间齐心协力，“通过狂热而艰苦的努力完成长时间的田间劳作，甚至要动员儿童参加”，因为播种和收获的全过程，都不得不匆匆完成。

此外，寒冷造成的低产量，促使新兴的俄罗斯富豪们尽力控制广阔的土地，这严重扼杀了农民的积极性，只要没人强制就不愿多干活，这造成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具有“暴力倾向”。俄罗斯共产主义的特点以及对于个人自由的不以为然，都与寒冷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空荡荡的大地，冰冷平原上的大教堂和防御工事，东正教的祈祷诵经以及所有风俗制度，都体现了集体主义的冷酷无情。

俄罗斯北部处于北极圈和北冰洋之间的冻土带，常年覆盖着冰雪，除了苔藓和地衣外寸草不生。当夏季冰雪融化时，大量的蚊虫又会泛滥成灾。冻土带往南是世界上最大的针叶林，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这样的地区，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占40%左右。在俄罗斯南部，从西部匈牙利平原经由乌克兰、北高加索地区以及中亚，一路直到远东，绵延着世界上最大的草原，用俄罗斯学者W．布鲁斯·林肯（W. Bruce Lincoln）的话说，这简直就是一条“以草铺就的大路”。

麦金德说过，俄罗斯人本来是蜷缩在森林里的民族，从远古、中世纪到近代早期一直受到亚洲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迫于无奈，不得不寻求对外扩张与征服。特别是蒙古人，包括中世纪莫斯科公国附近的金帐汗国和中亚的蓝帐汗国对他们的长期侮辱和侵犯，直接导致俄罗斯错过了文艺复兴时期，但同时也赋予他们共性、动力和极强的目的性，这些

至关重要的品质最终反过来帮助他们摆脱了蒙古人统治的枷锁，在近几个世纪里夺取大片领土。历史学家G.帕特里克·马奇（G. Patrick March）认为，蒙古人的统治造就了俄罗斯人“对暴政的极大容忍”，使他们在遭受困苦的同时，患上了“侵略妄想恐惧症”。

不安全感是俄罗斯典型的民族情感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馆员詹姆斯·H．比林顿（James H. Billington）写道：“既想在历史中寻根，又希望利用历史为自身辩护，这种需求部分源于来自东部平原的不安全感。”

［2］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79～180.

当法国和英国这两个海权帝国忙于应付海外的劲敌时，俄罗斯却不得不在自己的领土上接受敌人的挑战。忧虑和警惕，成了他们从早期历史中学会的东西。这个国家似乎总是处于不同形式的战争状态，再来看看高加索的例子：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穆斯林在18世纪后期抵抗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军队，19世纪则继续与沙皇战斗，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不曾安歇；而高加索南边更顺从的地区，如格鲁吉亚，早在很久之前已纳入沙皇统制下。车臣的好战，源于其生活条件的极端困窘。石质山脉少得可怜的土壤本就收成极低，还需要拿起武器来保护绵羊和山羊免遭野生动物的侵害。在经过高加索地区的贸易路线上，车臣人既是导游也是劫匪；此外，他们虽然皈依了苏菲伊斯兰教，却往往不像其他教派信徒那样狂热，而是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保卫家园、抵御东正教俄罗斯的入侵上。地理学家丹尼斯·J.B.肖（Denis J. B. Shaw）写道，在高加索地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哥萨克殖民者，遇到了山区暴民的顽强抵抗。除了奥塞梯人以外，此地居民在文化上都从属于伊斯兰，这更使他们下定决心痛击俄罗斯入侵者”。

出于对北高加索地区人民独立精神的恐惧，布尔什维克拒绝将其纳入统一的共和国，而是将其与不同语言和民族构成的其他民族人为划分

到一起。正如肖指出的，“把卡尔巴德人与巴尔卡尔人划分在了一起，尽管前者与切尔克斯人有更多共同之处，而后者与卡拉恰伊人更合得来”。更有甚者，1944年斯大林以涉嫌与德国人合作为由，将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卡尔梅克人流放到了中亚。他摆出的这副冷酷面孔，相当一部分是由高加索造成的。这是陆权国家的宿命，也是他们对征服的需求使然。

［3］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70～171.

从历史上来说，高加索始终紧扣俄罗斯人的心弦，索尔仁尼琴这样激烈的民族主义者，特别对它充满恐惧和敬畏。在黑海和里海之间有一座大陆桥，欧洲在这里逐步消失于绵延600英里、高达18 000英尺的群山中，那蜿蜒的山脊格外迷人，舒展而平坦的草原向北延伸。这里是俄罗斯的“蛮荒西部”，虽然这些山脉处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南边。自17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俄罗斯殖民者试图征服的“蛮夷”民族的聚居地，他们包括车臣人、印古什人、奥塞梯人、塔吉斯坦人、阿布哈兹人、卡特维尔人、卡克特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等；在这里，俄罗斯也见识了伊斯兰教的温文尔雅和残酷无情。俄罗斯人对高加索地区复杂的情感，让他们既着迷又惶恐，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故事，也在这里打开了窗口。

［4］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9～197.

听起来有点讽刺，虽然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各单一族群间缺乏完整的身份识别，居然也曾一度保持了中亚的适度稳定，只是偶尔在费尔干纳河谷等地出现动荡。中亚极端丰富、充满活力的天然资源，给其中一些国家提供了与莫斯科和北京讨价还价的底气。中亚天然气需要通过俄罗斯输送到欧洲市场，这是俄罗斯对欧洲的筹码，但俄罗斯的立场正因中国自己购买中亚油气而受到威胁。

中亚的自然资源的确得天独厚。哈萨克斯坦的田吉兹油田储量，据探为阿拉斯加北坡的两倍；土库曼斯坦每年的天然气产量居世界第三位；吉尔吉斯斯坦是前苏联最大的汞和锑生产基地，另有巨大的金、铂、钯、银储量。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对前苏联占领的强烈不满，导致乌兹别克斯坦开放其通往阿富汗的铁路桥作为北约的通路，而没有征得俄罗斯同意；此外还面向土库曼斯坦提供多元化的能源路线，而非完全依靠俄罗斯；在工程建设方面，他们宁可寻求哈萨克斯坦或欧洲的帮助，以开发利用里海大陆架的石油储量，也不求助俄罗斯的工程师。

以上种种因素，使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难以维持，并在某种程度受制于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因为俄罗斯经济就像中亚一样，本质上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如果俄罗斯新帝国成功建立，将可能只是昔日帝国的一个薄弱轮回，不仅受制于翅膀渐硬的中亚各国，也受制于中国在中亚影响的上升，印度和伊朗的限制也会给它造成一定影响。中国在中亚投资超过250亿美元，并为横跨哈萨克斯坦的2 000英里高速公路买单。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市和中国西部的乌鲁木齐市之间每日有航班往来，中国商品极大地填补了中亚市场的空缺。

哈萨克斯坦可能是俄罗斯在欧亚大陆财富的最终寄存器。作为一个欣欣向荣的中等收入国家，哈萨克斯坦地理面积相当于整个西欧，国内生产总值比所有其他中亚国家加起来都大。新首都阿斯塔纳位于由俄罗斯民族主导的北部地区，苏联解体后，头脑发热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想吞并它。沿哈萨克斯坦北部有3 000英里范围与俄罗斯边境接壤，属于前苏联的9个州8个在北部地区，人口近90%属非哈萨克人。阿斯塔纳的象征性建筑“生命之树”，由诺曼·福斯特爵士设计，象征着哈萨克斯坦保卫国家免受俄罗斯侵犯的决心。阿斯塔纳再造计划耗资100亿美元，它与南部地区以高速列车相连。

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在向真正的独立国家迈进，并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它正在开发3个超巨型的“大象项目”，即石油、天然气和炼油

业。里海海域有两大油田，主要由西方跨国公司投资，从里海到中国西部的新石油管道也将很快完成。此外，哈萨克斯坦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铀生产国；它还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铬、铅、锌储量，锰矿储量全球第三，铜储量全球第五，并拥有占世界前十位的煤、铁和金储量。

哈萨克斯坦，是麦金德真正的心脏地带！这里集中了世界上所有的自然战略资源，欧亚大陆中部的咽喉要道在这里相互重叠：地处西西伯利亚和中亚，向西1 800英里外有里海，东部伸展到蒙古；乌拉尔山在哈萨克斯坦的西北部，天山山麓则始于东南部。哈萨克斯坦属极端大陆性气候，阿斯塔纳冬季拂晓前的气温可至零下40摄氏度。麦金德认为，一些大国或超级大国必须控制心脏地带，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心脏地带在其原住民手中，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争夺的只能是能源资源。俄罗斯若想影响哈萨克斯坦并以某种方式施压，哈萨克斯坦必然无法抵御，但若被逼到极致，他们可以随时转向中国；俄罗斯将会受到国际反对和外交孤立，等于自吞苦果。2008年，在格鲁吉亚这个只占哈萨克斯坦1/40、人口只相当于对方1/3、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已经暴露了俄罗斯在大陆进行军事冒险的局限性。事实上，当吉尔吉斯斯坦在2010年向俄罗斯发出暗示性请求，希望俄罗斯军队干预制止其种族骚乱时，俄罗斯拒绝了。它害怕陷入一个多山的中亚国家，尤其是在哈萨克斯坦的边远地区。

俄罗斯在中亚军事行动中面临的另一个制约因素就是中国，他们在远东共享漫长的边界。俄罗斯与中国的交好将为上海合作组织注入活力，目的是联合欧亚国家（主要是权威体制国家），以抗衡美国的影响。俄罗斯和中国之间若心存敌意，对美国和欧洲在欧亚大陆的影响更大。因此，俄罗斯将约束别国在中亚的行为，坚决阻止任何国家企图以武力收回部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

［5］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192～194.

然而，普京没有完全放弃俄罗斯在地理上属于欧洲的维度。他对乌克兰的关注，背后还有更大的企图，那就是在海外周边重新打开势力范围，这进一步印证了他想把俄罗斯以非民主的条件锚定于欧洲的野心。乌克兰作为支点国，南部毗邻黑海，西部接前东欧卫星国，它若独立将使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与欧洲绝缘。然而，乌克兰西部地区奉行希腊和罗马天主教，东部则为东正教；西乌克兰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温床，东部地区则主张与俄罗斯保持更加密切的关系。

换句话说，乌克兰自身的宗教地理特点使该国具有中东欧之间的边疆作用。布热津斯基写道，没有了乌克兰，俄罗斯虽仍然是一个帝国，但只能是一个“以亚洲型为主”的帝国，并将进一步卷入与高加索和中亚国家的冲突。一旦乌克兰重归俄罗斯统治，俄罗斯面向西方的人口结构就会再增加4 600万人，并同时对欧洲形成挑战和融合之势。根据布热津斯基的观点，下一步俄罗斯所觊觎的波兰将成为“地缘政治的新支点”，决定中欧、东欧和欧盟本身的命运。

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斗争，尤其是和德、法之间的斗争，自拿破仑战争以来一直持续着，今后还将继续如此，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随时命悬一线。苏联帝国虽已解体，欧洲人仍然需要以乌克兰为主要通路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冷战的胜利在相关国内引起了巨大变化，但它无法改变地理事实。澳大利亚情报分析师保罗·迪布（Paul Dibb）认为，一个复兴的俄罗斯可能宁愿“考虑中断复兴，也要创造战略空间”。2008年对格鲁吉亚的入侵，正表明俄罗斯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力量。

在俄罗斯的沉重压力下，乌克兰已同意延长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租约，以此交换较低的天然气价格，克里姆林宫还试图将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网络置于其控制之下（毕竟，乌克兰还依赖俄罗斯的贸易）。然而，并非欧亚大陆的所有管道地理都对俄罗斯有利。中亚的管道向中国提供油气资源，阿塞拜疆的里海石油，通过管道横跨格鲁吉亚通往黑海，并通过土耳其进入地中海，完全避开了俄罗斯。此外，一个以里海

为起点的天然气管道计划，打算横穿整个南高加索和土耳其，通过巴尔干半岛到达中欧，也避开了俄罗斯。不过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筹建从黑海到土耳其的海底天然气管道，以及向西输往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底管道。土库曼斯坦远在里海之滨，通过俄罗斯出口天然气，因此即使有多元化的能源供应，欧洲特别是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仍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俄罗斯。欧洲的未来，正如过去一样很大程度上依赖东方的发展。

俄罗斯手里还有其他筹码：位于立陶宛和波兰之间的波罗的海海域的强大海军基地；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大量讲俄语的少数民族；亲俄罗斯的亚美尼亚人。此外，格鲁吉亚受到亲俄罗斯的分离省份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威胁；在哈萨克斯坦的空军基地和导弹试验基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空军基地，覆盖范围可达中国、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塔吉克斯坦也允许俄罗斯军队巡逻其与阿富汗的边界。2010年，正是俄罗斯精心策划的媒体宣传和经济压力，帮助驱逐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下台，并指控其引入美国的空军基地等罪行。

第7章
移民缔造的美利坚奇迹如何延续？

从1776年美国的诞生以杰斐逊为代表的众多先驱的开垦，到里根时期刺激投资的“补给边缘经济”，美国一直以50年为周期的循环模式向前发展。作为一个移民型国家，来自世界范围的移民在美国的历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显现及有效劳动力的减少，美国将率先打响移民争夺战并维护其霸主地位。

美国南部边境正在修建隔离墙，目的是阻止非法移民入境。移民造就了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美国却呼吁限制移民，以确保工作不会被外人抢走。绵延于墨西哥边境的隔离墙，正是这一政策的产物。

20世纪30年代，世界正处于人口加速膨胀的时期。美国乃至世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汹涌的劳动力洪流。廉价的劳动力逐渐流向发达国家。面临潜在移民冲击的美国，决定限制移民入境，以防止工资下跌。

在21世纪，美国并不会建立限制移民的制度。随着人口增长巨浪的逐渐消退以及人均寿命的逐渐延长，人口老龄化趋势将日益明显。这意味着美国将从2020年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并且这种趋势将在10年内持续加剧，因此，利用移民资源来填补这个漏洞就很有必要。而且，随着可利用新劳动力的日益减少，不仅美国需要新劳动力，其他工业国家也同样需要劳动力。20世纪的问题是限制移民，21世纪的问题将是如何吸引足够的移民。

俄罗斯第二次经济瓦解将为美国开启黄金时代之门。但与俄罗斯对峙结束后，将会出现由于劳动力紧缺而引起的大规模国内经济危机。

如今，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此类危机已经初见端倪。引起危机的原因，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社会性的：几世纪以来一直变迁的家庭结构将继续瓦解，从而导致众多老年人无人看管。正如上文提到的，将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照顾。社会保守主义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之间将会产生尖锐的政治斗争。从脱口秀到政论访谈的大众文化中，我们已经见到斗争的端倪，以及该斗争持续升温的迹象，直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危机爆发。

如果历史有任何指导作用，那么我们可以预见此次危机将在2028年或是2032年的总统选举期发展到顶峰。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美国历史中有一种难以诠释的奇怪模式。美国大概每50年必遭遇一次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且在危机出现的前10年就开始露出苗头。接下来的10年甚至更多的岁月里，就得由具有决定性的总统选举来改变国家的政治面貌。只有危机解除，美国才能繁荣。到下一代，旧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措施，但这种新措施本身又会产生新问题。随着矛盾的加剧，又会导致下一次的危机，如此循环往复。

我认为美国将在21世纪20年代经历危机是有原因的。了解这些原因对于全面了解这一模式至关重要。就像不了解股票的运行模式就不能投资股票一样，不了解美国政治经济的循环模式，你就不能理解我的推测。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经历了四次这样完整的循环，目前正是第五次循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这种循环模式通常始于一届众望所归的总统而终于一届失败的总统。因此，华盛顿（Washington）时期的循环终于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杰克逊（Jackson）时期的循环终于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海耶斯（Hayes）时期的循环终于赫伯

特·胡弗（Herbert Hoover），罗斯福（FDR）时期的循环终于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危机总是隐藏于政治外衣之下，这是由衰落的统治阶级及其建立的经济模式与新兴阶级及其建立的经济模式之间的斗争决定的。每个派系都代表一种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以及对合格公民不同的定义，反映了生存方式的变迁。

1776美利坚的诞生：从创始人到拓荒者

随着《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问世，美国于1776年成立。从那一刻起，它就有了自己的国家身份、军队和国会。美国主要是由单一的种族（英国人以及少数的苏格兰人）组成。这些曾辉煌一时的人们将自己视为新政权的捍卫者。他们与那些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非洲农奴完全不同。

尽管如此，建设国家不能光靠他们自己来完成，还需要一批先驱向外扩张，去开垦阿利根尼山脉以西的土地。与杰斐逊或华盛顿完全不同的是，这些先驱大多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是典型的贫穷而又没受过教育的移民。他们想要寻找一小块土地来耕种，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就是其中的代表。

到19世纪20年代，随着创始人的理念与开拓者利益之间的不断碰撞，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日益激化。社会矛盾演变为经济危机。1828年，危机以创始人时代的最后一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失败和新一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当选而告终。

林肯的时代：从拓荒者到美国小城镇

杰克逊当选时期，美国最动荡的人群是农民拓荒者。他们中有许多在美洲大陆的中心定居下来。上一代的创始人并没有销声匿迹，政治权

力的平衡逐渐转向不计其数的贫穷的西部开拓者。杰克逊的前任总统倾向于用稳定的货币政策来保护投资者。杰克逊却提倡降低利息来保护为他投票的债务人。华盛顿，这位绅士、农民、战士、政治家，是首次循环的英雄代表，而第二次循环的英雄代表则是出生于肯塔基州一个小木屋里的亚伯拉罕·林肯。

到这次循环结束，即内战后，美国西部摆脱了第一代拓荒者的贫瘠的农场经营模式。到1876年，农民不仅拥有自己的土地，而且还靠耕作为生。城市布局也有所改变，为了服务于日益富裕的农民，一批小城镇应运而生。小城镇的银行可以受理农民的存款，并在华尔街进行投资，而华尔街的大银行家们又反过来将这笔钱用在铁路和工厂建设上。

但问题仍然存在。持续了15年的低廉货币政策或许曾有利于拓荒者，但却损害了他们下一代人的利益，因为他们的孩子已将西部农场商业化。到19世纪70年代，由低廉的货币政策引发的危机已经失控。低利率使得农场，或是服务于农民的商业投资无利可图。

美国若想发展壮大，其根本是建立稳健而有力的货币政策。1876年，继尤利西斯·S.格兰特失败卸任后，卢瑟福·B.海耶斯当选总统。海耶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财政部部长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用金子支撑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并且提高利率，刺激投资。贫农的利益受损，但富农、大牧场主以及小城镇的银行家们却大大受益。这项金融政策加速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之后的50年里，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直到下一次危机的到来，就如同前两次的循环那样。

罗斯福的改革：从小城镇到工业城市

正如人们称赞当选的丹尼尔·布恩那样，美国民众也格外喜欢小镇生活。几百万的移民到煤矿和工厂工作，并主要定居在大城市。他们大多数来自爱尔兰、意大利或是东欧。这批移民与之前的移民完全不同。

这样，一个以白人和新教徒为主的民族，突然间充斥了大量的移民，而且这些移民无论是外貌特征、说话方式，还是行为习惯都与他们完全不同。所以，美国小城镇居民对这些移民持怀疑和敌对的态度。这些新移民定居的大城市，被看做是外来腐朽文化的中心。

但是，小城镇的价值观与美国建国时的价值观已渐行渐远。自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开始采取紧缩银根（tight money）的货币政策，这无疑将鼓励存款和投资，但却抑制消费及信贷。高出生率和移民的双重原因导致大城市人口膨胀，随之降低的工资使新移民生活更加困难。随着投资的增长，工人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的能力受到严重抑制。这就导致经济大萧条，即消费者没钱购买必需品，工厂不得不靠裁员来降低损失。勤俭和节约是美国小城镇居民的美德，但却无力对抗宏观经济的巨大力量。

1932年，继赫伯特·胡弗失败的任期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罗斯福着手扭转前任政府的一些政策，通过促进投资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资金流通来寻求刺激消费途径。他以小城镇及其价值观的衰落为代价，赢得了工厂和城市工人的拥护。

最终，虽然新政没能结束经济萧条，但“二战”却做到了，因为战争迫使政府花费大量资金建造工厂以及雇佣工人。“二战”的余波对于经济大萧条的结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战争结束后，一系列的法律出台允许退伍军人贷款买房，并轻松获得大学教育资助，成为职业白领。联邦政府构建了州际公路网，开放城市周边地区来建设住宅。这些措施转移了大量资金，增加了工厂及工作岗位，并维持了战时经济收益。美国中产阶级就这样产生了。迫于“二战”，罗斯福改革的目的在于改善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这使得工人阶级的孩子成为中产阶级的市郊居民。

里根的补救：从工业城市到服务郊区

一种解决方案往往会引发另一种问题。通过扩大需求，增加工作岗位，赢得社会支持以及转移资金，美国民众顺利地度过了萧条时期。对富人征收高税率，给房屋买卖者提供低利息贷款，向大批购买者推荐消费贷款，这一系列措施使美国经济得以恢复。

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模式不再有效。企业家被高税率隔在资金市场门外，从而倾向于投资效率低的大企业。对富人和企业征收的支付比例最高的边际税率（marginal tax rates）已经超过70%，这项税率政策大大抑制了投资。虽然积极的消费贷款政策刺激了消费，但工厂严重老化衰落。没有投资，工业及整个经济效率低下，全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日益严重。

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在战后生育高峰期的婴儿这时已经进入适婚年龄，这正是对贷款需求最旺盛的时期。所有的因素再加上能源危机，使得情况日益严重。吉米·卡特任职总统期间，整个经济摇摆不定。长期贷款利率正处于它的“青春中期”。通货膨胀超过10%，与失业率持平。虽然卡特通过削减中低阶层税率的手段拉动了消费，却给整个经济体系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所有前50年里曾用于刺激经济的手段虽然仍然有效，但是却使得情况更加糟糕。

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总统，等待他的是萧条的投资市场以及由于过分消费而引发的危机。里根采取的措施是保持消费的同时增加投资数量。里根通过“补给边缘经济”（supply-side economics）降低税率来刺激投资，其目的是使上层阶级和企业能够通过投资实现经济现代化。里根不想抑制需求，使得消费者无力购买商品。这项举措引起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剧烈重组，并为90年代的经济繁荣奠定基础。

里根的政策使得政治经济力量从城市转移到郊区。由于罗斯福—卡特时期的改革，大量人口迁移到郊区，从而改变了城市布局。州际公路网以及其他良好的公路设施不但使人们能够轻松地与城市保持联系，还

可以方便地到达欠发达且地价较便宜的地区。20世纪后半叶，这些郊区居民越来越富裕，正是因为受益于80年代里根的经济政策。

里根远离新政且不计一切偏向城市工人阶级消费的原则是，重整美国经济，侧重郊区职业人群及企业家人群。因此，有些人认为他这是对美国社会中心、城市、美国劳动力灵魂以及工会的出卖。与罗斯福、海耶斯，以及杰克逊受到的待遇一样，里根被诽谤为美国人民的叛徒，但最终里根与他们一样，别无选择，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益于整体发展的政策。

“50年循环模式”的延续：从服务郊区到永久移民阶层

现在让我们展望一下未来。

如果根据持续了220年的一系列循环总结出的“50年循环模式”准确的话，我们现在就正处于1980年当选的罗纳德·里根带领下的第五次循环的中期。这一模式表明当今美国的社会结构比较合理，这将一直持续到2030年。不论是总统还是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改变最基本的经济及社会趋势。

1952年，罗斯福当选20年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当选总统。但是他却无力改变新政时期建立的基本模式。伟大的罗斯福没有大幅改变海耶斯设定的模式；林肯则坚持杰克逊的原则；而杰斐逊则继承了华盛顿时期建立的体系。每次循环中都是反对党获胜，有时可能会选举出一位伟大的总统，但基本原则仍然不变。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无法改变1980年以来的基本事实，如今任何一党的总统也都无法改变。这种模式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深植于美国的立国根基之中。

但是，我们正在处理这些最终都会结束的循环。如果这一模式停滞，等待我们的将是21世纪20年代高危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然后是2028

年或2032年的某次决定性的大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21世纪20年代的危机是什么，更不知道其解决方案。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解决前一次危机的方案必然会引发下一轮的问题，而接下来的解决措施将彻底改变美国。

当今美国经济以消费性支出与商业发展的信贷系统为基础，其利率处于历史低潮。大部分财富来自房屋、401（K）计划和土地的股票增长，而不是传统储蓄。储蓄利率虽然降低，但财富增长速度却大大提高。

这种增长速度没有任何人为因素。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重组开启了企业活动促进大规模生产力的繁荣景象。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引进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生产力，同时也增加了商业的实际价值。微软和苹果就是20世纪80年代新工业的典型模式。在先前的循环模式中，通用汽车和美国钢铁等企业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而目前的循环模式则更加侧重于创造企业型（entrepreneurial）的工作岗位，而非资本型（capital-intensive）的工作岗位。

现在的情况是消费需求与股票价格基本持平。只要消费需求因某种原因而降低，房屋或商业的价值就会降低。无论是在消费贷款，还是商业贷款的信贷额度方面，这些有价交易都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在有价交易过程中，个人和商业的净价值都能得到确立和体现。如果股票下跌而导致消费需求下降，那么也会引发经济的螺旋式下降。直到目前为止，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和人口增长的速度同步增长。如今面临的挑战是防止经济下滑的速度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理想的情况是即使人口数量下降,经济也应该继续增长。

现在，距离21世纪出现第一次危机还有10多年，但我们已经能够窥见其发展源头。三次风暴即将来临，首先是人口风暴。21世纪头10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大部分人口步入70岁，其收入主要来自股票和出售房屋。其次是能源风暴，最近激增的石油费在25年的低能源价格后，只会

呈现周期性的良好态势。这些风浪可能只是油气经济结束的前兆。

最后，上一代改革创新带来的高生产率将到达顶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企业公司，诸如微软、甲骨文以及谷歌等已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大公司的利润率下降，反映了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总的来说，过去25年的改革创新已经成为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想要保持过去20年那惊人的增长速度绝非易事。

所有这些因素都会给房地产和股市施压。管理股票价格的经济手段并不存在。过去的100年里，控制信贷——这一管理利率以及货币供应的手段已经建立，但是管理股票价格（例如房地产和股市）的手段根本不存在。2008年抵押贷款体制的崩溃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已经有人谈到了住房和股市的投机泡沫，但目前还未真正到来，最糟糕的时刻将出现在15～20年以后。一旦这次循环到达高峰期，由人口、能源以及改革引起的危机将彻底捣毁美国经济。

一旦谈到经济危机，我们就会想到令人恐惧的大萧条时期。事实上，从历史观点来说，循环期里的危机发展到末期时产生的极度不适比起萧条时期更让人痛苦。比起20世纪30年代长时间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或19世纪70年代短暂而深刻的危机其实更糟糕。21世纪20年代的危机也是如此。在面临历史转折点的时刻，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大萧条的出现。

美国建国后前**100**年的首要问题是土地所有权的结构问题，之后**150**年的首要问题是资金构成与消费关系的管理问题。其解决方案摇摆于资金构成和消费两者之间，有时又处于平衡状态，但在美国250年的历史中，劳动力从未成为问题。人口一直在增长，而且年轻人总比老员工更受欢迎。

隐藏在2030年危机背后的事实是劳动力将不再是可靠因素。“二战”后的生育高峰期以及平均寿命的延长导致大量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人丧失工作能力但却继续消费。值得思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规定

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男性的平均寿命只有61岁。这不得不使我们意识到社保资金是多么微乎其微。后来，平均寿命达到70多岁这一事实已经完全改变了退休年龄。

如何养活更多的退休人员？

随着人口从业时间的推迟，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下降的出生率使得退休人员的数量减少。到了21世纪20年代，这一趋势将变得更加严重。工作者要赡养退休的老人，而那些依靠房产股权以及退休金的老人将继续保持高水准消费，他们的需求需要得到满足。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以及商品和服务需求的稳定增加，通货膨胀将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劳动力成本将超标。这将加快退休工人消耗财富的速度。

退休人员可划分为两个群体。一个是那些足够幸运、足够精明，并且在房屋及401（K）计划中有股票储备的人，他们将被迫变卖固定资产。另一组退休人员没有或只拥有少量的固定资产，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社会保障也不能让这批人群摆脱贫穷。婴儿潮一代人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和医疗标准的压力将更加沉重。而婴儿潮时期出生的退休人员是极为庞大的选举人群，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选举权利来获利。

不仅在美国，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都将被迫增加税收或外债。如果是前者，政府的增税对象是那些因为劳动力短缺而工资上涨的人群。如果增加外债，政府将进入资本萎靡的市场，同时，人们将从市场撤回资金，进一步加剧高利率，重演20世纪70年代由于货币供应量激增而导致通货膨胀加速的危机。唯一不会重演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失业。任何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会有高报酬的工作，但是高税收或通货膨胀会导致工资真实价值的急剧缩水。

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将在2013年陆续退休。如果我们假设平均退休年龄是70岁（根据健康和经济因素制定），那么几年后退休高峰期将

会到来，直到2025年或2025年以后才会有显著下降，但其经济影响将继续蔓延。出生于1980年的人将在35～45岁之间应对这些问题，他们中的大部分将处于日益失调的经济当中。从广泛的历史角度看来，这只是一个过渡问题。那些1970年到1990年之间出生的人不仅仅将承受生活带来的压力和痛苦，自身发展也将受到很大限制。这或许不是下一次大萧条的预兆，但是那些铭记20世纪70年代滞涨的人将会引以为戒。

不管是谁当选2024年或2028年总统，都将面临严峻的问题。像亚当斯、格兰特、胡弗以及卡特一样，这位总统将用前任的方案来解决新的问题，正如卡特试图用罗斯福的原则来解决滞涨那样，可这却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这一时期最后一任总统将用里根的办法，减轻税务以刺激投资。在劳动力短缺最严重时，削减税务可以增加投资，但却会过分增加劳动力价格，并导致恶性循环。

像前一场危机一样，21世纪20年代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小觑。我们该如何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呢？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提高每个工人的生产率，另一种是引进更多的工人。由于问题的严重性及时间的限制，当下之际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增加工人的数量，这就需要通过增加移民来实现。从2015年起，移民数量将持续增长，但因为增速不够快，问题还是不能得到解决。

1932年以来，美国一直担心失业问题会导致劳动力过剩。移民被视为是一个世纪以来低工资问题的来源，而移民的根源就是人口爆炸。能够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想法将和1930年失业不是因为懒惰的想法一样不切实际。

21世纪20年代，这种观念会再次改变。到2028年或是2032年选举时，美国的政治思想将发生巨变。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说有足够的可用劳动力，只是过高的税务使得他们没有工作的动力。失职的总统将试图通过削减税务来刺激根本不存在的工人参加劳动，从而刺激投资来解决问题。

通过移民来迅速增加劳动力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这一突破有力地驳斥了传统的劳动力紧缺观念。未来，通过劳动力来增加资本的趋势将不再持续下去，取而代之的问题将是寻找资本需要的劳动力。这种危机不仅限于美国，每个发达工业国家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其中大多数国家将陷于更复杂的境地。很简单，它们将急缺新的劳动力和纳税者。同时，曾是移民主要来源的中间层国家随着其人口结构逐渐稳定，其经济将从本质上得以改变。任何移民到其他国家的危机都将得以平息。

现在很难想象到2030年发达国家将展开移民争夺战。美国制定移民政策时将不会考虑怎样把他们排斥在外，而是要鼓励他们来美国而不是去欧洲。虽然形势严峻，但美国仍然占有优势，现在移民到美国就比到法国简单得多，以后的形势也是如此。而且，单就美国的低人口密度来说，美国比欧洲一些国家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事实是美国不得不做些史无前例的事情，即创建鼓励机制以吸引移民。

很明显，退休人群将倾向于用移民来解决问题，但是劳工群体对此态度不一。那些担心由于竞争而导致自己收入减少的人群将强烈反对；而处于较为安全位置的其他工人，则会支持移民，尤其是在那些要求降低服务价格的地区。最终，政治气候将不再纠缠于移民政策原则本身，而是转向确定可接收大量移民的区域（在这些区域，移民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同时也致力于处理移民的安置问题，这样就不会出现过分密集的移民区。

让我们重新回到激励机制。美国将不得不提供给移民一系列的竞争优势，从高度简洁的绿卡办理程序到专门签证，来迎合移民劳动力的需要和期望。他们还很有可能获得奖金，这是由政府或雇佣他们的公司直接发放的，还附有就业保障。移民当然会在比较之后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这个过程使联邦政府的权力在根本上有所扩大。自1980年以来，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断受到侵蚀，而2030年前后需要在政府的直接管理下进

行的移民改革将改变这一局面。如果私人商业要参与此次移民浪潮，那么联邦政府至少要担保移民不受欺骗，公司也要履行承诺，否则找不到工作的移民将成为负担。只简单的开放边境并不是好的解决办法。对新劳动力的管理，以及对于资本和信贷市场的相应管理，都会迅速扩大联邦权力，改变里根政府时期的格局。

入境的移民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人群可以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例如医生和管家。另一类是为了解决劳动力长期短缺问题，能够提高生产率的人群。因此，物理学专家、工程师、医学专家和多种手工劳动者将是主要招工类型。

这次移民浪潮比1880～1920年的移民浪潮更加猛烈，其数量比之前任何移民潮都多。这会改变美国的文化特点。但由于美国处于野蛮之地，没有固定文化，因此可塑性非常强就是它的优势，这对于吸引移民至关重要。我们也应该预想到吸引移民过程中将会引发的国际摩擦。美国将不惜任何代价达成自身的战略目标：出高价从发展中国家吸引知识型工人，针对劳动力短缺问题从策略上战胜他国。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将影响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来说，这只是历史上另一个成功的50年循环，也是另一个由于大量机会而引来的移民潮。不管这些移民来自印度或是巴西，他们的孩子将和之前美国历史上的移民大军一样，成为一代美国人。

但墨西哥人是个例外。美国占领着一块墨西哥曾宣布占有的土地，两国边境划分问题一直都很棘手。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不同寻常，尤其是在边境地区。这一地区将是21世纪30年代手工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地。本世纪末，这将会给美国带来严重的战略问题。

到2030年，使美国经济不稳定的劳动力紧缺问题将迫使美国必须将移民美国这一过程规范化，美国将在2015年前后开始着手行动。一旦获得成功，美国将继续其经济发展的步伐，并将在21世纪40年代加速，而

这一时期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已死亡，人口结构开始再次回归于正常的金字塔式，而不是蘑菇式。21世纪40年代将出现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或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浪潮。这一时期将成为2080年的经济危机的伏笔，那么在此期间，许多大事将会陆续上演。[1]

注释

［1］弗里德曼.未来10年[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219～221.

当墨西哥人北上的时候，他们未必和墨西哥以及家乡的亲人割断联系。实际上，在美墨边境线南北几百英里范围内，几乎不存在文化差异，因此，这些墨西哥人在北上过程中无须克服文化差异。只有迁徙到很远的城市时，他们才需要像传统移民那样，为适应新的环境而同化自己。但是在同一文化疆界内，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保持原有的语言和国籍，而对当地的合法身份不予理会。这种状况就可能导致法定边界与文化边界之间形成深刻的冲突。

这也是美国目前对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感到惴惴不安的根源。有批评家认为，美国人的这种顾虑是对所有墨西哥移民的嫌恶，而对他们不能一概而论，但这种分析显然还不足以真正理解这种担心的根源。边境地区以内甚至是以外的非墨西哥人担心移民人口的增加会让自己变成少数群体，让他们生活在墨西哥文化氛围之中。此外，他们还担心这些北上的移民会成为墨西哥人夺回以前领土的前锋。尽管这些担心有点杞人忧天，但也不是毫无根据；而且更是无法规避的忧虑。

当然，最具讽刺意义的还是美国经济确实需要这些移民，因为他们毕竟属于廉价劳动力。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美国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肯定能在美国找到工作。如果美国不需要这些移民补充其劳动力资源，而且所有岗位均已填满，移民也就不会来到这里。

而另一种反面观点则认为，这些移民夺走了其他人的工作，或者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已经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虽然说这种辩说并非无稽之谈，但说服力不强。在美国，10%的失业率相当于1 500万人失去工作。根据皮尤西语裔研究中心（Pew Hispanic Center）的估计，美国非法移民的总数约为1 200万人。如果“置换理论”成立的话，彻底驱逐这些非法移民将留下1 200个空缺职位，失业人口就会减少至只有300万人，失业率仅为2%左右。按照这种貌似不合逻辑的置换说法，我们可以从直觉上得出结论，大多数外来的低成本、非技能型劳动力无力与现有劳动力竞争上岗。尽管美国经济需要外来劳动力，但却不希望大幅增加居民数量，而墨西哥则有大量需要出口的富裕劳动力，最终的结果可以想象。

目前，这个问题只会进一步加剧，因为非移民女性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人口置换率，而且人口平均寿命明显增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老龄化程度明显提高，而劳动力则大幅萎缩。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发达工业国家的普遍状况。为了照顾老龄人口和补充劳动力资源，就需要国家输入更多的外来劳动力。因此，美国输入劳动力的压力不是正在缓解，而是正在不断激化，另一方面，尽管墨西哥国内经济始终处于增长态势，但它仍将拥有大量可输出的富裕劳动力。

第8章
偷猎时代的地缘政治谋局

进入21世纪20年代，俄罗斯的持续混乱，中国增长的进一步放缓，使得欧亚大陆重新陷入权力真空。土耳其将在向北挤压俄罗斯的同时，进一步阻止法德两国的崛起。日本将在东亚地区与中国进行角逐，并对美国形成挑战；波兰作为欧洲的支点，充当了美国对抗俄罗斯的马前卒；边缘地带的小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各自打起自己的小算盘。好戏即将上演。

21世纪20年代初，俄罗斯的解体将致使整个亚欧大陆陷入混乱。当莫斯科紧绷的链条松断时，俄罗斯联邦自身也会四分五裂。各地区，甚至人烟稀少的远东太平洋地区也可能闹分裂，它们在太平洋盆地的利益远比俄罗斯本土或者与俄罗斯相关的利益更为重要。车臣和其他的穆斯林地区将会分离出去。与斯堪的纳维亚保持密切关系的卡累利阿也将正式独立。这种分崩离析的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俄罗斯，苏联的其他成员国也同样存在,到那时，莫斯科根本就无法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如果说苏联的解体导致寡头掌控俄罗斯经济，那么21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二次解体将会导致地方性统治者的为所欲为。

当各国为经济优势你争我夺之时，喀尔巴阡山脉以东的亚欧大陆将乱成一团。实际上，从哈萨克斯坦到太平洋，中国边境两边的乱局将使得国家边界线变得毫无意义。

从美国的立场出发，这样的结果真是“棒”极了。美国的第五项地缘政治目标是：确保没有任何大国崛起并主宰整个亚欧大陆。实际上，美国压根没必要亲自出马来维持这个地区内部的势力均衡。在未来几十

年，均衡的局面将自然而然地形成并维持下去。

亚欧大陆将会变成“偷猎者的天堂”，该地区周边的国家将拥有非常难得的偷猎机会。这一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充裕，而且技术先进。核心权威的瓦解给周边国家创造了利用这种形势的机会。恐惧、需求以及贪婪构成了边缘地带的蕞尔小国觊觎权力中心的绝佳机会。

在利用这一优势方面，有三个国家的位置最为得天独厚。

> 首先，日本将抢占俄罗斯沿海地带和中国东部地区；其次，土耳其可能向北挤压，推进至高加索山脉（可能更远）；最后，由波兰领导的东欧国家联盟，包括波罗的海诸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认为这不仅可以收复失地，同时也能保护自己免受未来俄罗斯的侵害。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一次重大的额外收获就是：通过加强自卫能力，免受来自西部的宿敌德国的入侵。这些东欧国家将视此为一次重新确立该地区权力平衡格局的机会。而印度与这场游戏毫不相干。印度在地理上被喜马拉雅山脉隔绝在亚洲南部，因此它根本无法从这种大国斗争的形势中获利。

美国对21世纪20年代的这次行动将会持赞成态度。东欧、土耳其和日本会与美国结成联盟。届时，土耳其和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已经有75年，东欧则有30年。在与俄罗斯对峙期间，这些国家几乎都是出于自身利益跟美国合作。像对待其他同盟国一样，美国会把它们看做国家意志的延伸。

然而，21世纪20年代的变革意义深远，绝不仅仅局限于俄罗斯和中国的范畴。第一个变革是亚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将发生改变，这也将改变亚洲与美国的关系；第二个是美国与伊斯兰圣战者战争结束之后穆

斯林世界的状态；第三个是法德衰退时期和东欧崛起时期欧洲的内部秩序。分裂北约是德法两国为了防御波罗的海国家采取的措施。北约组织完全是在集体防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攻击一个成员国就是攻击了所有的成员国。这种想法的深层含义是北约已经准备好保卫任何一个处于危险的成员国。当波罗的海国家处于危险时，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就需要有一支防御力量。如果一些成员国不愿意参加集体防御，那就意味着这次行动必须在北约之外展开。这样的话，北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2010年，当美国与俄罗斯开始对峙时，所有这些事都将摆到台面上来。冲突期间，这些事暂时被搁置了，或者说至少没有纳入全球议程。但是，这些问题最终将重新出现。一旦俄罗斯威胁解除，这些地区中每一个国家又都会打起自己的地缘政治小算盘。

中日亚洲大角逐

日本对中国的干预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在19世纪中期欧洲入侵中国和“二战”结束的混乱时期，为了寻求某些经济利益和特权，日本接连对中国施压。中国人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有着痛苦的记忆，但这没有阻止日本人在70年代末大规模地重返中国的投资市场。

20世纪30年代，日本把目光投向中国来寻找市场，退一步来说是寻求劳动力。到了21世纪20年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关注点会放在劳动力上。随着中国的区域化和在一定程度上的分化，日本将在2010年后的10年及2020年后的10年里，再次面临过去中国曾对其产生的巨大诱惑。虽然建立某种形式来支配中国地区能够快速帮助日本解决人口结构问题，而无须强迫日本人支付移民的社会和文化代价，但是日本必须同自己在中国支配的每个地区都建立深层次的关系。

中国各地将寻求北京的保护以及资本和技术投资的支持。因此，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中日互利关系届时将会重现，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中国沿海地区对投资和技术以及日本对劳动力的互相需求之上的。

历史上，除了劳动力，日本在华还有另外一种利益——原材料市场。如我所述，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其几乎全部的原材料都需要进口，这对日本来说是最大的挑战，也是其在1941年和美国开战的主要原因。很多人忘记了在决定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内部已经分裂了。日本领导层曾断言，侵略西伯利亚能满足日本的原材料需要，并且比入侵美国更有把握。无论日本采用这两种方法中的哪一种，都会为各方带来极大的威胁。

太平洋沿岸的俄罗斯地区蕴含着各种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碳氢化合物。到21世纪20年代，日本将面临能源问题，它将依赖波斯湾，这同时也意味着要受美国挟制。考虑到俄罗斯第二次解体后美国的傲慢，日本也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对美国的下一步行动越来越担忧。因此，随着俄罗斯的分裂，日本认为在经济上控制俄罗斯太平洋地区会更有意义。在处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的关系时，我们要时刻牢记，该国原材料进口占世界之最，并且会对其地区内任何不稳定因素作出回应。

日本想从中国东北部和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地区获得直接利益，在军事方面倒没有什么兴趣。除非日本能够在21世纪20年代采取一些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否则它将在21世纪中期面临经济灾难。到21世纪50年代，日本的人口会从现在的1.28亿减少至1.07亿，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400万，14岁以下人口占150万。因为有550万人没有工作，日本很难维持自身的经济水平。在劳动力和能源问题上，日本想要获利，就必须尝试着变成一个区域性大国。

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日本及其历史。该国是当今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并将在21世纪继续保持这种走势。日本是唯一一个经历了工业革命，却没有通过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秩序的国家。日本的传统社

会结构在经历了工业化，“二战”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奇迹之后，维持至今。

日本以其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闻名于世，这些政策通常都能巩固日本的国内统治。继初次接触西方并认识到工业的强大能量后，日本开始了高速的工业化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扭转了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传统，突然成为世界上最崇尚和平主义的民族之一。然后，该国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直到1990年，其经济扩张由于宏观经济危机而停止，此时，日本人已经平静地接受了他们命运的大逆转。

文化的连续性与社会规则合二为一，使日本在改变行事方法的同时仍能维护自身的核心价值。其他的国家无法在突然改变路线之后依然井然有序地发展，但日本做到了。孤立的地理位置使它免受分裂的社会压力及文化侵袭。此外，日本拥有擅长统治的精英集团：择优招募新成员，以纪律严明的民众作为精英集团的储备力量。这是一种力量，它并非让日本人变得捉摸不透，而是使日本拥有一种别国所缺乏的转变政策的能力。

日本目前将会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克制与和平政策现状，并不想与任何国家发生军事冲突，因为它对恐怖的“二战”有着长期的国民记忆。与此同时，目前的和平主义对日本人来说是一种可适应工具而不是永恒的原则。由于其工业和技术基础，日本转移到一个更为坚定的军事立场只是一个政策上的转变问题。考虑到今后几年将要经历的人口和经济压力，这种变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将首先尝试通过经济手段获得所需，但日本不会单单寻求增加劳动力而没有移民，也不会是唯一寻求控制外国能源的国家。欧洲人对创造区域经济关系感兴趣，东亚的各种新自治区也会试图让不同国家相互争斗。

日本不能输掉这场比赛。对日本来说，基于其需要和地理位置，对东亚地区施加压力是其唯一的选择，但日本会遭到多方阻碍。首先，经

历多年抗日战争的中国，会认为日本蓄意破坏中华民族的主权完整。中国会与其他国家联盟，争取掌控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有可能取代日本控制整个东亚地区。日本最后的手段将是诉诸高涨的军国主义，即便这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到21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中国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和外国力量的上升，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维护自身的利益。[1]

2030年的日本将如何自保？

大约到2030年，美国将不得不重新看待更加强大的日本。日本和美国一样，是天生的海洋强国。该国通过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而生存，海航线对其生存至关重要。为了确保自身利益，日本会在东亚地区开始从大规模地参与经济转为小规模地插手军事，所以它会特别保护自己区域的海航线。

日本南部距中国上海只有大约500英里。500英里还可把你带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库页岛，以及上海以北的海岸。这个半径是日本军事利益的外围界限。但是，即使要保护这样一个小小的领域，日本都将需要一个完善的海军、空军和太空监视系统。事实是，日本已经拥有这些，但到2030年，日本将不再使用这些被明确指为不受欢迎的入侵武器来圈定自己的势力范围。

正是在这一点上，自信满满的日本将开始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希望主导所有海洋。日本区域力量的重现不仅威胁了这种利益，而且为日本提高全球影响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舞台。因为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利益增加了，其空军和海军能力也会随之改进。这些能力提高后，就不能保证日本的行动范围不会扩大。这在美国看来非常危险。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下面的一幕上演：随着美国开始对日本增强的力量作出反应，日本会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这使得美日关系呈现螺旋式下

降的趋势。日本要在亚洲追求根本的国家利益，就必须控制其海航线。相反，视控制全球海航线为国内安全绝对保障的美国人一定会向日本施压，设法对抗日本的挑衅。

处于日本日益增长的势力范围影响下的是韩国，一个我们期望能够在2030年之前完成统一的国家。统一后的韩国将会拥有7 000万左右人口，跟日本没有多大差别。韩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位列第12名，2030年统一后排名会更靠前。历史上，韩国就对日本的统治感到恐惧。由于日本增加了其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韩国受困其中，惶惶不可终日。韩国在捍卫自身权力时不会心慈手软，但真正的重点是，美国视韩国为其制衡日本权力的一支力量，以及维护自身在日本海势力的一个基地。在反对日本崛起的过程中，韩国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一支抗日联军也就随之建成。

在此期间，中国内部也将发生变化。在最近几个世纪，中国一直按照30～40年的周期运行。1842年，中国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在1875年左右，欧洲人开始控制中国的藩属国；1911年，孙中山推翻了满清王朝；1949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进入经济加速增长的时期；到2010年，中国将会集中主要力量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这意味着另一个逆转可能会在21世纪40年代的某个时候发生。

但显然，21世纪40年代不会是这一进程的开端，而是高潮。这一进程将在21世纪30年代开始，并因外国（尤其是日本）的侵犯变得越来越激烈。这将是美国用来控制局势的另一个杠杆，它将支持北京控制日本势力，这也是美国“二战”前期政策模式的一次逆转。

到21世纪40年代，美国和日本将产生深刻的利益分歧。美国将与韩国和中国结盟，这三方都担心日本力量的增长。由于担心美国干涉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必然会增加军事实力，但是，它将会被完全孤立。面对美国建立的区域联盟和其军事实力，日本没有办法独自应对这些压力，而且也不会有人伸出援助之手。然而，技术革新将改变地缘政治，

日本将可能在亚洲的另一端形成自己的联盟。

乱世中崛起的“奥斯曼帝国”

2020年之前，也就是美俄在欧洲对峙期间，高加索地区也将有一个附带的对峙。俄罗斯将向南推进，进入该地区，再次将格鲁吉亚纳为己有，并同亚美尼亚建立联盟。这等于俄罗斯军队重返土耳其边界，会对土耳其造成巨大的威胁。奥斯曼帝国覆灭以及现代土耳其崛起后的一个世纪，土耳其人将再次面临他们在冷战时遭遇的威胁。

当俄罗斯第二次解体时，毫无疑问，土耳其人将在2020年左右制定强有力的战略决策。依赖混沌不清的缓冲区来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的侵犯是一个赌注，土耳其人不会再这样做。这一次，为了保证国内的安全，他们将尽可能向北推进到高加索地区。

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到2020年，土耳其的经济水平将会跻身世界10强之列。2006年其排名已经在第18位，并正在稳步上升中。土耳其不仅在经济上能够自行发展，还能够在战略上发挥关键作用。事实上，土耳其在亚欧大陆拥有最强势的地理位置。土耳其容易接近阿拉伯世界、伊朗、欧洲、苏联成员国，以及最重要的地中海。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在于，它不仅是一个区域贸易中心，也是一个凭借自身力量壮大的生产型经济大国。

到2020年，土耳其将在乱世中崛起，取得相当稳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除了不稳定的北部之外，该国的其他各个方向也将面临挑战。位于东南方的伊朗，数百年来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没有显著成绩，但其国内事务一向都难以捉摸。南面有持续动荡、缺乏经济发展动力的阿拉伯世界。而在西北面，则是长期混乱的巴尔干半岛，其中包括土耳其的宿敌——希腊。

这些地区没有一个会在21世纪20年代获得良好的发展，尤其是土耳

其南面的阿拉伯半岛将面临生存危机。除了石油以外，阿拉伯半岛的资源很少，几乎没有工业，人口也是最少的。阿拉伯半岛目前的重要地位主要取决于石油，在历史上石油带来的财富对该地区的稳定有很大帮助。但到2020年，阿拉伯半岛将会衰落。虽然石油还没有枯竭但危险终将慢慢浮现。伴随着波斯湾地区其他酋长国的动荡，沙特众议院间帮派争斗将会大规模爆发。

不过，影响更广泛的一个问题当属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分裂。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它的分裂会受美国与伊斯兰圣战者战争的影响。大约在2010年美俄对峙时期，俄罗斯将进一步破坏中东稳定，企图用土耳其南部问题来牵制美国。大体上，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将在21世纪20年代按预想被划分为几块势力范围。

土耳其西北面的巴尔干地区也将鸡犬不宁。不同于20世纪冷战时美苏封锁南斯拉夫，美俄第二轮对峙的重点将是破坏该地区稳定。俄罗斯不会像冷战时期那么强大，它将面对的对手是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除了努力遏制土耳其（通过南面的阿拉伯国家），俄罗斯也将试图遏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并把它们变成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死对头。俄罗斯将撒下一张大网，以确保成功地转移土耳其的注意力。希腊、马其顿、波黑和黑山被卷入巴尔干冲突中，该地区将再次成为废墟。即便是土耳其的边缘地带都会持久地动荡不安。

土耳其：伊斯兰世界的守卫者还是美国的拥趸？

伊斯兰世界虽然不能团结一致，但却能够为穆斯林力量所支配。在整个历史上，从蒙古13世纪入侵以来，土耳其一直是最能将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创造成为一个帝国的一支力量。1917～2020年间的这个世纪算是例外，土耳其只统治小亚细亚。但是，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的权力不容小觑。从地图我们可以看出，土耳其一度统治过巴尔干、高加索、阿

拉伯半岛和北非。

21世纪20年代，土耳其将重新崛起，其实力甚至会超过日本。在与俄罗斯对峙期间，土耳其会在连接爱琴海和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阻断俄罗斯接近地中海（土耳其历史上就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因此，俄罗斯历来就视土耳其为阻断其利益的力量。俄罗斯将需要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对付控制巴尔干地区的美国。土耳其人知道，如果俄罗斯一旦有这样的机会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土耳其的主权将受到威胁。因此，土耳其人将致力于同美国联盟对付俄罗斯。

土耳其人将会对美国反俄战略起到一定的作用。美国将鼓励土耳其向北部高加索推进，希望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以及南面的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地区的影响力增加，这将提高土耳其的海军、空军力量和太空探索能力，以挑战黑海地区的俄罗斯。美国将要求土耳其海军与其共同承担地中海的军事任务，阻止俄罗斯在非洲的冒险行动。美国也将尽一切所能，鼓励土耳其经济的发展，这将进一步刺激土耳其正在快速发展的经济。

俄罗斯的第二次解体将提供给土耳其人一个百年不遇的良机。土耳其将摆脱混沌和虚弱的状态，迎来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双重发展。俄罗斯瓦解后，环土耳其各区域的地缘政治将会重组，土耳其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会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导力量，对各个方向施加压力。土耳其还不会成为一个正式的帝国，但毋庸置疑，它将处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位置。

当然，阿拉伯世界对土耳其重新崛起会相当担忧，它们并没有遗忘土耳其人在旧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虐待阿拉伯人的岁月。但本地区唯一能与土耳其抗衡的只有以色列和伊朗了，而土耳其的优势在于它对阿拉伯人不那么排斥。随着阿拉伯半岛的衰退，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都将密切依赖土耳其。美国将视这一发展为积极的步骤。

首先，它会奖励亲密盟友；

其次，它将使不稳定地区逐渐趋于稳定；

然后，它会将一直对波斯湾意义重大的碳氢化合物的供给纳入土耳其的势力范围；

最后，土耳其人会设法遏制伊朗在该地区的野心。

虽然短期内的反应是积极有益的，但其长期的地缘政治影响将违背美国的总体战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造就了区域大国来阻止亚欧大陆上更大的威胁。然而，美国也担心区域霸权，因为它不仅可以演变成区域挑战者，也有可能成为全球挑战者。这正取决于美国将对待土耳其的态度和方法。21世纪20年代末期，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也将变得越来越紧张。

土耳其对美国的看法也将改变。21世纪30年代，美国将被视为是土耳其区域利益的威胁。此外，土耳其可能发生意识形态的转变。自从奥斯曼帝国垮台，土耳其就一直是一个世俗大国。历史上，土耳其人采取灵活的方法，把宗教当做一种跟信仰系统差不多的工具。在美国不断加强对土耳其遏制的情况下，土耳其可能会转而发现这样做更有利于钳制伊斯兰势力，即不仅把自己装扮成穆斯林力量，还要装扮成伊斯兰力量（与基地组织决然不同），试图建立一个伊斯兰超级大国。这将使阿拉伯穆斯林在该地区的立场从不愿意结盟，转变为积极参与土耳其的扩张（不再计较历史旧账）。因此，美国将面对的是一个潜在的强大势力——伊斯兰国家，该国将统治整个阿拉伯世界和地中海东部。土耳其的政治力量和经济活力的结合，定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其他方面的挑战也会继续出现。[2]

欧盟与俄罗斯的支点：躲在美国身后的波兰

在美国与俄罗斯的对抗中，最热情的参与者将是苏联卫星国，尤其是波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被美国领导一样，波兰人也将影响美国人。面对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波兰已经失去一切，也没什么需要保护的。当俄罗斯再次逼近波兰的边境线时，波兰将通过北约寻求欧洲其他国家的支持。德国和法国对任何对峙都没有兴趣，因此，面对俄罗斯和德国的威胁时，波兰将尽其所能，寻求外部力量的保护，但历史证明，这个方法收效甚微。法国和英国1939年声称会保护波兰免遭德国和俄罗斯的侵犯，可并没有起到作用。但美国的做法将有所不同。它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敢于冒险的国家，而且实力不断增强。令波兰惊喜的是，美国将有足够的实力阻止俄罗斯。

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会对美国超越俄罗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它们不想再经历类似于20世纪的冷战了。当所有这些国家的人口减少时，德国和法国可能会欣慰地看到俄罗斯的第二次解体，虽然其人口也下降了，但总数依然庞大。然而，它们不愿意看到美国在北约框架之外依然拥有在欧洲的强势地位。北约实际上是欧洲人用来控制和遏制美国的组织。

德国、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也不会习惯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突然建立起来的自信。因为同美国强大的双边关系，跟俄罗斯对峙反而会使这些国家感到更加安全，它们通过这种双边关系设法压制俄罗斯的力量。摆脱了对俄罗斯原始的恐惧和对觉醒的德国的不安，这些国家几世纪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是相对安全的。法德的衰退将波及所有欧洲边缘地区，这主要是由人口减少、经济萧条，以及地缘政治的决策失误而放弃同俄罗斯对峙（因此破坏了北约）引起的，最终结果将是一战以来渐渐摧毁法德的信任危机的进一步深化。

因此，对欧洲权力结构将有一个界定。俄罗斯的瓦解将给东欧提供在东部地区采取更积极的外交政策的机会和需求。东欧将成为欧洲最有活力的地区。随着俄罗斯的瓦解，东欧国家将向东扩大其影响力和权

力。喀尔巴阡山脉形成的天然屏障，使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已成为最不容易受到俄罗斯侵略的国家。在欧洲北部平原的波兰将是最脆弱的，但同时也是东欧最大的、最具潜力的国家。

当俄罗斯四分五裂时，波兰将是第一个想要向东推进，试图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建立一个缓冲地区的国家。当波兰人想一试身手时，喀尔巴阡山脉以东的国家则把势力往乌克兰延伸。500年来，夹在大西洋沿岸欧洲国家、德国和俄罗斯的争夺之间，东欧一直处于落后地位。随着俄罗斯的瓦解，欧洲秩序将移向与美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东欧。

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建立政治邦联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有太多的文化和历史差异，但是，这些国家并不是不可能建立一个联盟，尤其是当它们有“向东部挺进”的共同利益的时候。

这正是这些国家将在21世纪30年代所要做的。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同美国密切合作时所遗留下来的军事力量，它们将结成联盟，并且不反对任何挺进东部的行动。相反，鉴于这种混乱的局面，该地区许多人会将其当做一支稳定的力量。难点是协调行动，避免某些特殊领域的主要冲突。该地区一直以来都矛盾重重，然而，21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东欧国家将尽释前嫌，共同对付俄罗斯。确保俄罗斯不再对自身构成威胁和增加劳动力数量，将成为东欧国家的头两号任务。

我们无法精确地预测东欧的发展进程，但并不难想象爱沙尼亚占领圣彼得堡，波兰占领明斯克，或匈牙利占领基辅的情景，这就好比俄罗斯占领华沙、布达佩斯和柏林。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如果俄罗斯再次解体，东欧不可避免地会掀起一场东扩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波兰将成为欧洲一支主要的活跃力量，但它不是独自行动，而是领导东欧国家联盟。

由此看来，到2040年，欧洲内部的权力平衡会转移到东欧。整个欧洲将面临人口减少的危机，但东欧能通过与美国复杂的金融关系解决这

一问题，这也是美国用来与盟国维持关系的传统手段。东欧在绝对经济规模上可能不会超过西欧，但东欧将比西欧更有活力。

这一切对法国和德国意味着什么呢？处于秩序混乱，但法德两国处于决定性地位的欧洲是一回事；处于自身重组，将法德两国抛在脑后的欧洲又是另一回事。英国已驶入美国的经济轨道，伊比利亚半岛也得到了美国的青睐，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和德国将面临生存困境。

衰落意味着不再进行大冒险，但它并不意味着丧失生存意志。到2040年，法国和德国的辉煌将一去不复返。在人口危机和欧洲地缘政治的重新界定之间，法国和德国将面临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如果不能维护自身利益，由他国决定自己的未来，它们就会从衰落变得无力，而这种无力会成为一种地缘政治性的螺旋，它们将因此一蹶不振。

对法国和德国来说，美国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本世纪中叶，东欧会迎来发展高潮，但这是在美国支持的背景下才会发生的。如果美国被迫放弃其在欧洲的权力，东欧就不会有能力和信心来推行其在东部地区的战略计划，欧洲旧秩序就可以继续维持下去，法国和德国的安全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显然，法德不会直接同美国对抗，迫使美国人放弃在东欧的影响力。但是，随着美俄冲突的落幕，美国在该区域的即时利益也将减少。因为美国的力量仍会是不断变化的，其注意力跨度小，所以美国很有可能减少在东欧的注意力。法国和德国可能还会有一次威慑东欧的机会，尤其是当美国把注意力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如太平洋地区）时。

美国对欧洲的胃口可能会在俄罗斯瓦解后立即缩小，但这只是在短期内增强法德的力量。随着美国同日本和土耳其危机的出现和加剧，美国会重新重视自身在欧洲的利益。一旦土耳其人在21世纪20年代开始行动，美国在东欧将拥有非常现实的利益，这足以阻止法德两国东山再起。[3]

2030：不可一世的美国时代

21世纪头20年，俄罗斯的分崩离析将创造一个从太平洋到喀尔巴阡山脉的巨大权力真空。周边地区将对这个权利真空展开激烈的争夺。芬兰将收回卡累利阿，罗马尼亚将收回摩尔多瓦，同时欧洲人和美国人也将在中国建立地方势力范围。这真是一个偷猎时代。

有三个国家有能力也有必要做一些大举动。日本将进行权力扩张，将俄罗斯远东滨海区域和邻国部分地区收入囊中。土耳其也将进行权力扩张，不仅进入高加索地区而且将穿过该地区达到其西北部和南部。波兰领导东欧国家联盟，将向东推进，深入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

本世纪头10年，美国对这一切会静观其变、不动声色，一如它在20世纪90年代对待世界的态度。波兰、土耳其和日本将是美国的盟国，增加它们的力量也将提升美国的实力。从道义角度出发，可以说，这些国家实际上将有助于邻国的繁荣。

然而，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当这三个国家的实力不断积蓄之时，美国又会开始感到心神不宁。到21世纪40年代，这种不安将会变成彻头彻尾的敌意。美国的第五条地缘政治原则是反对任何大国控制整个亚欧大陆。一时间，会有三个区域霸权同时出现，其中两个（日本和土耳其）将是重要的海上大国——一个在太平洋西北部，一个在地中海东部。这两个国家也都会在太空开发上采取行动、大展拳脚。下一章我们会讨论它们如何在21世纪中叶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世界进程。到21世纪40年代，美国会对一切破坏自身利益的行为作出反应。好戏即将上演。

注释

［1］弗里德曼.未来10年[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186～

188.

我们很难想象还有哪两个国家会像中国和日本这样差异迥然。它们之间的现代战争始于1895年，在那场战争中，日本人彻底摧毁了清政府的北洋水师。此后，经济摩擦把它们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敌人。

日本是个海上工业大国，它的原材料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而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中国则可以自给自足。从日本的工业化历程起步那一天起，就离不开中国的市场、原材料和劳动力，而且他们希望以最优惠的方式获得这些资源。中国需要的则是国外的资本和经验，但却不愿因此受到别人的控制。这两个经济体之间别有用心的相互依赖，导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它们之间爆发了一场残酷的战争，此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领土。两个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那场战争留下的阴影，而它们之间的敌意和仇恨也只是暂时受到抑制。

冷战期间，美国与中日两国维持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美国不仅需要日本的工业力量辅佐自己，更需要它所形成的天然屏障来阻止苏联舰队进入太平洋。对此日本也心甘情愿。作为回报，美国则向日本的工业产品敞开自己的市场，并且不要求日本为他们的全球军事战略承担任何责任。

与此同时，美国与红色中国在怒目和仇视中度过了30年，直至陷入越南泥潭，为寻找共同抗衡苏联的盟友时，才发现了中国的价值。而始终对苏联心存戒备的中国，也接受了美国人的示好。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对美国人与另一方的关系感到不舒服，但美国人在维护这个三角关系方面似乎已经驾轻就熟，因为每个国家都要考虑更重要的事情：中国人关心的是地缘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苏联的怵惕；日本想的则是如何实现战后经济的复苏。两国都出于各自的理由而需要美国这样一个朋友。

冷战结束后，这种均势也发生了变化。在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期戛然而止时，中国则采用了日式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成长模式，开始了长期

的高速增长。日本依旧是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则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这些非常符合美国的期望。事实上，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关注主要停留在经济层面，而不从真正的地缘政治角度去看待它们。总体而言，亚洲事务是财政部及贸易经理们考虑的重点，而不是国防部的当务之急。

西太平洋及东南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稳定局势尤需令人关注，因为在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印度支那到印度尼西亚，再到中国及其他地区，亚洲似乎是世界上最不稳定、最不被看好的地区之一，这里就像一个沸腾的大锅炉，充斥着战争、内乱和不稳定因素。

因此，美国总统必须牢记，亚洲永远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地方，未来10年里，某些现在还被认为不变的东西将会有彻底改观。例如，日本经济走出衰退的同时，中国经济却将面临严峻考验。1970年，我们还一致认为，亚洲是个充满暴力和不安定因素的地方；但是到了今天，它却呈现出一派和平与稳定的景像。这些相互矛盾的结论表明，要正确判断亚洲在未来10年的状况、中日之间的博弈将如何发展以及美国将采取何种政策，都将充满未知的挑战。

［2］弗里德曼.未来10年[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140～141.

因此，在即将到来的10年中，美国必须确保土耳其不会有悖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还要防止伊朗和土耳其为了统治以及瓜分阿拉伯世界而相互勾结。土耳其与伊朗对美国的恐惧感越严重，上述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从短期来看，美伊之间的和解会让伊朗暂时放松警惕，但是他们十分清楚，这只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为了建立天长地久的友谊。相形之下，土耳其不仅更适合作为美国的长期盟友，而且还能够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作为阻止俄罗斯勃勃野心的障碍，从而为美国带来好处只要美国能够维持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基本事项，伊朗对土耳其来说就意味着威胁。无论土耳其人有何想法，他们首

先要自保，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土耳其必须设法削弱伊朗在阿拉伯半岛的影响以及与半岛北部毗邻的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实力。这种做法不仅能够牵制伊朗，而且还会拉近土耳其与波斯湾地区产油国家之间的距离，从而保证其石油供给并且从中牟利。

在未来10年中，土耳其和伊朗将会进行角逐，而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则更加关系地区均势问题。从长远角度来看，伊朗不可能对土耳其形成制约，因为后者不仅在经济上更具活力，在军事上也更加先进。更为重要的是，伊朗地势封闭，而土耳其却四通八达，连接着高加索、巴尔干、中亚以及地中海和北非地区，因此有更多机会拉拢盟国从而削弱伊朗实力。从古代起，伊朗的海军力量就相对弱小，而且由于其港口所在位置，伊朗将来也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海上大国。与此相反，土耳其曾经数次成为地中海的主要强国，而且这一历史还会重演。在即将到来的10年中，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成为这一地区霸主的态势将会露出冰山一角。有趣的是，虽然我们可以想象土耳其在未来100年中将会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未来10年中仍然是其蓄势待发的一个过程。土耳其必须设法平定国内政局，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该国将继续遵循近年来较为谨慎的外交政策。反之，如果土耳其让自己陷入各种冲突之中无法自拔，那么它就难以对这一地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美国必须懂得从长远的角度看待这个国家，并且避免对其施加巨大压力，影响其发展。

［3］弗里德曼.未来10年[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180～182.

不管美国对欧洲周边国家采取何种战略，但德国依旧是问题的重中之重，在未来一段时间，德国将继续主导很多国家的外交政策。美国不仅需要避免与德国形成直接对立，也不能对欧洲事务置若罔闻。尽管北约已名存实亡，但美国决不能放弃北约，而要以足够的尊重对待所有多边制度和所有欧洲国家，把所有多边机构和每个欧洲国家都看做是不可

忽视的力量。换句话说，美国必须对欧洲建立一种常态机制，避免欧洲的周边国家被纳入法德阵营。一旦美国过早地让美欧关系陷入危机，只会加强德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德国（或者说德国与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固有的紧张关系注定会不断加深。因此，美国根本就没有必要主动去添油加醋，因为承担压力的是德国，而不是美国。与此同时，在这种相对缓和的局势下，美国必须采取必要步骤应对俄罗斯与德国成为盟友的可能性。为此，美国总统必须进一步推进与部分主要欧洲国家的双边关系，而且必须在多边关系框架之外达到这一目的。而最可取的典范就是英国，作为北约及欧盟的成员国，英国始终与美国保持着与众不同的坚实关系。在未来几年里，美国必须在绕开北约的前提下，加强与欧洲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但口头上又不能疏远北约。

不管选择何种关系，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美国在欧洲国家心目中的盟友关系，美国至少要在表面上接受德国。但某些国家确实关系到美国的利益。譬如，丹麦控制着俄罗斯进入大西洋的出口和美国进入波罗的海的入口。意大利在地中海占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与英国保持着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亲密关系的挪威，可以为美国提供战略上的优势，不仅仅是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也关系到美国与挪威石油行业的合作前景。当然，与土耳其的合作，则可以为美国在巴尔干、高加索、中亚、伊朗以及阿拉伯世界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但美国不应把眼光仅仅局限于这些对自己有价值的国家，而是应该放开眼界，总揽全局，还要关注那些会给自己带来负担的国家。德国和法国始终瞧不起美国的战略，认为它不成熟。而美国则应在未来10年充分利用这一点，在不经意间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美国的每一个举动都应让德国、还有法国感觉到，美国并不在意它们的活动。

但这些关系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们或许要让美国在遏制俄罗斯的波兰及“海间联盟”（即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地区付出一定的代价。在这些地区，美国的战略同样需要刻意制造隐蔽和欺骗。

它必须诱使欧洲认为，美国只是在拉拢那些一直想被美国拉拢的国家，如波兰、“海间联盟”的其他国家及波罗的海国家。一旦美国暴露出直接寻求抑制德国或是与俄罗斯制造危机的迹象，都有可能引起欧洲的反弹，从而导致这些周边国家回归欧洲权力的中心。就总体而言，这些欧洲国家并不想被拉进对美国的对抗。另一方面，它们又想寻找一个能对抗巴黎-柏林-莫斯科这个轴心势力的力量，因此，只要不需要付出高昂代价，他们完全会投入美国或者是英国的怀抱，为自己找到一个保护伞。无论如何，美国都必须阻止俄罗斯与欧洲半岛联合起来，因为这将形成一股美国人无法遏制的力量。

在欧洲问题上，信任至关重要，尤其是对波兰。美国必须从两个方面帮助波兰克服历史阴影。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波兰人认为英国和法国在1939年会出兵帮助自己抵御德军进攻完全是自欺欺人，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这完全不可能实现；其次，美国还需要提醒波兰的是，波兰人并没有抵抗多久，以至于其他国家根本就来不及出手相助，德国人征服欧洲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但波兰在第一周里就已经向德国人投降了。这样的提醒似乎有点尖刻。但对于波兰及其他欧盟成员国来说，如果不自救，也就不可能被他人所救。

这也是未来10年美国总统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因此，他必须学会以假乱真，只有这样，莫斯科或是柏林才不会在美国构建制约它们的框架之前，先发制人，加剧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同时，美国还要向波兰及其他国家重申其履行维护相关国家利益的严肃态度。尽管这些事情并非不可为，但要想成功，还需要同时具备罗纳德·里根故作糊涂的本事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超凡冷静的心态。总统在表面上绝对不能让人感到智慧超人，即便是撒谎也要让人信以为真。这种伪装的对象并不是未来的盟友，而是潜在的敌人。显然，美国还需要争取时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最理想的战略就是首先为盟国提供援助，培养和支持本土军事力量，延缓拖住进攻者，或者至少能让他们坚持足够的时间，等待援兵的到来。此外，美国的援助还应该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创造适当环境，

既要帮助他们发展和加强本国经济，还要向他们开放美国市场。冷战期间，美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说服西德、日本、韩国等国家承担起抗衡苏联的重担。

第9章
战争前夜
被逼上绝路的日土联盟

21世纪40年代的美国将进入一段活力四射的时期。随着俄罗斯的持续混乱，土耳其将迅速崛起并成为区域性海洋强国，威慑伊朗和阿拉伯地区。日本将在日美联盟的框架下继续壮大的同时，希望摆脱束缚并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作为合纵连横的一环，美国将继续确保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来对抗日本，并适度的扶植俄罗斯来对抗土耳其。犹如惊弓之鸟的日本和土耳其逐渐开始走上结盟之路并挑战美国，战争一触即发。

与20世纪90年代、20世纪50年代或是19世纪90年代相比，21世纪40年代美国将进入一段活力四射的时期。在经历了50年周期性循环之后的10～20年间，美国采取的改革措施开始推动经济发展。21世纪30年代在经济、科技和移民方面采取的大变革将会在这个年代末起作用。因推广机器人技术提高的生产力以及遗传科学增加的医疗机会，为美国经济注入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内部研发（尤其是第二次冷战期间激增的研发能力）将会结出硕果。

然而，正如我们曾在历史上无数次见到的那样，国内繁荣富强并不意味着国际的和平稳定。在21世纪40年代，一个将摆在人们眼前的问题就是：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会有怎样的关系？一方面，美国将会十分强大，它所采取的任何举措实际上都将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另一方面，鉴于俄罗斯的衰退，美国强大到可以不顾及其他国家感受的地步。即便在最缓和的情况下美国也极具进攻性，一旦它下定决心要解决问题

时，就会采取无情的毁灭性打击措施。全世界都想要遏制美国，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几乎所有国家都会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对抗美国的风险太高了，而与美国合作的回报则非常可观。这些反对的呼声将会通过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力量得到平息。

21世纪40年代左右，太平洋盆地的未来发展问题最为引人注目并将引起广泛争议。范围缩小点，就是太平洋西北部的问题，再具体点，也就是日本对中国和西伯利亚的政策问题。从表面上看，日本在亚洲大陆日渐呈现出其侵略性本质，因为它在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会干涉他国的事务，就连美国它也敢碰。此外，日本对中国主权的尊重问题和俄罗斯滨海区自决权问题也是21世纪40年代的主要问题。

从更深层次来说，日本的海上力量以及太空军事体系的迅速壮大给美国敲响了警钟。一直从波斯湾进口石油的日本将会增加在中国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的军事力量。21世纪40年代的最初几年，日本将会极为关注海湾地区的稳定性，并开始对印度洋进行探查和巡逻，以保护自身利益。日本将会与太平洋列岛建立起牢固紧密的经济纽带，还会与其达成卫星追踪和控制站协议。美国情报机构将会怀疑这可能用作日本超音速反舰导弹基地。超音速导弹的速度比音速的5倍还要快，到了21世纪中期将会超过音速的10倍，达到每小时8 000英里甚至更快。超声学可以应用于导弹，直接摧毁目标；也可以用于无人航行器，向目标投放军需品然后返航。

日本将会与美国第七舰队分享海域，与美国太空司令部（到目前为止愈加独立的美国军事机构）分享太空。任何一方都不会在海上或是太空挑起争端，两国在形式上将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但是，日本会敏锐地觉察到美国人的忧虑，即美国人自视为内湖的太平洋那里横亘着一个难以完全掌控的强国日本。

日本将会十分注重保护本国的海上交通要道，免受南部的潜在威胁，尤其是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印尼海域。印尼是个多民族多

岛屿的群岛国家，本身就是相互分离开来的，现在和将来都会不断地发生分离主义运动。为了获得印尼海域的各个海峡，日本将玩一场复杂的游戏，激起不同的分离主义运动力量之间的相互对抗。[1]

日本还希望有能力把美国海军驱逐出西太平洋。要想达到这个目标，日本需要做三件事。首先，要在本国岛屿建造并配置超音速反舰导弹，使自身具备对太平洋深海展开攻击的能力；其次，日本将会与美国达成协议，允许在经济上受日本控制的太平洋岛屿上建设传感器和导弹，像小笠原群岛（包括硫磺岛）、马歇尔群岛和瑙鲁岛，日本的策略是，制造障碍以便潜在地阻断美国的跨太平洋贸易和军用运输船；然后，日本将会加强对美国行动的预测能力，日本的人造卫星也会更易于监控美国船只的运行。然而，令美国最烦心的是日本将在太空领域大展拳脚。在太空，日本不仅要建立军备，还要建立商业基地和工业设施。

美国的政策会很复杂，并像往常一样，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对俄罗斯后方造成威胁，这一想法会在21世纪前30年给美国情报机构和军事部门带来困扰。21世纪30年代，这种困扰变成了国务院的固有观念，美国会一路坚持自己的旧有政策。因此，美国将继续履行承诺，确保一个安全稳定的中国。然而，这将成为21世纪40年代以来美日关系的主要摩擦点。很明显，日本对华政策有悖于美国保持一个稳定中国的想法。到21世纪40年代末，华盛顿与北京日益密切的关系将会激怒日本。

2050年的土耳其：走上神坛还是陷入泥潭？

随着俄罗斯的第二次解体，土耳其将果断地向北推进至高加索山脉。土耳其将以军事干预和政治结盟的形式展开此次行动。同样重要的是，土耳其的大部分影响力是经济上的，其他国家会因为需要新的经济力量而与土耳其结盟。土耳其的影响力会势不可挡地向北扩展，跨过高

加索山脉进入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政治上左右摇摆不定的顿河和伏尔加河谷一试身手，甚至继续向东扩展到俄罗斯的农业中心地带。穆斯林土耳其人将会对同为穆斯林的哈萨克斯坦产生影响，把土耳其的力量扩展到中亚。黑海将会变成土耳其的内湖，克里米亚半岛和敖德萨的贸易也将依赖土耳其。土耳其将在这个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

俄罗斯会在解体之前与南土耳其建立联盟体系，就像冷战期间那样。俄罗斯的衰退将会引发一条从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到阿富汗的动荡地带。土耳其完全没兴趣插手伊朗事务，并对伊朗在国际上的孤立形势感到满意。但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社会动荡则会直接影响土耳其的利益，尤其是库尔德人独立后会开始思考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没有俄罗斯的支持，叙利亚和伊拉克变得势单力薄，并且会因由来已久的国内冲突而四分五裂。由于不稳定的危险向北扩展和其他大国填补空缺的威胁，土耳其将向南推移。当然，土耳其人不想让美国进入伊拉克：在21世纪初期，他们将对此感到极度厌烦。

巴尔干半岛在这个时期也会陷入混乱。随着俄罗斯势力的削弱，它在巴尔干半岛的同盟也会受到牵连，造成区域性的不平衡。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将会试图填补这些空白，除此之外，希腊（土耳其历史上的敌人）也跃跃欲试。作为新的区域大国，土耳其将会因该地区大规模的动荡插手巴尔干半岛事务。土耳其将会与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国家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后两国将力图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不是出于侵略性的欲望，而是出于对其他国家扩张意图的恐惧。

从地理角度来说，这个区域的任何大国都只有一个实质目标，那就是控制地中海东部和黑海。重要的是：土耳其曾是在历史上既有陆军力量又有海军力量的国家。欧洲大国越靠近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土耳其来说就越危险。土耳其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意味着它能迫使欧洲大国退出巴尔干半岛，或者说至少可以坚决地阻止它们向巴尔干半岛扩张。因此，插手巴尔干半岛事务对土耳其成为主要地区

大国来说是势在必行。

到21世纪40年代中期，土耳其会真正地成为主要地区大国。它将会建立深入俄罗斯的关系网，将其农业产品和能源运往土耳其境内。土耳其将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随着石油和天然气（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的减少，土耳其的势力范围将会延伸到沙特阿拉伯半岛。土耳其将向西北推进自己的势力范围，深入巴尔干半岛，在那里，它会与美国的主要盟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发生冲突。后两国也会把它们的势力向东推进至乌克兰地区，这样就会与土耳其延黑海北海岸的势力范围交叉重叠。从游击战到当地的常规战，所有冲突将会以土耳其为中心爆发。

土耳其将会根据本国需求继续增强本已非常强大的武装力量，包括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力量。土耳其把武装力量开进黑海来保护博斯普鲁斯海峡，并突进亚得里亚海来应对巴尔干半岛突发事件，这些都需要海军力量。事实上，土耳其还需要在远达西西里的地中海东部取得统治地位。需要保护的不仅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奥特朗陀海峡和亚得里亚海通道也需要受其控制。

土耳其将会使在东南欧的美国同盟国感到紧张，而且它的实力增长会使意大利陷入极度不安。当本来就不稳定的埃及面临国内危机时，转折点就会出现，土耳其将作为穆斯林的领导力量把军队开进埃及以稳定形势。一时间，土耳其的维和部队会出现在埃及，控制苏伊士运河，并像以往那样从北非向西推进。如果土耳其能抓住机会，它将会成为欧洲南部大陆上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以色列仍将拥有强大的军队，但已被视为友好国家的土耳其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将会利用其强大的实力封锁以色列并向其境内驻军，使其变成土耳其的驻军基地。

如果能控制苏伊士运河，土耳其的机会将会接踵而至。土耳其已经向南推进到了阿拉伯半岛，而且将对阿拉伯的反抗势力展开围剿。土耳其的陆路补给线会变得紧张，如果能控制苏伊士运河，土耳其就能通过红海输送军队。这将稳固土耳其对阿拉伯半岛的控制，保持对伊朗的威

慑态势，封锁伊朗港口并从西部对伊朗进行攻击。土耳其并非真的要采取这两项行动，但仅仅是这些行动所构成的威胁就足以震慑伊朗，这正合土耳其的心意。

让美国感到不安的区域性海洋强国

土耳其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跨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盆地。土耳其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波斯湾，巩固对阿拉伯半岛的控制，因为那里仍有重要的石油供给线。这样，土耳其将变成日本一个重要的安全隐患。两国都有突出的经济、军事实力。两国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与马六甲海峡的海上交通要道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虽然有微小的摩擦，但两国将有重大的利益汇合点。

很明显，土耳其以海上强国的姿态在这一地区崛起，这给美国敲响了警钟，而同期日本的迅速崛起使得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土耳其和日本在印度洋上低调的合作令美国极为不安。土耳其和日本在波斯湾和西北太平洋分别具有压倒性优势。美国在印度洋上仍然处于统治地位，但在太平洋区域，这种趋势不会再向前推进了。

同样令美国烦恼的是，土耳其将以何种方式召集上一代伊斯兰运动残余分子，如何为它在此地区日益强大的势力增加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的砝码。随着土耳其影响和实力的不断增强，它所形成的不仅仅是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无疑会使美国和印度陷入不安。

美国将与印度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这可以追溯到21世纪早期美国同伊斯兰圣战者的战争。然而国内分裂的印度不会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力量，只会成为重要的地区性大国。对于信奉穆斯林的土耳其人进入阿拉伯海，印度会深感困扰，担心将来土耳其会把势力扩张到印度洋。印度的利益会与美国的利益密切相连，因此美国将在印度洋上建立起与在太平洋上同等水平的军事力量。美国会与印度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

大陆国家建立联盟，遏制更有活力的海洋小国。

随着这个过程的逐步推进，日本与土耳其这两个地处亚洲两端的国家的势力会得到巩固。为在亚欧大陆扩大各自的经济利益，土耳其和日本会调动海上力量进行支援。另外，两国会加强太空合作，有计划地发射有人或无人驾驶的太空设施。日本在科技方面领先于土耳其，但是土耳其发射太空设备会使日本在对抗美国时增加自身的安全性。这种合作是造成美国不安的另一个来源。

到本世纪中叶，土耳其的影响力将会扩展，并深入到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会与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发生冲突。土耳其将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力量，控制苏伊士运河并将其力量扩张到波斯湾。土耳其将威胁到波兰、印度、以色列，尤其是美国。

波兰：尴尬的大国角力场

一直以来，波兰的噩梦就是同时遭到俄罗斯和德国的进攻。一旦遭袭，波兰就会像1939年那样，没有幸存的指望。21世纪20年代,俄罗斯的第二次解体会给波兰崛起创造动力和机会。俄罗斯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尽量向西延伸，所以波兰会想要把自己的边界向东推进。

从历史上看，波兰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它曾经受到三个帝国——俄国、日耳曼和奥匈帝国的挤压和统治，但在17世纪，面对当时尚未统一的日耳曼德国和在西部还不强大的俄国，波兰曾有机会向外扩张。

一直困扰着波兰的是其南部的动荡。21世纪40年代，这个问题将不复存在，因为其他毗邻俄罗斯的东欧国家也都急切地想要向东扩展。1991年的教训仍鲜活地存留在它们的脑海中。但是这个东欧联盟仍然要面对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问题。自从1871年统一后，德国就成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即使“二战”后失去了政治意向和信心，但它仍然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势的经济力量。

2020年以后的情况就不再相同了。德国经济会被人口老龄化所拖累。德国一直倾向于建立庞大的经济体系，这会使生产率长期处于低谷，延缓经济的发展。中欧和西欧的众多问题将殃及德国。但是，东欧可以挺过第二次冷战（与世界头号科技强国美国结盟）。冷战是最可怕的战争，它会让你的国家生不如死。第二次冷战期间发展的科技能力将使美国抢尽先机，而波兰将淹没在美国的高科技中。

如果只凭一己之力，德国既没有欲望也没有能力来抑制以波兰为首的东欧国家集团（这点将在下文讲到）。德国人会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未来。用不了多久，波兰的实力将会超过中欧和西欧，这正是德国以前的梦想。波兰将会同化和开发原俄罗斯帝国的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强大的经济体。

波兰国家集团的核心弱点是，它位于内陆。它会在波罗的海拥有自己的港口，但那些港口很容易被具备一定海上实力的国家封锁。斯卡格拉克海峡会是一个危险点，这是因为：如果斯卡格拉克海峡是波兰的唯一出口，波兰通向美国或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海上供给线将极易受到攻击和封锁。此外，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亚得里亚海寻找港口。历史上靠近匈牙利的克罗地亚将会控制里耶卡港口，虽然这港口十分狭窄，但自有它的用处。

使用里耶卡港口存在两个问题，它们都与土耳其有关。首先，土耳其的势力将深入巴尔干半岛，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力量也会深入那里。在巴尔干半岛历史上，国家的敌对情绪会使得宗教情结复杂难解，这次也是一样，局势会变得动荡不安。土耳其不想看着波兰国家集团向地中海扩张，它将会利用波斯尼亚与克罗地亚的紧张形势来制造不稳定。即使波兰向地中海扩张，对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的利用权也不会握在只拥有简单商船队的波兰国家集团手中，而是取决于对奥特朗托海峡的控制。对波兰国家集团来说，另一个选择是进攻德国和丹麦来夺取斯卡格拉克海峡，但波兰这样做的机会为零。

波兰集团会在两个地区与土耳其发生冲突。一个是在巴尔干半岛为地中海的使用权而引发冲突；另一个是在俄罗斯，通过乌克兰向西扩张的土耳其会与向东扩张的波兰交锋。这个地区的冲突不像巴尔干半岛的冲突那么激烈，尚且存在很大的回旋空间，但也属比较重要的问题。没有国家曾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确立过势力范围。假设乌克兰对波兰和土耳其有敌意（16、17世纪乌克兰就与波兰呈敌对状态），任何一方都可以用令对方难堪的方式来给彼此制造麻烦。

四面楚歌的“美国代理人”?

在这个节骨眼上，波兰急需美国的支持。只有美国有实力在地中海与土耳其对抗。美国也倾向于这样做，它希望看到新的亚欧力量自行建立起来。但土耳其离到达那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在亚欧地区的战略指针是，在任何国家发展壮大之前使其分裂，并阻止任何海上力量的崛起，所以从理论上讲，美国会设法抑制土耳其的壮大。

同时，美国的政策显示与其直接采取行动，不如资助其他有意反对土耳其的地区大国。不同于土耳其，波兰国家集团不会立即对美国利益产生威胁。因此，美国的策略是避免自身陷入战争泥潭，对波兰提供科技支持，这样美国就能利用波兰达成自身的战略目标。

到2045年左右，波兰国家集团将攻下里耶卡港口，吞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国将寻求波兰国家集团的保护来对抗巴尔干半岛的敌对国，如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在与两国的临界地，波兰会大规模加强力量。波兰国家集团拒绝接纳塞尔维亚，因为波兰和其他国家不想陷入塞尔维亚的政治泥沼。借助于美国的科技力量，波兰将迅速实现一体化并发展海上和太空科技，用来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对抗土耳其。波兰国家集团的发展速度惊人，土耳其将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挑战不仅来自波兰国家集团，还来自美国。

德国会在临近边界处焦急地注视着这场危机，很明显它会支持土耳其。德国不会采取行动，但如果土耳其被波兰国家集团打败，德国会充分意识到严重的后果。那样的话，如果波兰国家集团没有分裂，并利用自身大多数的欧洲资源（外加中东的资源），波兰就会发展成苏联那样的规模。德国很清楚当美国扶持波兰国家集团在东欧获得统治地位后就会对其展开打击，到时德国就会处于美波对抗的风口浪尖。一旦波兰有实力控制东欧，美国将不得不采取措施阻止波兰控制西欧，这意味着德国又一次变成了潜在的战场。波兰国家集团成功控制东欧将为德国带来威胁。

因此，德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千方百计尽可能地帮助土耳其，但不会发动战争。但是土耳其需要的帮助是扼死波兰国家集团，关键是使波兰国家集团孤立于美国和全球贸易之外。如果土耳其能够在亚得里亚海孤立波兰，德国就会采取措施来遏制波罗的海诸国，那么波兰国家集团就会陷入极度的危险。但是德国要这样做必须先确定土耳其能够取得胜利，还要确定美国不会出全力插手当地事务。然而这两点德国都不能确定，所以只能伺机而动。

美国也会在全球范围内伺机行事，它将为波兰国家集团提供武装以鼓励它对抗土耳其。美国会帮助加强印度在印度洋上的实力，促进中国和韩国发展壮大，在太平洋和地中海建立美国势力范围。美国会尽可能地遏制日本和土耳其，但不会采取直接的对抗行动。土耳其和日本都清楚地知道，美国给同盟国提供装备来保护自己的实力，这在历史上早已有之。美国的这一政策将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土耳其和日本在美国这位“代理人”不断插手当地事务的情况下，将面临巨大的灾难。这将会导致紧张局势大规模升级。

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合纵连横

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在多重边境上面临危机：20世纪40年代，德国和日本同时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威胁。在那种情况下，美国采取一系列加强区域联盟的策略，协助英国和俄罗斯反对德国，协助中国反对日本。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美国将再次采取这种长期行动。美国不会占领或摧毁土耳其和日本，更不用提德国了。美国将采取防御措施，阻止其他势力崛起。它不会采取进攻策略（在特殊情况下也有可能）。美国的策略是降低在任何时期发生的能够引起潜在敌对的威胁，这些威胁会使美国陷入无法结束却又不能轻易放弃的两难困境之中。在这种策略里，美国总会宣扬本国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把日本和土耳其描绘成具有侵略性的、破坏国家主权的、侵犯人权的国家。

除了公共外交以外，还有一系列更加直接的挑战出现。

第一个挑战就是经济。美国市场广大，是日本巨大的销售市场，在较小程度上，也是土耳其产品的销售市场，而且美国依然是新科技的主要来源。因此退一步说，被美国市场和美国科技拒之门外是痛苦的。美国会停止一些科技产品的出口，尤其是那些潜在的军事设备，限制日本和土耳其的部分产品的进口。

同时，美国会在朝鲜和印度支持一系列民族主义运动。美国会通过波兰国家集团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土耳其势力范围内进行的民族主义运动。美国将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巴尔干半岛和北非，尤其是埃及。在巴尔干半岛，波兰国家集团（严重地依靠克罗地亚）将清楚表明不会与克罗地亚的宿敌塞尔维亚结盟，由此与土耳其之间建立了某种类似缓冲区的地带。美国将开始新的侵略计划，支持塞尔维亚反对土耳其，促使其扩张到马其顿地区。希腊是土耳其宿敌，它将会变成美国的亲密盟友并支持美国的举动，但不会与波兰国家集团正式结盟。

从地缘政治学的观点出发，并不难预测这些联盟的动机和动向。就像我说的，它们遵循良好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根深蒂固。我要做的就是看这种传统的模式如何在21世纪的大环境下发挥作

用。在这个特殊的地区里，美国开始支持反对土耳其的行动后，巴尔干半岛将变得危机四伏。土耳其在这个地区放置了大量的资源，它的主要任务是自卫。土耳其尽力保护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其他小国。如果土耳其撤退了，它的权威性将遭到严重的质疑。

美国还将试图支持在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土耳其在彰显实力时会小心翼翼，不会过分好斗贪婪，然而反土耳其情绪仍会蔓延。这种民族主义感被美国激发出来，当然美国并不是真诚地希望它有何进展，而是为了削减土耳其的实力。土耳其将会关注美国对波兰国家集团和北非的援助。美国的目的是改造和限制土耳其的行为，但任何干涉行为都将被土耳其视作对其基本国家利益的挑战。

无懈可击的“战斗星”堡垒

在此期间，美国将采取的最有威胁性的行动是在海上，然而真正实际的举动不会发生在海上而是在太空。21世纪30年代，美国将开始启动适度抑制太空商业化的程序，尤其在能量生产方面。到21世纪40年代中期，太空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仍需巨额拨款补贴，尚处在研发阶段。在太空商业化期间，美国会提升在太空机器方面的能力，只有最困难、最复杂的工作才会动用人力。美国创建了坚实的基础设施，使其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因为希望通过发挥在太空中的制衡优势来改进对地球的统治，美国将继续建设太空基础设施。它将逐渐抛弃用汽车把大量军队送到千里之外的昂贵无效的策略来展示实力，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将在本土建立极超音速的无人航行器。受地球同步轨道的太空指挥中心控制，我将这种太空堡垒平台称为“战斗星”（Battle Stars）。到本世纪中期，极超音速航行器和导弹将具有超过音速10倍的速度，大约每小时8 000英里。从夏威夷发射的导弹能在半小时内击中日本海面上的船只或是中国东北的

坦克。

美国还会创造（十分保密地，因为上世纪的条约仍然有效）由太空发射的破坏性导弹，该导弹能以极快的速度攻击地面上的目标。如果这个平台被地面通讯拦截，平台能在准确的时间和精确地点发射大量炸弹的战斗系统（基于先进的太空智能），这将会自动导致太空战。

21世纪的战争需要精准的通讯。最重要的是持续的太空战争将使主要的司令部和控制设备转移到太空。到那时，太空中获得的图像要通过一系列的人造卫星传到地球，然后将指令发送到极超音速武器系统，这大概需要几秒钟时间。重要的是，线路越多失败的可能越大，而且信号可能已被敌方截获。敌方可能会攻击地面的指挥中心、接收器和传送器。相较之下，位于太空的指挥中心更加安全持久，因为它拥有不易受武器和人员干扰的通讯系统。

这些系统中的大部分科技今天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到本世纪中期，它们会迅速发展起来。我将告诉你，科技世界实际上是怎样的。当然，我不是在写《星际大争霸》（*Battlestar Galactica*，70年代星球大战电影热潮中制作的一套经典科幻电视剧。——译者注）。这些预测是基于现实科技的关于未来科技和战争计划实实在在的想法。太空平台（Space-based platforms）将有超一流的感测设备和指挥控制系统。各个“战斗星”太空堡垒将控制无人操作的附属平台，正是这些附属平台支持着战斗星太空堡垒系统。它们能看到高清晰的地球表面，根据需要操纵极超音速航行器，通常在几分钟内击中目标。它们能袭击路旁的爆炸装置或是靠岸的舰队。只要它们能看到目标，就能击中目标。

鉴于在21世纪30年代太空建设计划中的教训，我相信美国的未来计划将需要创建三个太空堡垒系统。主要的太空堡垒将位于地球同步轨道——秘鲁海岸的赤道上。第二个太空堡垒将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上方，最后一个位于乌干达上方。这三个太空堡垒以几乎精确的间隔排列，把地球三等分。

大多数国家会对太空堡垒系统的建立感到不满，日本和土耳其将尤为惊慌。一个太空堡垒预定在土耳其南面，另一个在日本南面，运用自身携带的传感器和遥感器（它们绕地球转动），它们长时间来监控日本和土耳其，就像是指在这两个国家头上的枪。最重要的是，它们能够在一瞬间对两国实施不可阻挡的封锁。太空堡垒不会让美国直接占领土耳其和日本，但却能极大地遏制两国。

尽管新的太空系统将要计划好多年，但美国会以惊人的速度将其投入使用。由于2040年前后的快速发展，系统会在21世纪40年代的后5年内完全投入使用……由于还有争议的存在，不妨定在2047年吧。它的发展基于一个假设的前提——太空堡垒是无懈可击的，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击毁它。这是以前美国对战舰、航空母舰和隐形轰炸机所做的假设。美国认为没有任何国家能与其科技力量相媲美，所以美国的军事计划总有一种内在的自大感。尽管实际上依然存在很大风险，但整个太空计划看起来无懈可击，这将加快整个太空系统的研发进程。

美国肆意操纵的战争游戏

美国将通过太空堡垒的发展、太空控制新一代武器的引进、侵略性的政治行动和经济压力来遏制日本和土耳其。从日本和土耳其的观点来看，美国的要求偏激、蛮横无理。美国会要求两国的军队撤回本国边界，并保证美国在黑海、日本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通行权。

如果日本答应这些条件，它的整个经济结构就会被颠覆。至于土耳其，经济巨变在所难免，政治上的混乱也会将其重重包围。此外，美国会对波兰提出不平等的要求。事实上，美国将要求土耳其移交巴尔干半岛、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给波兰，这将使高加索再次陷入混乱。

美国实际上不期望土耳其和日本认输，这些要求只是美国向这些国家施加压力的平台，限制其发展，增加其不安全感。实际上，美国不期

望任何国家回到2020年的位置，只是想阻碍它们未来的扩张。

然而，日本和土耳其却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从它们的角度来看，假定的最好情况是美国想通过制造棘手的国际问题这种老套路，来把它们的注意力从紧迫的议题上移开。最坏的情况是美国计划封锁它们的国际舞台。无论如何，土耳其和日本都毫无选择的余地，只能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反击。

在太空领域，土耳其和日本没有美国经验丰富。它们能够建立载人航天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建起自己的侦查系统。美国的军事能力是遥不可及的，所以理所当然地，在一段时期内美国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方针。然而，日本和土耳其却都不具备重新调整战略的能力。

美国并不打算与日本或土耳其开战。它的意图只是打击两国，抑制两国的活力，使其更容易接受美国的要求。结果想要遏制美国力量的土耳其和日本，就会自然联合起来。到21世纪40年代，战争的科技手段能轻易形成国家间的紧密联盟。太空打破了地缘政治学的平衡。

从更为传统的角度来看，土耳其和日本也会彼此支持。美国的力量集中在北美，而日本和土耳其在亚欧大陆具有坚实的力量。

这样，有着确定目标的自然联盟就形成了。日本沿着太平洋海岸，到2045年将势力扩展到亚洲群岛和大陆。土耳其的影响范围将会扩展到中亚，甚至到中国西部的穆斯林区域。因此，土耳其和日本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它们会建立横跨亚欧的力量，与美国抗争。

美中不足的是，波兰和土耳其的影响不会渗透过巴尔干半岛，但这并不会影响土耳其和日本的联盟。即使只有一个欧洲国家加入联盟，波兰就会有大麻烦了。波兰的资源和注意力将被转移，使土耳其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毫无约束，这给土耳其和日本的联盟锦上添花。日本和土耳其最顾忌的欧洲国家是德国。它们认为，如果德国能被说服，就会对美国支持的波兰造成极大的威胁，这三重压力足以使美国的行动更加谨慎，

那么亚欧大陆的安全和联合资源的开拓便成为可能。

德国短时间内不会相信美国会被阻止。实际上，德国是害怕这三重压力会立即促使美国扣动战争的扳机。德国还考虑到如果波兰集团被消灭，不久后就要在多瑙河盆地与土耳其碰面。所以尽管我认为德国是最有可能加入土耳其和日本联盟的国家，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如果美国加入了与土耳其和日本的战争，与波兰结成联盟，波兰可能会在那场战争中受到严重的创伤。那样的话，德国晚一点介入，风险会比较低，获利会比较可观。如果美国直接获胜，德国的情况不会比原本更差。如果美国与波兰双双战败（至少有可能是这种结果），那么德国可以加快进攻的脚步，击退对方。静观其变才是德国的明智之举，这就是将会发生在21世纪中叶的一场战争游戏。

另一个可能结盟的对象是墨西哥（虽然可能性非常低）。回想一下，墨西哥曾在一战期间受德国邀请加入了联盟。尽管还活在美国的阴影下，但新世纪的前50年里墨西哥会迅猛发展，到21世纪40年代末它已经成为主要的经济国家。2030年美国新的移民政策出台后，墨西哥人将会大量的向西南边界流动。这给美国带来了诸多麻烦，但就21世纪40年代末墨西哥所处的状态来说，它几乎不可能加入反美联盟。

土耳其和日本被美国逼上了绝路

当然，美国的情报机构将会掌握东京和伊斯坦布尔（届时，土耳其首都会从安卡拉迁移到伊斯坦布尔）间的外交密电，同时密切关注德国和墨西哥的动向。届时，美国会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如果战争爆发，日本和土耳其会联合作战。虽然两国不会签署形式上的合作协议，但美国所面对的不再是两个独立的、易管理的区域性国家，而是一个支配亚欧大陆的联盟，这正是美国最初所恐惧的。这就回到了我在这本书前几章中讨论过的主要策略问题上。如果控制亚欧大陆，日本和土耳其的联

盟就不怕受到攻击，两国可以集中力量面对来自美国在太空和海上的挑战。

美国会以在历史上实施过多次的策略作为回应，在经济上向两国施压。两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全球性人口增长放缓使两国举步维艰。美国将来将组织一个新的经济团体，在这个经济团体内的任何国家只要停止向土耳其或日本采购产品，转向第三地（不一定是美国），美国就会给这些国家最惠国待遇。换句话说，美国会微妙地对日本和土耳其产品进行抵制。

另外，美国将开始限制对两国的科技出口。例如，美国在机器人技术和遗传学上的成果会对土耳其和日本的高科技能力造成极大打击。最重要的是，美国会大力对中国、印度、波兰和其他在俄罗斯境内大力抵制土耳其和日本的力量进行军事支援。美国的策略是尽可能多地给两国制造问题，以便阻止两国的联合。

然而，美国在太空的频繁活动是日本和土耳其最大的麻烦。太空堡垒平台的建立，会使两国确信美国对发动必要的侵略性战争是早有准备的。到21世纪40年代末期，根据美国所有的行动，日本和土耳其终于摸清了它的意图，结论就是美国将要攻打它们。两国还得出结论，只有建立一种具有威慑力的联盟才能彼此保护，或者更加确定美国无论如何都打算开战的决心。一个正式的联盟因此建立起来，它的建立将激发贯穿亚洲的穆斯林的活力，使他们重返权力舞台。

伊斯兰狂热势力的复兴因美国与土耳其的对抗而聚积起来，并蔓延到东南亚。这使在联盟条约下的日本有使用印尼海的权力——日本还会长期出现在太平洋群岛。这意味着美国对太平洋的控制和对印度洋的使用权不再稳定。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即使美国将面临来自日本和土耳其的挑战，但这两国永远不可能挑战美国的太空战略力量。

美国人将把日本人和土耳其人逼上绝路，尽管美国现在对此结果感到惶恐不安，但仍对自身处理问题的决断能力感到得意洋洋。美国不会

将这个结果视为一场热战，而是另一场冷战，如同与苏联进行过的冷战一样。这个超级大国相信，没有一个国家胆敢发动真正的战争，向它发起挑战。

注释

［1］对日本的崛起感到最不安的就是太平洋沿岸的另一个大国：美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主要从东南亚和东印度群岛进口原材料。为了确保这些资源供给，日本需要建立大规模军队，尤其是海军力量。在19世纪末才成为海上军事强国的美国则认为，随着日本海上力量的强大，他们迟早有一天会把美国赶出太平洋。实际上，作为一个工业强国和海上军事大国，日本人似乎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而美国在发展海军实力防御日本的同时，也给日本的安全带来了威胁。然而，依赖进口所致的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再加上美国人的不可预测性，注定会驱使日本不断减少对外依赖性和外交风险。

第10章
美国VS日土联盟
一场胜券在握的战争？

随着美国与日本、土耳其矛盾的不断激化，21世纪中叶的某一天，战争终于打响。此次战争也是一场技术革命，特别是以高超音速无人飞船为代表的精准打击彻底终结了全面战争。同步轨道及低轨道太空战略的运用，使得此次战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太空战。纵然日本在月球建立了基地，面对美国无懈可击的太空堡垒，日土联盟的一切攻击都显得徒劳。战争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

最初的战争开始于21世纪中叶，届时美国将对日本和土耳其的联盟施加巨大的压力,但是美国并不打算开战或摧毁日本和土耳其，它只希望搅乱这两个国家的联盟计划。然而，日本和土耳其却不这么认为。两国的人民认为美国正在试图毁灭他们。他们也不希望爆发战争，但是对美国的恐惧感迫使它们联合起来。两国表示会努力就此事和美国交涉，但美国人坚称让两国解除联盟关系的要求合情合理，日本和土耳其人民却把美国的要求视为生死攸关的重大威胁。

我们可想而知这之间的三个重大战略冲突。其一，美国人试图阻止亚欧大陆增强地域性实力，因为他们担心亚欧地域性实力的强大会成为一种新的霸权，而日本需要在亚洲占有一席之地，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其人口结构和原材料问题，这就形成了一大冲突；其二，由于日本的强大，它将控制太平洋西北部，而土耳其也将会成为目前处于极度混乱状态的三大洲的枢纽，这是美国不希望看到的第二个冲突；其三，一旦混乱加剧，美国就不得不努力维持该地区的稳定。所以日本和土耳其的这

些行为将引起美国的担心和焦虑，但日本和土耳其认为，只有这样做它们才能生存。

彼此之间是不会达成和解的，因为美国的每一次让步都将招致它们新的要求，而日本、土耳其每一次的拒绝都令美国更加恐惧。所以，只能选择臣服或开战，而开战似乎是更谨慎的选择。日本和土耳其也不期望摧毁或占领美国，相反，它们只想和美国就利益方面达成共识，希望它能保证日本和土耳其原本的势力范围。在它们看来，这一范围绝不会影响美国的根本利益。

由于日土联盟无法击败美国，所以它们的目的是在冲突爆发初期给予美国一次严重的挫败，这样才能使美国处于暂时的劣势。因此，在美国很可能引起这样一种意识，即战争将会比和解消耗更多，风险更大。土耳其和日本希望美国在经历了繁荣和对墨西哥崛起的不安后，能停止扩大战争，接受一个合理的协商协议。尽管它们知道如果美国不同意达成这样的协议将会有很大的风险，但它们已别无选择。

从这一角度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重演。弱小国家试图使世界的权力达到新的平衡，只好求助于发动一场快速的先发制人的战争。战争将会以突袭和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21世纪中期和20世纪中期的战争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战争主旨一样，但战争实际却截然不同——美国和日本、土耳其的冲突将会标志着新时期战争的到来。

核武器和载人航天引发的战争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欧洲统治时期的结束。在那段时间存在着两种战争模式，它们有时同时发生。一种是全球战争（**global war**），即全世界到处都是战场。另一种是全面战争（**total war**），即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动员起来，以各种形式参战。在“二战”中，一个国家的社会全员都被调动起来，要么踊跃参军，要么为部队提供保障。在20世纪

这样的全球战争中，士兵和平民百姓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不管是全球战争还是全面战争，都演变成了前所未见的大屠杀。

用于发射子弹、炮弹、炸弹的弹道武器出现以后，全面战争的本源也随之被发掘。弹道武器是一种一旦发射就不能改变路线的简单型武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不准确性。士兵投射一枚子弹或发射一颗炸弹时，一面要注意眼手之间的协调，同时还得躲避敌人的袭击。所以，在“二战”中发射体击中目标的几率低得令人吃惊。

既然投射的准确率极低，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投射次数，所以战场上到处都充斥着子弹、炮弹和炸弹。这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武器和士兵。随着士兵的增加，军火和粮食的供给也必须增加，而这也需要很多人生产和运输供给品。在“二战”期间，汽油几乎对于所有的武器系统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开采、精炼、运输石油这个任务所消耗的精力远远超过它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

20世纪的战争是这样的：只有全社会都被动员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投入到战争中，战争才会取得胜利。战争消耗了社会的一切，因为当时只有彻底地摧毁敌人的社会体制，增加敌方的人口伤亡数量，破坏对方的基础设施，使它们再也无力生产武器和补给军队，才能够获得胜利。

但是用一千架轰炸机轰炸一座城市是一项巨大且耗资不菲的任务。试想一下，如果只用一架飞机和一枚简单的原子弹来达到相同效果的话，那么只需花一小部分钱来对付敌人，就可以夺取整个战争的胜利。这就是原子弹的原理，正因为它能快速且高效地摧毁敌国，所以敌人才会不战而降。从科技方面来说，原子弹是一种全新武器。从军事上来说，它是欧洲几个世纪战争的延续。

核武器虽然本质上是残忍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为战争带来了一次技术革命。美国和苏联要想进行核武器战争，必须考虑全局，因为使用核武器唯一安全有效的办法是飞到敌人的领空，在空中投射。载人航天计划则是太空计划中公开的一面，但它最初就是用来探测核导弹

的。间谍宇宙飞船发展成即时系统，它可以在几米内准确地锁定敌军发射台，先发制人，击中目标。正是由于这种需要，才创造了这些武器。

全面战争的终结：美国精确打击时代的到来

这种即时发现目标的能力为许多精确制导武器（Precision-guided munitions）提供了帮助。精确制导武器是20世纪70年代首次研发的，它可以在发射后直击目标。这看似是一次小的技术革命，但影响却十分深远：它使战争形式彻底发生转变。20世纪的一场战争需要千百万台轰炸机和步枪，但在21世纪的战争中，轰炸机和步枪只占战争武器的一小部分，这也是全面战争时代结束的标志。

在以前的战争中，美国的参战人口数目总是处于劣势，而战斗武器数值的改变将给美国带来巨大的优势。20世纪的战场是在欧洲和亚洲这些人口密度高的地区，美国总是远隔战场几千里。人口数目较少的美国人不仅要进行战斗，同时还得为战争进行生产和运输，这样就耗费了大量的人力，限制了直接战斗的军事力量。

因此，美国的战争总是在思考怎样提高每位士兵的作战效率。历史上，它们曾通过运用科技和大量武器来实现过这个目标；“二战”后，重点集中在了技术水平而非武器数量上。如果美国想成为一个全球强国，那它们就需要配给每位士兵先进的武器来最大限度地提升战斗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以少胜多。随着科技的发展，部队的人数就需要精减到最少，留下的就全是训练有素且经验丰富的士兵。探究美国的武器和人口的平行变化规律有着重大的意义。随着老龄化现象和人口紧缩问题的加剧，想要维持军队的大量人数即使可行，也相当困难。

21世纪战争的制胜关键就是精确性。武器的精确度越高，相对发射的数目越少，也就意味着需要的士兵和防卫人员越少，但同时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需求就相对要增加。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会需要这样一

种武器：即使它坐落在美国，也能在1小时内以不可思议的机敏性避过地对空导弹的扫射，绝对精准地到达世界的另一端，而且能立即返回执行下一次任务。如果美国真的能拥有这样的一套系统，它将再也无须派遣坦克到8 000英里以外参加战斗。

这样的武器叫极超音速无人飞船。美国正致力于研究这种速度能超过5倍音速的极超音速系统。与火箭等其他发动机不同的是，这种飞船以超音速冲压喷气发动机为原动力。虽然这种超音速冲压喷气发动机的应用范围很窄，但在21世纪，随着新的耐高温材料的出现，与空气摩擦产生的超高温问题也一定会得以解决，这样超音速冲压喷气发动机的航程和速度都将得到大幅度提升。

试想以每小时8 000英里或10马赫的速度飞行的话，一颗美国东海岸的导弹击中一个欧洲目标的时间将不到1个小时。如果把它的速度提高到20马赫，那么同样的路程将花费不到15分钟。美国地缘政治学也应立即加入到战争中，这样两者结合起来才有足够的力量摧毁敌军。若用足够的极超音速导弹去摧毁潜在的敌人无疑会花费巨资，但考虑现在部队的消费结构，建立这样的导弹体系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建立这样的体系就可以节省用于供给坦克、飞机和舰队燃料的投入，降低石油的需求量。

开展极超音速系统将打破自拿破仑以来的战争模式。与之前相比，21世纪的军队规模将更小、士兵的专业性更强和战争科技含量更高。精确率的提高也将再次使士兵和平民区分开来，人们也不必为了摧毁一座大楼而毁灭整座城市。和“二战”时期的美国步兵相比，21世纪的士兵更像是训练有素的中世纪骑士。当然勇气仍必不可少，但需要的将是管理具有制胜作用的复杂武器系统的勇气。对大部分军队来说，速度、范围、精确度和许多无人飞船将取代20世纪战场上投射的炸药。然而，这些高技术的应用并不能解决战争的核心问题——侵占敌方的领土。虽然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精确的武器会助一臂之力，但攻占领土仍需要

大量的人力，这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活动。在很多方面，这更像是警察的工作而非士兵。因为士兵的任务是杀敌，而警察的任务才是识别违法者并拘捕它。前者需要勇气、武器和有素的训练，后者除了这三个条件外还需要对文化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从守法公民中将违法者辨别出来。这样的工作会很艰难，同时也是任何政权的薄弱环节。正如罗马和英国为了占领巴勒斯坦进行的战争，虽然它们击败了对手，但也和美国一样深受战后余波的困扰。

太空战：未来全球战场制高点

无论战争怎样变化，有一件事是始终不变的：战场上的指挥官必须对战场的情况了如指掌。尽管全球战场和传统战场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指挥官对战场的了解却应该恰如其分。在全球战场上，它所下达的命令必须和敌军正在干什么、我军怎样部署这些问题紧密相关。在实战中，要对战场有充分的了解的唯一途径就是从空中观察，而且理论上也证明空中有很好的视角。这一理论在全球战争中也同样有效。高地的能见度会更高，这里指的高地就是太空——在太空这个侦查平台上可以看见连续的全球战场。

全球战争也因此变成了太空战，但这并非是军事上的彻底转变。太空中本已存在许多用于为全球各国提供信息的侦察卫星，尤其在美国，一些太空探测器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战场，确立了战术目标，并召集了空袭和巡航导弹。虽然武器系统并未取得进展，但侦察平台已经存在并走向成熟。

太空不仅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安全通信工具，它也能对敌对物体进行追踪，所以电脑化的战斗指挥也将从陆地上应用到太空中。在距离地球表面不同的高度建立太空站，即指挥平台，目的在于指挥陆地和海洋的机器人和载人系统怎样躲避敌人的袭击，并执行命令袭击对方平台。

要摧毁敌人的卫星意味着破坏敌人选择攻击目标的太空系统。一旦敌人发动战争的能力被削弱了，那它的导航系统、通信系统和其他太空系统也将一并被摧毁。所以，摧毁敌人的卫星将成为21世纪战争的首要目标。

自然而然，防御自己的卫星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其中最简单的防御方法就是使它摆脱危险的处境，但如何摆脱这种危险处境并非听起来那么简单。首先，得有充足的燃料发射一颗卫星，而卫星往往都很重且把它送入预定轨道的花费相当巨大。其次，改变卫星轨道也不能彻底地起到防御作用，因为反卫星系统也能改变其轨道并发出激光束攻击卫星。最后，太空中都是轨道平台，它们将卫星置于确定的轨道上是为了覆盖必要的地带，为了躲避袭击而改变轨道会大大降低卫星的实用性。

卫星必须被妥当保护，否则会因其他卫星的袭击而偏离原轨道或被袭击者摧毁。在21世纪中期，这一观点将和其他武器系统一起被纳入历史，从而形成卫星战斗群。正如在航空母舰战斗群中，航母被其他舰艇保护着一样，侦察卫星也会被拥有各种能力和责任的辅助卫星保护着，免受激光束的威胁进而袭击其他卫星。太空系统防御战的问题会迅速扩大，因为随着威胁的增加，防御措施也随之增强。

武器最终会发展成为从太空向地面发射的趋势，而实际的发射问题也将更加复杂。因为位于太空中的武器以每小时数千公里的速度移动，同时地球也在自转，从太空向地球表面射击目标是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和太空监视相比，发展速度就会慢得多，但无疑最终还是会实现的。

一颗卫星会花费几十亿美元，卫星战斗群花费的将更多。除非损坏的或发射失败的卫星能再次被利用，否则这些投入的资金就白白浪费了。在太空中利用的太空越广阔，创造出的平台就越有价值，相对的损失也越少。尤其是当太空变成战场后，修复太空平台的任务就显得愈加紧迫了。正是为了维修这种复杂的、被破坏了的系统，人类才必须亲自进入太空。

每次发射卫星到太空去只是为了进行维修，这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而每次从地球发射一颗宇宙飞船进入太空要比转变已有的飞船轨道花费还要高。在太空中安置一个永久的宇宙飞船负责维修的话，将会更加经济合算。当然，这些负责维修的飞船也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所以一定要有自保能力，同时它们能管理并监视太空系统。

如何在太空中有效管理战场？

在太空有效地管理战场并不仅仅局限于修复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卫星，地面和太空的通讯连接也是十分复杂且容易受干扰的。所以，敌人首先会采用最合理的、最经济的方法来切断地球和太空之间的通讯信号。只要用点小伎俩就能干扰太空和地面的通讯，这并非难事。例如，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汽车炸药，它可以破坏地面的传送系统，以此来达到目的。当然，发射设备也可能被袭击。假设美国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和范登堡空军基地这两大主要的发射设施被敌人的导弹袭击并遭受严重破坏，它们就会几个月都停止运作。美国也无法安装更多的装备，而且遇袭时太空中的所有系统都会被对方获取。拥有了这样的系统就意味着掌握了胜负的关键。所以说，在太空中拥有维修团队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么严肃的一本书中探讨太空战这样的主题有点棘手。我们探索得越深入，越觉得太空战像科幻小说，但毫无疑问的是，人们在接下来的世纪中将亲身经历这一切。21世纪，人类势必走上太空战这一条路，这就是科技。

和16世纪的海战一样，太空战也会向外延伸。同步轨道是一个战争策略，所以对于同步轨道的争夺战即将拉开帷幕。轨道之间的争夺战仅仅是战争策略冲突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即是对月球表面的争夺。由于月球没有大气层，所以在它上面建立一个稳定的平台对于观察地球表面和太空中出现的任何一个冲突都是非常有利的。或许武器从月球向地

球袭击需要长达几天的时间，但它却能在几秒钟内检测到正在入侵维修系统的猎潜艇信息。实际上，维持和保护月球上的基地比保护轨道系统更加容易。

因此低轨道太空战、对地同步太空、天平动点（指地球和月球之间的稳定点）和月球表面太空的争夺战即将展开，和之前在地球上进行的战争性质一样，战争的目的是阻止敌人利用太空中的这些空间，从而保证本国军队顺利进驻。无论是否有条约的限制，哪里有人类哪就有战争。由于人类即将进入太空，所以太空战也会随之爆发。

在太空中控制地球上的海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在今天，美国海军就已经开始依靠太空监视系统确保舰队充分发挥作用，所以，组建一支能与美国海军相抗衡的舰队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并且会花费大量资金和时间。一旦掌握了宇宙飞船的技术和工作原理就能掌握一切，但大多数国家已经放弃了这种想法，即使在未来也几乎不可能有人掌握这些技术。因为太空系统能够观察到敌人的舰队并攻击它们，所以在21世纪对海洋巡逻舰队的依靠将远小于太空系统。因此，可以说谁掌握了太空，谁就掌握了海洋。

我们再来看看机器人和太空的关系。当我还在期待着人类在太空操作并指挥太空作战系统时，这个想法遭到了机器人系统的反对。因为人在太空中生存是一项非常复杂且需巨资的项目，并且这项研究已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但对于机器人系统来说却完全不同，像远程控制系统这样的自控系统已经非常普遍，无人宇宙飞船也司空见惯，而太空中机器人做的许多创举也将继续下去。美国国防部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相当卓越的成就，我们将看到，或者说已经见识到了，机器人飞行器维修卫星航天舱和水雷的例子。到21世纪末，机器人步兵很可能会完成加强防御、避免人员伤亡这种简单的任务。

以上提到的这些，都将彻底改变战争的性质，简直就是一次大逆转。这些高精密度技术的产生，意味着我们根本没有全面摧毁对方的必

要。

抹平日土联盟的战争计划

21世纪中期，美国的力量将集中于极超音速无人宇宙飞船和太空导弹的研究上。拥有了这些系统，美国若想对土耳其和日本进行海上封锁的话就不再是难事。它也可以对任何陆地设施进行袭击，还可以对陆军进行攻击。

美国的战争计划会分为三步。第一步，对敌国进行一次宇宙飞船和防空系统（包括太空系统）的突袭；第二步，针对敌军剩余军事力量和经济设施进行系统进攻；最后，安排包括步兵在内的陆地武装，这些步兵拥有惊人的火力、顽强的生命力和灵敏的机动性，同时还会出动一整队机器人。

美国在作战中不仅要依靠卫星系统，更要依靠我所提及的太空堡垒管理平台。太空堡垒将会成为美国用来观察战况的眼睛、听取消息的耳朵和出奇制胜的拳头。这些太空堡垒指挥着大量的卫星及其机载系统，同时也操纵着能在陆地或其他卫星上放射导弹的轨道舱。它们会向陆地上的极超音速无人宇宙飞船发射目标信息，甚至可以在太空中控制这些飞行器。一旦太空堡垒被破坏或隔离，美国整个作战系统的能力就会大大受挫，这样它就只能袭击那些知道确切位置的固定设施。对于移动的装置，再也无法识别。

到21世纪中期，人类在太空执行作战任务的经验将累积数十年。像前20年一样发射几十亿美元的卫星并希望它们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到时导致失败的关键系统也将被修复。今天的航天飞机虽有能力进行这种修复，但当太空变得愈加重要时，就需要永久的太空维修员来进行这些操作。正如我前面谈过的，整个太空计划中最昂贵的就是卫星发射，为了送维修员进入太空而不断地发射卫星显然是资源

浪费。这些在太空中的维修员负责拦截轨道上的功能不良的系统，并负责修缮它们。到21世纪中期，在不同高度建立太空轨道维修站已经近20年了。在这段时间，维修站也应该具有侦察和摧毁敌方卫星的能力了。

太空堡垒应该被设计成永久性的。它将成为容纳几十甚至几百个人同时执行任务和进行维修的一个大平台。它由高级材料建成，伴有各种船体，所以无论是激光还是高能束都无法毁掉它。该平台还伴有敏感元件系统，这样，任何一个从远处向它靠近的具有威胁的物体都会被它的发射体或能量射束击毁。

关于太空堡垒的安全问题更无须担心，想要摧毁太空堡垒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卫星强大到可以在太空堡垒攻击后还能存活下来。太空堡垒本身是有承载成千上万个使命的元件组成的。另外，如果其他国家再建造稍大一些的系统的话，美国陆地上或太空中的探测器都会迅速察觉。太空堡垒能预见任何危险并处理掉可能存在的问题。所以说，美国会率先建立太空作战系统，如果其他国家企图制造相同的系统，就必然会遭到美国的打击。

从美国拥有绝对优势的防御系统来看，日本和土耳其联盟就必须制定出一套能大大降低美国作战能力的战斗计划。在这期间，日土联盟必须在不引起美国有效反击的基础上，全面打击美国的各项利益，并准备制定出一套美国可以接受的协商条约。无论是从海底还是海面侵略，这些方法都不切实际。日本和土耳其即将拥有的核武器也不能达到进攻的目的，因为到那时，核武器这一技术已存在100年之久，无论是制造还是发射方面都不再带有任何神秘色彩了。正如我们现在所见，之前使用的核武器比之后的更具威慑力。所以日本和土耳其还是会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不会自杀似地袭击美国。如果它们真的采用核武器袭击美国，那最多只是破坏一座城市，但美国的反攻却可能让土耳其和日本毁于一旦。权衡利弊，对土耳其和日本来说，它们面临的危险远比美国面临的更大。

抵制美国的关键就变成了掌控太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两个盟国必须要摧毁那些太空堡垒，而这在美国人眼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它们真的做到了，土日两国就有了重绘太平洋、东亚和土耳其周边地区地图的机会，但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发射一颗强大到能够摧毁太空堡垒（而不被它击下来）的射弹是个极大的挑战。它不能从地球发射，因为美国会发现并立即摧毁它。对于日土联盟来说也有一个优势，即太空堡垒不能移动。太空堡垒位于同步轨道上，它负载有足够的推进剂保持自身在其轨道的运行，却没有足够的燃料，因此也就不能实现轨道的转移。一旦它发生移动便会失去它的同步轨道，进而影响它执行任务时所需的稳定性。这也是策划者不愿提及的一点。到21世纪40年代，美国的太空堡垒将成为一个应急措施。创建一个太空轨道站可以为数以百计的宇航员提供帮助，但如果要这个轨道站具备变换位置、移动轨道的能力，则会拖延整个太空作战计划的完成时间。但若实现转移将花费比计划更多的时间。因此策划者们不得不受限于技术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即使不需要移动，它们也会把太空堡垒设计得坚不可摧，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被宣传为永不沉落之船。

走上绝路的日本将会如何反击？

日本会在21世纪30年代思考怎样摧毁一个太空堡垒。2020年后，日本会先于土耳其实施强大的太空计划，因为土耳其此时正在处理其周边事务。两国都会发展环地轨道侦察同步卫星和同步通信系统，所不同的是日本会更看重太空的商业价值，并致力于下一代太空能源的开发。日本非常渴望开发新能源，会投资包括太空系统在内的所有形式的替代能源建设。

另一个研究和发展空间就是月球的表面了。20世纪50年代，好几个国家都在南极洲建立了科研基地，其中以美国和日本的科研站最多。到

2040年为止，日本将在月球上进行大量的实验，并会创建大量的地下研究室。届时，往返于月球将成为平常之事，在月球上工作的不同国家也会彼此合作并不断交流。和地球轨道相比，军队在月球上的工作效率将大大降低，因此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当然，日本会针对潜在的战争找出解决办法，这也得到其他军队的支持。而讨论的问题仅仅是如何摧毁美国的战役中心系统——太空堡垒。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从地面发射一枚导弹去袭击太空堡垒，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失败，日本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和美国开战。

日本也会提出新的局势策略。回想一下1941年，当时日本通过偷袭美国在珍珠港的舰队，削弱了美国在太平洋军事中心的力量。在美国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进行袭击太过危险，而且美国的战船一向被称为不败之船。因此日本军队用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袭击了美国。由于水位太浅，采用水雷战术并不合适，转而采用飞机在航空母舰上起飞这一方法。它们袭击的方向也是大大出乎意料，因为西北方这个位置离日本本国领土太远又不安全，一般人都认为不可行，但这并不是日本在战争中唯一一次使用这样的策略，它贯穿于整个日本的战争策略中。

到21世纪中期，日本将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次它们需要摧毁的是太空堡垒。它们必须从意料之外的方向，用意料不到的方式袭击美国的太空堡垒。就像当年从太平洋西北方突袭（珍珠港）一样，这次它们很有可能从后面进攻，即太空中的月球。它们需要用早已秘密创建在月球上的武器进行袭击，若在需要时再运输到月球那一定会被发现。总之，若说这次战争和之前的战争有何相同之处，那就是无论在进攻方向还是进攻方式上都和之前一样会令人大吃一惊。实际的情况很有可能和我预设的不太一样，但这确实是太空战中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我总是想到潜在的地缘政治学原则。在“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新兴大国想要重新制定全球秩序。21世纪中期的时候，这个地缘政

治周期再次面临着这个问题。“二战”中，日本必须用出其不意的方式击溃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希望以此达到它预期的协议方式。但相对于美国来说，日本长期处于不利的地理方位，它们若想改变这个状况就必须通过袭击美国军事心脏制造一次扭转的机会。而21世纪中期的日本，还是处于相同的位置，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结盟的对象是土耳其而非德国。所以，无论日本的军事细节部分怎样变更，我们还是可以推测出，这两个世纪冲突的动力根源本质是不变的。战争的大体策略亦不会改变。

在本书的前几章，我已经提过：历史和棋类游戏一样，真正可行的棋步远比表面看起来的少得多。你越是好的选手，越能洞察出每一步行动所潜藏的劣势，但这样你可移动的棋步就会越来越少。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则应用到未来的战争中。我已经推测了日本和土耳其是如何变成大国，又是怎样和美国产生摩擦的。参照历史情况，同时权衡其他的可能性，我已尽力想象日本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它会担忧什么以及它对于事态的回应。虽然具体细节还不能确定，但我已在此从地缘政治学、科技及军事方面分析了整个事情的结果。我当然不可能知道战争的细节和战争爆发的具体时间，但我能列出一些原理并阐述战争到底是怎样进行的。

届时日本将拥有多个月球基地，其中一个设计成平民化样式的基地会作军事之用。在那些偷偷挖空的大洞中，日本会研发出许多用月岩制造而成的射弹。相对于一般射弹的体积，月岩射弹要重得多。一些大小类似于小型汽车的射弹会重达几吨。若这些射弹以极速发射的话，其产生的动能将远远超出设想，它能够把碰到的物体击个粉碎。月球没有空气，也就没有摩擦和动力，射弹的形状也很不规则，所以岩石和燃料箱能很容易依附岩石进行发射。

这些用月岩制成的射弹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因为它们足够重，所以其产生的动能能够摧毁任何一个太空堡垒；第二，运用月球相对较低

的旋转速度，那些小体积的射弹可以利用火箭带入指定的轨道。若能达到需要的速度，只要几吨导弹就可以撞击太空堡垒，但它还需要较小的动能来对付防卫性飞弹。

日本还会在月球较远的一侧建立一个秘密基地。这个基地是为了测试从地球上开火但不被敌人发现这个系统而建立的。该系统的特点就是不会引起过分的关注。地下的导弹也会准备充分并做好掩饰。一旦美国的太空堡垒启动运行，日本的抵抗措施也随之奏效。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一颗袭击太空堡垒的导弹都可能会被拦截，所以它们为每个太空堡垒都准备了大量导弹，希望至少有一颗能击中目标，并且它们会在相当宽泛的范围内袭击目标，不会集中于一个方向，这样可以降低被发现的可能性。然而无论科技发展到怎样的高度，还是无法预测出这种战争会耗费多少资金和人员。

导弹从月球发射到太空堡垒大概需要三天，这段时间是极其重要的，而首要的任务就是不被发现。对日本来说这段时间也是最为危险的，因为一旦这些袭击导弹被发现，即使太空堡垒不能自保，它也会用极超音速系统发出命令摧毁来袭导弹，并对日本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对日本来说，制胜的关键是在毫无预示且不被美国发现的情况下毁灭太空堡垒。

于事无补的“B计划”

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日本一定能取得成功。日本还得准备B计划，一旦朝美国开火的火箭成功了，那么也就能保证摧毁太空堡垒。但在发现和摧毁期间，也许会发生许多灾难，但日本始终有一个优势，因为太空堡垒一旦开战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地球和地球同步轨道上，它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进攻而非防守。更重要的是，在那么高的位置不可能进行常规的观察，即使知道有人袭击，也会认为是从下面袭来而非背后。

美国人会建立一个虽不是很有效但却能执行简单命令的人造太空平台。太空虽然广阔，但也许和你想象的不尽相同。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太空到底有多大，甚至到了2050年，我们可能还是不知道它的范围。在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中始终存在着鸿沟。日本掌握了这一点就不会以单一的密集导弹束方式进攻，相反则是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发射。雷达只能扫描到其中一颗或者两颗导弹，因此绝不能把它看成是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事实上，日本会选择不被太空堡垒发现的轨道来发射导弹，而且这些导弹会被装配在火箭的燃料箱或发动机的尾端，这样直到导弹运行的最后几个小时才会爆炸，而这个形状很小很重的岩石所产生的杀伤力远远大于真正的导弹。任何一个电脑侦查系统都会把这样的导弹解读成一个距离很近但毫无杀伤力的陨石。电脑系统甚至不会将它们所侦察到的情况汇报给在太空堡垒上工作的人员，因为电脑毕竟是机器，没有人的敏感性。

对于日本来说存在着三种危险：其一，美国会用日本不知道的高科技侦察出月球表面的发射地；其二，导弹从发射后到最终调整好轨道需要几天的时间，很有可能在这段时间被美国发现；其三，即使是在撞击太空堡垒前的那几个小时，还是有被美国摧毁的可能。总之，美国发现的时间越晚，它用来反应的时间就越短，突袭爆发的力度就会越大。

万一日本的偷袭计划被发现了，那它的B计划会注重加速两方面的袭击：第一，如果它们成功摧毁了太空堡垒，那么就会立即对分布各地的美国的军队基地和导弹基地进行极超音速导弹袭击，届时美国的潜水艇也将受到日军太空系统追踪，并切断它和陆地的一切通信联系；第二，假使日本在摧毁太空堡垒前被发现，它紧接着就会不顾一切地鲁莽行事，希望以此来阻止美国的反击。日本也会通过美国是否突然增加太空堡垒、陆地指挥和其他平台之间的联系这些特点来判断美国是否发现了它们。日本不会破解密码，但会观察情形。出于航海和气象观测的目的，这些年来它已放置了多颗卫星，但还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目的，那就是窃听和截取美国太空系统的海量通讯信息。

建在月球上的基地代表了日本军事的顶尖技术，但日本不会和土耳其分享它的进攻计划及科技。土耳其是盟国而非“亲人”，所以它们只会告诉土耳其它们会在哪天发动战争。日本要发动的是一场无需直接协助的战争，它需要的只是间接帮助。

为了争取一点优势，日本会故意放一点线索给美国情报和侦查部门——为了分散美国的注意力。日本会选择在美国感恩节期间袭击美国，因为那时美国各大政治领袖都纷纷返乡与家人团聚。这既符合军事上出奇制胜的原则，也和日本在较早战争中的实践应用相符合。当年珍珠港事件就发生在一个周日的黎明，当时，舰队都在，但全体工作人员都于周六晚上去参加聚会了。这并不是说战争必须发动于感恩节期间，但一定要在美国的领导力相对薄弱的、出乎人们意料的时间。日本和土耳其会尽力在发动战争的前几天确保局势稳定，同时保证美国的领导力分散，然后在美国陆军防卫能力最薄弱的时候发起进攻。

日本明白攻击美国的最好方式就是先上演一次危机然后迅速解决。日本会利用土耳其和波斯尼亚、匈牙利以及波兰在克罗地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制造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会于10月中旬展开，借口就是克罗地亚在土耳其进行了恐怖袭击，然后土耳其再暗示这次恐怖袭击获得了美国的暗中支持，从而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对美国进行袭击。当然，我们不可能确定这次危机就发生在这个地区，但重点是，兵不厌诈，诈术在整个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41年，日本直到攻击珍珠港的最后一刻都还在和美国谈判协商。越南春季攻势始于春节假期，于1968年停火，这些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说，在引发战争的整个计划中，制造骗局才是关键。

当局势变得紧张后，波兰集团和土耳其都会进入全面警戒的状态。随着美国在塞尔维亚及本土的军事力量和波兰集团的结盟，巴尔干半岛的局势会直接对美国产生影响，而土耳其将部署它的空军导弹系统以保持高度警戒。但情况只有在开始时才这么紧张，随后就会因为各国的撤

军而有所缓和。日土联盟是为了故意引诱波兰发动攻击，因为它们知道波兰和美国的网络是互联的，以此来暗示美国战争即将爆发。根据这些年美国对土耳其的了解及防备，土耳其会在11月的第一周故意把该区的紧张情势拉到顶点，而波兰人则由于接收到的资料，预测到即将爆发战争，因而立即对土耳其基地发起一场小规模的空袭。土耳其就成功地以波兰人擅自发动空袭为由来成全它们的整个计划。美国总统一旦意识到巴尔干半岛即将爆发战争，它会立即召集土耳其和波兰总理并警告它们结束战争。土耳其这个好战的国家由于损失了空军基地，造成了人员伤亡，而不得不退出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

随后一场和平会议会在日内瓦举行。虽说是和平会议，但不会达成任何协议。无论如何大家还是会同意退出战争，避免挑衅行为。而美国会以一个监视者的身份出席——它得保证兑现自己的承诺，不让波兰人或匈牙利人卷入巴尔干战争，而国家安全顾问也会要求美国太空系统注意监视土耳其和波兰集团的军事动态。到11月中旬，情况会稳定下来，一切看起来都重回正轨，但乌干达上空的太空堡垒仍将密切关注巴尔干的情况，日本躲在幕后主导紧张局势，制造冲突；土耳其依然会在后方调动军事力量，波兰亦是如此。大家也都因此忙碌起来。

日本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每个季度都会进行一次军事演习以提升它的极超音速系统和太空作战能力。即使日本真的在感恩节的前几天发起一些类似战争的演习，美国也可能只是常规似地观看罢了，不会给予特别的警告，并且对于日本进入全面备战状态一点都不会感到好奇。事实上，这次的演习，日本表面上会装作人手不足，其实背后躲了一群部队没有参与，避免打草惊蛇。

第11章
第三次世界大战
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

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感恩节那天正式爆发。狡猾的日本人企图重新上演珍珠港事件，并对美国的太空堡垒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美国的同盟国之一波兰遭到了德国和土耳其的围攻。但美国有着超强的工业实力作支撑，雄厚的军事实力及高效的作战指挥，加之占据太空的制空权，瞬间击垮了来自联盟的攻击。幸运的美国人再次赢得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成为战争受益者。

迄今为止，我一直致力于预测地缘政治的发展。为此我一直在探讨有关21世纪发展的主线问题，并思考它会对未来国际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本章中，我将略微改变一下自己的陈述方式，我将会描述一场本人认为将于21世纪中叶爆发的战争。当然，我不确定它发生的具体时间，也不能确切描述战争的细枝末节，我所能做的仅仅是描述这场将发生于21世纪中叶的战争的大致情况。如果你不了解两次世界大战的话可能就无法理解20世纪，同样地，如果缺乏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你也很难真正理解21世纪。

正如我所说的，战争是细节问题，它与我之前谈及的内容大不相同。缺少了那些残酷的细节，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战争的本质。但要真正了解一场战争，也不能满足于仅仅知道战争发生的原因，还需要考虑技术、文化以及其他一些因素，而且要从细节上考虑它们。以“二战”为例，一谈到它，就一定会提及珍珠港事件。由于珍珠港的特殊地理位置，所以偷袭珍珠港对于日本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争取时间的战略，

因为当时日本意在占领东南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想要了解珍珠港事件的真相，你就必须从细节入手——航母的调度使用、浅水鱼雷的发明，以及日本选择在周日早上发动攻击的原因。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解释过，美国、波兰、土耳其和日本之间如何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日本人和土耳其人为什么会深感受到威胁，以至于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率先发动战争来拯救自己。本书讲述了我对未来100年的预想，在此我将要谈一谈这场战争本身。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假设自己博学多识，假设知道战争的具体时间及其具体过程。我确信自己能够准确预测这次战争中将会应用的军事设备，也能够粗略估计出这场战争的爆发时间，并就这场战争战事的推进做出一定的预测。在我继续深入，并对这场战争进一步剖析（我可能没有这个权利）之后，你或许就能明白这场发生于21世纪中叶的战争的本质。如果我能够获得许可，赋予战争一些特定的色彩，虽然我的水平不是很高，但我相信我还是可以带给你一种21世纪战争的感受，尤其是这场特别的战争。虽然不能叙述具体的细节，但是战争进程都大同小异，所以就让我们从某些特定的场景开始吧。

日本人击中了太空堡垒！

摧毁三座“战斗星”太空堡垒的计划，将于2050年11月24日下午5时执行。此时正值感恩节，大部分美国人都在观看足球比赛，或是在大餐之后小憩，又或者正在开车回家的途中。在华盛顿，没有人会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此时成了日本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瞄准太空堡垒的导弹正在进行最后一次轨道校正，这些导弹将于正午左右发射。理论上来讲，即使这些导弹在下午3点或4点被探测到，美军也来不及进行回击，因为华盛顿安全小组在1～2个小时后才能用完餐。为了成功实施这项计划，日本在月球的基地将会在11月21日24小时待命，以便随时能够发射导弹，发射时间根据轨道情况而定。因此，在11月20日日本将会

启用B计划——就如前文所述，这只是个猜测而已。

这些从月球发射的导弹无人察觉。而实际上，许多导弹将会被太空堡垒上的自动防御系统拦截。但是这些拦截不会影响基地，或是对地球造成严重威胁。它们在不同时段发射到离心轨道上，数据并不会传送到地面监控人员的手中。技术员第二天翻阅每日记录，会注意到该地区出现了大量流星，有些甚至就在他们基地附近，但是因为这些不是什么特别的现象，所以他可能就不太在意。

11月24日中午时分，这些火箭将会按计划再次点火，并改变轨道。在太空堡垒—乌干达基地上，用以监测控制轨道的雷达会在午后2点左右发出一通警告，并且电脑会被设置重新测定轨迹。不到1小时，这三个军事基地都将探测到空中正有多枚导弹正一起对它们发动攻击。地面军事基地的总指挥部，即太空堡垒—秘鲁基地，将会在三点一刻左右确认它所在的军事基地正遭受有组织地攻击。而后，它将通知位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太空指挥司令部。随后，司令部将会把情况上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与此同时，太空堡垒—秘鲁基地的指挥官会以个人名义发布命令：用激光击毁那些导弹，希望能够通过此种方法实现拦截，但由于系统不能对付同时来袭的15枚导弹，随之不断来袭的导弹数量大大超出它的防御能力，于是指挥官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防御系统存在的漏洞，更致命的是，一些导弹将会击中基地。

总统也将获悉此事，但由于当天是感恩节，所以他不可能立即召集到大多数顾问进行磋商。总统将对以下两个问题表示强烈关注：谁发动了这场攻击？导弹是从哪里发射的？但是没有人能够立刻给出答案，有人会假设这是土耳其干的，因为土耳其人已经卷入了近期的几次恐怖袭击事件之中。但是美国情报机构将会立即否定这一假设，因为他们确定土耳其没有发动这种进攻规模的能力。日本将会沉默，没有人会预料到它们有发动这种攻击的能力。尽管更多的顾问被召集到白宫，但这两个

问题仍没有答案。

日本人将会于4点30分左右将事件告知其盟友土耳其，可是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日本人不会把全部细节一一告知，因为它们不想被土耳其人出卖。但是，土耳其人还是会感知到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日本“拙劣”的伪装终将会在这场11月进行的攻击中被识破。但在日本就此事给予指示之前，土耳其人将会袖手旁观。

距导弹击中基地不到30分钟的时候，总统授权批准太空堡垒的转移计划。但是由于时间有限，所以转移工作不可能全面执行，成百上千的人会被留下来。更荒谬的是，尽管没有人知道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总统顾问将会说服总统下达一个疏散基地中所有极超音速飞机到各个分散基地的命令。该命令将会与人员疏散的命令同时发布。此时，系统也将出现许多小故障，基地控管人员将会不停地要求信息确认。一部分飞机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得到疏散，但是大部分的飞机都来不及撤离。

下午5时，三个太空堡垒基地将会发生爆炸，导致数百名工作人员伤亡，也切断了美国太空的连接，因为传感器和人造卫星均与太空堡垒—秘鲁基地指挥中心相连接。它们将会如往常一样在太空中继续绕轨道旋转，但是却无任何实质性作用。而那时日本早在几年前就发射了一枚用来监测太空堡垒的人造卫星，这些卫星能够监测从军事基地传输来的信息，并且最终记录太空堡垒被摧毁的全过程。

一旦确认基地被毁，日本人将会实施第二步计划。他们将发射大量的无人驾驶的极超音速飞机，它们小巧、敏捷、灵活，可以轻松躲避来自美国本土或是太平洋船只与军事基地的拦截。它们袭击的目标是美国的极超音速飞机、地对空反飞行器导弹以及指挥和控制中心。日本人不会袭击人口稠密的中心区，因为那么做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日本还期望同美国达成协议，所以会尽量避免平民伤亡，日本也不会伤害美国总统和政府官员，它还需要同他们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土耳其人也将主动对目标发动攻击，届时他们早已在这场与日本人联合策划的战争中有了自己的任务。随着联合计划的实施，两个国家已经对那些有可能出现的附带情况进行了预测。前文提到，土耳其人已经意识到一些事情正在发生，并且他们已经处在备战状态中了，不过不需要为了执行计划而做大量的准备。日本人将会告知他们自己已经做了什么，土耳其会为日本保密，同时日本也将会快速行动以抢占先机。虽然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有许多目标，但是土耳其将会对波兰集团和印度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但它不是单独行动，而是要和其他国家联手。该联盟的目的是让美国及其盟国在军事上孤立无援。

几分钟内，从无人驾驶的飞机中抛出的导弹就将开始攻击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武装力量，但是这些飞机要1个小时才能抵达它们的目的地。这短短的1个小时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此时，美国大部分的太空基地传感器都失去了作用，除了一个由于太过陈旧而不能连接上太空堡垒系统的传感器。这台传感器过去被用来探测洲际导弹的发射情况，现在唯有它能下载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系统，获悉日本和土耳其的大批武装编制，但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信息了。它绝对查不出来这些飞机与导弹会飞往何处。但是在太空堡垒被毁之后，总统先生会看到这两国立即采取的发射行动的实况转播，所以现在，它至少知道这些攻击来自何处了。

美国将会列出一些在日本和土耳其的军事目标，但日本和土耳其的飞机已经被派遣外出执行任务了，所以攻击那些目标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在这两个国家，有些目标是一定要进攻的，比如总控制中心、飞机场、燃料库以及一些主干道。美国将会实施调整后的作战计划。然而，等到命令下达，指挥官就位时，距离日本和土耳其发动攻击的时间已经不到15分钟了。虽然许多战斗机将会按计划起飞并且袭击这两个国家，但是更多的空军力量将会在地面遭到破坏。

波兰集团将会损失惨重。华沙的议会控制中心对太空堡垒已被毁一

无所知，所以还不知道美国正面临导弹袭击基地的危险。事实上，极超音速飞机将会对毫无准备的议会机构空投附加遥控导航装置的炸弹。一刻钟之前一切一如往常，而一刻钟之后波兰议会将变得毫无反击之力。

到下午7点，美国的基地和极超音速空军力量将会被彻底摧毁，美国将会失去对基地的控制和仅有的数百架飞机。它在欧洲的盟友将会动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对付美国在世界各海域的军舰。与此同时，印度也将丧失攻击力，此刻，美国及其伙伴将会在军事上遭受沉重的打击。

末日回击：美军击毁日土联盟

然而，此时的美国社会将不会受到影响，它的许多盟国也是如此。但这些非军事目标将成为联盟的一个致命弱点。和美国一样，日本、土耳其、波兰和印度也都是核武器大国，因此对军事目标的进攻不会引起核战争。然而，如果这几个联盟企图超出军事目标，试图攻击美国人口稠密的地区来要挟美国投降的话，那么将会激怒美国及其盟友，令它们跨过禁忌使用核武器。联盟并不想看到两败俱伤的结果，只是想要与美国签署一些于己有利的协议而已。但美国的行动经常深不可测，或许日土联盟会使用极超音速机队来给敌人一点教训，如果这样的话，美国民众的伤亡人数将会是难以估计的。但因为核武器的存在，战事的发展会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武力冲突不至于毫无节制地扩散蔓延。

然而，美国在军事上会受到重创，对于敌方联盟还会走多远、采取什么行动它无从知晓。日土联盟本指望，美国会认清自己的损失程度及其影响，加上日土联盟神出鬼没，美国就会选择政治解决，接受日土两国实力增强的事实，明确限制自己的权限，并制定一个切实可行且可被证实的准则来限制太空冲突的再次发生。换言之，日土联盟笃定，美国会认识到自己现在只不过是几大列强之一，而非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接受一个巨大且安全的势力范围。除此之外，联盟期望这次迅速有效的

空袭能够让美国高估联盟的军事实力。

事实上，美国的确高估了联盟的军事实力，但这却使它作出了与联盟期待相反地决定。美国不会认为自己正被卷入一场仅有几个敌人的小规模战争中。相反地，美国人会认为联盟的力量将会比表面上大得多。美国正面临选择，要么被歼灭，要么大量消耗武装力量，这就使它有可能在下次联盟或其他组织发动的进攻中毫无反击之力。

美国会疯狂地进行反击。如果它接受11月24日晚递交给它的协议，那么国家的长远未来将会生死未卜。不太可能发生内斗的土耳其和日本将会联合起来统治亚欧大陆。世界将会出现两大霸权，而不仅仅是一个。但如果它们合作，亚欧大陆将会被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美国大战略的梦魇最终将会变成现实，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这对伙伴由于不能够在战争中相互牵制，将会发动战争来争夺太空和海洋的控制权。接受联盟的条件意味着马上就能够结束这场战争，但将会造成美国经济长期衰退的局面。但是在那样一个夜晚，美国人是不会考虑到这些的。在缅因州沦陷、珍珠港被袭、“9·11”的举国悲痛之后，美国人将会勃然大怒，进而拒绝签署协议并很快进入战争状态。

美国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同时联盟的侦查航天器也将就位。联盟没有任何能够与美军已被毁掉的精密太空堡垒相媲美的东西，它只有一个最旧款的卫星来提供美方的最新消息。由于此类卫星是专业的军事配置，所以联盟军能够观测到美军的行动，以便及时采取回击。美军的侦查系统将会被迅速修复，所以美国多个幸存卫星可以重新向地面传输资料，当然，已被摧毁的太空堡垒除外。一旦卫星重新启用，美军就可以探测到敌人的行动，并予以反击。美国一旦成功，它首先将摧毁联盟军可能拥有的太空发射设备，以防止联盟再次启用新的太空系统。

日本掌握的关于美军财力状况的信息虽然不完整，但却十分有用。美军将会仔细考虑每一个能够建造火箭发射基地的秘密地点，并且严密地对基地进行伪装。这将是21世纪30年代主要的黑色计划之一。当日本

开始监视美国的时候，基地早已被建好，并已被隐藏好一段时间了。和平时期的秘密发射装置是不载人的，但现在是战争时期。将人员秘密送至基地将会花费几天的时间，在这期间，美国将会通过暂时中立的德国来递交一份外交协议与联盟军进行谈判以尽量拖延时间。这次谈判仅仅是逐步实施最终的反击计划的一种掩护罢了。

美国甚至会利用它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小型基地。为了完成计划，美国瞒过联盟的眼睛，秘密建设自己的太空基地系统。美国到那时已经储备了成百上千个反卫星导弹和高能激光作为秘密武器。工作人员们也将小心翼翼地进出基地以避免被侦察卫星探测到。与此同时，联盟将会专注于与美国的谈判之中，而此时美军的基地也早已完成。大约72小时以后，美军将在不到2小时的时间里摧毁联盟军的大量监测力量。这将极大地削弱联盟军的战斗力。

卫星一旦被毁，美军的那些幸存的极超音速飞机将会开始攻击日本和土耳其的发射设备，企图使敌人丧失发射新卫星或攻击美军幸存卫星的能力。与日本人不同，第二次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拥有大量的监测力量，因而会对那些伪装的较好的发射基地了如指掌。美军的战斗机将会击毁全部基地。此后不久，美军的卫星控制器将会搜寻美军那些幸存的卫星的信号。此刻敌军将会被彻底摧毁。日本缺乏对于美国的黑色计划中的反卫星能力的了解，这也是美军成功反击的保证。

革新的战备，不变的战术

联盟意识到自己的既定计划失败了，但还不确定美国到底了解多少。其实，美国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计划被严重扰乱时，它们才会意识到原来认为美军航空机队均被歼灭的想法是错误的，并且马上会知道美军仍有回击自己的实力，但它们不知道这些残余的军事力量其实就是在监测对太空堡垒的攻击和联盟进行空袭期间疏散的那些力量，它们更不

知道美军的反击力量有多大，也无从得知。21世纪战争的迷雾一如既往的厚重。

美军将会采取下一步行动。工程师们正在通过分析数据来寻找发射攻击太空堡垒的导弹的具体位置，然后美军将会在基地对其发射一枚装有核弹头的导弹。无论日本是否把这定义为一场核攻击，日本的基地都将会被摧毁。美国会命令军队在月球上建立自己的实验基地，做好准备并最终摧毁日本在月球的基地。美国不想再受意外奇袭了。

就如战争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旦某个蓄谋多年的计划被执行并挑起了战事，那么每个国家都想随后加入其中，尽管它们也不能确定这样一定会得到好处。然而大部分的战争计划都预计战争不会持续太久。情况的确如此，这场战争将会分三个阶段进行。

> 第一阶段：恢复部分的太空控制权。美国将会在太空进行一项破坏计划来增强自身的太空掌控权并且让联盟失去该项能力。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美国将逐渐增强自己的监控能力直到它恢复到战前准备阶段的要求。战争时期的研究速度比和平时期要快得多。在第二年感恩节之前，美国将会拥有比已被摧毁的太空基地系统更先进的技术。
>
> 第二阶段：美国将继续恢复极超音速机队的战斗力。尽管那些已暴露的飞机生产设备会被联盟军的飞机轰炸，但它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美军进行监测。所以尽管有些困难，但工厂还是能够很快恢复生产，生产出新型的极超音速飞机。
>
> 第三阶段：联盟在美军还没有完全恢复实力之前将采取行动来改变现状。日本企图占领中国和亚洲的其他一些区域，但这却远不及土耳其的嚣张跋扈。土耳其利用美军反击之前的这段时间以这一区域的主导力量自居，高姿态处理与波兰的战事情况。

战争初期对波兰集团的攻击还只是一个骗局，但现在土耳其已经把这变成了现实，土耳其在地面向波兰集团发动全面进攻，同时空中力量给予支持。铲除波兰集团会使土耳其腾出兵力在其他地方组织行动。然而，比起在北非和俄罗斯损耗力量，土耳其更热衷于将赌注放在进攻北部——由波斯尼亚外围到巴尔干半岛。

土耳其的目的是将波兰集团引入到一场歼灭战中。不像与美国的战斗，这次的战斗将会有组织地运用多种武装力量，其中包括装甲步兵、机器人物流和武器平台，并且给目前大量存在的极超音速飞机配置精密炮弹。

毁灭性的战争开始之后，波兰人不会将地面的武装力量聚集到一处，这是为了防止土耳其军队的空袭，而土耳其将想方设法迫使对方集中军力。当波兰人拒绝用这种错误的方法来防御时，土耳其军队就会采用特殊的进攻方式来迫使波兰军队集中兵力进攻主要目标或选择性地将分散军队。

土耳其将会从波斯尼亚的背面发动攻击，而后直驱克罗地亚平原，进入地势平坦且没有任何自然屏障的匈牙利，随后它将会进军布达佩斯。尽管土耳其的最终军事目标是在斯洛伐克、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喀尔巴阡山脉，但如果它掌控了喀尔巴阡山脉，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将会被孤立并且轻而易举地被攻破，而黑海最终就会变成土耳其的一个湖。一旦匈牙利被占领，孤立无援的波兰就将面对来自南部的威胁。然而，如果波兰人决定集中武力攻击匈牙利平原以此来保卫布达佩斯，那么土耳其的空中战队将会彻底击毁集团的武装力量。波兰人需要美国的空中支持对抗正在克罗地亚嚣张跋扈的土耳其军队，但美军已经没有多余的空中力量来支持波兰了。不出意外，土耳其人仅用几周就占领了匈牙利，此后不久又占领了喀尔巴阡山脉。被孤立的罗马尼亚将会主动请求休战。欧洲东南部、波兰的边境和乌克兰都将被土耳其控制，而这些又是波兰对抗土耳其的天然屏障。

随着空军逐步击溃波兰军队，土耳其军队将会向克拉科夫地方后退。美国不会帮助波兰，它要让波兰毫无反击之力主动请求和平谈判，因为这样它就能够争取一些时间来重整旗鼓继而对土耳其和日本发动一场突袭。因此美国不想分散力量来支持它在波兰南部的伙伴。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想冒险失去波兰这个伙伴，因为这会过早结束这场对土耳其的报复之战。为了让波兰再坚持一段时间，美国将不得不正式对土耳其发动多次进攻。

2051年2月，美国将会动用它现有的包括具有超凡攻击能力的新型飞机空军机队的大部分力量，来攻击土耳其各处的军事力量，以及其在波兰南部到波斯尼亚，甚至更南端的地方指挥中心。由于土耳其空军的反击，美国将会遭受惨重的损失，但土耳其的损失更惨烈，它将牺牲成百上千名装甲步兵，遭受机器人系统被毁以及补给大量缺失的损失。土耳其虽然不会因此瘫痪，但也会元气大伤。

土耳其人很快意识到自己没有赢得战争的机会，而且也无法重新掌控局面。并且，美国此时已有了快速制造飞机的能力，最终土耳其将被击败。与此同时，它也意识到日本不会伸出援手，因为此时日本正在为自己在中国的局面发愁。土耳其输了这盘赌局，而且败得一塌糊涂。美国将会把土耳其列为位于日本之前的攻击目标，所以土耳其军队必须迅速占领波兰。但是当时，土耳其的地面军事力量已经分散到各地，而集中对付波兰意味着要从其他地方抽调兵力，从长远来看这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土耳其人将遭到埃及和中亚的反击。

德国会再次进攻波兰？

战争开始之前，联盟会期望德国加入到攻击波兰的战斗中来，但德国人当时并不想参与其中。当土耳其人与其他同盟探讨时，联盟将开出一个相当诱人的条件作为帮助土耳其人攻击波兰的回报，那就是战后土

耳其军撤至巴尔干半岛，只保留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土耳其将会围绕黑海、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来建立它的力量，德国可以在匈牙利及其北部，包括波兰、波罗的海诸国以及白俄罗斯采取自由行动。

从德国方面来看，这在2050年前还仅仅只是土耳其的一个幻想，但现在已经变成十分现实的建议了。土耳其将会成为地中海和黑海附近的最大霸主，但它需要巴尔干半岛诸国来确保它已经占领的土地，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土耳其对这些地方没有兴趣，因为占领这些地方还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就如波兰和俄罗斯一样，德国人将会参与这次在北欧平原发生的战争之中，并且这个决定将会保证他们本国的边境安全。最主要的是，这个安排将会扭转自俄罗斯第二次解体之后对德国和西欧构成的不利形势。如果成功了，东欧国家将不得不退回本土。

德国人知道美国人最终会再次盯住这块地方，但现在离美国卷土重来还有一段时间，所以自己还有占领的机会。但生来就缺乏冒险精神的德国人不会像土耳其人那样大胆冒进。不过另一种可能是，土耳其会向德国东部施压，或者更糟糕的是，如果土耳其溃败，德国将不得不面对波兰和美国这两股更加强大的力量。按常理来说，德国人不愿意冒这种风险，但此刻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不得不动员所有军队，甚至那些虽仍有战斗力但平均年龄偏大的军队，在2051年春天从西面进攻波兰。同时，土耳其人将会从南面再次发动攻击。德国将会向法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请求援助，但这些国家更多地在政治方面而不是军事方面帮助它。

与这些国家不同，英国将会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故震惊不已。尽管世界权力格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英国人只是密切关注欧洲本土的权利平衡问题。此时，他们将再次面对德国成为欧洲霸主的局面。虽然德国担当霸主有些勉强，但由于有土耳其在背后撑腰，所以霸主地位也将牢不可破。英国人意识到如果放任这样的状况，或者一再退却，那么将会导致自己孤立无缘，而这对于整个欧洲和美国而言，将意

味着惨败。虽然英国没有参战的想法，但从这点来考虑，它也别无选择。英国将会派出一些精悍的战斗机。当这些战斗机与美军联合时就能严重破坏德国和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另外，它先进的防御系统将会确保英国本土免遭土耳其和德国的空袭，这也是它安全操作的基础。表面上看，英国人似乎是按兵不动，但事实上英国正在秘密将空中力量输送到防御能力高、报警设施更好的美国机队，重新部署军事力量。

最终，波兰将会受到来自西面和南面的双重攻击，并且这股攻击力量会像以前的侵略者一样慢慢推移，但在技术方面却与之前的战争大相径庭。它不是拿破仑麾下不计其数的步兵，也不是希特勒的装甲编队，事实上，将要发动的攻击将会以小股军事力量的形式来进行。这些力量包括装甲步兵，他们通常被分散成小股兵力，但有清晰并且相互叠加的交火地带——这些地方现在已经扩至几十公里。他们通过网络相互联结，不仅能够控制装备，而且可以遵从自己的意愿控制机器人系统和几千米以外的极超音速飞机。

自动系统基于数据和电力运作，两者缺一不可。它需要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和指令，同样，它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电源来保证正常的工作。自从土耳其的太空基地系统被毁，土耳其将会在战场及其周围使用无人航空飞行器来代替先前使用的飞行器来收集情报。当然，这些信息也不够全面，因为这些无人驾驶的飞行器会不断地被美军击落。美军虽然有完善的信息，但是也无法大规模地剿灭进攻者。

怎样为步兵的装甲服和机器人提供足够的电力将会成为一个难题。这些装甲服是由电力驱动的，所以需要充电或者每天更换巨大的电池。储藏电力资源可以暂时解决问题，但电池总会被耗尽。因此，与发电厂相连的蓄电池将会成为另一种重要的能源。一旦摧毁发电厂，这些侵略者就必须从任何一个战场附近的有电的地方为这些电池充电，之后再靠这些巨大的电池来行驶。军队行进得越远，军需线将会拉得越长。如果这些防守者准备让敌方的电网瘫痪，必要的时候也会摧毁对方的发电

厂，那么进攻将会由于缺乏电力而被迫放慢脚步。所有东西都依赖于电力的传输。

美国、英国、中国以及波兰的领导人将会举行一次秘密会谈，会议上，他们将制定一个战略：波兰人继续抵抗，但迫于联盟的压力又不得不慢慢接受退让。两大地缘进攻势力分别从西面和南面夹击，在华沙汇合。最终将达成协议，波兰抵抗，退让，重组，然后陷入无休止的讨论之中，这样就为它的伙伴争取了尽可能多的时间来重建空中力量。这时几千名美军将从北极到圣彼得堡突降支援波兰人，并在这次慢半拍的行动中调动部署波兰军队。

到2051年年底，国际形势将变得更加严峻，英国剩下的可用空军力量将被派遣去阻止土耳其的进攻。强大的美国将会不断地推出新的工业成果，生产出更多更加先进的极超音速飞机，其飞行速度将是之前飞机的两倍，但其相对体积也随之翻了一倍。到2052年中期，美国将有能力发动一场大规模毁灭性的进攻，一旦与进步飞速的太空基地系统相互配合，美军就可以消灭联盟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军事力量。到那时，美军就掌握了主控权。

联盟如何摧毁美国的电力系统？

联盟大大低估了美国的工业实力。它们认为仅需要几年时间就能攻下波兰。一方面，由于需要电力来维持战斗，并且不想战后重修电力系统，因此联盟不会选择首先攻击波兰的电力系统；另一方面，波兰人在撤退时将会破坏它们的蓄电池电极板，想以此来阻挠联盟军的进攻，并迫使德国和土耳其向战场运送储备电力资源。在2052年的夏天美国反击开始的时候，这条供给线将是最容易被袭击的。

当美国的装甲步兵带着先进的太空基地系统抵达战场时，联盟才会意识到波兰不会这么快被打败。联盟明白发电厂是美军的基础，除非电

厂被毁，以增加美军从自己国家运输储备电力到战场的数量，否则美国注定是赢家。因此，2051年夏天，联盟将会开始破坏波兰的电力系统和发电厂，并向北延伸直至白俄罗斯，而波兰将自此走向黑暗。

联盟将花费两周时间来迫使美国及其伙伴卷入一系列的战斗来耗尽它们的储备电力，同时在前线发动攻击，以此来耗尽美国的电力和好运。然而事与愿违，它们遭遇美军的激烈反击，并且美军还动用空中力量来彻底摧毁联盟军的防线。美军及其伙伴将会派遣机队加入战斗，并运用与太空基地防御系统相媲美的超尖端的、更精锐的太空堡垒控制系统，瞄准并击毁德国和土耳其的装甲步兵。

差点于1941年丧失全部海军的美国将不会把兵力集中于一处，尤其是太空基地系统。在战争开始之前，美国将会建立另一个太空堡垒基地（最新一代的系统），但是由于资金问题，这个基地还不能正常运转。国会对此并不知情，因为尽管建于地面，但基地仍是个秘密。就在出其不意地攻击并毁坏日本在月球的基地之后的几个月里，它将会被发射到太空。在战争开始之后，那些临时装备结构将会被乌干达附近的一个新一代的太空堡垒中心取代，它能够按照需求，快速调遣到赤道附近的新地方，也可以进行战略性的调遣来避免先前三个基地所遭遇的毁灭性攻击。美国将会重建它的太空基地。从某种程度来说，该基地将会超越几年前的太空基地系统。

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将会被一件事情震慑住，在毁坏波兰人的电力系统和电力补给之后，他们期望波兰的反击会急剧减弱，因为他们自己的军队也已经精疲力竭了，然而波兰和美国的装甲步兵也好不了多少。美国似乎不可能运载足够的电池来供应军队。问题随之而来，怎样才能得到电力？

日本不是唯一一个考虑利用太空商业价值的国家。在20世纪前50年，美国财团也投入大量资金来研发在未来使用的低成本多样化发射器，同时着手在太空建设发电厂，以微波形式向地面输送能源，并将其

转化成为可用电能。当美国从对抗波兰的漫长的战争中摆脱出来时，它会明白电力将是问题的关键。当土耳其人仅仅花费几周时间就横行于欧洲东南部时，美国人意识到要击败对方就必须保证自己及联军有足够的电力供给。同时，还要破坏对方的电力供应。制胜的关键在于确保波兰有足够的电力供应。

这种核心技术将会得到发展和改进。太空发射器能够被迅速制造，太阳能电池板和微波光束系统也一样。真正的挑战将会是热能接收器的建造和投入使用，于是，美国无限制的预算和无约束的野心再次创造了奇迹。避开联盟的视线，新的太空堡垒基地将专注于两个目标：一是设计作战计划，另一个是管理建设和操作庞大的太阳电池板的配置和微波辐射系统。届时，可移动的热接收器会被带到战场上。

当开关被按下时，在波兰战场前线的成千上万的热接收器将会开始接收来自太空的微波辐射，并将其转换成电力。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就好像手机替代陆地通信线路一样。整个电力结构将会被改变。这在将来将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从今以后面对土耳其的反击，波兰将摆脱劣势。对土耳其人来说，敌人莫名其妙的就拥有了比自己预期的更多的电力资源。

联盟无法破坏发电系统，也不能定位微波接收站的位置。因为太阳能电池板分布广泛，数量也很多，并且它们还在不断地四处移动。即使它们被毁，还会有其他的系统以比摧毁前（假使联盟有这个能力）更快的速度来取而代之。

联盟也没办法按常规方式来摧毁波兰和美国的军队。因为它们先前失去了卫星，监测系统存在很多漏洞，因此这些防御者可以侥幸存活下来。联盟的空中力量日渐衰微，相比之下，美军及其伙伴的空中力量虽然规模较小，但拥有强大、完善的信息，因而也就更加高效。

幸运的美国人，永远的战争受益者

地面战争将会陷入僵局，美国将于2052年10月最终动用大规模的新型空中力量。与太空堡垒的情报和武器联手，美军的空军力量也将用同样的办法对付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另外，它们还将瞄准日本的水上舰艇。

美国的反击将会重创日本和土耳其，届时德国也将举步维艰。联盟的地面武装力量将会如蒸发般消失殆尽。然而，美国也面临着核问题的威胁。如果联盟的军事力量被逼到认为自己国家的主权和生存问题面临挑战时，它们有可能会考虑使用核武器。

美国不需要无条件的投降，但它却会接受对方的无条件投降。美国不会威胁这些国家的生存问题，它也没打算这么做。美国从过去50年的历史中吸取到这样的教训：无论怎样，彻底地毁灭敌人都不是最好的战略。美国的目的是维持各种力量间的平衡，使这些力量专注于彼此，而让美国置身事外。

美国不会毁掉日本。相反地，它将会保持中日韩三国的对峙状态，通过相互制约来达到权力的平衡。美国也不会毁灭土耳其，而会在伊斯兰世界制造混乱，用这种方法来保证波兰集团和土耳其的权力平衡。波兰集团将会痛斥土耳其，并要求其对牺牲的波兰人民负责；中国和韩国也将对日本提出同样的要求。美国对法国的战略稍有不同，美国将会在凡尔赛安置一位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式的人物。美国虽然以人道主义为名做这些事情，但最终的目的却是让亚欧大陆处于混乱状态。

在快速组织的和平大会上，土耳其将会被迫从巴尔干半岛向南撤军，退到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这块缓冲之地，但不会进入高加索山脉。在中亚，土耳其将不得不接受中国有关边境的提议。日本也不得不从中国境内撤军。美国将会把防御技术转让给中国，但是这些技术中那些原本精确的术语将会被美国用含糊不清的词语代替。这就是美国的目的。与此同时，许多新国家也将应时而生。许多领土的边境界限也将变得不

明确。战胜方不会得到很多好处，战败方也不会损失很多。这是美国迈向全球文明的第一步。

在此期间，美国将会完全掌控太空，并以获得经济上的繁荣来平衡用在防御系统上的花销，一个崭新的、先进的发电系统将会改变人类接收电力的方式。

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夺走了5 000万人的性命。100年后的今天，第一次太空大战将会夺去50万人的性命，其中大部分是在土耳其对德国的地面战中丧生的，另一些则牺牲在与中国交战的战场上。美国失去了几千人，一些是在太空中，一些是在刚刚开始的对美空袭中，还有一些是在支援波兰的战斗中。从字义上来看，这是一场“世界大战”，但是从技术的准确度和速度方面的先进来说，这又不是一场全面的战争，只是一种社会体系想要吞并另一种社会体系。事实上，到最后真正丧失主权的只有欧洲东南部的那些小国家。

然而，这次战争与“二战”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到最后只有美国损失最少，而获益最多。就如在“二战”中，美国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复苏，同时在世界上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因此，美国将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在处理权力问题时更加游刃有余。

第12章
鼎盛时期的美国
21世纪60年代的黄金十年

世界大战后相继缔结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不仅确保了美国在太空的主导权，同时更进一步打压了土耳其和日本的实力。在美国的支持下，波兰重创了德国和法国。欧亚大陆重新回到势力均衡的状态。大权在握的美国开展了能源革命，并在文化上再次引领世界潮流，世界再次以美国为中心。

战争的结果将会巩固美国作为国际主导大国的地位，强化北美作为国际体系核心的重要性。这有利于美国加强对空控制，进而掌控国际海岸线,同时它也将开创一种新的关系模式——一种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都要依赖的关系模式。

战争最重要的结果是缔结条约，正式授予美国独享太空军事使用权的特权。其他大国可以在美国的督导下，不含军事意图地利用太空资源。这不过是以条约形式认可军事行动。为了不让大权旁落，美国就需要在太空领域打败日本和土耳其。因此条约将会限制这两国拥有的极超音速飞机的数量和种类。由于这一限制是一个不光彩的胜利者强加给另一方的，它不能强制执行，但是只要美国大权在握，条约就要继续生效，保障美国利益。

战后的波兰：逃脱束缚还是继续做棋子？

尽管波兰的损失是所有参战国中最为惨重的，但是它也将成为大赢

家，大规模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和韩国因为摆脱了日本的影响，也将会皆大欢喜。日本的人员伤亡虽少，但它失去了帝国地位，分崩离析，可是它会继续存在。同时它也将为战争付出代价，仍将面临人口问题。土耳其继续保持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统治一个战败后动荡不安的帝国。

波兰虽为战胜国，但是却饱受煎熬：领土直接遭受德国和土耳其的骚扰，后被美国同盟所占领。陆战负伤的民众不计其数——在巷战中步兵要比民众安全一些。波兰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经济也随之受到影响。尽管波兰能够发掘战利品，使区域经济指标朝有利的方向发展，进而迅速恢复经济，但它的胜利依然只是表面的光鲜。

至于西部，波兰的宿敌德国的势力会日渐衰微。土耳其虽受到一时的打击，但是其对几百英里以南的巴尔干半岛和俄罗斯南部的影响力依旧不容小觑。波兰会占领里耶卡港口，并保留其在希腊西部的基地以阻止土耳其觊觎亚得里亚地区。但是根据欧洲人以往的记忆，土耳其人还会继续盘踞在那里。最痛心疾首的莫过于波兰，它也是被禁止太空军事化的国家之一。在这一点上美国对谁都不破例。实际上，战后美国最担心的就是波兰。波兰将重建其在17世纪的帝国，甚至更加强大。

波兰将为其前联盟创建一个联邦体系，直接统治白俄罗斯。它的经济在战后虽然深受重创，但它有足够的地域和时间来进行恢复。

成为波兰手下败将的法国和德国将会把其权力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东方。从某种意义上讲，从1945年开始黯然失色的大西洋沿岸欧洲城市将会在21世纪50年代实现统一。美国不会喜欢活跃自信的波兰长期统治欧洲。因此，美国会怂恿其最亲近的盟友——英国，卷入到这场无烟战争中，提高美国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由于西欧人口减少、经济滑坡，同时担忧波兰力量的壮大，因此英国很愿意组建一个政治集团，正像20世纪的北约，着眼于恢复西欧的影响力，阻止波兰向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西扩。美国不会加入该集团，但是它鼓励这种集团的形

成。

有趣的是，美国人将会试图改善自己同土耳其的关系。正如一句英国古代谚语所说：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而美国的兴趣就是扶植弱小、对抗强大，从而保持力量上的平衡。土耳其已经意识到波兰长期潜伏的力量，出于日后生存的考虑，也乐于接受华盛顿这棵大树的庇护，与其保持亲密关系。

毫无疑问，波兰人也一定意识到了美国出卖了自己，但美国人也逐渐认识到，发动战争只能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但设法避免战争，或对战争敬而远之、置身事外可能会是更好的解决方法。通过扶植英国，支持土耳其，美国试图建立一个欧洲权力制衡体制，与亚洲权利平衡的情况相同。并且，只要美国掌控太空，就没有哪个国家会对它造成长久的威胁，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处理任何值得关注的问题和事件，以维护美国的国际地位。[1]

经济强盛的美国将独霸太空

地缘政治学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对于地缘政治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正如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60年代美国也不会受到什么严峻的挑战，至少不会受到直接的威胁。虽然美国对于即时的安全状况比较放心，但是它也要清楚安全问题已经暗潮涌动，并非表面上那般平静。

21世纪40年代，美国的经济扩张依然不会受到战争的影响。而且它还会不受约束地持续发展。正如我们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所见证的一样，美国再次成为战争的受益者。它的国土没有受到战火波及，而政府增加的支出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由于美国应用高科技作战，因此任何战争都会增加政府的研发费用。战后，这一系列新的技术也将应用到商业开发中，因此，到21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社会的转变，美国将获得一个在

战后世界经济大幅度增长的机遇期。

这场战争正好发生在美国50年循环周期的中期，将持续20年左右。这意味着这场战争发生的时间正是美国最强盛的时期。人口问题在美国不像在世界其他地方那样严峻，它因移民和婴儿潮时期人口的减少而得到较好的调节，减轻了灰领阶层的压力。可用资本和产品需求之间的平衡未受到任何波及，物质财富还将呈现增长态势。美国将会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社会也随之转型。然而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一场大型战役从爆发之初进入到周期循环中的中间阶段之后，经济因为要立即去适应战后余波，就会使周期循环的速度加快，这也就意味着21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将会是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高回报时期。从任何角度来讲，战后15年对美国而言都将是一个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黄金阶段。

21世纪30年代，俄罗斯垮台后，美国将会减少国防开支，但随着21世纪40年代全球冷战的加剧，其国防开支又会大幅增加。世纪中的战争，美国将会全身心投入到研发事业中，并将其研究结果立即投入应用。对于在和平时期需要花费几年时间完成的研发项目会由于战争的迫切需求（尤其是在美国的太空部队遭歼灭之后），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完成。

美国对于太空的开发将会达到痴迷的程度。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在美国，尤其是在军队中建立了一个信条，即毁灭性的袭击会在任何时刻，尤其是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降临。这种思想倾向将在未来50年一直影响着美国。对于意外袭击的恐慌渗透到部队官兵的思想中，并提上了军事日程。这种草木皆兵的敏感在苏联解体后有所缓和，但在21世纪50年代，袭击令珍珠港事件引发的恐惧感死灰复燃，整个国家再度陷入恐惧意外袭击的困扰之中，并且这次的恐惧来自太空。

这种担忧不久将会变成现实。控制太空意味着要和控制海洋一样应用战略。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几乎使美国丧失了对海洋的控制权，而21世纪50年代的战争则可能会使美国丧失对太空的控制权。美国一直以来

的对意外袭击的恐惧，以及对太空的关注将会使其把巨大的军事和商业资金投入到太空中。

美国因此要在太空建立大量的基础设施，从近地球轨道到同步人造地球卫星轨道站，再到卫星设备和绕月轨道卫星。许多系统将由机器人操控或是执行。前半个世纪以来，机器人所拥有的无法比拟的先进性汇集一体，集中应用于太空事业。

拥有一支稳步发展的太空部队是开拓太空事业的关键。他们的工作就是监督各个系统，因为不管机器人再怎么先进，它们还不是全能的。到21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努力将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美国太空部队——一支从美国空军分离出来的新部门，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成为预算最多的部门。来自企业家升级化商业版本的一系列低成本的发射工具，将会依托太空平台，不断穿梭于地球和宇宙之间。这些活动有三个目标：

> 首先，美国期望确保其国防力量强大，保障充分，防卫全面，以此保证美国在太空事业上的领先地位。
>
> 其次，美国期望占据有利条件，以此打消其他国家在太空事业上寻找立足之地的任何尝试。
>
> 最后，美国期望独揽各方资源，包括太空武器——从导弹到高杀伤力的激光束，以此控制地面的各种事件。但是，美国最终会明白，它不可能监控到来自太空的所有威胁（如恐怖袭击或其他大国结盟），但它可以确保其他国家不会对其造成有效的打击。

培养这种能力的代价是相当昂贵的。但美国国内政坛上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国家将会产生庞大的财政赤字，美国经济也会受到极大的刺激。正如“二战”之后，恐惧胜过谨慎。有些批评家（大多是非主流的、不具影响力的）会证明这项军事开支是毫无裨益的，甚至会把美国

拖垮，引发经济萧条。但事实上，美国经济实力会因此迅速提升，因为在美国历史上，尤其是其50年的循环周期中，财政赤字经常出现，而经济依然稳健发展。

巩固霸权的能源革命

美国对太空的痴迷是与能源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战争期间，美国会投入巨资来解决从太空向战场运送能源的问题，这种方式虽然不符合效益，原始又很浪费，但确实可行，这样就可以增强北约在波兰的各种能源补给力量，以防止土耳其和德国的联合入侵。美国军方将太空资源作为解决战场诸多复杂问题的途径之一，特别是十分关键且亟待解决的激光等新型武器的能量供给问题。因此，军方需确保外太空能源研发成为军事领域不可或缺的课题，美国国会当然要为此买单。这是美国从战争中汲取的经验，而且这一项目势在必行。

美国历史上发生的另外两起事件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项目。1956年，美国着手建设州际公路系统。出于军事考虑，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也非常认同这个项目。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官，他试图领导一个护航队穿越美国。当然，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亲历德国把整个军队从东方前线转移到西方战场，又利用德国高速公路发动坦克大决战。对此，他深感震惊。

建立州际公路系统，军事用途自然不言自明，但这一项目对市民的影响却大大出乎意料。随着时间的缩短和运输成本的降低，城市周边的土地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利用，大规模的城市郊区化悄然兴起，居民和工厂都向郊区分流。州际公路系统重构了美国。如果没有军事理由，美国也许就不会抽调专门资金来完成这项工程。

另外一个例子要从20世纪70年代谈起，当时美国军方非常重视研究工作。美国需要一种方法将各个研究中心的信息以快于信使或邮件的速

度传送出去，当时还没有联邦快递。国防高级研究规划局（简称DARPA）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了一项实验。这个实验希望通过计算机实现远程数据交流和文件传输。这一项目被称为ARPANET。它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ARPANET逐渐发展演变成为Internet，但是它最初的基本架构和初衷主要是为国防部门服务的，被国防部门和承包商所垄断，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普及。

正如高速公路一样，信息高速公路似乎也是自行演变出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信息高速公路创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军方面临的问题，因此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费用将由军方自行承担。以此类推，能量高速公路也是源于类似的需求。它也是为军方所建，因此能量高速公路的经济保障会让它比其他的能源开发更具竞争力。军方会筹措启动资金，并将其部署到各个系统当中，因此这种能源的商业成本将会比其他途径的开发成本更为廉价。对社会大众来讲，享有低廉的能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特别是随着机器人在经济体系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能源也将变得越发重要。

整体而言，军方实施太空计划确实减少了商业化开发研究的成本。之前商业化的太空推进计划虽然降低了成本，但是却无法运作像太阳能开发这样的大型工程。因此21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军事工程将会从以下两方面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

> 首先，计划重点是降低太空运输的单位重量成本。美国需要向太空运送大量的原材料，这就需要大幅削减发射成本。要满足这种需求，一方面要靠新科技，另一方面要增加发射的负载量，这样的话，成本会得到大幅削减，甚至低于之前开发的商业工具。
>
> 其次，在军方的大规模计划中，会安排备用容量。这次战争的一个教训就是美国没有留出足够的剩余空间输送能力，导致它仓促应对主动进攻。美国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它会预留出充

裕的、可重复使用的空运能力，并且以巨额的预算赤字来保障不再重蹈覆辙。同时，由商业组织来使用这些设备，会是降低成本的重要一环。

州际高速公路建设和因特网的到来，促使经济进入一个迅猛增长的时期。通过雇佣军队建设人员和国内工程师参与州际高速公路网建设刺激经济，但企业的推动效应才是繁荣经济的真正原因。麦当劳和市郊购物商场就都是州际高速公路网的产物。因特网的建设包括了大量的Cisco服务器和私人电脑的销售，但真正的繁荣来自Amazon（美国最大的在线零售商。——译者注）和iTunes（美国苹果公司的音乐播放软件。——译者注）。它们都拥有巨大的企业影响力。

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就以SSP（空间太阳能）的形式参与了空间能量研究。美国会在21世纪50年代的战争中首先使用这套新的系统。这一体系将在21世纪60年代的空间能量项目中得到完善。为了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大量的光合作用电池将会放置于地球同步轨道或是月球的表面。电能将被转换成微波的形式传送到地球，微波再次被转换成电能的形式分布于现有的展开电网。通过使用镜面聚集阳光能够减少所需的电池数量，因此降低了投产设置光电列板的基本成本。显然，接收器需要安装于地球上的隔离区，因为定位微波辐射将会非常强烈，但风险却远低于核反应器或是来自于烃类储集的环境效应。众所周知，太空的空间能源无限广阔。有些在地球上根本就无法开展的工程（比如说用太阳能电池板覆盖整个新墨西哥州），却不会影响无限的太空。太空中没有云层，收集器可以持续接收阳光。

这些进展将会降低地球的能源成本，从而让更多的能源密集型活动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商机也非常诱人。谁也不能在ARPANET和iPod（苹果公司推出的一种数码播放器。——译者注）之间划出一道界限。现在能说的是，与20世纪60年代州际高速公路和2000年因特网所带来的繁荣相比，这次创新浪潮所带来的改变将在21世纪60年代给人们带

来更多的繁荣，至少不会逊色多少。

美国还将为其地缘政治权力建立另一个基地，保护其能源领域免受攻击，它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而日本、中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都将是能源进口国。随着能源经济的转型，其他能源（包括碳氢化合物）将失去原有的吸引力。其他国家将无法实施自己的太空计划。一方面，它们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保障太空计划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挑战美国的权威。任何对美国的袭击都将给现存的权力不均衡现象造成难以预想的冲击。美国提供的廉价太阳能成为其巩固超级大国的又一个附加筹码，大大提升了它的国际主导地位。

我们将在地缘政治现实中看到一个基本模式的转变。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工业对能源的需求剧增，能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世界各地。无足轻重的阿拉伯半岛因其丰富的石油资源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随着工业开始向以太空为基础的体系转型，工业在消费能源的同时开始生产能源。太空旅行将成为工业化的结果。工业化国家生产能源，同时也加速了其工业的发展。太空将变得比沙特阿拉伯更为重要，并且会受到美国的控制。

世界再次以美国为中心？

美国式文化的新浪潮将会横扫全球。要知道我们不能把文化单纯地定义为艺术。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们如何生活。而计算机的引入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就要远胜于电影或电视机。机器人将成为计算机逻辑性的代言人。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有条不紊，但人口增长不会过盛。机器人将会成为生产力的驱动力，以太空为基础的太阳能系统会提供给机器人充足的原动力。机器人的开发仍然处于初始阶段但发展迅猛，并将风靡全球，尤其会受到人口稀少的发达工业国家和人口接近或是超过人口高峰期的国家的欢迎。

遗传学将继续延长人们的预期寿命，并将根除或控制一系列遗传疾病的发展。但这将引发更多的社会动乱。妇女角色和家庭结构的彻底转变已经给欧洲和美国造成了困扰，它将会继续蔓延，成为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传统价值观念的支持者和新的社会现实主义者之间剑拔弩张的对峙将会加剧整个国家的紧张局势。整个社会，所有的主要宗教都将面临重大冲击。天主教、儒教和伊斯兰教将一如既往地宣扬对于家庭，性以及世代关系的传统观念。但是，传统的价值观念在欧洲和美国土崩瓦解之后，将继续影响世界上的大多数其他国家和地区。

从政治上讲，这将意味着更加激烈的内部关系。21世纪末期，保守派将会试图控制医学、科技等领域的巨大变化。自从美国成为引起争议技术的始作俑者之后，其内部的社会混乱模型已逐渐成为准则，而这也会成为传统主义者的大敌。至于世界的其他国家，它们都会认为美国危险、野蛮且善变，所以人们会小心谨慎地对待美国，同时又充满嫉妒的情绪。届时的国际状况将会是整体稳定，而各国内部则处于不安的状态。

除了美国，还有两个国家对太空虎视眈眈。一个是忙于巩固其内陆帝国，同时仍能巧妙兼顾21世纪50年代和平条约的波兰。它正从战争和美国联盟的包围中恢复过来，但它还没准备好接受挑战；另一个是在21世纪60年代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墨西哥。它将美国视作对手，逐步登上美洲和世界舞台，但它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政策（也不会过分挑战美国权威）。

届时将会崛起新的国家，它们的人口增长压力有所缓和，经济飞速发展。尤其是巴西，它将紧跟墨西哥的步伐，人口稳步发展，成为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巴西很可能同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一起建立区域经济联盟，促使国家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出于自身和平结盟的考虑，巴西极有可能会在恰当的时机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战略规划。在21世纪60年代，巴西一定会实施太空计划，但这项计划并不全面，无法满足其自身

的地缘政治需求。

以色列、印度、韩国和伊朗等国家也会实施部分太空项目，但它们拥有的资源和参与的积极性都很有限，更别说抗衡美国的霸权垄断了。因此，正如在全球大战后所发生的那样，美国将在太空领域大展拳脚。美国会迎来一个黄金时代，而且这一鼎盛时期将会持续到**21**世纪**70**年代左右。

注释

［1］弗里德曼.未来10年[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155～157.

此外，欧洲国家还把这些苏联的卫星国视作与莫斯科保持安全距离的缓冲区，这就进一步保证了他们在与俄罗斯合作的同时，保持自身的国家安全。他们理解东欧国家的顾虑，但也相信，经济合作的益处以及东欧地区对欧洲其他地区经济依赖，足以让俄罗斯安分守己。欧洲人完全可以降格对美关系，在与俄罗斯建立新型互惠关系的同时，依旧可以把战略缓冲作为一种安全政策。这将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因此，美国总统必然采取措施遏制俄罗斯，让这个国家为其长期的内在缺陷付出代价。他决不能等到反恐战争结束再去做这件事，而是要当机立断。

如果德国与俄罗斯继续走向合作，那么，位于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的国家，也就是常被称作“海间联盟”（*Intermarium*）的国家将成为美国及其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些国家中，波兰无疑是最大、最具战略地位的国家，同时不仅是损失最大、也是对潜在损失最敏感的国家。对波兰人来说，成为欧盟成员国是一回事，而沦为俄德合作的附庸品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想到即将回归历史夙敌的势力范围，就会让他们和其他东欧国家感到心惊胆战。

实际上，在一战彻底摧毁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和日耳曼帝国之前，这些国家大多还没有独立。通常情况下，他们一直在被瓜分，被压迫和被剥削。像匈牙利这样的国家，遭受的压迫还算可以接受，但其他国家则灾难深重。但他们对法西斯和随后苏联的占领肯定记忆犹新，这些占领简直骇人听闻。诚然，当今的德国与俄罗斯政体不同，但对于东欧国家而言，那段被占领的历史并不遥远，陷入苏德战场的梦魇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民族特性。在未来10年，俄德之间的博弈将继续决定他们的行为。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波兰，他们曾先后被德国、俄国和奥地利吞并。瓜分波兰是历史妥协的产物，它将继续成为波兰人的噩梦。这个国家在一战后刚刚实现独立，就不得不为抵抗俄国入侵而战。20年之后，德国人和苏联人根据一项秘密协定同时入侵波兰。在随后半个世纪的冷战中，波兰人的梦魇没有丝毫的减轻。

波兰人的灾难源于他们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与德国和俄罗斯接壤，占据着北欧平原，并构成一条从法国大西洋海岸到圣彼得堡间的通道。尽管其他东欧国家也和波兰有着相同看法但他们躲在喀尔巴阡山脉背后，他们在地理上显得更安全。

而腹背受敌的波兰似乎别无选择，只能听任德国人与俄国人的裁决，这对美国而言无异于灾难。因此，确保波兰独立于俄罗斯和德国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不仅是形式上的独立，更重要的是通过打造健康而充满活力的波兰经济与军事，使之成为其他东欧国家的典范和推动者。从历史上看，波兰始终是俄国与德国两国的咽喉要道，因此，确保在波兰的影响力是美国的重要战略。一个依附于德国的波兰，是对俄罗斯的威胁，反之亦然。必须令波兰对这两个国家保持一定的威胁，因为这样的话，美国就可以让两个国家永无宁日。在未来的10年里，美国与波兰的关系将发挥两种功能：它或许可以阻止或限制俄德联盟；一旦失败，则会制造平衡。美国迫切需要波兰，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其他可以对抗俄德联盟的策略。从波兰的角度看，尽管与美国的联谊可以帮助他们免受邻国威胁，但也会带来一个特殊问题。在波兰人的心中，英法在“二战”初期没有兑现阻击德军的承诺，造就了他们挥之不去的悲愤情

结。波兰人对这种背叛行为痛心疾首，这使他们宁可选择与仇敌为伍，也不愿接受不靠谱的盟友。

第13章
美国VS墨西哥
2080年谁将成为北美统治者？

美墨边境的不断融合使得墨西哥移民不断涌入，移民们不仅解决了美国劳动力缺失等问题，同时也为墨西哥带来丰厚的外汇。加之石油美元及毒品经济的丰厚利润，墨西哥力量的成倍增长逐步呈现出打破北美势力平衡的态势。墨美跨界民族问题不仅影响到北美的地缘政治角力，更对美国和墨西哥的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未来的北美必将成为国际体系和大国较量的中心，而作为两个最具竞争力的对手，美国和墨西哥谁将称王？

从本书开篇，我就一直在谈论北美将成为国际体系重心这一问题。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基本上都把北美和美国画上等号。这仅仅是因为在北美，美国力量具有压倒性优势，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企及。21世纪的世界大战将会清楚地证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一个能够挑战美国的亚欧大陆国家。此外，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原则得到了检验和修正：谁控制了太平洋和大西洋，谁就控制了全球贸易；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全球的海洋。美国对太空的控制无人可敌，因而牢牢掌控着全世界的海洋。

然而，实际情况要比表面现象更加复杂。21世纪后半叶，美国将会产生一个潜在的、200年来都未曾遇到过的弱点。美国的第一个地缘政治驱动力（其他驱动力以此为基础）就是美国一定要主导北美。自从美墨战争之后两国于1848年签订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1848年2月2日在签订了该条约之后，墨西哥战争的

停战协议才真正达成。——译者注）以来，美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北美大陆。这一点似乎早已成为定局。

到21世纪末期，形势将不再如此。有关墨西哥与美国力量消长的问题将会以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复杂、最棘手的方式被再次提起。200年后的墨西哥将有能力挑战美国领土完整以及北美政治力量的总体平衡状态。如果觉得这个听起来有些牵强附会，那么请回头看看我的序言章节，并思考一下在仅仅20年中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要记住：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事。

墨西哥移民与美国社会的交融

墨西哥的挑战将会起源于21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这一经济危机将会随着21世纪30年代早期移民法的通过得以解决。移民法将会极大地鼓励人们移居美国以解决美国劳动力紧缺的问题。来自各个国家的移民将会大量涌入美国，而这些国家之中显然包括墨西哥。不同于其他的移民群体，墨西哥人将会有同以往迥然不同的表现，这不是因为文化或性格，而是因为一个因素——地理。作为一个国家，墨西哥力量的成倍增长将会打破北美政治力量的平衡状态。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其他移民群体一直处于一种多块分布的状态。居住在族裔聚居区的人们，虽然可能已经在那些邻近地区处于主导地位并影响周围的政治，但19世纪以来，还没有任何群体可以征服一个区域或州。作为已步入成年的第二代移民，他们在文化上已被同化，在追求经济机会的同时，他们的足迹遍布美国各地。族裔聚居区的生活远不及机遇多多的广阔社会那般吸引人。在美国，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入性一直都不差，除了两大群体：一个是被迫来到美国的非裔美国人，另一个是在欧洲人到来时就居住在美国的美洲印第安人。其他的种族均在到达美国以后先聚集在一起，再分散开来，然后为整个美国社会注入新的文

化。

这一点一直是美国的优势和力量所在。比如：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徒已经保留了区别于其他人口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特征，而且他们也从未被鼓励去融入大众文化。因此，他们自身的文化力量很强大。在美国，伊斯兰教移民和其他移民群体一样，经过世代的繁衍，已演变成一个大量“买入”美国社会基本原则的族群，其目前的宗教信仰几乎只是因为要传承过去的文化才得以保留。这不仅使这些移民快速融入美国社会，而且在第一代和后几代人之间（也在美国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地方的伊斯兰教徒之间）造成了隔阂。这对美国外来移民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也是他们必须迈过的门槛。[1]

从**21**世纪**30**年代开始，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将有卓尔不凡的表现。他们将会像以前那样分布在美国各地，而且其中很多人将会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但是，与其他移民群体不同的是，墨西哥人不会因为汪洋大海和万水千山的阻隔而与祖国分开。他们可以穿越边界几英里后进入美国，而且仍然可以在社会和经济上与他们的祖国保持联系。与自己的祖国邻近会产生一种十分不一样的动力。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国，与其说是一种散居，倒不如说只是向两国边界区域移动，至少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迁徙是这样的。这就像法国和德国之间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一样（一个不仅使边界稳定，也会融合交织两种文化的区域）。

看一下这张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绘制的2000年的美国墨西哥裔人口集中图。

通过观察2000年墨西哥裔居民在美国各郡的比例，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其集中程度。沿着太平洋到墨西哥湾边线，有一个明显的墨西哥裔人口集中地。这些郡的1/5到2/3以上的人口是墨西哥人（在这里我们用这个词来表示种族而非国籍）。与加利福尼亚州情况一样，在得克萨斯州，这种集中程度进一步扩展到州的范围。但是，与料想中的一样，边界周围的郡很容易成为墨西哥人的聚集地。

我把19世纪美国从墨西哥取得的土地（图中黑线下方的部分）放在这张墨西哥裔人口图里，将这个历史界限和2000年的墨西哥裔人口分布图加以比较，就可发现，2000年时，墨西哥裔人口高度集中于旧日的墨西哥领土上。当然，除了这个区域还有许多墨西哥人聚集的小片区域，但仅是小区域而已，那里的墨西哥人的生活方式和其他的种族群体差不多。在边境地带，墨西哥人没有与他们的祖国隔离。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墨西哥移民认为移民行为将祖国的领土延伸进了美国。美国在19世纪占领了墨西哥，而这个区域依然保持着被占领地的一些特征。随着人口的迁移，边界逐渐被看成是不稳定的或者非法的地区。这样就出现了从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的移民运动。虽然墨西哥的政治边界保持稳定，但是其文化界线却向北发生了推移。

这就是2000年的总体情况。经过实施30年的鼓励移民政策，到2060年的时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2000年的地图将会急剧演变，以至于那些过去墨西哥人口占50%的地区将会完全成为墨西哥人的集聚地，而在那些过去墨西哥人口占25%的地区，其墨西哥人口的占有量也会翻倍。整张地图色调将加深一倍。大量移向美国边界地带的人口中，绝大多数将会是墨西哥人。墨西哥将会在美国的鼓励下，通过扩展墨西哥割让地至非政治边界，来解决自身人口增长的最终阶段的问题。

矛与盾：技术移民抑制移民需求？

向美国蜂拥而至的移民大军以及战争的后期影响将会开启一段从2040年到2060年的经济繁荣期。在美国，可利用的土地和资金与发达工业世界中最具活力的劳动力储备大军一起点燃了经济之火。这就像20世纪80年代发起的增加资本投资所引发的20世纪90年代大繁荣一样。美国一贯采用比较宽松的政策来吸引移民，这给它带来了相较于其他工业化国家更多的优势。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繁荣的另一面，那就是工业技术。让我们先谈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再继续我们关于墨西哥问题的

讨论。

在2030年的危机中，美国将会寻求弥补人力资源短缺的方法，着重于开发可以替代人类的科学技术。这并不是联邦政府第一次致力于通过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去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像伊利湖和巴拿马运河工程，出让政府土地建设铁路，建设州际高速公路，制造原子弹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项目有时会带来一些出人意料的成果，如硅微晶片的应用。美国政府探测月球，进行航天飞行计划，需要携载一台小型的计算机。于是美国政府选择了已经发明的硅微晶片，投入巨资研发，最终发明了轻型计算机。私企应用了这一研究成果，个人电脑随之产生，历史在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政府研发，特别是军事及其相关产业的研发，总是历史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美国主要的科技发展模式如下：

第一，大学或是发明者个人提出的基础科学或是设计理念，往往能够带来革新的观念和一些商业性的开发。

第二，出于军事需要，美国向相关项目注入大量的资金，加快其特定的军事化目的研发进程。

第三，私人企业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将其商业化，应用到整个产业中来。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机器人技术上。早在19世纪末，机器人技术的基础研发就已经进行了。虽然核心理论有了重大的进展，并且已经部分应用到商业领域中，但机器人并没有成为美国经济的必需品。机器人技术仍然是供麻省理工学院学生消遣的一种游戏，并不完全是经济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但是，军队数年来一直在不断投资学习基本机器人理论及其应用。美国军方通过DARPA和其他来源，一直积极地为机器人的开发提供资

金。诸如开发一个机器骡来运输步兵设备，或制造一个无人驾驶的机器人飞机，这些项目仅是机器人技术研究的几个例子而已。在太空中部署无需在地面上加以控制的智能机器人系统，是进行机器人研究的另一目标。归根结底，这是人口问题。年轻人越来越少意味着士兵也越来越少。然而，美国的战略参与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美国将比其他任何国家更需要机器士兵来维护国家利益。

等到2030年社会和政治危机发生时，机器人的应用技术将得到实地验证并得到军事论证，从而为商业所用。显然到2030年，机器人将不会被大规模部署。而且，机器人绝不会排斥移民。这种情形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都很熟悉，因为我们之前有过类似的体验。1975年就出现了计算机操作；军队在硅晶片的发展上付出了很多努力，还可能研发出军事应用软件。商业化过程才刚开始，这可能会花上几十年来转变国民经济。所以直到2040年，机器人科学技术将大规模发展，而人们要真正感觉到机器人技术的全面改革力度估计要到2060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移民科学家在发展机器人的工作上扮演重要角色，但进步的机器人科技却会降低未来对大量移民的需求。这个技术将会削减大规模移民入境的需求。实际上，当机器人技术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时，那些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从事无技术含量的劳动移民将会逐步失去他们的经济地位。

一个观点再次得到了论证：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将会是下一个问题的催化剂。这种情形将会直接导致2080年的经济危机。鼓励移民入境的体制将被逐渐纳入美国的文化和政治领域。招募者会继续鼓励那些移民来到美国。问题是到了2060年左右，由于移民，或是像机器人那样的新技术，经济危机将会过去。最后一批在新兴地区安家的移民也已经离开或是长眠地下。美国的人口结构看起来也更像金字塔了——它本来也应该这样发展。机器人的先进性减少了对移民的需求。

科技的发展自然预示着工作负荷的减轻，但其负面影响也总是随之

发生。为了发展这种技术，人们就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所发生的变化就是从无技术含量的技术工作转变成技术工作。这当然是机器人技术发展的一个成果。因此就需要有人来设计和维护这些体系。但是机器人技术在本质上不同于先前的所有技术。先前的技术只是作为一种副产品来取代劳动力，而机器人技术则是出于要取代劳动力的明确目的被设计出来的。这种技术的整体要点是用廉价的技术取代稀缺的劳动力。第一个目标是取代劳动力缺口，第二个目标是用可用的劳动力支持机器人技术，第三个目标（这也是问题的根源）将是直接取代工人。换句话说，研发机器人技术就是为了取代工人缺口的，但那些缺乏技术，无法操控机器的工人将会被直接取代，这就会产生失业问题。

因此，大约从2060年开始，失业率在未来二十几年将急速攀升。届时，将会出现短暂的人口过剩。2030年，人口紧缺的问题将会出现。21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80年代，将演化成由于过度的移民入境和结构性失业而造成的人口过剩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也不排除遗传学改善的影响。人类寿命也许不会大幅度地延长，但美国人能够从事劳动生产的年限却会拉长。当然，我们不排除人类寿命大幅延长的可能性。

机器人技术，外加遗传学和随之产生的相关技术，会在取代劳动力的同时，提高劳动力储备质量，进而提高效率。这将会是一个混乱持续升温的时期，在能源利用方面也是如此。相对于汽车来说，处理信息的移动机器人会消耗更多的能源。这将会结束源自欧洲时代的碳氢化合物工业时代。美国人将寄望于太空，希望在那里寻求能源。

太空能源开发体系在2080年之前会进展得非常顺利。事实上，美国国防部已经考虑建立一个这样的体系了。2007年10月，美国国家太空安全办公室发布了一项题为《太空太阳能作为战略性安全防御的新机遇》的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

> 能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我们不得不考虑各种可能的解决

方法，包括重新探究近40年前美国研发的“太空太阳能”。这一概念非常简单：放置一系列的太阳能电池板到日光环球轨道上，源源不断地搜集大功率的电能源，然后通过电磁波光束传送到地球上。地面将搜集到的太阳能或者直接连接到现存的输电网路中，转化成大量的综合性碳氢化合燃料，或者通过低强度的传送方法将能源直接传送给消费者。一个一公里宽的同步地球轨道波段一年内获得的太阳能量可以媲美于地面上我们迄今所知的石油能源之和。

到2050年初，这种新的太阳能技术的部署将会步入正轨，而2080年的经济危机也将推动其发展。能源成本的大幅下降对于机器人策略的推广影响重大，对于此后长期的人口瓶颈期维持经济生产力来说也意义非凡。当人口不再增长时，技术方面必须平衡，而且这项技术行之有效，因此能源成本必须降低。

2080年后，美国人将致力于开发太空能源体系。很明显，这项计划早在几十年前就该启动。2070年经济危机的加剧会戏剧化地推动该工程的实施。由于政府任何的努力都要花费巨额的代价，到了21世纪末，当私营企业在太空的巨额公众投资开始占主导地位时，能源成本会显著降低，机器人技术也会迅速奇迹般地开展起来。回想一下1995—2005年家用计算机的发展：1995年时大多数家庭和办公室里甚至还没有使用电子邮件，而到了2005年，每天则有数十亿的电子邮件在全球间发送。

美国会是经历短暂的人口过剩期之后的少数发达工业国家之一。前50年，它为了满足经济需求，通过各种方式鼓励移民，而现在它的解决途径变成了阻碍。所以解决经济危机的第一步将是限制移民。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逆转，可能会导致危机，情况有如50年前增加移民的翻版。

一旦移民停止，美国就得处理由于人口缩减而引发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临时下岗和失业会严重地打击那些贫穷劳工，尤其是那些处

于边缘地带的墨西哥人。之后，紧张的外交政策问题也会随之衍生。除此之外，还伴有能源价格的飞涨，届时，导致21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的所有导火索都已蠢蠢欲动。

2050年墨西哥将成世界领先经济体？

2006年，墨西哥的经济在位居世界第15位。自1994年墨西哥的经济雪崩以来，已经戏剧般地得到了恢复。依据购买力来进行衡量，墨西哥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已略超过每年1.2万美元。这使得墨西哥在拉丁美洲成为最富有的大国，就算称不上领先的经济强国，至少也居于发达国家的行列。别忘了，墨西哥不是一个小国。它拥有大约1.1亿人口，比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规模都要庞大。

在未来的六七十年里，墨西哥的经济实力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再加上它的起步水平，墨西哥可能会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体之一。但是由于墨西哥的国内政治不稳定，人口外流，外加一些历史遗留的经济问题，很难想象墨西哥能够入围顶级国家的行列，而且对大多数人而言，同样很难理解它的经济为何会提升得如此之快。在经济方面，墨西哥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 第一，石油，墨西哥在上个世纪就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对于一些国家而言，墨西哥成为主要大国尚且存在争议。石油出口常常削弱一个国家发展其他工业的能力。因此，了解墨西哥的实际情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自2003年以来，全球石油价格高涨，但实际上，墨西哥的能源部门在其所有经济领域中已成下降趋势。石油在1980年占墨西哥出口总量的60%，但是到了2000年，却仅占7%。墨西哥拥有石油储量，但是它却并不依靠石油出口来增长经济。
>
> 第二，墨西哥与美国为邻并亲密合作。而这随后也有可能会

引发一次地缘政治的挑战。不管有没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墨西哥都能将石油有效地出口到世界最大、最有活力的市场上。然而，斜体却能减少出口成本，从制度层面上增加效率，其基本现状是尽管地缘政治学的不利因素伴随墨西哥经济的发展，但是毗邻美国的地理位置已经给它带来了经济上的优势。

第三，有大量的现金从美国以合法或不合法的移民汇款的形式流回墨西哥。源源不断地涌入的汇款资金现在是墨西哥外汇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在大多数国家中，来自国外的投资是发展经济的主要方式。目前，外国人在墨西哥境内的投资金额，已经被海外墨西哥人汇回墨西哥的款项数额迎头赶上。这个汇款体系有两大影响：当其他投资来源蜂拥而至时，汇款体系起到杠杆的作用；而且它还作为一种社会安全网为下层社会服务，对他们来说大多数汇款已经流动起来。

有资金流入墨西哥就意味着基于工业和服务业的技术将会增长。目前服务业占墨西哥国民生产总值的70%，农业仅占4%，其余部分是由工业、石油和矿业组成。集中在旅游服务业的比例相当高，但是将其混合为一个整体，那就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了。

联合国研发出一套很有意思的衡量标准，称为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并绘制出人类发展指数图表。该图表包含诸如生活期望值和文化等级等方面的因素。如下页地图，黑色代表发达国家，中灰色代表中等发达国家，浅灰色表示发展中国家。

正如这个地图显示的，墨西哥在人类发展等级中名列前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与美国匹敌，而是意味着墨西哥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我们进一步探索人类发展指数时，我们会看到有关墨西哥的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方面。墨西哥的整体指数是0.70，与欧美同级。但是在墨西哥内部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不平等现象。黑色区域的发展

水平与部分欧美国家同级，而最浅的区域则相当于贫困的北非国家的水平。

这种极大的不平衡，正是一个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想想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或维克托·雨果（Victor Hugo）对欧洲的描述吧。他们掌握了19世纪欧洲的精髓：经济的极速增长会加剧不平等。在墨西哥，人们可以找到墨西哥城或瓜达拉哈拉市（墨西哥第二大城市。——译者注）的对比数据，但人们也能够从地域性的角度，看到墨西哥北部的富足与南部的贫穷的鲜明差异。这种不平衡并不意味着发展不足，相反，这是发展所必然产生的副产品。

当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邻近美国边界的地区与南部的观光地带（还有墨西哥城）都处于发展的最高水平。距离美国边境越远，人类发展指数就越低。这就表明了美国在墨西哥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也显示出了墨西哥正面临着的真正的危险：区域发展不平衡引发了墨西哥南部的社会动乱。随着墨西哥的发展，这种不平衡会逐渐加剧。

毒品和犯罪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

推动墨西哥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和毒品贸易。一般说来，有两种犯罪类型。一种是简单的分配与消费，如某人偷了你的电视机并卖了它；另一种是创造资金大联盟。控制走私漏税的美国黑手党进行大规模的洗钱活动。这类事件发生在一国内部时，会刺激经济增长，当交易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时，就会产生更加显著的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是产品的成本由于其不合法性被人为地抬升。竞争、维持高价、促进资金转移，这一系列活动鼓励大型联合企业的出现。

在当时的毒品贸易案例中，出售人为抬高价格的毒品给美国的毒品消费者，这给墨西哥创造了巨大的投资空间。复杂的洗钱运作被设计成

合法的资金分配。下一代继承人将其变成一个相当合法的资金储备池，而到了第三代就成了经济贵族。

这种说法实际上过分简化了整个过程，而且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些案例中，墨西哥的毒枭没有将黑钱送回墨西哥，而是把钱投资到美国或其他地方。但是，如果墨西哥变得日益多产，如果政府腐败到愿意包庇洗钱活动，那么毒枭当然愿意把资金重新投回墨西哥。请注意，未来墨西哥会出现巨大的吸金现象——毒品犯罪组织把钱从美国转向墨西哥。

这个过程会从政治上破坏政府的稳定。因为在此过程中，毒枭会与政府当局串通一气，法院和警署对此无能为力。这会导致这种不稳定从市井一直延伸至政府最高层。理论上，一旦流通这些钱，社会就会四分五裂。然而，社会是如此强大复杂，而且在这个社会中，那笔资金仅代表可用资金中相当小的一部分，因此最终整个社会会立即自行稳定下来。美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组织就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虽然破坏了整个地区政府的稳定，但最终他们将非法所得导入合法的经济行为中。依我看，墨西哥很可能走这条路。这种活动最终也会促进墨西哥经济的快速增长。[2]

这并不是说在墨西哥就没有可怕的经济不稳定时期。在未来的几年中，国家控制垄断集团的能力将会受到质疑，墨西哥也会面临大规模的内部经济危机，但是从长远来看，纵观整个世纪，墨西哥将会平安渡过经济危机，而且会从大量来自美国的流动资金中获取利润。

最后，当我们着眼于墨西哥的人口数量时，我们不仅会看到在迫切需要劳工再次点燃经济的时期，墨西哥的经济会继续增长，而且会看到21世纪中叶人口增长的“软着陆”暗示了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人口压力的缓解。21世纪30年代，人口模式允许美国移民数量的增加，从而导致汇回墨西哥的款项增加，可以在不必承担人口过剩负担的情况下，改善自身的资本状况。尽管这对墨西哥的发展而言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但是这

种移民必然会成为支持经济的动力。

于是，在部分生活指标上已达到欧洲水平的墨西哥，将度过一段不可避免的动荡时期，然后走上稳定有序的发展道路。然后，到21世纪中叶左右，当世界正处于战乱当中时，墨西哥将以一个经济成熟、人口稳定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它会位列世界经济六七强之中。除此之外，其军事力量也稳步增长。墨西哥将成为拉丁美洲经济力量的领头羊。也许，它与巴西的联盟将会挑战美国在北美的统治地位。

颠覆还是融入美国：墨西哥的地缘政治定位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墨西哥将它北部的广袤区域割让给美国，这是美国主导得克萨斯州叛乱和美墨战争的直接结果。从本质上说，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格兰德河北部的所有土地和索诺拉雷暴沙漠全部被美国占领。美国没有对留在那些地方的人口实行种族灭绝，而是由逐渐到来的非墨西哥裔人统治该地区。从历史观点上说，美墨边境并不严密。美国和墨西哥公民都能够很容易地跨界限往来。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在美墨之间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边缘地带，政治界限划分明确，文化边界却复杂而模糊。

墨西哥从来没有拥有过颠覆美国征服者的实力。它默认了这样一种观念：除了眼睁睁看着北部土地从自己国界内消失之外，别无选择。甚至在美国内战期间，当西南地区没有相关防护措施的时候，墨西哥人并没有移居他处。在马克西米利安国王统治下，墨西哥仍保持着衰弱和分裂状态。它并没有意愿或力量采取行动。当墨西哥在一战中被迫与德国联盟，共同抵制美国来要回北部墨西哥失地的时候，墨西哥人表现得很消极；当苏联和古巴试图在墨西哥发起一次共产主义运动来威胁美国的南部边疆时，它们彻底失败了。墨西哥既不能行动起来反对美国，又不能利用外国力量对抗美国，因为墨西哥不容易进行全国动员。

这并不是因为在墨西哥没有反美情绪。事实上，其最深的根源在于墨西哥人可能期望重新回到原来的那种美墨关系。然而，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反美情绪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墨西哥人被他们自己的地方主义和复杂的政治所深深困扰，他们也知道向美国挑战是没用的。

1848年之后，墨西哥的主要策略很简单。首先，它需要保持自己的内部凝聚力来共同抵抗地方主义和叛乱；其次，它需要自我防护来抵制任何外来侵略，尤其是来自美国的侵略；再次，它需要收回19世纪40年代由美国占领的国土；最后，它需要超过美国，成为北美的统治力量。

墨西哥从来没有在地缘政治层面上完成实质性的跨越。自美墨战争以来，墨西哥只不过试图保持内部凝聚力。墨西哥被美国击败后失去了平衡，而且再也没有恢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归咎于美国政策，它助长了墨西哥内部的动荡不安。但是大部分时间里，墨西哥都因与一个强势的巨头为邻而削弱了自身的力量。比起墨西哥本国的努力，美国的实力更多地影响了墨西哥人民的立场。

到了21世纪，靠近美国的不稳定的边境地带会变成一种稳定的力量。美国仍然会影响着墨西哥，但是这种关系会将得到很好的处理，以提高墨西哥的实力。到了21世纪中叶，当墨西哥经济力量得到提升的时候，墨西哥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民族主义，从而将使地缘政治抱负付诸实践。这不仅增强了墨西哥人的自豪感，而且会产生一种反美主义。如果美国移民政策规划者试图在墨西哥出生率下降时，诱使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国，那么美国将会因为实施损害墨西哥经济利益的人口政策而受到谴责。

美墨的紧张状态是永恒持久的。不同的是，墨西哥的实力将在21世纪40年代有所提升，因此墨西哥人会产生更大的信心，以致骄傲自大。然而，两个国家的力量将不相上下，但形势更有利于美国，只是不像50年前那么不稳定了。可是就连这也会在2040～2070年发生改变。墨西哥不再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而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区域强国。美国并

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中世纪战争期间，华盛顿仅仅把墨西哥视为一个可能存在的同盟体。如果墨西哥有任何脱离的动机的话，那么华盛顿就会失去原有的既得利益。战后的精神愉悦和经济膨胀，将让美国政府继续保持以往的对墨西哥满不在乎的态度。

一旦美国意识到墨西哥将会成为威胁，就会立即对墨西哥以及发生在墨西哥的一切感到极度惊慌，而且会很平静地确信，美国在这种情形下可以强加任何自己想要的解决方案。一度潜伏的美墨紧张状态，会加速墨西哥实力上升的进度。美国将会把墨西哥经济的发展视为墨西哥和美国关系的一个良性的稳固力量。因而美国会更进一步地支持墨西哥经济的发展。美国把墨西哥视作一个受施者的观点将保持不变。

到了2080年，美国依旧会是北美最有控制力的国家，但是美国人将会反复地体会到——强大并不意味着全能，如果摆出无所不能的姿态，反而会耗尽国家的能量。但它却表现得好像能够轻而易举地削弱一个国家的力量。到2080年，美国人还会再次面临一场挑战，但这次的挑战比起他们在21世纪50年代面临的挑战要更加复杂和微妙。

这种对峙无法预计，因为美国在墨西哥没有野心，墨西哥人也没有凭借他们的经济力量与美国相抗衡这样的幻想。这种对峙将跳出两国地缘政治的现实，不会像大多数类似的地方性冲突那样，而将是一场世界霸权者和新兴邻国之间的对峙。竞争的目标将是国际体系的重心——北美。促成这次对峙的因素有三个：

> 第一，墨西哥将以主要全球经济体的身份登台。在世纪初位列第14名，到了2080年肯定会挺进前十。1亿人口会使它有力量处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难题（除了美国南部边界地带）。
>
> 第二，到**21**世纪**70**年代，美国会面临一次经济危机的周期循环，并在**2080**年选举期间达到顶峰。新技术加上合理的人口政策会减少对新移民的需求。的确，让临时移民（尤其是让那些在这生

活了50多年，自己的后代也在这里出生的移民）返回墨西哥，必然会增加他们的压力。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仍然是低阶层劳工。之后，专业人士和企业家们为了他们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将返回墨西哥。美国将开始强制那些长期定居的居民跨过边界回到墨西哥，但这些人没专业能力，只会拖慢墨西哥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且这些工人已经在美国居住了几十年。

第三，边界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并不能扭转全局。不管是美国公民还是非美国公民，墨西哥人的基本优势是很长久的。19世纪40年代由美国占领的墨西哥部分领土，将会从文化、社会，乃至意识形态方面再次为墨西哥所有。将临时工人遣送回国的政策在美国看来似乎是一个合法的过程，但是在墨西哥人的眼里就像是一场种族清洗。

在过去，墨西哥面对美国的这些移民政策时，也许会表现得非常被动。然而，因为在21世纪70年代，美国的移民入境成了突出的问题，而且2080年的选举也将围绕移民问题展开，墨西哥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处理这个事务。美国的经济危机以及墨西哥步入成熟的经济和社会的进程会同时发生，而且将产生一个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美国主要的社会和经济流动（这将不同程度地影响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以及对美国西南部人口的重新定义，将会共同引发一场新的危机。美国的技术和力量也不能轻而易举地解决这场危机。

这场危机始于美国的内部问题。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在全国广阔的领土范围内，英语文化不再占据统治地位。美国会像加拿大或比利时那样成为一个二元文化的国家。虽然第二种文化不会被正式认可，但是它会成为现实，而且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被清晰定义的地理事实。

当二元文化主义被草草忽略，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不是容纳它所形

成的观念，而是维持自身现状，它就会逐渐演变成一个问题。尤其在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开始采取措施来破坏那些少数民族文化的时候，问题就会愈加严重。这种少数民族的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邻国文化的一种延伸。如果它被认为是邻国公民“侵占了”自己的领土，那么形势就要变得剑拔弩张了。

墨美跨界民族问题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到了21世纪70年代，墨西哥人和那些有墨西哥血统的人们会继续沿着那条宽达200英里的线路安家落户。这条线路始自美墨边界，途径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横跨墨西哥被割让的大片领土。这片移民区与其他的移民区域有所不同，它处于墨西哥北部的边界地带，会在文化和经济层面成为墨西哥北面边境的延伸。但政治边界会保持不变。

这些移民不会是被剥夺选举权的雇工。美国在墨西哥的经济扩张，外加美国经济在21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飞速发展，都让这些移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实际上，他们将成为21世纪后期利润丰厚的美墨贸易的促成者。这个群体不仅会主导当地的政治活动，还会支配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诸多政治活动。只有像得州这么幅员广阔的地方，墨西哥移民才无法全面掌控。美国的国境之内最终会出现一个类似加拿大魁北克的“国中之国”。

等到墨西哥移民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时，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国家内部是一个独立实体。更确切地说，他们开始发现自己控制的区域是如此与众不同。基于自己的地位，他们开始要求一系列的特殊权利。当他们自然而然地喜欢上美国的时候，该组织的一部分人会把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的本地人，而不是移民。他们只不过住在墨西哥国外的统治区罢了，而墨西哥国内也会出现鼓动合并的运动。

这个问题将会分化墨西哥裔的内部阵营。一些居民会把他们自己视为美国人；而另外一些人接受了美国精神，但认为自己只是与美国存在着特殊的关系，他们要求美国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第三类群体，也是最小的一个群体，将支持分离运动。在墨西哥内部会产生同样的分歧。有一件事我们要清楚，那就是到2030年以后非法移民将会逐渐消失。到那时，美国政策的重点就是鼓励外国移民。一部分人会把这个问题看做是美国的国内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会打破他们与墨西哥经济关系的和平局面。但是，另外一些人会把美国的人口问题看做重新定义美墨关系的一种方式。以推翻有关移民政策作交换，一些人想要美国在其他问题上对墨西哥做出让步。大多数人还是主张合并的。一场复杂的政治战争将会在华盛顿和墨西哥之间展开，每一方将努力操控边界另一方的局势。

许多参议员和墨西哥血统的国会议员会被选中去华盛顿效劳。一些恰好是墨西哥血统的议员不会把自己看成是选区代表，相反，他们会把自己视作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代表，就像加拿大的魁北克政党。区域政治进程将会开始反映这个新的社会现实。一个新的墨西哥党派将会逐步形成独立的政党势力，并把其代表以独立集团的形式派驻华盛顿。

这种情况会促使移民区政策发生逆转。该移民政策将影响21世纪70年代的生活以及80年代的选举。从人口发展角度来看，21世纪30年代的移民政策需要重新修正，修正的过程会使美国西南部陷入极端的状态。美国大众感到恐慌，反墨情绪也会随之持续上升。美国人一直担心得克萨斯革命和美墨战争的结果可能出现扭转，这种担心已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由此引起的恐惧会在美国煽起对墨西哥裔美国公民以及在美国居住的墨西哥人的敌对情绪。

这种恐慌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美国西南部地区的大片领土自19世纪中叶至21世纪以来一直被美国的拓荒者占领。从21世纪初开始，墨西哥移民开始在这个地区居住。美国人在19世纪用武力强加一个政治军事制度，然后又创造一个人口现状来迎合它。而墨西哥人，也通过美国的

政策，形成了一个新的人口现实。他们将继续考虑以下几种选择：是尝试颠覆美国制造的政治军事社会制度，还是创造一个新的独特的现状，抑或接受现状。而美国人会继续讨论是否要逆转人口的改变趋势，重新安排边界的人口。

然而，任何的讨论都会在边界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边界并不会因为墨西哥人的讨论就轻易地改变。人口组成现状也不会改变。而这正是美国人想要的。美国将依靠一个势不可挡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美国军队）来强制维持边界的稳定。居住于墨西哥割让区的墨西哥人已深深地融入美国的经济生活当中，让他们迁走只会制造巨大的不稳定。因此将会有强大的力量来维持现状，也会出现强大的力量与它对抗。

美国其他方面的主要反冲力将会打开边界，加剧紧张局面。墨西哥的民族论调变得更加激烈，美方也如此。墨裔美国人的意见逐渐统一，其中极端的激进分子和华盛顿激进政客将领军这些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与此同时，有人会尝试走温和路线，但这些相对合理的温和派意见会被看做是背离两国根本利益的做法。对地缘政治的根本性纷争，很难找到双方都乐意接受的合理的折中方案，长期存在的阿以冲突就是最好的例证。

与此同时，那些几十年前办理临时签证，允许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公民，不管他们在美国居住了多久，都将被强制遣回墨西哥。美国将不断加强将对墨西哥边界的控制，同时美国不会防堵那些移民（此刻没有争先恐后挤入美国的人潮），而是在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之间划清界限。虽然这会被冠上安全措施的美名，但实际上它是为了强化1848年战后的既定现实。这些活动以及类似的活动虽然只是激怒了边界两边的大多数墨西哥人，但是却给激进派提供了导火索，而且会给两国的重要贸易活动带来威胁。

在墨西哥内部，政治压力会迫使墨西哥政府维护本国利益。一个新的派系将会脱颖而出，想要入侵被占领的区域，夺回割让给美国的领

土。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组织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不会是一个弱小的派系而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党派。美国仍然控制着墨西哥被割让出去的领土，保护着在那里定居的居民的权利，特别是暂停驱逐那些没有签证而滞留的墨西哥人。出于商业考虑的群体希望维持现状，保持安定，避免冲突，但是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微弱。渴望合并的呼声和寻求区域自治的呼声将会此起彼伏，冲突将会不断爆发。

美国内部仇视墨西哥人的激进者会质疑墨西哥党派的激进争论是否意味着墨西哥打算干预美国内政，甚至可能侵犯美国的西南部领土。接下来，美国国内的极端主义者就有合理的借口采取更加严酷的措施，无视墨西哥人的美国公民身份，将他们统统遣返回国。如果墨西哥政府反抗，就侵略墨西哥。这种言论会持续性地制造紧张气氛。

让我们提前设想一下未来的冲突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但要清楚，我们无法预测到具体的细节，只能获得一个宏观的局势轮廓。

21世纪80年代，墨西哥城开始发生抵制美国的示威游行，接着在洛杉矶、圣地亚哥、休斯敦、圣安东尼奥、菲尼克斯以及其他墨西哥人占据主导地位的边界城市里，也会相继发生游行。最突出的主题将会是墨西哥人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力问题。在美国的少数墨西哥激进分子开始执行密谋破坏活动，还有少数恐怖主义者反对该区域的联邦政府的统治。在未取得墨西哥政府、墨西哥人统治的州政府或边界地带大多数墨西哥人支持的情况下，恐怖主义者的行为会被视为计划暴动和地区分裂的第一步。美国总统顶着强大的压力试图稳定局势，将下令联邦政府接管这些州的国民警卫队，以保护联邦政府的资产设备。

在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州长坚持国民警卫队应由州长管辖，拒绝把国民警卫队交给联邦政府。国民警卫队也会服从州政府的调遣。国会中的一些议员会对此举表示强烈的不满。总统也会抗议，同时还会要求国会允许动员这些州的美国军队，宣布美国已经进入叛乱状态。这导致了国民警卫队和美国军队的直接对抗。

当形势失控的时候，各种问题就会混杂在一起。到那时，墨西哥总统就无力对抗压力了。他不能果断地处理事务，只能动员墨西哥军队，把他们派到边界以北的地方。他的正当理由是美国军队已经沿着墨西哥边界行动起来了。他想防患于未然，预防任何可能的侵犯，并与华盛顿里应外合。但事实上，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由，那就是墨西哥总统会害怕美国军队在这块区域彻底清除墨西哥人，不管是合法公民、绿卡持有人，还是持有签证的人。他也担心美国军队会强迫他们跨过边界，撤回到墨西哥。墨西哥不希望难民成群。而且，他也不希望美国剥夺那些居住在那里的墨西哥人的宝贵的财产。

当墨西哥军队动员起来的时候，美国军队已经全面戒备了。美国军队虽然不太擅长监控敌方的人口，特别是那些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人口，但是他们很善于袭击和破坏敌军。美国空军部队和陆军部队也做好准备，面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

两国总统的会晤会缓和局势。因为很明显，没有人真的希望挑起战争。实际上，没有一方的当权者希望在西南部出现危机。但问题在于：在谈判期间，无论双方多么想恢复原状，墨西哥总统都会有效地代表在美国居住的墨西哥裔的美国公民去谈判。考虑到要降低危机等级，他们将会讨论生活在割让区的墨西哥人的地位问题。此时此刻，谁会为生活在割让区里的墨西哥人说话？显然，那就是墨西哥总统。

当21世纪80年代的危机平息下来的时候，潜在的问题却未能得到解决。边界问题会继续上演。当墨西哥不再有能力强制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时，美国政府也无法强加自私的政治性的解决方案。美国军队进驻并巡视这个区域，就好像它并不是美国国土。而由墨西哥总统代表割让区内的人民于美国进行磋商，更会加深美国大众对该地区的成见。该地区受到墨西哥民族主义者重金资助的激进分离主义组织将进一步煽风点火，恶化局势。小部分恐怖组织在墨西哥割让区和美国实施了一系列的炸弹和绑架事件之后，使得问题层出不穷。墨西哥是否要卷土重来夺回

失地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可是这个地区仍将是美国的地盘，但是生活在这个区域内的人民的忠诚度会受到许多美国人的强烈质疑。

驱逐数以千万计的民众不会是个好的选择，因为从交通运输上它就行不通，而且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与此同时，那些自认为是美国公民的墨西哥裔中的大部分将转变过去的观念，不再将自己看做美国人，其他美国人也不这么看。政治局势将会变得更加紧张。

墨西哥的战略与美国的应对

大约到2090年，墨西哥的激进分子会制造一个新的危机。在把它转变成墨西哥宪法的过程中，住在国外的墨西哥人（从出身和文化方面界定的），不管其公民身份如何，现在都将允许在墨西哥选举中投票。更重要的是，墨西哥国会在墨西哥境外设立选区，以便利于诸如阿根廷等国的墨西哥人投票，方便他们选举出维护居住在阿根廷国家的墨西哥人权益的代表。

大多数选民在美国都有参选资格，这是整个事件的关键点。如此一来，美国占领的墨西哥领土就将划分出墨西哥人选区，这样就有可能从洛杉矶选出两个国会议员，从圣安东尼奥选五个国会议员，组成墨西哥城的国会。墨西哥人社区是个人承担选举费用，这是否会违背美国法律并没有清楚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当美国部分地区心存不满时，联邦政府并不会进行干预。所以，美国国会选举在2090年照常进行，美国的墨西哥人可以同时为设在华盛顿的国会和设在墨西哥城的国会投票。在少数案例中，一个人可以同时入选两个国会。这真是明智之举。这使美国人处于防守状态，但却想不出相应的对策。

21世纪90年代，美国将会内外交困，既要面临艰难的内部局面，又要应对与墨西哥一触即发的战事。墨西哥荷枪实弹，充分武装自己，防备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进攻。美国的空军占有很大优势，而墨西哥在陆

军方面略胜一筹。但美国军队的规模不会很大，而且控制像洛杉矶这样的城市仍然需要最基本的步兵保障。

墨西哥准军事民兵组织会迅速壮大，对美国的侵犯做出反应，在击退进攻之后，民兵组织会在适当的位置留守。双方都在边界地带留有重兵把守，但是民兵组织会切断供给线，将美军力量孤立在边界线附近。美国可能会消灭墨西哥的军队，但那并不意味着可以实现本国西南部地区的和平，或因此而平定墨西哥。与此同时，墨西哥将开始发射本国的卫星，建造无人驾驶的航空飞船。

对于这种形势的国际反应如何呢？世人会袖手旁观，静观其变。墨西哥人希望得到国外的支援。巴西人凭借自身的条件将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会故作姿态与墨西哥保持团结。但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暗自希望墨西哥人能够给其强大邻国的脸上挂点彩，但没有一个国家打算真正卷入这场纷争。墨西哥可能会孤军奋战。它的策略就是在美国边界上激起矛盾，而其他国家则从其他地方向美国发起挑战。波兰人渐渐地对美国滋生出极度不满，其他的新兴国家（如巴西），也因为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垄断心怀不满。

墨西哥只有在军事上与美国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敢与美国开战。但墨西哥需要一个联盟，而构建一个联盟需要时间。然而墨西哥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美国面临内乱。虽然内乱没有达到足以颠覆美国的程度，但是它需要美国分散精力来平息，进而对美国形成了牵绊。侵略和击败墨西哥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很可能会加速恶化问题。美国还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将是墨西哥的主要优势，仅这点就为它赢得了时间。

美墨接壤的边界，现在横穿墨西哥。两国真正的、社会公认的边界位于合法边界以北几百英里之外。事实上，即使美国在战场上战胜了墨西哥，它也不能够解决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局面。这种两难的困局只会演变成为更大的僵局。

在这一切背后掩藏的问题是，美国不得不再次重申自建国以来就困扰它的问题。哪里是北美的“首都”：华盛顿还是墨西哥？看起来后者更像。然而几个世纪之后显然应该是前者。这个问题将再次浮出水面。问题可以延后，却不能回避。

17世纪的西班牙和法国就面临过同样的问题。西班牙位居最高统治地位近100年。它一直控制着大西洋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直到一个新的力量崛起并向它发起挑战。当年的问题是：西班牙和法国，哪个是霸主？**500**年后，**21**世纪后期，美国已经主导世界近**100**年。现在，墨西哥上场了。谁会成为最高统治者？美国虽然控制着太空和海洋，但是墨西哥的挑战来自地面。墨西哥可以越过边界，深入到美国内地，向美国发起挑战，而美国最不擅长应对这种挑战。因此，在21世纪圈上句点之时，摆在桌面上的问题将会是：北美会成为国际体系和大国较量的中心，但是鹿死谁手，谁将是北美的统治者？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得不等到22世纪才能一见分晓。

注释

［1］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327～329.

波士顿学院教授彼得·斯凯利（Peter　Skerry）认为，亨廷顿的某个原创性见解“更令人吃惊，更有争议性”：虽然美国人倡导多样化，但“当今移民浪潮汹涌而至的时期，实际上是我们历史上最不多样化的时期”。他继续阐述并解释亨廷顿的话说：“诚然，非西班牙裔移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但就总体而言，由于50%的移民是西班牙裔或称拉丁裔美国人（Hispanic），使得整个移民队伍的多样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得多。对于亨廷顿来说，这种减少的多样性又使同化的可能性更小。”

大卫·肯尼迪也认为，“移民潮流的变化和分散”会使同化的进程更加平滑顺畅，“然而今天，大规模的移民潮流进入特定的区域，而且有着单一文化、语言、宗教和国家源头，那就是墨西哥……美国没有经验应对西南地区正在出现的严峻形势”。可以想见，到2050年将有几乎一半的美国人说西班牙语。

在上述论点中，地理处于前沿位置。再来看看亨廷顿说的：“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移民族群提过或有资格对美国提出领土和索赔要求。但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可以提，而且也这样提了。”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大部分，都曾是墨西哥的一部分，直到1835年至1836年得克萨斯独立战争，以及1846年至1848年的墨西哥与美国战争。

要论同时遭受美国入侵、占领首都、吞并很大一部分领土，墨西哥是唯一的国家。因此，斯凯利指出，墨西哥人来到美国并居住在这个国家某处，那里曾经是他们的家园，因此“享有一种脚踩自家草地的感觉”，而其他移民就无缘分享。墨西哥裔美国人直到第三代及以后仍能保持他们的母语能力，远远超过其他移民，主要是因为西班牙裔社区在地理上相对集中，并从人口上体现了对得克萨斯独立和墨美战争的否定。

更重要的是，墨西哥裔的入籍归化率是所有移民群体中最低的。亨廷顿指出，国家是一个“记忆的社会”，也就是一个人对于自身历史的记忆。墨西哥裔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12.5%，还不包括其他拉美裔，他们分散集中于美国西南部，与墨西哥相连。他们的加入第一次修改了美国人的历史记忆。到2000年，边境上美方一侧的12个重要城市中，有6个的西班牙裔美国人已经占到人口的90%以上，只有亚利桑那州的圣迭戈市和尤马市的西班牙裔人低于50%。新墨西哥大学教授查尔斯·特鲁克西洛（Charles Truxillo）预测，到2080年美国西南部各州和墨西哥北部各州将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国家。

现在，美国西南边疆趋于模糊化已成为一个地理事实，所有安全设施都不能改变。虽然我很佩服亨廷顿挑战和揭露两难困境的能力，但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结论。亨廷顿认为，面对社会的部分拉美化，要对美国民族主义保持坚定信心，以保存其盎格鲁-新教文化和价值观。但我相信，虽然地理不一定能确定未来，却大致地划定了什么可以实现，什么不可以。

墨西哥与美国之间在地理、历史和人口上的有机联系太紧密了，亨廷顿一厢情愿地希望保持美国民族主义的纯洁性，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亨廷顿也对普世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提出讽刺，认为它们是精英的幻想。但一定程度的普世主义其实是必不可少的，不能一概贬低。我相信，在21世纪的进程中，一种波利尼西亚式混血文明（Polynesian-cum-mestizo）将在美国成形，其走向从北到南，从加拿大到墨西哥，而不是从东到西，像浅肤色种族孤岛一般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这个多种族的组合将是一个广阔的城郊式国家，不管是太平洋西北的卡斯卡迪亚还是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林肯市都彼此相像，每个地方自行培育与城市的经济关系和世界各地的贸易网络，并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打破距离。在我的视野里，美国将成为全球最好最旺的商业交易免税区，成为全球精英最喜欢居住的地方。

按照罗马的传统，美国将继续使用移民法挖掘世界上最好和最聪明的人才资源，并进一步促使移民人口多样化，亨廷顿担心的墨西哥化问题有望解决。民族主义力量必然会得到稀释，但不致过分，美国的独特属性不会受到剥夺，其军事力量也不会被削弱。美国已不再是由大西洋和太平洋保护的岛国，它与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不仅是靠技术，也得益于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人口压力。

［2］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329～330.

但这一设想的前提是，墨西哥作为一个国家不要遭遇失败。如果卡

尔德龙总统和他的继任者能够一劳永逸地断绝贩毒集团的后路（说这件事非常困难，已经算是最客气的说法了），那么美国将取得巨大的战略胜利，远大于在中东可能取得的任何胜利。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墨西哥将与美国结成有机合作联系，这在地缘政治上将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组合。此外，后毒贩时代的墨西哥与稳定和亲美的哥伦比亚相结合，将融合西半球人口最多、第三多和第四多的国家，缓解美国对拉丁美洲和大加勒比地区挥舞大棒造成的紧张感。一言以蔽之，巴塞维奇的推理是正确的：搞定墨西哥，比摆平阿富汗更加重要。

然而不幸的是，正如巴塞维奇断言的那样，墨西哥是一个近乎灾难的国家，而且对大中东的过分关注也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目前的局势会导致更多合法或非法的移民潮，从而创造出亨廷顿预想的恐怖局面。自2006年以来，卡尔德龙对毒枭的进攻已造成23 000人死亡，仅2010年上半年就有近4 000人死亡；此外，贩毒集团也已经进行了升级改造，军事形式的袭击屡屡出现，复杂的陷阱和封闭的逃生路线堪称专业。墨西哥安全专家哈维尔·克鲁兹·安古洛（Javier Cruz Angulo）总结道：“这些都是他们正在使用的战术……它超越了正常有组织犯罪的战略方式。”华盛顿凯托研究所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副总裁特德·盖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也认为：“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墨西哥这个国家的健康发展甚至生存能力都将非常令人担忧。”贩毒集团所使用的武器普遍优于墨西哥警方，甚至可与墨西哥军方媲美。卡彭特说，这使得这些毒贩“超越了单纯的犯罪组织，变成了严重的叛军”，就连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挑选暴力程度低于华雷斯和蒂华纳的地方部署。目前当地警察和政客因害怕被暗杀而纷纷辞职，墨西哥商业和政治精英们把他们的家庭送出国门，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也离开家园飞往美国。

墨西哥现在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在早期阶段向贩毒集团宣战，要么陷入堕落深渊，或两者兼而有之。因为未来难料，美国方面采取什么措施将对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美国安全力量却一边眼睁睁看着墨西哥局势发展，一边卷入其他臭名昭著的腐败政权和不稳定的社会，将

金钱和精力投入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些离美国半个世界之远的地方。

后记
天堂与地狱：21世纪美国地缘政治挑战

崛起的墨西哥最终会对美国的霸权发起挑战，这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但我相信，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对于生活在20世纪初的人而言，同样也是超乎想象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会发展成如今的新天地。正如我在本书序言中所述，当我们力图预测未来时，常识总是让我们出丑——仅回顾一下20世纪所发生的那些让人瞠目结舌的变化，然后试着用常识来想象并期待这些变化，你就会发现事情总是出人意料。预测未来，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对一般的预期提出质疑，培养发散性思维，想常人所不敢想。

今天刚刚或即将出生的孩童将会体验22世纪的生活。我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看来，21世纪只是一个富有科幻色彩的构想，而非我将要生活的真实世界。现实世界的人们关注的是下一时刻，将世纪风云留给梦想家。但事实证明，21世纪对我来说正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我将在这个世纪度过一生中相当长的一段时光。在这段历程中，历史——无论是战争、科技进步、社会变革，都以惊人的方式重塑着我的人生。我庆幸没有死于与苏联的核战争，尽管我见证了多次战争，但其中多数未被预见。《杰特森一家》（*The Jetsons*，又译《摩登家族》，翰纳-芭芭拉公司十大经典卡通剧之一，这部半小时的家庭动画喜剧用未来时空背景来反映当时的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译者注）没有描绘出1999年生活的轮廓。实际上，1999年时，我已经用笔记本电脑进行写作了。通过它，我可以在几秒钟内用无线网络获取全球互联网信息。联合国没有解决人类的问题，然而黑人和妇女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所期待的与实际发生的完全是两码事。

回顾20世纪，有些事我们可以有十足的把握，有些事我们一知半解，有些事我们一无所知。但我们确信，单一民族国家将会一如既往成为人类组建世界的方式。我们也知道战争将更具杀伤力。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知道，他发明的三硝基甲苯，会把战争推向无穷无尽的恐怖深渊，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通讯和交通革命——无线电、汽车、飞机业已出现。只需运用想象，外加一点信息，就可以领略到它们将为未来世界带来多大的改变。

回顾20世纪，我们知道，战争不可避免且会愈演愈烈，就不难想象出战争的大体局势。曾几何时，新结盟的欧洲列强——德国和意大利，以及刚刚完成工业化的日本，致力于重新制定国际体系，对原来主要受控于以英法为首的大西洋欧洲列强的国际体系发起挑战。随着战争将欧洲和亚洲一分为二，不难预见（其实许多人都预见到了）俄罗斯和美国将会崛起成为两个全球超级大国。随之而来的事则没那么显而易见，却也并非超出想象。

世纪之初，科幻小说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描述了接下来几个世代会在战争中投入使用的武器。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看看哪些是已经想象得到的，哪些是已经制造完成的，哪些与未来战争相关联。可以想象的不仅是技术领域。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战争博弈者及日本防卫省官员均描述了美日战争的大致轮廓。德国总参谋部在两次世界大战前都列出了战争可能推进的路线和存在的风险。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可以看到战争的后果，不但会丢掉大英帝国，还会招致未来的冷战。没人能够想象出确切的细节，但是20世纪的大致轮廓是可以预知的。

这即是我试图在本书中所要做的：通过地缘政治理论来“感受”21世纪。我以永恒作为开始：人类所处环境是持续存在的。接着，我着眼于发现长远大趋势，而长远大趋势可以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窥见一二，即随着欧洲作为全球文明中心的衰落和倒塌，世界中心地位正被北

美，尤其是主导北美的美国势力所取代。由于国际体系的这种深远转变，不难看清美国的特征——刚愎自用，不够成熟，但又绝顶聪明，而世界对其的反应是：恐惧、妒忌和反抗。

而后我将致力于研究以下两点：其一，谁将反抗；其二，美国将对他们的反抗作何反应。反抗将紧跟着20世纪短暂的转折期如浪潮般席卷而至。最初是伊斯兰教国家，随后是俄罗斯，而后是新势力（土耳其、波兰和日本）的联盟，最后是墨西哥。为了理解美国的反应，我回顾美国过去数百年的历史，依个人之见划分为50年一个周期，并尝试设想2030年和2080年将会如何。这使我想起业已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人口爆炸时代的结束，并考虑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我也能想象现有技术会如何应对社会危机，并为机器人与基于空间的太阳能技术的发展制订一个路线图。

越接近细节，越容易犯错误。我谨记此道，但是，在我看来，我的任务就是让你找到一点21世纪的感觉，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感觉起来如何。对于一些细节，我的预测未必精准。实际上，我可能对哪些国家会成为强国，以及它们会如何对抗美国有些错误估计。但是我确定美国的国际地位将会成为21世纪的核心问题，而其他的国家将会全速崛起。最后，我必须强调一点：那就是美国没有衰落，事实上，它的崛起才刚刚开始。

此外，此书并非有意为美国庆功的应景之作。我是美国政策的支持者，但我认为《宪法》或《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并不是美国强大的源泉。我进行史料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促使美国强大的是诸如此类的战役：杰克逊将军在新奥尔良战场上立马横刀（1815年1月，美军与英军为争夺新奥尔良展开决战。防守该城的美军将领安德鲁·杰克逊沉着应战，美军以很少的伤亡取得了胜利。杰克逊也因此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1828年当选美国总统。——译者注），休士顿将军在圣哈辛托河战役中打败墨西哥桑塔·安纳大将（圣哈辛托战役于

1836年4月21日在今美国得克萨斯州哈里斯打响。在山姆·休士顿将军的率领下，仅用18分钟就击败了墨西哥军队。墨西哥军队撤出得克萨斯，这次也成为得克萨斯摆脱墨西哥控制的决定性战役。——译者注），吞并夏威夷，以及1940年英国海军将在西半球的海军基地让渡给美国。

有一点我没有触及，但有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没有在本书中涉及全球变暖问题。这看起来是一个很明显的纰漏。但我确信环境恶化，气候变暖问题，科学家们已经发出无数警告，这场辩论已经结束，共识也已经达成，我也承认全球变暖，人类是罪魁祸首。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言："人类不会给自己制造没有解决方法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条普遍真理，然而就全球变暖的问题来说，它似乎千真万确。

两股力量的出现，可能让现在成为焦点的全球变暖问题在将来变得无关紧要。首先，人口爆炸一旦结束，再经过几十年，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就会趋缓，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将会减少；其次，开发和使用碳氢化合物的成本上涨将会增加对替代品的渴求。最显而易见的选择就是太阳能，但是我很清楚，以地球为基地收集太阳能，还存在诸多需要攻克的难关。但是如果成功开发太空太阳能的话，那么大多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到21世纪下半叶，我们将看到人口数量和技术方面的转变，二者将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换言之，人口数量的下降，以及为谋求全球权力而主宰太空的努力将交织在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想象到全球变暖的解决方式，那将是其他研究进程中意外的收获。

意料之外就是本书的主旨。如果人类可以直接决定自己能做什么，然后付诸实践，那么就没有必要预测未来了。自由意志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期。但有意思的是，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并不是很自由。理论上讲人们能够生10个孩子，却几乎没人愿意那么做。我们总是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这些行为总是会产生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们用微芯片在宇宙飞船上组装一台电脑时，他们并

没有想到去研制iPod播放器。

我在这本书中所应用的核心方法是通过研究制约个人和国家的因素，来了解受到这些制约后他们的表现，然后试着预测这些行动可能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存在着无尽的未知，因此对于未来100年的预测不可能完整或是完全准确。但是如果这些预测能够有助于你理解重要的制约因素，了解由其引发的可能性回应，那么我就知足了。

写这样一本书对我来说，真的是相当奇怪。书中内容对错与否，我皆无从知晓和验证。因此，这本书是为我的孩子们而写，甚至为我的孙辈们而写。如果本书能对他们起到任何指引作用，我也算没有白费工夫。

致谢

若无战略预测公司的广大同仁，别说本书能出版，就连想都不敢想。我的朋友唐·凯肯德尔（Don Kuykendall）自始至终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着我。斯科特·斯特林格（Scott Stringer）对地图插页一直都充满耐心并极具想象力。所有公司同仁都努力协助我把书做到最好。我尤其要感谢罗杰·贝克（Rodger Baker）、热娃·布哈拉（Reva Bhalla）、劳伦·古德里治（Lauren Goodrich）、纳特·休斯（Nate Hughes）、艾瑞克·艾森斯坦（Aaric Eisenstein）和科林·查普曼（Colin Chapman）。我还要特别要感谢皮特·珍罕（Peter Zeihan），其一丝不苟、一针见血的评论给予我莫大的帮助，极大地激励了我。除了战略预测公司这个大家庭，我还要感谢约翰·毛尔丹（John Mauldin）和古斯塔·莫尔纳（Gusztav Molnar），他们教会了我换位思考。苏珊·科普兰（Susan Copeland）把各种杂务做得井井有条，让人放心。

最后，我想要感谢我的稿务代理吉姆·豪恩费斯（Jim Hornfisher），感谢我在道布尔戴（Doubleday）出版社的编辑詹森·考夫曼（Jason Kaufman），他们俩不遗余力地让本书变得通俗易懂。罗布·布卢姆（Rob Bloom）负责统稿，将凌乱的内容融为一个整体。

尽管这本书是集体的结晶，“衣食父母”颇多，但我仍要对其中的瑕疵负全责。

译后记

本书的翻译工作确是一份不小的挑战。一是因为未来100年的世界的确是一个看似虚无缥缈的未知；二是地缘政治学也并不是一个经常接触到的视角，作者以“按图说话”的方式来解析国际关系也不是我们文科人所熟悉的分析方法；三是本书的有些言论观点甚为偏激，在翻译过程中觉得有待考量，有的是感情上不能接受，有的是理念上无法判断。但随着翻译工作的继续与深入，我们越来越发觉其实带有疑问地去看待翻译对象是一件对工作、对自己都非常有帮助的事。探索接下来的内容，和作者一样预测未来的情景，就好像站在他的身后，顺着他的手指，向远方眺望。他让我们看到，这个预测中的未来并不是只有人们一相情愿的光明，也会有阴霾，也会有冲突，甚至战乱。

作为译者，我们没必要同意或捍卫作者的观点，但我们相信，在书籍市场上快餐文化、娱乐文化盛行的气候下，如果有一本书能让你进行深沉且长远的思索，这不失为一件好事。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张宁、刘娜、刘杰、余红、王洁、林丽妍、邵蓓蓓、方慧倩、仉进、孙远波、田野、张娜娜、刘志欣、王琳、宋丹丹、任宇欣、辛德娣、曹菲，等等。张建华审稿。中资出版公司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们为本书译稿的完善付出了大量心血。

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背景和成功案例

乔治·弗里德曼以犹太人天生的灵敏嗅觉，一手创立了私营情报预测机构“战略预测公司”（简称“战预”），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未来趋势、情报资讯分析机构，为各国政府、《财富》500强提供建议和经营环境解析，提出全球大战略思考架构下的行动方向，是美国唯一一所可以公开合法出售情报分析成果的私营机构。“战预”在全球各地与分析家、学界、智库和各领域顶尖人士合作，将搜罗的情报信息严格筛选整理，为客户提供现场情报、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三大重点产品。因此，“战预”公司在美国又被称为“影子中情局”或“民间中情局”。在中情局因情报不准广受指责诟病之际，“战预”反而名声鹊起。

1996年“战预”公司刚刚成立，即成功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唯一现场解析1999年北约空袭科索沃战况和未来冲击的私营机构，而所用的方式竟是从战场给CNN发电子邮件，不花一分钱就办了中情局花大价钱也办不到的事，经由《时代》杂志披露后确立了该机构的权威地位。“9·11”事件后，该公司更首度对大众定期有偿提供信息，预测基地组织及布什政府的策略方向。该智库也曾经准确预测巴基斯坦、阿富汗紧张局势升级的关键因素，破解拉美毒枭组织的经营结构，并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新政面临的挑战提出精辟建议。